

建党以来

重要文献选编

(一九二一—一九四九)

第二十一册

建党以来 重要文献选编

(一九二一——一九四九)

第二十一册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央档案馆 编

中央文献出版社

目 录

- 迎接一九四四年 (1)
 ——纳粹覆亡的一年
 (一九四四年一月一日《解放日报》新年献辞)
- 毛泽东给杨绍萱、齐燕铭的信 (5)
 (一九四四年一月九日)
-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晋察冀分局干部扩大会议
 应讨论的几个问题的指示 (6)
 (一九四四年一月十日)
- 军民关系要更亲密 贺 龙 (12)
 (一九四四年一月十五日)
-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对待国民党军队执行
 自卫原则的指示 (17)
 (一九四四年一月十八日)
- 群众需要精神粮食 (18)
 (一九四四年一月二十日《解放日报》社论)
-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对坦白分子进行甄别
 工作的指示 (22)
 (一九四四年一月二十四日)
- 一九四三年生产运动的基本总结 李富春 (25)
 (一九四四年一月二十五日)

-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东江游击区建立
抗日民主政权问题给尹林平的指示…………… (34)
(一九四四年一月三十一日)
- 毛泽东关于国共有协调可能给董必武的电报…………… (35)
(一九四四年二月四日)
- 军委、总政治部对全山东政治工作会议的指示…………… (37)
(一九四四年二月五日)
- 中共中央关于检查拥政爱民及拥军优抗
工作的指示…………… (43)
(一九四四年二月七日)
- 毛泽东等关于应付阎锡山部东进方针
给滕代远、邓小平的电报…………… (45)
(一九四四年二月八日)
- 中共中央关于转发西北局减租指示的通知…………… (47)
(一九四四年二月八日)
- 毛泽东、彭德怀关于揭破蒋介石以反共缓敌
进攻的诡计给邓小平、滕代远的电报…………… (49)
(一九四四年二月十日)
- 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延安机关学校
政治教育的通知…………… (51)
(一九四四年二月)
- 敌后军民的道路…………… (53)
——战斗与生产结合起来
(一九四四年三月二日《解放日报》社论)
- 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 周恩来 (58)
(一九四四年三月三日、四日)
- 关于路线学习、工作作风和时局问题…………… 毛泽东 (87)
(一九四四年三月五日)

-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注意防止和纠正坦白运动中
各种“左”倾错误给饶漱石的指示 (96)
(一九四四年三月九日)
- 毛泽东等关于对阎锡山斗争的方针给滕代远、
邓小平等的指示 (98)
(一九四四年三月十日)
-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组织生产问题
给华中局的指示 (101)
(一九四四年三月十三日)
- 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关于山东工作
给罗荣桓等的电报 (103)
(一九四四年三月十六日)
- 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目前国内问题宣传政策的
通知 (105)
(一九四四年三月二十一日)
- 毛泽东等关于公布战绩应用实数
给八路军总部等的电报 (106)
(一九四四年三月二十一日)
- 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在目前时期中的宣传策略
给程子华、刘澜涛的电报 (107)
(一九四四年三月二十二日)
- 关于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问题 毛泽东 (108)
(一九四四年三月二十二日)
- 陕甘宁边区三三制的政体 林伯渠 (123)
(一九四四年三月二十五日)
- 学会做共产党的商人 陈 云 (132)
(一九四四年)

- 总政治部关于加强我军对外宣传工作的指示 (140)
（一九四四年四月一日）
- 毛泽东等关于争取国内平静拉蒋抗日
给罗荣桓等的电报 (141)
（一九四四年四月五日）
- 回忆我的母亲 朱 德 (142)
（一九四四年四月五日）
- 毛泽东关于国共有重新协调之望
给北方局等的电报 (147)
（一九四四年四月六日）
- 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工作的基本方针 任弼时 (148)
（一九四四年四月七日、八日）
- 毛泽东给陈毅的信 (189)
（一九四四年四月九日）
- 学习和时局 毛泽东 (190)
（一九四四年四月十二日）
- 中共中央宣传部、总政治部关于印发谭政
《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通知 (202)
（一九四四年四月二十日）
- 附：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 谭 政 (203)
（一九四四年四月十一日）
- 毛泽东关于向河南发展问题给滕代远、
邓小平等的电报 (238)
（一九四四年四月二十二日）
- 对敌斗争与武装建设中最大的经验教训 刘伯承 (239)
（一九四四年四月三十日）
- 太行区三次简政总结 (243)
（一九四四年五月七日）

-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敌进攻河南情况下的
工作方针的指示 (250)
(一九四四年五月十一日)
- 毛泽东关于向国民党提出的二十条谈判意见
给林伯渠的电报 (252)
(一九四四年五月十五日)
-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目前不应向新黄河以西发展
给北方局转冀鲁豫分局的指示 (257)
(一九四四年五月十八日)
- 附：冀鲁豫分局关于向豫皖边发展等问题的意见 (258)
(一九四四年五月五日)
- 在陕甘宁边区工厂职工代表会议上的讲话 刘少奇 (260)
(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日)
- 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的工作报告 毛泽东 (265)
(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一日)
- 共产党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 毛泽东 (272)
(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二日)
- 在延安大学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毛泽东 (274)
(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四日)
- 中共中央关于发动与争取基本群众的方针
给华中局的指示 (282)
(一九四四年五月三十一日)
- 中共中央关于改订华中的财税政策
给饶漱石等的指示 (284)
(一九四四年五月三十一日)
- 总政治部关于敌军工作的指示 (286)
(一九四四年六月一日)

- 毛泽东关于同意林伯渠等对时局的估计和
谈判意见的复电 (291)
(一九四四年六月三日)
- 附一：林伯渠等关于目前的形势和谈判问题
给毛泽东的电报 (292)
(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三日)
- 附二：林伯渠关于国民党代表张治中、王世杰拒绝
接受我党二十条问题给毛泽东的电报 (294)
(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三日)
- 附三：林伯渠等关于十天来的活动及各方面的动态
给毛泽东的电报 (296)
(一九四四年六月五日)
- 中共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 (299)
(一九四四年六月五日)
- 第二战场开辟与中国抗战 (308)
(一九四四年六月八日《解放日报》社论)
- 林伯渠为国民党代表拒绝接收我党意见书
致张治中、王世杰函 (313)
(一九四四年六月十一日)
- 毛泽东会见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的讲话 (315)
(一九四四年六月十二日)
- 中共中央关于兵役制度问题给晋察冀分局的
指示 (319)
(一九四四年六月十四日)
- 纪念联合国日，保卫西安与西北！ 毛泽东 (320)
(一九四四年六月十四日)
- 中共抗战一般情况的介绍 叶剑英 (324)
(一九四四年六月二十二日)

- 刘少奇、陈毅关于华中部队准备向河南发展
给张云逸等的电报 (348)
(一九四四年六月二十三日)
- 中共中央关于整训军队的指示 (350)
(一九四四年七月一日)
- 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 罗荣桓 (356)
(一九四四年七月一日)
- 边区参议会常驻委员会、边区政府委员会联席会议关于召开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二次大会的决定 (364)
(一九四四年七月五日)
- 中共中央发布抗战七周年纪念口号 (367)
(一九四四年七月六日)
- 八路军新四军的英雄主义 朱 德 (370)
(一九四四年七月七日)
- 在民主与团结的基础上，加强抗战，争取
最后胜利！ (377)
——纪念抗战七周年
(一九四四年七月七日《解放日报》社论)
- 中共中央关于新四军五师工作给郑位三、
李先念等的指示 (383)
(一九四四年七月十日)
- 附：郑位三、李先念等关于五师工作和向河南发展
等问题给张云逸、饶漱石等的报告 (384)
(一九四四年七月三日)
- 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对中国大资产阶级及美英
资产阶级的政策问题给晋察冀分局的电报 (386)
(一九四四年七月十三日)

- 附：晋察冀分局关于大资产阶级有无革命性问题的
请示 (387)
(一九四四年六月二十日)
- 毛泽东同英国记者斯坦因的谈话 (389)
(一九四四年七月十四日)
- 毛泽东关于时局近况的通知 (400)
(一九四四年七月十五日)
- 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华南根据地工作给曾生、
冯白驹等的指示 (403)
(一九四四年七月十五日)
- 党在不断学习中进步 董必武 (405)
(一九四四年七月十五日)
- 思想方法问题 彭 真 (409)
(一九四四年七月十八日、十九日)
- 开辟豫西抗日根据地 邓小平 (420)
(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日)
- 中共中央关于收集研究全国经济情报的通知 (425)
(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二日)
- 中共中央关于争取教民的指示 (427)
(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二日)
- 中共中央关于发展河南敌后工作的指示 (428)
(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五日)
- 中共中央关于布置湘粤两省工作和桂林疏散
给董必武的指示 (431)
(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五日)
- 中共中央关于东江纵队应大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
给尹林平等的指示 (433)
(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五日)

- 毛泽东关于请各地调查和答复十项问题的电报…………… (435)
 (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八日)
- 附一：罗荣桓、黎玉答复毛泽东的十项问题 …… (437)
 (一九四四年八月十二日)
- 附二：邓小平答复毛泽东的十项问题 …… (446)
 (一九四四年八月二十四日)
- 毛泽东等关于在上海、杭州周围广泛发展游击
 战争等问题给华中局的电报…………… (455)
 (一九四四年八月三日)
- 衡阳失守后国民党将如何 …… (456)
 (一九四四年八月十二日《解放日报》社论)
- 周恩来关于国共谈判问题答新华社记者问 …… (460)
 (一九四四年八月十二日)
- 中共中央关于克服财政困难和生产自救问题
 给豫鄂区党委的指示 …… (466)
 (一九四四年八月十二日)
- 欢迎美军观察组的战友们! …… (469)
 (一九四四年八月十五日《解放日报》社论)
- 中共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 (473)
 (一九四四年八月十八日)
- 毛泽东关于认真布置沪杭甬地区工作给张云逸、
 饶漱石、赖传珠的电报 …… (478)
 (一九四四年八月二十一日)
- 毛泽东、刘少奇、陈毅关于华中部队整训
 给饶漱石等的电报 …… (479)
 (一九四四年八月二十二日)
- 毛泽东关于同国民党谈判我军编制问题
 给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的电报 …… (482)
 (一九四四年八月二十二日)

- 毛泽东给秦邦宪的信 (483)
（一九四四年八月三十一日）
- 中共中央关于建立城市工作部门的指示 (486)
（一九四四年九月四日）
- 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满洲工作给晋察冀分局的
指示 (487)
（一九四四年九月四日）
- 中共中央关于提出改组国民政府的主张及其
实施方案给林伯渠等的指示 (488)
（一九四四年九月四日）
- 为人民服务 毛泽东 (490)
（一九四四年九月八日）
- 中共中央关于要求合理分配盟国援华物资
给董必武的指示 (492)
（一九四四年九月九日）
- 军委关于建立联络机关的通令 (494)
（一九四四年九月九日）
- 毛泽东、刘少奇关于同美军合作的方针问题
给张云逸、饶漱石、曾山的电报 (497)
（一九四四年九月十日）
- 林伯渠在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上关于
国共谈判的报告 (498)
（一九四四年九月十五日）
- 延安权威人士评国共谈判 (507)
（一九四四年九月十九日）
附：国共谈判双方来往文件 (511)
- 延安观察家评国内战局 (524)
（一九四四年九月二十一日）

-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关于民兵工作的指示 (527)
(一九四四年九月二十六日)
- 林伯渠给王世杰、张治中的复信 (534)
(一九四四年九月二十七日)
- 中共中央关于开展苏浙皖地区工作
给华中局的指示 (538)
(一九四四年九月二十七日)
- 周恩来致史迪威将军说帖 (540)
(一九四四年九月)
- 评蒋介石在双十节的演说 毛泽东 (544)
(一九四四年十月十一日)
- 军委关于准备决战前日军严重“扫荡”
给邓小平、滕代远等的指示 (548)
(一九四四年十月十四日)
- 中共中央关于巩固太岳、豫西等根据地的指示 (550)
(一九四四年十月十四日)
- 军委关于开辟河南根据地问题给郑位三、
李先念等的指示 (552)
(一九四四年十月十四日)
- 毛泽东对董必武、林伯渠关于同赫尔利谈话
情况的电报的批语 (554)
(一九四四年十月十九日)
- 附一：董必武、林伯渠关于第一次同赫尔利谈话情况
给毛泽东、周恩来的电报 (554)
(一九四四年十月十七日)
- 附二：董必武、林伯渠关于第二次同赫尔利谈话情况
给毛泽东的电报 (555)
(一九四四年十月十八日)

- 附三：董必武、林伯渠关于第三次同赫尔利谈话情况
给毛泽东的电报 (556)
(一九四四年十月二十四日)
- 军委关于暂时缓和同阎锡山的关系给邓小平、
滕代远等的指示 (558)
(一九四四年十月二十日)、
- 军委关于向苏浙豫皖发展给华中局的指示 (560)
(一九四四年十月二十四日)
- 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广东游击战争等问题
给尹林平等的指示 (561)
(一九四四年十月二十六日)
- 在湘赣工作座谈会上的发言 任弼时 (564)
(一九四四年十月二十六日)
- 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 毛泽东 (582)
(一九四四年十月三十日)
- 毛泽东、刘少奇关于准备力量向苏浙地区发展
给饶漱石、张云逸、赖传珠的指示 (585)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日)
- 南下的方针与任务 任弼时 (587)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四日)
- 毛泽东同赫尔利的谈话 (601)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八日)
- 延安协定草案 (607)
——中国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协定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日)
- 附一：赫尔利致毛泽东的信 (608)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日)

- 附二：赫尔利带来之五条 (609)
 (一九四四年十月二十八日)
- 毛泽东给罗斯福的信 (611)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日)
- 中共中央关于东江、琼崖工作给尹林平的指示 (613)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四日)
- 开展大规模的群众文教运动 李维汉 (614)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五日)
- 陕甘宁边区文教大会关于发展群众艺术的决议 (625)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六日)
- 陕甘宁边区文教大会关于开展群众卫生医药
 工作的决议 (630)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
- 毛泽东给郭沫若的信 (634)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 中共中央关于华中军事部署的指示 (635)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 附一：中共中央华中局关于转报给粟裕、谭震林
 等的信给刘少奇的电报 (636)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七日)
- 附二：中共中央华中局关于发展东南的部署
 给中央的报告 (640)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日)
-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审干反奸工作
 给晋察冀分局的指示 (643)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 毛泽东给谢觉哉的信 (646)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一日)

- 毛泽东、周恩来关于同蒋介石谈判的原则立场
给王若飞的指示 (648)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二日)
- 彭德怀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二届二次会议的讲话 (649)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二日)
- 一九四五年的任务 毛泽东 (657)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五日)
- 高岗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二届二次会议的讲话 (667)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七日)
- 毛泽东关于扩大解放区给程子华的指示 (672)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八日)
- 毛泽东关于对英雄模范须勤加教育
给程子华的信 (673)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 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 (674)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 刘少奇、陈毅关于发展江南的准备工作
给饶漱石等的电报 (678)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迎接一九四四年

——纳粹覆亡的一年

(一九四四年一月一日《解放日报》新年献辞)

充满着伟大历史事变的一九四三年，已经过去了。这一年中，斯大林格勒之役，标志了世界战争的转折点，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与德黑兰三国领袖会议，标志了世界政治的转折点。世界今后发展的方向，已经确定下来了。在中国，陕甘宁边区的生产运动，敌后八路军新四军的胜利与民兵的大活跃，各抗日根据地整风学习与防奸运动的开展，打破了口寇的“扫荡”、“蚕食”、经济封锁、政治阴谋与特务政策。中共中央十大政策，给了我们以信心与把握，来渡过抗战相持阶段中最困难的年头，来准备行将到来的反攻。四国宣言的发表，开罗会议的举行，给了我国抗战阵营中的投降派反动派以打击，剥夺了他们阴谋妥协投降的借口，这是苏英美盟国对我中国人民极其重大的帮助。

一九四三年过去了。更伟大的一年，在人类历史上更重要的一年——一九四四年到来了。只要第二战场一开辟，这一年就一定是纳粹覆亡的一年，是希特勒就擒的一年，是法西斯的恶势力及其所造成的一切事物从欧洲大陆上扫除净尽的一年，是欧洲各民族与各国人民从死亡、饥饿、牢狱生活与专制独裁之下大翻身的一年。西方的这种变化，毫无疑义会大大影响我

们东方。

战争与灾祸，是人类所不喜欢的。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爆发了规模空前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照理来说，在那一次大战以后，人类就应该可以防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的。但是为什么仅仅二十余年之后，又发生了规模更大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有一批反动派，主张对法西斯纵容，对共产党反对。共产党做了许多最大的好事，如像推翻沙皇专制的俄国，建设没有失业没有穷人的社会主义社会。共产党不论在什么地方，在什么时候，总是主张民主，主张进步，总是做好事。但反动派对共产党做的这许多好事都心怀成见，不但不赞成，而且还要千方百计的来破坏。法西斯本来没有什么力量，不过是几个流氓，一撮匪徒，只因为法西斯高叫反对共产党，反动派就把它当作宝贝，赞成它，纵容它，以至帮助它。最后养虎贻患，荼毒人类，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靠得有个苏联，靠得有个共产党，才能打败法西斯，把人类从毁灭中挽救了过来。经过了这次大流血的教训，连反共二十年的丘吉尔也改变了态度。凡是不愿人类再有战争与灾祸的，到了今天，都应当知道：共产党是反对不得的，法西斯是纵容不得的。反共反苏的调调，现在已经没有市场了。这就是为什么英美和中国尽管还有些顽固不化的反动派，尽管这些反动派还在反共反苏，还在纵容法西斯，还在把法西斯当作宝贝，而世界发展的方向，却与他们的主观愿望背道而驰。今年希特勒败亡之后，欧洲就是绝灭了法西斯匪徒的欧洲，就是社会主义与新民主主义的欧洲，这必然会大大影响东方，影响中国。此其一。

再就军事的形势而言。莫斯科会议、开罗会议与德黑兰会议，对于所谓“先亚后欧”的叫嚣，加以驳斥，确定了盟国的

战略，首先打败希特勒，然后收拾日本法西斯。这个战略是完全正确的。一九四四年，盟国军队的主力事实上还不能移来东方对付日寇，但英美海军主力移来太平洋战场，则已经是很有可能的了。在太平洋战场上，盟军在一九四三年中取得了许多胜利，逐岛推进，特别是阿图岛战役与吉尔贝特群岛战役，守岛日寇全部歼灭，无一漏网，尤足称道。今年，由于英美海军主力可能移来，太平洋上海战与岛屿争夺战中，盟军必将大显身手，以完全取得制海权与制空权，为完全战败日寇奠定基础。一九四三年日寇已在哀鸣空军不够，一九四四年日寇又将哀鸣其海军的薄弱了。此其二。

综合起来看，国际形势，对于我国的抗战，今年比之往年是更有利了。我们中国，如果在敌后各抗日根据地与陕甘宁边区，坚持实行十大政策；如果在大后方，国民党方面能实行中共七七宣言中所提出的“加强作战”、“加强团结”、“改良政治”、“发展生产”四条；正面与敌后共同努力，一切为着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强盗，那末，再过一年，我国就可以开始对日寇进行战略反攻。

但是，我们必须深刻警惕读者：虽然国际形势如此有利，但抗战的难关并未过去；虽然四国宣言已经发表，开罗会议已经开过，但投降危险与内战危险并未完结；加以战争连年，明年各根据地必须接受晋冀鲁豫的经验，郑重周密的准备与灾荒奋斗！日寇的垂死挣扎是必然的，没落的中国投降派反动派的发疯也是可能的，再加上天灾的威胁，因此，一九四四年将是抗战战略相持阶段的最后一年，但也许将是最困难最艰苦的一年。

国际形势是非常之好的，去年一年的成绩是非常之大的，但切勿以此自满，切勿因此而有任何的骄傲，须知敌人还是强

大，危险还未过去。必须精神上对于对付最坏的环境有充分的准备，始能临事不惧；必须在实际工作中兢兢业业，实事求是，依靠群众，不要脱离群众，始能取得新的成绩。

值兹新年，本报向我前线忠勇将士与民兵英雄、劳动英雄、各界抗日人士，及我们的国际战友——盟军将士与盟国人民致敬，祝贺去年的伟大胜利，并预祝今年更伟大的胜利！

根据一九四四年一月一日《解放日报》
刊印。

毛泽东给杨绍萱、齐燕铭的信^{*}

(一九四四年一月九日)

绍萱、燕铭同志：

看了你们的戏，你们做了很好的工作，我向你们致谢，并请代向演员同志们致谢！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郭沫若在历史话剧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你们则在旧剧方面做了此种工作。你们这个开端将是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我想到这一点就十分高兴，希望你们多编多演，蔚成风气，推向全国去！

敬礼！

毛 泽 东

一月九日夜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三卷刊印。

^{*} 这是毛泽东看了杨绍萱、齐燕铭编导、中共中央党校俱乐部演出的平剧（即京剧）《逼上梁山》后，写给编导者的信。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 晋察冀分局干部扩大会议应 讨论的几个问题的指示^{*}

(一九四四年一月十日)

晋察冀分局并告北局：

子华、澜涛^[1]同志并转分局各同志：

荣臻、理卿^[2]同志先后来延，使中央对晋察冀过去及现在工作，有更多了解。六年来，分局同志及晋察冀全体干部党员和在边区的八路军指战员与人民群众相结合，创造并坚持了晋察冀民主抗日根据地，是执行了中央的路线和所给与的任务，工作是有很大成绩的。近年来在敌人“扫荡”、“蚕食”更加艰苦的战斗情况下，你们不仅粉碎了敌人的企图，并且还把我们的力量伸入到敌后的敌后去，在一千多村庄中恢复了工作，证明你们在极困难的局面下仍能有办法坚持。但是应当认识目前国际形势虽然愈对中国抗战有利，并有助于击败希特勒后紧接着击败日本的可能，但在我们领导机关布置工作，宁可放在时间较长的估计上面。而且华北是敌人力求掌握的兵站基地，其控制兵力，不会很大减弱。晋察冀区域更处平津附近，为敌所特别重视。因此在军事上敌强我弱形势，直到全国反攻前，是不

* 这个指示经过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通过。

会改变的。我们在思想上还要有在最困难局面下，和敌人熬时间的准备。这就需要我们避免轻敌速胜观念，要更加依靠群众，与群众打成一片，要认真执行十大政策，不犯错误或少犯错误，要边区党政军民更加团结一致，才能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坚持。同时，必须自信我们在最困难条件下坚持了六年半斗争，经历过各种考验，克服过许多困难，创造出许多新的斗争方式。只要能够正确执行党的政策，则不仅可以继续坚持斗争，而且还可以争取一些新的发展。若果从这个方面来看晋察冀的工作，则还有若干不够的地方需要我们努力去充实与改进。中央与荣臻、理卿同志共同检讨晋察冀工作后，特提出下列几点意见，作你们这次干部扩大会议讨论的参考。

（一）在对形势估计问题上，我们觉得在某些干部中尚缺乏坚持长期斗争的足够认识；而对整个边区今天游击性的增大，如何从主力部队多抽出力量进一步加强广泛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以及认真的开展伪军工作，还有不够的地方；对边区军民愈日困苦的情形也还估计不足；同时在一部分下层干部、党员、士兵和群众中，在困难增加情况下，又已生长了一种悲观情绪（你们去年八月的组宣会议已经提到这一点），这是极可注意的。这次干部扩大会议中，要求能够在形势估计上获得一致的认识，才能保障对敌斗争的顺利开展，认真加强对游击战争、武工队、民兵工作及敌伪军工作（特别是对伪军伪组织工作）的领导。

（二）坚持长期斗争的又一个最基本条件，就是要极大地注意发展军民生产及节用民间物力。在长期战争负担与敌人“三光”政策破坏、劳动力日形减少、某些地区熟荒增加、生产力大大的下降的情形之下，组织全体部队、机关及全体人民开展生产运动，以便增加人民生产及减轻人民负担（你们那里

人民的负担是相当重的），实在是非常重要的工作。我们觉得关于发展公私生产的重要性，特别是农业生产，在党内还缺乏足够认识。因此，也就抓得不紧（合作社运动是有成绩的，今后还需开展这一工作），对群众农业生产还只限于个别问题的解决和注意以及军队帮助群众生产的方面，尚未有全般的、有计划的组织农民劳动力去进行生产运动。开展吴满有运动还只是停留在一般的号召上，部队与机关还缺乏把生产当做自己一种极端重大任务的认识，因之也就未能创造许多可能进行生产的办法，求得从生产收获中改善部队、机关的生活，同时减少人民的负担（据说有些战士因吃不饱发生不满），刺激和影响人民的生产热情。希望这次会议对于展开生产运动问题，着重地加以检讨，并根据毛主席欢迎劳动英雄会上的演说《组织起来》所提示的方针，按照晋察冀实际情形具体布置今年公私的生产运动。

（三）要坚持敌后长期斗争，必须更加依靠群众。在一切政策的决定与实施中都须经常具有坚强的群众观点，要克服地方干部中只知向群众要东西，而不注意帮助群众发展生产的作风。这主要的是由于我们缺乏明确的尖锐的向干部提出此项任务及组织此项任务的实行。你们这次会议上必须对此加以检讨，并经常注意防止官僚主义倾向。在军民关系上，拥政爱民观念在许多军队干部中还很不够，军队侵犯群众利益的军阀主义现象还是存在。这些现象虽因战争环境，群众不多提出抗议而且时常加以原谅，但我们自己必须揭发纠正，并经常注意防止军阀主义倾向，使军民关系更加改进。今后军队要恢复苏维埃运动前期红军做群众工作传统，把群众工作看成自己经常的一个任务（作战、生产、做群众工作，应成为军队的三大任务），这样才能增强军民的亲密关系，巩固根据地，坚持长期

斗争。

（四）对党的统一领导问题，九一决定后，从分局到地委，都是由部队军政首长兼党委书记，按这些同志的历史和能力是可以的，但必须使这些同志弄清“一元化的思想”是在于加强党对各方面工作的领导，党委应成为所管辖区域的领导中心。要注意防止只照顾军队一面，而未照顾全面，对于根据地各种政策不加深刻研究，不注意检查督促，把部队的首长制带到党内，抑制党内必要的民主，因为这将削弱党的领导力量。再从各种组织对党对上级关系来说，闹独立性的现象还相当多，各地区各部门间闹本位主义的现象也相当存在，这些证明一元化的思想在许多干部中也还未真正弄通，是值得检讨纠正的。

（五）在整风学习问题上，我们觉得成绩还不够。首先是没有正确认识到这次整风学习运动是我党建党的一个重要关键，是“思想上的革命”，其目的在于克服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中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肃清三风不正的残余，建设正确的思想——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以达到统一党的思想，增强干部党性，巩固党的纪律，建设成为一个统一的马列主义的布尔什维克党。由于在整风学习中对此种认识的不够，因此过去你们那里的整风学习，在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中没有更好的进行，在相当长的时期中，把学习文件看成为一般的学习，或者是认为只须整下面的和新干部的风，或者是偏重于业务整饬，而未把整风的重点放在干部的思想改造上，这种思想改造，又必须与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联系起来。每个干部，特别是犯过某些错误的干部，一定要对于过去和现在的工作经过深刻的反省，才会获得整风的成效。我们希望这次干部扩大会也像陕甘宁边区党前年高干会一样，能够成为一次整风会议，把你们区域党内存在的一些不正确的思想和倾向，运用正确的批评和

自我批评，根据“治病救人”的方针，加以适当的揭发和检讨，求得在各种问题上一致的认识。这对于晋察冀边区工作的深入和更加发展以及整风运动的深入将起重要作用。同时分局在以后要以很大的精力组织和领导整风运动，要经常讨论此种问题。随着整风运动的展开和深入，应当有计划的根据中央八月十五日指示方针，开始进行党内审查干部和群众中的防奸运动，彻底的但是正确的将暗藏在党内和群众中的真正日国特务奸细清查出来，同时要预防弄错及被诬陷，这是巩固党和坚持敌后斗争的一项重要工作。在防奸运动中，除激发群众对日寇的民族仇恨外，必须在党内党外认真进行反国民党法西斯政治的教育，你们对当地国民党组织的反动活动应加以防范，对其特务破坏罪行应给以适当的制裁，但不是公开驱逐国民党。

上述各项问题，希望你们二月召开的干部扩大会议上联系到执行中央所提十大政策情形加以检讨，必须敢于放手发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但要防止过火斗争，把一切问题都提到思想认识上去，从思想根源上弄清这些问题，正确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不仅不会破坏领导、破坏团结，反而可以巩固领导、巩固团结。

中央相信晋察冀边区全党在中央分局及聂荣臻同志领导下，依据过去六年的伟大成绩与坚固基础，必能完成上述一切任务，配合各根据地及全国的斗争最后战胜日寇。

中央书记处

一月十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四册刊印。

注 释

- 〔1〕即程子华、刘澜涛。
- 〔2〕即杜理卿。

军民关系要更亲密^{*}

(一九四四年一月十五日)

贺 龙

为了迎接行将到来的拥军运动与拥政爱民运动，我谨代表八路军驻边区部队的全体指战员，向边区政府和全边区人民致热烈的敬礼和衷心的感谢。过去一年，边区政府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的生产运动，达到丰衣足食，使边区成为更有力量的抗战柱石。边区政府还领导人民进行拥军运动：对军队进行普遍的慰劳慰问；对军队开荒生产给了许多帮助；对优抗工作也采取了具体的步骤；在去年自卫动员中，政府和人民更对军队表示无限的关切和爱护。

回顾过去一年，是边区军政民关系最亲密最团结的一年。

我们在部队里普遍地进行了拥政爱民教育。经过干部大会、拥政爱民动员大会、班排检讨会等方式，全体指战员以及事务人员，均进行自我检讨，互相批评，和错误倾向作斗争。讨论的内容不只是一般讲道理，而是联系到本部队和政府人民关系的具体问题，和每个人的思想和行动的反省。这种实事求是的教育方式，造成了整个部队的拥政爱民热潮。

从去年拥政爱民月起，除上述拥政爱民教育之外，我们还做了一系列的实际工作：去年旧历年关举行了盛况空前的军民

* 本文原载一九四四年一月十五日《解放日报》。

联欢；有组织地进行访问，征求政府、人民对军队的批评与意见，有组织地清理旧案和赔偿还物；以后部队自身又大规模地从事生产，做到了完全自给或部分自给，减轻了人民的负担；部队自己运送粮草，节省了大量民力，并用成千上万的劳动力，不取报酬，帮助人民春耕、夏耘和秋收；此外还采取安置移难民，与人民变工等办法，来帮助人民生产。这些事实是大家所知道的，我在这里不再详述。

经过一年来拥政爱民的思想教育和实际行动，我们部队的面貌和军民关系，已焕然一新。军队和人民结合的观念已在部队中普遍地更进一步确立起来了。许多干部说：“我们军队的枪杆子是用来对付敌人的，并不是用来对付自己的同志和老百姓的。”战士们说：“如果我们不拥政爱民，抗战就不能胜利，革命就不能成功。”某团一个班长在拥政爱民大会上讲：“我们是边区的子弟兵，就是像人民的儿子，我们要做好子弟，做个孝顺儿子，老百姓就喜欢我们了。”帮人民锄草的战士们说：“给老乡帮一天，就要像一天。”所以帮老百姓锄，比替自己锄还要卖力，锄得又快又细，有些不大会锄的战士，则虚心向老百姓学习，务要把工作做好。像这类动人的例子是很多的。

部队违反政府法令和群众纪律的现象已很少了，干部和战士都能自动地遵守政府法令和群众纪律。例如某团供给处有人主张开老百姓的荒山，管理员就立即反对，并说：“这是违反拥政爱民原则的。”某团四连，不小心碰碎老百姓一个水缸，战士们就说：“打碎老百姓的缸，当然是要道歉赔偿的。”他们就从自己的伙食费中抽钱赔偿。某连到达×××驻地时，不住老百姓的房子。当天虽下大雪，仍在外面露宿，后来经老百姓邀请，才进屋内住宿。像这样真心诚意爱护人民的例子，也是不胜枚举。

部队实行拥政爱民，老百姓也更加把部队当作自家人一样，爱护帮助，无所不至。当我们进行赔偿运动的时候，老百姓纷纷赞扬说：“天下哪里有这样好的军队！”有些老百姓不肯接受我们的赔偿，他们说：“八路军没有来以前，有钱都不敢放在家里，官家要，土匪抢。现在八路军来了，开门睡觉也没关系，你们借一点家具，还赔偿什么呢。”部队生产和对人民生产的帮助，也到处获得人民的好评：“八路军又能打仗，又吃苦耐劳，还要帮助老百姓！”大风川的老百姓说：“八路军真行，一条大川都叫他们开完了，当官的比当兵的还能吃苦。”南泥湾一带老百姓说：“军队的庄稼长的比我们的庄稼还好。”盐池有个老农说：“我是同治年生的，从来没有见过像八路军这样好的军队。”部队调防时，老百姓都来挽留，有走送几十里的，还是依依不舍。在去年边境情况紧张时，人民自动的送柴送菜，组织运输队和担架队，替军队做鞋子，炒干粮。这些事实，真正表现了军民一家、融洽无间的精神。

一年来，拥政爱民工作有了很大的成绩，这是在党中央和西北局正确政策之下，全体指战员一致努力的结果。但我们决不能丝毫自满，我们的工作还有不少缺点。今后应当加倍努力，一方面要巩固和发扬已经获得的成绩，另一方面要更认真的和仔细的检查自己的缺点，并坚决纠正这些缺点。

我们边区部队，对于拥政爱民，已有进一步的认识，并且孜孜不倦地实践这一政策。但是还有一小部分人员，对于自己的错误认识，还没有全部改变过来，因而有时还免不了有违反政府法令和群众纪律的行为；有些人则把拥政爱民看作单纯的纪律要求，看作例行公事，因而勉强应付，敷衍塞责。因此，在今年我们必须更深入地进行拥政爱民教育，三番四复地说明：八路军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是来自人民、属于人民、

为了人民的军队。拥政爱民决不是单纯的纪律要求，而是革命军队的政治要求，也是每个革命军人必须具备的品质。八路军之所以能在敌后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抗战，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就因为八路军和人民血肉相连、休戚相关，并得到人民和抗日民主政府的有力支持。今后八路军继续坚持抗战，争取更大胜利，亦唯有进一步加强军民团结，而拥政爱民正是加强军民团结的必要步骤。我们必须利用一年来拥政爱民与拥军运动中无数生动事实，来证明只要军队负起责任，以正确的态度对待政府和人民，人民是没有不爱戴军队的；也证明过去有些人员轻视、误解政府和人民的心理，是完全错误的。我们必须深刻指出：把人民看作“贱骨头”，把政府看作“支差机关”，把军队看作凌驾于人民之上，这都是旧军队的思想，与我们八路军的拥政爱民的思想，是完全相反的；谁的头脑里存在着旧军队的思想，而不加以清除，谁就有愧为革命的军人。今年的拥政爱民运动，不仅要普遍的举行，而且要力求深入，使其成为整个部队真正自觉的运动，以更进一步提高部队的政治觉悟。

同时，拥政爱民的思想教育，必须和拥政爱民的实际行动密切结合起来。在行将到来的拥政爱民月中，更深刻地检讨自己对政府和人民的关系还存在着一些什么缺点，实行清理旧案、赔偿还物，慰劳政府和人民，举行军民联欢等等，这一切应当成为今年一年经常的拥政爱民工作的开端。去年，我们积累了很多工作经验，创造了不少新的办法。今年，应当加以发扬，特别是帮助人民生产，是增进军民关系的一个最有效的办法。在这方面，我们应当比去年做得更细腻、更周到。我们要更好地帮助老百姓春耕、夏耘、秋收、冬藏，我们要亲切地照顾老百姓的日常家庭琐事。我们要在群众自愿、军民互助和

“对老百姓方面更有利”的原则下，多和老百姓变工。除了执行保卫整个边区、保卫边区人民生命财产、安定后方的任务以外，我们还必须认真地帮助人民建立自卫力量，并和他们并肩作战，打击破坏分子骚扰边区的阴谋活动。总之，我们要在生产、自卫、防奸等各方面经常的实际工作中，给人民以切实的帮助，和他们息息相关，密切联系，并经常检查自己的工作，取得新的经验，不断巩固、发展军民关系。

今年元旦，西北局公布了关于拥政爱民和拥军的决定，留守兵团政治部亦已发出关于拥政爱民的指示。对于这两个非常重要的决定，我们边区全体指战员，必须在思想上、行动上努力求其贯彻。我们相信，今年的拥政爱民运动将会创造出比去年更光辉的成绩。

根据解放军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
《贺龙军事文选》刊印。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对待国民党 军队执行自卫原则的指示^{*}

(一九四四年一月十八日)

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并转各有关区党委：

为保持国共间之平静，争取抗战最后胜利起见，请你们通飭有关各部队，对于国民党军队，我军谨守防地，不得发生由我启衅之任何事件。仅在彼方进攻时，我应执行自卫原则。如发生大的事件，须先行报告，待命处理。

中央书记处

子巧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四册刊印。

^{*} 这个指示是毛泽东起草的。

群众需要精神粮食

(一九四四年一月二十日《解放日报》社论)

去年一年的生产运动，使边区面目一新，经济上的丰衣足食的境地，引起了广大工农兵群众在文化上的要求。在部队方面，学习运动的热烈，战士们学习兴趣的高涨，从学习模范朱占国等的出现可以看得出来。在工农方面，如全边区工农通讯运动的发展，关中唐将班子^{〔1〕}提倡读报和卫生，延安南区合作社提倡办小学，吴满有、孙万福等在边区劳动英雄代表大会上，把扩大办学校列入今年计划，赵占魁和其他许多工人劳动英雄把文化学习列为竞赛条件，以及若干妇女纺织小组提出识字的要求，都是文化运动普及的表现。而今天本报第四版所发表的黎文同志的文章，生动的指出了群众对于出版物的需要，更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新现象。

书店的统计告诉我们，一年来通俗书籍销路的百分比是增加了。部队的战士要求大量的通俗书报，劳动英雄要买各种小册子，石匠背着他的工具走进书店，老婆婆为他的小孩子寻找读物。文化水平较高的群众，则除了这些通俗出版物之外，还要买《新民主主义论》和《评〈中国之命运〉》了。这许多动人的事实，给我们的文化工作者和出版工作者一个很大的启示：丰衣足食的条件提高了老百姓的文化要求，他们有了丰裕的物质食粮，现在就进一步要求丰裕的精神食粮。

在这种情况下，为着进一步发展今年的生产运动，把毛主席的“组织起来”的号召和劳动英雄代表大会上创造模范乡和模范村的口号很好的实现，为着完成我们今年提出的“自卫备荒”的任务，我们站在文化战线的同志们，就有了比起以前来更大的责任。一个大问题提在我们面前：我们需要根据党和政府的政策，做更多的文化上的普及工作，使工农士兵群众对于当前的政策与任务，获得更深刻更具体的认识，使他们的热忱和信心更加提高。

一直到现在，我们在这方面的的工作还做得很不够。前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主席明确指出文艺要为工农兵群众服务的方向，指出“对于人民，第一步最严重最中心的任务是普及工作。”这一个指示，对一般文化工作也是适用的。从那时起，延安文艺工作在各方面都有了些新的尝试。但就文艺方面来说，除了在延安附近做了一些群众的文艺活动之外，真正深入农村的工作，现在才只算开始；这表现在目前几个剧团下乡的事实上。就出版方面来说，虽然除《边区群众报》、《部队生活》报及各分区的通俗小报外出版了一些通俗读物，并且书店也用种种方法（在骡马大会上摆摊子，组织流动供应等）把读物送到群众的手里，但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是很不够的。

给群众丰裕的精神食粮，还是我们今天的一个严重任务。除文艺工作应该照现在已经开始的方向努力去做之外，在写作出版方面，我们希望文化工作者（文艺、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各方面的写作者）方面，要肃清轻视或忽视普及工作的思想残遗，肃清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教条主义思想残遗，真正眼睛向下，向群众学习，考察群众的需要。只有这样，才能根据实际政治任务，以群众斗争中的生动活泼的材料为内容，为群众有系统地编写他们所需要的作品和读物。

我们的出版发行工作者，必须切实调查群众的文化上的需要，出版工农兵群众所容易接受的东西，更设法增加纸张产量，大大增加出版的数量，并用一切可能的方法，把这些东西送到群众手里。不要只是在城市里开店，专等群众上门，而要深入到乡村里，走上群众之门，使更广大的工农士兵群众都有机会获得自己所需要的精神食粮。

为着这目的，出版发行工作者特别需要对于过去的工作做一番检讨。有一个时期，出版发行工作者对于自己在宣传教育战线上所负的严重政治责任曾是盲目的，他们把自己的工作看作是纯粹技术的甚至商业的工作，对于书店里或图书馆里所陈列的书报究竟是否符合群众的需要，甚至是否对群众有害，他们是不负责任的。这个现象在边区现在是消灭了，但是用满腔热情积极向群众介绍好的出版物，却还做得很差。要把出版发行工作做好，必须与各县区乡、各团营连的党政军干部密切联系，取得他们在这一方面的帮助。党政军方面负责宣传教育工作的同志们，必须重视这一工作，把供给群众精神食粮作为自己的重要任务之一，要帮助出版者推广“群众报”以及各种通俗读物，要调查群众的文化需要，经常向出版者和文化工作者提供意见和要求，要组织群众，推动他们来阅读“群众报”和各种通俗读物。

广大群众对于精神食粮的要求，明显地增长起来了。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给了革命的文化工作以无限发展的远景。让我们看到这个远景，和实事求是的来加以解决吧。我们的努力，将使边区文化发展，在全中国放一异彩。

根据一九四四年一月二十日《解放日报》
刊印。

注 释

〔1〕旧时，陕西关中地区把那些由土地不足的贫苦农民结合起来集体出雇，为别人耕种以取得工资的组织称之为唐将班子。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唐将班子是一种劳动互助的组织形式。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对坦白分子 进行甄别工作的指示^{*}

(一九四四年一月二十四日)

小平、漱石、林枫、子华⁽¹⁾四同志：

(一) 对于坦白分子之处理，首先要进行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绝不要将所有坦白了的人，都认为是特务分子，因为在坦白运动中，固然有少数重要特务分子，常常用假坦白的手段来欺骗我们，我们必须警惕。但又有很多坦白分子，按其性质，并不是特务问题，他们或因问题复杂，一时难弄清楚，或因惧怕镇压，或逼于群众压力，或由于逼供信的错误，或由于特务的诬陷，而暂时承认自己是特务分子。这种事实，在延安是很多的。如果我们不加分析区别，笼统的将所有坦白分子，都主观肯定为特务分子，就会犯严重错误。

(二) 根据延安初步经验，已坦白的人大致可分为六类：

第一类是职业特务。他们是加入了特务组织，进行过特务活动，保持着特务联系，以特务工作为职业的。但这类职业特务是极少数，仅占全体坦白分子百分之十左右。其中又有自觉与被逼，首要与胁从之别。

第二类是变节分子。其中有的破坏过党的组织，捉过人、

* 这个指示经毛泽东修改、审定。

杀过人的；有的是自首后写过反共文件的；有的被敌人短促突击，接受了敌人的任务，但回来没有实行，但也没有向党报告的。这一类人在坦白分子中也是少数。

第三类是党派问题。他们是加入过国民党、三青团、公道团或其他党派，其中许多人加入我党后，没有向党报告，但还不是特务分子。这类人占颇大数目。

第四类是被特务利用和蒙蔽的分子。其中有的是在敌人红旗政策下不自觉的被特务利用；有的因为半条心作了特务的工具。

第五类是党内错误。如假造历史，虚报党龄，与坏人来往，泄露秘密，包庇亲友，欺骗组织，政治错误及贪污腐化等等，在坦白运动中，被人怀疑，甚至被误认为特务。

第六类是被特务诬害或在审查时完全弄错的人，这类人虽然是少数，但确是有的，甚至在已逮捕的人中也还有的。

以上六类是根据延安坦白分子的情况，作一个初步的分析。其准确性，尚待今后甄别工作来证实。但职业特务是极少数。有党派问题的分子，被欺骗蒙蔽的分子及仅属党内错误的分子三类占绝大多数，这种估计大致合乎事实，这些人在分清是非后，均应平反，取消特务帽子，而按其情况作出适当结论。因此你们可以将这六类分析，当作一个方法，去细心分析你们那里的人，遇有不是特务而被误认为是特务者，必须在复查过程中，加以平反。要教育同志认清：从党内清除特务固然是成绩；从坦白分子中，将弄错了的人平反，同样是成绩，而且是完全必要的。但这种平反，不是在反特务斗争正在高潮之时，而是在高潮过去，特务已经清出之后。由领导同志先向高级干部解释明白，对于所有坦白分子进行复查，根据复查结果而加以平反。

（三）在反特斗争中要注意保护好人，防止特务诬害。这里要注意：不要将所有或多数新知识分子都认为是特务分子或嫌疑分子，延安许多机关，在初步复查工作中，已证明新知识分子大部分是好的，其中有政治问题的（轻重不等）只占百分之二十左右，这个经验值得注意。在反特务斗争中，要注意保护知识分子。

（四）关于坦白分子的党籍问题，为了顺利的开展坦白运动，目前不要宣布停止，即对于那些杀过我们人的和假坦白的人，暂时也不明白宣布，但你们绝不要通过甚么正式决议和文件。中央局及分局的负责同志也不要肯定的担保党籍，因这个问题目前还不到解决的时期。对于不愿真正坦白的分子，主要的是依靠调查研究搜集证据与宽大政策感化教育相结合的方法，促其觉悟，一般的不要采取逮捕的办法，因为如果我们没有确实材料与真凭实据，即使逮捕了也不能解决问题。

中央书记处

子敬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四册刊印。

注 释

〔1〕即饶漱石、程子华。

一九四三年生产运动的基本总结^{*}

(一九四四年一月二十五日)

李 富 春

中直各个机关、学校在去年做了三件大事，都有很大成绩。这就是整风学习、审查干部和生产运动。这三件事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整风运动为生产运动做了思想准备，而生产运动又为整风与审干提供了物质条件。

全边区机关、学校、部队的生产运动，还是一九三九年在毛主席“自力更生”的号召下开始的。中直机关的生产也于这年开始。在过去的五年中，我们走了弯曲的“之”字路。在一九三九年与一九四〇年的两年中，是以农业为主、大家动手的方针，这是正确的方针，曾经取得很大的成绩。但是，从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二年，在执行这一方针时发生了一些缺点。当时不了解如何深入检查，总结经验，改正缺点来贯彻正确的方针，反而因噎废食，放弃以农业为主、大家动手的方针，代之以依靠少数人生产、并以商业为主的方针，结果走了两年的弯路。直到一九四二年冬季，毛主席总结边区财政经济问题时，批判了过去的错误，提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口号，才重新确认第一阶段的正确方针。这样，我们的生产运动就在去年走上新的发展阶段，收到很大的成效。

^{*}这是李富春在延安中共中央直属单位生产运动总结会上的讲话。

去年生产运动的第一个成绩，是做到“丰衣足食”，减少财政负担，建立“革命家务的基础”。

去年一年，中直机关的生产总值折合小米三万一千石，平均每人三石。其中，各机关、学校公共生产占百分之七十三，个人生产占百分之十，管理局经建处生产占百分之十七。从生产的内容看，农业和畜牧业收获占百分之六十，手工业作坊收获占百分之十六，商业收获占百分之二十，业余社会劳动（泥瓦土工）收获占百分之四。由此可见，去年的生产是贯彻了广大群众自己动手和农业第一的方针。这样，就产生了两个方面的结果：一方面，把“丰衣足食”的口号变成了实际。一九四三年，除个别单位外，绝大多数单位在物质生活上相继达到丰衣足食的标准，而且中直机关的经费支出中除粮食、被服两项仍由政府支给外，平均计算百分之六十是自给的，政府支给的只占百分之四十。另一方面，“建立革命家务”的口号也成为现实。我们的生产基础比一九四三年扩大了。

去年生产运动的第二个成绩，是依靠大家的努力，创造了许多新的技术、新的组织形式，生产力提高了，供给制度改善了。例如菜的收获量，前年一亩水地收获一千五百斤，去年党校菜园水地平均每亩收了四千四百斤。造纸，前年每工每月最多能捞一百九十刀，去年战卫团纸厂的捞纸英雄王国初一个月捞到二百八十七刀，创造全边区捞纸新纪录。

去年供给方面改善的情形是：第一，大灶伙食的改善。现在中央办公厅大灶菜的烹调方法达到六十种，每个月不要政府多发麦子，仅从节余的粮食中调剂，一个月可吃十多次馒头。第二，运输队的改造。由于将运输队改为运输合作社，去年中直机关的运输效率平均提高了百分之五十，全年运输量比前年增加了一千五百万斤，并为公家节省经费一千余石小米。第

三，供给商店的建立。特别是离延安城较远的机关，不但以便宜的东西供给本单位全体人员，而且改善了采买制度，杜绝了贪污，并且还减少了采买人员。第四，节约显著。去年供给工作的节约，证明生产与节约是保证丰衣足食不可缺少的两个方面。节约最有成绩的是粮食和石灰两项，这是在厨房中建立了二八分红、公私两利的节约制度的结果。前年中直机关的粮食超支了一千三百石，去年反而节约了一千一百石。石灰的节约估计在四十万斤以上。总之，我们去年在生产与供给上有了很多创造，通过这些创造，才走上丰衣足食的道路。这是依靠广大群众的积极性，特别是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的劳动而得到的。

去年生产运动的第三个成绩，是提高了杂务人员的觉悟。前年，许多机关的事务人员常有不安心工作的现象。经过前年和去年的整风，通过业务教育，加以供给制度的改进，这些现象大大减少了，一般事务人员的积极性也提高了。许多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绝大部分是在这些勤劳苦干的同志中产生出来的，而且从中提拔了许多负责生产供给工作的新干部，开辟了一个引进与培养经济、供给干部的丰富源泉。这个成绩，对于那些把成千成万的人看成一个模型的主观主义者，对于轻视事务人员与杂务人员的官僚主义者，是很大的教育。由于思想的改造与生活的改善，进一步巩固了我们的队伍，战士逃亡现象大大减少了。

去年生产运动的第四个成绩，是加强了我们与人民群众的联系。首先，由于机关、学校、部队生活的改善，杂务人员的进步，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改善了。其次，去年我们机关、学校、部队的很多生产事业是与老百姓合作进行的。如安置难民，合办作坊、运输、畜牧、商业等。不仅帮助了老百姓的生

计，而且使我们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更密切了。

去年一年生产运动的成绩，主要的有这四点。但是各单位在生产发展与供给改善上是不平衡的。生产运动发展不平衡的原因，主要是各单位对下面几个问题的掌握程度不同。

第一是对生产运动的认识问题。去年的经验证明，凡是对生产运动认识正确的成绩就大，否则成绩就差。对生产运动的认识不正确，首先是有些单位的负责干部还有轻视生产的观点，没有了解工作、学习与生产是三位一体的任务，没有了解生产搞好和生活改善可以推进工作与学习，没有了解生产是其他活动的物质基础，因而忽视对生产运动的领导。其次是有些单位的领导缺乏长期打算，缺乏建立革命家务的观念。有些干部甚至只要“丰衣足食”，而不愿“自己动手”；只依靠少数人发展生产，而不是动员大家动手。这是坐食别人劳动成果的思想还未完全去掉的反映。

第二是首长负责问题。去年经验证明，凡是实行首长负责、亲自领导的，就得到成绩。在这方面，战卫团的领导同志值得表扬。他们亲自动手定出切实的计划，适时地深入督促检查，所以生产比前年有很大的进步。每个单位的负责同志必须学会这一套本领，掌握生产知识，把本单位的生产与供给工作搞好。这才是全面的领导，而不是跛足的领导。

第三是群众路线问题。去年的经验证明，凡是在生产、供给工作中有群众观点、群众作风的，就有很大的成绩。反之，领导干部有官僚主义，生产成绩就差。我们必须记着毛主席在中直机关生产展览会上的题词：“群众生产、群众利益、群众情绪、群众经验。”群众生产，就是组织大家动手，把生产开展成“热火朝天”的群众运动。群众利益，就机关、学校、部队而言，就是要在生产与供给上贯彻公私两利的方针，以提高

群众的生产积极性。生产上多用一分力量，不但团体多得收入，个人也多得收入。在供给方面，要贯彻面向群众、为大家服务的原则，在现有物质基础上，照顾到群众的需要，特别要照顾事务人员的需要。就老百姓而言，机关单位和老百姓合办生产事业，不仅有利于公家，而且可以帮助老百姓发展经济。群众经验，就是要善于把群众在生产中的创造和经验加以总结和提高，用来指导运动，继续前进。群众情绪，就是要倾听群众的呼声，帮助解决发展生产和改善生活中的问题，巩固群众的积极性。

第四是“组织起来”的问题。组织起来的问题与群众观点的问题是不可分离的。有了充分的群众观点，才能谈到把群众组织起来。去年的经验证明，凡是在生产工作、供给工作中贯彻“组织起来”的方针的，就有成绩。反之，让其放任自流的，成绩就差。“组织起来”的基本内容，在机关、学校的生产与供给工作上说，就是“公私合作、公私两利”八个字。掌握这八个字，就会运用各种新的组织形式和新的一套办法，代替旧的组织形式和旧的一套办法，来改进生产关系，刺激生产情绪，使每个供给人员对于供给工作的关系和态度有所改进。这样生产就能得到发展，供给能力、供给工作就能得到改善。

这种“公私合作、公私两利”的新形式新办法，去年创造了七种，在实践中证明都是成功的。（一）采取以劳动力入股的形式，按比例分红；（二）在生产中规定分红比例；（三）节约分红；（四）机关里大小单位的合作；（五）单位与单位之间的合作；（六）与老百姓合作；（七）个人生产的公私合作、公私两利。今年，我们如果进一步发挥公私合作、公私两利的原则，提倡先公后私、公私结合的精神，新的组织形式新的办法是会更多的，生产运动与供给工作中的群众积极性将更加提

高，生产与节约运动能够更好展开，公私经济可以更大发展。因此我们还要好好研究，要很熟练地掌握这些原则。

要很熟练地掌握这些原则，必须改变对“公私合作、公私两利”的怀疑和执行不坚决的态度。这种怀疑是从两方面来的：一方面，是经验主义的倾向。认为我们历来都是一切归公的，如果提出公私两利，公家不要吃亏么？这是不了解新情况的保守观点。事实证明，去年运输队的改造，大厨房节约分红制的实行，给予公家前所未有的利益，而且集体生活中私人的一部分利益和问题解决了，也等于解决了公家问题。领导者要注意的问题，是把私人所得好好组织起来，帮助其储蓄，而不让其浪费。另一方面，是教条主义的倾向。认为“公私两利”是不适合共产主义原则，不适合每个革命者、每个党员应当牺牲一切的原则的。这样的教条主义者，不了解我们将来的共产主义，是必须通过现实的新民主主义才能实现的；不了解我们现在对每个革命者、每个党员，在经济上既不要求他们完全取消私有制，也不提倡他们先私后公或以私人利益与公家利益对立，而是要求他们先公后私，把私人利益与公家利益结合起来。因此，我认为公私两利的原则，在现在的条件下是正确的。只有这样，才能提高生产与节约的积极性，才能解决公私两方面的问题。而且这正是发展新民主主义的杠杆，我们绝不应轻视这一原则。

第五是技术的研究与提高问题。去年的经验证明，凡是对于生产技术和供给制度具有认真总结群众经验与研究精神的，就有成绩。反之，凡是熟视无睹，墨守成规，固执老一套的，生产与供给的结果就大相悬殊。原因之一，是掌握技术不同。例如种洋芋，在一亩山地上，最高产量达到一千八百八十二斤，最低的仅二百五十斤，相差六、七倍。由此证明，不注意

掌握技术，不注意总结群众经验，是无法改进生产与供给的。

第六是掌握“农业第一”的方针问题。去年的经验证明，凡是真正掌握了农业第一的方针的，就有成绩，就真正建立了革命家务的基础。反之，凡是想走捡便宜和投机取巧的商业道路的，虽然形式上也可以获得利益，但实际上是亏本的。对于这个经验，要严重注意。必须了解农业、手工业投资少收获大，而且最能组织广大的劳动力。在农村环境中，如果不以农业和手工业为主，不使“黄土变成金”，就谈不到真正的生产运动。

以上这六个问题，实际上是机关、学校、部队已经初步摸索到的规律。要好好研究加以充实，才能保证生产供给工作的提高。

上面是我们对一九四三年机关、学校、部队生产运动的成绩和经验教训的基本总结。这虽然是中央直属机关、学校、部队的情况，在全边区只是一小部分。但也可看出，全边区所有机关、学校、部队的生产与供给方面的主要经验，大概不外乎此。根据这个总结，我认为对于机关、学校的生产运动应有一种新的估价。

就经济方面说，边区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是由国营经济和私人经济两部分组成的。机关、学校、部队的生产是国营经济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长期抗战中，机关、学校的生产，是建立“自力更生”经济的柱石之一。只要我们自己动手，任何经济封锁和任何困难都能克服。就国营经济与私人经济的关系来说，机关、学校的生产通过与老百姓的各种合作形式，在公私两利的原则下可以使公私经济互相发展。机关、学校的生产不仅应当向老百姓学习，而且还可以在经营方式和劳动技术上提高老百姓的生产，逐渐影响老百姓的生产方法的改进。如施

肥、选种、修水利、兽医及合作方式等等，都可以起示范作用。因此，机关、学校、部队与老百姓合作经营的生产事业，如能进一步发展，不但与老百姓在经济上更加密切团结，而且使合作经济与国营经济结合，更好地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并推动老百姓中私人合作经济的发展。这就是新民主主义制度下新民主主义经济发展的远大前程。对此，我们还要好好研究毛主席“组织起来”的原则。

就财政方面说，机关、学校的生产运动是政府的直接收入部分。去年我们中直系统生产总值折合三万一千石小米，就减少政府很大一部分财政负担。如果今年的生产搞得更好，明年除了粮食被服外，一切机关、学校就可以不再向政府要钱。这对政府财政是个很大的帮助，对革命事业有着重大意义。在长期战争的农村环境中，机关、学校、部队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这套办法，我们一定要坚持，一定要发展。再者，在目前的环境与生活条件下，机关、学校、部队执行公私两利的方针，大家生产，大家享受。只要按自己的可能来劳动，个人家庭与公家结合在一起，都有丰衣足食的保障，都有个人节约、储蓄的便利。这与中国其他地方靠薪水津贴的人们天天愁吃、愁穿、愁住的艰难生活相比，既有保障，又生活得好一些。

就贯彻党的十大政策方面说，十大政策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而生产是完成一切任务的物质基础。机关、学校、部队的生产运动配合老百姓的生产运动，可以创造物质基础。整风、防奸、文化教育等工作，如果没有生产的基础，决不能有现在的效果。我们遵守政府的法令与政策，执行自己动手生产的方针，极大地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帮助了人民经济的发展，岂不是最好地执行拥政爱民的政策吗？现在大家都在生产，把工作、学习与生产三者适当配合起来，统一起来，提高

了工作的积极性与效能，把单纯消费转到生产，由生产所得节省了公家开支，岂不是最彻底、最合理地执行精兵简政吗？我们应当对生产的认识提到应有的高度。

就全国影响方面说，我们边区的老百姓过着经济繁荣和丰衣足食的生活。而敌占区，则被敌伪敲诈抢夺得民不聊生。两个鲜明的对照，表明我们边区是黑暗中的明灯。中国亿万受苦受难的人民从边区的发展更清楚地看到了前进的道路，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道路。

由于部队开展了生产运动，可以做到自给，不要国民党政府发饷，也不要老百姓发饷。我们八路军、新四军不仅能英勇顽强作战，而且能生产自给，是古今中外没有见过的队伍。由于机关、学校开展了生产运动，机关、学校也做到大部分自给，不要政府拨款，这也是前所未闻的事。

总之，我们有坚强的信心。我们创造的新民主主义制度优越于旧制度。我们发展了生产力，能使人们丰衣足食。人类的历史证明，凡能发展生产力的，就能够生存和发展。我们的坚强信心的最基本根据就在这里。

根据中国计划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出版的
《李富春选集》刊印。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东江 游击区建立抗日民主政权问题 给尹林平的指示

(一九四四年一月三十一日)

林平：

东江游击区的抗日民主政权的基本精神应该是新民主主义的，三三制的。但在实践上既不必照国民党的形式，亦不必抄华中边区的办法，而要因地制宜，根据你们当地具体情况采取某些便于游击发展和军队转移的政权形式。如东宝某些区乡可开代表会者则开代表会选举区乡政府，如不可能开代表会，而其地区又经常被敌伪侵占者，则不妨组织武装工作队，统一军政工作。县级代表会亦可名参议会。县以上是否成立联合政权，视情况需要定之。选出的各级政府应实行民主集中制。关于三三制，一方面应注意我党领导权的确立；另一方面应吸收党外联共的和不反共的人士多多参加。施政纲领可参照陕甘宁边区的纲领，加以切合当地实际的变动。各种条例当择要为你们广播一部分，但只是做参考，不要照抄。

中央书记处

于世延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四册刊印。

毛泽东关于国共有协调可能 给董必武的电报

(一九四四年二月四日)

必武同志：

世电悉。观察今年大势，国共有协调之必要与可能，而协调之时机，当在下半年或明年上半年。但今年上半年我们应做些工作。除延安报纸力避刺激国民党，并通令各根据地采谨慎步骤，力避由我启衅外，拟先派伯渠^[1]于春夏之交赴渝一行，恩来^[2]则准备于下半年赴渝。上月郭^[3]参谋见我，要求林、朱、周^[4]赴渝，我即以林、周或可先后赴渝答之。郭又提及何白^[5]皓电、西北军事二点，我则答以谈判可以何白皓电为基础，反攻时胡宗南部与边区部队，可按比例开赴前方。我并告郭：我党拥蒋^[6]抗战与拥蒋建国两项方针，始终不变。另据探息，调统局以已得延安同意派中央社分社驻延并不日来延之说，此事全属片面意旨，如有人询你时，你可否认之。关于伯渠赴渝事，今日另有有线电复你。

毛 泽 东

丑支午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注 释

- 〔1〕 即林伯渠。
- 〔2〕 即周恩来。
- 〔3〕 指郭仲容。
- 〔4〕 指林伯渠、朱德、周恩来。
- 〔5〕 指何应钦、白崇禧。
- 〔6〕 指蒋介石。

军委、总政治部对全山东政治工作会议的指示

(一九四四年二月五日)

罗黎萧^[1]并总部、新四军、一二九师、五台军区、一二〇师：

你处政工会议准备讨论的五个议程^[2]是很好的，因对你处目下情况不清楚，不能提供具体意见，现只就下列几点提出一般意见：

(一) 目前整个敌后根据地及所有我们部队如何更加密切与群众的联系，是很重要的问题，我们部队的政治工作，对此点应有严重的注意。因我们部队中存在着一一种单纯军事观点，表现出若干横蛮霸道的国民党作风，而政治工作部门本身的群众观点就是不足的。过去红军政治工作优良传统的三大任务：作战、筹款（现在应称为生产）与做群众工作，后来变为只着重注意第一个任务，其余两个任务是被忽视或多少被忽视了。且在我们部队中产生了一种对群众工作极不正确的认识，以为我们进行群众工作，单只为着军队；殊不知我们军队本身之所以有存在之必要和不顾牺牲进行战斗就是为着群众。因此，你们此次会议应很好的从干部思想上彻底解决这一问题，把这个加强群众观点的问题，作为这次会议的主要精神，贯彻到全部议程中去。

(二) 我们军队的特点，不但要会打仗，会做群众工作，而且要会生产，这是中国革命特殊条件尤其目前敌后条件所决定

的任务。现在你们的生产节约运动已在进行，并已有若干成绩，这是好的，但你们仍必须在部队中把这一问题提到原则的认识上去。政治工作应把发展生产、改善生活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之一，在全体干部与战士中加强生产教育与节约教育，从思想上改造与反对那种轻视劳动与浪费资财的观念。因为真正把生产搞好并能进行节约，不仅对部队巩固才有物质保障，向群众少要东西才使军民关系更加改善，同时使官兵在亲自参加劳动过程中获得真正的劳动观点，改变小资产阶级与兵痞的气质，干部更好地与战士生活打成一片，军队更好地与劳动人民结合起来！

（三）关于部队的教育问题。应当利用机会与拨出时间进行部队的教育。在教育时间分配上，军事应占十分之七，政治占十分之三。但这两者的重要性的比较上则政治教育的重要性较大些，军事教育的重要性较小些。须纠正部队对军事、政治教育认识上的诸错误。在政治教育方针上应采取各种各样的适合情况的方式与材料，反复说明与养成几个根本思想与精神，例如战斗中的勇猛顽强迅速，平时的勤劳积极，平时战时的遵守纪律与吃苦精神，坚定不移革命到底的决心等。教育内容上，除各种临时问题的教育外，应将共产党的与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政府的实际主张、制度、生活、行动、成绩、前途与国民党的及其军队、政府的实际情形与前途，两方优劣，作对比的教育；将中国妥协及亡国与中国抗战胜利建国的利害作对比的教育；将中国工农的生活状况与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生活状况作对比的教育（但不公开广播，不登在大报上）。教育方式：应除上课外，可用开会、演戏、士兵演讲、讲故事、唱歌、上识字课等等。教员除首长外，可选士兵或地方党、政、民中之人员来报告，力求生动、现实。须特别注意实例教育，应汇集各种英勇的战例作教育，对学习，对生产亦当注意以实

例作教育。对战例须不断收集，不断编与教。并望将所编辑的教材陆续送延安备用。在军事教育方面，政治工作须极力协助，过去那种政治工作不关心军事技术的提高应彻底纠正之。军事教育方针上要养成部队白刃战、夜战、进攻战的最高度的勇敢性与熟练、结实的技能。在教育上应养成部队有打蛮仗打猛仗的真本领。在实战时则应养成各级指挥员机动灵活的弹性的指挥，有利时须行勇猛的作战，不利时不投入战斗或干脆的撤退。在官兵教育上应着重于士兵，在士兵教育上应大大的侧重于刺杀、投弹、射击、近迫作业，对于刺、投、射及军事体育（有练力、练勇、练身之功）四者，应当每日晨夕练习。仿用中国古时练拳术、练武艺的精神与经验，以各个教练为主，班教练为次，排教练更其次，部队教练应更少或从略，依实际的程度而逐渐课以更高要求（如提高米达数），对士兵的各个战术动作，应以仅次于练武艺的精神而进行演练。如爬行、滚行、跃进，利用地物地形的隐蔽前进，以及学习步哨勤务与步哨顽抗等。对于夜摸教育除一般部队进行外，各部应指定一部连多学，增加夜操，减少昼操。干部教育应首先学会教士兵学技术与教士兵学战士之战术。其次为详细研究作战的经验与方法，应以高度的具体性、切实性、创造性去学会打仗的办法，反对教条主义，提倡参考过去经验与参考书上的道理，根据具体条件，自己搞出道理与办法来。一定要养成我军有以少胜众（例如打顽军时），在攻击时一人能打敌三人，一班能打敌一排，在追击时一人能打敌十人，一班能打敌两排。要养成使敌不能奈何我们，执拗的找他拼刺刀的那种不怕死的作风。除军事官兵外，其余人员亦必须学习一定限度的军事知识与技能，务使人人皆兵。

（四）目前更需要加强我们内部的团结，一一五师与山纵

之间，军队与地方之间的关系，应经过这次政工会议作到融洽无间。其办法是军队着重批评自己缺点，一一五师与山纵之间亦应各自着重批评自己，不着重批评对方，并由干部领导，在连队中发动坦白运动（经过很好准备，然后以一个星期进行之），将侵犯群众利益、想开小差及对坏人（奸细）隐秘不报等，一切平日不肯说的话都说出来，然后加以很好的教育，以改正官兵关系中及军民关系中一切不良现象。至于地方的缺点，应将意见提交党政负责同志，由他们发动地方党政作自我批评，而不应由军队去批评地方。

（五）我们部队中的官兵关系还不能说是很好的，今后要作到如家人父子一样的亲密。应强调干部与战士真正生活打成一片，艰苦与共。那种只要求于战士而不关心战士生活，或只注意自己生活的现象，必须严厉纠正。在管理部队方法上，应尽量运用友爱感情的力量与模范的作用。在部队一些日常生活问题上（如伙食管理、文化娱乐等），应尽量多给战士以民主，多倾听与尊重他们的意见，这对于集中，不仅不会妨碍，而且可增进战士的自觉性。连队政治工作更须改变今天所表现的脱离群众、软弱无力的状态，要真正使我们的连队政治工作做到抓紧战士的心，能实际为战士解决问题。指导员应依靠教育说服方式做到与战士经常在一起，多做个别谈话、漫谈、长谈、深谈，更重要的，不只在讲而在实做（如作战、生产、群众工作等），过去连队政治工作中许多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的东西，必须彻底予以革除，代之以真正从实际出发，为群众所需要，对工作真有效果的作法。

（六）你们这次会议最好能采取前年陕甘宁边区的高干会方式来开，检讨工作时多做反省与自我批评，要把问题提到思想上原则的高度来解决，只有这种解决才是彻底的解决，才

能真正有力的改正错误，转变工作。同时希望能利用这次会议，对各种工作多做些具体调查，介绍与奖励工作的模范与模范干部和模范连队，并以此种方法作为推动部队工作的主要方法。

（七）现在总政正在准备彻底检查我们部队中的政治工作，不仅是抗战时期的，内战时期的也要检查，从整个政治工作方向、制度、作风来一个全面检讨，使我们的政治工作更适合于今后党的任务。望你处在这次会议中亦加以注意，并将意见告诉我们。

（八）对敌政治攻势应多组织武工队，扩大对敌的宣传战，并有计划的暴露敌暴行与扩大敌伪的矛盾。关于敌伪军工作，重点应放在争取伪军上级，敌军工作目前主要是注意于争取敌军的宣传，进行思想的瓦解工作，并以多归日人反战同盟去做为有利，敌军工作部主要应集中力量作伪军工作，而对敌军工作则着重指导反战同盟的活动。

（九）民兵与游击部队的建设，应注意其特殊性，不能完全照用正规军的一套。这里主要的问题应该是更加地方化与群众化，工作方式与领导方式应更多依靠民主与非军事的作法，干部的作用与保证党的领导，主要是使干部地方化，与成为真正的群众领袖。

（十）在分局及你们领导之下，山东八路军有很大的发展和地方党政民结合一起，建立与坚持了山东根据地，学会了許多新的斗争方法。我们希望你们更加努力，学会你们现时尚不熟悉的东西，改正现在还存在的缺点。（此电如有不了解处望提出询问）。

军委及总政

丑微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四册刊印。

注 释

〔1〕指罗荣桓、黎玉、萧华。

〔2〕五个议程是：（1）总结对敌政治攻势；（2）总结拥政爱民；（3）总结地方武装及小部队建设；（4）总结整风；（5）具体布置今后部队政治工作建设方针。

中共中央关于检查拥政爱民及 拥军优抗工作的指示

（一九四四年二月七日）

从现在旧历年节中各地所传来的拥政爱民运动与拥军优抗运动的消息，我们感觉到以下几点现象，需要提起注意：

（一）拥军的消息多过于拥政爱民的消息，而且多是由政府领导，给军队送很多东西。是否拥政爱民工作，各地尚有未抓紧的？是否有因拥军工作而无形增加群众不必要的负担？党政发动民众拥军，应多注意于切实解决优抗、归队、帮助部队解决困难及精神上、政治上对部队多给亲切的热烈的鼓励，不只在多送东西。

（二）各地拥政爱民工作，很注重群众的访问，纪律的检查，损坏的赔偿，军民的联欢等事，这些都是应当做的。但同时还要利用这一运动，来深入关于革命军队本身的教育。要使不仅干部，而且是每个战士都懂得革命军队与旧军队不同的性质与任务。我们的军队，是在共产党领导下，来自人民，属于人民，为了人民的军队。我们军队的任务，不只是单纯的打仗，“除了打仗一件工作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设政权的重大任务”（古田决议）。今天具体说就是要做打仗、生产、群众工作三件事。只有使部队的干部与战士，完全弄通了上述思想，才能彻底扫除从旧军队沾

染来的军阀主义倾向；才能自觉的去实行拥政爱民与遵守群众纪律，而不是简单的、形式的服从纪律。最近陕甘宁边区及晋西北的某些部队，在拥政爱民运动月中，实行以连或排为单位，学习古田会议的反单纯军事观点及拥政爱民公约，要每个人都根据这两个文件去反省检查自己，这就是连队战士的整风，每个人都坦白的揭发自己过去的缺点和错误，并作出具体改正的办法，收效甚大，各地都可参考采用。

（三）在部队进行群众访问、纪律检查、损坏赔偿时，还要注意研究访问调查的方法。按普通的经验，老百姓对部队纵有意见，常常是不肯当面实说的，这就除了自己直接访问之外，还要想出一些别的能够了解民情的方法（如通过党政民众团体去了解或各个连队间相互检查等），才能使这种访问不是形式的。

总之，拥政爱民运动，是当前旧历年节中最重要的革命工作，希望各地党委切实抓紧检查，发扬好的经验，纠正缺点，务使这一运动真正达到改造战士思想与巩固军民团结的目的。在旧历年节的拥政爱民与拥军优抗运动月过去之后，各级党委及政治部仍须根据上述各点进行工作检查，继续深入此两项运动尚未完成的工作，以期彻底改善军民关系与军队内部关系。

中共中央

二月七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四册刊印。

毛泽东等关于 应付阎锡山部东进方针 给滕代远、邓小平的电报

(一九四四年二月八日)

滕邓：

鱼电悉。(一) 目前须争取时局平静，不生波澜。六十一军东进^[1]，可能是蒋^[2]阎设置的挑衅计划，迫我冲突，造成口实。(二) 应付方针，除此间电阎请加制止外，你处应令太岳部队先行忍让，不和他冲突，去信六十一军交涉撤回，顾全大局；同时集中兵力于适当地点修筑防御工事，彼若坚决来攻，然后以反攻姿态打击之，但非至最后不得已时，不要发生冲突。(三) 一切交涉及军事行动，均以决死队面目出之，不用八路军出面。(四) 该地情况随时电告。

毛 朱 彭^[3]

齐辰

根据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一九九三年出版的《毛泽东军事文集》
第二卷刊印。

注 释

〔1〕一九四四年一月底，国民党军阎锡山部第六十一军军长梁培璜指挥第四十八师、六十九师、七十二师东渡汾河，向太岳根据地浮山地区进攻，以实现其所谓“开展汾东”、“收复失地”的预谋。

〔2〕指蒋介石。

〔3〕指朱德、彭德怀。

中共中央关于转发西北局 减租指示的通知

(一九四四年二月八日)

各级党委：

兹将西北局对各地减租指示发给你们参考，其中所述原则各地均适用，望据以检查你们的减租斗争。

中共中央

二月八日

西北局减租指示原文如下：

“据最近各地报导，减租运动已在各未经分配土地区域广泛展开。党政已发动群众起来，向某些顽固地主进行斗争，以贯彻减租。在此情况下，各地党应注意如下数点：

(一) 应抓紧已彻底进行减租地区的典型例子，向所有应当实行减租而未贯彻的地区的农民进行广泛深入的宣传，并于春耕前，一律普遍彻底减租。

(二) 凡已发动群众起来彻底减租的地区，应即注意对地主的团结。在彻底实行减租后，对地主一般的不是继续斗争，而是注意团结他们，稳定他们，使他们不但不离开我们，且不得不靠近我们。

(三) 在减租斗争中，应防止对地主采取过左的政策。如

不看具体对象，一律退回三四年长收的租子，及对地主过多的罚款等。甚至个别地方已发生要求没收地主的土地。这些都是不对的。如已发生，应适当纠正（但不能损害群众积极性）；如未发生，应预先防止，使减租斗争正确的顺利的开展下去。

（四）各地目前应即全面的检查一次减租进行情形，并具体定出春耕前贯彻减租的计划，同时报告西北局。”（此件发到地委）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四册刊印。

毛泽东、彭德怀关于揭破 蒋介石以反共缓敌进攻的诡计 给邓小平、滕代远的电报

（一九四四年二月十日）

邓滕：

（甲）敌有打通平汉进攻西北消息，蒋甚惧，欲以反共缓和之。去年七月向边区威胁，受到英美及国内责难，目前国际情势更不利于大张旗鼓反共。不久前，派徐永昌谒阎^{〔1〕}与此次阎部进占太岳似有关。同时阎与敌通（敌拉阎）派了一批人至太原，如系事实，当与敌已有某种秘密协定，利用敌人掩护东进反共就食，但阎老奸成性，知目前不利公开投敌。

（乙）为不中蒋缓兵之计，我们应利用平津保石太南京敌伪工作关系，巧妙揭破之（仿效去春对庞、孙^{〔2〕}办法），向各关系透露下列各点：

（一）蒋怕敌进攻，破坏反攻准备，以不进攻陕甘宁边区，减少包围边区兵力，进引宪政，表示对共让步，并共商如何缓和破坏敌人进攻西北平汉中段争得时间。

（二）蒋派徐永昌谒阎出兵太岳表面反共，迷惑日寇，蒋同意阎纵横捭阖之策略，大量派人入太原，控制伪政权，准备反攻时之内应。

（三）延安解放报是中共机关报，从去年十月起对国民党

没有任何批评，邓宝珊衔蒋命过延受到盛大欢迎。

（四）延安正在筹备宪政，准备派林伯渠去重庆。

（丙）对进入太岳阎部，不是武力打击，而是以各种办法去开展工作，对连排班干部进行金钱收买也是必要的，以作在将来适当时机消灭该部之准备。但六个月内，必须避免冲突，六个月后再看情形决定。

毛 彭

十日午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注 释

〔1〕指阎锡山。

〔2〕指庞炳勋、孙殿英。

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延安机关 学校政治教育的通知

(一九四四年二月)

延安一般机关及若干学校一九四四年的政治教育，以配合审查干部、坚定革命立场为主要任务。为此目的，特选印关于中国问题基本常识与共产主义基本概念的文件十余篇，以供学习之用。望各机关学校领导同志根据这一计划及本单位具体情况（学习者的政治需要、文化程度、过去学习状况等），决定学习人数、文件种类及次序，并经由各系统的宣传或发行部门向中央出版局领取文件。文件目录如下：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单行本已出）

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单行本已出）

孙中山蒋介石选集（孙蒋各时期的代表作品选集，对外秘密，印刷中）

列宁：论国家（关于唯物史观的通俗讲演，说明国家的阶级性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各个时期）

斯大林：论十月革命的国际性质（说明人类历史发展的现阶段，与上篇合订一单行本，即出）

马恩：无产者与共产党人（共产党宣言第二章，驳斥对共产主义的各种诬蔑歪曲）

联共党史：布尔什维克是怎样形成的（联共党史第一、二

章关于反对民粹主义、经济主义、孟什维主义各节，说明革命必须依靠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政党及无产阶级政党的纪律。与上篇合订一单行本、即出)

列宁论民主与平等，领袖、党、阶级、群众之间的关系（选自革命与考茨基及左派幼稚病两书，说明革命政权下的真民主)

斯大林与美国工人代表团谈话（附与外国工人代表团谈话摘录)

斯大林与英国作家威尔斯谈话（附与德国作家路特维希谈话摘录。这些谈话都是解释对于共产主义、共产党与苏联的各种误解。以上三件合订一单行本，即出)

列宁：论共产青年团的任务（即论青年的学习问题，说明共产主义者的学习观、道德观与工作观，单行本即出)

季米特洛夫：在莱布齐法庭上演说（说明共产主义者的革命气节及对反共分子的痛斥，单行本待印)

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阶级观点与群众观点的具体应用，单行本印刷中)

毛泽东：文艺座谈会讲话（单行本已出)

刘少奇：论共产党员修养（全文订正单行本，待印)

中央宣传部

一九四四年二月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四册刊印。

敌后军民的道路

——战斗与生产结合起来

(一九四四年三月二日《解放日报》社论)

最近敌后开了两个大会。晋西北在一月初举行了劳动英雄大会，晋察冀北岳区在二月中举行了战斗英雄模范大会。这两个大会，各有特点，北岳区的大会，是在整整三个月反“扫荡”大战斗之后举行的，反映战斗情绪更为深刻。这两个大会，又有其共同之点，就是把战争与生产结合起来，把劳力与武力结合起来。这个共同之点，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共同之点指出了方向，即是敌后吴满有运动的方向，也就是敌后军民的方向。这两个大会，指出了敌后军民的道路，因而值得非常重视。

敌后的抗日战争，自从武汉失守，敌寇回师敌后举行残酷“扫荡”以来，其发展过程，是道高一丈，魔高一丈，极其尖锐与残酷。敌后游击战争的发展，迫使敌寇不得不停止正面进攻，抽兵回师，企图以“扫荡”来毁灭八路军新四军主力。百团大战以后，敌人乃施其最残暴的兽性的战法，即所谓“三光”政策，来毁灭抗日根据地的一切人力、物力、财力，其直接作战对象，除了八路军、新四军的武力而外，连手无寸铁的老弱妇孺亦包括了进去，连吃的粮食、住的房子、穿的衣服、养的牛羊、用的工具，以至水利、肥料都成为日寇野兽们所要

毁灭的对象，在这种情形之下，抗日根据地的人民就不得不起而自卫，他们首先学习战斗，涌现了神枪手刘二堂、爆炸手李勇等非凡人物。从前年下半年起，敌后各根据地实行精兵简政及发展民兵、发展游击队的政策，于是民兵运动与游击队运动在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得到了巨大的开展，表现了非常伟大的力量。应该说，如果没有民兵与游击队以与主力军配合，要对付敌人的“绝灭扫荡”是很困难的，要战胜像敌人对晋察冀北岳区那样的三个月大“扫荡”是不可能的，要想打破敌人的“扫荡”、“蚕食”，不但保持抗日根据地，而且把敌人挤出去、扩大根据地，更是不可能的。

从去年一年敌后的战绩来看，民兵与游击队的作用非常伟大。他们的武器，只是地雷、手榴弹、步枪和别的原始武器，但由于它们围绕在主力的周围，得到主力的帮助和教育，由于他们熟悉地形和熟悉敌伪的行动规律，由于他们的爱护祖国保卫家乡的热忱与积极的行动，因而在有些地区，民兵与游击队的战绩是不亚于正规军的。日寇的“三光”政策，已经激发了敌后广大人民起来自卫，起来报复。在血与火的锻炼中，老百姓学会了打仗。

我们手里没有敌后民兵与一般游击队战绩的完善统计。但仅就已经知道的来说，已经是非同小可了。例如山东的人民武装，去年一年中作战八千八百五十二次，毙伤俘敌伪六千八百〇九名；晋察冀某分区，民兵去年一年作战三百六十九次，毙伤俘敌伪三百八十名，炸死敌酋井手大佐；太行民兵去年一年作战一万五千三百四十九次，毙伤俘敌伪一千一百三十二名；太行武东一个县的民兵，去年八月一日统计，六周中毙敌伪三百九十名，平均每日十名；晋西北民兵，去年九月份统计，半年来作战一千二百零八次，毙伤俘敌伪六百六十五名；苏中三

分区民兵，去年夏收两个月中，作战三百零八次，毙伤俘敌伪六百七十余名。依此估计，去年一年中敌后民兵与游击队所歼灭的敌伪，必不少于二万人。

就民兵与游击队的活动来说，是非常多种多样的。他们或则单独作战，或则配合正规军作战。在春耕时保卫人民春耕，秋收时反对敌人抢粮，并到敌人碉堡脚下去抢收。在敌人进攻时掩护老百姓转移，进攻敌人时则挖毁封锁沟墙，甚至包围敌人据点，打下敌人据点。民兵最使敌人胆战心惊的，就是地雷战，不知道多少鬼子官兵，在民兵的地雷爆炸中丧命，民兵的地雷甚至放到敌人碉堡的门口去。在民兵中出现了无数英雄：晋西北有张初元、徐力强、石连胜、王德兴、崔三娃、赵尚高、段兴玉、薛光钦、郭来子、路五小、李赞森等，民兵英雄殉国的则有李玉儿、阎四虎、曹文平、王贵子、李振英、刘桂元；晋察冀的民兵英雄有李勇、郝秀金（女），已殉国的有安永昌等；山东人民武装代表会所奖励的民兵英雄，有张恒谦、二月（乳名）、孟宪福、任传福、臧西山、栾宗礼、王永双、朱德秀、阎士义、吴继翠（女）、刘曲功、申维法、张三楞、刘麻子、吴敬增、刘震、徐君曾、高春明、杨振城、谢丁方、王明昆、毛守勤等。

敌后人民一方面学习战斗，一方面就渐渐学会把战斗与生产结合起来。在太行区武乡蟠龙线上，群众发明了“游击生产”的方法，群众说：“在敌人面前要组织才能办事儿”，于是就把劳力与武力结合起来，“敌人赶一赶，我退一退，你在前面打枪，我种后面的地，你到老巢内去了，我再种前面的”，“握紧锄头，拿紧枪，赶快干一场，田庄战场。”在山东滨海区，民兵展开集体生产，莒南某村十余户贫民，去春参加民兵后，即集体开荒四十八亩，赣榆青抗先队员二十二二人，合力开

荒十二亩。晋西北临县等地，组织以民兵为中心的变工队，临县五区某村劳动力参加变工队的占百分之九十，一区某沟参加变工队的劳动力占百分之九十以上。晋西北民兵英雄劳动英雄张初元，更是劳力与武力结合的范例，他在民兵的组织上来了一个革命。

张初元的民兵组织，是把自然村的民兵，分编在变工组里，变工组组长要住得相近，以便发生敌情时大家好照顾。春耕和锄地时，哪一组民兵多，那一组就大一些，耕牛也强一些。打场时，编组以场为中心，按每一场邻近的人数来编。民兵提出不让敌人抢去一条牛的口号，变工组则报以不荒民兵一垧地的行动。早晨天一明，民兵和变工组都吃过饭，变工组便下地务庄稼。每天有一定数量的民兵出去活动。村口山头上也有自卫军的瞭望哨，若发现敌情，民兵就鸣枪警告，大家就预备，如情况紧张，民兵就都爬山警戒，山下的人们就赶紧把牲口藏起来。张初元把全村的人民这样组织起来后，就解决了很多问题，民兵的地有人耕了，民兵爬山时家中牲畜衣物有人照料了，敌人抢去的粮食前年为五十石，去年只有二石了；省去牛工七百二十个半，人工二千五百三十二个，而且生产搞好了，收成增多了。张初元的出现，是敌后的一件大事，说明敌后人民，不但学会战斗，而且开始学会了把战斗与生产结合起来。

从前，战斗会妨碍生产，现在战斗与生产能够结合起来了，敌后的民兵将会有更大的发展，这就会更加减少人民在敌寇“三光”政策之下的生命财产的损失，并且相当增加生活资料的生产。反过来，敌寇的损失将因民兵的发展而增大，敌寇的掠夺将愈益感到困难。

军队方面，在敌后坚持抗战将近七年的八路军新四军，在

武装斗争方面已经学得很好了。无数的战斗英雄像邓世军、安全福那样的范例，应该大大加以提倡，来巩固我们光荣的战斗传统，并且进一步来发扬它。对于我们八路军新四军今天非凡重要的，是补习另外一项工作，这就是生产工作。在去年，太行军队中的生产热潮是很高的，没有这个生产运动，要想克服天灾和敌人的“三光”政策所给我们的困难，几乎是不可能的。太行的部队机关，已在去年九月二十一日举行了生产动员大会，规定今年要保证三个月粮食和全年菜蔬自给。在其他地区，部队机关的生产运动也在开展起来。晋察冀边区战斗英雄战斗模范大会致毛主席和朱彭^{〔1〕}总副司令致敬电中说：“部队要学习三五九旅，贯彻朱总司令屯田政策。”在其宣言中说：“子弟兵里的战斗英雄和模范，要成为拥政爱民与生产的模范。”这些话，不仅对于晋察冀是对的，对于其他抗日根据地的八路军新四军同样是对的。

两个大会指出了敌后军民今后的道路，这条道路，就是不论军民双方，都要把武力与劳力结合起来，把战斗与生产结合起来，使敌寇的“三光”政策完全归于失败。

根据一九四四年三月二日《解放日报》刊印。

注 释

〔1〕指朱德、彭德怀。

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

(一九四四年三月三日、四日)

周恩来

同志们：

近半年来，大家都在学习两条路线斗争问题。在学习大革命时期的文件中，大家对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看法有很多争论，而且争论得很热烈。这是启发思想的一种争论。党内思想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解放。这是毛泽东同志领导整风学习的结果，是思想上很大的进步。

我参加了“六大”的工作，是当时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按理应当比别人认识得更清楚些。我觉得，研究“六大”要有合乎历史实际情况的眼光，要有今天整风的思想方法，两者缺一，就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对“六大”的历史情况，有些我已经记得不很清楚了，有些我已经忘记。现在在延安还有十个同志参加过“六大”，我同有些同志谈了一下，不过没有都找到一起对一对。我分六部分来讲，先说事实，事实是对的，就说对，不对的，就说不不对，结论放在后面。

* 这是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党校作的报告。

一 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前途

讲到中国革命的性质，今天似乎是老生常谈了，因为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中，已经讲到中国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可是在“六大”时，这却是个很严重的问题。什么叫革命性质？革命性质是以什么来决定的？这些在当时都是问题。后来才知道：应以革命任务来决定革命性质，而不是以革命动力来决定革命性质，这个问题还是一个新的问题。本来，在共产国际第七次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已经确定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更早，在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也提出过。中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可是又要反对资产阶级，这在当时就成为很难理解的问题，虽然俄国一九〇五年的革命就是这样的，但我们没有很好地研究。当时无论从莫斯科中山大学或从西欧回来的同志又都轻视理论，所以对革命的性质问题搞不清。在今天看来是很幼稚的问题，但在当时却是严重问题。共产国际第九次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的精神刚传到中国，我们都去出席“六大”。开会之前，斯大林同志找我们谈话。他主要谈两个问题，一个是中国革命的性质，一个是革命的高潮与低潮。他指出，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是“不断革命”，也不是社会主义革命，并以俄国的二月革命为例说明。这样，我们才懂了。“六大”前，中国党是不懂这个问题的。从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到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承认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陈独秀的机会主义的观点，认为资产阶级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无产阶级不是领导而是帮助资产阶级，是替资产阶级抬轿子的，无产阶

级在资产阶级革命中不要争取领导权；认为帮助资产阶级革命成功，无产阶级可以得到自由、八小时工作制，以后再搞自己的无产阶级革命。这种观点实质上是旧民主主义的，是十八、十九世纪的西欧资产阶级革命的观点。用这种观点来看中国革命，领导权问题就很久得不到解决。关于参加国民党的问题，当时有争论。有的主张参加，这是对的，但认为参加进去只是帮忙，又是错的。另外，张国焘开始是反对参加，后来又主张至少产业工人要留在外面。他不了解广大工农群众参加进去，可以改造国民党，争取领导权。在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彭述之认为领导权是天然地落到了无产阶级身上，是“天然的领导权”，不用无产阶级去争。这就是没有看到资产阶级在争领导权。所以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蒋介石来了个反共，我们毫无准备。一九二六年冬的共产国际第七次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的精神传到中国时，资产阶级已经叛变。我们党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才承认了领导权要争，批评了天然领导权的说法。但争的方法是到处贴标语，喊口号，说要争领导权。这只是空的，没有实际意义。另外，有一个中国革命非资本主义前途的问题，在共产国际也发生了争论。托派认为在武汉时期就要组织苏维埃，把工会变为政权，推翻武汉政府。这是把俄国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的经验搬到中国来。斯大林同志和共产国际的多数同志则认为我们应在武汉政府中夺取领导权，而不应马上和武汉政府分裂。虽经斯大林同志的反对，托派在共产国际第八次执委会上还是提出了他们的意见交大会讨论。当时曾在中国工作过的印度人罗易、法国人多里欧都同意托派的意见。陈独秀虽然没有公开同意托派的意见，却认为共产国际的决议是错的，但又没有组织工农与武汉政府破裂。及至武汉政府叛变后，托派主张

中国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陈独秀则受了这个影响。那时，共产国际派罗米那兹来中国。罗米那兹认为中国是“不断革命”，说中国是民主革命，但一直发展下去就是社会主义革命。他说广州时期是四个阶级联合，武汉时期是三个阶级联合，南昌起义时只有工农，是两个阶级，中间不经任何停留，不经任何阶段，一直发展下去，就是社会主义革命。这是与托派调和的论调，实质上是托派的观点。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央扩大会议接受了这种观点，认为当时虽不是社会主义革命，但一直发展下去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罗米那兹的意见，在我们党员中间是有影响的。

当时之所以搞不清中国革命是民主革命，是因为：第一，对什么叫革命性质，革命性质是以什么来决定的搞不清；第二，中国党历史上没有从理论方面搞清这个问题；第三，国际上托派的影响以及同托派调和的观点的影响。这些问题都须要“六大”解决，“六大”正确地解决了这些问题。为什么在决议中写得这样简单呢？因为当时在党内已经有宣传：中国革命现阶段的性质是资产阶级的民权革命，如认为中国革命目前已转变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这是错误的；同样，认为中国现在的革命是“不断革命”，也是不对的。

讲到革命任务，就要联系到性质、动力等问题。任务是反帝反封建，建立工农民主专政。这个问题当时讨论过，工农民主专政是包括小资产阶级在内的，并不是将小资产阶级除外。以工农民主专政的政权，实现反帝反封建两个任务，基本的力量是依靠工农。这个政权是反对资产阶级的，但不是消灭资本主义。这个性质和任务的确定，基本上没有错，但不如毛泽东同志后来概括的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明确。这个阶段是很长的。毛泽东同志分析，中

国自鸦片战争后就开始旧民主主义的革命，自“五四”以后是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六大”提出中国革命的十大要求^{〔1〕}，就是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党纲。当时详细的党纲还产生不出来。详细的党纲应该有两部分，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恰巧那时通过了共产国际纲领，就作为我党的最高纲领。“六大”的十大要求是我党在民主革命阶段中的纲领，也就是民主革命阶段的战略任务。作为战略任务来看，十大要求没有什么不妥的地方。作为策略任务来看，有些就不妥当。如第一条，反帝，是对的。第二条，没收外国资本的企业和银行，是对的，但策略上不一定采取强力没收的办法。第四条，推翻军阀国民党政府，现在抗战时期当然不提，但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要使革命彻底胜利，必须推翻它，这是不言而喻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就是人民大众的胜利，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权是不能存在的。第五条，关于苏维埃，不管名词是否妥当，但苏维埃是工农代表会议，它与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度是有原则区别的。列宁说苏维埃政权不仅可以用于资本主义国家，而且可以用于殖民地国家。毛泽东同志发展了这种思想，把它发展成为中国的代表会议制。这种政权是一元化的，不是两权并立的。我们现在实行的“三三制”就是各级代表会议制，是真正的民主制度。关于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是战略任务，今天在边区还实行十小时工作制，是策略问题。关于发给士兵土地，过去认为是很难实现的，今天在南泥湾就实现了。关于联合世界无产阶级和苏联，没有提到被压迫民族的问题，当然是缺点。十大要求基本上没有多大错误，就是将来“七大”，也不会有多大的修正，不能只以抗战时期为限，因为抗战时期是民主革命的一个阶段。

关于非资本主义前途的问题，现在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

级民主革命将来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六大”作了原则的决定。至于怎样转变，要看我们将来力量是否占优势和革命发展的程度而定。不能犯急性病。这与后来李立三同志的意见完全不同。李立三同志认为只要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就可以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了。关于这个问题，毛泽东同志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讲得很清楚。

但“六大”对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前途的决定中也有缺点，这就是没有把中国的情况搞得很清楚。共产国际第九次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已经指出了中国革命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六大”时本来可以对这点做具体的研究，但做得不够。什么是中国的情况？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上农业占主要地位，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社会是两头小中间大，政治上是军阀战争，国家的不统一，历史上有不断的农民战争如太平天国等。如果分析了这些问题，就可得出中国革命的主要特点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的结论。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都是这种思想，认为殖民地问题就是农民战争问题。在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条件下，农民革命战争是可以长期存在的。当时我们不理解这个问题，没有把不平衡的问题同农民战争联系起来，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估计不足。

二 中国革命的动力和阶级关系

“六大”时阶级阵营有了新的分化，帝国主义、军阀都是反革命，资产阶级分化到反革命方面。大革命时，民族资产阶级是反对北洋军阀的，带有革命性。大革命失败，蒋介石同帝国主义勾结，同买办资产阶级勾结，并同江浙的财阀南四行^[2]勾结，在上海、广州屠杀革命的工农，所以共产国际第九次扩

大会议指出当时的反革命是三个：帝国主义，封建势力，资产阶级。在革命的方面也有分化，城市小资产阶级动摇，有的跑到改组派与第三党方面。反映到党内，党员有的脱党，有的畏缩，有的则拼命、发狂。因此革命的力量主要依靠工农，当然也不是把小资产阶级除外。共产国际第九次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说中国向两个极端急剧分化，中间阶层是动摇的。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给中央的报告中也指出主要是依靠工农。当时，在城市主要依靠先进的工人，一般的大多数的工人也有些畏惧；在农村，农民也有畏惧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小业主、小商人、学生等）也是畏惧的。“六大”把资产阶级算成反革命，但没有主张消灭资本主义。主要依靠工农，这是对的，不能把城市小资产阶级看成是革命的主要力量，否则便会使我们的思想混乱。但“六大”对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认识是不清的，虽然承认城市小资产阶级的革命作用，在动力上又认为只有工农，小资产阶级被除掉了，把当时某些上层小资产阶级分子参加资产阶级反对派，误认为全体小资产阶级背叛革命，因而在策略观点上错误了。

“六大”对反革命方面没有分析，特别是对民族资产阶级的认识与共产国际第九次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不同。共产国际第九次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认为反革命内部有矛盾，可以利用。“六大”则把这一点翻过来，认为他们虽然有矛盾，但反共是共同的，因此他们的矛盾无法利用。这种认识是错的。毛泽东同志说，把敌人看成铁板一块，这是关门主义的分析方法。事实上，南京政府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府。另外还有不满意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对派，这是当时的第三营垒。这个第三营垒不是动摇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中间力量（这在当时的情况下是不可能的），而是统治阶级营垒中的反对

派，是政府的反对派。第三营垒开始是改组派，以后改组派跑进政府，又有史量才、杨杏佛等代表人物。蒋介石和汪精卫在一九二八年三四月本来要一起回南京，桂系反对汪精卫，汪精卫被阻在上海反桂系、反胡汉民，那时蒋、汪的矛盾不明显，但他们之间是有矛盾的。毛泽东同志的分析是正确的。

“六大”对农村阶级关系的分析基本上没有错，但不像毛泽东同志说的那样明确。“六大”决议中说对地主是没收一切土地，对富农不要故意加紧反对，在雇农反对富农时，我们要站在雇农方面（这同后来的加紧反对富农是不同的），但对小地主、富农没有进一步分析。

大革命时是四个革命阶级（无产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中，这四者有区别：无产阶级是领导阶级；工农是基本的革命力量；小资产阶级有动摇性；资产阶级有两重性，有时参加革命，有时反对革命。大革命时，有些带买办性的资产阶级也投机参加了，这是国共合作初期的国民党右派，不能算作革命的动力。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在反北洋军阀时是革命的，但也有软弱性，他们同帝国主义封建势力有联系。

武汉政府当时不是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政府，还有谭延闿、孙科、唐生智等代表地主资产阶级的人物坐在政府中，汪精卫则是代表资产阶级的。当时我们应把改变武汉政府为工农小资产阶级联盟当作努力的方向，当时实现这一种方向也是可能的。共产国际把国民党看做阶级联盟，内分左、中、右三派，右派是大资产阶级，中派是民族资产阶级，左派是工农和小资产阶级，包括我们党。但是那时我们党内的机会主义者却把我们从左派划出来，叫共产派，没有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在国民党内改造国民党，争取领导权。

现在我举出几个典型人物来研究一下。

（一）胡汉民。他是彻头彻尾的右派，是买办阶级的思想。他在广东时反对工农很厉害，反对农民组织武装队伍，站在机器工会方面反对工人群众。他下面的大将有吴铁城、马超骏、古应芬。刺廖仲恺便是他的弟弟胡毅生干的，而他知道。

（二）蒋介石。他在大革命时主要是买办资产阶级的思想，但也不否认他有一点民族资产阶级的思想。在一九二四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蒋介石的民族资产阶级性多些，是中派，但与地主买办资产阶级有关系。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到“四一二”这期间，群众起来，他便反共。一九二六年“三二〇”事件时他的立场已转到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方面，变为新右派，其灵魂便是戴季陶。“四一二”后他便成了反革命，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表面上却仍以民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进行欺骗。

（三）汪精卫。他在大革命时主要是资产阶级的思想，虽有时很“左”，却不赞成没收地主土地，对工农有戒心。汪精卫在大革命初期并不积极，孙中山曾说：精卫、展堂已不能代表俄国式的革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是孙中山先生委托鲍罗廷起草，由瞿秋白翻译，汪精卫润色的。孙中山先生逝世后，汪精卫乘机积极起来，在广东又被选为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主席。一九二七年汪精卫由俄国回来，并没有想反蒋。他一到上海，蒋介石就找他开会。这时陈独秀找他写了个“汪陈宣言”，此事被蒋介石知道了，汪精卫又想不发表，而报馆已上版来不及抽回。第二天汪精卫又去开会，吴稚晖在会上大骂，汪精卫一怒，拔腿就跑到武汉去了。就这样他成了左派的领袖，大叫革命的向左边来，这完全是投机的。抗战期间他投降日本侵略者，成为卖国贼。

（四）廖仲恺。他是民族资产阶级的激进的代表，没有买办性。他是华侨，但不大富有，对帝国主义很仇视，反对封建势力，同情农民减租减息，但对工人反对中国资本家却采取调和的态度，对反对外国资本家则是赞助的。在黄埔军校，当我们青年军人联合会反孙文主义学会时，他采取调和的态度。他是激进的资产阶级革命家。

（五）邓演达。他是小资产阶级的激进的代表，赞成土地革命，能与我们长期合作，是国民党中的左派。开始他相信无政府主义。当他从苏联回来，在讨论土地问题时，他和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一致。他积极主张摧毁封建势力。他是农村出身的知识分子，与军队有些关系。在武汉时，若以邓演达为中心，不以汪精卫为中心，会更好些，而当时我们不重视他。大革命失败，他很苦闷，同俄国顾问一起走了，后来回国组织了第三党。虽然他在思想上是反对我们的，应该批评斗争，但在策略上应该同他联合。这人的品格很高尚，对蒋介石始终不低头。在“九一八”以后，蒋介石把他杀了。

在阶级关系的分析上，过去我们的缺点，一是公式化，一是定型化。所谓公式化，是教条地搬用俄国一九〇五年反对沙皇和资产阶级立宪民主党的公式到中国来，对中国的资产阶级特别是民族资产阶级不能正确地认识，不能分析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把中国的小资产阶级看成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小资产阶级一样。所谓定型化，是把人定死了，不懂得人是会变的。蒋介石代表过民族资产阶级讲话，但不能把蒋介石的叛变看成整个民族资产阶级的叛变。对汪精卫也一样。看不到中国的阶级关系的复杂与变化，这是错误的。第三党是代表小资产阶级的。一九三〇年邓演达回国后，曾找我们谈判合作反对蒋介石，可是我们没有理睬他，这是不对的。

至于大革命失败后，是否还可以用国民党和三民主义的旗帜问题，我也讲一下。假如邓演达没有走，仍与他合作，是还可以用国民党旗帜的。但在南昌起义之后，只有共产党是革命的，国民党叛变了，这时再用国民党和三民主义的旗帜，就会使群众的认识发生混乱。对三民主义不革命的方面应该批驳，对三民主义革命的方面应该保留下来，而我们当时却是对它全部否定了，没有给以历史的科学的分析。

三 大革命的经验教训

“六大”开会时，革命正处在转变关头，当时对许多问题是有很热烈的争论的，如对过去的主要错误机会主义、盲动主义的认识等。但时间不够，大会总共开了十天，接着就开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没有像现在我们为开党的“七大”做准备这样多的时间。会上没有解决的问题，决定组织专门委员会来解决。当时组织了研究秋收起义、南昌起义、广州起义三个委员会，由共产国际东方部领导。可是许多代表已经回国，事实上也研究不出什么东西来。“六大”是把一些基本问题提出来了，做了结论，但因为研究不够，不能抓住问题的本质和中心，把问题平列了。

第一，对机会主义的分析。虽然指出了它是大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但没有抓住要点。布哈林在大会上的报告，对机会主义的错误曾指出以下三点：一、中共在与国民党合作中没有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二、对同盟者不敢作正面的批评；三、动员群众的力量不够。这三点是机会主义的错误，但当时的情况也并不完全如此。从整个大革命的过程来看，特别是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六年中，党的两次中央扩大会议都强调了我

们组织上的独立性；对国民党的批评是有的，甚至有些批评是不恰当的；群众是动员起来了，在一九二七年初，我们就组织了二百万以上的农民协会会员，以后更多，工人有工会及纠察队的组织，从毛泽东同志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也可看到群众是动员起来了。只有武汉时期，机会主义者才说群众运动过火了。当时是群众革命运动的高潮，是历史上空前的，就是在抗战期间也没有过。所以，虽然这三点是机会主义的错误，但大革命的失败，主要是没有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在国民党、政府、军队中争取领导权，搞土地革命，以武装斗争为中心。共产国际第八次全体执行委员会会议对中国问题的决议包括这四点：改造国民党使工农分子大批参加进去，这就是争取党权；把农民协会变成为乡村的政权，这就是争取政权；组织七万军队，其中要包括二万共产党员，这就是争取军权；再就是要没收土地，搞土地革命。共产国际在没有把这个决议送来之前，先用电报把这四点告诉了共产国际驻中国的代表罗易。罗易收到这个电报后，不给我们党中央看，却拿给了汪精卫。汪精卫看了后大怒，骂共产国际有阴谋。罗易这种叛卖阶级的行为是和十月革命前夕加米涅夫的行为一样的。后来中央也知道了这个电报的内容。这时离国共分裂还有两个月，如果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努力去做，还不失时机，但当时中央不重视这个指示，反觉得没有办法。身任国民政府农政部长的谭平山以“不能纳农运入正轨”而辞职，希望国民党去整顿、改革下层政权，而不把农民协会变为乡村政权。关于军队，我们当时已经有一个军、两个师和武汉的警卫团，以当时的军校作骨干，再加上湖南、湖北的工农武装和武汉的工人纠察队，组织五万到七万军队是有可能的。还有朱德同志在江西有一个军官教育团，他兼南昌市公安局局长。有这些条件不去运用，是不对的。

后来军校被张发奎解散了。对于土地革命问题，当时曾有争论，是扩大还是深入？主张深入的要是在湖南、湖北搞土地革命；主张扩大的却不要在湖南、湖北搞土地革命，而要向西北发展，首先打通西北国际路线，将来经过地方自治、减租减息再解决土地问题。讲到西北国际路线，也是有历史的。在广东时鲍罗廷就主张向西北发展，不要过早与帝国主义冲突，与国际打通后，再与帝国主义作战。在当时，这个意见是值得考虑的。可是到武汉之后形势变了，当时有两个敌人，一个是蒋介石，一个是北洋军阀张作霖。在中央内部有东下还是北上的争论。多数人的意见不主张东下，理由首先是蒋介石的欺骗在群众中还有影响，他也高喊北伐；其次是东下会与帝国主义过早发生冲突；第三是如果我们东下打蒋介石，张作霖可能从后面来打武汉。所谓北上的中心思想，是想避开湖南、湖北的农民运动，接冯玉祥出来，与国际打通。所以四五月间，唐生智带兵继续北伐。那时对冯玉祥的认识比对蒋介石的认识更错误。当打下武汉，以武汉为革命中心来对抗在南昌的蒋介石时，听说驻中央的共产国际代表伍廷康还跑到南昌去见蒋介石，想同他妥协。冯玉祥在北平驱逐溥仪出了皇宫以后，跑到苏联大吹自己，说自己是工农合种生出来的。共产国际对他也弄不清，相信他是农民军队的领袖。当时，武汉的环境是困难的，在敌人封锁、内部动摇的情况下，把最后的希望押在冯玉祥身上，所以对“马日事变”并不重视。在郑州打下后，什么人都跑到郑州去会冯玉祥了。鲍罗廷、加伦也去了。可是这时蒋介石也派吴稚晖到了郑州。冯玉祥一面与武汉来的这些人应付，一面宣布他要去徐州会蒋介石。于是武汉去的这些人一连串地跑回来。这时汪精卫、谭延闿、孙科、顾孟余等态度全变了，国民党的人更加动摇了。共产党领导人六月三十日的让步（承认国

民党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承认共产党员参加政府是以国民党党员资格，共产党员可以请假退出，工农武装应在国民党领导之下，武汉工人纠察队编入军队，取消纠察队）是投降式的让步，企图以此来挽回局面，结果更糟。从整个过程来看，党的领导在大革命初期对的多，错的少；中期有对的，也有错的，有些还是原则的错误，如对中山舰事件及北伐等问题；到大革命的后期，机会主义路线形成。说大革命时期党的领导完全错误是不对的。如果当时坚决执行共产国际的四点指示，局面不是不可以挽救的。“六大”决议对机会主义错误的总结，虽然指出它的最高表现是“不去发展土地革命和群众的阶级斗争，却只做上层勾结功夫，蒙蔽阶级的矛盾，不去夺取军队，不去武装工农，不能利用参加政权机关的机会，去为群众谋利，所以在紧急关头不去打破敌人的包围，而被敌人包围”，但与其他错误平列，没有指出主要的问题。所以从决议来看，不能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第二，对“八七”会议的总结。指出了“八七”会议的成功与成绩，也指出了有两个缺点：一是对国民党左派还保存了些幻想，一是对土地问题还不大彻底。这两点也不是中心问题。“八七”会议后，南昌起义的部队仍用国民党左派的旗帜，并不是最主要的错误。土地革命当时是决定要干的，但经验证明实行土地革命的初期是不能够彻底的，总要有一个过程。我认为“八七”会议的主要缺点是：一、“八七”会议把机会主义骂得痛快淋漓，指出了要以起义来反对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但到底怎样具体办，没有明确地指出，以作为全党的方向；二、“八七”会议在党内斗争上造成了不良倾向，没有让陈独秀参加会议，而把反对机会主义看成是对机会主义错误的负责者的人身攻击。所以发展到后来，各地反对机会主义都找一两

个负责者当做机会主义，斗争一番，工作撤换一下，就认为机会主义没有了，万事大吉了，犯了惩办主义的错误。我认为这是主要的缺点。

第三，对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央扩大会议也总结了。我看十一月扩大会议的错误方面多于正确方面。正确方面是放弃国民党的旗帜，打出苏维埃的旗帜。事实上在十一月扩大会议以前，海陆丰已经打起苏维埃的旗帜。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也不是用国民党的名义，而是用工农革命委员会的名义。这个问题实际上已经解决了。我认为十一月扩大会议的主要错误：一是认为中国革命是“不断革命”，一直发展下去没有间断地达到社会主义；二是对革命形势的估计认为是一直高涨上去；三是认为革命的方针是全国总暴动。“六大”决议对这些都批评了。“不断革命论”是那时共产国际驻中国的代表罗米那兹提出来的，我们当时并不知道。对革命形势的低潮，“六大”没有严重地指出来。十一月扩大会议还有个错误就是规定了政治纪律，这也是国际代表提出的。我们当时觉得这一条很新鲜。政治纪律是为了处罚领导起义失败的同志，当时认为毛泽东同志领导秋收起义是失败的，曾给他处罚，解除他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还处罚了其他同志。事实上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是成功的。他把起义的农民武装和武汉的警卫团带出来，到了井冈山，创造了井冈山根据地和以后的中央苏区。南昌起义时，谭平山是共产党员，是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委员长，他也因犯错误被开除出党。他被开除党籍的原因，是张国焘反对南昌起义，谭平山对一位师长说，张国焘若反对起义就把他杀掉。当时我任前委书记，这位师长来征求我的意见，我说党内斗争不能这样做。后来有人把这事告诉了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代表就决定把谭平山开除了。今天看来，这

个处分是不完全妥当的。如果给他别的处分或送他到莫斯科去，是会好些的。当然谭平山是有错误的，但张国焘也是有错误的。张国焘当时也受了处分。我和李立三也受了处分。

第四，“六大”对于南昌起义，总结也不够。南昌起义是反对国民党的一种军事行动的尝试，中央虽指出了南昌起义五点错误，但没有指出它的主要错误。我觉得它的主要错误是没有采取就地革命的方针，起义后不应把军队拉走，即使要走，也不应走得太远。当时如果就地进行土地革命，是可以把武汉被解散的军校学生和两湖起义尚存的一部分农民集合起来的，是可以更大地发展自己的力量。但南昌起义后不是在当地进行土地革命，而是远走汕头；不是就地慢慢发展，而是单纯的军事进攻和到海港去，希望得到苏联的军火接济。假使就地革命，不一定能保住南昌，但湘、鄂、赣三省的形势就会不同，并且能同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合。

第五，秋收起义。各地的秋收起义，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农民自动起来把农会变成政权的情况，当时在湘、鄂、赣三省到处都有。后来毛泽东同志到平江、浏阳等地，起义就搞起来了。他把队伍带到井冈山。鄂豫皖、赣东北等地也都受到秋收起义的影响而搞起来了。但也有些地方失败了，如鄂西、鄂北等地，失败的原因是由于当时中央领导上还有盲动主义的错误。主要的盲动主义是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央扩大会议以后，但“八七”会议就已有了盲动主义的因素。例如“八七”会议以后普遍提出杀土豪劣绅的口号，甚至有些地方把杀土豪劣绅当作动员的口号，以致发展为烧城市。小资产阶级革命家的狂热性，在秋收起义时，在中央领导机关中就发生了。当时一部分人由于大革命失败而产生了愤慨、报复、拼命的情绪，这也是造成盲动主义发展的因素。

第六，广州起义。这时正是反革命猖獗的时候，全国的城市在反革命手里。广州起义是广州工人与革命军人联合起来的英勇尝试。“六大”指出广州起义是大革命失败后退兵时的一战，这是正确的。当时正是汪精卫继李济深之后统治广州，汪精卫要解散罢工委员会。工会还有一部分武装。跟张发奎从武汉回到广州的教导团的一部分，已由叶剑英同志当了团长，叶剑英同志说他们也将要被解散。同时，张发奎的军队正好开去挡黄绍竑去了，如再等一个短时期，他们就会调一师兵力回广州解散工会和教导团。我们乘这空子把部队拖出来，并且根据情况估计，要起义是可能的，但坚守不容易。当时在广州的共产国际代表是德国人纽曼，他主张起义后坚守广州，建立苏维埃。起义的总指挥叶挺同志是起义的前夜才请去的。叶剑英同志刚入党，搁在一旁没有被用。叶挺在起义的当夜主张把队伍拖出去，纽曼大骂叶挺动摇，说广州起义是进攻的，应该“进攻进攻再进攻”。第二天张太雷同志牺牲。第三天大败，仓皇退出。结果张发奎回到广州，来了个大屠杀。那时如果采取退却的方针，实行有计划的退却，或同海陆丰农民运动会合，或同在曲江的朱德同志会合，都不会如此仓皇，可以保持更大的革命力量，可以保存更多的干部。

广州起义失败后，叶挺到了莫斯科，共产国际代表还说他政治动摇。共产国际没有人理他，东方大学请他作报告，共产国际也不允许他去。这样，他就离开党跑到德国去了。这件事我们应该给叶挺伸冤。在皖南事变时他是非常英勇的，想以个人的牺牲来保存革命的力量，比某些共产党员表现还坚决，而且迄今还未向国民党低头。

“六大”对这些问题的总结有缺点，没有抓住基本的问题，但一般的都总结了。在总结起义的经验时，反映出各地代表的

一些地方倾向，即今天的所谓山头倾向。假如说到某地起义搞得不好时，某地的代表就很激动，总希望把自己的起义说得好一点。因此，就不易冷静地去总结这些经验教训。

中国党在策略的运用上所犯的错误是：在革命处于高潮应当进攻的时候，不善于进攻，如在武汉时期；在革命处于低潮应当退却的时候，不善于退却，如在广州起义时期。

四 革命形势和党的策略

关于对革命形势的估计问题，当时有过争论。中国代表曾争论到斯大林同志面前。斯大林同志说，现在的形势不是高潮，是低潮。李立三同志则说，现在还是高潮，因为各地还存在工人、农民的斗争。斯大林同志说，在低潮时也有几个浪花。

关于土地问题，当时也争论得很厉害。有人以为蒋介石也可能在中国实行俄国斯托雷平式的土地政策^[3]。斯大林同志指出，中国不可能实行斯托雷平式的土地政策，因为蒋介石是依靠帝国主义、勾结封建势力的，他不可能实行这种改良的土地政策。

“六大”指出当时中国革命的形势是处在两个高潮之间，因为当时所有能够引起革命的矛盾，没有一个得到解决。农民的武装斗争还部分地存在，是新的革命高潮的微弱的象征，但它并没有说新的革命高潮已经到来。以后事变的发展证明，当时指出农民斗争将成为新的高潮的重要组成部分的预见是对的。一九三〇年红军打下了长沙。不管红军打长沙的政策对不对，但它可以说明当时的农民游击战争处在高潮中。“六大”指出民族革命运动又在生长，是指高潮快要到来，这在“九一

八”事变后也证明了。所以，我们还不能说“六大”对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预见是性急或过早。

“六大”的争取群众、准备起义的基本策略方针是对的，同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央扩大会议的不同。“六大”当时反倾向斗争中的主要锋芒是反对“左”倾盲动主义与命令主义，因为机会主义已经过去，陈独秀、彭述之又没有到会，只有张国焘一人到了，而犯盲动主义错误的人到得比较多，受批评最多的是李立三同志。虽然如此，“六大”还有它“左”的错误。

首先，对于革命高潮与低潮，有几个问题一直是模糊的：一、对革命高潮的客观条件与主观力量区分不清楚，不知道主观的群众运动对促成革命高潮到来的作用。所以后来对革命高潮的估计，往往强调有利的客观条件，而不知道主观力量薄弱是不能真正造成革命高潮的。二、没有把革命高潮与直接革命形势区分清楚，不知道革命高潮是说明起义的条件正在甚至已经成熟，但仍不是说全国可以马上到处起义。如一九三〇年农村革命形势是高潮，但不能马上到处起义。立三路线的失败就因为要到处起义。三、没有把局部的高潮与全面的高潮区分清楚。所以当时虽然肯定了是低潮，但并没有很清楚地去了解这个问题。正因为没有把这几个问题弄清楚，所以我们一九二八年十月回国后，对革命高潮问题还是空洞地争论浪潮与浪花的问题。

其次，在策略方针问题上，也有几点是模糊的：一、虽然当时决定了我们是退却，争取群众，但是“六大”对于高潮是进攻，低潮是退却，并没有斩钉截铁地分别开来。二、没有弄清在总的退却中，还可以在局部的地方举行进攻与攻势防御。例如当时在井冈山就是局部的进攻，但在全国是退却的。三、没有弄清在进攻中也有退却。如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时，在进

攻中有时还采取退却的办法。由于对这些问题没有清楚认识，所以不能使策略更具体明确，而当时是有可能去认识这些问题的。这是“六大”的缺点。

我们对革命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没有很好分析，同这个问题相联系的“乡村中心”、“乡村战胜城市”的观点也没有产生。依据当时的实际情况与理论水平，要求“六大”产生一个以无产阶级为领导、以乡村作中心的思想是不可能的。当时虽然有了农民游击战争，但我们这种经验还不够，还在摸索。我也根据历史的经验与当时的情况研究了一下，太平天国是从乡村中发动的，占了南京才有以后的局面。还有一种“流寇”式的农民游击战争，没有占城市，终归失败。这些使我感到要以城市作中心方能长期存在。俄国一九〇五——一九〇七年革命失败后，农村也没有高潮，而且农村的革命运动比城市的工人运动更快地低落下去。至于其他的小国家更不用说。所以在历史上无论中外都找不到农村包围城市的经验。从我国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正是处在整个农村革命的游击运动非常困难的时期，蒋桂战争还未爆发，想在这种情况下肯定以乡村作中心是不可能的。

讲到乡村中心的时候，还必须联系到一个问题，即农民必须由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但当时要党不去用主要的力量与城市无产阶级联系，而把主要力量放在农村，这是史无前例的。共产国际的一切文献，一讲到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就是同工人运动联系在一起的。只有中国党经过长期的实践，证明在脱离城市无产阶级的情况下，也能够锻炼成为一个坚强的布尔什维克党，这才能得出这个结论来。我们研究这个问题，不妨再从反面想一下，如果没有坚强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即使以“乡村为中心”，也难免要失败，事实上也是有许多地方失败了

的。当时海陆丰的力量比井冈山大，各种条件都比井冈山好，但结果还是失败了，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由于那里无产阶级领导的思想没有展开，由于领导上还带有小资产阶级革命家的气味的缘故。

当然，我不是说乡村中心的思想永远不会产生，在“六大”以后，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应该产生这种观点。但一九四〇年我到共产国际去，共产国际的领导同志都还担心我们离开工人阶级太远了。我说我们在农村里经过长期斗争的锻炼，有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完全可以无产阶级化。共产国际的一些同志听了之后大哗，不以为然。

毛泽东同志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也是有其发展过程的。大革命前，有一次恽代英同志看到陶行知他们搞乡村工作，写信给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回信说：我们现在做城市工人工作还忙不过来，哪有空去做乡村工作。一九二五年他回家养病，在湖南作了一些农村调查，才开始注意农民问题。在“六大”那时候，关于要重视乡村工作、在农村里搞武装割据的重要与可能等问题，毛泽东同志是认识到了的，而“六大”则没有认识。但是，关于把工作中心放在乡村，共产党代表无产阶级来领导农民游击战争，我认为当时毛泽东同志也还没有这些思想，他也还是认为要以城市工作为中心的。开始他还主张在闽浙赣边创造苏区来影响城市工作，配合城市工作，到给林彪的信中才明确指出要创造红色区域，实行武装割据，认为这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也就是要以乡村为中心。所以，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是发展的。斯大林同志的思想也是发展的，例如他把中国红军问题放在中国革命问题的第一位，不是在一九二八年，而是在一九三〇年红军打长沙的前夜，这是接受了一九二九年红军发展的经验。

五 党的各项政策

“六大”对党的各项政策，大体上有了规定，如关于苏维埃区域的红军问题、工人工作、农民工作、土地政策等，都有单独的决定。但以现在的眼光来看，这些政策是缺乏策略观点的，深入地研究实际情况与群众观点非常不够，最明显的是不重视农村武装割据，搞军队和政权，其次是关于建党问题。毛泽东同志当时已经重视这些问题，这在一九二八年十月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和一九二九年十二月红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已经明白表现出来。

第一，关于建党问题。大革命失败以前，党的组织都是处在半公开或公开的状态。大革命失败后，在国民党区域的党要转为地下秘密党，在游击区域的党则要公开领导群众进行武装斗争。当时的建党问题，在白区是如何把公开半公开的党转为地下秘密党，在游击区域是如何以武装来建党的问题。“六大”对党的组织问题并未很好地讨论。记得我曾做了关于组织问题的报告，但那时所知道的材料也仅限于白区城市党的问题。“六大”没有认识到白区党应以积蓄力量为总的方针，只注意在组织形式上改变和缩小。但事实上党的组织仍是半公开的，如上下级关系仍是那样密切，领导机关庞大，支部仍以领导斗争为中心，不是像列宁所说的为着积蓄力量保存干部甚至可以不作声息。当时并没有这种思想。如果谁有这种意见，那时一定会说他是机会主义。工作作风是“跑街主义”的，谁跑得最多谁就是好党员，谁要坐下来多研究一些问题，谁就会被当作坏党员看。后来刘少奇同志到北方，曾批评过这种作风，当时许多同志还认为他这种批评是不正确的。关于领导机关工人化

的问题，在“八七”会议后，就把与机会主义作斗争看成了简单的人事撤换，这种形式主义影响到后来关于领导机关的工人化，把工人干部当作偶像，对知识分子干部不分别看待。那时李立三同志当广东省委书记，曾说：知识分子的作用完了，今后只有依靠工农干部。所以到广州起义失败后，教导团有几百学生退到海陆丰，就没有把他们当作干部来使用，而把他们编到第四师去当兵，后来绝大多数在作战中牺牲了。关于思想斗争问题，也没有像毛泽东同志给林彪的信中那种循循善诱耐心说服的精神。在“六大”会议上是有“山头”倾向的，不能完全平心静气地讨论问题，特别是与自己有关的问题，把反对机会主义与盲动主义看成人身攻击。那时机会主义的代表是张国焘，盲动主义的代表是瞿秋白同志，两人争论不休。后来布哈林出来讲话，说就是你们这两个大知识分子在吵架，再吵就把工人干部提拔起来代替你们。他这话在当时和以后影响都非常不好，使工人干部与知识分子干部相互对立。

第二，关于工人运动。当时提出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是对的，并且写在决议上了。可是如何去争取？是组织赤色工会去争取工人阶级大多数呢，还是到黄色工会里去工作来争取工人阶级大多数呢？“六大”决议对这个问题没有作明确的规定。后来在关于职工运动的决议上，决定以组织赤色工会为主。这是错误的。大革命时期，我们在上海、武汉、广州等大城市是组织了广大的工人群众的，可是大革命失败后，这些工人组织差不多都被摧垮了，即使有留下来的工会，会员数量与党员差不多，已经很少。当时存在的还有这样几种工会：一种是原来的工会，到国民党部那里去登了记，成为合法的组织；一种是原来的工会，没有到国民党部那里去登记，也还存在；还有一种是国民党派人组织的工会。当时这些工会中有的还是有群众

的，再去组织赤色工会的可能性已经很小，应该是到黄色工会里去工作。关于职工运动的决议确定以组织赤色工会为主，这与中国党内对工人运动“左”的倾向和职工国际一贯的“左”倾是有关系的，对后来党的职工运动过左起了很大影响。关于工厂委员会的组织，是企图在工人斗争中建立既非赤色工会亦非黄色工会的工人统一组织，今天看来在当时也是不可能的。

第三，关于农民运动。“六大”写了关于农民与土地问题的两个决议。关于如何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是要经过一个长期摸索过程的，而且要有许多具体的办法，如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抽多补少，抽肥补瘦，这就是很好的办法。如果根据“六大”的原则，没收地主阶级的一切土地，只分给贫苦的农民，那就必然发展到从肉体上消灭地主或驱逐地主出苏区。这样对斗争是不利的。

第四，关于苏维埃问题。从决议中看不出像毛泽东同志那样的在农村中创造苏区长期割据的思想，而是抄袭苏联的经验，看重城市苏维埃，所以仍是教条主义的。

第五，关于反帝反军阀斗争。军阀和帝国主义我们都是要反对的。但“六大”是把他们看成铁板一块，没有矛盾可以利用，不是像毛泽东同志那样特别看重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来发展我们的力量。

第六，对其他党派的政策。没有加以区别，把他们一律看成敌人。如改组派当时是反对我们的，但他们同南京的矛盾是可以利用的。再如第三党，对他们在思想上瓦解我们这一点应该反对和批评，但在反蒋问题上仍是可以与他们合作的。再就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那时应该在城市中间发动广泛的民权主义斗争，“六大”没有着重指出这一点。

第七，关于军事运动。“六大”有一个秘密的关于军事工

作的决定，没有宣布，里边有一部分是关于白军工作的。当时对这一工作的重视是非常不够的，而且把白军工作完全放在士兵当中也是一个偏向。不错，在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军队中许多军官是反动的。但中国雇佣式军队的特点，军官在军队中是有很大作用的。“六大”认为在官长中进行工作就是军事投机。后来的事实证明，敌军大部队的哗变和投降红军，都是由于我们在军官中进行了工作。如广西李明瑞的一个师变为红军，江西第二十六路军的起义，都是由军官领导的。

六 “六大”本身及其影响

（一）共产国际对“六大”的影响。“六大”是直接共产国际领导下召开的，今天对它应有个分析。我上面说的“六大”正确的地方，主要是斯大林同志的影响。这里有两点证明：一是一九二八年二月间共产国际第九次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是经过斯大林同志看过、改过的，它成了“六大”的基本根据。主要的问题都是这个决议上有的，如革命的性质、动力等。二是斯大林同志在“六大”前夜曾和中国党的几个负责人谈话，具体地解释了革命性质与革命形势这两个问题。

当时在“六大”做实际工作和做报告的是布哈林、米夫等人。布哈林是共产国际书记，米夫是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他们对“六大”当然也会有影响。如布哈林在大会上做报告骂张国焘和瞿秋白同志，说他们是大知识分子，要让工人干部来代替他们，这是一。二、布哈林对中国苏维埃、红军运动的估计是悲观的。他认为只能分散存在，如果集中，则会妨害老百姓利益，会把他们最后一只老母鸡吃掉，老百姓是不会满意

的。他要高级干部离开红军，比方说，要调朱德、毛泽东同志去学习。所以我们回国后就指示要调朱德、毛泽东同志离开红军。朱德、毛泽东同志不同意。后来蒋桂战争起来了，我们觉得红军有可能发展，就作罢了，但没有认识到这种调动是错误的。三、至于对中国富农的问题，布哈林在苏联对富农问题虽然犯了错误，但是“六大”对农民问题的决议强调了富农的封建性，又说不要故意加紧反对富农，所以没有多大坏的影响。

“六大”决议是瞿秋白同志起草的，米夫、布哈林都修改过，拿回来后秋白同志又改过。米夫的作用在这里还不大。他起的主要作用是：一、散布了一些对中国党负责人轻视、不相信的话，有影响。在“六大”筹备选举时，他在筹备选举的委员会中说过，中国党负责人理论上很弱，现在有些较强的同志如王明^[4]、沈泽民等，暗示可以提拔他们参加中央。当然，当时是没有什么人理他的（后来传出去说，米夫要提他们当中央委员），可是这种说法却起了影响，造成了东方大学等校学生对党的负责人轻视，以致后来发生了反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斗争。二、造成了工学界限。例如他对向忠发极力地捧，利用他放炮，要他反“江浙同乡会”等。在“六大”会后，有的代表没有走，还召集了几个报告会，王明还报告了反“江浙同乡会”的斗争。一般地说，代表们对米夫印象不好。三、在组织上起了些作用，但不是主要的。例如，在“六大”工作人员的人选上，东方部的人员多，这是有宗派的意味的。

（二）代表成分。今天看来是不很健全的。代表有七十五人，各地方的都有。到会的代表，连工作人员旁听的，共有一百十二人。不健全的地方在于：一、太重视工人成分。工人代表要占多数，这是可以的。但是，大革命中工人干部牺牲很多，有些做实际工作的领导同志又调不出来，所以很多是从支部中

找来的代表。大革命后，支部负责人都是新的，老的都牺牲或离开了，所以许多人是很弱的。七十五个代表中，工人有四十一人，经过大革命锻炼的人不多。二、没有把当时有革命经验的干部集中起来参加“六大”。共产国际三月底来电通知，四月代表就要走。当时要毛泽东同志去是有困难的，但还有许多同志是可以去的，如刘少奇、任弼时、恽代英、陈潭秋、李富春等同志。如果多去一些做实际工作的同志，就可以多反映一些实际问题和意见。但当时觉得国内工作更重要，所以没有去。三、有失败情绪、“山头”倾向和人身攻击等。所以讨论问题不能深入，一讨论到实际问题就闹起来。例如，当检讨到两湖起义的错误时，两湖的代表们便觉得他们的工作中也有些成绩而极力争辩。但必须说明，当时各地代表团中并没有宗派小组织的活动。

这是三个主要的弱点。代表成分不健全，问题就不能深入讨论。加之在领导上又没有少奇、泽东等更正确的同志参加。

在选举中，有多选工人为中央委员的倾向。三十六个中央委员中就有二十一个是工人。过去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工人领袖虽然不少，但党对他们的教育不够，而知识分子干部中有许多是五四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做了许多实际工作，有经验的不少。由于太强调工人成分，很多较好的知识分子干部参加中央工作就受到了限制，如刘少奇同志只被选为审查委员会的书记，没有被选为中央委员。恽代英同志也没有选上，到二中全会才补上。这和后来中央很弱是有关系的。但当时对选举的态度并没有什么宗派主义，如毛泽东同志和关向应同志等得票是很多的，而张国焘和瞿秋白同志等犯过错误的，票数最少。

（三）大会时间。大会没有充分时间来研究讨论问题。代表在思想上没有什么准备，代表又不是各地选来的（只有广东

来的是开会选出的，其他大多数是中央指定的)，对许多决议的讨论也不充分，只是所谓原则通过交委员会在文字上修改。如果时间多一点，可能好些。

总起来说，“六大”关于革命的性质、动力、前途、形势和策略方针等问题的决定基本上是对的，所以说“六大”的路线基本上是对的。但错误的方面也不少，就是说，在具体的实际的问题上犯了许多错误：一、不认识中国革命的特点是农民斗争与武装割据，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土地问题。二、不认识中国阶级关系变化的复杂性，没有把策略观点着重放在争取中间阶级上。三、不认识革命形势发展的不平衡性，因而没有重视农村工作与建党工作，虽然当时还不可能产生乡村包围城市的观点。四、没有更认真地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从而认识武装的重要，以武装建党、建政、做群众工作，这些，毛泽东同志当时已经做了。所以说，“六大”是有原则性的错误，对以后发生了坏的影响。毛泽东同志是正确的，但是，“六大”决议在当时的影响更大，因为“六大”是全党性的，毛泽东同志还没有成为全党的领导，这是党的不幸。

我们党的布尔什维克化，是从党一产生就开始的，是逐步发展的，毛泽东同志是一个代表。“六大”正确的东西属于这方面。“六大”也有毛病，犯了一些错误。但这些错误没有形成路线错误，没有形成宗派主义，虽然一些倾向是有的。这些，对以后立三路线、宗派主义的形成是有影响的，但不能负直接责任。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〇年出版的
《周恩来选集》上卷刊印。

注 释

〔1〕指一九二八年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的十条政纲：一、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二、没收外国资本的企业和银行；三、统一中国，承认民族自决权；四、推翻军阀国民党的政府；五、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府；六、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失业救济与社会保险等；七、没收地主阶级的一切土地，耕地归农；八、改善兵士生活，给兵士以土地和工作；九、取消一切苛捐杂税，实行统一的累进税；十、联合世界无产阶级和苏联。

〔2〕指当时的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嘉璈）、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浙江兴业银行（总经理徐寄庠）、浙江实业银行（总经理李铭）。

〔3〕指一九〇六年由沙皇政府大臣斯托雷平颁布的土地法令。主要内容是：允许农民退出村社，可以把自己的份地变成私产。这个法令的实行，使村社瓦解，富农可以用贱价收买土地，从而地位加强，少地农民和贫民的状况恶化，农民的分化加剧。

〔4〕即陈绍禹。

关于路线学习、工作作风 和时局问题*

(一九四四年三月五日)

毛 泽 东

一 关于路线学习

(一) 党内与党外问题。

在去年党的路线学习中，有部分同志对王明、博古^{〔1〕}同志的错误怀疑是党外问题，现在确定是党内问题。

(二) 合法与非法问题。

过去有同志认为临时中央和五中全会是非法的。现在看到洛甫^{〔2〕}在他的反省笔记中说到，对临时中央共产国际来电批准过，五中全会也经过共产国际的批准，根据这一点应当说是合法的，但选举手续不完备。临时中央迁到中央苏区后应该报告有关的情况，他们没有报告是不好的。确定了上述问题后，就好检讨四中全会是不是政治路线的错误。四中全会得到共产国际和中央的承认，这在形式上是合法的，但政治内容是不好的。

这样，在政治上便于弄清是非，在党内便于团结。

*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

（三）弄清思想与结论宽大问题。

我们自整风以来就是治病救人的，在清查党内历史问题中有人怀疑好像不是采取治病救人的方针。现在我们的方针，还是在思想上要清算彻底，作组织结论要慎重和适当。

过去在我们党的历史上，除反张国焘错误路线的斗争外，有两次大的斗争，即反陈独秀错误路线与反李立三错误路线的斗争。那时在思想上没有进行很彻底的讨论，但结论作得严重，因此未能达到治病救人的目的，前车之覆并没有成为后车之鉴。这一次我们一定要在思想上弄清楚。现在中央指定读五本理论书^{〔3〕}，是学习世界革命的经验。过去没有做过认真研究理论和研究历史的工作，对犯错误的人只是惩罚。没有认清立三路线的错误不是个人问题，而是代表了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急性病是在小资产阶级十分广大的社会中的一种必然性，不是个人的偶然现象，而是社会现象。无产阶级的社会存在也是一种必然性，无产阶级思想是革命热情与实际精神相结合。无产阶级对小资产阶级是用改造与感化的方法，引导农民和小资产阶级进入社会主义。对小资产阶级不能采用急躁的消灭的方针。

中国社会最基本特点是小资产阶级占人口的大多数，党对这个问题要慎重处理。反映到党内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及由于这种思想而产生的错误，也不是个人问题，而是社会现象，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必然现象。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时期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在内战时期犯“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过去在国际上也有这种现象，例如在巴黎公社时期犯“左”的布朗基主义错误，后来又犯第二国际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这个规律是由于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采用的政策会反映到无产阶级党内来。例如，中国资产阶级蒋介石在抗战时期采用联共政策时，

我们党内容易产生右倾错误；在皖南事变时，便产生“左”倾错误，有人认为是又一次“马日事变”，主张举行全国暴动等等，资产阶级一触，我们即跳。

在四中全会后到中央工作的同志，有一些没有参加过大革命，却认为自己似乎是很高明的。这也是他们犯错误的原因之一。

我们要强调产生错误的社会原因，不要强调个人问题，因此我们的组织结论可以宽大些。这个方针现在就要宣传解释，使同志们了解实行这个方针的必要。思想要弄清，结论要宽大，对党才有利。我们反对四中全会后党内斗争的错误方针，因此要采用宽大政策，否则便成了四中全会的学生，便不能弄清思想问题，吸取经验教训。

对抗战时期的问题也许不在七大作结论。七大只作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一段历史的结论，这个结论应着重于取得经验教训，要照顾到以后，不重视惩办，只作政治结论，以达到治病救人的目的。

（四）不要否定一切。

对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这一段历史，也不要一切否定。当时我和博古、洛甫同志在一起工作，有共同点，都要打蒋介石，分歧点是如何打蒋介石，是策略上的分歧。在土地问题上，对六大决议中关于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的政纲，是没有争论的。争论是在没收后博、洛等主张富农分坏田、地主不分田，而我是不同意的。如果把过去一切都否定，那就是一种偏向。我们对问题要分析，不要笼统地一概否定。我在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时，也说到要保留好的东西，这才是实事求是。

（五）对六大的估计。

在讨论中有少数同志企图否定六大，有人说六大的路线基本上是错误的。

我认为六大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六大指出了革命的性质，提出了十大政纲，指出形势是两个高潮之间，反对速胜论，指出要争取群众。六大的基本精神是有群众观点的，不要群众的是李立三。在蒋冯阎^[4]战争爆发后，李立三便认为革命形势到了高潮，没有准备好群众条件也要暴动。

（六）党内的宗派现在是否还有？

我认为经过几次分化是没有了。经过遵义会议的分化、抗战初期的分化，又经过这次分化，现在是没有这个宗派了。这样的估计才符合事实，利于全党的团结。

现在比较严重的是山头主义。其产生的主要原因是：（1）小资产阶级的广大；（2）长期被分割的农村革命根据地；（3）思想教育的缺乏。这种东西相当妨碍我们内部的合作，在党、政、军、民关系上表现还很严重。长征过的老干部容易强调从军队来的力量，这也是有道理的，当年没有红军北上是不可能现在这样大的力量，而只能进行游击战争。这一点，本地负责同志应向本地干部作解释。而南方来的负责同志也要向外来干部解释清楚，如果没有本地的干部和党组织及群众的基础，工作也是不能搞好的。全部北上的红军到陕北时只有二万五千人。现在我们有了近百万党员，只有少数是老党员。延属地委除王震同志外，主要是本地干部，西北局及华北、华中各地区，主要也是北方干部多，因此外来干部要了解这一点，要重视这个问题。头一条，要说明红军干部有成绩。最初本地干部把八路军当作“神”，后来又认为一钱不值，现在要来一个否定之否定，就是说不是“神”，或者说是有点的“神”。第二，外来干部同本地干部要多交谈，要了解当地历史，要与本

地干部合作，在这方面要有自觉性。现在基础是本地同志，老干部要自觉地认识这一点。山头主义是目前党内最主要的具体的问题，历史上的问题已经不是主要的了。

二 工作作风问题

最近有些领导同志的工作作风有进步，这种进步是在经过整顿三风、审查干部和路线学习之后得来的。拿我们的机关工作来说，工作不仅在机关中，而且许多工作要跑出机关去做。过去我们中央许多机关同地方民众没有联系，他们是没有“国籍”的；其次有些同志认为大材小用，对于现任工作不安心。现在情况有些改变，如妇委表示要同本地群众多联系，原来认为大材小用的，现在思想上也改变了。还有些同志过去不用脑子，不会分析具体问题，只会大喊大叫，做大块文章。脑子的作用是专门思想的，不用脑子是一个大毛病，近来情况有些改变，特别是最近有进步。但从全党来说，工作作风问题还相当严重，在某些环节中还有相当多的人脱离群众和不想问题。

最近在文艺工作、宣传工作方面接近了群众，报纸上也有了有分析的文章，与群众有联系了，党校工作和某些机关工作有进步，国民教育也正在改进中。

组织部门的工作过去有形式主义，在运用了群众路线后，有很大的进步。锄奸工作也改变了过去只靠少数专职工作者来做的方法，发动广大群众参加，有了新的成绩。

职工运动，过去是照例到纪念节发文件，以应付纪念节完事。现在职工委员会已深入工厂作调查研究，切实参加陕甘宁边区工人运动，会有成绩的。

军队中过去军民关系很差，高干会以后作风改变了，已有

很大进步。

现在各方面的工作都注意计算数字，实事求是，联系群众，特别是在整风、审干、生产等方面成绩更大。主要是由于实行了首长负责、亲自动手，领导与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具体指导相结合等等方法。我们要使每个同志都懂得，如果作风不改变，不仅个人无成就，大则会使革命丧失前途。我们都要有这样的信心，凡是作风不好的犯错误的同志，都可以改变，都是有光明前途的。

有什么好的工作方法呢？我看最近开劳动英雄大会、劳动英雄与模范工作者大会、劳动英雄与战斗英雄大会，就是一种好的工作方法。内战时期有些脱离群众的强迫的办法是不好的。现在的英雄模范大会有了新的内容，真正做到了群众化、具体化。劳动英雄与模范工作者是群众中的模范，开这样的大会，就使首长、劳动英雄、模范工作者同群众联系起来。过去是首长同群众相隔离，没有去团结积极分子使群众同首长结合起来。模范工作者的标准要在群众中讨论，现在要先在几个机关中进行选举，这样就使领导同群众联系起来了。我们的机关中有些首长还不如群众，也有好的首长，如马专员^{〔5〕}会审官司，老百姓说他是“青天”。今年边区还要开劳动英雄大会，有各区劳动英雄、战斗英雄、各方面的模范工作者参加。这是群众创造出来的好方法，这样的方法是一种好的竞赛方法，可以提高干部，联系群众，推进工作。对于模范工作者要加以培养和教育，不要使他们骄傲或落后。在部队的连队中，在一切大小机关中，都要选举劳动英雄或模范工作者，这种方法对各级首长是一种“将军”，使干部能得到学习。例如，在军事教育中，从连队选出会投手榴弹、会刺枪的人来教大家，这就逼使我们的干部从机关中走出来。当干部的首要放下架子，打

破个人英雄主义，忘记自己是什么“长”，忘记自己是中央委员，而到群众中去学习。今年部队中有一个人种了三四十亩地的（去年只有十八亩），能产六石粮食，四石归公，二石归个人。杨家岭的个人生产平均每人是一石五斗。现在实行的公私兼顾的分红制，是一个新的原则问题，是群众自己创造出来的。

总之，我们要建立好的工作作风，就是要放下架子，打开脑筋多想问题。

三 时局和我们的方针

我们的方针是使国民党既不能投降又不能打内战。我们是不愿意打内战的。去年下半年对国民党实行的政治攻势，逼出了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关于对共产党问题要用政治方法解决的声明，今年可能不会发生内战了。今年这一年很重要，我们要开七大，要搞生产，要继续整风、反特务，这些都要今年完成。现在我们还是处在困难的地位，还有很多困难，例如经济困难，党内整风和反特务斗争的工作还没有完成，我们要有一年的和平环境才能完成上述工作。今年和去年相比较，形势有所不同：（1）今年有了莫斯科会议和德黑兰会议的成果，现在苏、美合作得很好、很积极，苏、英好像有些矛盾。英国内部有一派人认为英国没有独立的外交，如对波兰问题，对南斯拉夫问题。但英、美都声明不会影响开辟第二战场。现在国际关系中虽然有些别扭，但对德黑兰会议的基础无妨碍。（2）日本已经决定不向苏联进攻，这种国际局面影响到中国，使内战减少了可能性。我们的政策是采取防御，实行“后发制人”。（3）最近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的进攻计划改变了，近日有四个主力

师离开了边区周围。（4）我们的情况也在改变，军队进行了冬训运动，生产有了成绩，军民关系比较改善了。去年我们进行了时事教育（即阶级教育），团结了内部；兵工生产发展了，现在已能炼钢；训练了自卫军，兵力增加了两个旅。在上述国际国内四个条件之下，避免内战的可能性增加了。最近国民党要周恩来、林伯渠同志到重庆去谈判，我们回答林老可以先去，他们说甚表欢迎。我们的方针是避免内战，集中抗战。对北面高双成更要注意联络，对联络参谋更要改善关系。最近外国记者要到延安来，我们要准备让他们看。我们要采取同国民党搞好关系的方针，即是实行“孔夫子打麻将——和为贵”。

辩证法是从过程中来规定的。我们在去年对国民党实行政治攻势时，主要是强调批评国民党的一面，现在主要是缓和同国民党的关系，这两方面不能同时强调提出，否则就是形式逻辑。

国民党提出同我党谈判的条件是以皓电为基础，要按比例裁兵，我们提出我军编为四军十二个师。我们的原则是三民主义与四项诺言，七大也要抓住三民主义和四项诺言，强调避免内战，集中力量抗日，强调战后和平。现在我们要答应以皓电为基础（不是完全实行皓电），才能重开谈判之门。我们的步骤是派林老先去，打开谈判之门，但具体谈判恐怕要到下半年。

对宪政问题，我们的方针是参加宪政运动。在“三一二”孙中山逝世纪念日，恩来、林老都要发表演说，要强调地方自治、民权自由与开放党禁。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三卷刊印。

注 释

〔1〕即陈绍禹、秦邦宪。

〔2〕即张闻天。

〔3〕指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列宁《在民主革命中社会民主党的两个策略》（今译名为《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

〔4〕指冯玉祥、阎锡山。

〔5〕指马锡五。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注意防止和 纠正坦白运动中各种“左”倾 错误给饶漱石的指示

（一九四四年三月九日）

饶：

寅鱼电悉。

（一）根据延安经验，当我们同志和群众没有看见特务以前，总是麻木不仁，熟视无睹，但当他们一看见具体特务及群众的坦白运动发动以后，即以为到处都是特务，不合事实的夸大特务活动与特务组织，因而引起反特务斗争的狂热，随便给人戴上特务帽子并在下层常常发生逼供信的错误，以至使用捆绑吊打等肉刑。因此在群众的防奸运动发动以后，领导机关必须注意防止与纠正“左”倾错误。你处坦白运动已达全面突破阶段，应即根据运动中各种“左”倾毛病在领导骨干中详加说明，引起他们注意并及时进行检查工作，纠正偏向，无论如何不能让逼供信的错误现象发展。但在运动还没有发动的地方，还不要去反对“左”倾错误。

（二）坦白运动进行到适当的程度，应即停止坦白大会的举行，而集中注意于研究坦白分子的材料，辨别其真伪与可信的程度，坦白大会不可开得过多。

（三）此时必须坚持一个不杀大部不捉（百分之九十五不

要捉)的方针,并注意防止自杀事件。

书 记 处

寅佳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毛泽东等关于对阎锡山斗争的方针 给滕代远、邓小平等的指示

（一九四四年三月十日）

滕、邓转太岳聂、毕、王、王^{〔1〕}：

一、岳北系我基本根据地，是延安与冀鲁及华中交通孔道，不能让阎部深入，因此必须准备给阎东侵部队以严重打击，歼灭其一部。

二、对岳南已深入之阎部，在目前时局与地形尚不利于给以大打，但如继续向东侵犯，有腰斩太岳之虞，亦须给以必要打击，阻止其东伸及四出扰乱春耕。

三、对阎部内及占领岳南中条区内，应采取一切有效办法开展政治攻势与组织工作，希望你们根据具体情形详加考虑，我们提出以下几点不成熟意见作你们参考。

子、为釜底抽薪计，组织武工队及游击小组，深入我们原有工作基础较好地区（浮冀沃地区），进行游击活动，袭扰驻地，打击征粮征税捉拿采买哨兵人员，破坏交通联络，掩护群众春耕，增加顽军物质困难与恐慌。

丑、揭发顽军头子通敌事实，特别掌握人民与士兵下级军官所了解到的事实，重复宣传。

寅、改善对俘虏兵方式，采取小组座谈，个别接见，了解其被征当兵（捉兵）经过，家庭与部队生活状况，官兵关系。

我应真心诚意关心其家庭生活与个人处境，在可能条件下替其解决困难，利用他们自己的经验去教育他们自己，去逐渐引导他们仇恨有钱者不当兵、无钱者捉当兵，真抗日还可言，假抗日真反共一世臭名。要告示八路军官兵平等，不打人不骂人，根据地减租减息，民众有事，自己开会，自己办，不捉兵也不拉夫，抗日军人家属有政府群众照顾帮助，征求对我批评，他们愿留八路军者欢迎，愿来陕北本人及其家属均给以土地与帮助，愿回家归队者从优给以路费，在我各级首长诚恳谦和感化与自愿下，与之结为朋友，规定秘密通信、代语、代名、地点，保守秘密，保持联系，取消过去夸张自己、侮辱别人的硬化方式。对俘虏军官一般采取欢迎欢送出境，首长分别接见，发现其中动摇与进步分子秘密争取为我服务，许以事成给以优待。

卯、利用武工队游击小组掩护下，恢复建立地下支部、群众小组。

辰、利用阎部经济困难，在连排班长及兵士中进行收买工作（我们以前无经验），以便必要时配合军事行动。据黄克诚经验，所得利益常比收买武器弹药的用费少得多。同时利用社会关系直接进行向阎部下级军官士兵收买武器弹药。经验证明经济关系易成为政治关系之桥梁，不可忽视。上述一切活动，以决死队名义，以口头宣传及无名传单，不以八路军名义发传单，不在新华报上公布。

毛、朱、彭^{〔2〕}

三月十日午

注 释

〔1〕指聂荣臻、毕占云、王新亭、王敬林。

〔2〕指朱德、彭德怀。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 组织生产问题给华中局的指示^{*}

(一九四四年三月十三日)

华中局并转各区党委、各师：

春耕已到，你们应动员广大人民，一切男女老幼走上生产战场，各级地方干部，专员、县长、区长、乡长等，均应亲自下乡，精细的去指导与组织一个村或几个村的生产，解决人民生产中的困难，发动群众高度的生产热潮。除此之外，关于部队机关学校的生产，亦应加以切实的动员和组织，在不妨害战斗与工作条件下，要使每一个战士与工作人员适合各人情况的都去参加一些生产劳动，为切实改造本部队本单位的生活而斗争。华中的财政并不怎样困难，所有部队机关学校农业手工业生产所得，应一律用以改善各该部队机关学校全体人员的生活，公家发给他们的经费照常发给，不予扣除。在开始时，公家并应贷予各部队机关学校一笔生产基金，哪个单位生产很好，那个单位的生活就可提高，让各单位的生活水平高低不一样，以刺激各单位的生产积极性，并应特别注意改善战士杂务人员及工作人员的伙食，增加肉食，训练伙夫，使饭菜做得适合营养的程度，以便保持健康，增强体力，减少疾病。一切浪

* 这个指示是刘少奇起草的。

费是应该反对的，但对于部队机关已经很低的生活水平，不应再去号召节省，再去降低他们的生活水平。各部队机关学校的首长，均应亲自计划与组织生产，务使今年生产能获得显著成绩，则其他困难亦将比较容易解决。

中央书记处

三月十三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四册刊印。

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关于山东工作 给罗荣桓等的电报

(一九四四年三月十六日)

罗、黎、萧并滕、邓^[1]：

寅江电悉。我们提出以下意见，请根据实际情况考虑执行：

(甲) 争取国内和平，团结抗战，坚持敌后斗争是我党一贯方针。去秋国民党向边区威胁，经我政治上猛击，引起英、美及国内人士之注意与对国民党之不满，逼迫蒋^[2]不能不暂时改变对我斗争方式（军事反共转到政治反共为主）。因此对顽斗争应坚持自卫原则，决不衅自我开。保持我党经常的政治主动地位。

(乙) 鲁南、鲁中、滨海三区，从去年夏秋后，地区扩大一倍以上，极应利用时机努力发动群众，深入减租减息，加强游击队与组织民兵，并须在今年内做出一定成绩。在老区域注重生产，继续深入群众工作，准备坚持今后更艰苦局势，盼深刻注意。

(丙) 张里元对我态度似历守中立，应彼此维持原界，我应多派人与之联络，引敌注意，对其威胁，使张受敌威胁后进步而与我合作，或投敌或被敌“扫荡”而驱逐消灭，较我直接逼之出境均为有利。王善志与赵保元矛盾极深，赵力大，王畏

之，前王与我联络因而断，且赵现为山东顽军中坚，常在敌军掩护下向我进扰，我应联王，利用赵向我进扰时给以严重打击，消灭其一部，造成赵王均势，扩大其矛盾而利用之。达到打通滨海与胶东区联络。否则造成赵王团结，依附敌人制我，甚为不利。张景月据云系土匪出身，狡猾异常，打击与争取其对我中立，请灵活运用之。如给以打击后，退还少数人枪，讲和抗战等办法。打击亦应在其进扰时施行，我才有理有利。

毛、朱、彭

十六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注 释

〔1〕指黎玉、萧华，滕代远、邓小平。

〔2〕指蒋介石。

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 目前国内问题宣传政策的通知

(一九四四年三月二十一日)

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各师并转各区党委：

三月十二日延安举行的孙中山纪念会及周恩来同志的演说，应作为这一时期我党关于国内问题宣传的基准。自去年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及解放日报评十一中会后，国共关系即已趋于缓和，我们为了继续团结国民党，准备对日反攻计，应该争取时局的进步，应该改变前此（去年七月至九月）对国民党公开正面猛烈抨击的态度。在那一时期那种斗争是正确的，必要的，收到成效的。在现在时期，宣传上采取和缓态度亦是正确的，必要的。至于孙中山三民主义口号及其进步内容，则在现在革命阶段无论何时均是适用的，不应放弃的。但各地为了进行时事教育，为了整风防奸，除上述政策应予指明外，在对内的口头宣传上，可以仍着重于暴露反共分子（不是整个国民党）的反动及区别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不同，各级党的领导机关，尤其宣传部门，应善于灵活地配合这两者。

中央宣传部

寅马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四册刊印。

毛泽东等关于公布战绩应用实数 给八路军总部等的电报

(一九四四年三月二十一日)

集总、山东军区、晋西北：

查我军战报，多年沿用加倍数目发表的办法，用以扩大影响，但此种办法，对群众为不忠实，对党内造成虚假作风，对敌人则引起轻视，对外界则引起怀疑。

嗣后，我军公布战绩的数字一律不准扩大，均发表实数。
望转令所属严格执行。

毛、朱、彭、刘^{〔1〕}

三月二十一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注 释

〔1〕指朱德、彭德怀、刘少奇。

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 在目前时期中的宣传策略 给程子华、刘澜涛的电报

（一九四四年三月二十二日）

晋察冀分局程、刘：

林^{〔1〕}主席报告在蒋^{〔2〕}领导下的话是特意如此表示，以期争取国共关系的缓和，边区政府则争取合法化。即在去年紧张时期，我们亦仍要求国民政府承认边区，《评〈中国之命运〉》亦仍说要求蒋如何如何，而并不提出推翻蒋口号。在进行反法西斯教育中，骂法西斯反动派是应该的，但在目前时期中不应指名骂蒋、骂国民政府及骂整个国民党。本部十四日电亦说明此意。望以此两电方针在高级干部中进行解释。至于你处过去提法不妥当处，不必须作公开更正，如有询问者则个别解释之。

中 宣 部

寅养（三月二十二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注 释

〔1〕指林伯渠。

〔2〕指蒋介石。

关于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问题^{*}

(一九四四年三月二十二日)

毛 泽 东

今天想把文化教育问题和同志们讨论一下。这个问题我也没有深入研究，只是听到一些不多的材料先来讲一讲，开一个头。这次陕甘宁边区高干会议讨论的问题有好几个，文化教育问题虽然没有列入议事日程，但是我想今年冬季再开高干会议的时候，应该把它作为一项议程，而且应该作为一项重要的议程。

最近这几年陕甘宁边区的工作有很大的成绩，特别是去年一年边区的生产更有成绩。今年如果老天下雨，具备了自然条件，再有这次高干会议作了思想准备，工作更会做好。拿环境来说，今年比去年好，磨擦仗大概是不会打了。罗斯福不赞成我们中国打磨擦仗，那位蒋^[1]委员长也不想打，我们更不想打，大家都不想打，自然就打不起来，所谓“和为贵”。边区现在就是在这样一个环境下面。我们的口号老早已经提出来了，就是战争、生产、教育。在敌后我们同日本帝国主义打仗，同时还可以进行建设，进行生产，也可以办教育。边区在没有战争的条件下，直接的任务就是生产和教育两项。军队也有教育，有政治教育、军事教育、文化教育，今年冬季要来一

*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宣传委员会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个大练兵。早几年，陈学昭刚来边区的时候，她看边区建设这样也不好，那样也不好，就说共产党搞军队有办法，建国就不大行。这是三年前讲的话。这个话对不对呢？我看这个话讲对了。我们在政治上、军事上有些办法，但是在生产建设上那个时候办法的确是比较少的。大家想一想，三年以前生产成绩在哪里？如果生产搞得好，《野百合花》也许不会写出来了。三年以前大家的伙食不好，病人也很多，据说鲁艺上课有一半人打瞌睡。大概是小米里头维他命不够，所以要打瞌睡。

我们党在内战时期和抗战初期学会了打仗，学会了战争。在政治、军事这两门上我们比较会，当然还有毛病，但对这两门比较熟习一些。至于对经济、文化这两门，就不大熟习。我们也搞过经济，因为不搞经济，仗也没有办法打。要能够打仗，首先要有饭吃，过去能够打仗，也是因为搞过一点经济。过去中央苏区也搞过文化，比如有海军舞，在座的同志也有看过的，也有识字组，办过报，办过学校，但不能说全党都学会了，因此也不是很有成绩。说到老百姓，现在陕北还有一部分人吃得很差，还有许多人粮食不够，丰衣足食在边区还是一个目标，只有一部分人达到了。但是去年这一年，生产走上了轨道，经济走上了轨道，这是大前提、新的东西。今年高干会议的议事日程中有财政经济问题，这是因为经济虽然走上了轨道，但是我们还没有完全学会，还要继续学。

这次会议文化问题还没有提到议事日程上。我们边区的党部、政府甚至某些管理机关，如某些宣传机关，在议事日程上还没有把文化教育问题提出来，还有同志不晓得在这些方面要做什么事情。比如县和区一级的宣传部，听说有的知道了，做得还好，有些就不晓得如何做。现在就是这样一种情况，对军事、政治比较会，对经济、文化不大会。经济、文化如果不会

搞，那会怎么样呢？如果不会搞，这个共产党就没有多大用处。用处也有一点，就是善于破坏旧的东西，善于打击敌人，能够把敌人打败，但是很大的用处就没有。因为你不学会经济、文化，就不能使人人吃饱小米饭，老百姓就会没有猪肉吃，又不识字，又不会闹秧歌。现在秧歌也有一点，但如何普及还是一个问题。在文化方面还有很多事要做，要搞识字组，搞唱歌，搞春联，等等。因此，经济、文化这两门不学会就不好。

在内战时期、抗战初期，甚至于现在，在我们一些同志中间还有一种思想，就是认为政治、军事是第一的，经济、文化是次要的。这样一种看法有没有理由呢？的确，政治、军事是第一的，你不把敌人打掉，搞什么小米、大米，搞什么秧歌，都不成，因为还有敌人在压迫。在敌人压迫下，你还能搞什么学校，搞什么生产呢？所以打敌人当然是第一的。这样一来，做打敌人工作的人就有名誉，就吃得开，搞小米的人、搞秧歌的人就吃不大开，开会不会坐首席，选举主席团也没有他们的位置。不把敌人打掉，搞小米、搞生产搞不起来，因此把打敌人的工作放在第一是应该的。但我们应该知道，政治是上层建筑，经济是基础。政治好比就是这个房子，经济就是地基。我们搞政治，搞政府，搞军队，为的是什么呢？就是要破坏妨碍生产力发展的旧政治、旧政府、旧军队。日本帝国主义占了我们的地方，我们还有什么生产力可以发展？这是妨碍生产力发展的。妨碍生产力发展的旧政治、旧军事力量不取消，生产力就不能解放，经济就不能发展。因此，第一个任务就是打倒妨碍生产力发展的旧政治、旧军事，而我们搞政治、军事仅仅是为着解放生产力。学过社会科学的同志都懂得这一条，最根本的问题是生产力向上发展的问题。我们搞了多少年政治和军事就

是为了这件事。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也主要是讲的这件事，讲生产力在历史上是如何发展起来的。至于文化，它是政治、经济的反映，又指导政治、经济；它反映军事，又指导军事。今天我们边区有两种秧歌：一种是老秧歌，反映的是旧政治、旧经济；一种是新秧歌，反映的是新政治、新经济。有一个秧歌叫《赵富贵》，还有一个秧歌叫《张治国》，听说在吴起镇演出后，警三旅有一个士兵把自己的手捆起来，跑到连长那里请求处罚。为什么要请求处罚？他说“我想开小差，不但自己想开小差，还想组织别人开小差”，还讲出在他棉衣里缝了多少法币。他要求处罚。他自己讲出来了，当然也就不处罚了。这就是我们的文化的力量。早几年那种大戏、小说，为什么不能发生这样的力量呢？因为它没有反映边区的政治、经济。过去，成百成千的文学家、艺术家、文化人脱离群众。开了文艺座谈会以后，去年搞了一年，他们慢慢地摸到了边，一经摸到了边，就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所谓摸到了边，就是反映了群众的生活，真正地反映了边区的政治、经济，这就能够起指导作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政治、军事的力量，是为着推翻妨碍生产力发展的力量；推翻妨碍生产力发展的力量，目的是为着解放生产力，发展经济。经济是政治、军事的基础，政治、军事是上层建筑。地基是经济，根本目的也是发展经济。政治、军事之所以放在第一，是因为如果没有它们，生产力得不到解放，就没有可能谈其他问题。文化是反映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的，但它同时又能指导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文化是不可少的，任何社会没有文化就建设不起来。封建社会有封建文化，封建文化是宣传封建主义的道理。资本主义社会也有资本主义的文化，资本主义社会如果没有文化，也没法建立起来。现在中国还不是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

义不占优势，所以中国的文化也是很弱的。在真正的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文化提高了生产技术。现在我们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性质是资本主义的，但又是人民大众的，不是社会主义，也不是老资本主义，而是新资本主义，或者说是新民主主义。这个社会没有文化也不行。比如组织了变工队需要记账，组织合作社也需要记账，这就需要文化。一个村里组织变工队，至少要有人能写村里人的名字。总之没有文化就不行。过去北伐时期，新军队比旧军队好，同建立黄埔军校就有关系。当时黄埔学生大部分是青年学生，这些青年有革命热情，又有知识，他们有了文化，其他军队就比不上。革命军队除了要有革命精神，没有知识也不行。如果军队没有知识，文化、政治水平不提高，那末这个军队的质量也不可能提高。

现在我们的边区发展到怎样的情况呢？我看如果不发展文化，我们的经济、政治、军事都要受到阻碍。现在我们是被拖住了脚，落后的东西拖住了好的东西，比如不识字、不会算账，妨碍了我们的经济、政治、军事的发展。假如我们都能识字，文化高一点，那我们就会更快地前进。所以我提议，从现在起，我们就要提出发展文化这个问题，请大家考虑考虑，调查研究一下。到今年冬天，我们开一个会展开讨论，搞他十天八天，明年就会搞得好些。我们来一个五年计划，去年算一年，今年是第二年，在这五年中间，使陕甘宁边区一百四十万老百姓，加上党政军十万人，一共一百五十万人，统统把文盲消灭掉，把边区人民的文化提高到一个必要的程度。怎样才能做到呢？我看这里面大致有四个问题：报纸、学校、艺术、卫生。现在分别来说一说。

第一，关于报纸。

现在高级领导同志，甚至中级领导同志都有一种感觉，没

有报纸便不好办事。饭来了，报来了，他们有些人是先看报，后吃饭。有一位本地工农出身的同志告诉我，他就是先看报的。假使每个县上这样的工作同志增加到十五人至二十人，那我们的工作就会做得更好。《解放日报》在边区已成为一个组织者。没有《解放日报》，在这样一个人口稀少、地域辽阔、在全中国算是经济文化很落后的地区工作，是很困难的。有一个《解放日报》，就可以组织起整个边区的政治、文化生活。还有《边区群众报》，发行更广，看的人更多。现在边区还有许多地方报纸，是各地委办的，我看到的有关中、绥德的报纸，陇东、三边听说也有。关中、绥德两个地区的报纸似乎还不错，新闻编写得都很好。这些地方报纸之所以需要，就是因为仅仅有一个《解放日报》、一个《边区群众报》还不够，他们那里出一个报纸，反映情况可以更直接、更快些。我想这是好的。我们地委的同志，应该把报纸拿在自己手里，作为组织一切工作的一个武器，反映政治、军事、经济并且又指导政治、军事、经济的一个武器，组织群众和教育群众的一个武器。要以很大的精力来注意这个工作，使它一年比一年进步。我们的各旅是不是都有报纸？我知道关中的那个旅^[2]有，三五九旅也有，听说有些团也有。各县还没有。可不可以在各县也办一些报纸？这点还毫无经验，究竟需要不需要？有些地方我看不需要，比如延安，因为《解放日报》、《边区群众报》就在它这里出版。有些离延安远的县份是不是需要？比如有些县委可以出一个油印报纸，请一位知识分子负责，定期也好，不定期也好，从编辑到发行，包括刻钢板，一个人就差不多了。各县的报纸登些什么呢？比如我们这里出了一个申长林，就把他的事迹登上，有一个陈德发也可以写进去，不必专等延安的《解放日报》。这个事情同志们可以考虑一下，当然也不要以为

这是杨家岭开了会的，于是就发命令要大家都办，如果不需要就不办，也可以先从一两个县办起来试一试。

过去我们学会了一种工作方式，就是开会。这个方式各处盛行，多年以来我们就没有放弃过这种工作方式。如果你们再把办报这种工作方式采用起来，那末许多道理和典型就可以经过报纸去宣传。现在我们要学会这种工作方式。现在我们边区，开会是最重要的工作方式，报纸发出去就可以省得开许多会。我们可以把许多问题拿到报纸上讨论，就等于开会、开训练班了，许多指示信可以用新闻来代替，所以报纸可以当做重要的工作方式和教育方式。墙报也算是一种报，办墙报也可以当做重要的工作方式。但是我们还不会使用它，还拿不出一种轰动全城的革命墙报，吸引全延安的人来看。我想一个伙食单位，比如说有一百个人，就可以出墙报一张。这里总有一个首长，他就要把墙报当做自己组织工作、教育群众、发动群众积极性的武器，自己写社论。现在有些墙报办得不好，只有写文章的人才看。可不可以开个墙报会议？假如现在有两百个机关有墙报，每一个墙报来一个编辑，来一个首长，开一个四百多人的会议。这个会一定要首长参加。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墙报才能办得好。要把墙报办得又有革命的内容，又生动活泼，成为组织各机关工作的一种工作方式。

这样来办报，全边区可以有千把种报纸，这叫做全党办报。一个机关也可以办报，党员非党员都可以参加，这叫做党与非党联盟。这样一来，我们的报纸可以起很大的作用。过去在这一点上注意不够，现在要各机关首长负责，把报纸当做自己很好的工作方式。我们有很多的政治、经济工作，如果办好报纸，就可以使这些工作做得更好。

第二，关于学校。

昨天报上登了一个消息，是关于延安市完小的消息。这是一条很好的新闻，有这样一条新闻，比我们讲好多话还起作用。因为这个完小已经做出了实际成绩，应该把它传播到全国去。这个小学办得很好，过去我们有许多小学办得不好，群众不欢迎，我们硬要办，这是命令主义。从前我们杨家岭有一个教员，教了年把，我问他你讲的课人家懂不懂，他说听是听不大懂，但是还要讲。我说，我们共产党要学会一个办法，就是人家不听就不讲了。教育厅开了会，说学校要归民办，我想这样很好。乔木^[3]同志对我讲，学校要村办才好。听说陈德发那个乡有二十五个自然村，一个乡只办一个小学，学生读书要走几十里路，很不方便。昨天报上还有一条消息，说锁家崖村要办一所小学，采取一年三学期制，农忙时放假，学生帮助家里耕作。这样，一面读书，一面帮助家里做事，同时也就没有变成公家人的危险。在乡村里，一个村办一个小学是比较方便的。如果一个乡办一个小学，娃娃读书要寄宿，寄宿要交粮食，在家里吃饭六七斗便够了，交学校要一石三斗，学的尽是一些九州万国，不从农民的实际需要出发，又有变成公家人的危险，这是不妥当的。变成参加革命的公家人，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这好比民兵变成游击队、游击队变成正规军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一样。现在有些不自然，参加工作，脱离生产，好像从他身上割下一块肉，很突然。关于教员问题，我们也可以想法子解决。可以组织识字组。边区过去也搞过识字组，但是失败了，我想实际上是没有做。好像从前提出要增加四十万石细粮一样，高干会议以前提出的，但究竟如何增加，没有哪个管。而前年高干会议提出增加八万石细粮，结果增加了十六万石，因为去年一月初报纸上出现吴满有的按家计划，建设厅把他找到，开了三天会，搞清楚了一个吴满有，才晓得边区能增加多

少万石，用什么办法增加。组织识字组，从前所以失败我看是因为没有具体领导，也因为群众的生产运动还没有发展。现在情况不同了，群众有了这个要求，我们的工作方法也有了进步，我们来一个号召，就可以逐步推广。我们大体上有这样一个计划，就是说边区三十五万户，一百四十万人，十年之内消灭全部文盲。一天识一个字，一年三百六十五天识三百六十五个字，十年识三千六百五十个字。十年又可以分作两个五年计划，一个五年计划识两千字左右，如果能够识两千字，就接近消灭文盲了。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提出一百四十万人在五年之内都可以看《边区群众报》。即使再推延五年，十年之内人人都可以看《边区群众报》，也可以。我们共产党是以有雄心著名的，在十年之内，我们要使老百姓人人都可以看《边区群众报》，有三分之一的人能看《解放日报》。一百四十万人的三分之一能够看《解放日报》，《解放日报》就要印得很多，到那时候恐怕要办很多造纸厂。过去吃的是窝窝头，穿的是破烂，冷得要死，哪里还能搞什么识字组？现在不同了，我们生产有了进步，今年再搞上一年，文化工作就应该提出来了。我想今年冬季要搞他一下，因为现在群众要求这样做，比如可以来一个三四个月的冬学。春季夏季是不容易搞的，因为人家忙得要死，要上山种地。今年冬天来一个发动，打下一个基础，明年就会有更大的发展。提高文化，消灭文盲，要靠识字组。当然这也要以自愿为原则。开始不妨组织一两个组，约一些人识字，识字当然比不识字好，于是识字的人就神气。再评选几个模范出来，奖给他们几块手巾，字也识了，手巾也有了，搞他两年就可以搞成一个风气。

什么人教呢？就是老百姓教老百姓。现在我们的部队是官教兵，兵教兵，兵教官。去年一些干部在延安训练了五天就回

去练兵，一个连有一百多人，其中总会有一个好汉，干部和他比一比，不一定比得过他，就可以让他出来教。识字组也可以民教民，认识十个字的就可以当组长，认识一百个字的就可以当委员长。

我们还要编一些书，搞一些关于生产知识等方面的书，作为教材。学生要学会打算盘，学会写信，学会记账，学会写路条。这样他家里的人一看，到完小读了几天书回来，什么都行了，很好。这比从前的学生好，我们那个时候从学校里一出来，就自以为是，个人突出，神气十足。

另外，我们还要提倡父慈子孝。过去为了这件事，我还和我的父亲吵了一架，他说我不孝，我说他不慈，我说应该父慈第一，子孝第二，这是双方面的。如果父亲把儿子打得一塌糊涂，儿子怎么样能够孝呢？这是孔夫子的辩证法。今年庆祝三八妇女节，提出建立模范家庭，这是共产党的一大进步。我们主张家庭和睦，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双方互相靠拢，和和气气过光景。

小学现在决定民办的方针，这很好，此外还有公家办的。由政府办的高级一些的中学、师范学校现在有六个，边区一百四十万人口有六个师范学校和中学，这是历史上空前的事情，是在共产党的时代才发展的。绥德、米脂一带，历来教育就发展，现在比过去也许还差一点。至于三边、陇东就大不相同，三边有了师范学校，这是一大进步。现在把权交给专员公署和地委，你们就要管，而且还要管得很好。

在教学方法上，教员要根据学生的情况来讲课。教员不根据学生要求学什么东西，全凭自己教，这个方法是不行的。教员也要跟学生学，不能光教学生。现在我看要有一个制度，叫做三七开。就是教员先向学生学七分，了解学生的历史、个性

和需要，然后再拿三分去教学生。这个方法听起来好像很新，其实早就有了，孔夫子就是这样教学的。同一个问题，他答复子路的跟答复冉有的就不一样。子路是急性子，对他的答复就要使他慢一些；冉有是慢性子，对他的答复就要使他快一些。听说去年延安办了个把月的训练班，把各乡乡长、支部书记集中起来训练，教什么呢？教去年《解放日报》七、八、九三个月登载的一些材料，以及《国共两党抗战成绩之比较》。教这些东西要得要不得？要得，特别是《国共两党抗战成绩之比较》，更有教育意义。但是，仅仅是这几条就还不够，到农村里只会讲抗战成绩的比较是办不了事的。应该教给他们工作的方法，使他们懂得一个支部书记、一个乡长应该如何工作，使他们晓得工作的方式方法不能总是老一套，而是根据当前的情况如何做工作，如何当乡长，如何当支部书记。至于延安的学校，如中央党校、延安大学、行政学院也要着重联系实际。从中央党校、延安大学、行政学院一直到每一个村小学，都要做到这一点。听说两个宣传部^[4]都注意了这个问题，那很好。现在的教育，一个是普通教育，包括社会教育、识字教育；再一个是干部教育。有了这两种教育，就可以把整个边区变作一个大学校，每一个乡就是一个学校。所有的老百姓和干部都在这个大学学校里学习生产，学习文化。几年之内，边区的群众文化就会比其他地方都高，比武汉、重庆等一些大城市都要高。只要好好搞，五年到十年就可以搞得很好，就会有一个很大的进步，就会有很大的发展，这绝不是空话。

第三，关于艺术。

秧歌是一项，还有春联、歌曲、年画。

杨家岭的秧歌队去安塞演出几天，解决了一个基本问题。以前外来知识分子和本地老百姓有隔膜，这次杨家岭的秧歌队

在安塞演出时，有几个劳动英雄也参加进来，和秧歌队一起跳起来了。我看这就很好，劳动英雄们感觉到你们秧歌队是歌颂他们的，消除了隔膜。《解放日报》昨天登了周扬的文章，这篇文章是谈秧歌的，值得一看。秧歌现在还没有普遍化。延安今年看秧歌看腻了，但全边区的老百姓还没有看够，一个秧歌剧他们要求演三次。所以我看秧歌队可以多组织一些，这个新秧歌队一个乡可以搞他一个，搞新的内容，一个区搞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不加限制，今年冬天就要这样搞。这是我的设想，不是规定了的，同志们可以考虑。我想延安的知识分子在今年农历十月，应该纷纷开会研究怎样下去调查和工作。杨家岭妇委的同志学纺纱，只学了两个星期，到了乡下妇女就欢迎得很。你不学这个本领，想要组织妇女，怎么行呢？你说你革命，那就要学本领。今年冬天，延安学校里的知识分子都下去，做群众工作，帮助群众演秧歌、办冬学、办训练班、订按户计划等等，做三个月工作，真正学习本领。我看这些人要解放一下，每年都可以实行这个制度。这既可以作为放假旅行，又可以作为上边区课。这里有一个条件，就是去了是要帮助群众，不要去妨碍群众。过去我们做了很多蠢事，就是妨碍人家纺纱，妨碍人家带娃娃。你们这回下去，就要“看菜吃饭，量体裁衣”。

边区有三十五万户，每家都挂起有新内容的春联，也会使边区面貌为之一新。两个宣传部的同志要把这个问题研究一下。写春联就要编几个本子，要搞新的春联。新春联是群众的识字课本和政治课本。三十五万副春联，内容大体相同，文字可以不同，这是群众文化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不是也搞几个歌子来唱一唱呢？比如说搞他三五个歌子，使得一百四十万人民都能够唱，并且懂得它的意思，我看这也是一种学习，也

是一种消灭文盲的办法，和春联的道理一样。此外还可以搞年画。

总之，我们的艺术要搞几样确实为老百姓所欢迎的东西。现在老百姓连好的春联都没有，我们还只是谈提高，这只能是空谈。现在边区的主要问题，还是一个普及问题。群众艺术生活太贫乏了，我们做文艺工作的同志要从多方面努力。

第四，关于卫生。

卫生问题是边区群众生活中一个极严重的问题，现在也把它放在文化问题里面讲一讲。今年的春节宣传，包括总卫生处在安塞演出的秧歌，证明老百姓是欢迎新文化的。边区群众中的迷信现象，现在比从前少多了，但是还不能消灭，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医药卫生工作还不普及。群众没有别的方法战胜疾病、死亡的威胁，只有相信神仙。现在延安只有三个医院，而延安有多少人呢？党政军三万人，老百姓一万四千人，享卫生医疗之福的人还不多。至于边区其他一百三十多万老百姓，则根本没有人管。现在应该把医药卫生的知识和工作大大推广一下，想办法在每一个分区训练一些医药人才。或者是各分区送人来延安学习，或者是延安派人去训练，我看都可以。这件事情，各个地委、各个专员公署、各个分区都可以订一个计划，在五年到十年内，做到每个区有一个医务所，能够诊治普通的疾病。至于药品问题，边区应该发展这方面的工业。普通的药尽量自己制造，必要的还可以到边区以外去买，为了人民的福利当然可以到外边去买。我们的经济发展了，争取出超就可以到外边去买。宣传卫生，就应该给群众治病。在五年到十年之内，我们要求得在科学知识普及方面的进步，医药卫生应该放在我们的计划里，和生产计划同时并进。

我们希望人口发展，科学进步。这个问题在早两年讲，也

是办不到的，但是现在已经有了这种可能了。当然党也要注意，有这个可能条件，就要把问题解决了，这样可以破除迷信，使老百姓不敬菩萨。从前我从长沙到上海，乘的船有两种，一种是洋船，一种是木船。洋船他们不敬龙王菩萨，坐洋船的人也没有关心敬龙王菩萨的。但是木船他们就要敬龙王菩萨，龙王菩萨是他们的“保险公司”，木船是容易翻船的，为了避免翻船，他们不得不投一笔钱到龙王菩萨这个“保险公司”里去。所以要老百姓不敬神，就要有科学的发展和普及。科学不发展、不普及，敬神在他们是完全需要的。如果多有几个阿洛夫^[5]这样的人物，当然就没有人再敬送子观音了。有了科学知识，迷信自然就可以打破，没有这一着，他还是要迷信的。

我今天就讲这几件事。如果共产党在边区把这几件事办到，各个系统都改进自己的工作方式，一天一天、一年一年地进步，如果在五年到十年内，我们办起了很多种报纸，组织许多识字组，扫除了文盲，把艺术再来一个普及，并且注意到医药卫生，改善医疗条件，那就差不多了。共产党是不是有用，也就是说共产党有无存在之必要的问题，也就解决了。叶青写文章说共产党没有存在之必要，我们说有存在之必要，我们会用事实来证明。

二十多年以来，我们党首先学会了政治，后来又学会了军事，去年学会了经济建设，今年要学会文化建设。如果文化建设取得伟大的成就，那我们就又学会了一项很大的本领，陕甘宁边区就可以在全国成为更好的模范！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三卷刊印。

注 释

- 〔1〕指蒋介石。
- 〔2〕指八路军留守兵团警备第一旅。
- 〔3〕即胡乔木。
- 〔4〕指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共中央西北局宣传部。
- 〔5〕指当时在延安中央医院工作的苏联外科医生阿洛夫。

陕甘宁边区三三制的政体^{*}

(一九四四年三月二十五日)

林 伯 渠

政体问题就是民主集中制问题，就是政权组织多元化还是一元化的问题。

边区二届参议会前后，曾有同志主张二权论，或二权半论。“议行并列”，是之谓两权，加上司法半独立，则为两权半。司法审判该独立，因此司法机关在政治上虽应受政府领导，但在行政上则是要保持独立。这就是司法方面应该参得半权的理由。前年高干会批评了“司法独立”的倾向之后，这倾向在思想上和实践上都有改正，司法机关及其工作已经统一在政权领导之下。

“议行并列”亦即两权并立的二元论。在前年高干会上也曾受到批评，但因为各级参议会的选举条例及组织条例非依法定手续不便修改，这问题在组织上迄今尚未彻底解决。“议行并列的思想”在二届参议会以前即已存在，二届参议会至前年高干会期间，则思想上的分歧与组织上的混乱更发展了。思想上：（一）误解三三制与苏维埃制之间的“很大的实质上的不同”，不仅在于阶级结合的变化与我党政策的改变，而且也在

* 这是林伯渠在陕甘宁边区高干会上的报告《陕甘宁边区三三制的经验及其应该纠正的偏向》的第二部分。

于改变民主集中制为“县与边区两级议会与政府并列，与一般民主国家制度相同”；并分别参议会为“权力机关”，政府为“政权机关”；正确的认识参议会和政府都是政权机关，而政权机关又一定是而且不能不是权力机关。（二）认为参议会是政府的监督机关或制裁机关，“本来参议会与政府并列，议会监督政府，理由是怕政府专权渎职”（参议会又从权力机关降为监督机关；参议会以自己的决议为基础，选举自己信任的人去组织政府，又怕他专权），在三三制时期则“不同利益阶级合作的统一战线政权，需要有独立的监督机关”（作为监督机关的参议会也就是不同利益阶级合作的统一战线政权）。（三）常驻会是参议会的代表机关。“常驻会是参议会闭会期间的唯一民意机关（参议会选出的政府却不能代表民意），它的工作就是代表参议会完成其议事管理的工作”，“不止于监督”。于是，在组织上：（一）边区常驻会对县参议会（或常驻会）、乡市参议会；县常驻会对乡市参议会；同样，下级参议会或常驻会对上级参议会或常驻会都要经常取得联系；常驻会可分工到各县各区乡出席各级参议会，指导与了解人民生活情况及其要求。（二）“各县的边区参议员组成小组，两个月会商一次，汇集意见送边参常驻会审议转达政府。”“各行政区的县参议员组成小组。他们除按时集会向县常驻会反映意见外，还可参加各区乡长联席会议”。（三）在乡村中一方面有自然村与民选村长，又一方面有与之并立的由乡参议员领导的居民小组，因此不但各级参议会与其同级政府并列，而且逐渐形成了参议会系统与政府系统的并列。

我们必须从二元论回到一元论，即从二权并立论回到民主集中制。必须承认参议会和政府都是政权机关，都是人民的权力机关。对政府而言，参议会是最髙权力机关（人民代表会

议)，而在参议会闭幕期间，由参议会选出并对参议会负责的政府就成为该级政权的最高权力机关。

民主集中制在乡以上与县级以上的运用，应该分别加以研究。在乡上，首先应该取消居民小组的制度，因为它有三弊无一利：（一）“乡市参议会上每二十人至六十人的居民小组得选举参议员一人”的规定，圈子太小，不能适应三三制选举所需要的成分的调剂。以后应该依地区（一个大自然村，几个小自然村，或一个行政村）划分选举单位。（二）这个制度是模仿苏维埃时代乡代表各代表和管理一定居民的成规，但那时是工农代表制，现在是三三制，阶级结合已经不同；现在也实行乡议员代表和管理一定居民的办法就不合时宜，就等于让一部分不良地主去把持村政权，实际经验会如此证明的。（三）一方面为自然村长，另一方面为居民小组长，违背了民主集中制。

其次，前年高干会前，某些地区为要实行“乡市参议会采议行合一制”，行政村主任和自然村长一律由乡议员兼任，这办法同样便利了一部分豪绅地主把持行政村和自然村的领导权。“《简政实施纲要》”有鉴于此，明文规定行政村主任采委任制，自然村长采选举制。看人说话，可以是议员，也可以不是议员。从此，参议员只有经过委任或选举的才兼任行政村主任或自然村长。这规定的合理性，已由绥德分区经验所证明，其他地方还没有完全执行这一规定的。以前乡政府委员会下设经济、文教、优抗等委员会，有各委员任主任，但实际经验证明这类组织有名无实，去年决定暂时取消它是对的。

去年许多地方的乡参议会比前年更为活跃，生产、征粮、防奸与整理民兵等大会都开了。参议会开会时，参议员、政府委员、村主任、村长都到，支部干事也参加，叫作“一揽子会”，大家议、大家决、大家分工、大家参加，无分别党员与

非党员，也无分于议员与非议员。议员兼了村主任或村长的，固然加重了职权，不兼的只要肯到会，肯负责，也是有职有权。总之，议决是一揽子，执行也是一揽子（大家力量）。这种方式又民主又集中，合乎三三制精神，能解决问题，能办好事情；没有形式主义，也没有教条主义。它是群众的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我们应该接受这种方式，并把它传开去，使它合法化。只要在几点上加以确定：（一）用乡参议会的名义。（二）除议员、村主任、村长、自卫军连长或乡干事外，还可吸收党小组长、劳动英雄、防奸英雄等参加；（三）保持大家议大家决的习惯（已成习惯了），不必搬用有表决权与无表决权的教条；（四）提倡大家分工负责，人人执行决议的精神；（五）建立领导会议的党核心，三至五个人就可以，或由支干会担任，或另行组成（鄞县防奸运动中，是由支书、乡长和防奸主任三人组成核心），保证党的领导。但必须是群众中有威信的党员，才便利于当时影响非党群众。

这个照顾了三三制的一揽子形式，还没有普遍采用，还有些地方，乡参议会前年还开会，去年以来就不开会了，只开村主任村长联席会，不兼任村主任或村长的议员就不通知他到会，这样，无形中把参议员取消了，这是缺点，应该改正的。

全乡的群众性的大事，开参议会的大一揽子会是最好的形式。但不能所有事情都开大一揽子会，有些事情可以开乡政府委员会的小一揽子会（乡政府委员会是表现民主集中制的形式之一，又可照顾三三制，如果乡长是非党员，又可在委员会中选进党员；去年议定不要乡政府委员会，似不妥当）。例如生产、征粮等大事，经过参议会布置下去之后，需要检查；又如某些临时重要任务需要布置方能传达下去；又如某些比较重要的事情需要作决定，这时召集自卫军连长、指导员、行政村主

任及其他有关人员参加的乡政府委员会小一揽子会，就是合适的和必要的。而如果是讨论合作社问题，就可以吸收与合作社有关的积极分子参加讨论；变工队问题就可以吸收变工队方面的积极分子参加；其他以此类推。在这小一揽子会上，同样要形成党的领导核心。

再次，日常政务上有些事情乡长不便单独作决定时，可以找自卫军连长、政府文书等乡级负责干部商讨，此种形式同样在政务会议也是可以的。

一个问题：居民小组取消之后，不兼村长村主任或其他固定工作的乡议员，他们平日是否应该有所活动？并如何活动？绥德分区的经验是这样：乡参议员团结在村长的周围，受村长领导，参加各种工作。这经验是值得介绍的。

去年有些乡长和行政村主任的调动或撤换未经过乡参议会；又有许多乡参议员撤销了也未经过选民的罢免与改选。乡上是直接民权，这个原则不仅要在议决复决上表现出来，而且要在人员的罢免与改选上表现出来，这一层还需要做许多宣传教育工作，县区政府尤要注意从实践中来教育群众。

乡上的问题就说到这里为止。以下谈县边区两级的问题。

县参议会和县政府委员会的活动，前年满起劲，到去年就冷淡下来。县参议会都未开，因试行农业累进税，经边区政府指定庆阳、绥德和延安召开县参议会，也未照办。上半年县常驻会和政府委员会还有照常开会的，下半年防奸运动起来后，开会的就更少了。常驻会和政府委员会有的是分别开，但实质上多是一个内容两套形式；也有合在一起开的，也是一揽子形式。去年春冬两季，边区常驻会和政府委员会各开过两次会，头一次分别开的，后一次是联席会议。

前年高干会后，作为二权并立的常驻会实质上已改变，但

形式上仍然存在。以县为单位的边区议员小组，以区为单位的县议员小组，也无形中取消了，但问题尚未彻底解决。

关于常驻会，照过去经验大致有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向政府反映人民意见或提出某些建议，这方面做得不多，成绩不大；又方面听取政府工作报告，或通过它交来的重要决议和法令等，这方面形式居多，作用也不大。同议员取得联系，反映民间意见确属重要，但这些工作不必设常驻会，只要有常驻议长就办得了。至于批准或否决政府之施政方案、工作报告和法令等，则是参议会大会的权力，几个常驻议员不能有此大权，且就人数说，常驻议员一般少于政府委员三分之一。同是参议会所选出并对参议会负责的机关，而常驻会却对政府委员会有批准或否决之权，这于法理也属不合。提议边区县两级常驻会取消，政府委员会即为常驻会，名额可以扩大些，注意三三制成分和地域上的调整。

参议会大会和政府委员会开会时，出色的模范工作者和劳动英雄，党政军各方面的负责干部，必要时也要请出席，开会期间，党团为领导核心或同级党委直接为领导核心；关于路线政策和方针上的问题，党员之间应讨论，政权工作范围内的一般具体问题则均在会上讨论。这样作，将使领导与群众间的意见有适当的结合，各方面工作中的经验有必要的交流，党内党外的政见有更好的沟通。这样作，将使三三制的形式更为完善，其内容也更加充实。这种形式将更能保障群众，特别是群众中的积极分子的积极性与创造性更大的发扬。

如果各级参议会和政府委员会真正成为解决问题进行工作的机关，那末这种会议就有多开的必要，也不会是形式的会议。提议县参议会半年一次，边区参议会一年一次，两次参议会之间，各开政府委员会一次。

今年作为过渡时期（因为制度上的重大改革有待于下届边区参议会），县参议会需要开一次，吸收县区干部及出色的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列席，或者与（下半年的）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大会同时开。今年可考虑边区二届参议会第二次大会和边区劳动英雄模范工作者大会同时召开，并有时合开。

关于三三制政权中的民主集中制问题，可以说到的就是这些。上述问题的基本精神，是贯彻政权机关的民主集中制，并使政权机关成为更充实的权力机关。这样作，要求各级党组织对政权工作的领导更有远见，尤其在各级政权工作的党员，要时刻警惕和防止对党闹独立性的倾向。另一方面，也要求各级党组织对政权工作领导的灵活性，照顾三三制政策，注意使政权机关及各级参议会形成为唯一的权力机关，不代替政权，不直接去进行政权范围的工作，否则也可能形成二元化或多元化政权。

三三制政权的形式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带着基本性质的问题。我们现在就是要找到这样一种适当的形式，这种形式既能保障广大工农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和创造性能够没有阻碍地充分地发扬，又能不致使作为中间分子的地主资本家难于忍受；既要能够充分反映工农群众的要求与利益，又要能够反映地主资本家们合理的要求与利益；既要能够密切联系广大的工农群众，又要能够集合适当数量的一定地主资本家阶层的代表。它是唯一的权力机关，是说了就做的“议行合一”的机关。它是不能为其他任何组织形式所代替的。这也就是目前在中国行得通的、集中一切权力的、最高度的民主的机关。这种形式，在我们目前所已找到的一揽子会中，是相当具备了上述这些特别的。在今后，我们要使它更加完备起来，并使之普遍起来。

从整风以来，我们曾经在党内充分地发扬了民主，许多干

部会、座谈会等，曾经多次地举行，批判与讨论之热烈均前所未有。因而区别了良莠，团结了党，并使党的干部和党员积极活跃起来。这种民主形式，不只是应该在党内发扬，而且应该在一切革命人民中发扬，才能更进一步的团结人民，并使人民更进一步积极活跃起来。今天我们党内的情况更加一致地提高了，在人民中又经过了土地革命。在边区，减租减息、生产运动、防奸运动等，我们的党与人民有了更进一步的结合。人民的觉悟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因此，我们不怕在人民中发挥充分的民主，不怕将一切的重要问题、重要设施，提到人民中去作充分的讨论与批评，并由人民大众动手来做，也不怕反动分子利用这种民主来进行反党反政府的活动。只要我们不犯严重的原则错误，这样作，对于我们是不会有什么危险的，相反，这将使我们党更密切地与革命的人民结合起来，暴露反动分子，提高人民的觉悟，并在人民中提高党的领导作用，提高党的威信。在政权与党的机关中，清洗官僚主义及一切弱点，而使党与三三制政权更加健康起来，这是我们目前提高自己、团结人民最有效的办法，如果我们不这样做，我们的各种弱点就很难清洗。

在三三制政权中，党员与党员之间，对于一切政策与关系重大的具体问题，应该采取完全一致的立场与态度，不能有所分歧。非如此，党就不能对三三制政权实行领导。在三三制政权中，党员与党员之间，尤其不能有互相攻击、互相排挤等现象，如果发生这种分歧的现象，党委与党团应立即加以约束和解决，这是必须遵守的纪律，不能丝毫通融。但并不能因此就说，对于一切个别的、具体的、技术的问题，在三三制政权中党员与党员也不能有任何不同的意见及正当的辩论；如果被约束达到这种绝对的程度，就要使大多数党员在三三制政权中不

能充分地活跃起来，因而也就要使党外群众及政权机构不能充分活跃起来，使他们受到过多的拘束而死气沉沉与照行公事。这种情形，正是我们目前所要避免的。在三三制政权中的党员，对于一切问题在基本方针与基本态度上完全一致的条件下，应该允许有时甚至要发扬所有党员从各个侧面去发表意见，进行讨论与辩论，这一点也是应该加以指出的。

根据华艺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出版的
《林伯渠文集》刊印。

学会做共产党的商人^{*}

(一九四四年)

陈 云

做生意我是一个外行，在座的搞政治工作的同志也都是外行。今天我就是外行变内行。我过去在洋行里做过店员，那是洋店员，今天不要那样的。今天是愈土愈好，洋店员的开发票、请客这一套都不要。我今天提出一些意见，请大家考虑考虑。

关于政治工作，西北局已经决定由地委常委管。财经分委不要了，免得层次太多。这是第一条。

第二，经理由司令员兼，指导员由党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由军队政治部主任兼。原来的局长做副局长，实际工作都是他做。

第三，分区政治部主任是军队的政治部主任，又兼贸易分公司的主任。军事同做生意完全是两回事，所以在分区政治部主任的下面，设三四个人专门做金融、贸易工作，叫做贸易科。这三四个人就叫做干事，什么事都干，不分工。这样一揽子好些，做一个时期再看，需要分工的时候再分工，一般地不分工好些。干事什么都干，可以叫干部部，或者叫干部科，看来的干部大小而定。我们延安地区大体上准备这样做。

* 这是陈云在西北财政经济办事处会议上的讲话，时间在三月或四月。

第四，下面每一个银行分行、贸易分公司，大的设指导员，小的设协理员，公营商店也如此。

第五，工作的重点放在什么地方？重点放在贸易公司、盐业公司、土产公司、运输公司这四方面，代管银行、税务局。工厂生产部门是财政经济，也管。

第六，政治工作的任务是什么？它的任务就是保证完成党所交给的在财政、金融、贸易、运输上规定的任务，除了这些任务以外，它再没有什么单独的任务。当然要怎样才能搞好，还有干部管理等问题。但总的任务就是完成党所交给的这几方面任务的同时，一方面要教育干部，另一方面要团结非常干部。在贸易公司、盐业公司，将来要请一些非常干部，我们要团结这些人，要向他们学习。

关于教育干部问题，我问了一下贺老总^{〔1〕}和高岗同志，教育干部一些什么东西呢？有这样三方面：

1. 政治教育。包括党的教育在内。
2. 政策的教育。贸易政策的教育以及与贸易政策有关的一般的政策教育。
3. 业务教育。学习怎样做生意。

第七，政治工作人员必须成为业务人员。分公司、支公司的政治工作人员就是做生意的人员，不要束起手来说，我是政治工作人员，你们是做生意的。这样，政治工作人员就变成了“二流子”。上面的政治部主任要管军事，那就很难去做生意，但是下面的要这样做。一个能干的指导员，一个政治工作人员，做生意也一定要精通业务。如果不懂得盐怎样卖，什么东西怎样搞法都不晓得，那政治工作就无从做起，业务人员发生了毛病也不知道。所以，下面的政治工作人员一定要精通业务，不然就和军队里的政治工作人员不懂得军事是一样的，讲

的就是空话。

我们应该精通什么业务呢？我们要学会做共产党的商人。我们是共产党员，同时也会做生意。共产党的商人与普通的商人不同，我们也是商人，但是前面又加上一顶帽子，叫做共产党，这就是与普通商人的基本区别。他们是招财进宝，黄金万两。我们共产党人是为人民而不是为了个人的，这就要求我们懂得党的政策，一方面精通对内对外的贸易，同时又懂得团结内部，对外同国民党作经济斗争。对内对外的贸易生意该怎样做这一套都要摸熟，要懂得在边区内怎样做生意，和外面的商人怎样搞好合作，怎样利用外部的商人。我们的后备军大得很，有自己的公营商店、合作社、老百姓商人。对商人，我们不简单地反对投机操纵的商人，我们要拉这个力量同我们合作，要他们帮助我们对外斗争才有力量。我们共产党人不能把不应该消灭的都消灭，因为这样就不能团结内部同国民党作斗争。外面的商人也是我们争取的对象，不然对内对外的贸易就搞不好。我们是共产党员，要懂得党的政策，要照顾到这几项。在共产党这一点上，我们要有党的立场、革命的立场、阶级斗争的立场。在商人这一点上，我们要弄通以下几方面。

一、要弄通做生意的过程。一个是生产过程，生产了以后要消费，就又产生了一个交换的过程。在今天的社会里，买卖的过程就是交换的过程。商业的过程就是买卖的过程。怎样买进卖出这就是市场的规律，我们要了解这个规律。假使不了解这个规律，做生意一辈子也做不好。一个商人精明不精明就看懂不懂得这个市场规律。如果不懂得，那你做生意就是外行。如果能摸着这个规律，而且非常灵活，那做生意大概就可以赚钱。

首先是出入的过程。懂得货从什么地方出，向什么地方

去，什么人消费，这是第一个关键。做生意的人都是很灵敏的，比如金鸡纳霜是外国的东西，但是在中国卖的金鸡纳霜在外国制造的时候，早就把中国的字写上了。看在什么地方卖就用什么牌子，以便迎合那个地方人的口味。比如哈德门香烟，哈德门是北平的一个门，这个牌子的烟是在北方卖的，在上海卖的就另换一个牌子。这个牌子在这个地方卖，那个牌子在那个地方卖。外国人做生意是这样，中国人做生意也懂得这一套。掌握什么地方出货，什么人消费是最重要的。做生意不了解这个东西就不行，比如盐需要出多少斤，销到什么地方，这个口子销多少，那个口子销多少。如果销到海边去，那不是碰到鬼了吗？所以，货从哪里来，销到哪里去，在这个中间还要了解许多层次。

其次是批发生意。全世界，中国、外国，从前、现在，都有一套做生意的办法。洋人做生意就是进出口的批发生意，你订了货以后，通过打电报，他就送一批货来给你。这在中国叫做坐庄。从前延安就有十大家，他不大做门市生意的，都是做批发生意。他的房子里不放什么，顶多放一些货样子，放一些算账的东西，你要多少东西向他订了，通过打电报，然后东西就给你送来了。

再次是销路层次。城市里与农村不同，不封锁的与封锁的又不同。城市里比较简单，在农村就比较分散。比如外国的东西到中国先经过洋行、批发庄再到商店。我们边区商人从外面买货变成收庄，后又经过载行^{〔2〕}卖给门市部，再由商店到背包生意人，再分散到乡村去。这中间到底经过多少层次，每一层次都要摸熟，不摸熟这些层次你就无法做生意。现在一个是乡村，一个是封锁，这里的层次也很多，这与大城市、不封锁的地方不同。抗战初期与现在也不同，抗战初期延安有十大家坐

庄，现在都是经过毛驴子驮到过载栈，经过过载栈再卖出去，过载栈的作用加大了。所以，商业的过程我们要摸，要知道它到底有多少层，从哪里来往哪里去。知道里面有多少层，哪一层利润比较大，哪一层利润比较小。假使我们不学到同商人一样，会做过载行的生意，会批发，会做门市生意，会赶毛驴子，也会背着背包到乡村去卖，各种各样的人我们都能设身地去地地去打交道，那就不能做好生意。这是一个完整的过程。一方面是进，一方面是出，其实是一个过程，到下面就又连起来了。就像生理卫生上讲的一样，动脉与静脉到神经末梢是动脉也是静脉，从动脉一下子就流到静脉里去。背包、担担的小商人一面卖货，一面收货，是出也是进。

我们学商业是不是学外国的拉宾托斯，或是学中国的马寅初，旧的大城市的一套？不是。我们不学外国的，也不学中国大城市的那一套，我们学陕甘宁边区共产党领导下的战时的被封锁的乡村商业。学这一套拜谁做先生呢？不是拜外国的拉宾托斯，也不是拜中国的马寅初，而要拜本地的商人做先生。

我们如果能够抓住中心环节，能够了解全部，那我们的生意就好做了。中心环节就是过载行的、跑街的，商店里的东西都是经过过载行卖出去的。过载行的老板，他知道什么地方来什么东西，来多少东西。他也知道什么人要卖什么东西，那里要多少，这里要多少。他也知道哪个地方的货便宜，哪个地方的货贵。这在外面大的叫交易所，小的叫茶会，这是讲市价的。茶会，就是在南方城市里有茶馆，买货的商人和经纪人、老板都来这个地方吃茶。比方说什么人要什么东西，大家商量一个价钱。米商就商议米价，布商就商议布价。第二天在《申报》、《大公报》上登出市价来，就照这个价钱做生意。我们这里没有茶会，今天搞商业就要找过载行、跑街的。他的消息灵

通，熟悉市面，这样我们的生意就大体上不会吃亏。如果我们能用各种办法，把这样的人搞来一两个，我们就会熟悉市面的情况。各个分区努一把力，看能不能找到帮助我们做事的。但这样的人唯利是图，我们注意不要上他的当。找一个跑街的人，我看这是我们工作的当务之急。因为他知道来多少货，卖给哪一家，什么地方的货好、便宜，这些他都知道，找到这样的人我们的生意就好做了。我们要学陕甘宁边区的货从哪里出，向哪里去，卖给什么人。要弄通它是怎样的过程，怎样由过载行卖到商店，如何批发到门市部生意，又怎样由背包小商人送到农村里去。我们自己跑街的就外行得很，没有商人的跑街那样精明，我们就向这些人学习做生意。我们做政治工作的同志要懂得商业的过程，除了这个办法外再没有别的出路，但我们不要忘记共产党的立场。

二、要懂得商品的行市。像刚才一位同志讲的，花三千多块钱买的电池没有电，这样的外行就不能做生意。自己外行就要学。我昨天去学了一下，什么叫三八布，什么叫四八布，什么叫五福布。我一看，原来五福布就是这个样子，是上海造的，好在什么地方，知道它的价钱一度涨到十二三万元，后来虽然跌了，但昨天的价钱又涨到十一万元。吃这一行饭就要懂得这一行。我是做杂货生意的，不大懂得布这一行，从前在上海洋行里，卖过铅笔、信封、信纸、钢笔。铅笔什么牌子好，我懂得。一支派克笔是什么价钱，真假如何，这一点我也内行。我们要识货，这是很重要的。外面买电池怎样买？他是用电铃试验，如果电铃叫得很响，那电池就好；电铃不大叫，那就不好。买电话机也一样要试验，因为卖货的要讲信用，买货的也不愿意吃亏。我们买电池、电话机的，不懂要向懂的同志学一学，要专门研究一下。我们买西药那就更困难，人家拿一

个白的东西说是阿司匹林，我们不懂，结果是石膏，我们就上当了。所以，我们要认识商品，懂得行情。

三、我们要认识商人，要能够把这些人拉着，这一条很重要。无论是中国也好，外国也好，是大生意也好，小生意也好，做生意的人都要能拉拢关系。做生意愈看得远愈好，货物周转得愈快愈好。外国人做生意就会打算盘，比如说他在陕北本来没有他的生意市场，他宁愿拢一批货便宜卖，甚至亏本，取得了市场以后，再赚钱。先亏本卖是为了将来多赚钱。做生意不能十回十回都赚钱，总有一两回蚀本，目的是为了以后把它赚回来。

四、要会打算盘。一个商店的老板，你不要看他坐在那里不做事，他可精明，账上搞差了一点，他都查得出来，什么地方出了毛病，他都懂得。不学会打算盘，生意就不好做。所以，行政学院要专门有一批人学打算盘，要能写能算。

我们要学商业的过程，要认识商品，知道行情，要能打算盘，能写账，这是做生意的人必须学到的，我们在业务上要能精通这几项。

我们能不能学会呢？我们的人应该承认自己做生意是外行。但是共产党人不是笨人，是聪明人。我们要承认做生意是外行，如果不承认这个，我们要学会就很困难。我们承认这个，努力学，现在不会将来是可以会的。我从来没有想过当共产党还要做生意，只是想将来到上海或许可以再搞这一行。没有想到，一九四四年三月六号中央给我的中心任务是做生意，在陕北恢复了这一行。这也不要紧，不会做，我们可以学会。

第八，干部问题怎样解决？这个问题恐怕要各分区自己解决。各分区有适当的人，就可以派去当指导员、协理员或做副经理、掌柜都可以。假如我们派去的人做得不大好，束手不

动，反而碍手碍脚，妨害了经理业务倒不好。我们的目的是为了帮助经理搞业务，而不是妨害。

我提出这八条，其中有的是西北局的决定，有的是我的意见，比如重点在什么地方？政治工作人员的业务是什么？干部问题是不是这样解决？提出来供大家讨论。

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二〇〇五年出版的
《陈云文集》第一卷刊印。

注 释

〔1〕即贺龙。

〔2〕过载行，也叫过载栈，是一种半客栈半货栈的栈房。过往行商与脚户运货到延安时，常住过载栈。栈内有一定行市，每日挂牌。货物卖出时栈主收取“佣钱”，客商住栈，另交伙食费用，牲口交草料钱。

总政治部关于加强我军对外 宣传工作的指示

(一九四四年四月一日)

由于我军七年血战所创造出来的单独担任着整个敌后作战的力量，已成为组织战略反攻，最后战胜日本所必需依靠的力量，这一支增大的力量，已引起反法西斯同盟国家政府与人民的重视。

因此，英美在华记者，组织一个外籍记者团（约有英美等国记者十多人），经过国民政府同意，将来延安参观，并拟亲到敌后考察，目的在研究我真实之力量与我党我军对内对外政策。

为了显示我们的真实力量和作用，和扩大我军的宣传起见，望敌后各地区部队首长及宣传机关，注意指导并组织我军的对外宣传工作。今后应更好利用新华通讯社，有系统的真实报导敌后战况（打小仗也要报导），生动有力的宣扬我英勇战绩，并利用来延部队或交通部队运回一批缴获的轻重武器，利用回延干部或交通人员多搜集一些缴获文件和各种其他战利品与我军作战活动之照片，交他们带回，供给我们对外宣传的资料，并供给军委建立的抗战纪念陈列馆的需要。

总 政

四月一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毛泽东等关于争取国内平静拉蒋抗日 给罗荣桓等的电报

(一九四四年四月五日)

罗黎萧李并告滕邓^{〔1〕}：

三月二十三日电悉。目前时局不宜对顽取攻势，已详寅马、寅感两电，望照执行。近日，日将库页岛权益还苏，北和苏联，南抗美英，进攻中国（打通平汉路甚至粤汉路），“扫荡”敌后，东条此项政策，更加明显，因此日蒋^{〔2〕}冲突今年必更剧，故争取国内平静，准备拉蒋抗日，是目前政策中心。你们大举打顽部署，极不合宜。除非顽部进攻，我可在自卫立场上打之。其具体作战，亦须取得中央同意。

毛 朱 彭^{〔4〕}

卯微（四月五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注 释

〔1〕指黎玉、萧华、李作鹏，滕代远、邓小平。

〔2〕指蒋介石。

〔3〕指朱德、彭德怀。

回忆我的母亲^{*}

(一九四四年四月五日)

朱 德

得到母亲去世的消息，我很悲痛。我爱我母亲，特别是她勤劳一生，很多事情是值得我永远回忆的。

我家是佃农。祖籍广东韶关，客籍人，在“湖广填四川”时迁移四川仪陇县马鞍场。世代为地主耕种，家境是贫苦的，和我们来往的朋友也都是老老实实的贫苦农民。

母亲一共生了十三个儿女。因为家境贫穷，无法全部养活，只留下了八个，以后再生下的被迫溺死了。这在母亲心里是多么惨痛悲哀和无可奈何的事情啊！母亲把八个孩子一手养大成人。可是她的时间大半被家务和耕种占去了，没法多照顾孩子，只好让孩子们在地里爬着。

母亲是个好劳动。从我能记忆时起，总是天不亮就起床。全家二十多口人，妇女们轮班煮饭，轮到就煮一年。母亲把饭煮了，还要种田，种菜，喂猪，养蚕，纺棉花。因为她身体高大结实，还能挑水挑粪。

母亲这样地整日劳碌着。我到四五岁时就很自然地在旁边帮她的忙，到八九岁时就不但能挑能背，还会种地了。记得那时我从私塾回家，常见母亲在灶上汗流满面地烧饭，我就悄悄

* 本文原载一九四四年四月五日《解放日报》。

把书一放，挑水或放牛去了。有的季节里，我上午读书，下午种地；一到农忙，便整日在地里跟着母亲劳动。这个时期母亲教给我许多生产知识。

佃户家庭的生活自然是艰苦的，可是由于母亲的聪明能干，也勉强过得下去。我们用桐子榨油来点灯，吃的是豌豆饭、菜饭、红薯饭、杂粮饭，把菜籽榨出的油放在饭里做调料。这类地主富人家看也不看的饭食，母亲却能做得使一家人吃起来有滋味。赶上丰年，才能缝上一些新衣服，衣服也是自己生产出来的。母亲亲手纺出线，请人织成布，染了颜色，我们叫它“家织布”，有铜钱那样厚。一套衣服老大穿过了，老二老三接着穿还穿不烂。

勤劳的家庭是有规律有组织的。我的祖父是一个中国标本式的农民，到八九十岁还非耕田不可，不耕田就会害病，直到临死前不久还在地里劳动。祖母是家庭的组织者，一切生产事务由她管理分派，每年除夕就分派好一年的工作。每天天还没亮，母亲就第一个起身，接着听见祖父起来的声音，接着大家都离开床铺，喂猪的喂猪，砍柴的砍柴，挑水的挑水。母亲在家庭里极能任劳任怨。她性格和蔼，没有打骂过我们，也没有同任何人吵过架。因此，虽然在这样的大家庭里，长幼、伯叔、妯娌相处都很和睦。母亲同情贫苦的人——这是朴素的阶级意识，虽然自己不富裕，还周济和照顾比自己更穷的亲戚。她自己是很节省的。父亲有时吸点旱烟，喝点酒；母亲管束着我们，不允许我们染上一点。母亲那种勤劳俭朴的习惯，母亲那种宽厚仁慈的态度，至今还在我心中留有深刻的印象。

但是灾难不因为中国农民的和平就不降临到他们身上。庚子年（一九〇〇）前后，四川连年旱灾，很多的农民饥饿、破产，不得不成群结队地去“吃大户”。我亲眼见到，六七百穿

得破破烂烂的农民和他们的妻子儿女被所谓官兵一阵凶杀毒打，血溅四五十里，哭声动天。在这样的年月里，我家也遭受更多的困难，仅仅吃些小菜叶、高粱，通年没吃过白米。特别是乙未（一八九五）那一年，地主欺压佃户，要在租种的地上加租子，因为办不到，就趁大年除夕，威胁着我家要退佃，逼着我们搬家。在悲惨的情况下，我们一家人哭泣着连夜分散。从此我家被迫分两处住下。人手少了，又遇天灾，庄稼没收成，这是我家最悲惨的一次遭遇。母亲没有灰心，她对穷苦农民的同情和对为富不仁者的反感却更强烈了。母亲沉痛的三言两语的诉说以及我亲眼见到的许多不平事实，启发了我幼年时期反抗压迫追求光明的思想，使我决心寻找新的生活。

我不久就离开母亲，因为我读书了。我是一个佃农家庭的子弟，本来是没有钱读书的。那时乡间豪绅地主的欺压，衙门差役的横蛮，逼得母亲和父亲决心节衣缩食培养出一个读书人来“支撑门户”。我念过私塾，光绪三十一年（一九〇五）考了科举，以后又到更远的顺庆和成都去读书。这个时候的学费都是东挪西借来的，总共用了二百多块钱，直到我后来当护国军旅长时才还清。

光绪三十四年（一九〇八）我从成都回来，在仪陇县办高等小学，一年回家两三次去看母亲。那时新旧思想冲突得很厉害。我们抱了科学民主的思想，想在家乡做点事情，守旧的豪绅们便出来反对我们。我决心瞒着母亲离开家乡，远走云南，参加新军和同盟会。我到云南后，从家信中知道，我母亲对我这一举动不但不反对，还给我许多慰勉。

从宣统元年（一九〇九）到现在，我再没有回过一次家，只在民国八年（一九一九）我曾经把父亲和母亲接出来。但是他俩劳动惯了，离开土地就不舒服，所以还是回了家。父亲就

在回家途中死了。母亲回家继续劳动，一直到最后。

中国革命继续向前发展，我的思想也继续向前发展。当我发现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时，我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了，我和家庭完全隔绝了。母亲就靠那三十亩地独立支持一家人的生活。抗战以后，我才能和家里通信。母亲知道我所做的事业，她期望着中国民族解放的成功。她知道我们党的困难，依然在家里过着勤苦的农妇生活。七年中间，我曾寄回几百元钱和几张自己的照片给母亲。母亲年老了，但她永远想念着我，如同我永远想念着她一样。去年收到侄儿的来信说：“祖母今年已有八十五岁，精神不如去年之健康，饮食起居亦不如前，甚望见你一面，聊叙别后情景。”但我献身于民族抗战事业，竟未能报答母亲的希望。

母亲最大的特点是一生不曾脱离过劳动。母亲生我前一分钟还在灶上煮饭。虽到老年，仍然热爱生产。去年另一封外甥的家信中说：“外祖母大人因年老关系，今年不比往年健康，但仍不辍劳作，尤喜纺棉。”

我应该感谢母亲，她教给我与困难作斗争的经验。我在家庭中已经饱尝艰苦，这使我在三十多年的军事生活和革命生活中再没感到过困难，没被困难吓倒。母亲又给我一个强健的身体，一个勤劳的习惯，使我从来没感到过劳累。

我应该感谢母亲，她教给我生产的知识和革命的意志，鼓励我以后走上革命的道路。在这条路上，我一天比一天更加认识：只有这种知识，这种意志，才是世界上最可宝贵的财产。

母亲现在离我而去了，我将永不能再见她一面了，这个哀痛是无法补救的。母亲是一个平凡的人，她只是中国千百万劳动人民中的一员，但是，正是这千百万人创造了和创造着中国的历史。我用什么方法来报答母亲的深恩呢？我将继续尽忠于

我们的民族和人民，尽忠于我们的民族和人民的希望——中国共产党，使和母亲同样生活着的人能够过快乐的生活。这是我能做到的，一定能做到的。

愿母亲在地下安息！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
《朱德选集》刊印。

毛泽东关于国共有重新协调之望 给北方局等的电报

(一九四四年四月六日)

北方局并转冀鲁豫分局：

中原大战，国共有重新协调之望，已派林伯渠同志艳日起程赴渝谈判。我华北各部除对侵入太岳之阎^{〔1〕}部已有指令外，务集中注意于对付敌伪、整训部队、发展生产、整顿三风及谨慎地清查特务，切勿刺激国民党，望通令所属知之。

毛泽东

卯鱼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注 释

〔1〕指阎锡山。

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 工作的基本方针^{*}

(一九四四年四月七日、八日)

任 弼 时

一 一九四三年边区财政经济工作的估计

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后和财经办事处及各地财经分会成立以来，一九四三年边区财经工作获得了很大成绩的，最主要的表现是：

(一) 确实开展了广大群众的生产运动，军队也贯彻实行了屯田政策，使边区的粮食棉花大量增产；公营企业、合作社都有些进步。

(二) 分区各自负责从农工商业及一部分税收中保障了自己的供给。这一方面刺激了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减轻了政府财政负担，渡过了财政上的困难。

(三) 公家和部队机关建立了相当雄厚的家务，打下了自力更生的基础。

(四) 贯彻了统销政策，这对政府收入和供给上是起了作

* 这是任弼时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的演讲，原题为《去年边区财经工作的估计与今年边区金融贸易财政政策的基本方针》。

用的。粮食税收工作也有些改进。

(五) 使陕甘宁和晋西北的财经趋于统一。

(六) 在分区财经领导统一的基础上，使边区财经工作的领导进一步统一。

这些都是去年巨大的成绩。这些成绩，没有高级干部会的整风，毛主席关于财经工作的指示，西北局和财经办事处的领导和督促，以及全党同志的努力，那是不可能取得的。

我们应当指出，去年经济建设的成绩是空前的，这些成绩使我们得到下面的巨大收获：一是人民、部队和机关的生活改善了，部分真正达到了丰衣足食的标准。二是党和政府同人民的关系大大地改善了，人民对党和政府表示更亲切的爱护，充实了民主政权的内容。三是由于经济上的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使党和陕甘宁边区在全国的政治影响更加扩大了。

我们在生产事业上的胜利和发展，给了全国人民以奋斗的方向和信心。事实证明共产党不仅能破坏旧的，而且是有能力来建设新的。当它认真来干这件事的时候，它可以依靠群众力量克服任何可能克服的困难，而且是极富于创造能力的。

由于我们去年生产获得成绩，使各方面的工作也随着而获得进步，如军队工作、政府工作、群众工作、防奸工作、文化事业等，特别是领导作风，经过反官僚主义倾向与反军阀主义倾向后有巨大的转变。在这一运动中，党政军民的关系更加团结与巩固，党在群众中的威望更加提高。

我们应当足够地估计这些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收获。

经济建设大体有两方面的任务——生产和分配（消费），即生产必需物资，并将它适当地分配给消费者。对于自己还不

能生产的东⻄，则必须以多余之物资向外面去交换必需之物资——即以己之所余易己之所无，来满足消费者之需要。这里面就产生了包含生产、贸易、金融、财政等各方面的政策问题，构成整个经济建设的复杂的内容。

去年我们在生产方面（主要是农业生产）获得很大成绩，但是在贸易、金融、财政等问题上，还有许多的缺点和错误（有些缺点和错误是相当严重的），表现在生产与消费之间，缺乏恰当的组织 and 调节，还存在着未能协调配合的严重矛盾。我们在经济建设中的许多方面的工作还是在摸索过程中，尚未能走上正确的轨道，有些缺点错误是应当避免的，但有些缺点错误因为我们还缺乏经验也是难于免除的。

我们要正确地掌握经济建设中的各种政策，就必须了解边区经济发展现阶段中，存在一些什么特点，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与国民党统治区域经济对比的形势和相互斗争的关系。

下面我准备讲讲这个问题。

二 边区经济发展现阶段的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边区在经济上逐渐脱离对外的依赖性而过渡到完全的自力更生。

从历史发展过程看，边区经济可分为三个时期：

（一）内战时期（一九三一年——一九三六年）。这时期的特征是带着破坏性质，即以革命的军事政治力量破坏反革命的军事政治力量——革命的内战，以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摧毁旧的封建性质的经济关系，这些都是为着便于后来经济的发展的。因为战争频繁，一方面是敌人破坏，一方面是战争的需要，人力物力不得不有很大的消耗，时间与环境不可能容许

我们进行普遍的、计划性的经济建设。那时的供给是依靠于打土豪没收反动阶级资财解决的。

(二) 休息民力时期 (一九三七年——一九三九年)。这时期内的政策是恢复民力。当时国内已取得和平, 对日战争只限于黄河边沿区域, 我党在国内外影响大增, 因此也获得巨大的外援力量。这种环境容许我们休养民力, 也必须使民力休养。人民对政府负担轻微 (一九三七年缴公粮仅一万石, 一九三八年一万石, 一九三九年也仅五万石), 因此民力经这三年的培植也逐渐恢复起来。此时政府的财政开支主要依靠外面的捐助筹集, 直到一九三九年还有百分之八十七点五是靠外款。边区人民、部队、学校、机关等除食盐、皮毛及大部粮食之外, 几项重要生活必需资料如布、棉、铁、纸和部队机关的一部分粮食, 一部分煤油, 都需要靠外面采购来保障供给。这里表示我们在经济上对外的依赖性是很大的。

(三) 边区经济发展时期 (一九四〇年——一九四四年)。这一时期的方针是发展公私经济 (工农商业), 争取自力更生。从一九三九年底起, 国共之间发生军事磨擦, 国民党采取经济封锁和停发八路军经费的办法, 来断绝我们一切外援, 企图借此削弱打击我们。我们在极端困难之下决心自己动手, 从发展农工商业中求得由半自给到全自给。工业在一九三八年已开始创办, 但带倡导性; 一九四一年有大发展, 到一九四二年底止, 我们已有公营的纺织、被服、造纸、印刷、化学、工具和石炭等企业六十二个, 资金五千九百六十七万零九百六十二元, 职工九百九十一人。农业方面, 从一九三九年起, 耕地面积逐渐扩大, 植棉亩数逐年增加, 牲畜也是逐年发展的。四年内开荒二百三十五万三千二百六十三亩, 植棉由三千多亩增到九万四千多亩。其他如盐的产、运、销, 煤油的增

产，商业的整理等，也获得相当成绩。一般说是解决了困难，渡过了难关。然而我们在经济建设方面，还带有许多的盲目性，思想认识上有错误和不一致，没有总结经验找出其规律性。

经过一九四二年底边区高级干部会议，毛主席总结财经问题以后，思想方针获得一致。去年一年的努力，使边区经济依据正确的规律有着极大的发展。农业开荒百万亩，增产细粮十六万石（超过计划一倍），按总产量和消费量相对比，可余细粮二十二万石。今年计划再开荒百万亩，增产细粮二十万石（连军队在内三十万石）。植棉面积去年已扩大到十五万余亩，产棉花约二百万斤，可供全边区近一半的需要。公私纺织企业共生产大布十万匹。今年计划扩大棉田到三十万亩，产棉花四百五十万斤到五百万斤，棉花收获以后就可以再不要外面供给了。去年造印刷纸五千五百令，迷信纸、麻纸一万二千刀，今年计划纸的生产全部自给（据绥德同志谈，警备区纸厂月产可达七千刀，如全部设备能力发挥起来，全年以六个月生产计算，就可够边区人民三万刀用纸的需要而有余）。去年各种国营自给性工业也有发展，经工厂会议与整风后，生产率提高，管理改善，成本减低，质量也有改进。肥皂已有些出口，火柴今年计划达到全部自给。去年产盐超过计划百分之五十，运销也有成绩，长期合作的运输牲口比前年增加十倍。煤油产量大增，足供边区消费而有余。农业工业和军工业需要的铁，也有可能大量开发，今年计划自给百分之五十以上，明年则可能完全自给。

总之，几年来特别是高干会以来，由于党的领导，政府和军民的努力，使边区在经济上有了巨大的发展。现在基本生活的必需资料如粮食、棉布、皮毛、铁、纸、食盐、煤油、燃

料、火柴和肥皂等，或则已经自给有余，或则今年即可自给，或则经过一时期的努力也能完全自给。

由此我们得出结论：边区在经济上正逐渐脱离对外的依赖而过渡到完全的自力更生。我们的贸易、金融、财政政策都必须从这一特点出发，才不致犯错误或犯很大的错误。

去年我们有些同志，由于对这个特点认识不够，或简直没有认识到，故在工作中产生了或“左”或右的缺点和错误（关于这问题我下面还要说到）。

第二个特点是，边区的国民经济在私有制基础之上，逐渐由分散的个体经济组织起来，走上合作化的道路，成为一种比较有计划有组织的经济。

陕甘宁边区原是一个地广人稀、经济落后的地区，个体农民经济散布在广阔的地区之内，虽然经过土地革命和减租减息，人民的生产热忱提高了，但这种散漫情况如不加以改进，则生产力的提高就会受到限制。去年高干会后，在全边区内发动的劳动互助运动，解决了新民主主义下农村经济如何建设的一个原则问题——合作化的问题。去年之内，全边区三十三万八千七百六十个劳动力中，已有八万一千一百二十八个约占百分之二十四的劳动力组织在变工队、扎工队、唐将班子^{〔1〕}之内，个别县份，已有百分之七十的劳动力组织起来了。全边区有十三万七千六百余名妇女组织在妇纺组织之内。各种性质的合作社共有二百六十多个，连它们的分社总合有八百个以上的合作社单位，社员有十五万人，南区合作社的方向逐渐普遍地被采用着。

农业劳动的合作化——变工、扎工等大大提高了劳动的效能，从以下几个事实中，就可以看出集体劳动的效果。

表一 延安念庄变工队的统计

一个劳动力	种地(垧)	打粮(石)
不变工	11.6	6.45
变工	17.9	10.45

以不变工为一百，则变工种地为百分之一百五十四；变工打粮为百分之一百六十二，较原来增加一半多。

表二 关中新正三区二乡别岭村的统计

种地一亩	个人(工)	集体(工)
开荒	6.5	2.5
下种打土	2.0	1.0
锄草两次	2.0	1.0
收割	1.0	0.5
合计	11.5	5.0

变工较不变工可节省六个半工，省工一半以上。

由此可见，变工与不变工的效率是三比二，即二人劳动的成效等于三人。

在发展生产与把分散的个体经济组织起来走向合作化运动中，我们用表扬劳动英雄和模范生产工作者的方法（去年产生了大批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用提倡革命竞赛的方法，用实行按户计划的方法，使广大农民群众从合作互助运动中体验到组织起来的好处。去年劳动英雄大会总结了合作劳动的经验，今年经过党的领导和各地劳动英雄们的推动，可能有百分之六七的劳动力组织起来。据说安塞百分之九十以上已经组

织起来了。这样就使边区散漫的个体农民经济，逐渐成为在私有基础上比较有组织的合作经济。这种合作经济并不消灭私有，只是限制剥削，奖励劳动；劳动增产的成果，仍归个人所有，使私人经济更合理地发展。这是新的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并非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经济。那种在私有基础之上的高度集体化的某些办法，目前也不宜采取。

因为劳动合作化的结果，劳动效能大大提高了，大大发展了生产力，按过去耕作标准就大大节省了劳动力，使劳动力剩余下来，这就给我们扩大耕地面积，改良种子、肥料、农作方法和兴修水利等的便利条件，同时还可组织多余劳动力，去求得农村手工业和其他副业的发展，也更便于我们组织农村的文化教育事业。这些由于互助合作发展了国民经济而产生的新问题，正待我们作更具体的研究和解决。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农村劳动合作化将使边区农业（包括副业）手工业等获得充分发展的条件。这是我们今后更进一步提高人民物质和精神生活的基础。

至于农村经济以外的部队、学校、机关和政府举办的公营企业（农工商业），原是建筑在集体劳动所得完全归公（为该集体的全体人员所享受）的基础之上，现在也充实以公私合作、公私两利的新因素，个人能够分得一部分生产成果，而各人所得多少又是按其出力多少为比例，并要求各人都要有适合于公私利益的个人生产计划，这就能够刺激和巩固部队、政府、学校、机关的公营经济更加合理地向前发展。比如杨家岭的运输队，自去年实行公私合作的二八分红制以后，一般运输员的工作责任心和积极性增强了，运输力提高了，过去大车载重不过九百斤，驮骡载重不过一百五六十斤，现在大车载重提高到一千三百斤至一千五百斤，驮骡载重则提高到二百斤至二

百二十斤。去年全年，中央直属的运输队在同样的牲口车辆情形之下，比前年多运一千五百万斤，并替公家节省了运输开支，折合一千余石小米。今年一月起，该队又改为“交任务”制，给该合作社以更大的经营自由，分红也改为等级分红制，以刺激工作积极性，在制度上也有些新的规定，使今年第一季度工作更加改进。这是一个很大的创造。今年三五九旅的生产也采取了公私合作、公私两利的办法，规定每个战士全年要生产六石一斗粮食，除四石一斗归公外，下余二石完全归个人所有，这就使战士更加积极生产，使部队更加巩固。

由此我们得到结论：边区虽然是一个分散的个体农业经济社会，由于党的领导和组织，现在已经走上在私有基础上的合作化的道路。这种有计划、有组织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就更加保障边区经济在坚实的基础之上迅速向前发展。

我们要看清楚这个特点，我们的财政、金融、贸易政策也必须照顾到这个特点。如此才不致犯错误或犯大错误。

去年，有些同志不认识这个特点，故在工作中不是采取互助合作的方针和办法，而是相反地采取防范态度，自己孤立自己，结果陷于孤军奋斗，孤立主义（关于这问题我下面还要说到）。

除开革命与战争是我们边区所处环境的一般特点，这对边区的经济建设必然产生直接的影响之外，上面所提出的两个特点，就是边区经济发展现阶段当中表现的最基本的特点。从这两个特点就可以使我们得出下面的结论，就是：我们边区经济，恰恰与国民党统治区域的经济相反，它是在坚实的基础之上日益向上发展的，其原因就是在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政治之下，使生产力有着充分发展的条件；而国民党区域的经济是日形下降的，其原因就是那里的统治阻碍着生产力的发展，

那里的政治是买办封建专制下倒退腐败的政治，他们把国家银行与国家财政机关，看成为少数人从中谋利的工具，他们今天的经济政策是向着扶植官僚资本，实行独占经济，提倡商业投机，破坏农业与工业生产发展的。他们利用《战时国家总动员法令》，把人民生活日用必需的物资和对外出口的物资都统制起来，不准自由运销。由于棉花的统制，棉农因棉价不及成本而不再种棉；由于糖的统制，内江农民不再种甘蔗；由于桐油的统制，人民把桐树砍作柴烧；由于食盐的统制，自流井出盐区域的农民买不到盐吃；由于粮食的统制（假调剂供销之名），农民的粮食被夺去，又买不到粮食吃；由于棉纱的统制，许多纱厂被迫缩小生产或关门。总之，举凡一切受统制的东西，没有不是产量大减的。

今天，大后方农村经济破坏的现象非常严重。据农林部中央农业实验所逐年公布的农情报告，大后方十五省的耕地面积、农作物产量及耕牛逐年减少，截止一九四一年的统计，耕地已较战前减少八百万亩，总产量减少二万万市石，耕牛减少三百万头。今天大后方的工业，由于原料与产品的运销受统制，由于不能从银行借到周转资金，所以由沪、汉等地内迁的工厂有三分之一的机器未被使用，甚至对于重要国防工业的炼钢厂，也因利润不及商业投机的大，而让许多机器在那里闲放着。总之，大后方的经济是日趋破坏的、衰落的，广大人民因此陷于破产、饥饿、死亡的惨状。农民没有要求减租减息的自由，工人没有获得工资的自由，中小工业资本家没有发展自己经济的自由，各种小本生产者没有发展自己生产的自由。一切被垄断干净，垄断得使广大的人民活不下去。

正由于边区经济的日益向上发展，粉碎了国民党用停发经费与封锁经济来困死我们的企图，更激起反共顽固派对边区的

仇恨。在目前，国际国内形势均要求中国内部团结准备对日反攻的情况下，他们虽然不敢轻易发动对边区的军事进攻，但并未放弃消灭共产党、八路军和边区的企图，必然会要更加紧在经济上来封锁我们，运用他们的力量来和我们作经济斗争，派遣他们的特务打进我们里面来进行破坏活动。这种情况是我们应当足够估计到的。

虽然整个国民党区域的经济是破坏的、衰落的，但我们必须承认另外一个事实，就是在经济力量比重上，今天还是他们的力量比我们要强大，因为他们统治着广大的而且是富饶的地区，有工业城市，有外国的援助，有全国性的政权。我们边区是很小的，原来是贫穷的，且今天又无外援，同时我们边区今天的经济又不能与国民党区域完全断绝关系，因为我们有若干必需品尚不能完全自给，需要从国民党区域购进，而我们的货物也需要大后方的市场，这就使国民党能用经济封锁、贸易操纵、金融捣乱等办法给我们以很大的困难。更由于我们共产党人虽然在军事上政治上已有丰富的经验，但对于经济建设事业还在开始学习，还没有完全学会，从这里就可以认识我们与国民党进行经济斗争的任务，是非常繁重而艰巨的。忽略了这一点，就会使我们陷于盲目的乐观，放松对这方面的注意与应有的努力，而使我们在对外经济斗争上要受到失败。

我们的贸易、金融、财政政策，必须根据上述两个特点，以及由这种特点而产生的与国民党区域经济对比的形势与相互尖锐斗争的关系出发，这就是说，我们边区人民的财富和经济力量，比两三年以前是大大地增强而且是继续向前发展，我们在经济上对外依赖性日益减少，独立性日益增强，但与国民党的经济斗争也日趋激烈，这就要求我们在贸易、金融、财政政策上采取独立的主动的而不是被动的依赖的方针。我们只有正

确地掌握这种主动的独立的方针和政策，才能够使我们更有力量进行对外的经济斗争，保障边区经济的发展。

根据以上的分析来检查我们去年的贸易、金融和财政政策，便可以发现我们有些直接负责管理贸易、金融、财政的同志和机关，对于边区经济发展现阶段的特点和形势是缺乏正确的认识和估计，因此也就产生了政策上偏右或偏“左”的错误，主要是偏右的错误。这种错误表现为他们对于边区经济力量的估计不足，而对国民党区域的经济力量的估计过分。因此在一些政策上缺乏独立的主动的精神，在某种程度上表现一些投降主义的因素。比如在对外贸易问题上认为不可能出超和“出超无益论”，不赞成全面地管理对外贸易，不主张统销而主张对外贸易的自由等等思想，这是由于在经济上依附外面的思想和不相信边区经济力量增强而产生的。又如在金融问题上，主张边币发行的外汇基金制和认为边币不可能高于法币的思想，以及反对“边币一元论”，在边区内买卖要使用法币的主张等，也是由于过分地估计了法币的力量（不懂得法币总的趋势是不可避免地要降落的），不相信我们在金融问题上能够采取独立自主的方针而产生的。上述这些思想和政策上的错误，对边区经济力量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是起了消极、妨碍作用的。

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有些在财政、金融、贸易方面负责的同志当中，存在一种盲目乐观的思想。他们以为我们边区经济有了发展，而我们又掌握有必要的物资，就可以高枕无忧了。他们没有足够地估计到国民党对我们边区的封锁和破坏所产生的困难，不了解边区经济的发展和财政金融的巩固是要从艰苦复杂的斗争中争取的，盲目地用银行发行边币去满足财政上的开支，不去依据自己可能的收入，采取必要的节约，防止

浪费，以求得在财政上的收支平衡。由于这种盲目乐观的思想，我们的银行长期规定了法币一元兑换边币两元一角的牌价，不管边币黑市如何继续高涨。他们认为边币可以不费气力地回到两元一角的比价，放弃银行在扶植边区经济发展上可以进行的一些业务。必须指出，这种表面上“左”的盲目乐观的思想，对边区经济的发展、物价金融的稳定和人民生活的改善也是有损害的。

确定今后正确的贸易、金融、财政政策，必须克服上述偏右偏“左”的两种倾向。只有克服了偏右的依赖观点，才能够保障我们采取主动的独立的政策来进行对外的经济斗争，而使我们获得胜利。也只有克服偏“左”的盲目乐观的思想，才能认真去认识经济斗争的复杂性与艰巨性，才更能够加速边区经济的发展，更加增强我们在经济上的独立性。

三 金融贸易财政政策的基本方针

由于我们在经济建设事业发展中，还存在着生产与消费（分配）之间未能协调配合的矛盾，必须有很大的组织工作来加以调节，这就需要我们今后在经济建设事业中具有更多的计划性和组织性。为此目的，必须有一些基本方针的规定。

第一个基本方针是发展生产，增加财富，达到完全自给。

上面我们指出边区经济的日益发展，逐渐脱离对外的依赖性而过渡到完全的自力更生，这一方面说明了我们今天还没有达到完全的自给，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只要我们充分发挥边区的人力及资源的作用，努力发展边区经济，边区是可以迅速达到完全自给，可以完全摆脱对外的依赖而独立地主动地解决问题的。因此我们要保障对外贸易的出入口平衡，并达到出超；

稳定金融，提高边币；收支平衡，财政基础稳固，这就必须全党更进一步地去努力发展生产。

去年下半年的物价猛涨，金融发生强烈波动，引起社会生活不安，成为我们去年工作中的极大缺点。如果这样设问：为什么去年下半年发生金融波动、物价高涨？可以答复：除因财政开支增加引起的银行发行政策的错误之外，基本原因是由于入超（还有一些次要原因，此地不去列举）。为什么会产生入超呢？更基本的原因就是由于有一部分生活必需的资料，我们还不能够自给；而已经可以自给的生产品，还没有能够使它的产量增加得更多，以至于我们能够把它输出边区以外，来抵消必须由外面输入货物的价值；加上贸易政策上有很多错误，因此就产生物价高涨、金融波动的结果。

明了了这种情况以后，就在全党的面前清楚地提出了当前最中心的紧迫任务，就是更进一步地努力生产。

在粮食增产上，去年我们获得很大成绩，的确是把人民的生活提高了一步。今年我们要完成西北局提出的开荒百万亩、深耕细作增产细粮二十万石、边区驻军产粮十万石的号召，使我们在粮食上不仅能够完全自给和余存一年备荒的粮食，而且能够使粮食将来有大量的输出。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粮食增产和输出是有很大大前途的。因为边区有大量的荒地，人口逐年增加，耕地面积可以扩大，粮食的增产是大有希望的，而边区以外的周围地区，因征拔壮丁，负担繁重，农业经济日形下降，抗日战争结束后的几年中，也是很难恢复到战前农作物的产量，这就保障了我们的边区粮食能够大量的有利的输出。因此我们应当多生产粮食，输出边区以外，这是保障将来能够平衡出入口的一个主要的力量；而且如有粮食输出，就能提高农产品的价格，刺激农民的生产，保障农民物质生活的提高。

棉花、布匹占去年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农民和军工上需要的铁有百分之七八十依靠外面输入。根据这次会议的研究，这两项东西只要我们大家努一把力，是完全可以解决的。我们今年就要决心完成三十万亩棉田、产花四百五十万斤到五百万斤的计划，明年再不需要进口外面的棉花、布匹了；更要以最大的努力组织铁和其他金属的生产，以现在边区铁的蕴藏量和我们的技术来说，要做到今年产铁至少能供给一半以上的需要，明年做到全部自给，再不买外面的铁了。此外，必须完成造纸、种蓼蓝、造肥皂、造火柴、多榨植物油的计划，调整盐的产、运、销，增加煤油产量，继续发展畜牧业。

除开加紧整理政府和公家所举办的公营企业，使之继续求得产量增加，质量提高，成本减低（最近的工业会议将详细讨论）而外，今年还必须强调发展广大群众的手工业生产。要充分利用农村劳动因合作化而节省出来的广大劳动力，去发展边区的手工业和农业上的副业。要把边区所生产的棉花织成布匹，边区出产的铁制成为农具，制造纸张的原料变成为农民提高文化和日常需用的纸张，不然有棉花、生铁和原料，还是不能解决问题。这是一件很大的组织工作，丝毫不能容许对之采取自流的态度。边区合作社应当改变自己的方向，今后要以组织上述各种生产合作事业作为自己基本的业务（今年合作社会议应作详细讨论）。各机关部队除完成自己的农业生产计划而外，也应组织自己可能组织的劳动力量去发展各种必需的手工业。对这类手工业合作生产事业，除开充分利用民间游资使它变成生产的力量而外，贸易公司必须有一定数量的投资，银行必须有一定数量的放款，以扶植这些生产事业的发展。

只要使农业、手工业、合作社、公营企业今年都能够获得充分的发展，就必然会使边区经济力量大大地增强一步，保障

我们明年能够达到经济上的完全自给。

如果上面提出的任务都能实现，那末我们便可以完全保障出入口平衡，并且可以达到出超。机关部队，除开一部分、大部分或全部粮食自给外，其他的生活必需物资，也可以做到一部分、大部分或全部自给。这样税收也能够增加，财政就有了巩固的基础（去年边区党政军民全年开支的总额为六十万万元，其中有三十八万万元是由各部门生产自给解决的，几乎占全部开支的百分之六十四，今年更要增加）。

出入口既平衡甚至能出超，金融物价也就必然会平稳，边币可能迅速的提高，农产品与工业品价格的剪刀差不至继续发展，甚至可以有些缩小，而缩小这种剪刀差是我们必须尽可能努力的。

我们要做到能够胜利地完成今年的生产任务，就必须：

贯彻毛主席“组织起来”的号召，争取今年有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劳动力组织到各种合作组织中去，并改进这种合作组织的内容；

采取公私兼顾，奖励竞赛，按户计划和个人计划等刺激和组织生产的许多办法，提高劳动热情，发展生产力；

组织和发展边区的交通事业，尽量做到运输机构合理，降低成本和运费，以便利于边区内物资的交流、调剂和输出物资到边区以外去。

全边区经济的完全自给，又必须建筑在各分区的经济能够自给的基础之上。

第二个基本方针是公私兼顾，互助合作，一致对外。

这个基本方针的主要目的在于：对内求得互助合作，发展经济；对外求得统一步骤，集中力量。

毛主席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一书中曾指出：“我们

要批驳这样那样的偏见，而提出我们党的正确的口号，这就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在公私关系上，就是‘公私兼顾’，或叫‘军民兼顾’。”毛主席这里所指的“公私兼顾”，是适用于一切公私关系上的。例如在金融贸易问题上，及国营经济的分散经营与分配问题上，也要采取公私兼顾、互助合作的方针。而不是只照顾公家不照顾群众，只照顾自己不照顾别人，或损人利己以求自己的发展。这都是国民党作风在我们一部分同志中的反映，是足以妨害整个边区经济的发展的。

先从金融贸易问题来说，由于我们的民营经济还是建筑在小私有商品生产制度之上，不能不依靠货币与市场去进行买卖，因而市场就有调整生产和消费的重要作用。当此农业和手工业日益发展的情况之下，边区内部贸易必然会要随着发展的，内部市场的地位和作用，显得更为重要了。

一般小商品生产社会中的市场，其发展情况是盲目的，无政府状态的。投机商人、高利贷者、兼营商业的地主和巨富，往往操纵市场，囤积居奇，借以剥削人民。而人民的生产也是盲目的，他们并不知道市场上的需要如何，也没有真正为着人民利益的机构来指导他们按社会需要去进行生产和调剂他们的产品。这就更便于上述投机商人等来操纵、剥削。这种情形，就会使人民，特别是农民、手工业者蒙受重大损失，而妨碍人民经济的发展。

我们边区民主政权下的经济，与国民党统治及敌伪统治区域的经济是有根本区别的，同时又有其相当独立的地位。我们就必须注意使内部市场的发展和活动能够符合于新民主主义经济发展的要求，即便于小商品生产者的有利交换，反对一切投机操纵，借以帮助和刺激农业（包括副业）手工业的发展。

但必须指出，过去边区内部市场上的情形，是很不能令人

满意的，物资局、银行、公营商店、合作社等未能互相结合，互相帮助来调整市场的需要；相反，甚至还是互相竞争，促使市场上盲目性增大。

我们是否有条件使日趋发展的内部市场能适应边区经济而更合理地比较有组织地发展，使我们能更团结内部力量便于对外斗争呢？答复应当是肯定的。因为政权是我们领导的，我们有银行，有贸易公司，有合作社，有公营商店和企业；有党的领导，有政策；而我们的生产如产粮、种棉、制铁等又是可能比较有计划地进行。只要我们能够依据公私兼顾、互助合作的方针，那我们就有力量和一切投机商人作斗争，来调节市场需要和价格，使市场处于一种平稳安定的状态而利于人民经济的发展。

在调整市场上，我们的公营经济、银行和合作社，都负有重大的责任。

我们的公营经济虽然在全边区生产上不占主要地位，但在商业上因为它有巨大集中的资本，有高度组织的力量，足以控制金融与市场。这就要求它们要严格服从政府的法令与政策，不但不得损害人民群众利益，而且其唯一的任务，就在于为边区一百四十万人民与十万党政军人员的生产与消费起集中的组织与调节的作用，一切离开这个任务的方针，就是危害新民主主义的错误的方针，就是国民党式的剥削大多数人的方针。

我们的贸易公司，应当时常照顾到群众的生产和消费的需要而加以适当的调整。它必须协同建设厅，经过广大合作社并与之很好地合作，去收集民间的土产品，如陇东地区大量的棉花、三边的皮毛药材等，首先调节内部市场上的需要，多余的则有计划地由贸易公司或帮助合作社组织外销，换取边区人民必需的物资。这一方面使农民多余的物资获得销路，不致因为

生产过多而跌价吃亏，以此来刺激人民的生产积极性；另一方面使缺少这些物资的地区获得供给，不致因缺少这类物资而涨价，引起金融物价波动。同时贸易公司又须注意，在对外贸易上不仅要换得十万公家人需要的物资，而且要换取边区人民今天还不能生产而又必需的物资，经过合作社、公营商店、骡马店有计划地分配到各地市场上去，尽量保障人民消费的需要，不致因这种物资的缺乏而使农民购买不到，或要用过高价格去购买因而吃亏，甚至于直接影响生产的发展（如农民买不到犁铧铁器等）。

我们的银行，必须时常照顾人民生产上的需要和调节各地市场上的金融，来保障物价平稳，杜绝投机者活动的机会。如某地合作社或人民需要发展必需的自给工业（如造纸、纺织等），或有为着农业发展的需要（如修水利、改良种子等），银行必须尽可能给以贷款的便利。市场上发生了金融波动以致引起人民生活不安时，则又必须尽速地加以调整使之迅速趋于平稳，防止因此而妨碍生产发展及引起市场上的混乱。

我们的公营商店和企业，应当成为调节市场需要、稳定金融物价的力量，成为与一切投机操纵者作斗争的工具。为着这样目的，有时吃点亏也是必要的。公营商店要将一部以至大部资金逐渐转到真正生产财富的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方面去。

各种公营企业，如果都能够依据公私兼顾、互助合作的方针，处处从全体人民（包括自己在内）利益出发，那它就自然在一百五十万人的生产与消费中起着组织与调节的作用。而边区内部的市场也就能够正常地向前发展，真正做到内部发展与团结而利于对外进行经济斗争。

再从公营经济的分散经营与分配问题上来说，今天的条件不能不采取分散经营的方式，而领导上则须绝对服从统一的方

针，反对不照顾全体的本位主义现象。士兵及一切工作人员、杂务人员劳动的结果，不应全部归公，应以一部分归私，才能更加提高他们对生产的积极性。

从这种公私兼顾、互助合作的观点来检查过去的情形，就可以发现这方面我们还存在着许多严重的缺点。

比如物资局，过去对小公家和群众的利益是照顾不够的，有时甚至是损害他们利益的，以致造成了同他们对立的形势。在某些物资的代销上，曾经使物资的所有者蒙受很大的损失。在盐的统销上，卖出和购进的盐价相差太大，使广大运盐脚户和合作社的运盐队不能够获得利益，甚至于亏贴很大。这是一种没有群众观点、损人利己的国民党式的剥削思想。又如在物资的分配上，过去物资局没有照顾到各系统的小公家及各分区、各合作社和群众的需要，以致使他们分不到必须的物资而表示不满意。过去物资局更没有想到与广大合作社和各公营商店合作，从帮助他们发展中来取得他们对自己的帮助，以求得统一和集中力量去进行对外斗争。我们的银行，在扶助国民经济上没有尽到自己应有的责任。这样，自然就不能达到团结内部的目的，而只是造成自己孤立的状况。

有些小公家和个人，站在本位主义和私人利益上而不照顾到整个边区利益的现象，也必须纠正。比如财政厅，从财政本位出发，不顾情况地发行边币，虽然在财政方面解决了去年和今年很大的问题，但因而成为影响金融大波动的重大原因之一。又如食盐的走私，破坏了统销和等价交换的政策（如公家规定一斤盐换一斤四两铁，走私的结果，变成一斤半盐交换一斤铁，使公家受到极大的损失，自己也吃了亏）。或者是任意对统销物资加价，小公家虽暂时获利，但因此使大公家积压了大批的货物不能够销售而蒙受了很大的损失。

公营商店过去虽起过积极的作用，但有一些公营商店的情形也是严重的。他们不是以执行政策法令、稳定金融、平抑物价、与投机商贾作斗争作为自己经常的任务，相反的，有些时候是依靠破坏法令政策（如囤积居奇、买卖黑市等）去获利，反而助长了金融的波动和物价高涨。某些个人在图营私利的目的上不惜破坏政策法规的事情也还很多。

因此，要团结内部就必须克服这类损人利己、为私忘公的局部观念和本位主义，要与这些倾向作坚决的长期的斗争。

由于一九四〇年以后，国民党封锁边区和断绝我们的外援，曾经造成大小机关极端困难的情况，各个部门既没有家务，又没有很多的流动资金，要靠自己的经营去维持生活和解决办公需要的经费，这就发展了各自为政、本位主义甚至于是损人利己的严重现象。在极端困难的经济状况之下，这种情形也是难于避免的。但经过几年自己动手发展经济的努力之后（政府也曾投下了不少的资金），现在的情形已经是大不相同了。各个部门都已经建立起必要的雄厚的家务，并正在厉行生产和节约。各个单位就应当严格地遵守党和政府的政策与法令，打破本位主义的思想，增强内部团结互助的力量，以便利于进行对外的斗争。

大公家、贸易公司、财政厅和银行等，由于边区经济的发展，对外贸易的扩大，也积累了相当雄厚的力量。他们更需要从发展边区经济的观点出发，积极努力照顾局部的、小公家的以及群众的利益。必须懂得，只有这些局部、小公家和群众在经济上有了更大的发展，才能使大公家的事业有更大发展的条件和基础。为着保障各个局部和小公家能够严格地遵守政策和法令——而这又是统一步伐和进行对外斗争的最重要的条件，就必须帮助他们解决具体的困难问题，帮助他们发展生产（如

有些公营商店因为他们的上级机关规定了过大的获利任务，致使他们不得不从破坏政策中去求得任务的完成，要使他们能遵守法令政策，就得减轻其任务，这就必须由大公家拿出一笔钱补贴其所属的机关)。尤其在今年，提出发展民间各种自给经济当作当前一个重要任务时，物资局和银行以及财政厅必须以很大的注意和力量加以帮助。只有各种自给工业真正能够获得具体帮助和迅速顺利发展时，才能够使我们真正具有强大的经济力量来进行对外的经济斗争。

由于边区经济逐年向上发展，边区人民的财富增加，购买力提高，需要消费的东西也增多，正需要我们有计划地发展自给经济以满足他们的需要。当他们需要的东西我们还未能达到完全自给，或者某些公私需要的东西（比如一部分兵工通讯器材、医药卫生器材以及老百姓所需某些日用品）边区还不能生产，还必须依靠外面的供给，我们需要从边区以外取得一部分物资满足人民的需要，但又不要因此妨碍自给经济的发展，这就增加了我们对外斗争的重要性、严格性与复杂性。

关于边区经济发展的情形可从下面一个例子看出：

表三 安塞高川村 1940—1943 年经济发展情况

项 目	1940	1941	1942	1943	1943 年与 1940 年 相比 (%)
户 数	10	11	13	15	150
劳动力	10	11	19	15	150
半劳动力	5	6	3	9	180
耕牛 (头)	3	4	8	9	300
耕地 (亩)	540.0	783.0	1,143.0	1,380.0	255.5

续表

收细粮（石）	109.0	145.0	220.0	313.7	287.8
驴（头）	7	10	15	24	342.8
羊（只）	85	135	265	410	482.3
猪（头）	5	10	13	17	340.0
鸡（只）	75	95	116	150	200.0

（根据 1944 年 3 月 27 日《解放日报》杨光的通讯改制）

上表告诉我们，四年来该村总财富增加百分之五十到近四倍。

边区人民因财富增加，购买力提高，消费能力增加的情形，又可从下面延川拐峁村农民蓝凤城的情形中看出来：

蓝凤城：全家三口人（本人及妻一、子一，子现年十六岁），革命前一无所有，靠揽工度日，并有大烟瘾，贫苦不堪。革命后分得窑两孔，山地十垧，川地四垧，共计十四垧，本人大烟瘾也戒掉了大半，但光景仍未见有大出息。抗战后除经营农业外，兼营副业，生活蒸蒸日上，一九四〇年存款一百六十元，以此款开了一爿小店，到如今吃穿不愁，竟是丰衣足食之家了。

从下面几个表中，可以看出他光景的发展：

表四 蓝凤城 1941—1943 年收支对照表

单位：折粮食石

项 目	1941	1942	1943
年总收入	5.413	19.939	21.807
年总支出	3.762	12.648	17.448

续表

年存余	1.651	7.291	4.359
说明	本年度本人无牲口、农具，劳力还不很好，故农业收入不多。		本年度店中生意不好，更因儿子问媳妇破费，故存余不多。

表五

蓝凤城各项开支表

单位：折粮食石

项 目		1942		1943		说 明
		数目	百分比	数目	百分比	
主要必需品	自给	2.467	19.50	4.125	23.64	米、麦、线、棉等 盐、火柴、碱等
	购买	2.120	16.76	2.264	12.98	
	合计	4.587	36.26	6.389	36.62	
次要必需品		1.651	13.05	1.950	11.18	染料、坤袜等
非必需品		2.180	17.24	1.306	7.48	迷信品装饰品等
嗜好品		1.200	9.49	1.076	6.17	水烟等
牲 畜		1.739	13.75	2.173	12.45	
负 担		1.291	10.21	1.144	6.56	
其 他 (股金及特支)				3.410	19.54	特支指问媳妇
总 计		12.648	100	17.448	100	

表六 蓝凤城支出中购买边区内外物品的费用对照

单位：折粮食石

项 目	1942		1943	
	数 目	百分比	数 目	百分比
总支出	12.648	100	17.448	100
边区外	1.576	12.46	1.268	7.27
边区内	7.314	57.83	10.911	62.53
自给	2.467	19.50	4.125	23.64
负担	1.291	10.21	1.144	6.56

从上面的统计数字可以看出农村经济发展的形势，农民的收入和支出都是逐年增加的，而负担则减少了，表示人民财富逐年增加，购买力逐年提高。在开支项内可以看出自给的数量增加，说明自给经济力量在扩大；大部分物品从边区内部购买，一部分还需要靠外面供给。

上面的统计数字还告诉我们，正因为人民财富增加，消费量增大，如何有计划地去管理对外贸易，就非常重要了。只有执行正确的对外贸易和税收政策，才能保障边区自给经济有充分发展的条件，同时也只有有计划地把边区自给有余的生产品，如盐、皮毛、药材及将来的粮食等，输出到边区以外去，交换在边区内不能生产或还不能完全生产的一些必需物品，才能保障出入口平衡，争取出超，这是非常重要的工作，否则对边区经济的发展是极端不利的。

总之，一方面因为国民党（敌伪也如此）不愿我们的经济向上发展，加紧同我们作经济斗争；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实行严格的保护政策，来保障我们的经济更顺利地继续向前发展，

我们就必须正确地管理对外贸易中来进行对外经济斗争，并使这一斗争获得胜利。

要使我们取得对外经济斗争的胜利，必须团结内部的力量，也必须实行公私兼顾，互助合作，团结内部，一致对外的方针。

西北局现在把物资局改为贸易公司，来统一管理全边区的对外贸易，并责成它要由局部的管理，逐渐做到全面的管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也是一项非常艰巨的工作。我们的贸易公司必须善于依据自己和可能使用的民间力量，首先从主要的出口物资如：盐、皮毛、药材和可能出口的粮食、油类等的出口管理起，不要企图立即去统制一切出口贸易。有些次要货物的出口可交地方或部队去组织，但必须指导他们的贸易方针，使之符合于总的对外斗争的利益。贸易公司要把这一工作做好，绝不能再采取像过去物资局那样不联系群众的孤立政策。它必须善于与合作社、公营商店、机关、部队以至于私营企业 and 商人密切合作。它必须善于去组织边区内的群众和边区外的商人，来冲破封锁，尽量输出我们需要输出的东西与输入我们需要输入的必需品。它必须紧紧掌握对外贸易的原则，贯彻发展与保护边区经济的方针。它必须经常很清楚地了解边区内外的商情，能够主动地及时地和国民党进行经济斗争。贸易公司的一切活动，只有认真实行公私兼顾与群众路线的方针，才能团结内部，统一步调。总之，贸易公司的任务，应该明确地规定，它是对一百四十万人民群众及十万大小公家人员的生产与消费（主要是在对外关系上，其次也在对内关系上）起集中的组织作用与调节作用的机关。在这里，并不废止私人的对外与对内的一般商业，贸易公司起的是集中的组织作用与调节作用。它不是从中夺取商业利润为目的的机关，它是与国民党

金融买办、大资产阶级及边区内部的投机商人作斗争的机关。它是保护一百五十万军民的经济利益的机关，它是一个大合作社。只有这样，它才能完成西北局所给的任务。另一方面，要使我们的对外经济斗争能获得胜利，不仅贸易公司要努力负责，所有合作社、公营商店和企业也要自觉地负责地协助贸易公司去进行这个斗争。我们的一切党政军民机关，也要领导群众自觉地去协助贸易公司进行对外经济斗争。比如我们要号召大家自觉地完全服用土货，不用外货，自觉地忍受一时的不便，甚至暂时牺牲小己的利益去顾全全面的利益。当着某些口岸被国民党特别严紧封锁，或在某处大量运进货物（如去年三边运进大批布匹）企图捣乱我们金融，或当贸易公司为着对付国民党的封锁和破坏而主动地决定某种东西暂停输出或贴价输出，或暂停购进，或为巩固边币而打击法币时，各方面都要协同一致地去做，不能因为与局部利益冲突，便任意破坏政策，错乱步调。当着贸易公司及银行在对外经济斗争中发生困难时，各方面都要自觉地给以支持。如前年十二月及去年三月紧急动员各机关交出法币以克服边区金融波动那样。

总之，我们应当了解，与国民党作经济斗争是一个繁重的任务。要看到国民党区域的经济力量今天比我们还是强大些，但是它内部存在的不能调和的矛盾是完全可以被我们利用的；我们的经济力量虽然今天还处于劣势，但我们内部没有不可克服的矛盾。我们必须克服内部矛盾一致对外，作到随时能够集中调动自己的力量，既便于进攻，也便于退守，那样才能使我们在这个斗争中免于失败并获得胜利。

第三个基本方针是厉行节约，建立家务，备战备荒。

我们陕甘宁边区现在是处于一种相对和平环境，我们比敌后各根据地具有进行经济建设的优越条件，能够通过建设逐渐

提高人民的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以达到丰衣足食的目标。然而我们必须看到，这种和平环境是存在于全国抗战的局面当中，是处在敌人和顽固势力的军事、政治和经济的包围封锁状况之中；另一方面，陕北历史上又经常发生严重的灾荒。因此我们的经济建设除改善和提高人民生活之外，还要能够准备足够的力量，以便将来进行驱逐日寇的反攻战争，并且也要具有充分的力量保卫边区，以防止反共势力的突然袭击；同时又要积蓄必需数量的粮食，以防止万一来的灾年。这就在我们的面前提出了积蓄力量的严重任务。

积蓄力量的办法有两个，就是生产和节约。从生产中使我们的公私财富逐年增加；从节约中使我们的财富能够积累，不浪费，更多地用之于发展生产。因此，我们一方面应当从组织人民生产中保障人民能够吃得饱，穿得暖，真正做到在战争环境当中可能做到的丰衣足食；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防止和克服浪费现象，养成一种坚实而朴素的作风。

节约的方针不是要减少必需的消费，而是在于节省根本不需要的开支，以便建立公私雄厚的家务，能在坚固的基础上保持长期的丰衣足食的生活。

我们之所以要保证必需的消费，保证一定标准的丰衣足食生活，不仅因为可以提高生产热情、保障经济的发展，而且对于战士与工作人员身体的健康，工作效能的提高，部队的巩固，都有伟大的作用。这是去年一年许多生动丰富的事实所证明了的。

我们之所以要提倡节约，因为去年我们的确还存在有很大的损失和浪费现象。这种浪费情形，有些是由于政策上的错误而产生的。比如，贸易局在对外贸易上允许奢侈品的入口，和在输出物资上没有严格地注意等价交换政策的掌握；银行固定

二元一角的牌价，使我们不得不贴本兑出外汇。这些情形，都使大小公家和人民蒙受了很大的损失。在供给上，有些机关部队和个人借口丰衣足食，无限制地提高了供给标准，部分的甚至发生浪费奢侈现象。比如在被服的供给上，或者不管是否必须增发和添补而滥发了许多可以不必发的被服；或虽然作到了按时发给，但大部分被服质量很差，不能耐久。在肉食、油盐的供给上，也有过量的事实。在窑洞、房屋、礼堂的建筑和修理上，也有不少的浪费情形。在日用品上，不去努力提倡使用土货或代用品，而去购买外来品。某些机关、部队甚至取消了预决算的制度，形成随便开支，造成很大的浪费。这些都是来自没有长期打算、不去认真建立家务的观点。群众当中也有因为财富的增加开始产生某些浪费的现象。

表七

三五九旅战士开支比较

单位：元

项 目	今年每人开支			往年每人开支		
	数量	单价	年金额	数量	单价	年金额
粮 食	1.5 石	20,000	30,000	1.8 石	20,000	36,000
单 衣	1 套	10,300	10,300	2 套	10,300	20,600
棉 衣	2 套	21,200		1 套	21,200	21,200
罩 衣	2 套	10,300				
毛呢衣	1 套 (平均穿六年)	18,000	13,500 *			
毛 巾	1 条	600	600	2 条	600	1,200
被 毯	1 条 (用五年)	12,000	2,400	1 条 (用三年)	12,000	4,000

续表

棉鞋	1双 (用两年)	1,500	750	1双	1,500	1,500
单鞋	1双	1,200	1,200	2双	1,200	2,400
草鞋	3双	500	1,500	4双	500	2,000
皮大衣	1件 (用八年)	40,000	5,000	1件 (用五年)	40,000	8,000
绑带	1付 (用三年)	2,100	700	1付 (用二年)	2,100	1,050
衬衣				1套	4,775	4,775
合计			65,950			102,725
节约			36,775			
总计			102,725			102,725

* 棉衣 2 套，计 42,400 元；罩衣 2 套，计 20,600 元；毛呢衣 1 套，计 18,000 元，合计 81,000 元。使用 6 年，每年平均为 13,500 元。

上面这些浪费损失，如果加以认真的统计，数目必在几十万万元以上。假若能够把这些浪费的资材和金钱用在各种经济建设事业的发展上，那是可以再生产出成倍于浪费数目的财富的。

从三五九旅今年计划的每一战士在粮食与被服的开支上和往年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出节约的数字如何的庞大！

从上表所列，去年每一个战士，按旧的供给标准共需十万零二千七百二十五元，经过各种节约后，今年每一个战士仅需六万五千九百五十元，而并没有减少丰衣足食的标准。每一个人在一年内的开支就节省了三万六千七百七十五元。三五九旅

这样节约的原则，一般是可以运用到边区其他部队中去的。

今年杨家岭机关发展个人生产和公共生产的结果，与去年政府所发经费比较，完全要政府开支的减少了八项，计津贴费、保健费、卫生费、夜餐费、杂支费、马杂支费、鞋子毛巾肥皂费、伙食费；减少政府一半开支的有办公费及单衣费。另外，今年还决定至少节省粮食五十石。以上总共减少政府开支五千二百四十九万元。以二万元一石小米折算，共节省政府开支二千六百二十四石五斗。以杨家岭一千零二十二人计算（小孩在内），平均每人节省政府开支二石五斗六升八合。西北局机关将其个人与公共生产节约合计，平均每人减少政府财政开支亦在二石五斗以上。

以上计算还没有包括马草、路费两项，如将此两项计算在内，每人平均节省开支要超过三石，更没有包括中央与西北局所节省的特费开支。杨家岭和西北局机关的这种生产节约的原则，是应当用到其他机关、学校中去的。

根据上述机关、部队节约的标准来估计，边区全部脱离生产人员的节约，今年至少可以达到二十万万元以上，这就大大地减少了政府的财政开支。若以这二十万万元投入其他生产事业中，则今年还可以生产数十万万元的财富。至于老百姓能够节约的数目，现在还无法估计，但我们必须在群众中进行一些必要的教育，使他们懂得尽量节省不必要的开支，尽量使用边区自己所造的工业品，来增加自己财富，保护自己生产的发展，比如节用迷信品和其他边区以内还不能够生产的外来物品。这对国民经济的发展也必然会产生重大的功效的。

由此可见，节约对于发展边区经济，调整生产与消费，节省政府财政开支，保障出入口贸易平衡，稳定金融物价，建立家务，积蓄力量等方面，是有何等重大的意义和作用！

根据延安各部队、机关节约运动的经验，一般节约方法是从三方面着手的：一是从发展生产中提高自给能力来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二是极力减少各大小单位不需要的开支，极力提倡用自制品，减少购买的支出，极力研究改进供给制度，展开节约运动。三是贯彻公私兼顾的原则，以一定比例的节约部分划为私人所有，以刺激个人和机关的节约运动。

由发展生产而替公家减少财政开支的事实，去年已经做到，除粮食被服外，平均达到自给百分之六十四。今年生产运动更加展开，可以平均达到自给百分之八十。有的部队如三五九旅已可完全自给，有的在今年秋收后也能完全自给；西北局与杨家岭机关除粮食及部分被服外，已自给百分之九十。机关、部队、学校的生产，如果继续认真地发展，政府多注意扶持，一两年之内，只要无突然变动，部队是可以向三五九旅看齐，做到完全自给，机关及部分学校是可以同西北局、杨家岭并进的。

就部队、机关、学校本身说，确是可以节省许多不必要的开支，如停止建筑，不使用奢侈品，减少应酬招待等。特别要注意许多供给制度上的改善，如改善炊事工作，既可节省粮食，又可节省柴炭；改善运输制度，既可节省运输费，又可发挥运输力。因此关于节约方面的已有经验，要好好总结介绍，并且还要各单位根据自己的情况好好创造，来展开公共的与个人的节约运动。

贯彻公私兼顾的原则是促进生产节约运动的好办法。去年延安许多机关、学校运输队的改造，运输力的提高，主要原因之一，是实行了二八分红制。中直各机关能节省粮食一千一百石，也是由于实行了公家与炊事员的二八分红制。今年中直各机关订出了三种办法：一是节约完全归公的办法，如节省政府

所发单衣百分之五十，并决定机关、学校每人节省五升米交公家。二是节约按比例分交大公家、小公家及私人的办法，如杨家岭各小单位节省的印刷纸张、办公费等，规定以百分之四十归财政厅，百分之二十归杨家岭，百分之四十归私人分配。三是节约完全归私的办法，凡是个人生产任务中规定由公家发给他个人所用的东西，而他节约者，其所值完全归己。因此杨家岭工作人员今年在生产与节约中，除交公家任务外，个人所得平均可到一石二斗至一石五斗粮食。

在人民群众的节约方面今年要特别提倡使用边区产品的运动，宣传教育老百姓穿土布，用土货。这不仅是一个大的节约运动，而且是一个大的保护边区经济发展的运动。希望各地党政军民根据当地发展自给经济的实际情况配合进行。

我们既总结了去年财经工作的经验，我们相信今后可以克服在对外贸易、财政制度和金融方面的浪费。同时根据上面所讲的办法，在各机关、学校、部队及人民中展开的节约运动一定能够得到很大的成绩。厉行节约与发展生产配合起来，我们一定能克服任何财政经济上的困难，一定能使边区经济更迅速的达到完全自给！

四 全面认识经济建设的重要性

我们要承认，随着边区生产的发展，就产生许多新的需待我们解决的复杂问题，如贸易如何管理，金融物价怎样才能巩固和稳定，财政政策如何才利于经济的发展，如何运用因组织起来而节省出来的劳动力，怎样提高群众的文化教育水平以推动建设事业发展等。这些新产生的问题，其内容都是相当复杂的，我们过去对这些建设中的新问题是缺乏经验的。但是，这

些问题今天又已经摆在我们面前需要解决，那就只有依凭我们的决心、努力和创造精神，从摸索中去发现其规律性。这不免要感到困难，发生缺点和错误，但遇到这些困难、缺点和错误也正表示我们是在发展当中，它们是发展中的产物。我们要不怕发生困难、缺点和错误，问题在于我们要以学习的态度与群众联系，集合群众的经验与智慧严肃地对待每一个新发生的问题。就是要每当一个新的问题发生需要处理时，能够事前加以深入的调查研究，事后详尽地总结经验教训，使我们少犯错误，不重犯错误，而能较快地走上正确的轨道。

我们过去在贸易、金融、财政问题上存在的缺点和错误，这次会议从思想、方针、政策、作风方面都加以揭发，算是在财经工作上作了一次比较深入的整风，初步总结了经验教训，确定了今后的新方针和办法，只要全党来注意这些工作，我们相信会很快地走上正轨，把这方面事情搞好的。

但是，要使全党努力做好财经工作，首先就要使各级党委，特别是县级和团级以上的党政军民和财经干部，在思想上能够全面地认识财经工作的重要性。边区的干部、党员以至于群众，对经济建设中农业生产的重要性及发展农业生产的方法，经过去年的动员和实践，应当说是有了深刻的认识和很多的经验，现在，要使他们对于经济建设中的金融、贸易、财政及民间自给工业等类问题的重要性，也能有如对农业生产一样的认识，也加以很大的注意和努力，那我们就必然能够创造许多新的办法，发现和培养大批的干部，使我们在这方面的工作很快就可以收到成效。

我们要告诉党员特别是干部，使他们懂得：革命的目的就是为着建设。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是为着中国的解放与建设。破坏旧的社会制度和经济关系，是为了要建设一个新的社会制度

和经济关系，使人民能够过着真正文明的物质和精神的生活。

为什么要破坏旧社会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关系呢，而且是用战争——不惜巨大的牺牲和流血，如像过去的内战和现在的抗日战争一样，去破坏旧的和帝国主义的统治呢？其原因就是因为旧制度和帝国主义的统治，是妨碍生产力，也就是妨碍人民经济的发展。

比如在旧的农村社会中，占人口少数的地主阶级，掌握了政权，垄断了生产资料（土地、农具、牲畜、肥料、种子）和社会财富，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反而没有、或只有少量的土地和生产工具，用高度的租额向地主租佃土地来耕种。地主对农民除开地租的剥削以外，还有劳役和其他的剥削。地主阶级依靠这些用无止境的剥削来增加自己的财富，而不愿意拿出本钱从改良农作法、水利、工具、种子、肥料等方面去增加土地的产量和社会的财富。广大贫苦的农民因为自己没有或者缺少土地，而租种的土地又没有佃权的保障，也就无力或者不愿意去改良土地的耕种。这样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制度，自然就要严重妨碍农业经济的生产力继续向前发展，使广大的农民群众呻吟于地主阶级统治之下，过着非人的生活。

今天的日本帝国主义，企图以武力来侵占中国，其目的自然不是使中国的经济获得发展，使中国人民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恰恰相反，日本帝国主义是要把中国人民变成为它的驯服的奴隶，以便于剥削中国人民的血汗，掠夺中国的物资，来满足它独霸东亚的野心。只要看现在沦陷区的同胞的情形，就可以知道他们负担着繁重的捐税，自己劳动生产的物品，都被日本强盗和汉奸政权强迫集中或廉价收买，而另以高价“配给”人民。他们过着牛马般的奴隶生活。

人民在这种政治制度和经济关系的下面，自然产生了革命

的要求，一到这种要求达到觉悟高度的时候，就会不惜任何牺牲和代价，用暴力和战争去达到推翻这种统治和制度的目的。这在过去就叫做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制度，实现各种革命的政策；在今天就叫做驱逐日寇，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成立“三三制”的民主政权，用减租减息的方法逐渐改变旧社会存留的封建剥削关系。

但我们用革命的手段，把帝国主义势力赶走，把旧的制度和统治推翻以后，哪怕只在部分地区取得胜利，例如内战时期的革命根据地，目前的抗日根据地，在我们面前就提出了建设新的社会制度的任务。新社会制度的建立，就是为着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是为着促进经济发展，而且只有经济发展了才能使新的社会制度获得巩固的基础。并且还因为中国革命的长期性，一方面为着革命与战争事业的物质供给的需要，另一方面为着改善人民生活的需要，都必须从事经济建设的工作。我们不应该也不可能等候把全部敌人打平后，才去进行建设工作。加以中国地方的广大，要使全国人民都信服我们所指出的道路的正确而拥护我们，参加革命奋斗，也需要我们拿出建设的榜样给他们看，才能做得到。

毛主席指示我们说：要破坏妨碍生产力发展的旧政治、旧军队、旧政府，例如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与汉奸，这些妨碍生产力发展的军事政治力量不取消，生产力就不能解放，经济就不能发展。因此第一个任务就是打倒妨碍生产力发展的军事政治力量，这就是为着解放生产力。学过社会科学的同志懂得这一条，最根本的是生产力向上发展的问题。我们搞了多少年就是为了这件事。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主要的就是讲的这件事，就是讲生产力在历史上是如何发展起来的。毛主席的指示也就是告诉我们一个真理，即革命是为着建设，而建设的根本就是

发展经济。

一切只能够破坏而不善于建设的政党，都是不能够获得最后成功而必然是要失败的。我们共产党人如果只晓得用战争和暴力来推翻旧的制度和统治，而不善于建设新的丰衣足食的幸福快乐的社会，那我们也是不会胜利的，而且也一定要失败的。毛主席曾经说过：“我们不但应该会办政治，会办军事，会办党务，会办文化，我们也应该会办经济。如果我们样样能干，唯独对于经济无能，那我们就是一批无用之人，就要被敌人打倒，就要陷于灭亡。”毛主席说的也就是这个道理。

我们陕甘宁边区，今天是处在相对和平环境，而且大部分地区是经过了土地革命的，没有经过土地革命的地区，也比较彻底地实行了减租减息。在没有战争直接威胁的条件之下（自然我们要随时准备战争），建设边区的最基本的、最中心的而且是最迫切的任务，就是动员全党领导所有的人民和部队来进行经济建设的各方面的工作。

这种经济建设的基本方针，早在一九四一年，当时的边区中央局即现在的西北局就已经明确地提出来了，去年^{〔2〕}高干会期间毛主席写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小册子，更规定了经济建设中各种具体问题的方针和办法。对农业第一的基本方针，边区的党和干部从实践中是有了比较深刻的了解，但对其他方面的认识和政策的研究，还是不够的。西北局对各种政策虽然已经有了指示，但应当说各地委和县委对贸易、金融和财政问题在整个边区经济建设中的重要性，还是缺乏明确认识的。

去年下半年以来，因为金融物价的波动，虽然已经开始引起了地方党的注意，但对于这方面问题的调查研究和政策的讨论，以及负责任地来掌握这些政策，贯彻执行这些政策，还是

非常不够的，甚至于还没有完全把它看成是自己担负的责任，以为这是物资局、财政厅、银行的责任。而在这些系统的工作同志，认为自己的工作只能够受本系统的上级领导，当地的地委县委不能够干涉，闹独立性，使地委县委也难于去管理他们。必须指出，这些情形的存在，对边区经济建设的开展是有很大妨碍的。

去年下半年开始的金融波动，对边区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的生活，是起了很坏的影响的，而且遭受了不小的损失，但也有一个积极的因素，就是大家从切身困难中，引起了对金融、贸易、财政问题的注意，这也是为什么要召开这次高级干部会的一个重要原因，使我们在这次高级干部会上能够和必须向全党提出贸易、金融、财政问题的重要性，把过去的经验教训加以总结，订出今后努力的方针。我想这次高干会以后，应当是可以引起全党在思想上认识贸易、金融、财政工作的重要，认识贸易、金融、财政工作是组织全部经济生活的重要环节，离了它们，或对它们采取了错误方针，全部经济生活就会停滞或受到障碍，因此我们应该积极想出许多合乎实际的办法，来改进这方面的工作。

从这次金融波动中，也使我们大家认识到财经工作的复杂性，要求我们以认真的态度细致地工作，决不是粗枝大叶，凭主观设想可以把事情搞好的。每项有关经济的措施和政策的决定，都要直接影响到广大人民生活的安定与否和政府财政的收入；经济上的设施一旦弄错，就可以很迅速地招致极大的危害和损失。特别是在与敌人作经济斗争的时候，更不能有所差错，有如指挥作战一样，如果不能正确地判断情况，灵活运用政策，就可能遭受失败；相反，如果情况了解，措施适当，也就可以获得胜利。比如在边区内，某几种货物规定要用法币交

易，结果会促成金融更加波动，引起物价高涨，人心不安，党的政治影响受到损失；相反，决定这几种货物在边区内贸易和在对外贸易时一律改为边币交易，边币市场马上扩大，购买力提高，物价也随着稳定，甚至下跌，边币的信用立即提高了。又如法币贬值时，外面物价高涨，我们不明情况，或者明知法币低落而不去适当地提高出口货物的价格，结果使我们的物资被人家套购出去了，或者变成了不等价交换，使我们蒙受很大的损失。相反，当法币回涨，物价低落，我们不知道按情况降低出口货物的价格，结果使我们的货物卖不出去，造成入超，也会使我们受到很大的损失。这些情形告诉我们，要把金融、贸易、财政工作做好，必须依靠我们正确地、艺术地、及时地去掌握政策，运用政策；否则，是会把事情弄坏的。

因此，在边区党的面前提出学会经商、搞好贸易的任务。须知商业贸易是有数千年的发展史，积累有非常丰富而复杂的学问，绝非一个门外汉所能立即精通的。年来我们参加贸易机关工作的同志，虽然在实践中也学会了一些，有了许多业务上的改进，这都是很大的进步。然而商业是一门复杂的学问，“行行出状元”，这一句话说明任何一个职业都有其精微奥妙的高深知识，绝不能看成是轻而易举的事，要学会一行，就必须虚心地从那一行的 ABC 学起才行。

列宁说：“问题是在于负责的共产党员——虽然是最好的，虽然是非常诚实，忠心耿耿的，虽然他曾经忍受过苦役而不畏死难，但他却不会做买卖，因为他不是一个经营商业的人，他没有学习过怎样做生意，也不愿意学习，也不了解他必须从 ABC 学起。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干过世界上最伟大革命的革命家，一个为众目所注视（如果不是为四十个金字塔所注目，则无论如何是为欧洲的四十个国家所注目）而抱着从资本主义

下面解放出来的希望的人——他应当从一个普通的店员学习起，这个店员有十年的商店经验，他懂得怎样做生意；而负责的共产党员与忠实的革命家，却不仅不知道经营商业，而且甚至他还没有觉悟到他并不知道怎样去经营商业这回事。”

的确，我们有许多同志，很好的干部，很诚实，甚至是很负责的干部，正如列宁所说他还没有觉悟到他并不知道怎样去经营商业这回事。现在许多同志，至少这次到会的同志知道了搞商业，搞金融贸易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正表示我们在这方面是有了进步。

经济建设工作既是当前任务的中心环节，而在这些方面我们又还存在着许多的缺点错误，需要加以纠正和改进，因此，我们在这方面必须培养大批建设工作干部，不仅是供给这一个区域的需要，而且要把这方面有经验的干部供给到敌后各个抗日根据地去。各地党组织应当下决心抽出一部分真正能够掌握政策而且党性又好的负责干部，让他们参加贸易、金融、财政机关的工作，以健全财经机构，这不仅是为着解决目前的问题，还要使他们专门向贸易、金融、财政和管理企业方面去发展，培养成为我们建国的专门人才。这是在我们全党面前已经被提出来的严重任务。

这次高级干部会议决定了对金融贸易财政工作的方针，到会的同志都有了新的认识，但还有许多具体问题，需要各地到会同志回去以后，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加以妥善的解决。

同志们，经济战线上的斗争是复杂的，其紧张的程度犹如军队作战一样，因此必须强调领导的统一。闹独立性，闹本位主义，互相竞争，不服从决议，破坏政策法令等，都只能是混乱自己的阵线，在客观上帮助敌人。这次高干会决定，各地金融、贸易、财政工作必须统一于各个地委的领导之下，各地委

又必须统一于西北局及财经办事处领导之下。各地委的负责同志，应当看到自己的责任是大大地加重了，必须加倍努力把事情搞好。我们相信在加强领导之后，经济战线的事情是一定可以办好的，我们的建设任务是一定能够完成的！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出版的
《任弼时选集》刊印。

注 释

〔1〕旧时，陕西关中地区把那些由土地不足的贫苦农民结合起来集体出雇，为别人耕种以取得工资的组织称之为唐将班子。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唐将班子是一种劳动互助的组织形式。

〔2〕应为前年。

毛泽东给陈毅的信

(一九四四年四月九日)

陈毅同志：

来信已悉，并送少奇^{〔1〕}同志阅看。凡事忍耐，多想自己缺点，增益其所不能；照顾大局，只要不妨大的原则，多多原谅人家。忍耐最难，但作一个政治家，必须练习忍耐，这点意见，请你考虑。感冒宜多睡，少动多食。余容面叙。

敬礼！

毛 泽 东

四月九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三卷刊印。

注 释

〔1〕即刘少奇。

学习和时局^{*}

(一九四四年四月十二日)

毛泽东

—

去年冬季开始，我党高级干部学习了党史中的两条路线问题。这次学习使广大高级干部的政治水平大大地提高了。在这次学习中，同志们提出了许多问题，中央政治局曾对其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作了结论。这些结论是：

(一) 关于研究历史经验应采取何种态度问题。中央认为应使干部对于党内历史问题在思想上完全弄清楚，同时对于历史上犯过错误的同志在作结论时应取宽大的方针，以便一方面，彻底了解我党历史经验，避免重犯错误；又一方面，能够团结一切同志，共同工作。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反对陈独秀错误

* 为着进一步地提高党的干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三年这个时间内，曾经几次进行了关于党的历史的讨论；随后又在一九四三年到一九四四年这个时间内，领导全党高级干部进行同样的讨论，大大地帮助了党内思想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统一。这个讨论为一九四五年召集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作了重要的准备，使那次大会达到了中国共产党前所未有的思想上政治上的一致。本文就是毛泽东一九四四年四月十二日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和五月二十日在中央党校第一部对于这个讨论所作的讲演。

路线和李立三错误路线的大斗争，这些斗争是完全应该的。但其方法有缺点：一方面，没有使干部在思想上彻底了解当时错误的原因、环境和改正此种错误的详细办法，以致后来又可能重犯同类性质的错误；另一方面，太着重了个人的责任，未能团结更多的人共同工作。这两个缺点，我们应引以为鉴戒。这次处理历史问题，不应着重于一些个别同志的责任方面，而应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借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对于人的处理问题取慎重态度，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损害同志，这是我们的党兴旺发达的标志之一。

（二）对于任何问题应取分析态度，不要否定一切。例如对于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时期中央的领导路线问题，应作两方面的分析：一方面，应指出那个时期中央领导机关所采取的政治策略、军事策略和干部政策在其主要方面都是错误的；另一方面，应指出当时犯错误的同志在反对蒋介石、主张土地革命和红军斗争这些基本问题上，和我们之间是没有争论的。即在策略方面也要进行分析。例如在土地问题上，当时的错误是实行了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过左政策，但在没收地主土地分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这一点上，则是和我们一致的。列宁说，对于具体情况作具体的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我们许多同志缺乏分析的头脑，对于复杂事物，不愿作反复深入的分析研究，而爱作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简单结论。我们报纸上分析文章的缺乏，党内分析习惯的还没有完全养成，都表示这个毛病的存在。今后应该改善这种状况。

（三）关于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的讨论。应该指

出，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路线是基本上正确的，因为它确定了现时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确定了当时形势是处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批判了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发布了十大纲领等，这些都是正确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亦有缺点，例如没有指出中国革命的极大的长期性和农村根据地在中国革命中的极大的重要性，以及还有其他若干缺点或错误。但无论如何，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我党历史上是起了进步作用的。

（四）关于一九三一年上海临时中央及在其后由此临时中央召开的五中全会是否合法的问题。中央认为是合法的，但应指出其选举手续不完备，并以此作为历史教训。

（五）关于党内历史上的宗派问题。应该指出，我党历史上存在过并且起了不良作用的宗派，经过遵义会议以来的几次变化，现在已经不存在了。这次党内两条路线的学习，指出这种宗派曾经在历史上存在过并起了不良作用，这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如果以为经过一九三五年一月的遵义会议，一九三八年十月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九四一年九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一九四二年的全党整风和一九四三年冬季开始的对于党内历史上两条路线斗争的学习，这样许多次党内斗争的变化之后，还有具备原来的错误的政治纲领和组织形态的那种宗派存在，则是不对的。过去的宗派现在已经没有了。目前剩下的，只是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思想形态的残余，我们继续深入地进行整风学习，就可以将它们克服过来。目前在我们党内严重地存在和几乎普遍地存在的乃是带着盲目性的山头主义倾向。例如由于斗争历史不同、工作地域不同（这一根据地和那一根据地的不同，敌占区、国民党统治区和革命根据地的不同）和工作部门不同（这一部分军队和那一部分军队的不同，这一种工作和那一种工作的不同）而产生的各部分同志间

互相不了解、不尊重、不团结的现象，看来好似平常，实则严重地妨碍着党的统一和妨碍着党的战斗力的增强。山头主义的社会历史根源，是中国小资产阶级的特别广大和长期被敌人分割的农村根据地，而党内教育不足则是其主观原因。指出这些原因，说服同志们去掉盲目性，增加自觉性，打通同志间的思想，提倡同志间的互相了解、互相尊重，以实现全党大团结，是我们当前的重要任务。

以上所说的问题，如能在全党获得明确的理解，则不但可以保证这次党内学习一定得到成功，而且将保证中国革命一定得到胜利。

二

目前时局有两个特点，一是反法西斯阵线的增强和法西斯阵线的衰落；二是在反法西斯阵线内部人民势力的增强和反人民势力的衰落。前一个特点是很明显的，容易被人们看见。希特勒不久就会被打败，日寇也已处在衰败过程中。后一个特点，比较地还不明显，还不容易被一般人看见，但是它已在欧洲、在英美、在中国一天一天显露出来。

中国人民势力的增强，要以我党为中心来说明。

我党在抗日时期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〇年为第一个阶段。在此阶段的头两年内，即在一九三七年和一九三八年，日本军阀重视国民党，轻视共产党，故用其主要力量向国民党战线进攻，对它采取以军事打击为主、以政治诱降为辅的政策，而对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则不重视，以为不过是少数共产党人在那里打些游击仗罢了。但是自一九三八年十月日本帝国主义者占领武汉以后，他们即已开始

改变这个政策，改为重视共产党，轻视国民党；改为以政治诱降为主、以军事打击为辅的政策去对付国民党，而逐渐转移其主力来对付共产党。因为这时日本帝国主义者感觉国民党已不可怕，共产党则是可怕的了。国民党在一九三七年和一九三八年内，抗战是比较努力的，同我党的关系也比较好，对于人民抗日运动虽有许多限制，但也允许有较多的自由。自从武汉失守以后，由于战争失败和仇视共产党这种情绪的发展，国民党就逐渐反动，反共活动逐渐积极，对日抗战逐渐消极。共产党在一九三七年，因为在内战时期受了挫折的结果，仅有四万左右有组织的党员和四万多人的军队，因此为日本军阀所轻视。但到一九四〇年，党员已发展到八十万，军队已发展到近五十万，根据地人口包括一面负担粮税和两面负担粮税的^{〔1〕}，约达一万万。几年内，我党开辟了一个广大的解放区战场，以至于能够停止日寇主力向国民党战场作战略进攻至五年半之久，将日军主力吸引到自己周围，挽救了国民党战场的危机，支持了长期的抗战。但在此阶段内，我党一部分同志，犯了一种错误，这种错误就是轻视日本帝国主义（因此不注意战争的长期性和残酷性，主张以大兵团的运动战为主，而轻视游击战争），依赖国民党，缺乏清醒的头脑和缺乏独立的政策（因此产生对国民党的投降主义，对于放手发动群众建立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和大量扩大我党领导的军队等项政策，发生了动摇）。同时，我党吸收了广大数目的新党员，他们还没有经验；一切敌后根据地也都是新创的，还没有巩固起来。这一阶段内，由于时局开展和党与军队的发展，党内又生长了一种骄气，许多人以为自己了不得了。在这一阶段内，我们曾经克服了党内的右倾偏向，执行了独立政策，不但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创立了根据地，发展了八路军新四军，而且打退了国民党的第一次反共

高潮。

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为第二阶段。日本帝国主义者为准和和执行反英美的战争，将他们在武汉失守以后已经改变了的方针，即由对国民党为主的方针改为对共产党为主的方针，更加强调起来，更加集中其主力于共产党领导的一切根据地的周围，进行连续的“扫荡”战争，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着重地打击我党，致使我党在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这两年内处于极端困难的地位。这一阶段内，我党根据地缩小了，人口降到五千万以下，八路军也缩小到三十多万，干部损失很多，财政经济极端困难。同时，国民党又认为他们已经闲出手来，千方百计地反对我党，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和日本帝国主义配合着进攻我们。但是这种困难地位教育了共产党人，使我们学到了很多東西。我们学会了如何反对敌人的“扫荡”战争、“蚕食”政策、“治安强化”运动、“三光”政策和自首政策；我们学会了或开始学会了统一战线政权的“三三制”政策、土地政策、整顿三风、精兵简政、统一领导、拥政爱民、发展生产等工作，克服了许多缺点，并且把第一阶段内许多人自以为了不得的那股骄气也克服下去了。这一阶段内，我们虽然受了很大的损失，但是我们站住脚了，一方面打退了日寇的进攻，一方面又打退了国民党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因为国民党的反共和我们不得不同国民党的反共政策作自卫斗争的这些情况，党内又生长了一种过左的偏向，例如以为国共合作就要破裂，因而过分地打击地主，不注意团结党外人士等。但是这些过左偏向，也被我们克服过来了。我们指出了在反磨擦斗争中的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指出了在统一战线中又团结又斗争和以斗争求团结的必要，保持了国内和根据地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一九四三年到现在为第三阶段。我们的各项政策更为见效，特别是整顿三风和发展生产这样两项工作，发生了根本性质的效果，使我党在思想基础和物质基础两方面，立于不败之地。此外，我们又在去年学会了或开始学会了审查干部和反对特务的政策。在这种情形下，我们根据地的面积又扩大了，根据地的人口，包括一面负担和两面负担的，又已上升到八千余万，军队又有了四十七万，民兵二百二十七万，党员发展到了九十多万。

一九四三年，日本军阀对中国的政策没有什么变化，还是以打击共产党为主。从一九四一年至今这三年多以来，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在华日军是压在我党领导的各个抗日根据地身上。三年多以来，国民党留在敌后的数十万军队经不起日本帝国主义的打击，约有一半投降了敌人，约有一半被敌人消灭，残存的和撤走的为数极少。这些投降敌人的国民党军队反过来进攻我党，我党又要担负抗击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伪军。国民党只担负抗击不到百分之四十的日军和不到百分之十的伪军。从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起，整整五年半时间，日本军阀没有举行过对国民党战场的战略进攻，只有几次较大的战役行动（浙赣、长沙、鄂西、豫南、常德），也是早出晚归，而集中其主要注意力于我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在此情况下，国民党采取上山政策和观战政策，敌人来了招架一下，敌人退了袖手旁观。一九四三年国民党的国内政策更加反动，发动了第三次反共高潮，但是又被我们打退了。

一九四三年，直至今年春季，日寇在太平洋战线逐渐失利，美国的反攻增强了，西方的希特勒在苏联红军严重打击之下有摇摇欲倒之势。为救死计，日本帝国主义想到要打通平汉、粤汉两条铁路；又以其对重庆国民党的诱降政策还没有得

到结果，有给它以再一次打击之必要，故有在今年大举进攻国民党战线的计划。河南战役已打了一个多月。敌人不过几个师团，国民党几十万军队不战而溃，只有杂牌军还能打一下。汤恩伯部官脱离兵，军脱离民，混乱不堪，损失三分之二以上。胡宗南派到河南的几个师，也是一触即溃。这种情况，完全是几年来国民党厉行反动政策的结果。自武汉失守以来的五年半中，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战场担负了抗击日伪主力的重担，这在今后虽然可能发生某些变化，但这种变化也只能是暂时的，因为国民党在五年半以来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政策下所养成的极端腐化状态，今后必将遭到严重的挫败，到了那时，我党抗击敌伪的任务又将加重了。国民党以五年半的袖手旁观，得到了丧失战斗力的结果。共产党以五年半的苦战奋斗，得到了增强战斗力的结果。这一种情况，将决定今后中国的命运。

同志们可以看见，一九三七年七月起至现在止，这七年时间内，在我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力量曾经历了上升、下降、再上升三种情况。我党抗击了日寇的残酷进攻，建立了广大的革命根据地，大大地发展了党和军队，打退了国民党的三次大规模的反共高潮，克服了党内发生的右的和“左”的错误思想，全党学得了许多可宝贵的经验。这些就是我们七年工作的总结。

现在的任务是要准备担负比较过去更为重大的责任。我们要准备不论在何种情况下把日寇打出中国去。为使我党能够担负这种责任，就要使我党我军和我们的根据地更加发展和更加巩固起来，就要注意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工作，要把城市工作和根据地工作提到同等重要的地位。

关于根据地工作，第一阶段内有大的发展，但是不巩固，

因此在第二阶段内一受到敌人的严重打击，就缩小了。在第二阶段内，一切我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都受到了严格的锻炼，比起第一阶段来好得多了；干部和党员的思想政策的水平，大进一步，没有学会的东西，学会得更多了。但是思想的打通和政策的的学习还需要时间，我们还有许多没有学会的东西。我党力量还不够强大，党内还不够统一，还不够巩固，因此还不能担负比较目前更为巨大的责任。今后的问题就是在继续抗战中使我党我军和我们的根据地更加发展和更加巩固，这就是为着将来担负巨大工作的第一个必要的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没有这种准备，我们就不能把日寇赶出去，就不能解放全中国。

关于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工作，我们一向是做得很差的。如果现在我们还不争取在大城市和交通要道中被日本帝国主义压迫的千百万劳动群众和市民群众围绕在我党的周围，并准备群众的武装起义，我们的军队和农村根据地就会得不到城市的配合而遇到种种困难。我们十多年来是处在农村中，提倡熟悉农村和建设农村根据地，这是必要的。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的准备城市起义的任务，没有也不可能在这十多年中间去实行。但是现在不同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要在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实行了。我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不久就可能开会，这次代表大会将要讨论加强城市工作和争取全国胜利的问题。

这几天陕甘宁边区召开工业会议，是有重大意义的。一九三七年边区还只有七百个工厂工人，一九四二年有了四千人，现在有了一万二千人。切不可轻视这样的数目字。我们要在根据地内学习好如何管理大城市的工商业和交通机关，否则到了那时将无所措手足。准备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武装起义，并且学习管理工商业，这是第二个必要的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没有

这种准备，我们也就不能把日寇赶出去，也就不能解放全中国。

三

为了争取新的胜利，要在党的干部中间提倡放下包袱和开动机器。所谓放下包袱，就是说，我们精神上的许多负担应该加以解除。有许多的东西，只要我们对它们陷入盲目性，缺乏自觉性，就可能成为我们的包袱，成为我们的负担。例如：犯过错误，可以使人觉得自己反正是犯了错误的，从此萎靡不振；未犯错误，也可以使人觉得自己是未犯过错误的，从此骄傲起来。工作无成绩，可以使人悲观丧气；工作有成绩，又可以使人趾高气扬。斗争历史短的，可以因其短而不负责任；斗争历史长的，可以因其长而自以为是。工农分子，可以自己的光荣出身傲视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又可以自己有某些知识傲视工农分子。各种业务专长，都可以成为高傲自大轻视旁人的资本。甚至年龄也可以成为骄傲的工具，青年人可以因为自己聪明能干而看不起老年人，老年人又可以因为自己富有经验而看不起青年人。对于诸如此类的东西，如果没有自觉性，那它们就会成为负担或包袱。有些同志高高在上，脱离群众，屡犯错误，背上了这类包袱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所以，检查自己背上的包袱，把它放下来，使自己的精神获得解放，实在是联系群众和少犯错误的必要前提之一。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第一次是在一九二七年上半年。那时北伐军到了武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忘记了国民党将要袭击我们。结果犯了陈独秀路线的错误，使这次革命归于失败。第二次是在一九三〇年。红军利用蒋冯阎^[2]大战的条件，打了一些胜仗，又有一些同志骄傲起

来，自以为了不得。结果犯了李立三路线的错误，也使革命力量遭到一些损失。第三次是在一九三一年。红军打破了第三次“围剿”，接着全国人民在日本进攻面前发动了轰轰烈烈的抗日运动，又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结果犯了更严重的路线错误，使辛苦地聚集起来的革命力量损失了百分之九十左右。第四次是在一九三八年。抗战起来了，统一战线建立了，又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结果犯了和陈独秀路线有某些相似的错误。这一次，又使得受这些同志的错误思想影响最大的那些地方的革命工作，遭到了很大的损失。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所谓开动机器，就是说，要善于使用思想器官。有些人背上虽然没有包袱，有联系群众的长处，但是不善于思索，不愿用脑筋多想苦想，结果仍然做不成事业。再有一些人则因为自己背上有了包袱，就不肯使用脑筋，他们的聪明被包袱压缩了。列宁斯大林经常劝人要善于思索，我们也要这样劝人。脑筋这个机器的作用，是专门思想的。孟子说：“心之官则思。”他对脑筋的作用下了正确的定义。凡事应该用脑筋好好想一想。俗话说：“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就是说多想出智慧。要去掉我们党内浓厚的盲目性，必须提倡思索，学会分析事物的方法，养成分析的习惯。这种习惯，在我们党内是太不够了。如果我们既放下了包袱，又开动了机器，既是轻装，又会思索，那我们就会胜利。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刊印。

注 释

〔1〕这里所说的一面负担粮税的地区，是指根据地的比较巩固的地区，那里的人民只向抗日民主政府负担粮税；两面负担粮税的地区，是指根据地的边缘地区和游击区，在那些地区因为敌人可以经常来骚扰，人民除向抗日民主政府负担粮税外，还经常被迫向敌伪政权缴纳一些粮税。

〔2〕指冯玉祥、阎锡山。

中共中央宣传部、总政治部 关于印发谭政《关于军队政治工作 问题》的通知

(一九四四年四月二十日)

(一) 谭政同志一九四四年四月十一日在西北局高干会上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是八路军新四军政治工作问题的全面总结，其中关于发扬成绩纠正缺点部分，及组织形式工作制度部分，都是八路军新四军全体适用的；关于边区经验部分，亦值得全军重视。八路军新四军连级以上一切政治工作、军事工作、后勤工作干部，应一律将此文件作为整风文件与固定教材，加以研究讨论，并须联系实际，改造自己的思想与工作。对于文化程度低的干部与全军战士，则应根据这一文件的精神与各部队中存在的具体问题，编为通俗教材，进行普遍的教育与检讨。

(二) 这一文件不但特殊地解决了军队政治工作问题，而且也一般地解决了我党历史经验、领导方法与工作作风上的许多问题，为全党干部所应注意；同时，为了了解党的军队工作的方针，为了指导或协助各地军队工作，全党干部亦应研读这个文件。

(三) 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区党委的宣传部与各军区、军分区、及军、师、旅的政治部应负责组织这一学习。

(四) 各地应将此文件印成小本，广为散发，直到连队与区委。

附：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

(一九四四年四月十一日谭政在西北局高干会上的报告)

一、关于边区军队一年经验的总结

从一九四二年冬季西北中央局召集的高干会及军政干部会到现在，已经一年多了。一九四三年的一年，是边区部队大进步的一年。一年的时间，我们在边区部队内解决了一个重大原则性的问题——军阀主义偏向与教条主义偏向的问题，确立了一个以西北局为首的，包括边区党政军民在内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一致的一元化的领导系统，并且发扬了联系群众的与实事求是的领导作风。

还在前年高干会时，我党中央及西北局各同志就指出：八路军、新四军是人民的军队，是有革命优良传统的军队，是在抗日民族战争中全国境内一部分最好的军队。而在陕甘宁边区的八路军，是在基本上完成了党与上级给与他们的任务的，是执行了党与上级的路线的。但是同时又指出：我们的部队由于种种原因，发生了一些偏向，其中最主要的是所谓军阀主义与教条主义的偏向，犯这种毛病的程度各有差别，而当前的任务则是一致起来纠正这种偏向，发扬优良作风，改变不良作风，以便更好地提高部队的战斗力，更好地执行党与上级的政治任务，更好地进行战斗、生产与群众工作，借以达到团结自己、

战胜敌人的目的，推翻日本帝国主义。一年以来，我们就是执行这个指示，并在基本上完成了指示所给予的任务的。

一年工作的结果，在军党关系上，军政关系上，军民关系上，官兵关系上，干部上下级关系上，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关系上及各部分军队间的友好关系上，都有显著的进步，这些都是军阀主义偏向与教条主义偏向曾经借以表现它的地方。在军党关系上（所谓军党关系，即是说我们的军队，必须完全的绝对的无条件的放在共产党及其领导机关的政治指导之下，不能闹独立性），我们不但建立了在边区范围内以西北局为中心，在各分区范围内以地委为中心，同时又保持各自的上下级关系的统一领导，而且更重要的，是在政策思想上，行动步骤上，也趋于一致了。在军队与政府，军队与人民的关系上，经过拥政爱民运动与拥军运动，特别是从一九四三年二月以来，军队方面坚决实行了自我批评，实行了坦白运动，将军党之间，军政之间，军民之间一切不良现象，都讲出来，彻底改变了干部与战士的思想；对民众关系不好者，实行改善关系，归还借物，赔偿损失，争论事件错在军队者实行向民众赔礼道歉；军队又大规模地从事生产自给运动，改善了给养，减轻了民众的负担；军队又以大量的劳动力帮助民众生产；这样就使我们的军政军民关系大大的改善了。在军队内部关系上，无论官兵关系，上下级关系，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的关系，各部分军队之间的友好关系，凡属存在着缺点的，均有了很大的改善。在连队军人坦白大会上，将官兵关系上、连队生活上、个人思想上，一切不良现象、不满心理，都讲出来，激发了他们的积极性、创造性，增进了亲切友爱的空气，纠正了各种不良现象，平复了不满心理，团结了军队内部。所有这些方面，虽然至今仍然存留着若干缺点，并不能说已经完全克服，但和一年前比

较，显然是大不相同了。总而言之，部队中多少存在着的以脱离群众为其主要特点的军阀主义偏向与教条主义偏向，是受到了严重的批判，是基本上被克服了。

在上述这些改造与进步的情形之下，部队的情绪起了很大的变化，过去部队中存在着的若干消极情绪与不良行为，现在一般均已消失，而为新的情绪所代替了。现在的部队，是充满着战斗热情、生产热情与学习热情的部队，是富于朝气的部队。这种热情与朝气，从去年春季开始高涨，一直延续到现在。从去年的开荒、锄草、秋收，往后又紧接着转入整训，中间经过七月间的战斗动员。其特点是：紧张性，普遍性与持久性。现在的部队是充满着进取心的。在生产中，在拥政爱民中，在冬季整训中，都出现了许多动人的事迹，成批的劳动英雄与模范学习者出现了，许多的模范班排、模范连队出现了。部队的组织性与纪律性，是增强了。经过精简改编之后，官多兵少，头重脚轻的现象是被改变了，若干官兵脱节的现象，是被克服了。违反纪律的现象也大大减少了。

在这个伟大的运动中，某些环节上的领导作风有了大的转变，军阀主义作风与教条主义作风都受到了批判。现在极大地发扬起来的作风，是联系群众的作风，是实事求是的作风了。

所以我们说，去年一年是我们部队的领导作风大进步的一年。由于有了这种进步，才获得了去年一年真正伟大的成绩，获得了在我们部队中实行整顿三风的成绩，精兵简政的成绩，拥政爱民的成绩，生产运动的成绩，防止奸细的成绩与冬季整训的成绩。如果没有领导作风上的进步，这样大的成绩是不可能的。

陕甘宁边区部队的特点，就是它是后方留守的部队。它守备了数百里河防，但因前方部队的英勇作战敌人还不敢越河进

攻。这些都是和前方部队不同的。但其他一切则都大体相同。特别是在领导作风问题上，陕甘宁边区部队的进步，可以为一切八路军新四军部队所仿效。我们是怎样取得这种进步的呢？

这种领导作风的进步，其过程是从军党关系到军政关系，军民关系，从军队总的领导关系到官兵关系，上下级关系，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的关系，各部分军队之间的友好关系。以官兵关系，上下级关系而论，又是从高级干部到一般干部，从干部到士兵，从党员到非党员。如果去年的进步不是各方面的一系列的进步，而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去做；如果去年的进步不是首先抓住军队总的领导关系，亦即抓住高级领导干部，使之打通自己的思想，改变自己的作风，无条件地服从党的指导，作为推动一般干部，影响士兵群众的前提，而是只从下级与士兵身上求解决；如果我们的同志在领导上确有毛病，而在检讨这些毛病时，却畏首畏尾，患得患失，不肯揭露自己的错误；那末，这种伟大的进步就将成为不可能，至少是不会有这样大与这样快的成绩。去年一年的经验证明，凡是依照这种精神与这种方法做去的，成绩就很大，进步就很快。反之，成绩就不大，进步就是很慢的。

去年的经验证明，干部的思想改造工作，是极其重要，也是极其艰巨的。干部思想的进步是一切工作进步的枢纽，只有在干部思想有了进步之后，工作的进步才是真正可靠的进步，而如若离开思想进步去求什么工作上的进步，便必然只会是表面的与形式的。在一定物质基础之上，思想掌握一切，思想改变一切，这个真理，已为去年的经验所完全证实。如果我们要从若干错误的领导作风变到正确的领导作风，要从军阀主义偏向与教条主义偏向表现得最典型的部队，在改变这种作风之后，就能飞跃地前进，要使落后分子改变为积极分子，要使自

由主义的空气改变为原则立场的空气，要使不好的官兵关系、军民关系改变为好的官兵关系、军民关系，如此等等，都是要从人们思想的进步才能进到行动的进步。差不多可以说，思想的进步过程，就是工作的进步过程，就是群众情绪的进步过程。哪里思想改造做得愈彻底，那里的工作，那里的群众情绪，那里的工作作风的进步也就愈彻底。

根据去年的经验，使我们懂得，对于犯有错误的人们改造其思想，是应该有步骤的，大体上应该是：第一步，揭露错误；第二步，反省错误；第三步，改正错误。没有前两个步骤，就不可能实现后一个步骤。在一切存在着毛病的部队中，三个步骤中，头一个是首先重要的。没有这个步骤，或这个步骤进行得不彻底，就是说，不揭露错误的本质，不对明明错了的东西进行认真的批评，就不能警惕干部，就不能发动干部对于检讨错误、批评错误的积极性。而对于犯错误的人来说，不揭露错误，就无法测知他对自己错误的态度，就无法使他进行自我反省，即使反省，也会多是表面的，应付的，没有下决心的，因而要他改正是不可能的。去年，边区各地部队曾经检讨过那里的错误，检讨那里的官兵关系与军民关系，开过坦白大会，进行斗争反对军阀主义偏向以及那种对于这个偏向采取满不在乎的态度，即所谓自由主义的态度，一次没有做好的又来第二次，第三次，最后果然是做好了。那些至今还没有做好的，便是对于揭露错误做得不彻底，或做得不适当。

但是这里所谓揭露错误，是有方针，并有具体目标的，而不是轻率的随意的指责。我们的方针就是教育干部，改造干部；就是教育士兵，改造士兵；而不是毁伤干部，谩骂干部；而不是毁伤士兵，谩骂士兵。只要犯错误的同志大胆地揭露自己的错误，诚恳地反省自己的错误，并有决心改正自己的错

误，就不采取过火的斗争方法，不采取处罚与打击的方法。在整个整风运动中，我们是执行了这个方针的，除了少数几个真正的坏分子之外，对一切有毛病的同志，都是没有执行纪律处分的。一时转变不了的，在整风班及干部队慢慢进行改造。我们这样做，是收到了效果的，大部分有毛病的人都转变过来了，许多人并且转变得很好。干部中缺乏和蔼态度，缺乏勤勤恳恳教育士兵的态度，缺乏问寒问暖关心士兵生活的态度，缺乏关心民众疾苦的态度，缺乏廉洁奉公态度的人，现在是改变了，学好了。干部学好了，士兵也学好了。士兵中的二流子变为好人了，想开小差的不开小差了，不满的满意了，破坏纪律的遵守纪律了，懈怠的勤劳了。总之，不论官兵，都面目一新了。这里，我引一个边区部队中的典型例子来说明党的这个方针的正确性。

下面是一个部队的工作报告：

“思想上的转变，可以部队中积极分子的增多和落后分子的减少来说明。在去年三月刚整编时，党员积极分子只有七十七人，非党积极分子只有三十一人。而到去年十二月，党员积极分子增加为一百六十二人，非党积极分子增加为九十五人。刚整编时，党员落后分子有五十五人，非党落后分子有八十二人。去年十二月，党员落后分子减少为八人，非党落后分子减少为十五人。可见这个变化是很大的。”

“干部中贪污浪费，私人做生意，只顾自己享受，不关心士兵生活的现象是被克服了。例如，一九四一年，那时采取了单纯处罚的方法，对于犯贪污浪费等错误的干部撤消了十多个，其中计有营长两名，政教两名，连长两名，政指两名，卫生队长一名，民运干事一名。但在一九四二年，同样的不良现象，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多了。如果依然采取单纯的处罚方

法的话，那就要撤换更多的人，并且事情也一定不会变好。但在一九四三年，我们根据上级的指示，废止了单纯处罚的方法，采取了改造思想的方法，一个人也没有撤换。经过整风与反省，经过坦白大会，经过生产运动与练兵运动，过去犯错误的人都在这种伟大的运动中转变过来了，还是这些人，但是一个整年中没有发现一个再犯严重错误的人。”

上述的这个部队，是边区部队中工作与纪律最不好的部队，这是极坏的典型。但因为揭露了错误，展开了群众的自我批评，改变了领导作风，提出了正确的积极的任务，并且掌握了治病救人的方针，便很快的转变过来了。至于大多数工作基础好的或较好的部队，一经按照正确方针认真整顿，其进步更是很快的。

由此可见，工作的做好，纪律的维持，是建筑在领导正确与群众自觉的基础之上的。如果没有领导正确这个条件，正如列宁所说：“整饬纪律的企图，将不免流为空谈和虚妄。”而在领导正确这个条件一经获得之后，就要着重群众的自觉，去年的经验，也完全证明这一点。过去许多领导机关，对于干部及群众中发生的消极现象，不去检查领导，不去从转变领导着手；不去掌握思想，不去从改造思想着手；并且对于犯错误的人们不去从爱护观点出发促其反省与自觉，而只会用简单的处罚方法，实在都是不正确的。因此，只有从爱护观点出发，从揭露具体的错误到督促犯错误者（包括干部与士兵）反省自己的错误，勤勤恳恳地好心好意地推动他们自动的改正自己的错误，这样一个路线，才是完全正确的路线。

这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都是有作用的，不可偏废。但是批评是为着启发自我批评，在某种意义上讲，是以批评的手段，达自我批评的目的。在过去一个时期内，部队中以

改造思想为目的的整风运动中，斗争目标是集中在克服军阀主义偏向与对此偏向的自由主义态度上面，所谓揭露错误也就是揭露这些，这些目标以外的东西，只是联系着它（可以联系与需要联系的），而不去强调它。不要企图同时改正一切不良的东西，而应集中力量批判最主要的一点，其余就会迎刃而解。在一定的斗争目标下，对于联系具体的人一点来说，也只应该选择典型，不应该采取平均主义。这种典型的批评方法与典型的教育方法，是最有力量与最有教育意义的正确方法；平均主义的批评方法与教育方法，则是最没有力量、最没有教育意义的错误方法。

去年一年，我们在部队的实践中，发扬了统一领导的思想，拥政爱民的思想，生产自给的思想，提高军事技术的思想与防制奸细分子的思想。在这些思想的教育与实践中，不但军阀主义偏向受到了批判，教条主义偏向也就同时受到了批判。我们的军政干部，在进行工作时，已经能够不受教条主义作风所束缚，抛弃了脱离实际、专尚空谈，重视形式、轻视内容，团结少数、脱离多数的那些不良作风，而懂得了遇事从分析具体情况出发，并懂得了选择典型与抓住典型的方法；懂得了不但要注意事件的形式，尤其要注意事件的内容；懂得了不但要照顾少数，尤其要照顾多数。在进行教育时，懂得采取启发诱导与检讨反省的方法，懂得宣传张治国的作风与门善德的作风，懂得组织张治国运动与门善德运动。这样，就使得我们的教育工作，从教条主义、形式主义、平均主义、孤立主义的束缚中，从脱离实际的抽象概念中，解放出来。

去年一年的经验使我们懂得，领导作风上的军阀主义偏向与教条主义偏向，其共同结果，都是脱离群众，而教条主义则特别表现于脱离具体的实践，而以抽象的空喊与形式的整齐为

满足。反之，去年工作之所以取得伟大的成绩，还因为我们在克服军阀主义偏向之时，我们就从基本上克服了教条主义的领导方法，采取了我党中央所指示的正确的领导方法。这种领导方法的主要特点，就是“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具体指导相结合”。每一运动，每一工作，都是先使组成领导核心的各级主要干部先懂得，然后采取群众路线，通过群众去进行思想动员与舆论动员，使一般干部与广大群众也懂得，然后才动手去做。在动员的过程中，都是根据各旅各团的情况去规定各旅各团的总计划（一般号召），然后根据这种旅团的计划及各单位的情况去更具体地规定班排连营的计划，以至每一个人的计划（具体指导）。在执行的过程中，又根据实践经验去检查这些计划，并修正这些计划，使高了的减低些，低了的提高些（具体指导）。在动员过程中，又是使政治工作同志与军事工作同志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在每一部队中最有威信的首长的统一指导下，协同一致地去做，故无各自为政之弊。

去年许多大的工作，都采取了革命竞赛的方式。但当群众的情绪还没有感觉到需要实行竞赛的时候，就不应发动竞赛。当这种竞赛情绪在群众中酝酿到大体上成熟了的时机，便应立即号召竞赛，并用一切力量组织这种竞赛。这种时机成熟的标志，就是不仅积极分子方面精神上已有充分准备，而且中间分子方面（他们往往占多数）与落后分子方面，也已有了相当程度的准备，否则竞赛便会变成少数人突出，只是少数人在做，不是多数人也能做起来的。去年生产运动开始时，有些部队发动竞赛的时机选择得不适当，发动过早，只看到少数积极分子的情绪，没有照顾中间分子与落后分子的情绪，结果这种竞赛的号召便落了空。后来照顾了中间分子与落后分子，重新组织

竞赛，便得了成功。在生产运动与练兵运动中，凡是不但照顾了中间分子，而且照顾了落后分子的，竞赛热情就愈弄愈高，竞赛规模就愈弄愈大，一直坚持到底，完全成了群众自己的事业，不要领导方面的督促。我们必须懂得，在各种人们的觉悟程度上，中间分子比较积极分子是有距离的，落后分子比较中间分子又是有距离的。领导的任务，就是在于团结积极分子，吸引中间分子，鼓励落后分子。而我们团结积极分子的全部目的，就是在于吸引中间分子与鼓励落后分子一道儿前进。离开这个目的，积极分子就失去作用，我们组织积极分子的工作，就是多余的事。因此，在任何一个带群众性的运动中，在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上，在我们的组织步骤上，首要的问题，是照顾中间分子和落后分子的问题。要从中间分子甚至落后分子的水平出发，要选择为中间分子与落后分子也能接受的组织形式与工作方法，要适应中间分子与落后分子的进度，而规定整个运动的进度。例如，我们在部队的生产运动中组织张治国运动，郝树才运动，胡青山运动，赵占奎运动（不是职工运动的赵占魁），武生华运动，冯振僧运动，冯国玉运动是很好的，很必要的。因为这些部队中的先进战士与先进的初级下级干部，是本部队生产运动或整训运动中涌现出来的，为本部队战士群众所熟知与亲眼见到，容易吸引中间分子与鼓励落后分子，容易为他们所理解，容易激起他们的上进心。因为群众是从自己的切身经验来体会问题，不是从口号来体会问题的。如果我们的鼓动是脱离具体人物、具体事迹的鼓动，便无法使群众了解，无法激起他们的上进心。但是当我们鼓励中间分子与落后分子向先进分子看齐时，必须不忘记中间分子与落后分子的特点。例如在生产的劳作形式上，必须依据体力强弱，并采取相当的自愿原则，将劳动力划分为甲乙丙三等，采取不同内

容与不同程度的劳作形式，较之平均主义的与完全命令式的劳作形式，就会更为广大群众所欢迎。如果我们没有这种分别，我们就会要脱离群众。

在改造落后分子的工作中，主要应采取耐心感化的方法，禁用单纯惩办的方法。对于逃兵也不是单纯惩办方法所能解决问题的，必须采用教育感化方法，更要绝对禁止枪毙逃兵。在这里，首长们从爱护观点出发的亲切谈话是最有效力的，一定要把这种首长谈话与群众中的自我检讨自我教育配合起来，才能发生更大的效力。单纯的惩办，甚至打骂的方法，只是一种脱离群众而毫无效果的方法。军队中一定要废止谩骂与肉刑，坚决执行一九二九年四军古田会议的决议，一定要把从爱护观点出发从治病救人出发的勤勤恳恳好心好意的教育感化工作，去代替谩骂与肉刑（打人），去代替单纯的处罚方法，并且一定要把谩骂与肉刑以外的、必要的、即按照实情必不可少的正当处罚方法，也减少到最低限度。非在十分必要的情形之下，决不轻易采用处罚方法。

一年的经验是很多的，我在这里讲得很不完全，例如整顿三风，精兵简政，拥政爱民，生产运动，练兵运动与防奸运动，均有各自的宝贵经验，我在这里没有一一说到。我所指出的，只是一些共通的主要的经验。并且也不是说，我们部队的军阀主义偏向与教条主义偏向，已经全部的与最后的克服了，不，不是这样。我们部队中存在着的军阀主义偏向只是受到了严重的批判，将它表现在军党关系、军政关系、军民关系、官兵关系、干部上下级关系、政治工作与军事工作关系以及各部分军队间友好关系上的显著不良倾向加以克服，基本上改善了各种关系，并不是说这些关系已经完全的最后的改善。要使各种关系获得更加完满的改善，并使之巩固起来，成为根深蒂固

坚强不拔的东西，我们还须继续做很多的工作。至于爱好空谈、脱离实际，重视形式、轻视内容，团结少数、脱离多数的教条主义作风，在过去一年中也是受到了批判的，但是还没有全部克服，尤其是从历史上检讨这个问题，过去我们还没有做。下面我就想就全军的历史问题加以检讨，而着重于政治工作中教条主义作风与实事求是作风两种作风的比较与分析，着重于政治工作中成绩与缺点的比较与分析。至于军事工作方面的教条主义偏向，这里暂时不去提他。

二、关于发扬政治工作中的成绩与纠正政治工作中的缺点

中国共产党从它参加与领导中国民族民主革命以来，从它参加与领导为这个民族民主革命而战的革命军队以来，就创设了并发展了军队中的革命的政治工作。这种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是以民族民主革命的纲领教育军队，是以人民革命的精神教育军队，使革命军队内部趋于一致，使革命军队与革命人民、革命政府趋于一致，使革命军队完全服从革命政党的政治领导，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并进行瓦解敌军、协和友军的工作，达到团结自己，战胜敌人，解放民族，解放人民的目的。这就是我们的军队和其他军队的原则区别。我们说，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政治工作是革命军队的生命线，就是指的这个意思。拿了这种革命的政治工作去和革命的军事工作相配合，就成了革命军队的全部工作。北伐战争时期，共产党人在国民革命军中所指导的政治工作是这样做的；国内战争时期与抗日战争时期，我党在过去的红军中与现在的八路军新四军中所指导的政治工作，更是这样做的。共产党人在这三个时期的革命军

队中所做的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都是收到了成效的。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彻底拥护人民利益的军队。如果我们的军队没有共产党领导，如果没有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军事工作与革命的政治工作，那是不能设想的。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不可能有彻底拥护人民利益的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而如果没有这种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的军队，就不可能是彻底拥护人民利益的军队。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之所以能够如此英勇坚持，艰苦奋斗，再接再厉，百折不回，其根本原因就在这里。这种革命的政治工作，也不但是我们军队的政治工作人员做的，许多的军事工作人员及其他人员也都参加了这种工作。同样，许多的政治工作人员也都参加了军事工作。这在内战时期是如此的，在抗战时期也是如此的。

以内战时期来说，我们军队在其初期是创造的时期，其中期是发展的时期，其后期是受到某些挫折但同时有其成绩的时期，政治工作也有其创造、发展与受某些挫折但同时有某些成绩的情形。特别是在内战初期与中期，在对敌斗争的政治工作上，在协调军党关系、军政关系、官兵关系、军民关系、上下级关系、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关系、各部分军队间友好关系的政治工作上，总之一句话，在团结自己、战胜敌人的工作上是有许多的创造，以至于到今天还成为我们军队的一部分优良传统。

以抗战时期来说，其初期是生动活泼的，是有伟大成绩的。在这时期内，整个八路军新四军在党的领导下，发展了抗日游击战争，扩大了抗日武装力量，团结了广大人民群众于自己的周围，收复了广大的失地，建立了许多抗日民主根据地，抗击了大量的民族敌人，以至于能够协助处在正面阵地的国民党军队停止了敌人的战略进攻，保障了中华民族不被日本帝国

主义所击败，这些都是做得很好的，很正确的。在抗战的中期，尤其是最近几年，整个军队继续执行了党的路线，与党的许多具体政策，以至于能够抗击了日寇侵华军队的百分之五十八、伪军的百分之九十，以至于能够破击敌伪军无数次的反复的残酷的“扫荡”，能够有效地对付其杀光抢光烧光的所谓“三光”政策，能够使被敌人再度夺去的许多中国土地，又被我军再度夺回来，能够忍受史无前例的没有政府接济、缺乏武器、缺乏弹药、缺乏药品、缺乏粮食被服的无限困苦，而为中华民族，为同盟各国，坚持了一条中国大陆上最重要最有力的抗日战线，这些也都是做得很好的，很正确的。

总之，不论在内战时期与抗战时期，整个军队的成绩是伟大的，军队政治工作的成绩也是伟大的。军队中从事政治工作的人员，也和从事军事工作的人员与从事后勤工作的人员一样，他们是有功劳的，是对中国人民有了光荣的贡献的。

但是，我们的政治工作（这里只说政治工作），是存在过与存在着缺点的，我们应该采取自我批评态度，检讨这些缺点，克服这种缺点，以便更好地改进我们的工作，达到团结自己，战胜敌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目的。

例如，当我们提到政治工作中的传统的时候，若干同志往往存在着一种模糊观念，似乎认为我们政治工作的一切传统都是好的，都是优良传统，因而对于过去的传统作风，缺乏批判的态度。因此，就不免对于某些不好的东西与某些不适合于我们军队当时情况的东西，也都奉为天经地义，当作所谓优良传统在发扬。而对政治工作历史上曾经积累起来的许多真正好的经验，真正好的传统，却又被忽视，被抹煞。

我们的政治工作，在内战后期曾有过这样的情形。就其积极方面说来，这时期的政治工作，曾经执行了反对人民敌人的

政策，曾有过许多成绩。这种成绩，主要表现在对敌斗争方面，例如关于鼓励官兵的英勇斗争，关于争取俘虏等。在团结军队内部与团结人民方面也有其成绩。例如，关于争取人民参加军队，军队的更加有秩序，军队中许多好的政治教育工作与文化教育工作，居民工作中的许多好的工作等（这种成绩主要是表现在中央苏区，及其他几个区域军队中，在另外某些军队中，由于个别同志在政治领导与政治工作领导上的绝对错误，就不但看不出这种成绩，反而摧毁了原有的成绩）。但是，就其消极方面说来，却又产生了一种不正确的作风，这就是政治工作中的教条主义作风（这种教条主义作风，在军事工作特别是在军事教育工作中也是存在的，这里不去论列）。这种教条主义，在我们工作中的最典型的表现，就是爱好空谈，脱离实际；重视形式，轻视内容；团结少数，脱离多数。某些同志之所以或多或少地犯这种毛病的原因，在于他们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方法论。这种方法的表现，就是他们在许多时候，只凭主观臆想办事，忽视中国革命的实际和当时军队的实际，机械地搬运外国经验，不适当地强调当时军队的正规化，割断我们军队的斗争史。这些同志喜欢从口头上、从形式上强调所谓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但是在实际上却放松了无产阶级思想（即马列主义）对于从农民与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们在思想上的改造工作和教育工作，实际上不甚重视与不甚强调我们军队所应该认真倡导与认真实行的真正的军党一致、军政一致、军民一致、官兵一致、上下级一致、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一致、各部分军队间的一致等等基本思想，不是严肃地认真地把这些思想列为政治工作的基本内容与基本工作方向，而是把这些基本内容、基本方向，当作不甚重要的东西，却从形式方面重视了与强调了许多不应该重视不应该强调的东西。

这种作风发展下去，其结果势必产生这样的情形：争取群众的任务有些被轻视了。军队的三大任务，三项纪律八项注意，改变了提法，或被认为不必要了。军队内部团结一致的工作也有些放松了。党政军民关系也不去力求亲密了。军队不尊重党政，军队打骂民众，侵犯民众利益的现象，以及军队内部官长对士兵的打骂现象，虽有指责，也不甚得力了。各部分军队之间的友好关系也减弱了，山头主义、本位主义，在潜滋暗长了。由于山头主义与本位主义的发展，军队的这一部分可以不照顾那一部分，主力部队可以不照顾地方部队与民兵，模范队伍可以不照顾落后队伍，从而在主力部队的若干同志中（这里军事政治后勤三种工作同志都有），生长了一股骄气，自以为是，目空一切，只爱说成绩，不爱说缺点，只爱听恭维话，不爱听批评话，惧怕别人批评，也惧怕作自我批评，有些则更发展到对党与上级的领导机关闹独立性的恶劣现象。所有这些情形，有些在抗战时期有了改变，有些在抗战时期先有发展，后有改变，有些则至今还没有改变。

在党内生活上，内战后期曾经普遍采用了过火斗争的方针，缺乏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精神。军队中的党内生活，也发生过这种不正常的情形，以致许多不应该受打击的同志受到了错误的打击。抗战时期，这种情形有了改变，但其残余没有肃清，还发生过若干错误地打击不应该受打击的同志的情形。

在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的关系上，虽然基本上是团结的，但是存在过某些不协调的情形。在内战后期，曾经不适当地强调政治委员制度，不适当地强调政治工作的地位与权力，并且在实际上是在不适当地强调所谓军事工作人员与政治工作人员的党性的差别，对于军事工作者与政治工作者之间，缺乏合作精神的提倡，是这种不协调情形的来源之一。但是这种不协

调，不能一概责备政治工作人员方面，有些时候军事工作人员也要负责任。

在抗战初期，曾经一时迁就国民党，取消了政治委员制度，降低了政治工作的地位，这是错误的。后来改正了，恢复了政治委员制度，提高了政治工作地位，这是很对的。政治工作在任何一部分革命军队中，都应有其适当的地位，都应适当地强调它的作用，否则这个部队的工作就要受到损失。特别是在那些政治工作比较薄弱的部队，这样的强调十分必要。对于政治工作地位的过分强调是不对的，但是没有必要的强调，没有必要的地位，也是不对的。

整个军队的方向就是政治工作的方向。因此，政治工作的任务，只能根据我军的基本任务（为反帝反封建而斗争，为战争、生产与群众工作而斗争等）与当前具体任务（如反“扫荡”，反“蚕食”，生产运动，整训运动，防止奸细，整顿三风，统一领导，精兵简政，拥政爱民，改善军党、军政、军民、官兵、上下级、各部分军队之间的关系等，依当前需要而作具体布置）去规定，不能在我军基本任务与当前具体任务以外再有所谓政治工作的独立任务。政治工作就是以革命精神教育军队，从思想上、政治上与组织上去保证这些任务的完成。如果在这方面强调政治工作的独立性、特殊性，把政治工作任务与整个军队任务分离起来，那便是不对的，那便会是产生政治工作与军事工作目标不一致，使政治工作脱离实际、显得空虚的原因。任何组织形式、工作方式、工作方法，都是根据情况与任务而产生的，是从属于一定情况与任务的，是应该依据情况与任务的变更而变更的，政治工作的组织形式、工作方式、工作方法，也是如此。所以，如果离开军队的具体任务去谈政治工作的组织形式、工作方式、工作方法，把组织形式、

工作方式、工作方法与整个军队的具体任务相分离，并把它看成绝对的东西，那是不能不变成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的东西的。在这个问题上，过去有些同志是认识不清楚的，如果现在还有这种情形，便应加以纠正。

应该指出，所有上述一切缺点，无论在内战时期与抗战时期，都不是一切部队同样具备的，其间轻重大小，互不相同。正如各部队的优良成绩、优良传统，也是各有特点、互不相同一样。我们的军队始终是革命的军队，其有缺点，好似一个壮健的人有时生了一点疾病一样，很快就会治好的。

还应指出，上述这些缺点，也不能认为都是由于教条主义产生的，中国革命的特殊环境（小资产阶级的广大与长期被敌人分割的农村根据地）是其产生的客观原因。教条主义思想的存在与没有被肃清，我们的教育工作做得不够，则是其主观的原因。一九四二年整顿三风以及实施各种改革以来，这些缺点就逐渐减轻了，某些整风深入的部队，这些缺点就更少了。

还应指出，军队中的教条主义，和内战后期党的领导上的教条主义，有密切的关系，如果没有当时党的领导上的教条主义，则军队是不会单独产生这样严重的教条主义的。

还应指出，当我们检讨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时，不应着重在某些个别同志的责任，而应着重在总结历史经验，以为今后工作的借鉴。还应知道，我们的军队工作与军队政治工作，总是向前发展的，我们的军事工作同志、政治工作同志与后勤工作同志的思想认识也是向前发展的，某些犯过错误的同志或是已经进步了，或是正在进步中，或是一经指出就可能使之进步。根据中央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我们应该团结一切从事军事工作、政治工作与后勤工作的同志，不分彼此，共同工作。

但是应使我们的同志深刻认识，如果我们不从中国革命实

际与中国革命军队的具体任务出发，如果我们犯了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毛病，我们就会无力以高度的革命精神去教育军队，就会无力巩固正当的军党关系、军政关系、军民关系与官兵关系，就会无力克服军队上下级之间、军队政治工作与军事工作之间、各部分军队之间以及军队与地方之间的不正常关系，也就会无力克服军阀主义、本位主义、山头主义的恶劣倾向。反之，如果我们真正懂得了马列主义的方法论，如果我们善于从中国革命实际与中国军队的具体任务出发，善于调查研究，善于联系群众，那末，政治工作（与军事工作、后勤工作）的全般任务就能完成，团结自己、战胜敌人的目的就能达到。中国革命的经验，北伐战争、国内战争、抗日战争三个时期的经验，都在证明这一论断。

长期革命斗争的经验证明，我们军队的任务，不只是一个单纯地对敌斗争的任务，四军古田决议中已经明确的规定了这一点。由于我们军队的特殊环境，我们在内战时期，曾经规定以作战、筹款与做群众工作作为军队的三大任务。自然，作战是被放在第一位，在战争时期，其他一切都是服从于战争的。但是，如果放弃后二项工作，就不适合于我们的环境。在内战的初期与中期，我们军队曾经艰苦地但是光荣地执行了上述三大任务。这也就是说，在根据地没有建立之前，曾经协同地方党政建立根据地，而在根据地建立之后，又曾经协助地方党政巩固根据地。这样的任务，就是在抗日战争中也是没有改变的。大家知道，如果不是八路军新四军在华北华中协助当地人民，协助当地党政建立各个抗日民主根据地，试问这样强大的民族敌人（全部侵华敌军的百分之五十八与全部伪军的百分之九十，都担负在八路军新四军的身上），这样长期艰苦的战争，怎能支持呢？不过在抗战时期，筹款的方式改变了。我们提出

了军队进行生产运动的任务，借以改善军队生活与减轻根据地人民的负担。于是我们八路军新四军今天的任务，就变成战争、生产与做群众工作这样三大任务了。如果把这样三个任务，缩小成为一个单纯的作战任务，那就不能适合我们的特殊环境。

为着团结自己、战胜敌人，为着实现军队的三大任务，过去军队的三项纪律八项注意的精神必须恢复，军党之间、军政之间、官兵之间、军民之间、上下级之间、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之间以及各部分军队之间的关系，必须竭力改善，并建立在巩固基础之上。必须使八路军新四军一切部队，无条件地服从共产党中央及其代表机关的政治领导，才能使军队不走偏向，达到协和全国军民，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目的。

革命军队的内部，必须是团结的方针，必须是合作互助的方针，不能是分门别户、各自为政的方针，不能是互相轻视、互相妨碍的方针。凡属革命军队，在党的统一领导之下，军事工作同志、政治工作同志与后勤工作同志，除应强调专精自己本业，并指出如果不注意本业则是不正确倾向这一点之外，还应提倡，军事工作与后勤工作同志应学习政治工作，参加政治工作；政治工作同志则应学习军事工作与后勤工作，并在需要他们的时候准备去参加军事工作与后勤工作，或竟改变现有工作职位去做军事工作与后勤工作。而在军事工作、后勤工作与政治工作的关系上，则应强调彼此的合作。不错，这些工作各有其不同的内容，因此才分为几种工作。但是这些工作都是为着团结自己战胜敌人一个目的，这些工作的进行又必须取得和谐的合作。因此，凡是能巩固这种合作的，即应受到赞扬，而如果是妨碍这种合作的，即应受到批评与指责。

在团结自己、战胜敌人的总方针下，革命军队内部的争论

问题，只应该是思想倾向与政策方针的原则性的争论，只应该是正确原则克服不正确原则的争论，并且只是因为这种争论，是有助于巩固党的领导，巩固官兵关系、军民关系及其他各种关系，借以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借以达到团结自己战胜敌人的目的。任何的争论都应该完全是在党的统一领导之下去进行。而如果是多少离开这种立场的争论与对立，就都是无原则的，是不应该允许其存在的。

在我们军队中，应该把尊重工农出身的干部与尊重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尊重老干部与尊重新干部的方针，同时提了出来，并使这些干部很好的结合起来。应该使人们懂得工农干部的长处，我们军队中有大批的革命工农干部，他们已在历史上形成为军队中一部分起主要领导作用的骨干，正是我们军队的优点与特点（在党务工作、政府工作、民众工作中也是这样）。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忠诚可靠的，并特别能吃苦耐劳，英勇奋斗。轻视工农干部的思想是不正确的。但是同时，又应该使人们懂得革命知识分子的长处，我们军队如果没有大批革命知识分子参加，就不能达到团结自己战胜敌人的目的。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也是忠诚可靠的，他们的缺点，经过锻炼（特别是经过实际工作的锻炼）是能够改造的，轻视知识分子的思想也是不正确的（在党务工作，政府工作，民众工作与文化教育工作中，也是这样）。无论工农干部与知识分子干部，都有他们自己的短处，都不应该骄傲，而应互相学习其长处，去掉自己的短处。

军队中的老干部是军队的主要骨干，没有他们就不可能有如此坚强的军队。因此，我们应该尊重老干部，轻视老干部的观点是错误的。但是同时，应该尊重新干部，因为新干部是我们军队的新鲜血液，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军队的发展与壮

大，轻视新干部的观点也是错误的。新老干部应该互相尊重，互相帮助。而老干部尤应随时随地，特别表示欢迎与尊重新干部的态度，以便于从各方面吸收新干部加入我们抗日的军队，壮大我们的抗日力量。

从地方工作中吸收到军队来工作的干部，新的与老的，工农出身的与知识分子出身的都有，这是扩大军队干部的一大来源，我们应该表示尊重、欢迎与和气地同他们一道工作的态度。他们初来时，在工作上有些不习惯，不熟练，是很自然的，我们应该善于帮助他们。

我们军队中，在工农干部与知识分子干部的关系，老干部与新干部的关系，原有军队干部与新来地方干部的关系，这些问题上，是存在着不正确的观点的，在这些问题上存在的宗派主义观点，是应该纠正的。

在军队的政治教育中，要把培养高度的对敌仇恨与争取敌军俘虏二者区别而又统一起来。没有前者，就不能振起一往无前、杀敌致果的士气；没有后者，就不能瓦解敌军官兵。应该使我们军队的指挥员战斗员都懂得，在战斗时，集中一切力量去压倒敌人，迫使敌人投降，如果敌人不投降，那就应坚决的歼灭他们，或俘虏他们，这就是我们军队一往无前、杀敌致果的革命精神。这种革命精神，是我们军队非常宝贵的历史传统，今后应该在我们军队中大大提倡，大大发扬。但是在战斗解决以后，对待俘虏的政策，就不是这样。这里应该转变为说服态度，从思想教育上、物质待遇上、政治态度上争取他们，将我们在战斗前与战斗中对于敌军的宣传变为事实，借以瓦解敌人的队伍。拿中国的老话说，如果前一种态度可以叫做“霸道”（革命的霸道），那末，后一种态度就可以叫做“王道”（革命的王道）。如果拿前一种态度应用于后一种情况，那是不

对的。分别而又同时发扬这两种态度，正是我们的历史传统，今后应把这一点更大的发扬起来。

如果说对敌人是用“霸道”，那末，对同志、士兵，对人民、对朋友，就是用“王道”。对前者是打击，是消灭；对后者是尊重，是说服。如果不去学会分别这两者，如果把对待敌人的态度有时稍微误用了去对待同志、士兵、人民与朋友，那就是犯了极大错误。严格地分别这两种态度正是我们的历史传统，今后同样应当予以大大的发扬。

在我们军队的军事教育与政治教育的比重上，应依照部队的具体情况去规定。依照具体的需要，在一个时间内，对于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有所侧重。例如，在部队政治教育特别缺乏时，应当多费时间、多费精力去着重进行政治教育，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一般地说来，在分配二者的时间上，军事教育应占的比较多些，政治教育及文化教育则应占的比较少些，不可拿许多不必要的繁琐的会议、汇报去占据军事训练的时间。许多政治教育工作与政工会议，则多利用各种间隙与机会去做。这种时间上的分配，决不能被误解为是降低了政治工作的重要性，恰好相反，我们认为政治工作是我们军队的生命线，无此则不是真正的革命军队。必须使人们懂得，认真的政治工作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任何轻视政治工作的观点，都是不对的。但是现在有些部队中将政治教育文化教育及其他政治工作活动占去了太多的时间，减弱了军事训练的时间，这是应当纠正的。

在军队的政治教育与文化教育的比重上，政治教育应占第一位，文化教育则占第二位，借以提高部队的政治情绪，政治认识与政治质量。但革命军队的文化水平，是应该提高的，不能误认为只要政治，不要文化，我们可以而且应该利用各种间

隙与机会去进行识字运动及其他文化活动。在陕甘宁边区留守部队的情况下，文化教育有更多的可能性，更应多加些力量去做。

我们的军队是人民的军队，是彻底拥护人民利益的，是以工农为其基本成分的。但是我们绝不拒绝从地主富农资本家阶级出身，而真心愿意献身于抗日战争，真心愿意服从共产党领导的那些人们，参加我们的军队。这些人们的缺点，甚至严重的缺点，那是会有的，放任这些缺点是不对的。但是这些缺点是可以纠正的。我们不是排斥或歧视他们，而是欢迎他们与尊重他们，和他们一起奋斗，在奋斗过程中逐渐地帮助他们克服其缺点。

对于军队中的二流子（流氓），应和对于地方上的二流子一样，采取改造与感化的政策。听任二流子习惯存在，是不对的，单纯地排斥与洗刷二流子，也是不对的。绝大多数的二流子是可以经过教育，变为好人的，只要我们的政策与方法不犯错误。

对于会门与土匪，也应采取逐渐地有步骤地感化与改造他们的政策，不能是单纯地排斥与打击的政策。除非我们尽了一切力量去争取，而某些会门或土匪还是坚决站在敌人方面反对我们，才可以采取某种打击手段。但在打击之后，又应继之以争取。

抗战时期，各种对敌伪斗争的政治工作，争取敌伪军俘虏的政治工作，武装工作队的政治工作，争取广大民众加入军队的政治工作，组织民兵与游击队的政治工作，团结广大知识分子到军队中来的政治工作，团结地主资本家阶级和我们一道抗战的政治工作，团结少数民族的政治工作，以及其他作得有成绩的工作，凡属有积极意义的，都应该继续坚持与加以发扬。

如果我们部队中对于上述各项问题发生了思想上的偏向，那就应当加以纠正。

此外，在我们军队的政治工作中（同时也在军事工作中），还有几个毛病，在前面虽已提到，但是没有着重说清楚的，需要在这里说清楚。这些毛病并不是每个部队都是一样地存在与一样地严重的，陕甘宁边区部队在去年一年中又已经给了许多的改造。但是这些毛病是这样显著与这样引人注目，使我们不得不提出来加以分析，以期唤起同志们注意，加以彻底的克服。

哪些毛病呢？第一个毛病，就是形式主义。常有这样的情形，当有些同志做工作计划时，他们的计划常是随时可用、随地可用的照例文章，他们只知道习惯了的一套老公式，不知道依情况的变化而变化。这是一种形式主义。

在我们的政治教育问题上（军事教育上也有某些相同），我们教的东西与战士们需要的东西，有些是不相符合的。例如，有些同志在战士面前专门喜欢谈论国际大势与国内大势，却不愿意谈论本地本军与本连本队的大势。把这种自己所最清楚的同时又是战士群众最需要最欢迎的具体事物，抛弃不谈，却喜欢向战士们输送大批的抽象概念。又如，有些同志常常喜欢凭空教导战士们要守纪律，要做模范，要英勇坚决，却不愿意把现成的、活的、动人的模范人物，英勇事迹，讲给战士们听。似乎这样的东西，没有讲的价值，只有大批概念，才是无价之宝。在这种情形下，教育的内容既是教条主义的，教授法、学习法、测验法也是教条主义的。教的人不管被教的人懂不懂，只管教下去，为的是要“完成计划”。学的人也就只得把听课当做一种负担，当做一门差事，虚应故事，从来也不知道要联系自己与反省自己。在测验的时候，只知算问答的分

数，不知看实际的行动。这种情形，在许多部队中存在着。在这些部队中，不但对战士的教育如此，对党员的教育也是如此，不但对政治教育如此，对文化教育也是如此。不重内容，但重形式的形式主义作风，成了我们宣教工作的一个严重毛病。这种情形，就陕甘宁边区说来，一九四三年有了很大的改进，但在干部的思想，还是没有彻底解决的。

我们的有些支部工作，也犯了形式主义的毛病。有些同志，当他们去检查支部工作、讨论支部工作的时候，当一个支部书记在布置自己工作的时候，开宗明义第一条，就是会议与汇报，名曰“建立会议制度”，“建立汇报制度”。会议与汇报执行得好的，就是“模范”，不好的，就不是模范，几乎把会议与汇报当做中心，当做一切。因此，支部忙于开会，党员忙于到会，结果是大家讨厌开会。为什么如此？因为这种会议是毫无内容的，枯燥无味的。战士们讨厌这种汇报，因为这种汇报多是消极地向战士们找岔子，反映所谓“怪话”，因此，引起群众不满。这种所谓会议与汇报，只是使支委脱离党员，党员脱离群众。像这样的支部工作，是没有法子做好的。这也是一种形式主义。

如果不是按照每一部队的特殊机能（步兵、骑兵、炮兵、工兵、卫生队、运输队等等）及每一任务的特点（作战、训练、生产、做群众工作等等），去进行不同内容与不同形式的政治工作，而是对于什么都做成一样的政治工作，那就是一种很厉害的形式主义。这种形式主义，在若干部队中是存在的，是这些部队的政治工作所以缺乏生气的原因。

有些部队中写报告填表格的制度，也有类似的情形。例如，上级机关规定许多报告项目与表格形式，生硬地要求下级（特别是营连）去做去填。在此种要求下，下级只得拼命地做

上去，填上去。但是这些东西的内容，大都千篇一律，很少实用，徒费精力。上级得了这种东西又往往堆在一起，不加分析与整理，结果化为废纸，无所用之。这也是一种形式主义。

我们军队中的许多组织形式是不合实际需要的。例如，有些政治工作机关分了很多的部与科，收罗很多的人堆在机关里，结果人员越多，工作越少，忙的多是一些琐碎的形式上的工作，真正的领导工作反而做得少了。又如连队中的工作网，十人团，青年队，政治战士，也变成了形式上好看，实际上无用的东西。

总之，凡属不合实际需要、徒具形式的工作方式与组织形式，都属于这一类，这是第一个毛病。

第二个毛病，就是平均主义。这里所说的，是指我们有些同志做工作计划时，不知道抓住中心；检查工作时，不知道找典型；解决问题时，不知道从某一个关节着手。以至他们的许多计划，常常是应有尽有，无所不包，早已成了日常习惯的业务，也要列入所谓计划之内，把一些不关痛痒的东西和主要的东西同时并列在一起，这样搅在一团，毫无眉目的所谓“工作计划”，完全失去了工作计划的意义。有些部队的同志不知道，在一个相当时期内，只应该有一项为当时情况所要求的中心工作，而以其他若干必不可少的工作附属之，而是同时发动做很多项工作，想在这很多项工作中获得成绩。但其结果则是一项也做得不彻底，一项也得不到满意的成绩。我们有些同志在检查工作时，可以把所有的连队都跑一遍，把政治工作的各个项目都考查一遍。但是结果呢？仍然没有发现问题，没有分析问题，没有找出事件的症结，加以恰当的解决。所谓“总结工作经验”，变成了一句空话。这些都是很严重的平均主义。平均主义的工作方法，其原意是想样样做好，但其结果一样也做不

好。这种平均主义方法，同形式主义一样，其性质是主观主义的，因为它是从主观臆想出发，不是从工作的实际需要出发。

第三个毛病，就是重号召不重组织，以一般号召代替具体指导，换句话讲，就是空喊。我们看到有些同志提出的号召是不适当的，他们没有估计那里的工作性质，没有顾及那里的群众情绪，他们所号召的东西，并不是那个部队实际上所需要的东西。即使号召是正确的，我们也看到我们有些同志对于自己发出的号召是不负责任的。一个号召发出之后，第二个号召接着又来，在那里，许多工作是在号召上打圈子，永远停留在号召的阶段，许多工作常常是有头无尾的。这是对工作的开玩笑态度，极端不庄重的态度。这种态度，对政治工作，对领导机关，都只会损失威信，得不到任何好结果。与此相反，我们应该根据“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具体指导相结合”的原则，一经提出号召，就应组织实行，并在实行中，突破一点，取得经验，指导其余。如果没有具体指导，则所谓一般号召，就是自己给自己取消了。

第四个毛病，就是有些同志的孤立主义。不是人家孤立我们，而是我们自己孤立自己。这些同志，首先，不把政治工作看作是群众工作，不从群众观点出发，不采取群众路线，不组织群众行动，宁愿将政治工作锁在狭隘的圈子里，只有少数政治工作人员在做，在忙，广大群众却在那里闲着。许多事是可以而且应该协同军事工作同志一起去做的，但是我们不愿意去找人家，宁愿使工作老是抓不开。至于动员了群众的，也有这种情形，在那里，不知道照顾群众的需要，而是违背这种需要，不知道考察群众的情绪，而是忽视群众的情绪。从而关于领导群众的艺术问题，关于如何团结积极分子、巩固中间分子、提高落后分子的问题，关于党与非党群众的联系问题，关

于宣传鼓动工作与组织工作互相配合的问题等等，都被认为是不重要的，或者完全被忽视。在这种情形下，我们的政治工作，就不能不一般化与简单化。在这种情形下，我们的政治工作，就变成了少数人脱离群众而孤立起来的所谓“工作”。此外，有些同志在解决问题时，不凭自己的本领，不凭自己勤于向同级、向下级、向群众去商量、去学习，借以取得知识，取得经验，而只凭自己的工作职位，只凭行政手段去解决问题，以至于不得不把事情弄坏，有时甚至毫无办法，只好拿大帽子压人。这种脱离群众的工作方法，就是孤立主义的方法。

总起来说：形式主义的作风、平均主义的作风、空喊的作风与孤立主义的作风，本质上都是小资产阶级的作风，都是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作风。这种作风不是共产党人的作风，不是革命军队的作风。它同党的作风、革命军队的作风，是不相容的。政治工作中存在着这样的作风，就会减弱它的革命性，即使党的路线是正确的，政治工作方向是正确的，如果这些作风不改变，仍然无力完成政治工作的任务。我们的政治工作曾经有过很好的传统，古田会议的决议，就是这种传统的一个具体表现。过去工作中，凡是继承了并发扬了这种传统的，那里的工作就充分地表现其革命性与创造性；反之，就表现死板僵化，死气沉沉，毫无生气，毫无力量。现在在陕甘宁边区部队中，在整个八路军新四军中，都有很多生动活泼的创造。在长期抗战中，产生了很多的战斗英雄、劳动英雄与模范工作者。他们没有形式主义，也没有平均主义，没有空喊，也没有孤立主义，他们是实事求是与联系群众的。我们应该学习他们，应该表扬他们，应该展开每一个部队中学习战斗英雄、劳动英雄、模范工作者的运动。干部中群众中的积极性创造性是无限的，只要我们善于把任务提出来，善于启发他们，善于鼓励他

们，他们就会蓬蓬勃勃地活跃起来，发扬自己的成绩，纠正自己的缺点，即使在过去工作中曾经犯过错误的同志，也会在这个群众运动中改正过来。经验已经给我们证明：干部中群众中蕴藏的正气、热忱、创造性、积极性，一经被启发，就会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就会变成长江大河，一泻千里，那时来看我们过去的缺点，就会显得不过是像太阳中的一些黑点了。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我们的人民本来是太阳，这个太阳是要照耀全世界的。

三、关于组织形式与工作制度中的一些规定

根据上述陕甘宁边区部队一年工作的总结与全军历史上的一些总结（不是全部总结），使我们感觉我们政治工作中现存的组织形式与工作制度，应有某些修改，并加入许多新的东西进去，才能适合目前军队的需要。但是我在这里不准备来说全部政治工作的组织形式与工作制度问题，只说这个问题的一部分，其他部分则待将来再讲。并应指出，我们的组织形式与工作制度有些还是好的，应当保留的。这里所说的修改，是指那些已被长期经验证明不适合实际需要的东西。其中有些是仅具形式而无工作内容的，有些则由于情况变化，从前合用的，现在已经不合用了。

一切组织形式与工作制度，大体都有基本的与临时的两种。带基本性质的，应当使之固定起来；带临时性质的，则不应当固定，而应当依据具体工作的性质去选择，依据环境与任务的变更而变更。在工作中，应当创造新的组织形式和建立新的工作制度，不应当留恋已经陈旧了的东西。这里的原则是：凡属便于组织和发扬广大战士群众的积极性，借以完成一定

任务的组织形式与工作制度，便应当充分利用之；如果某种组织形式与工作制度，不便于组织与发扬广大战士群众的积极性，完成一定任务的，就不应当采用，已经采用的就应当废止，而代以新的东西。例如我们从战争中，从整训运动中，从生产运动与拥政爱民运动中，创造了战斗英雄会议、劳动英雄与模范学习者会议，连队军人坦白大会等，都是很好的组织形式，应当予以发扬。

根据上述原则，我们提出如下意见：

（一）连队中的会议制度与汇报制度，必须加以改革。过去有些部队会议太多，一个连队每月有多至四五十次的，空虚繁杂，徒耗精力。今后不论是属于行政的、党务的或政治工作的，也不论是属于党员的、非党群众的或干部的，凡属工作性质相同，到会人相同，又不妨碍机密能够合并举行的，应当合并举行；不能合并必须单独举行的，才许单独举行。一切会议，必须是有内容的，例如充分切实地检讨工作，教育同志，解决问题等。凡无此类具体内容的会议，一概取消。一切会议汇报，都应注意节省时间，会议次数不应过于机械的去规定。党员向组长，战士向班长的固定汇报制度，已成形式的东西，且使战士讨厌，应予取消。

（二）连队工作网的作用，是为着对付奸细与逃兵。但是证以过去经验，依靠少数耳目与固定的网对付奸细，是不起多大作用的。防止逃兵，争取与巩固动摇分子的工作，是支部的责任，是所有党员及所有革命战士应做的工作，是属于一般的政治工作，不是防奸性质的工作。对逃亡分子的政策，主要是争取，是说服、教育、感化，是改善官兵关系，改善管理制度，改善连队的物质生活，从这些积极方面去解决问题。逃兵归队时，应取欢迎态度，使他安心，禁止轻视、讥笑与打骂。

过去许多工作网用反侦察的方法对付企图逃亡的分子，是错误的，反而妨碍了争取。因此，今后连队固定的工作网无存在之必要，应予以取消。只在必要时，临时布置侦察员，任务完毕，这种临时组织即行消失。

（三）连队中的十人团，在对付逃亡、巩固部队上，起过某些作用。但是由于其工作过分注意消极防制的方面，忽视从政治上去积极争取的方面。而且这种组织只有在新兵居多数的连队，或逃亡盛行的时期，才有实际意义。因此，在没有此种情况的一般连队中，无组织十人团的必要。只是在需要这种十人团的特殊情况下，才去临时组织之。

（四）在青年占多数的连队，应当重视青年的教育工作，过去青年队组织曾起过某些教育青年的作用。但是，过去的青年队，由于不注重发挥青年群众的积极性，以与成年协同奋斗，往往使青年脱离成年而突出。又由于过于从外表上强调青年的组织生活与特殊教育，而连队中青年与成年的组织生活及各项教育，又大都是一致的，因而使青年队的工作，变成空虚与无力。今后不必有固定的青年队的组织与纪律，不必有固定的青年特殊教育，也不必有固定的青年会议生活与汇报制度，而应在连部或队部的指导下，开一些非固定的青年会议，借以教育青年，启发青年的积极性，并使他们与成年一道，努力于共同工作。

（五）连队中的政治战士，因无一定工作内容，应予以取消。

（六）在取消连队中的工作网、十人团、青年队与政治战士等固定形式之后，关于反逃亡的工作、防奸工作及青年工作，均由支部集中领导，按照实际需要，规定适当的具体办法。支部应注意利用军人俱乐部去做自己的工作，很多带群众性的工作，均应通过军人俱乐部去做。过去有些部队把军人俱

乐部看成只作文化娱乐工作的机关，致使俱乐部工作内容贫乏，今后应扩充俱乐部的工作内容。

（七）由于发展了伟大的生产运动，把连队的经济工作提到比前更加重要的地位了，因此应该重视连队经济委员会的组织及其工作。连队经济委员会应由选举产生，官长可以当选，但不超过三分之一。其职权为计划、组织与监督连队的生产、消费及防止贪污浪费等，为连队全体人员特别是为战士群众谋物质福利的一切必要事项。连队经济委员会应脱离俱乐部而独立，支部应经常注意其工作。

（八）改变支部与连队政治工作并立的制度。支部除接受总支委领导之外，应该接受连指导员的领导，指导员兼任支书。支部在纯粹党务问题上（如接受党员、开除与处分党员，以及处理党内纠纷等），应当采取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不得个人包办。在全连事务和政治工作方面，支部应经常与连长取得意见上的一致，并应尊重连长的意见。

（九）根据中央决定，每年旧历正月为拥政爱民月，举行拥政爱民运动。全军应利用这个时间，在所有连队中进行拥政爱民的深刻教育。这一制度的规定及其认真实行，将使军政关系、军民关系、军队与地方关系获得极大的改善，全军都应重视这一方式。

（十）每年举行一次至三次以教育为目的的反省坦白运动。每个连队，在一年中择一个至三个适当的机会，每次三天至五天，举行连队的反省坦白大会，根据“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原则，在高度的同志友爱互助精神之下，使每个干部与战士均把心中的不满情绪，打骂现象，想逃亡的心理，奸细分子勾结与破坏的现象，物质困难情形，侵犯民众利益现象，不尊重党政不尊重上级现象，以及教育工作与经济工作中的缺点等，

一概反省出来，坦白出来，然后由连队支部及行政首长收集起来，一面反映到上级去，一面讨论改善各方面工作的切实办法。这种方式，现已在很多部队中证明是发动群众积极性，提高战斗情绪，提高领导威信，改善官兵关系、军民关系，消灭逃亡现象，破获奸细分子，改善各方面工作的很好方式，上级领导机关应很好地注意组织之，应在事前有各种积极准备及精神上的酝酿，使这种大会在不是勉强的而是自然的，不是惩罚的而是教育的，不是冷淡的而是热烈的空气之中去进行，使这种大会成为干部与战士团结一致的真正教育性质的群众大会。如果一年中开两次至三次时，其中有一次可在拥政爱民月内举行。

（十一）以分区以旅以团或以营为单位每年举行一次战斗英雄、劳动英雄及各方面模范工作者的会议（如果合开时，可以总名之曰群英大会）。各种英雄及模范工作者，应经过认真的选择与民主的选举，真正是广大群众所佩服的人物，并在选出及开会以后，经常注意培养他们。这些英雄及模范工作者中，大多数应从战士及杂务人员中选出，但须有相当一部分从初级下级及中级干部中选出来。在这种大会上，应给予优异者以精神上与物质上的奖励，并在报纸上予以发扬，号召群众学习他们。

（十二）恢复古田决议的党的代表会议制。分区为单位或旅团为单位全年举行一次。代表经选举产生。

（十三）恢复古田决议的书、宣、组联席会议，分区或旅或团为单位每年举行一次。

（十四）全营集合讲话，每月一次。一有可能，应举行全旅及全团的集合讲话。应重视此种集合讲话，把它当作提高战士情绪、统一全军意志的主要方式之一。此种讲话，由军事工

作与政治工作负责人共同出席。此种讲话的精神，应是鼓励多于批评（连队集合讲话亦应有此种精神）。

（十五）报告与表格的目的，是为着反映部队及其工作的发展情形，使上级能够据以了解那里的问题所在，给以适当的指导。今后应当废止那些不分析工作发展过程、不指明问题在什么地方、千篇一律毫无内容的报告方式，提倡能够生动地反映工作发展过程，能够指明成绩所在及为什么获得此种成绩的原因，能够指明矛盾所在、困难所在、问题所在及为什么发生此种矛盾、此种困难、此种问题的原因，以及自己如何解决这些矛盾、困难与问题的意见这样一种报告。少作按周按月按年的报告，多作叙述事件起讫、叙述过程发展的报告。表格也要废止繁杂而不切实用的，提倡简明而切合实用的。

（十六）机关工作人员应以少而精为原则。并应改造某些机关工作中所盛行的那种“办公事”式，而忘记了群众，忘记了思想领导与政治领导的不良作风。

我的这个报告，经过很久的积累，又在这次会议中经过到会同志的多次座谈，收集了各方的意见，前方来的军事工作同志与政治工作同志又提供了许多意见，并经过中央同志及西北局同志的指导，才这样地做出来。如果大家认为恰当，我们就决定照此去做。只要全军上中下各级干部的思想打通了，工作成绩是会很快看见的。在整风的精神之下，我们坚决相信，全军将有一个飞跃的进步，团结自己，战胜敌人，解放民族，解放人民的神圣任务，我们是一定能够完成的。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四册刊印。

毛泽东关于向河南发展问题 给滕代远、邓小平等的电报

（一九四四年四月二十二日）

滕邓并转杨苏黄^{〔1〕}：

（一）敌打通平汉路战役，一部已由中牟渡河，突破汤^{〔2〕}部阵地，似企图吸引汤蒋^{〔3〕}主力于许昌东西地区。敌主力似集结博孟济地区，准备南渡，截断潼洛，配合信阳之敌北犯，聚汤部于许昌东西地区。

（二）应即转告水东区切实侦察陈留、杞、商、亳、柘城、淮阳、太康、通许及皖北等地国军情形电告我们及新四军。

（三）唐天际部须向垣博孟地区侦察，敌南犯后方空虚时，应乘机开展豫北地方工作，以便将来可能时，开展豫西工作基地。

毛

卯养（四月二十二日）午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注 释

〔1〕指杨勇、苏振华、黄敬。

〔2〕指汤恩伯。

〔3〕指蒋鼎文。

对敌斗争与武装建设中 最大的经验教训^{*}

(一九四四年四月三十日)

刘 伯 承

抗战以来，我们在对敌斗争与武装建设中最大的经验教训是什么？

一 敌我斗争不仅斗力，更主要是斗智

敌我双方都有坚强的指挥能力，都有政治的敏感，特别要警觉日寇狡黠，富有统治殖民地的经验，尤其是特务政策的经验。我们善于总结经验，研究敌情，提出新的对策；敌人也善于研究我们，接受经验，不断研究其方略，尤其是里应外合的谋略。所以敌我斗争，不仅是军事力量的比赛，而且是政治、经济、文化全部力量的决斗。不仅斗力，更主要的是斗智。我们乘间自强，取得抗战初期发展的胜利。敌人接受了这一教训，抓住我们的错误弱点，而突之以“治安强化”与“铁壁合围”，获得了某些成效，使我们根据地退缩。一九四二年五月

* 这是刘伯承一九四四年在延安参加整风学习期间写的《晋冀鲁豫抗日民主根据地现状的报告》第二章“现在对敌斗争与武装建设问题”中的最后一个问题。

后，我们又兢兢业业实现了一套敌占区政策，反“蚕食”与反“扫荡”群众性的全面游击战争，又取得某些胜利，开辟了某些根据地。今后敌我斗争，将进入到更有计划、更有组织、更巧妙而尖锐的地步，我们必须经常兢兢业业地根据中央的方针，实事求是，发扬我们的战斗力，尤其是智力。

二 团结自己，才能战胜敌人

一切政策都要紧紧握着扩大中日矛盾的原则，才能打到敌人痛处，也只有团结各阶级抗日人民一致对敌，才能照敌人痛处打得有力。在根据地减租减息，合理负担，充分发动广大民众，组织人民武装等，正是打稳统战的基础，发挥有力的群众性游击战争。在敌占区不去扩大阶级矛盾，团结中国人对敌，一切从保护民众利益出发，实行两面派政策，秘密繁殖游击战争，也正是从敌方巩固根据地，给敌人心脏以打击。经验证明：团结中国人对敌，也包含斗争，不过斗争主要是用和平的、政治的方式，对付那些帮助敌人，破坏团结抗战，自私自利的个别分子。只有对于那些一心事敌，为人民所痛恨的死心汉奸特务分子，才给以坚决的打击。

三 掌握敌强我弱、持久战的特点，在战争中积蓄力量，进行武装建设

我们的原则就是：削弱敌人，保存自己，隐蔽组织力量，准备反攻。我们对于这个原则，曾经认识不够，不去麻痹敌人，从各方隐蔽地积蓄力量，反而时常发生暴露自己的错误，遭到敌人的报复破坏。我们对于“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

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作战指导原则，也就是对敌强我弱、持久战的条件，过去认识不够，强调了正规军的建设，曾一时犯了编并与放任地方武装建设的错误，削弱了对敌斗争力量，吃了亏。在群众性的游击战争中，从敌占区与根据地各方面隐蔽组织力量，应认为是一个武力问题，而表现之于积蓄与使用两方面。所以对敌斗争与武装建设，应依据现实的情况，使之趋于一致。在群众性游击战争中，联系实战进行军队建设，保护壮丁，教育民兵，组织日用生产、军用（炸弹）生产，把战斗、生产、教育统一起来。现在游击战争的工作，也就是将来反攻的准备工作，所谓“越战越强”者也。

四 巩固根据地，与在敌占区组织斗争相结合

根据地党、政、军、民的建设，与对敌斗争应密切联系，才能巩固我们的阵地。以前我们关门建设是吃了亏的。同样要在敌占区组织斗争，才能破坏或阻滞敌人摧残根据地。现在根据地与敌占区的游击性同时增加，就是“敌进我亦进”的结果。敌伸入根据地的特务活动，与我伸入敌占区伪军、伪组织内隐蔽积蓄力量的斗争，也是同样发展的。我们应在掌握中日矛盾的基础上，争取主动权。

五 领导一元化

我们在敌人总力战的面前，实行了一元化的领导，在对敌斗争与武装建设上，获得了初步的成绩。不过我们内部，还存在有山头主义，缺乏全面观念，团结不够，互相磨擦、埋怨，影响到工作步调，不能一致。尤其是我们对中央、北方局的方

针和指示，虽然基本上执行了，获得了某些成绩，但对其指示尚有了解不够、发生错误之处，如曾对游击战争了解不够，与对敌占区的工作忽视，以致工作受到损失。

根据解放军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出版的
《刘伯承军事文选》刊印。

太行区三次简政总结^{*}

(一九四四年五月七日)

自中央提出精兵简政后，太行区即认真周密、彻底执行了这一政策，并能根据着敌我斗争形势的变化及当前具体任务，不断地改进与发展这一政策的实施。从一九四二年到现在，该区已进行了三次简政，且得到了不少的宝贵经验和教训，兹特报导于后，以供各地参考。

简政的方针与办法

一九四二年初，晋冀豫边区抗战五年，人力物力消耗极大，财政经济发生着很大的困难，战争日益残酷频仍，各种组织机构许多已不适合于当前战争的要求。为着坚持敌后战争，为着积蓄力量与准备反攻，乃根据中央精简指示提出简政方针，其具体办法：第一，裁汰骈枝机关，减少脱离生产人员，确定政民全体脱离生产工作人员不得超过居民百分之一；第二，纠正头重脚轻，充实下层，提高干部质量，增强工作效率；第三，废除一切繁文缛节，建立简便工作制度，提倡朴实计算与管理的作风；第四，反对浪费，肃清贪污，节省民力。

* 一九四四年四月五日，毛泽东在审阅本文后批示：“此件很有用，请少奇饬党务研究室修改文字，送解放发表，并予广播。”

但在五月“扫荡”后，又鉴于组织机构还不够精干，不能适合于当前的“扫荡”新形势，因而又提出二次简政。其方针是进一步的缩小上层机关，足够的充实下层，培养各地区之独立工作能力。其具体办法：第一，减少边府专署两级人员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加强县区两级；第二，减少边府事务，加强专署县府职权；第三，着重改革机构，实施重点是强调适应战争。到四三年一月，又鉴于二次简政后，总数上虽减少了很多，然还有些机关仍比较庞大，各系统强调垂直，各自为政的现象依然存在，于是又提出第三次简政。其方针是适应今后极端严重的分散游击战争的环境，加强区村工作，加强一元化的领导，用各种方法减轻人民负担，密切群众联系，加强对敌斗争。具体办法：第一，大大减缩边府专署两级机构，合并性质相同机关，放弃一些次要工作，抓住中心环节；第二，建立各级领导核心；第三，抽调大批干部，充实下层，加强薄弱部门及游击区敌占区工作，提倡干部降级使用；第四，保存培养干部，以作今后准备。

机构紧缩与行政区的划分

区村机构的改革，第一次简政是实行大区小村制，村干部大都脱离生产，但在五月反“扫荡”中，实际经验证明，这种制度不适应于残酷的游击战争，因农村战争行动，多以自然村为目标。我们村指挥部，却都放在行政村，干部也都集中于主村，于是战争一来，自然村陷于无领导的状态，行政村也困于孤立而无法坚持，且全行政村，人地辽阔，开会不易，妨碍了民主的发扬，各种问题也不能即时发现与解决。组织重叠，亦助长了官僚主义的作风。因此在第二次简政时，又改变了大区

小村制。变更村组织，节省人力，如和顺仪城全村二百户八百人口，村干部就有一百人，且又都不支差，说话人多，做事人少，战时互相推诿，工作无人负责，于是适当的缩小区的范围，争取村干部多不脱离生产，将村政委员会之民教合并，取消除奸委员，设立公安员，财粮仍旧，除大村庄及工作复杂的村庄设各委员会外，一般只由几个负责人组成村政委员会就可。这样实行的结果，工作效率大大的提高，且便于战争的领导和节省了民力。在三次简政时，因着重领导一元化的加强，区村机构无大变化。

县以上的机构的改革：第一次简政是着重减少人员，组织机构变动不大。第二次是为要再度缩小领导机关，减少日常事务，合并同类部门，于是专署县府民政教育合并了，财政粮食合并了，税务贸易局合并了，建设科取消了，另外为统一战时勤务工作，设立了抗战勤务科，为强有力的组织领导中心工作及强化工作上的统一与配合，又成立了办公室。这样就大大加强了中心工作之推动力量与对敌斗争。第三次简政是强调一元化的领导，各机构更进一步的调整，边府民政教育合并为第一厅，财政建设及粮食总局合并为第二厅，取消太行卫生处抗院，合并三个中学为联中，专署县府更加强化了办公室，将各科合并为第一、二、三科。这样实行的结果，统一领导加强了，工作也就更为有力了。

在编制区划中所发现的问题是：（一）专署兼县使专署事务增多，削弱对各县的领导作用，同时也妨害所兼县工作之深入，贻误战争，利少弊多；（二）各科林立固然不好，但只图简单混合为一，而取消了部门工作，特别是合并教育系统，取消建设系统，致对生产与教育工作，受到相当的损失；（三）简政中也未免过大强调一面，如一次简政时片面注意缩减人

员，对考虑工作重点以配备干部注意得不够，更重要的是对如何加强区村工作人员分散领导群众游击战争的问题没有想到。二次简政后，根据实际工作经验，有了改正。如在敌后斗争中山地行政村一般以直径不超过七里至八里为适宜，百户以下者为丙等村，百户以上者为乙等村，二百户以上者为甲等村，三百户以上者为特等村，村干部一般不宜脱离生产。区的范围，以十五至二十个行政村为适宜，面积一般应以一千到一千五百平方里较恰当，村庄稠密，人口集中地带，其划分当不以此为限。

人员缩减与干部调整

人员的减缩，从总的方面说，简政前如果作为一百，三次简政共减少了原有数将近百分之五十一（这只是政府行政系统的减少比例，如加上各种地方组织，民众团体学校，各种后方机关以及过去制度外之吃公粮与半脱离生产者来计算，减少比例远过于此）。

从各级人员减少之比较来说，是着重减少上层并充实下层。第一次简政从上到下普遍地减少了，区村两级变动较小，县级减少亦较小，专署级较多，边府一级最多。第二第三次简政，主要是减少上层，例如若将第一次简政后的人数与第三次简政后的人数拿来比较，第二第三次简政村级调整了组织，人数无变化，区级在三次简政后，人数有适当的增加，比一次简政后，增百分之四二。县级在三次简政后为百分之一〇三，也比一次简政后增百分之三，专署则比第一次简政后人数又减少百分之五十七，边府又减少百分之六十六。

从干部与杂务人员的比较来说，历次减少是着重杂务人

员，例如专署级一次简政后，新编制杂务人员人数，相当于干部人数的百分之六十一，到三次简政后为百分之五十；县级一次简政后，杂务人员相当于干部人数的百分之六十六，三次简政后为百分之四十。区级一次简政后杂务人员相当于干部人数的百分之四十八，三次简政后为百分之三十九。经过历次简政，各级组科中的杂务人员所占比例已经是很小了。

干部调整的基本原则是精干上层充实下层，因职设人，不因人设职，在一定条件下提倡降级使用。以边府的调整为例，派到专署区的，第一次简政时为四十五人，第二次为一六四人，第三次为八十七人，派到各级直属局的，第一次简政时为五十六人，第二次为七十二人，第三次为一三六人，派到学校培养的三十四人。经过历次简政，各级干部比前得到了合理的使用与调整。在调整中曾发生过如下的问题和缺点：第一是本位主义。若干机关和干部只顾自己方便，总想给自己增加或保留一些人员，口头上拥护精简，实际上托故不让调动，或者有因机关合并，将本机关的生产节约所存全部浪费。第二是个人主义。有些人对自己的马匹勤务表示抗拒不让精简，或者表现“要减都减，不减都不减”的平均主义观点，有些被减的人表示悲观消极，认为这是奇耻大辱，甚至痛哭涕流。也有轻视被减者，未被减的自豪自骄的现象。这些表现，都是说明对精简政策缺乏正确认识，在领导上思想动员也不够深入，对精简下来的人员安置不够迅速，个别不够妥当。因而精简前后，机关呈现混乱，干部情绪动荡。二次简政因着重于机构改革，干部情绪没有多大震荡。到第三次简政时，因已有两次的经验，个人主义、本位主义与混乱状态，基本上是克服了，不过还有个别同志无条件的要求到后方学习，或一味企求个人物质享受而想调到工商部门工作，但在总的方面，三次简政是进步的多

了，主要的缺点是精简下来的人员没有尽可能的组织到生产里面去。

生息民力

由于人员的减少和机构的紧缩，便大大的节省了经费，也就是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如四三年的公粮征收，比四一年就减少了将近百分之三十三。同时对人民劳动的服役，有了严格的规定，村半脱离生产的干部，每月耗费时间不得超过八天，不脱离生产的干部，每月不得超过五天，群众服役每月不得超过三天。实行的结果，以榆次十个村的统计为例，在简政前每日村公所服务人员为九十六人，简政后则为二十八人，每月共节省民力一千八百个。在支差方面，根据边府拨出牲口的统计，四一年三月到九月，共要六六九二三头，平均每月为八三六六头，四二年三月到九月，共为一二九三头，平均每月为二〇六头，现在是除征收公粮时由群众运送一部外，所有机关部队平时食粮，全由自运。各地岗哨，已由划定边防线制，代替了一般的形式岗哨，且又确定了民兵的冬训制，以求不违农时，更反对民兵只顾活动，不事生产的单纯军事主义。

在另一方面，我们各级人员，不仅大大实行节约，学习与群众同甘苦，吃糠吃菜和吃代食品，且积极的更进一步的实现党中央的开展大规模生产运动的指示。

领导作风的改进

随着简政工作的实施，政府的领导方式与作风，也得到了改进：

第一，是领导一元化的加强，各系统的林立与平分春色的倾向，基本上已经克服了，三权鼎立的思想也相当地纠正了，同类机关合并了，一些次要工作放松了，主要负责干部能多考虑些工作领导问题与抓紧中心工作了。

第二，提高了各级政府独立工作能力，适当扩大了专署县府的权限，划清了各级职责。所以在更频繁的反“扫荡”与反“蚕食”斗争中，能够独立工作，粉碎敌人分割封锁与“蚕食”的阴谋，且上下职权分明，专署县府即可自己解决问题，因而就相当减少了上层的文牍主义、事务主义的作风。

第三，提高了领导质量，增大工作效率。就以边府而论，数次简政虽把一倍以上的人员减少，但工作任务并未减轻，且树立了朴实与艰苦的作风，一个人做三个至五个人的工作，同时在注意掌握政策方面也大有进步了。

第四，加强了干部劳动观念。一切自己动手，提倡节约与生产模范。简政后虽然杂务人员很少，但都能愉快的共同劳动、共同生产与做各种勤务工作。

第五，树立了干部群众观点，特别是四三年北局会议后，更强调了深入下层、深入群众，对克服政府中的官僚主义，收到了很大效果。

随着客观战争形势的变化和工作的发展、领导机构的改进，最近重新建立各级政府内建设系统与加强教育工作人员，以及政府的领导方式和作风也是不断的改善着。

根据一九四四年五月七日《解放日报》
刊印。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敌进攻河南 情况下的工作方针的指示

(一九四四年五月十一日)

华中局并转鄂豫边区党委，北方局并转冀鲁豫分局：

(一) 敌人已大举向河南进攻，目的在打通平汉线并控制陇海路、潼关以东一段，估计敌人暂时不会退出，河南平汉路以东及河南大部地区已成敌后地区，而国民党汤恩伯等部业已大败，溃散者颇多，河南秩序紊乱，人民抗日武装必然蜂起。

(二) 国民党在敌人进攻及国内国外各种压力之下，最近又对我党表示好感，林伯渠、王若飞同志已应国民党之邀请前赴重庆进行谈判。目前我们在各方面应避免刺激国民党，因此八路军新四军各部目前决不应向河南推进，以免引起和国民党方面的磨擦，妨碍大局，此点前已通令各地。

(三) 然而河南地方党员在目前情况下应该起来参加与领导河南人民抗战，应该组织抗日游击队及人民武装，建立根据地保卫家乡。现在河南党的组织与中央已断绝关系，中央无法派人前去指导。为此，北方局、华中局、冀鲁豫分局应分担发动与指导河南及皖北人民抗日游击战争的任务。中央决定：在郑州以西地区由北方局负责；平汉路以东之豫东地区由冀鲁豫分局负责；豫南及皖北地区由华中局及豫鄂边区党委与淮北区党委负责。

(四) 上述各负责党委应即切实侦察河南、皖北情况，并选择河南、皖北干部党员，秘密派回去进行群众工作及在可能条件下组织抗日游击队与人民武装，以便将来能给河南、皖北敌后游击战争以一般指导。但在目前我们所组织的游击队，暂时不得用八路军新四军的番号，党的关系亦应暂时秘密。它们一律以地方人民保卫家乡的游击队名义出现，至派回之干部党员及其所组织的游击队之具体活动及工作，由上述各该党委依照具体情形给以指导，并将情况报告中央。

书 记 处

五月十一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四册刊印。

毛泽东关于向国民党提出的二十条 谈判意见给林伯渠的电报

(一九四四年五月十五日)

必武^{〔1〕}转伯渠同志：

支、灰、文各电均悉，兹复如下：

(一) 王、张既屡求我方提具体意见，故决提全国者三条，两党者十七条，明日由军政部台发来，请备公函交给王、张。

(二) 为顾全彼方面子，谈判全文暂勿向外发表，但在判明彼方毫无诚意时，准备向外发表。

(三) 为避免刺激，王、张所指恢复新四番号及抗敌百分之五十八均未提出。

(四) 林案^{〔2〕}已被何应钦否决，年来情况亦大有变更，故须另提新案。

(五) 军队决不能少于五军十六师，徐向前同志必须编一军，边区必须编一师，林案四军十二师已不适用；再则全军四十七万均愿受政府指挥，应编十六军四十七师，此点亦应提到。

(六) 边区应正名为陕甘宁边区，以符实际，可设行政公署，人员民选，政府加委，直属行政院，其他地区仿此。

(七) 边区及敌后各根据地应请政府允许发行地方纸币，

此点必须坚持（或不提此事）。

（八）边区及敌后各地之民主设施，不能变更。

（九）如彼方承认中共可在全国各地办党办报，则我方可以承认彼方在我党区域办党办报，以为交换。

（十）其余请照二十条精神谈判。

（十一）要求彼方将“提示案”^{〔3〕}草稿先交我们审阅，协议妥当，再将正式提示案交我。如不事先协商妥当（内容及文字），则属彼方片面意见，我方不负实行之责。

毛 泽 东

删亥

二

林主席伯渠同志：

灰、文两电悉。请以下列文件提交王世杰、张治中，并和他们谈判。全文如下：

“为克服目前困难局面，击退日寇进攻，并认真准备反攻，中共方面认为唯有实行民主与增强团结一途。为此目的，中共希望政府方面解决若干急切的问题。这些问题，有关于全国政治方面者，有关于两党悬案方面者，兹率直牖陈如下。

甲、关于全国政治者：

（一）请政府实行民主政治与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及人身之自由。

（二）请政府开放党禁，承认中共及各爱国党派的合法地位，释放爱国政治犯。

（三）请政府允许实行名副其实的人民地方自治。

乙、关于两党悬案者：

（一）根据抗战需要、抗战成绩及现有军队实数，应请政府将中共军队编为十六个军四十七个师，每师一万人。为委曲求全计，目前至少给予五个军十六个师的番号。

（二）请政府承认陕甘宁边区及华北、华中、华南敌后各抗日根据地民选抗日政府为合法的地方政府，并承认其为抗日所需要的各项设施。

（三）中共军队防地，抗战期间维持现状，抗战结束后另行商定。

（四）请政府在物质上充分援助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自一九四〇年以来，政府即无子弹、片药、文钱、粒米之接济，此种状况请予改变。

（五）同盟国援助中国之武器弹药、药品、金钱，应请政府公平分配于中国各军，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应获得其应得之一份。

（六）请政府饬令军政机关撤销对于陕甘宁边区及各抗日根据地的军事封锁与经济封锁。

（七）请政府饬令军事机关停止对于华中新四军及广东游击队的军事攻击。

（八）请政府通令取消‘奸党’、‘奸军’、‘奸区’等诬蔑与侮辱共产党、十八集团军、新四军及抗日民主地区的称号。此等诬蔑与侮辱的称号，过去还是暗中流行，近更公开见诸报纸。

（九）请政府停止特务人员对于共产党、十八集团军、新四军及抗日民主地区的破坏活动。此种活动，变本加厉，中共获有充分证据，如不停止，妨碍团结实重且大。

（十）请政府饬令党政机关释放各地被捕人员，例如皖南事变时被俘的新四军官兵叶挺等，广东的廖承志、张文彬等，

新疆的徐杰^[4]、徐梦秋、毛泽民、杨之华、潘同等，四川的罗世文、车耀先、李椿、张少明等，湖北的何彬等，浙江的刘英等，西安的宣侠父、石作祥、李玉海、陈元英、赵祥等。此等人员，均属爱国志士，请予恢复自由，以利抗日。

（十一）请政府禁止在报纸、刊物上发表对中共造谣诬蔑的言论，例如西安特务人员谓延安枪毙王实味等数十人，竟伪装王实味等亲友于三月二十九日在西安大开追悼会，在报纸上登载追悼广告与追悼新闻，实则王实味等绝无所谓枪毙情事。似此完全造谣有意诬蔑，应请飭令更正，并制止再有类似此等事情发生。

（十二）又据确息，西安一带特务机关，准备于外国记者团到西北时，沿途伪装各种人物与伪造各种证件向外国人告状，借达破坏中共信誉之目的，闻彼辈所捏造之中共罪状共达十余项之多。似此不但妨碍团结，而且有辱国体，请政府予以制止。彼等伪装伪造，发踪指示，奔走布置，中共获有充分证据，如不制止，难免引起不快之后果。

（十三）请政府允许中共在全国各地办党办报，中共亦允许国民党在陕甘宁边区及敌后各抗日民主地区办党办报。

（十四）请政府停止对重庆中共《新华日报》之无理检查（例如禁登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的作战消息，禁登中共文件等），破坏发行，威胁订户，扣压邮寄等情事。

（十五）请政府发还在三原被政府军队扣留之英、美援助十八集团军的药品一百零一箱。

（十六）请政府允许恢复重庆、西安两处电台，以利通讯。

（十七）请政府允许中共代表及十八集团军办事处人员有往来于渝、延间及西、延间之自由，及允许西、渝两办事处人员有在该两地居住与购买生活物品之自由。”

以上各条，由你用中共中央代表名义签名，并书明年月日，以书面正式交给王、张。

毛 泽 东
辰 删（五月十五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三卷刊印。

注 释

〔1〕即董必武。

〔2〕一九四二年十月至一九四三年六月，林彪受中共中央委派在重庆同国民党谈判。林彪根据中央指示，向国民党提出四点：（一）在允许中共合法的条件下，可允许国民党在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办党；（二）八路军、新四军编为四个军十二个师；（三）陕甘宁边区改为行政区，人员、地域不动；（四）八路军、新四军黄河以南部队，在抗战胜利后北移。

〔3〕指国民党政府对中共问题政治解决提示案。一九四四年六月五日，国民党代表王世杰、张治中将该提示案面交中共代表林伯渠。其主要内容是：中共领导的军队，只能有十个师，其余部队限期取消；这十个师必须集中到规定的地区；敌后抗日根据地政府一律交重庆政府“接管”。

〔4〕即陈潭秋。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目前不应向 新黄河以西发展给北方局转 冀鲁豫分局的指示

(一九四四年五月十八日)

北局转冀鲁豫分局：

五日电悉。

(一) 为避免刺激国民党使之安心作战计，我军此时不应大举向新黄河以西发展，且现在汤^[1]部尚有何柱国，陈大庆两个集团军和平汉东面，亦不容许我军向新黄河以西。但现时我应以水东支队，极力向四方发展，逐渐扩大自己根据地。主要打击伪军，对顽军则避免作战。如该支队力不胜任时，由你们酌增派兵力及干部，但仍以水东支队名义出现。

(二) 决定杨勇同志为分局委员，参加常委会议。

(三) 关于冀鲁边属何处领导，待询问山东后再定。

中央书记处

五月十八日

附：冀鲁豫分局关于向豫皖边 发展等问题的意见

（一九四四年五月五日）

北方局请转中央：

敌自攻正面后之对策，中央必早有成策，现将我们意见电上，是否有当，请示。

（一）豫皖边境，自汤部西撤后，顽军仅余地方土顽，敌人及大部伪军（如张岚峰）亦陆续西进，敌顽势力均极单薄，是我们发展良好机会。过去经验，遇此混乱局面，事不宜迟，往往是先以主位，当地的正统，则费力小，收效大。过去人家势力养骄，则难以插手；且硬争夺，政治上也不利。故向该区发展，虽一般较抗日初期困难，但目前发展陇海路南，津浦路西，有华北华中根据地作依托，进退极为自如，尽可能扩大与伸入，无后顾之忧（不利时，随时都可以回来）。敌后顽我竞争，是我优顽劣，只要我是有阵地的推进，敌后无处不可发展。因此，向南发展方针，请即指示，以便着手准备。

（二）冀鲁边区敌，春来敌伪紧缩防区，撤走据点不少（约破坏打掉的在内）。最近又退走之伪军（如李英、张岚峰、孙殿英等），将继续南撤，接替敌人所占区防务，而使得我之根据地、游击区发展困难，与各分区间的联系不容易打通。扩大计划大部已结束（约有一万余人），因地区扩大，新战士过多（各团中新老兵各一半），故兵力及干部均感不够用。

（三）如中央有我们南下发展的任务，我们当尽量抽一批地方干部，兵力也能调一千二千人左右去发展。提议中央再从

山东抽调一个大团及一部地方干部。

(四) 山东与华中打通后，我们意见，山东仍归华中建制。

(五) 冀鲁边工作，由我们或由山东负责，亦请中央明示。
我们意见，仍由山东分局负责。

冀鲁豫分局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注 释

〔1〕指汤恩伯。

在陕甘宁边区工厂职工 代表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日)

刘 少 奇

我们陕甘宁边区最近几年搞起来一件新的东西，这就是工业。我们今天的工业规模虽然还很小，但这几年的发展是惊人的。一九三五年时，这里只有几十个工人的一个修理厂，而现在则已经有一万多工人了。这次会议以后，相信会有更快更大的发展。我们新民主主义的政府，是保障工业的发展的，老百姓也需要发展工业，以便于达到工业品的完全自给。现在世界上凡是强大的国家，都是工业国。苏联经过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大大发展了工业，就把苏联从农业国家变成工业国家，因此他们就能进行如此伟大的消灭德国法西斯的战争。我们中国之所以弱，也就是因为我们还只有很少的工业，我们还不是一个工业国。要中国强盛起来，也必须使中国变成工业国。我们将来的责任，就是要把中国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那时候我们就要建造很多的工厂、铁路和轮船，搞很多的机器，需要很多的厂长、工程师、技师、工人和很多的劳动英雄。所以工业这个新的东西，有它极远大的前途。使中国变成工业国是我们奋斗的远大目标。

我们有很多同志不了解这一点，因此要他做经济工作、做

工厂工作就不高兴，他们说干这一行没有前途。依我看，无论做什么工作，都没有像做经济工作、工厂工作这样有前途。比如有很多同志，特别是长征过来的，他们总喜欢带兵打仗，他们可以当团长、当旅长。当然，在今天仍进行战争的时候，我们每个同志都应该学习打仗，应该奖励与拥护那些战争中的英雄。但是，不久的将来，战争打完了之后，那些团长、旅长又干什么呢？那时有许多同志就要放下枪杆来搞你们这一行——搞工业、搞经济或者搞文化。那时你们就是“老资格”，就是先生，他们就要向你们学习，你们就要当领导人。

将来有没有这样一个时候，像战争一样，工业也可以不要了呢？我看就是在长远的将来，工业不仅不能被取消，而且必然要大大发展的。现在边区的一百五十万人当中，大多数是农民，工人只有一万多，可是这一万多人却最有前途。几千年以来的农民，发展到今天还是农民，几乎没有大的变化。以后怎样呢？以后农民一天天就会减少的，因为以后开荒、耕种、收割大都用机器，工业技术要普遍运用到农业中去，那时农民就会变成驾驶农业机器的工人了。今天边区农民的作用与农民的力量很大，可是就发展前途来说，今天这样的农民，在将来是要起变化的，只有无产阶级和工业是最有前途的。

但是要达到那样远的前途，一定要从今天的实际情况出发，一步步地向前发展。所以我们要好好地学习、研究，把办工厂当做一门学问，用严肃的态度对待它。例如，怎样组织劳动力，怎样管理工厂，怎样改良技术，怎样规定工资等等，都要用心去研究。我们要熟悉这门知识，要使学习在工厂中成为一种风气。厂长、工程师要学，工人、职员也要学，学徒更要学，大家互相学习，这是促进我们事业发展的一种动力。须知

我们现在还有好多事情没有搞，很多事情搞得不好，或是搞错了，这在开始当然是免不了的。但是我们必须从这些搞不好或搞错了的经验中去学到本事，使我们以后能够搞得好，能够少错一点，我们才可以前进。

在学习中，无论什么人，一定要放下“包袱”，去掉骄傲，才能够学好。不要以为我是从城市里来的，我已经学好了，看不起这里山沟中的东西。对眼前的事情不好好学，不加以研究，你就不能把眼前的事情搞好。至于从农村中出来的同志，那更要好好学习，否则，不独现在的事情办不好，将来更无法应付。抗战要胜利，这是没有疑问的。可是在抗战胜利之后，甚至在胜利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想象得到，情况是会发生变化的。现在我们是在山沟里、在窑洞中搞，将来我们就会到城市中去。那时不仅有大工厂要办，而且有铁路、有火车、有轮船，要我们去管理。如果我们现在还不把这比较简单的本事学习好，那末将来遇到那样复杂的大的场面又怎么办呢？今天我们开这个代表会，固然是为了推进边区工业的发展，同时也是为了提高我们。只要我们认真学习，我们就可以把边区的工业搞好，不久的将来，也就可以搞更大的工业。

我们既然认识工业的前途是最远大的，我们从事这个工作的同志，就应该有决心把这件事情当做自己的终身事业，一定要把它搞好。一年不行，三年五年、十年八年，是一定能搞好的。我们必须把这样的事业精神和我们固有的革命精神结合，那一切的事情都是能够办好的。

大家知道，我们的工厂是公家办的，不是资本家办的。资本家是为了追逐私人的利润而办工厂，我们办工厂不是为了哪一个人发财，而是为了大家好，为了国家好，在今天是为了打

败日本。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中发展工业，我们同时采用私营与公营这两个办法。我们应该帮助私人多办一些工厂，因为生产出来的东西多了，对于我们的经济是有好处的。但有些事情私人不办或办不了的，便只好公家来办，即国家办。我们的国家是属于广大人民群众，工农兵在这个国家中占主要的成分，公营工业也就是劳动者自己的。在我们的公营工厂中没有资本家，因而工人与工厂就没有不可调和的冲突。所以，在我们工厂管理方法上，就不是采取资本家的那一套办法。我们管理工厂的方针应该是：用一切方法与工人合作，依靠工人的积极性；工人也应该以一切方法和工厂合作。要办好工厂就要依靠大家，依靠大家都发挥出高度的积极性。

邓发同志讲过，工厂管理人应该有群众观点，这很对。但工人同志也应该有群众观点。你织的布，做的衣服和鞋子，都是给八路军穿、给人民穿的，你做的东西，都是给八路军和人民用的（资本家开工厂所制造的物品就不管哪个穿、哪个用，只知道赚钱，这叫做发财观点或利润观点）。如果你织的布不好，一穿就破了，鞋子做得不结实，给八路军穿，一个冲锋就烂了，那就是没有群众观点。因为我们产品的消费者是工农兵大众，开工厂就是为了替大家做事，就应该对大家尽责，不可因追求数量而忽视质量。工厂管理者在可能条件之下，应该把工人的文化生活、物质生活都搞好，使他们安心工作。大家都应该有群众观点，大家负责。有困难，大家讨论、大家研究来求得解决。领导是要集中的，每个人办事的职责应该分明。谁的工作没有做好，谁就应该负责，就应受到适当的指责。这样，我们的工厂便一定可以办得好。

总之，我们不仅能组织政治斗争、军事斗争，而且要会组织经济、组织工厂、组织劳动力、组织市场等。这是一门高深

的学问。我们从今天开始，一定要把它学会，使我们中国在不久的将来也变成一个经济繁荣的工业国家。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出版的
《刘少奇选集》上卷刊印。

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的工作报告

(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一日)

毛 泽 东

今天因为时间的限制，我只能向全会作简单的工作报告，详细的中央工作报告是否还需要，请大家考虑。我觉得不必作详细报告了，因为最近这个时期中央的工作，中央同志都知道，参加全会的同志也大体知道。至于是否要向七大作从六大到现在的详细的中央工作报告呢？我觉得从六大到现在有十六年，中央主要负责人换了几次，这个详细报告也很难作，对于过去工作的检查，准备放到历史总结中去。过去联共中央向大会作的工作报告，实际上也就是政治报告，我们只准备对七大作政治报告，不另作工作报告，工作的总结也可以在这个报告中提到，只解决已经成熟了的中心问题。

我今天只讲抗日准备时期和抗战时期的主要问题。在抗日准备时期和抗战时期，我们的目的就是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而奋斗。为达到这个目的，我们的方针就是发展自己，团结友军。这个方针最初决定于瓦窑堡会议（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以后的民主共和国决议（一九三六年九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一九三七年五月）、洛川会议（一九三七年八月）、六中全会（一九三八年九月至十一月）直到现在，都是为执行这个方针而斗争的。我们在执行这个方针中，对于如何发展自己

与团结友军，对于日本、国民党与我党的看法，对于当时形势的估计与具体政策，是有争论的。我今天讲话的目的，就是要为中央的政策作辩护。

这里有国民党河南调统室给其中央调统局的一个关于河南战争的报告，是最近时期抗战情况的典型材料之一，请王首道同志宣读一下。这个材料表明，蒋介石的三个主力之一汤恩伯如何完全无能，日寇乱冲一顿，他们就乱跑一顿，胡宗南有两个师在河南也只剩下一个团。这证明抗战中的两个方针带来的不同结果：不民主的方针必然使抗战失败，只有民主的方针才能战胜敌人。蒋介石的中央军没有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的教育，只有法西斯的教育，因而战斗力完全瓦解，一击即溃。我们的八路军、新四军实行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的教育，我们充分发动了人民的力量，在敌后建立了十几个根据地，曾经停止了敌人在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达五年半之久。现在日本进攻河南，是因为日本要救死，国民党太不行，而共产党的力量又还没有达到保护汤恩伯的程度。现在胡宗南也有一部分军队调到河南去了，如果胡宗南也和汤恩伯一样，蒋介石的三个主力就塌掉两个，中国政治局面就会起大的变化，国民党与共产党力量的对比也会起变化。将来在英、美准备反攻的条件下，日本的军心民心和中国敌占区民心大大动摇时，日本力量和八路军、新四军力量的对比也就会起变化。实行民主则胜，不实行民主则败，以前这还只是我们的一种理想，现在开始变为现实了。去年我们发表《国共两党抗战成绩之比较》，使外国人注意共产党的抗战力量。英、美从来没有像现在对国民党和蒋介石作过这样露骨的批评的。胡政之访问英、美回国后，请董必武、潘梓年同志吃饭，说他在外国讲中国共产党有前途，他又说国民党十二中全会无希望。最近孙科说要辞职，

于右任不愿参加十二中全会。这些人都是寒暑表，表明情况要有变化。

关于发展自己，发展八路军、新四军和抗日民主根据地，以此为代表中华民族打击日寇的中心力量，这个问题中央曾做过很多工作来同反对这个方针或不积极执行这个方针的同志作斗争。华中与山东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曾经表现得最严重，差不多花了一九三九年一整年才纠正过来，但后来还是出了皖南事变，到皖南事变后才彻底纠正过来。当日军占领江、浙，国民党逃走一空时，我们的同志不敢当县长，说是没有人委任。当山西新旧军冲突时，旧军向新军开枪，新军要不要还枪也成为问题。这些就是在民族战争中不敢实行独立自主政策的具体表现。问题就是要不要独立自主的政策。在今天的世界上，苏联的政策是最独立自主的，美国次之，英国犹豫，在法国、意大利、波兰等问题上，英国都徘徊于两可之间。蒋介石也是这样，对共产党及其他许多政策都表现出徘徊犹豫，表里不一。汤、胡均以反共的《剿匪手本》为教材教育其军队，这样的军队对日一定是没有战斗力的。我们就不同，始终采取独立自主的政策，我们始终站在团结国民党抗日的立场上，但遇到反共磨擦则要同它斗争，使国民党既不能投降日本又不能大举进攻共产党，将国民党引导到对敌斗争一个目标上去。在反磨擦中，我们是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使磨擦斗争归于缓和，我们对于三次反共高潮都是如此。我们在抗战初期只是一个很小的党（不超过四万有组织的党员）和一个很小的军队（只有四万五千人），发展到现在的近百万的党员和近五十万的军队。当一九三五年冬季中央苏区红军长征到陕北时，只剩下七千人，成了“皮包骨”。我们当时说长征是胜利了，长征是播种机和宣传队，留下的这点力量，不要看轻了它，它的发展

前途是很大的。当时有些同志发生悲观情绪，其实是很不符合实际的。从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九年，我们曾经希望改造国民党，所根据的是张学良进步的先例与国民党丧失了江、浙的地盘。但是这个希望落空了，不过我们并没有亏本。归根结底，主要是靠了八路军、新四军，才挽救了民族的危亡，抗击了百分之五十八的日军与百分之九十的伪军。没有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战，中国的抗战决不能有今天。我们发展八路军、新四军和抗日根据地的政策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团结友军的政策也是完全正确的。

我党在抗日时期的发展，经过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〇年。这一阶段的头两年，日本以主力对付国民党，国民党也比较有朝气，国共关系比较好，我们采取了游击战争的方针，发展了军队，建立了根据地，开办了干部学校。对运动战还是游击战的问题，我们内部也发生过争论，但是还是执行了以游击战为主的正确战略方针。统一战线政策在一九三八年受过一次挫折，后来被六中全会纠正了。在第一阶段，我们队伍中生长了一股骄气，有些同志过于轻视日本，过于相信国民党，自以为万事大吉，骄傲得很，这一点是吃了亏的。

第二阶段是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二年。日本以主力对付共产党，举行了无数次的残酷“扫荡”，实行“蚕食”政策与“三光”政策，我们的根据地、人口和军队都缩小了。但是这种困难教育了我们的同志，我们采取了适宜的政策，例如对敌斗争、整顿三风、精兵简政、拥政爱民、发展生产、统一领导、“三三制”、减租减息等，都有成绩，因此我们在敌后站稳了脚。我们虽然受了损失，但是得了经验，渡过了困难。这一阶段，日本对国民党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政

策，这个政策还是从一九三九年就开始了的，到一九四一年汪精卫成立傀儡政府而更露骨，日本对国民党差不多没有大的军事行动。国民党则日趋反动，对日本的进攻采取消极的态度，对共产党和人民大众发动进攻则是积极的。

第三阶段，从去年开始。我们的根据地、人口和军队又上升了。军队现在有四十七万人，战斗力提高了；党员发展到九十余万；根据地人口，在第一阶段直接、间接负担粮税的近一万万，第二阶段降到不满五千万，一九四三年又上升到八千多万。各种政策更有进步，特别是整顿三风与发展经济。整风是为着弄通思想，团结全党。我们党基本上是团结的，但在各种政策问题上有许多不同意见，有各种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作风，而在纠正之后又团结了。统一是我党第一个侧面，不统一是第二个侧面，这两个侧面都要看到。历史上的曾经起过不良作用的宗派，在政治上与组织上已不存在了，但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思想的残余还是有的。现在还严重存在着带有盲目性的山头主义倾向，这是由于中国小资产阶级的广大、长期被分割的农村根据地与我党教育工作的不足而产生的，必须加以克服。经济工作是我们长时期内缺乏经验的，现在我们要大大地注意。

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是未解决根据地问题，而提出准备暴动，夺取大城市。这在六大到现在都是不可能实现的，但将在七大以后去实行，七大以后我们必须实行这条方针。一九二七年我们曾经配合薛岳占领了上海，但是随即受到国民党的袭击。现在我们要将薛岳进上海变为陈毅进上海，而且我们有了几十个“薛岳”。六大至七大我们实际上走了根据地路线，现在也必须坚持根据地。在根据地上，我们必须发展经济。一九三九年陕甘宁边区只有七百个工厂工

人，一九四二年即有四千个，今年有了一万二千个。如果边区有三万个工厂工人，边区工人同边区人口的比例即超过全国工人同全国人口的比例。党的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到农村，曾经发生过许多争论，将来由农村转到城市，又会发生许多问题，这就要求我们要有精神上的准备，学会做经济工作，学会做城市工作。将来农村是供给军队粮食和干部的地方，没有我们，没有八路军、新四军，是不可能把日本侵略者赶出大城市的。

我们党要准备应付将来的大事变。七大要选出比过去二十三年更强的更有能力的中央。

关于国共谈判，林伯渠同志这次出去，国民党派文武两大员^{〔1〕}迎接，每天谈四小时，沿途招待，空前未有。原来我们的估计很低，以为这次不能解决问题，故要林伯渠同志只提出一些小事。彼方提出根据林彪去年提的四点来谈判，林老答以根据恩来今年提的五点^{〔2〕}来谈判，彼方又不赞成，故党中央提出了二十条。前途不外两个：一仍是拖；一是解决部分问题，如军队问题、边区问题、防地问题、在个别地点办党办报问题。他们如决心解决这四个问题，我们应准备接受，向全国表示我们愿意搞好国共关系。

今年军事仍以精练为主。明年准备发展，并占领一批小城市，准备驱逐日寇出中国。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三卷刊印。

注 释

〔1〕指王世杰和张治中，当时他们是参加国共谈判的国民党代表。

〔2〕指周恩来一九四四年三月十二日在延安各界纪念孙中山逝世十九周年大会上所作的《关于宪政与团结问题》演讲中向国民党政府提出的五点要求，即：

承认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承认陕甘宁边区及各抗日根据地为国民党政府的地方政府；承认八路军、新四军及一切敌后抗日武装为国民党政府所管辖所接济的部队；恢复新四军的番号；撤销对陕甘宁边区及各抗日根据地的封锁和包围。

共产党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

(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二日)

毛 泽 东

现在无论中国和外国都为了同一的目标而奋斗，那就是打倒法西斯。我们陕甘宁边区的工业建设，也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目的的一样，是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边区在五年前才真正开始有了一点工业，当时只有七百个产业工人，一九四二年有了四千个工人，到了今年就有一万二千个工人。所以边区工业的进步是很快的，它的数目虽小，但它所包含的意义却非常远大。谁要不认识这个最有发展、最富于生命力、足以引起一切变化的力量，谁的头脑就是混沌无知。这次开大会的目标，就是在两年以内要争取做到工业品的全部自给，首先是布的自给与铁的自给。假如我们做到了全部自给，我们工人的数目还会大大地增加。全体工程师、厂长、工人们都要向这方面努力，共产党员和非共产党员都要向这方面努力。像沈鸿同志、陈振夏同志，他们不是共产党员，但是他们的心和共产党员一样，都是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而艰苦奋斗的。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必需有工业；要中国的民族独立有巩固的保障，就必需工业化。我们共产党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

*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为陕甘宁边区工厂厂长及职工代表会议举行的招待会上讲话的摘要。

中国落后的原因，主要的是没有新式工业。日本帝国主义为什么敢于这样地欺负中国，就是因为中国没有强大的工业，它欺侮我们的落后。因此，消灭这种落后，是我们全民族的任务。老百姓拥护共产党，是因为我们代表了民族与人民的要求。但是，如果我们不能解决经济问题，如果我们不能建立新式工业，如果我们不能发展生产力，老百姓就不一定拥护我们。在抗日战争中，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抗击了百分之五十八的日军、百分之九十的伪军，这方面我们是有经验、有成绩的。但是，对于经济工作，尤其是工业，我们还不大会，可是这一门又是决定一切的，是决定军事、政治、文化、思想、道德、宗教这一切东西的，是决定社会变化的。因此，所有的共产党员都应该学习经济工作，其中许多人应该学习工业技术。我们边区是个大学校，其中有一门课叫做工业，这次职工代表大会便是一个工业的短期训练班。如果我们共产党员不关心工业，不关心经济，也不懂得别的什么有益的工作，对于这些一无所知，一无所能，只会做一种抽象的“革命工作”，这种“革命家”是毫无价值的。我们应该反对这种空头“革命家”，学习使中国工业化的各种技术知识。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三卷刊印。

在延安大学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四日）

毛 泽 东

同志们！今天延安大学开学。我们这个学校是一个包括政治、经济、文化课程的学校，你们要学政治、经济、文化，准备将来去做这些方面的工作。这个学校，过去有些部分是分开办的，现在合起来了。像周扬同志所讲的我们的工作中间有缺点错误，但是我们的缺点错误是暂时的。共产党人在工作中有缺点错误，一经发觉，就会改正。他们应该不怕自我批评，有缺点就公开讲出是缺点，有错误就公开讲出是错误，一经纠正之后，缺点就不再是缺点，错误也就变成正确了。过去办学校办了多年没有搞好，现在有了进步，方针、办法上了轨道，这是同陕甘宁边区和华北、华中、晋西北等各个根据地整个工作的进步相联系的。

我们的一切工作，只有一个目标，就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深入中国国土，每一个中国人的任务就是打日本。有些人反对共产党，和我们闹别扭，这些人就违背了这个方针。在这个问题上，他们是两条心。我们是一条心，开大会是一条心，开小会也是一条心，公开的、秘密的都是一条心，就是要把日本打出去。要把日本打出去，就要建立根据地。整个中国凡是没

陷的地方都是抗日的根据地，大后方是根据地，华北、华中是根据地，广东、海南岛是根据地，陕甘宁边区是根据地，我们共产党在许多地方创造了抗日的根据地。有人说根据地不好，不应该有根据地，这个话不妥当。没有根据地，八路军、新四军就没有饭吃，没有地方出发去打敌人。什么人最恨我们的根据地？就是日本帝国主义，它不喜欢我们的根据地，因为根据地在它后方把它挤出去。我们有了根据地，就要做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党务等工作。党校是学习搞党务的，也有政治、经济、文化课程，还有一些军事课，但是比较偏重讲党的理论，党的历史和作风。抗大也学政治，也搞生产，也讲经济。现在我们的军队都讲经济，三五九旅搞生产，今年要求每个战士、干部都要生产六石一斗细粮，这不是经济吗？所有我们的军队，搞饭吃，做衣服，修房子，盖大礼堂、小礼堂，做桌椅板凳，一概都是自己动手，这都是经济。延大的学习偏重政治、经济、文化这三门，各个根据地都搞这些工作。唯一的目就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把中国变为独立、自由的新中国。刚才周扬同志说要为边区服务，要为这个根据地服务。可不可以有一个两个，两百个，两千个，到晋西北、太行山、泰山、五台山的根据地去服务？那里也叫边区，大体上我们的根据地都叫边区。我们是为根据地服务，为什么不说是为全国服务呢？因为你总要落一个地方，像飞机飞上天总得飞回来要落在一个地方，不能到处飞不落地。教条主义是不落地的，它是挂在空中的。我们不要搞教条主义，要脚踏实地地为实际服务。

日本是实在的东西，它落在中国有几十万军队打我们。现在我们各个根据地负担的敌人很多，抗击了百分之五十八的日军和百分之九十的伪军。有些人看不见这个事实，诬蔑我们好像一个日军也没有打，一个伪军也没有打。去年《解放日报》

发表了我们的一篇文章，叫做《国共两党抗战成绩之比较》，那里头就有数字，有百分之五十八、百分之九十等。现在我们有四十七万八路军、新四军，其他党政机关民众团体的工作人员大概有二十五万，四十七万加二十五万就是七十多万。现在各抗日根据地直接和间接交公粮的人口一共有八千多万。过去有一万万，后来日军“扫荡”，把正面战场的大量兵力调回来，对正面战场采取军事进攻为辅、政治诱降为主的方针，集中力量要把我们搞垮，要把我们摧毁，实行“扫荡”、“蚕食”、“治安强化”、“三光”政策。“三光”，就是烧光、抢光、杀光。我们也要有一套去对付它，这就是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党务。战争最残酷的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这两年，各抗日根据地遇到了很大的困难。《解放日报》写了一篇社论叫《破晓前的黑暗》，号召大家努力来战胜这个困难。各个根据地的党、政、军、民全体努力，实行十大政策，熬过难关。敌后的困难很多，延安也有很多困难，例如《野百合花》问题，只有小米没有猪肉问题。延安发展生产很好，还要继续发展，猪肉还要吃得多一点。那天我同周扬同志谈，你们大家纺纱，还有各种专门生产，都很好，但我看现在还不够，还要努力发展。敌后的情况更困难，大体上各个根据地都很困难，因为敌人实行“三光”政策。敌后是非常艰苦的，斗争也非常激烈，但是我们站住了脚，坚持抗战七年之久。这个残酷的战争经过最困难的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今年我们又向上发展了。中国所以有今天，就是因为有我们的抗日根据地。当然，如果说大后方这个大根据地一点不救中国，这个话也不妥当。有的人说只有他那个大后方根据地救中国，边区和敌后根据地不救中国，这就完全没有道理。你那里是怎样救中国的？你们三百万军队只负担日军的百分之四十二、伪军的百分之十，我们四十七万

军队负担却那样重。我们的根据地比较小，但是担子很重，没有任何接济，就靠我们党政军和老百姓结合起来，一齐努力奋斗。这次河南战役，日军十余万，国民党军队约四十万，就不挑担子，一听枪响就“向后转，开步走”。现在许多事情难办，所以要搞一个办法，就是民主，这个办法有的人不赞成。还有一条就是团结，有的人也不搞，他那里发小册子，开大会小会，骂共产党为“奸党”，八路军为“奸军”，边区为“奸区”，很不讲团结。

总之，延安大学要为各个抗日根据地服务。根据地的工作上了轨道，我们陕甘宁边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党务各项工作上了轨道，就使得我们的学校也上了轨道。但是过去的缺点一定要克服，教条主义一定要去掉。

政治上你们要学习党的方针和政策，如统一战线、“三三制”、精兵简政等。工业、农业、商业、运输、财政，你们都要学习，现在的方针是要全面自给。“三三制”的执行，前年开高干会以前右了一点，去年又“左”了一点。我们的方针是非常清楚的、确定的，就是打日本，中国的一切党派，一切阶级，一切政治的、非政治的团体，只要是赞成打日本、同共产党合作的，不是破坏共产党的，我们都要团结。这个方针是始终不变的。同志们学政治，就要坚持这样的方针，团结全国人民，达到打败日本的目的。

经济上要做到全面自给，几年以来，特别是去年以来，我们的经济有很大发展。全面自给，除了搞饭吃，还要生产各种用的东西。现在边区政府发了指示，要求边区人民的所有家庭，一百四十万人口，三十五万家，每家有一年余粮。不仅要防备天旱，还要准备反攻。这个目标去年没有达到，要在今后两三年以内实现。我们在延安、在边区做工作，办延大，如果

使得三十五万家农民都有一年余粮，那末我们共产党就了不得。还有陕北的山头都是光的，像个和尚头，我们要种树，使它长上头发。种树要订一个计划，如果每家种一百棵树，三十五万家就种三千五百万棵树。搞他个十年八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此外，还有工业，现在开工厂代表大会，提出日用工业品要全面自给。边区工、农、商、学、兵一百五十万人口，一年需要三十一万匹布，可是我们现在每年只能生产十万匹，还差二十一万匹。我们要在两三年内完全解决衣服的全部自给，根据过去经验，这是有把握的。边区过去的棉花、棉纱、布，都要从外面买，要花几十万万元边币，血向外流。如果我们棉花自己种，棉纱自己纺，布自己织，一百五十万人大家动手，血就不流出去了，我们的经济就更坚实。每年公家和老百姓需要四百七十万斤铁，大部分不能自己生产，又要花几十万万元边币从外面买，血又要向外流。现在要求在两三年之内做到四百七十万斤铁完全自给，自己采矿，自己冶炼，并制造必需的机器和农具。我们的工业生产有各个种类，主要的是纺织和炼铁这两项。这两项主要的要做到自给，其他各项也都要自给，这是全面自给。

关于文化教育问题，也有很多工作。我们要达到这样的目的：边区一百四十万老百姓，十万党、政、军，一共一百五十万人，都要识字。我们要有文化，才能学习政治，将来当乡长、区长、县长都要有文化。边区的经济发展了，农民也要求有文化。我们要使边区所有的老百姓，每人识一千字，搞他十年八年。如果能识一千五百字、两千字、三千字，那更好。我们至少要做到识一千字，每村要有一个冬学。识字要成为群众性的识字运动，单靠我们下去教“一、二、三、四”，“人、手、刀、牛、羊”，那是不行的，老百姓里头有识一百字的就

可以教别人。

还有卫生工作。周扬同志说了，要开一个卫生班，学一点东西。每个乡要有一个小医务所，边区一共一千个乡，一百五十万人里头找出一千个人来学医，学他四个月、一年也好，然后到医务所当医生。近来延安疫病流行，我们共产党在这里管事，就应当看得见，想办法加以解决。我们边区政府的副主席李鼎铭同志是中医，还有些人学的是西医，这两种医生历来就不大讲统一战线。我们大家来研究一下，到底要不要讲统一战线？我不懂中医，也不懂西医，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作用都是要治好病。治不好病还有医术问题，不能因为治不好病就不赞成中医或者不赞成西医。能把娃娃养大，把生病的人治好，中医我们奖励，西医我们也奖励。我们提出这样的口号：这两种医生要合作。

文化上你们还要学会演戏，扭秧歌，还要学会唱歌，唱黄河大合唱、小合唱，等等。政治、经济、文化，是我们延大学习的内容，一定要学好，要会做这方面的工作，要为实际服务，不搞教条主义，不脱离实际。

周扬同志刚才说到了整风和审干，这两件工作有很大的意义，改造了人，改造了思想。同时也犯了错误，正在纠正。除了周扬同志讲的以外，我再讲几句。我们有一条方针，叫“一个不杀”。有人还不相信，说不晓得政府哪一天会要杀。真正是特务，过去做了破坏边区和八路军、新四军的事情，搞了情报，只要交待清楚，我们一个不杀。从去年四月到现在，一个也没有杀。这有没有坏处？没有坏处。对于真正的特务，过去真正的坏人，我们的目的，是要把他改造好。我们的方针是教育人，这个方针是确定了的，我现在再一次向你们宣布。有人相信，有人不相信，信不信由你。《论语》上说“言可復也”，

意思是说过的话是要实行的。中央决定的方针，既然宣布了，就要实行，大家可以看。一个不杀，这个意义大得很。不管有多大的罪，既然不杀，就可以教育，教育好了，还能做点事情。过去做了坏事的真正的特务，我们希望他自己觉悟，跟我们一道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如果一百个人中，有一两个人硬不觉悟，硬不合作，怎么办？有办法，让他自己搞小米吃，自己动手，发展生产，丰衣足食，那有什么坏处？他不觉悟，不同我们合作，顽固得很，我们刀下还留不留人？我们刀下还要留人。为什么要留？为了稳定多数人，因为杀了他，其他有类似问题的人便要恐慌。你顽固十年，就让你劳动十年，你顽固二十年，就让你劳动二十年，你顽固，我们也顽固，就这样顽固下去。这叫做是则是，非则非。是特务就是特务，要搞清楚，使他们不再做特务的工作，能同共产党合作打日本。非则非，本来不是特务，搞错了，给他戴上了特务帽子，我们就要把帽子取下来，要分清是非轻重。“抢救运动”那时候，空气紧张得很，“抢救”了好些人，许多是搞错了的，非则非，今天要行脱帽礼，脱去给人戴错的帽子。共产党办事，不明白的时候是会犯错误的，明白了以后错误就要改正，这样做才是正确的。搞错了是坏事，但可以变成好事。比如我冤枉了你，现在经过我的手取下给你戴错的帽子，从这里我们得到了经验，以后不要给人乱戴帽子。对于被冤枉的人来说，他们心里不舒服，很痛苦，但是也受到了锻炼，得到了经验，以后他们审查别人的时候就会谨慎一些。关于审查干部，我们实行九条方针：首长负责，亲自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结合，一般号召与具体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现在延安审查干部，就要采取这样的方针，是则是，非则非，实行宽大政策。

今天开学，还有一件事说一下，你们的一些课是由边区政府各厅的负责同志来教的，他们是做实际工作的，你们是学习的，做实际工作的领导人自己来教课，这很好。同时，你们也要经常去请教，走上门去，也可以打电话。如果哪一天没有来教课，便将他们的军，请他们一定来讲。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三卷刊印。

中共中央关于发动与争取基本群众的方针给华中局的指示

(一九四四年五月三十一日)

华中局：

华中来延干部据称：去冬睢邳铜地区即已开始了反恶霸的群众运动，如算旧账，昭雪几十年的冤案等。最近新华华中分社又报导淮北行署发动的反贪污斗争，其内容包括公款、公地、公物、公粮及吞没大众的钱、物、抢粮等，期限从民国元年算起，并要以分半给息，土地则以每年收益计算偿还，本人死后，儿子负责等。上述的问题，如作为个别的案件，发动群众经由政府或法院依具体情况公允处理，要犯主给苦主以适当的赔偿，要吞没者吐出一部分，只要不超过可能，达到双方关系的调整和正气的伸张，则这些措施是有意义的，应该审慎去分别办理；但如作为普遍的群众运动，而党与政府公开号召，且加以组织和领导，则其弊害甚大。如淮北真在进行此种反恶霸，算贪污积年旧账的群众斗争，那是可以引起不良结果的，应该加以纠正。

华中各地为了发动与争取基本群众，或使群众运动更深入，其方针应该是：在新区彻底实行减租减息，在老区发展生产运动。就是说，从减租减息到发展生产的群众运动方针，应正确的彻底执行，不宜用其他办法去代替；反恶霸和算旧账，

只能限于个别的顽固家伙，期限亦不能那样长，亦不能采用减租息那样普遍的群众运动方式。华中几年的减租运动，均获得很大成绩，目前宜以生产运动号召各阶级参加，一面更能提高和保护基本群众的利益，一面也更能使中上层阶级认识我党的建设能力，缓和农民与地主的阶级矛盾，而不是无限度的对他们进攻，并真心保护其合法权益。特别华中各老区在几年的紧张的群众运动之后，在策略上不宜继续紧张下去，普遍的反恶霸算旧账，必致造成过分震动，某些方面人人自危，给予特工和二流子等以活动机会，甚至“逼上梁山”，破坏根据地的抗日秩序，而妨害大规模的生产运动，并影响各阶级间的抗日团结。请你们考虑此电后，转告淮北，按实况加以纠正，并告知各区党委查照。

中 央
三十一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四册刊印。

中共中央关于改订华中的财税政策 给饶漱石等的指示

(一九四四年五月三十一日)

饶张曾^{〔1〕}：

三十日据陈毅同志报告：

华中过去几年来实行征收公粮的合理负担制度，比较把负担重点放在中上层阶级方面，于一九四二年加征田赋亦复如此，同时几年来货检税收人甚大，这些办法在初期均是必要的，而且是适合当时情况的，依靠他保证了抗战经费之供应无缺。由于贫苦工农无负担或负担少，也有助于工农生活之改善，这些均对根据地之创立和巩固，起了积极作用。

近年来，由于华中根据地群众斗争业已深入，根据地内部阶级关系呈露着新的变化，如贫农中农不断上升，中小地主降落或转移和出卖其土地等，雇农贫农无负担或负担很少，实际上有许多已提到富裕阶段。另一方面，某些中农和富农及中小地主负担较重，许多大地主负担比重反而是很少，同时货检税是一种间接税制度，商家获利极巨而负担特少。你们应考虑这些新情况，去适当改订华中的财税政策。

根据华北及陕甘宁边区的经验，以统一累进税制代替合理负担制度，则可收得下列效果：一、使负担面扩大，负担量减轻，于财政收入总额并无妨害；二、征税比较公允，可以刺激

根据地的生产向前发展；三、按富力逐步累进，使根据地每一公民，均负担一定的不过量的纳税义务（免征者除外），不致有畸轻畸重之弊，这样，可相当调整根据地各阶级关系，特别是对中间势力的争取有极大意义；四、统累税办得好，才算根本扫除了旧时代的苛捐杂税遗迹，而扩大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影响，你们应考虑在华中实施统累税的具体办法。

这一工作有两方面：第一，在农业累进税方面，其繁难处在于土地调查和登记；第二，商业累进税方面，其繁难处在于富力计算，如资产利润的估计；此外便是免征点，累进率和最高点的适当规定。这些均应经过极其仔细调查研究。一般说来，在华中党与群众工作有基础的地方，只要领导得法，上述困难是可以顺畅解决的。你们可在今年秋季开始在几个中心县区试行，取得经验，事前并发动讨论，征求人民的意见，以便明年能比较普遍实施，你们可向北方局要参考材料，延安亦可供给你们一些。

中 央
五月三十一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四册刊印。

注 释

〔1〕指张云逸、曾山。

总政治部关于敌军工作的指示

(一九四四年六月一日)

抗战数年来，我党我军在瓦解敌军争取俘虏工作上，是经过努力并获得了一些成绩的。主要表现：在争取敌军俘虏中培养了一批日人干部，并在许多地区建立起日人自己的反战组织，此种组织，已在敌军中发生着相当的影响，在工作中积聚了初步的经验，这就为我们今后的敌军工作造成了新的有利条件。今后应以更大的努力采取更大的规模去进行敌军工作。估计到日本军队的民族特点，和上述条件的变化，总政对敌军工作有以下指示：

(一) 决定凡有了日人干部，而这些日人干部政治上又较成熟的地区，今后的敌军工作，应该要通过日本人民解放联盟(原名反战同盟)及日人干部去进行(目前尚无日人干部及解放联盟组织的个别地区仍按原状进行敌军工作)。各级政治部的敌工部门，则集中力量进行伪军工作，对敌军工作，只居于方针的领导与协助解决实际困难的地位。为适应此种改变，对解放联盟与敌工部门之间的关系作如下之具体规定：

甲、敌工部分担的工作：

(子) 定期听取联盟关于敌军工作的报告，并与日本同志共同讨论和决定敌军工作的新方针与带政策性质的诸问题。

(丑) 审查与批准联盟所起草的各种工作(宣传教育、新

来俘虏的处理、人事等等)计划,并切实援助其工作之完成。

(寅) 联盟对上级送出之工作报告,应经过自己的负责审查,并在报告上副署。

(卯) 日人干部政治教育的指导及援助。

(辰) 汇集及研究各种材料及情报,并译成中文。

(巳) 工作经费的审查与批准,及帮助联盟总务工作的建立与其他困难的解决。

(午) 负责保护日本同志的安全,特别在敌人“扫荡”时与工作行动中要有更多的关心。

乙、解放联盟分担的工作:

(子) 向敌工部门作定期的工作报告,并接受其领导与指示。

(丑) 有关联盟内部问题的解决。

(寅) 对敌军工作计划方案的提出及其执行。

(卯) 对于新来者及一般盟员之教育与审查。

(辰) 供给敌工部门关于敌国敌军方面的各种材料。

(巳) 处理批准之经费及联盟本身之总务工作(须通过中国干部来做)。

(二) 敌军工作的方针:目前仍应着重于强化对敌军的宣传。在宣传内容上,除应利用敌军内部的矛盾与日益恶化的生活问题,以掀起士兵的不满与斗争外,更应善于抓着政治形势中不利于敌人的方面,扩大宣传,以增强士兵的厌战与失败情绪。本年二月延安日人解放联盟所通过的斗争纲领,应用浅显通俗的文字作广泛深入的宣传,以扩大联盟影响。依据日本士兵的觉悟程度,目前仍不宜于提出过高的政治宣传的口号,但利用日人共产主义团体的名义,与通俗化的表现形式,适当的宣传共产主义与启发阶级觉悟的思想,亦是可而且应该逐渐

开始进行的。在宣传方式方法上，根据过去经验，应注意以下各点：

（子）在宣传同盟国胜利或日本失败时，要善于利用日本消息的本身来暴露其前后矛盾，以揭破敌方消息之欺骗性，和证实我方宣传之真实性，若只照抄我方电讯，不仅会减少宣传效用，甚至会引起日本士兵的反感。

（丑）各地联盟支部，最好均能发行小型报纸。这类报纸的形式与署名，可以不一定用反战同盟或解放联盟的名义，而以各种敌方已有的地方小型报纸的伪装形式出现。

（寅）对于慰问袋和物品的赠送，信件的往还以及喊话、打电话等等联欢工作，经验证明是最有效果的宣传方法，今后必须普遍的更好的采用。

（卯）应当善于抓着反“扫荡”的时机，遍写标语与广发传单，使敌兵进入我根据地内即到处接触我方宣传。

关于宣传品，除主要依靠各地自行写制外，延安今后每星期二五两次，每次上午九点钟用日语罗马字向各地播送，此间写制之宣传品的教材，望各地按期收听并确实利用。

至于开展敌军内部及日本居留民中的组织工作，目前应即想尽一切方法去进行，但估计到敌人宪兵及特务组织之严密与狡猾，任何在敌军及日本居留民中的革命组织，必须采取十分谨慎和秘密的方法，各个秘密组织之间亦不能使之发生相互关系，而应分别的单个的与根据地内解放联盟联系。这种组织工作开始时可利用经常与敌军接近的可靠的老百姓、伪军、伪政权、或利用敌人军队中的翻译官，以及经过适当教育而后释放回去的俘虏等。在可能条件下，各地并应注意培养这类的日人干部。

（三）为更多培养日本革命力量，确定今后原则上不释放

日本俘虏。但有下列情形者例外：

（子）对我军俘虏政策影响尚少之日军部队，而有以释放俘虏作宣传之必要者；

（丑）战况紧急或其他原因无法带走者；

（寅）无教育希望者，如残废老弱妇女等。

为便于新来俘虏的处理，各地可酌量设置日人弟兄招待所，以便新来俘虏的收容隔离与进行考察，同时对于决定释放之俘虏，亦可在此种招待所内经过一定教育后，再行释放。

估计敌后环境的困难，决定今后各地的所有俘虏，在可能情况下，一律送来延安，以便进行有系统的教育。至各地所需之工作干部，当由延安将培养较为成熟之干部陆续派出。此间并在晋西北开设有日本工农学校分校，各地送延之日人，须先送该校，经过初步教育后，再转延安。

（四）因为决定敌军工作某些组织上的改变，各级政治部及其敌工部门，对此必须有正确的认识，切不可为今后的敌军工作经过解放联盟及日本干部去进行，而自己却可以减轻责任。根据此次由前方回延之日本同志的反映，某些地区对于他们的工作指导，与应有的信任，以及生活上的关心，都是十分不够的。在今后给他们以更大任务与更多工作的情形下，必须更多的信任他们与更多的关心他们。在生活上，必须尊重他们的民族情调，在对他们工作领导的方式上，必须采取多同他们商量与讨论的办法；除着重方针与政策的领导外，关于具体工作的进行，则应多尊重他们的意见。只有如此，才能更大发挥他们的工作积极性与创造性，也才能有利于工作，有利于我们的对敌斗争。应当了解：认真同日本同志共同工作，并用一切努力帮助日本同志的进步，不仅为我军今日抗战所必须，而且是为我们国际共产党人替将来日本革命准备干部不可推诿的责

任。过去有些同志对此认识不足，因而对日本同志产生了不正确态度的地方，是应当认真改正的。

各地收到此指示后，应在敌工部门及解放联盟内部同时进行传达与讨论，并将执行情形随时电告。此件发到各级政治部敌工部科。

总 政

六月一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四册刊印。

毛泽东关于同意林伯渠等 对时局的估计和谈判意见的复电

(一九四四年六月三日)

重庆十八集团军办事处林伯渠同志：

林、董、王^[1]：

(一) 二十三日长电今日始收到。(二) 完全同意你们对时局的估计与对谈判的方针，你们的意见和我们是一致的。(三) 修正文件虽然去掉八条，但主要内容未变，又可借此重开谈判，如再不接收，则曲在彼方，那时准备由延安用电报拍给蒋^[2]。(四) 会见华莱士及拉铁摩尔时可以新十二条及口头提议八条均告知他们。(五) 如小党派出席招待华莱士宴会时，你应该出席参加，此外并求得与华莱士单独会面。同时请探听华、拉可否来延一行。

毛 泽 东

六月三日

附一：林伯渠等关于目前的形势和 谈判问题给毛泽东的电报

（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三日）

毛主席：

（一）我们对于目前对国党谈判有以下的看法：

在蒋的独裁政治下，现时存在着的日益严重的困难：

第一，是河南战事失败，在军事、政治、经济、外交各方面所发生的严重影响；

第二，是英美舆论对共的同情与对国的抨击，日益增加，有些论文并露骨的要求直接援助中共军队，以便配合盟军作战；

第三，是财政经济上的无办法，通货膨胀，物价高涨，负担太重，不仅人民不能忍受，就是他所倚靠着统治人的公务人员及士兵，也已到处发生怨恨；

第四，是对共党无办法，想打又不敢打；

第五，是国民党内部各派系军队各个人中间的倾轧，离心离德。

蒋在目前对这种情形相当恐慌，曾在国党中央内表示要改变办法，实行民主，来缓和各方，使孙科及许多倾向民主的国民党员都曾引起很大幻想。

但自听了蒋在十二中全会的讲话，强调三民主义是最民主的，国民党以外一部分人不配讲民主，强调自信心及友邦舆论批评不足畏后，又表示大失所望。

估计蒋所以又这样顽硬的原因，不仅由于蒋之独裁本质要

死而后已，而我在西安谈判之避免刺激，恐怕也增加了蒋以为不难对付盟邦批评及华莱士来华的梦想。

（二）我们从延安出发时的一些估计，必须随情况的改变而改变了，争取和平已不成基本问题，林彪同志过去提案已不适合今天情况，照原订之方针，反被蒋利用去加强他们党内对于一党专政的信心，且作向盟邦粉饰团结的工具。同时，使英美难于说话，使小党派不敢硬挺，使国民党内以孙、邵^[3]为首要求实行民主的力量也不能抬头，对于促进全国团结抗战进步，决无所得。这种情形，在西安最后数日已稍感觉，到重庆后更为清楚。

（三）我们完全同意中央所提二十条每条的精神，今天只有继续给蒋提出，只有继续揭露其欺骗，只有不给他敷衍捧场，才真正对整个团结抗战有利。同时新二十条虽不能马上实现，但可否定过去，成为今后新的谈判的基础。昨天将此文件交给张、王，虽然张、王坚决拒绝接受转递给蒋，但一定会向蒋报告的。估计蒋会咆哮起来，会逢人骂我，说我无诚意。但客观形势，使他仍不敢公开和我决裂，更不能打我。新的麻烦是会有有的，我们早准备了，我们早就确定问题的解决还要拖一个时间，而新二十条的即时提出，也可以使其重新考虑提示案，重新考虑如何对付华莱士来华，重新考虑十二中全会的结论。我们的看法是否正确，请予指示。还有下面几个具体问题，亦请指示：

A. 张、王既坚决拒绝接收二十条文件，是否需要直送给蒋和国党中央，这样就是表示超过张、王，估计不可能送到，在送去也会被退回的，因此不好继续与张、王会谈；

B. 我们对外宣传完全照恩来^[4]文章发挥，并着重说明我们争取团结抗战的诚意，及暴露国民党对电台封锁抓人等具体

问题上无解决诚意之事实，二十条全文暂不发表，但对华莱士是否需要告知。

C. 国党招待华莱士的一切宴会，拟不出席，并劝各小党派也不出席，而求得单独和华会面，但小党派如出席时我们应怎样？

D. 我们自然无自行修改二十条之权，但如张、王所提意见有可接受的，当向中央请示。同时建议中央在将来具体解决问题需要修改时，请加上忠实实行四项诺言等字句，更能增加中间人士同情。

E. 如果他们交来的提示案内容不好，我拒绝接收，或借此转回延安请示，暂拖下去。

林、董、王

五月二十三日

附二：林伯渠关于国民党代表张治中、王世杰 拒绝接受我党二十条问题给 毛泽东的电报

（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三日）

毛主席：

昨日（养日）约张、王在张宅会谈，先说电台问题，回答仍是由军令部拨一专台，不能自设。我接着把中央二十条交给他们，张、王看后，沉默很久，才说出以下意见：

（一）全文是宣布罪状精神，完全没有实践诺言及拥蒋

表示；

(二) 与西安谈判内容不符，为何又不以林彪案为谈判基础；

(三) 你们无决心解决问题诚意；

(四) 是否因我们这样欢迎你，以为示弱可欺；

(五) 我们正在令有关各部门研究西安谈判材料，准备提示案；

(六) 希望你考虑修改二十条内容词句，并告你们中央。

我的答复：

(一) 全文都是要实事求是解决问题；

(二) 西安初步谈判的意见，约定各向自己中央请示，并非最后决定，而且我曾提过六军十八师，现在文件是五军十六师，已有让步；

(三) 我们是真正诚意要解决问题，所以我才出来，我们中央于接到西安的谈判经过后，即来答复；

(四) 我们说不上欺人，只是想公平合理解决问题；

(五) 你们既拒绝接受我党中央文件，则你们中央的提示案，我也要请示我党中央才能决定接受与否；

(六) 二十条内容、字句，在此无研究修改余地。我与张、王争辩两小时，张、王最后托打电话，退到内室密商半小时，出来后，将二十条文件交还我，坚决拒受与转递给蒋。情况如此，请予指示。

伯 渠

五月二十三日

附三：林伯渠等关于十天来的活动及各方面的动态给毛泽东的电报

（一九四四年六月五日）

毛主席：

新修改十二条收到后，约定张、王今晚会谈，再交他们。在要释放的人名中，我们加上成都新华日报分馆最近被捕的李椿、张少明两个名字，其余全遵照中央指示进行。

兹将我们十天来的活动及各方动态，摘报如下：

（一）我们估计，蒋目前虽极困难，但绝无解决问题诚意（苏英美人士，小党派，地方实力派及孙科、许宝驹、王昆仑，都如此看法），今天只是作出谈判姿态给中外看。华莱士主要是搜集情报，也不便直接干涉他改变态度。具体解决问题，要在英美主力将要在远东战场行动时。所以，我们这几天并不急切去摧张、王，平常请客会面时，也只着重要求先恢复电台。总之不闭谈判之门，也不存急切解决之想，而把精力全用在各个方面宣传我在敌后、边区，实行民主抗战成绩及力量，及推动国民党内一切不满现状的人积极起来，争取民主运动，并使这一运动互相配合。

（二）美武官已详谈两次，他目前最关心的是华北、华中敌军行动，是否我们经常有详细情报；我敌后各根据地，哪些地区，宜于美机临时降落，并保证空军人员安全。我们表示，只要他们能交涉到派人常驻延安，一切均可满意解决，并建议：如蒋不允，可用降落伞直接去。他们说：先合法争取，万

一做不到，再说。他要求送一张胡^[5]部封锁边区详图给参谋本部，已允许他。苏武官已谈过。英武官约本周内会谈。

(三) 小党派及实力派最初对西安谈判曾发生恐我单独解决心理。现经多次会谈及事实证明，都清楚，都说蒋无解决问题诚意，认识我们力量强大，不怕拖，也不怕打，增加他们争取民主运动信心。黄任之^[6]到处宣传新四军在华中民主与经济建设。

(四) 经过杜斌丞，马哲甲等得知川、康、滇、粤、桂西南各实力派态度，并直接见到刘文辉。据说，李济深已成西南各方拥护中心（包括李、白^[7]、张发奎、余汉谋及湘薛、浙黄、闽刘^[8]等）。他们中有些人来谈，从东南，经滇、川、康到西北，对重庆马蹄形包围，希望西北来一个军事发动。并妄拟西南在双十节将有一个大发动。我劝说他们不要妄为，要在法令中抓住有利于实行地方自治的东西，放手去做，要使自己比中央更民主进步。蒋把田赋征实交地方办理，是想把人民责难给地方政府，但又增加了地方政府权力，这是他不可解决的矛盾。

(五) 左翼文化界及妇女界，均开过座谈会，个别和一些教授、学生、工业家谈过，他们都不满现状，要求民主。

(六) 国党内可推动争取民主的：

第一，是广大下层党员，但无领导，不能起来；

第二，是还保有若干革命传统的元老，但相互又四×宾党^[9]。

第三，是许宝驹、王昆仑等，正积极活动，他们的口号是团结抗战，民主建国；

第四，是“合法争取”及“实力准备”（即一切活动，不走到失掉现有地位或被开除，和促进各实力派密切联系）。他

们目前办法是：

（甲）集中火力打西西，同一切反西西力量联合行动；

（乙）拥护孙科民主演说，并推动冯、于、居^{〔10〕}要支持孙；

（丙）出版宣传民主出版物，密切与实力派、小党派及我党联系。他们把我党看为坚持民主的中心势力。

（七）有些英美人士希望中共改变名称，可以减少外人疑虑，更易得外国援助，而陈铭枢、孙科及不少中间人士从自身需要出发，也有此主张，需要多解释。

（八）虽然蒋今天绝无具体解决问题诚意，但仍不敢有公开拒绝及表示冷落，他们并通知九月五日开参政会，要林出席。

（九）中央对上述活动有何意见，请指示。

林 董 王

六月五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注 释

〔1〕指董必武、王若飞。

〔2〕指蒋介石。

〔3〕指邵力子。

〔4〕即周恩来。

〔5〕指胡宗南。

〔6〕即黄炎培。

〔7〕指李宗仁、白崇禧。

〔8〕指薛岳、黄绍竑、刘建绪。

〔9〕原文如此，应有误。

〔10〕冯玉祥、于右任、居正。

中共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

(一九四四年六月五日)

一、不占领大城市与交通要道，不能驱逐日寇出中国。不争取在日寇压迫下的千百万劳动群众与市民群众，瓦解伪军伪组织，并准备武装起义，不能配合军队与农村占领大城市与交通要道。过去人们以为从大城市与交通要道驱逐日寇的任务，似乎只有国民党才能胜任；现在必须改变此种观点，认为有些只有依靠我党才能胜任，有些主要依靠我党才能胜任，依靠国民党是无望的。国民党已腐化达于极点，河南数十万国民党军队不战而溃或一触即溃，就是明证。仅在没有我党强大军队与强大根据地的地方，我党才不能负此责任。

二、因此，各局各委必须把城市工作与根据地工作作为自己同等重要的两大任务，而负起准备夺取所属一切大、中、小城市与交通要道的责任来。日寇现在为着救死而正在向中国正面战场大举进攻，日寇正在没落过程中。西方反希特勒斗争不久可望获胜，太平洋反攻日寇今后必更开展。这一切给予我党以良好条件，一方面发展与巩固根据地，依据现有基础，建设比现在强大得多的军队与地方工作；又方面，争取城市及交通要道的千百万群众，瓦解与争取伪军伪警，准备武装起义，以俟时机成熟，就可使二者相互配合，里应外合地进攻日寇，占

* 这个指示是毛泽东起草的。

领大城市与交通要道。里应外合的思想，是我党从大城市驱逐敌人的根本思想。

三、各局各委必须把争取敌占一切大、中、小城市与交通要道及准备群众武装起义这种工作，提到极重要地位，改变过去不注重或不大注重城市工作与交通要道工作的观点，唤起全党注重此项工作，认真地与细心地总结经验，研究办法，组织机关，配备干部，进行工作，以期在今年下半年及明年上半年，就能收到显著成绩，准备配合世界大事变，在时机成熟时，夺取在有我强大军队与强大根据地附近的一切敌占城市与交通要道。

四、要实现这个伟大任务，必须解决下列诸项具体问题：

第一，关于思想。要进行教育，使广大干部完全了解由我党领导里应外合地占领大城市与交通要道，以便最后驱逐日寇的可能性、必要性与重要性，没有此种思想教育，是不能动员全党行动的。又要使干部了解：在目前去进行城市与交通要道的工作，比过去有完全新的目标。在以前进行这种工作，只是为了保存组织，渡过黑暗，或是为了获取情报与购买物资。现在则是为了争取千百万群众，争取伪军伪警，准备武装起义，夺取城市与交通要道。一切努力与工作都是为了这个目标，并服从这个目标。又要使干部了解：在目前为了这样的目标去进行城市与交通要道的工作，是切合时宜的。因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与中国抗战均已确切接近完全胜利，国民党的极端腐败与我党我军在广大敌后战场的胜利坚持，全国人民对国民党更加失望，而对我党我军则寄以无限希望，敌占区广大群众的革命热潮，今后必然有极迅速的高涨，目前去进行这一工作，比以前有更宽广的社会条件与群众条件。因此，在以前曾经正确地不提出准备武装起义夺取大城市的任务，而在现在就必须提

出。现在如果不提出，则我们将要犯一个大错误，在将来反攻时逼使我们在没有准备或准备不足的情况下去进行争夺大城市与交通要道的斗争，使我军将来进攻城市时没有充分与必要的内应，以及在夺取城市后不能迅速发动群众建立城市的革命秩序与掌管城市。又要使干部了解：为着夺取城市与交通要道的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是一种长期艰苦而伟大的准备工作。由于中国特殊条件，城市武装起义常常只有在响应城外进攻军队的条件下，即在里应外合条件下，才有胜利可能（例如一九二七年上海起义），而没有城外军事行动配合的单独城市起义，是很难胜利的。因此在准备城市武装起义工作中，应该反对急躁病，反对轻率地举行武装起义，反对在没有城外我军配合条件下，单独地或者过早地发动起义。必须要有长时间和极端复杂忍耐的工作，决不是粗枝大叶与急躁的工作所能济事。又要使干部了解：我们进行城市工作的方针和一般策略是无法秘密的，是应该向全党传达的。但是在城市与一切敌占区的具体工作计划及具体组织工作，则应完全秘密，应在党内进行关于秘密工作的教育，每个党员及干部，只应知道他们所必须知道的事，不应知道他们所能够知道的事。

第二，关于计划与组织。各局各委应依据自己所属地区内一切大、中、小城市及铁路、公路与伪军伪警的具体情况，拟定一个大体计划，例如如何分工负责，如何组织机关，如何配备干部与训练干部等。应该以每一个城市（大的、中等的和小的），每一段铁路、公路，每一个伪军部队与伪警组织为工作对象，都组织一个有能力的工作委员会去进行工作。大城市与大部队还可组织几个委员会，分头分区去工作。此种委员会不作根据地工作，专门负责组织与指导各该城市要道与伪军中的工作。此种委员会目前可设在根据地内或游击区内，如有安全

条件，则设在城内。各局各区党委，对所属大城市、中等城市及重要铁路，应委托在自己直接指导下的工作委员会去工作，各敌占县城及小城市，则在各地委或县委指导下组织委员会去工作。对于经常调动的伪军中的每一个军或师，应在适当党委指导下成立一个委员会去工作。但是同时，这种工作还应动员全党全军一切组织，多头地与分路地去进行，从支部到中央局各级组织，只要它对城市与交通要道及伪军伪警有办法去进行工作者，均应直接派人去工作，暂时不必统一，关系亦不必交代。如各种关系在工作中群众中碰头时，则应彼此关照协助，不应彼此争夺和抱怨。这种工作应由各级党委负责领导。但为管理方便起见，在各局及区党委之下，可成立城市工作部门。这种部门除指导和组织城市与交通要道秘密工作外，还应指导敌区城市与交通要道附近的小型便衣游击队，借此给城市工作以便利。这种部门应驻在根据地比较隐蔽的地方，不要与根据地党、政、军混在一块。

第三，关于工作方向。由于我们的工作目标是反对民族敌人，大局有利于我，城市与要道周围或其不远地方又有我党强大军队与根据地，这种工作将有极大开展的客观条件。在敌占城市与交通要道的人民中，除开极少数死心汉奸与顽固反共分子外，大多数人是能够参加或同情各种各样抗日工作的。因此，我们在城市与交通要道的一切群众中、各界人民中，都要进行广泛而妥善的工作。在伪军伪警中，在工人苦力中，在伪政界、伪经济界、伪文化界中，以及在青年学生、儿童、妇女中，甚至各种秘密结社与流氓组织中，都要去进行工作。但应将主要注意力放在争取数十万伪军伪警和争取数百万工人苦力的工作上，因为他们是武装起义的决定力量，而这点正是各地以前所注意不够的。我们在工人苦力中的活动与组织，应与上

层统一战线的活动分开进行。而上层活动一般应是为了掩护与协助下层群众中的活动。我们的活动不应与国民党组织发生任何关系，我们应在群众中揭破国民党人的反动腐败无能和只顾少数人利益、不顾民族利益，肃清大城市群众中对国民党的任何幻想。过去我们在大城市为情报及经济工作而建立的组织与关系，仍应进行情报与经济工作，只在可能情况下去进行一些上层活动与群众工作。为了广泛造成根据地同城市（特别大城市）和要道的交通联系，并为准备夺取城市和要道的军事出发地，应在城市四周与要道两侧的人民中进行充分的工作，根据地游击战争应采取各种妥善办法向城市四周与要道两侧逐渐逼近，在那里建立隐蔽的游击区，以利城市与要道工作的进行。同时，要动员城市与要道中的大批工人与革命知识分子出城出路参加游击战争，其中若干人准备在起义时派回去指导起义的武装斗争，以便里应外合，占领城市与要道。重说一次，里应外合的思想，是我党夺取城市与要道的根本思想，应从这点出发去部署一切力量，布置一切工作。

第四，关于工作方法。到城市与交通要道工作的方法，应从总结已有经验中取得，并应在以后的工作中，不断去总结经验，将群众中创造的各种好方法普遍化。但应指出：党在内战时期在城市与交通要道的工作方法，一般是错误的，是不能采用的，应该批判这种错误，以免重复。而在抗战以来，各根据地在其附近敌占区与某些小城市进行了极有成效的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相配合的工作，在某些大城市，也有许多好的工作。在这些工作中，其方法一般是正确的。如果将我们在敌占区与小城市的工作经验，加以适当改造，就可移用于大城市、中等城市和交通要道。各地应用心研究适合每一个地点、每一种群众、当时环境的合法与非法相配合的斗争形式。在敌占区，党

和抗日团体的组织，只能秘密进行，因此应该注意精干、隐蔽，严防特务分子混入。但各种普通群众组织与群众活动，就应该公开利用一切可能的合法形式去进行。例如，利用已有各种伪组织（新民会、自卫团等），或成立各种灰色社会团体，或建立纯粹的但与群众有密切联系的社会职业机关与职业活动（茶馆、饭店、荐头房等），甚至利用工厂、工房、学校、店铺，在为了共同欺骗与应付敌人汉奸，保护中国人的口号下，成立其中所有人员某种无定形的联盟，亦是一种很好的群众组织形式。我们常看到根据地附近乡村中全村人联盟，共同欺骗与应付敌人汉奸的严密组织和分工，这种办法，应该运用到城市某些工厂、工房、学校、店铺中去。应从保护群众的切身利益出发，把群众联合起来，例如减轻负担，免除骚扰，隐藏物资以及增加工资改善待遇等，均可以成为群众联合活动的出发点。而敌人对华“新政策”的欺骗做作，则大可成为我们和群众利用的合法口号。其次，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区各阶层人民中的极高威信，亦可成为我们城市工作的有利资本，许多人以听到我军消息，与我军建立某种联系，取得我军某种证件为荣耀者，我们应该利用这种情形去促进人民的团结，但这在敌区是非法的，应该十分隐蔽地有限度地去利用。在目前，城市 and 要道的一切非法活动与非法斗争，以不妨碍和破坏我们的合法组织与合法斗争为限度。这点同根据地附近游击区中的合法与非法联系的斗争，是有些区别的。在游击区中的合法斗争，常常是为了掩护非法游击队的活动和存在，而在城市与交通要道则相反，非法斗争常常应该服从合法斗争。在敌区的宣传工作，亦应采用许多合法形式去进行，利用各种合法的报纸、刊物和书籍，并利用各种合法口号去进行。各种非法宣传也是应该进行的，但应切实考虑其方法。在目前，口头宣传是主要

的，甚至可用散布流言的方法。发行非法的传单、书籍、报纸，则应有周密谨慎的组织。总之，在城市工作方法上，应反对两种偏向：一是粗心大意，不负责任，大喊大叫，莽冲莽撞的冒险主义方法；一是根本不动，单纯隐蔽，不去联系群众与进行群众工作的尾巴主义方法。正确方法是在一切可能的与合法的范围内，去联系与团结尽可能广大的群众，去提高群众的觉悟性、组织性，而使精干的秘密组织与秘密活动隐藏在广大群众之中，隐藏在群众的合法活动之中。而在举行起义以前，一切组织形式与斗争形式，均应避免定形的与系统的形式，采用各种不定形的与分散的方式，以期多得胜利，减少损害。

第五，关于干部。必须有大批干部去进行城市与交通要道的工作。现有在城市工作的干部及过去在城市工作过的老干部，都应设法使他们仍旧担负这种工作，但应使他们吸收新经验，并在新方针下，用新方法去工作。其次，数年来在各根据地附近敌占区的两面斗争中，已经锻炼出广大而善于进行合法斗争的党与非党干部，其中许多人是有善于应付敌人、欺骗敌人、进行合法斗争的丰富知识的，有些甚至超过我们内战时期城市工作的老干部。其中许多人，是能够到城市工人苦力中及其他各种职业中立足的，应该很好地训练培养与使用这些干部。只要这些人有办法到大城市、中等城市及交通要道立足，并能进行工作，就应抽调一些出来，加以短期训练派去工作，不论是知识分子、工人、农民及其他各种职业者，或党与非党干部均可。而这种干部，现在各根据地是很多的。再次，就是各根据地都有一些人经常到敌占城市经商、做工、谋事，特别是在苏北与胶东，每年有数十万人到上海、杭州及满洲各城市谋生。因此，应从这些人中寻找与训练出各种各样的城市工作

干部。此外，在伪军俘虏中亦可训练一些干部放回去。根据地士绅到城市居住者，亦可给他以某种任务和名义到城市去活动。就是根据地中因有某种政治嫌疑而不易弄清楚者，亦可派他们到敌占城市进行某种独立活动来考察他。而在各种干部中，要特别注意培养各城各路的当地干部，外去干部应把自己当作当地干部的引路者与保育者。在根据地中，还可以找到原来在城市及要道生长与居住过的干部，加以训练派回去。总之，我们应放手使用各种各样干部去进行各种各样工作，并使各种人的各种工作都分开进行，不混杂在一起，多头地与分路地去做。但同时又必须保持党的秘密组织之精干、纯洁与可靠，在一切大、中、小城市及铁路、公路上建立起党的多数可靠据点，作为伟大城市工作的领导骨干，形成党的领导骨干与广大人民群众相结合的局面。此外，在根据地中，各级党、政、军、民的负责干部，均应切实研究与学习城市工作，研究城市的武装起义及里应外合的斗争艺术，研究建立城市革命秩序，掌管城市及大的工商业，作为将来夺取与管理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准备。

第六，关于经费。必须有大批经费去进行城市与交通要道的工作，只要不引起干部的浪费及城市工作人员的雇佣观念，一切必须的经费，是应该充分付给的。各根据地各种组织，为了进行城市与交通要道工作的必需开支，应准予报销。在各根据地预算中，应准备一笔充足的的城市工作经费。发给资本到城市与要道去做生意，以其盈利充工作经费的办法，也是可以采用的。

五、上述各项具体问题的意见，应由各局各委依据当地情况，加以切实研究，灵活地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去，并在以后工作中加以充分发挥。只有这些具体问题完全解决，才能

使城市与交通要道工作获得显著成绩，走向武装起义的目的地。

中 共 中 央
六 月 五 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三卷刊印。

第二战场开辟与中国抗战

(一九四四年六月八日《解放日报》社论)

盟军于四日晚克复意京罗马，六月晨在强大空海军掩护下，在法国北部海岸，自诺曼第半岛之瑟堡至塞纳河口之巨港哈佛尔一线大举登陆，并有大批空运兵团在敌后降落，现已建立长百余公里深一二十公里之海滩阵地。为全世界反法西斯人士所渴望的第二战场开辟了。预料东线苏军之巨大规模的夏季攻势，即将接踵而至。苏美英从东西南三面围攻德寇的大战开始了。

从一九三九年英德战争爆发以来，欧洲战争已经经历了两个大的阶段。即由英德战争爆发至斯大林格勒之战，及由斯城战役至第二战场的开辟。现在，战局已进入了新的最后的阶段。第一阶段是纳粹凶焰高涨的阶段，褐色铁蹄践踏了十四个国家的领土，而在苏联境内亦竟伸张到伏尔加河畔。第二个阶段是纳粹从进攻转到防御的阶段。以斯城战役为转折点，纳粹受到不断的重大打击，丧失了苏联占领的领土的三分之二，丧失了北非与南部意大利，其本土及欧陆占领国家亦受到盟国空军的猛烈轰炸，但是由于第二战场的缺如，法西斯野兽虽受到了创伤，但是还能够支持着，并在欧洲大陆上继续逞其凶焰。现在，情况根本改变了，欧陆第二战场的开辟，是战争的新的转折点，从此将踏入的新的阶段。这一阶段的特点，是苏

美英盟邦从东、西、南三面围攻德寇。以联合的打击，来最后消灭法西斯野兽。这是法西斯德国从防御到灭亡、盟国从反攻到最后胜利的阶段。这是此次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决定的阶段，而在欧洲的反法西斯战争则为最后的阶段。

反法西斯战争中，欧洲的最后决定阶段已经开始了，法国北部海岸的登陆是这一阶段的序幕，残酷的战斗和繁复的变化还在前面。但是无疑的，新阶段的幕帷已经胜利地揭开了。盟军六日晨以巨大的海陆空军的力量（飞机数千架、船舶四千艘、舰艇数千及大量空运及陆军部队），成功地摧毁了德国所吹嘘的大西洋壁垒中最坚强的一段海岸防线，在法国大西洋上最大港口及最接近法都巴黎的道路上，建立了海滩阵地。攻入欧陆的最初一步，已经完成了。盟军在极短促的时间内以极轻微的损伤完成这个巨大的任务，无疑地是一个重大的胜利，并且为整个新的战争阶段安置了胜利的发端。当然，法西斯德国在这致命的打击面前，必然将作绝望的困兽之斗。因为正如德国发言人所说，这是纳粹德国及其占领下的欧陆的“生死斗争”。但是根据盟军士气的旺盛、将领指挥的才干（这在昨天的登陆作战中已经明白显示了的）、兵力的绝对优势（据最近消息，德军在西线者不过五十四万人，而盟方集结英伦之大军不下四百万人）、制海制空权之掌握、被占领国家反法西斯运动的增长及其配合盟军进攻之行动，及最重要的强大红军从东线的联合打击，这些条件，则可以断言：无论纳粹怎样挣扎，这野兽决难逃脱其在巢穴中被消灭的命运。希特勒的最后覆亡，不出今冬明春！反法西斯战争在欧洲的胜利已经逼临面前了！

登陆的胜利，第二战场的开辟，是希特勒德国最后毁灭的开始，亦痛击了盟国营垒内一切亲法西斯半法西斯的反动分

子——美国的孤立分子、英国的慕尼黑余孽和中国的“西困东攻论”者一流。这些希特勒的应声虫，在各地呼朋引类，造谣生事，或以大西洋壁垒森严坚固无可动摇的遁辞，或以登陆作战将牺牲数百万生命的威胁，或以“倒转战略”的胡说，高呼大喊，兴风作浪，力图阻止第二战场的开辟，并借以离间盟国，替希特勒延缓其死亡之期。现在，事实给这些分子打了一记耳光，沉重而且清脆！大西洋壁垒坚不可破吧，仅仅几小时的工夫已经摧毁了其面对英伦的最坚固的一段。登陆作战将牺牲惨重吧，则“岸上炮兵的抵抗……大见削弱……其火力减至不足为患的地步……各项登陆行动损失极微……损失之微远不及我们所预料的”（丘吉尔报告）。“倒转战略”吧，则登陆行动已证明千百万反法西斯人民的坚定意志，决非少数反动分子所能摇撼的。同盟国之间的团结合作，将随联合行动之展开而日益增强其战友之谊；反法西斯的人民大众的民主势力，亦将随苏美英军事行动之展开而日益增长；而这些反动派，则无论如何叫嚣也不能帮希特勒逃脱其灭亡的命运了。

第二战场的开辟，使希特勒陷于毁灭的边缘；苏美英盟邦在欧陆联合大进军，将使德寇迅速地溃灭。在希特勒溃灭之后，明年美英盟邦就可以移其全力到太平洋上来，日寇的死期亦不远了。我国抗战的最后胜利，由第二战场的开辟而更加速地逼近了。但是正因为日寇预感其灭亡之将至，力图在此盟邦血战欧陆的时机，投机取巧，在我国恢复其挣扎性的攻势，以求得在欧洲战争结束之前解决“中国问题”，确保大陆，增加我国及美英盟邦反攻的困难，这样来延续其生命。因而日寇在盟军欧陆进军之前，相继发动了平汉战役、粤汉战役，而在第二战场开辟之后，日寇在我国的军事行动可能会益加猖狂。因此，我们在庆祝第二战场开辟、反法西斯战争在欧陆逼临最后

胜利之际，必须惕厉奋发，坚决粉碎敌寇之迷梦。可惜，国内的一部统治人物，从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即高唱“先亚后欧”的论调，甚至直至盟军攻欧前夕，尚作“西困东攻”之说，因而我国虽厕身盟国之林，而在战略上则有一部分统治人物与盟邦政府同床异梦，背道而驰，驯至与美英国内之反政府派之孤立主义者及慕尼黑余孽勾搭，自陷于外交上的孤立，招致盟邦舆论之讥评。这种“倒转战略论”之谬误与恶果，事至今日，有目共睹。而造成这种谬误之心理的基础，乃是这一部分统治人物的自私自利的企图。这个企图就是：一切依靠别人，垂手而得胜利之果，保存自己实力，以便战后继续其反民主反人民之独裁统治。依据此种心理，才产生世界战略上“先亚后欧”、“西困东攻”等谬论，亦产生了从武汉战役后我国战场上进入相持阶段之后，军事上的消极观战，政治上的统制独裁，经济上的垄断专卖，文化与舆论上的钳制封锁等错误政策。此种政策愈演愈烈，到现在已经把我国引入了严重的危机。河南战役，国军以七八倍于日寇的兵力，竟至望风而溃，欲保全实力而不能；政治之统制独裁，非但人民不堪忍受，而且盟国舆论亦已猛烈抨击；经济则恶性通货膨胀，产业衰疲，民生憔悴。几年来的错误政策，使我国走入抗战以来的最险恶的境地。这些错误政策，我们曾屡次指出，屡次警告过。现在，当第二战场已经开辟，这种错误政策种种方面的恶果，已经暴露无遗的时候，我们谨再度忠告掌国柄者，当机立断，改弦更张，无论军事、政治、经济各方面，必须抛弃旧的那一套，必须以积极作战来代替消极抗战，必须以民主政治来代替统制独裁，必须以发展生产来代替垄断专卖，必须以思想言论自由来代替钳制封锁。总之，国土不容再失，内政必须改革。必如此，我们才能够确保抗战七年的成果；必如此，我们才能

够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

第二战场开辟了，欧洲大陆炮火连天，苏美英盟邦正在进行围攻德寇的最后大战。我们必须以改革内政积极作战，粉碎日寇的对华新攻势，来切实的配合盟军的欧洲大进军！

根据一九四四年六月八日《解放日报》
刊印。

林伯渠为国民党代表拒绝接收我党 意见书致张治中、王世杰函

(一九四四年六月十一日)

文伯、雪艇先生勋鉴：

奉读六月八日来函有以下两点甚难理解：

第一、谈判是两党的公事，非个人的私事。我们彼此都是要遵照自己中央的意见去和对方谈判，并将对方的意见，详细报告给自己中央，最后得到双方中央一致同意，才能使问题真正获得解决。今天，两先生既承认我是中共中央的代表，而又拒绝接收我党中央正式提出的意见，不加讨论，不允转报贵党中央，不让贵党中央了解我党中央方面意见，只片面的要求我个人接受贵党中央提案。试问我个人如何能够作主，谈判如何能够进行，而两先生又如何能够负责。

第二、六月四日面交两先生之我党中央十二条意见，诚与弟在西安与两先生初步交谈之意见略有出入。但另一方面两先生面交给弟之贵党中央六月五日提示案与两先生在西安所表示者亦有出入（比如编军数目弟初提六军十八师，两先生提四军十二师，我未坚持自己主张，同意以两先生所提最低限度之数目向我党中央请示，但现在贵党中央提示案并不是四军十二师而为四军十师，我党中央所提者亦非六军十八师而为五军十六师）。因为彼此在西安都曾声明这是初步交换的意见，不是最

后决定，约定各自向其中央报告请示，到重庆再谈。所以这种谈判过程中的出入，是双方都有的，是不足为异的。彼此所应重视与继续商谈的是对方中央最后决定的正式意见。现在弟已将贵中央正式意见电告敝党中央请示，而两先生则拒绝将我党中央正式意见转报贵党中央请示，这是使弟很难理解的。

总之，今天全国人民及盟邦人士均希望中国能够实行民主团结，希望国共关系能够很好解决，以便动员全国抗战力量，配合盟邦向敌反攻，使中国早日获得自由解放。因此敝党中央对于此次谈判，是竭诚求得合理解决。对于谈判条件，不惜委曲求全，比如两先生对五月二十二日敝党中央二十条提案，感觉所列要求事实，“无异宣布国民党罪状”。经弟转告敝党中央后即尊重两先生意见改为口头要求，不列入条文。全军四十七万人应编十六军四十七师，只要求编五军十六师，凡此所以委曲求全者，已无所不用其极。弟以衰朽之身不惜冒暑奔走，总望获有结果，对国家民族抗战有利。亦盼两先生能将敝党中央六月四日所提十二条转呈贵党总裁及贵党中央，使双方谈判能早日达到公平合理之解决，不胜盼望之至。

敬颂

勋祺！

林 祖 涵

六月十一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毛泽东会见中外记者 西北参观团的讲话

(一九四四年六月十二日)

一 致 辞

我十分欢迎各位记者来到延安。我们的目的是共同的，就是打倒日本军阀与打倒一切法西斯，全中国，全世界，都在这个共同基础上团结起来。

各位到延安时，正遇着欧洲开辟了第二战场，我们表示极大的庆祝。第二战场的开辟，其影响不仅在欧洲，而且将及于太平洋与中国。中国要前进，世界要前进，我们必须取得最后胜利。

第二战场的开辟，是经过长期发展的结果，是经过莫斯科、德黑兰会议发展而来的，在这些会议上决定了从东、西、南三面打击敌人。第二战场现在是实现了，三面打击希特勒的计划是实现了，我们谨祝罗斯福总统、丘吉尔首相、斯大林元帅的健康！

全中国所有抗战的人们，应该集中目标，努力工作，配合欧洲的决战，打倒日本军阀。现在时机是很好的。

关于中国国内情况，诸位先生是十分关心的，我在这里必须讲几句。关于国共关系，中国共产党对此问题的态度，早已见于中共中央历次文告及其报纸。今乘诸先生来延之便，特再

申述如下：拥护蒋^{〔1〕}委员长，坚持国共合作与全国人民的合作，为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立独立民主的中国而奋斗。中国共产党此种政策始终不变，抗战前期是如此，抗战中期是如此，今天还是如此，因为这是全中国人民所希望的。

但是，中国是有缺点的，而且是很大的缺点，这种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中国人民非常需要民主，因为只有民主，抗战才有力量，中国内部关系与对外关系，才能走上轨道，才能取得抗战的胜利，才能建设一个好的国家，亦只有民主才能使中国在战后继续团结。中国缺乏民主，是在座诸位所深知的。只有加上民主，中国才能前进一步。

二 答 记 者 问

诸位的问题可综合为三个：

第一个问题，关于国共谈判。谈判已进行了许久，但是今天还在谈判中。我们希望谈判有进步，并能获得结果。其他今天还无可奉告。

第二个问题，关于第二战场。日前《解放日报》社论已说明是一个新阶段，我们不准备再发表宣言。第二战场的开辟是同盟国战争合作的发展，其总的性质，现在与过去比较，是没有变化的。但是第二战场开辟有与斯大林格勒反攻某种相同的意义。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以前，是法西斯凶焰高涨，反法西斯力量被打与退却的时期，赖有苏联的进攻结束了过去的阶段，开辟了新的阶段。接着，北非与太平洋相继有了进攻。这是同盟国从防御到进攻的一个大转变。第二战场开辟，在进攻中又前进了一大步，如果没有它，就不能打倒希特勒。现在欧洲已进到了决战阶段了，在这个意义上说，它是一个新阶段，特别

在军事方面。我已说过，第二战场开辟的影响会是很广泛的，直接影响欧洲，将来亦会影响到太平洋与中国。但就目前来说，对中国的影响似乎不会很大，你们可以看见，外面情况虽然甚好，但是中国的问题还要靠中国人自己努力，单有国外情况的好转，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第三个问题，关于中共的希望和它自己的工作。为了打倒共同敌人以及为了建立一个很好的和平的国内关系和一个很好的和平的国际关系，我们所希望于国民政府、国民党及一切党派的，就是从各方面实行民主。全世界都在抗战中，欧洲已进入决战阶段，远东决战亦快要到来了，但是中国缺乏一个为推进战争所必需的民主制度。只有民主，抗战才能够有力量，这是苏联、美国、英国的经验都证明了的，中国几十年以来以及抗战七年以来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民主必须是各方面的，是政治上的、军事上的、经济上的、文化上的、党务上的以及国际关系上的，一切这些，都需要民主。毫无疑问，无论什么都需要统一，都必须统一。但是，这个统一，应该建筑在民主基础上。政治需要统一，但是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统一在军事上尤为需要，但是军事的统一，亦应建筑在民主基础上，在军官与士兵之间，军队与人民之间，各部分军队互相之间，如果没有一种民主生活、民主关系，这种军队是不能统一作战的。经济民主，就是经济制度要不是妨碍广大人民的生产、交换与消费的发展，而是促进其发展的。文化民主，例如教育、学术思想、报纸与艺术等，也只有民主才能促进其发展。党务民主，就是在政党的内部关系上与各党的相互关系上，都应该是一种民主的关系。在国际关系上，各国都应该是民主的国家，并发生民主的相互关系，我们希望外国及外国朋

友以民主态度对待我们，我们也应该以民主态度对待外国及外国朋友。我重复说一句，我们很需要统一，但是只有建筑在民主基础上的统一，才是真统一。国内如此，新的国际联盟亦将是如此。只有民主的统一，才能打倒法西斯，才能建设新中国与新世界。我们赞成大西洋宪章及莫斯科、开罗、德黑兰会议的决议，就是基于这个观点的。我们希望于国民政府、国民党及各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主要的就是这些。中国共产党所已做和所要做的，也就是这些。先生们来到边区已有十几天，今后还将有若干时日留在边区。你们可以看到，我们共产党为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而做的一切工作，都贯彻着一个民主统一或民主集中的精神。其有不足的，必须继续做。如果有缺点，必须克服这种缺点。我们认为全中国只有民主制度、民主作风，目前才能胜敌，将来才能建立一个很好的和平的国内关系与国际关系。对于德、意、日等法西斯国家，在法西斯被打倒以后，我们所希望于他们的，也是如此。持此观点来看许多问题，没有不可以说通与做通的。今天时间已晚，今后还可互相交换意见。我要说的，就是如此。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三卷刊印。

注 释

〔1〕指蒋介石。

中共中央关于兵役制度问题 给晋察冀分局的指示^{*}

(一九四四年六月十四日)

晋冀察分局：

实行退伍是不好的，解决办法，由党在部队中起作用，经过宣传酝酿，开军人大会或军人代表会通过请求军区及政府延长服役期间，直至驱敌出国。党应经过士兵唤出不打倒日寇不回家的口号，利用第二战场开辟向士兵及人民作宣传，使他们接受我们的口号。在请求书内并指出参议会通过义务兵役制，原是出于体念人民的好意，但现在日寇尚在践踏我们的家乡及沦陷区人民，我们必须再接再厉，驱敌出国，为人民及自己报仇。收齐部队的请求书以后，军区及政府发一联合命令，接受他们的请求，并嘉奖他们，此事即告解决，不应取承认错误的步骤。根据此种命令，嗣后动员补兵，均以不打倒日寇不回家为口号，不再宣传义务兵役制。在党内说明此事时，亦采取上述精神。

中 央
六月十四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 这个指示是毛泽东起草的。

纪念联合国日，保卫西安与西北！^{*}

（一九四四年六月十四日）

毛 泽 东

今天是第三次联合国日，延安有热烈的民众大会，这个大会不但是一个庆祝大会，又是一个动员民众保卫西安，保卫陕西与西北的大会。

一九四二年罗斯福总统发起以每年今日为联合国日，全世界反法西斯各国都在这天作纪念，今年是第三次了。过去的两年，是世界形势起巨大变化的两年，包括两个巨大的事变。第一个是在一九四二年十一月，苏联红军从斯大林格勒开始进攻，扭转了世界的历史，随后又有英、美在北非与太平洋的进攻，把联合国的防御与退却形势，转变到了进攻形势，苏联红军的伟绩，起了决定作用。第二个是本月六日英、美联军开辟了第二战场，使进攻转到了决战阶段，英勇的盟军正在法境作艰苦的但是胜利的战斗，它的影响将及于全世界。我们在中国纪念联合国日，不要忘了苏、美、英人民的艰苦奋斗，不要忘了斯大林元帅、罗斯福总统与丘吉尔首相的英明领导和他们所指道路之正确。

欧洲与太平洋早已转入进攻，欧洲且已进入决战阶段，但是日寇还在向中国进攻，中国不但还没有转入进攻的迹象，而

* 这是毛泽东为《解放日报》写的社论。

且还不能停止退却，这是今天中国的新形势。从四月十八日开始，日寇相继发动向河南、湖南与广东的进攻，洛阳失陷，长沙岌岌可危，其中最严重的是河南战事。在这个战场上，洛阳失守以前，敌以攻击第一战区蒋鼎文将军及汤恩伯将军统率下的三十余万军队为主要目的，以洛阳失陷而告一段落。本月初旬，又开始第二个战役，敌以向部署在灵宝、虢略、官道口线的第八战区胡宗南将军统率下的军队进攻为主要目的。截至本日为止所获情况，该线业已不守，敌向潼关前进，显有攻陕目的。据闻西安已下令疏散，西北处在极大的威胁中。中国纪念联合国日，却和欧洲及太平洋处于相反的情况，那边在进攻，这边在退却。

中国境内也有两种情况，敌后战场在进攻，正面战场在退却。中国从抗战开始，即形成了两个战场，敌后战场与正面战场。一九三七年七月至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敌主力向正面战场进攻，但是八路军、新四军却向敌后前进，开辟了几个广大的敌后战场。武汉失守后，敌人开始改变其战争政策，对国民党正面战场以政治诱降为主，以军事进攻为辅，而逐渐移转其主力于敌后对付共产党，直至今年三月，整整五年半时间，主要的打击力量都落在共产党及敌后人民身上。最高峰时，六十万日军及九十万伪军的总数中，共产党担负的几达四分之三。然而我们是没有任何接济的，各抗日根据地又是被敌人分割了的。五年半中，敌对正面战场只作过几次战役性质的作战，都是早去晚归，并无战略的与占领性质的进攻。国民党统治人士在此期间的政策，是招架与观战的政策，敌来招架，敌去袖手，而注其全力于防制人民、压迫民主与反对共产党。这个政策，贯彻于其一切党、政、军机构中，顽固执着，不愿稍变，以迄今日。

但是敌情起了变化，四月十八日以后，过去以政治诱降为主的政策，改变为以军事进攻为主的政策。敌人所以出此，全为救死，但是敌人今天并未丧失战斗力。可是我们的政府与国民党统治人士，却因长期执行不适宜的政策，而陷于几乎丧失战斗力与束手无策的境地，军队不战而溃，或一触即溃，军队官兵脱节，军民之间又脱节，作战五十余日而退入潼关，西安震动，又在准备退却。

敌后战场以一九四一及一九四二两年为最困难时期，在敌人主力重击之下，根据地人口由一万万下落到五千万，军队缩小了，土地也缩小了。但是我们坚持奋斗，执行了中共中央的各项适宜的政策，打退了敌人一切进攻，终于站稳了脚。一九四三年及今年则举行广泛的进攻，又从敌人魔手下夺回了大批的土地，解放了广大的人民，根据地人口又上升到八千多万。八路军、新四军恢复元气，并且发展了，华北、华中、华南三大敌后战场合计，共有正规军与游击队四十七万，民兵二百万，主要的是经验丰富了，质量提高了。敌人原欲摧毁敌后战场，再攻正面战场，但是不可能了，为救死计，被迫着同时挑起这两个战场在肩上。

这本是极好的形势，只要我们的政府及国民党统治人士愿意修改自己的政策，就能振奋士气，击退敌人进攻。有如此坚强与如此广大的敌后战场存在，只要正面稍作有力的回击，即足退敌。敌人并不多，截至目前止，豫、湘、粤三处进攻部队合计不过十几个师团，难道以倾国之力还不能给它打回去吗？而无如至今还只看到自己的退却。

这是完全没有理由的。为什么共产党能够站住，能够进攻（虽然现在尚不是战略性的进攻，尚不能攻破大城市），国民党反而不能站住，不能进攻呢？

原因很简单，共产党坚持团结与民主，共产党团结了华北、华中、华南一切敌后战场的各界人民，实行民主，依靠人民，在那里充满抗敌卫国的爱国精神与再接再厉的朝气，对于全国则力求团结，无论国民党的政策如何反动，总是愿意和它改善关系。国民党不然，就其统治人士来说，今天为止，尚毫无反省与择善的意图，没有团结与民主方针，反而天天诬蔑共产党为“奸党”，诬蔑八路军、新四军为“奸军”，诬蔑抗日民主地区为“奸区”，自大骄傲，不可一世，已属中外皆知。只知伸手向同盟国要东西，满心依赖同盟国打日本，很少自力更生的意图与计划。以此而求胜敌，岂非缘木求鱼？

中国正面战场现在已处于极端严重的状态，我们希望我们的政府及国民党统治人士即刻进行严肃的自我批评，修改自己的政策，从今天起，与民更始，则事尚可为。目前最严重的任务是保卫西安，保卫陕西与西北。这是今天一条唯一的国际通道，此处若失，则威胁四川。我们共产党人始终希望国民党作好，我们及全国人民均希望国共两党改善关系，解决悬案，重新进入一个新的时期，我们希望我们的政府及国民党统治人士不要再使人民失望了。这种希望，美、英、苏各国同样迫切。记者团诸君已经来延安，华莱士副总统即将到中国，我们希望他们能起促进的作用，帮助中国人民解决团结与民主的问题，借以克服中国正面战场存在的危机。要医治中国这个时症，再无他药，唯有团结与民主，离了这些，军事危机是无法解决的。乘此联合国日纪念，谨致我们共产党人的热望。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三卷刊印。

中共抗战一般情况的介绍^{*}

(一九四四年六月二十二日)

叶 剑 英

中外记者参观团各位先生：

为应各位要求，并使各位便于研究目前中国共产党抗战的具体情形起见，我向各位作一个关于敌后战场军事情况的一般介绍。中国抗战，一开始就分为正面和敌后两大战场，而自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以后，敌后战场就在实际上成了中国的主要战场。这种情况，因为中国政府采取压制言论的政策，不但外国人不明白，就连中国人也有很多不明白。我今天要说的，就是关于敌后战场的情形。

我们八路军、新四军在这个敌后战场上，坚持了七年之久，七年抗战的过程，是极其残酷、紧张，并且是极其复杂、曲折的。假使某些先生们要求更深入地来了解敌后抗战的实际，我可以在另外的机会再和各位作一个共同研究，现在只作一个极其简单的介绍。我介绍的范围是：多说现状，少说历史；多说军情，少涉及其他方面。

我的介绍分为四项，即：

- (一) 敌后战场的敌情；
- (二) 敌后战场的伪情；

* 这是叶剑英在延安同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的谈话。

(三) 敌后战场的友情；

(四) 敌后战场的我情。

现在来说敌后战场的敌情。

我们关于敌情的知识，还不很令人满意：一则敌军变动频繁，二则我们的侦察工作还不是很强的，对于敌军的番号、编制、装备、移动的时日和方向等，不免有某些地方不能做肯定的说法，要先向各位声明一下。

我想把今年三月份的敌情材料，即敌人以一部军队进攻豫湘以前的敌情材料，把那个时候的敌军态势，作为基本态势，加以说明，然后说到尔后的敌情变化。

敌后战场有三个，即华北、华中、华南三大敌后战场。在华北敌后战场抗战者为八路军，在华中敌后战场抗战者为新四军，在华南敌后战场抗战者为中共领导的游击部队。每一个战场，又分为几个抗日根据地。这三大敌后战场的敌情是和友军担任的正面战场的敌情互相联系的，故须从整个敌情中分析我军与友军分担抗击的情形。

根据我们今年三月份的材料，日寇在华兵力共有三十四半个半师团，约五十六万人。

华北敌后战场的敌军，计有九个师团，八个独立旅团，两个独立骑兵旅团，合计为十四师团，约二十二万人。八路军抗击了十一点七五个师团，占华北敌军兵力百分之八十四强；友军仅抗击了二点二五个师团，占百分之十六弱。

如果要问：你们抗击的百分数怎样得出来的呢？这是根据敌军联队分布态势及其活动范围来计算的。例如第三十七师团共有七个联队（三个步兵联队，四个特种联队），其中有百分之七十兵力，在风陵渡、运城、垣曲一带与友军隔河对峙。有百分之三十的兵力在浮山翼城地区，对付我八路军。但是当着

敌人对我太岳区进行季候“扫荡”的时候，那敌人（第三十七师团）所使用的兵力就比百分之三十的数目还要大。

以上是华北敌寇在今年三月以前的基本态势。

在华中，敌军计十六个师团，约二十六万人。新四军抗击百分之五十九点五（九点五个师团），友军抗击百分之四十点五（六点五个师团）。

华南敌军约有三个半师团，两个独立旅团，合计四个半师团（八万人）。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约抗击了一个师团，占百分之二十二，友军抗击三个半师团，占百分之七十八。此外尚有海南岛的全部敌人，均为共产党所抗击，未计算在内，因为电讯中断，目前敌军数目不明，估计有一个旅团。

以上是一九四四年三月以前国共两党军队抗敌的具体情形。我们抗击了敌人百分之六十四点五，友军抗击了敌人百分之三十五点五。

可是在一九四四年四月以来，敌人增加了一部分兵力，向中国正面战场进攻。依现有材料来看，敌寇新增侵华兵力，已知番号者有十个师团，或者尚有一部分今天还不知番号的，总之至多不过十几个师团。同时，原来在华作战总兵力三十四四个半师团中，三月后调往南洋一个师团（三十五师团）。因之，日军目前在华总兵力为四十三个半师团（滇西一个半师团在内），或者略多一些。

此次在中国新增加的已知番号的十个师团中，有四个半师团参加正面作战，即是：第二师团，第十四师团，第十九师团，坦克师团，坦克旅团；有五个半师团在敌后守防，即是：第四师团，第十三旅团，第十五旅团，新编第十师团，特务旅团（旅团长福冰），申板旅团，在石家庄的某师团，铃木旅团，山本源旅团。

在这一期间，华北敌后战场的敌军，同时有调动，如第一一〇师团，第三十七师团，独立第七旅团，骑兵第四旅团，共抽三个师团，移到正面战场。

但是，敌寇在华北所抽出的三个师团的兵力中，其第一一〇师团原在石家庄地区，现在已为新编师团所接替；独立第七旅团原在胶济路西端，现为申板旅团所接替；第三十七旅团原在晋南三角地区，现为第六十九师团由晋中南移接替；其原第六十九师团所在之临汾、汾阳等地防区，现由第十三旅团及特务旅团所接替。此外，第三十五师团他调后（似已调南洋），新乡、开封及道清西段地区防务已由铃木旅团及第四旅团所接替。这一地带的机动兵力并未减少，而仍保有一个机动旅团（第十五旅团——驻阳泉地区）。骑兵第四旅团原在陇海线开封、杨山地区，现为伪军张岚峰所接替。

由此可见，敌寇在华北敌后战场，虽然抽走了一批兵力，但其防务同时又为新的兵团所接替。这决不是如外间某些人士所揣测的说是华北敌军抽调以后，已成一空地似的。那里担负在共产党背上的兵力，仍和原来的情况相同。

应该指出：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以前，日寇的主力是向着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但在武汉失守以后，日寇改变了政策，对国民党以政治诱降为主，以军事进攻为辅，而移其主力于敌后战场，残酷地进攻共产党。一九三八年十月至一九四四年三月，整整五年半时间，日寇对国民党只有几次战役性的进攻，并无战略性的进攻，大体都是早出晚归。在此时期内，国民党的政策则是招架与观战的政策，敌人来了，招架一下，敌人走了，袖手旁观。这就是今天河南、湖南战局一败涂地的原因。此种情况，我们希望今后能有所改变，使正面战场能够配合敌后战场的作战，以结束过去的那种完全不相配合的局面。

关于敌情的介绍，大致就是如此。

现在说一说敌后战场的伪情。

这里，我先要感到惭愧，因为中国七年抗战，一面是全国绝大多数军民在庄严神圣的抗战与牺牲，一面又有一部分人，而且是不小的一部分人，卑鄙无耻的投降与作伪，这是我们民族的极大的耻辱，必须予以洗雪。可是今天的伪军在敌后战场已有七十八万之多（伪警察、伪民团还不在于内），成为中国抗战不可忽视的一个大敌。所以值得介绍一下。

中国伪军在一九三三年冬长城抗战的时候，就有所谓李守信、王英两部伪军（李守信是国军骑兵第九旅的团长，王英是绥西地方武装），这是抗战以前的老伪军，现约二万人。

抗战初期，平津沦陷，齐燮元起来组织靖安自治军，当时仅四个连，到一九三八年发展到五个团，直到现在，有十二个集团军，辖三十六个步兵团，共约六万余人。

自汪精卫投降以后，华中伪军开始大发展，如李长江、杨仲华两部四万国军，改变旗帜，整个投降。但是伪军的猛烈发展是从一九四二年春开始，也可以说是从孙良诚投敌开始的。从那个时候起，在抗战营垒中投敌将领共有将级军官六十七人之多。

中国有这样多的伪军，各位也许会惊讶起来，可是这完全是事实。如果有人问为什么在一九四二年以后会有这样多的军队投降？原因当然是可以找到的。在找原因时，或者有人要说：一九四二年那时候的形势，有：

- （1）日本在南洋正在得势；
- （2）苏德战场的红军还未转入进攻；
- （3）日本对华采用所谓“新政策”，因为日本正有事于南洋，感觉兵力不足，乃强化汪政权代管敌后，又提倡南北合流

及渝宁合流等口号。

是的，这些确是那时的情形，但是这些并不能作为大批中国军队投降的真正原因。究竟什么是真正的原因呢？

我们认为完全是因为中国国内政治不团结、不民主与赏罚颠倒，对全国军民投下一个巨大的暗影，动摇了颇大一部分军民的胜利信心。如果不指出这一点，就不能解释为什么同在敌后，同样困难，共产党能够坚持，绝无叛军，国民党则不能坚持，产生了如此众多的叛军。

关于我们政府与我们统帅部赏罚颠倒一事，只要指出一件事就明白了：山西的决死队和华中的新四军，自始至终是英勇抗战的，但是这两部分军队，却遭到我们统帅部派遣的大军袭击，并杀死与俘去成万的官兵，又下令通缉与审判其首长，以后便宣布他们为“叛军”。但是，国民党军队真正叛变了几十万，将级军官达六十七名之多，其中最著者例如庞炳勋、孙殿英、孙良诚、公秉藩、陈孝强、吴化文、李长江、王劲哉等都是上将与中将领级人物，而我们的政府及统帅部却不审判，不讨伐，不宣布为叛军，反而和他们勾结，给予命令，要他们去进攻八路军、新四军与华南游击队。请你们看看，这是怎样一种颠倒过来的赏罚啊！抗日者有罪，叛国者无罚，请问怎能振奋士气，又怎能叫人心服呢？

一九四三年冬，汪逆宣布南北伪军统一指挥，将全国伪军重新编制，并加以整训。经过此次编整以后，全国伪军有了比较完整的系统。

总的说来，全国伪军可分为正规军及地方军。伪正规军的数量约有三十八万多人，伪地方军约有四十万人，全国共计伪军约有七十八万人，其中有百分之六十二是由国军投敌的，有百分之三十八是敌伪强拉壮丁，收编土匪、流氓编成的。此外

尚有许多伪民团、警察，没有计算在内，如果一并计入，当达九十万人以上。

这许多伪军在敌后起了什么作用，换句话说，许多伪军为敌人负担了什么任务呢？大概说来是：

- (1) 配合“扫荡”；
- (2) 守备据点；
- (3) 进行“清乡”；
- (4) 补充缺额。

前三项是众所周知的。最后一项例如敌第三十七师团自一九四三年春季以来，补充三批伪军：第一批三百余人；第二批由石家庄补充来一千五百人；第三批由介休补充三千人。而所有这些任务，都是对付共产党的。

你们看，昔日的“友军”，现在倒转枪口打自己的同胞了。

根据我们对敌伪斗争的经验，证明投降的伪军反对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战是特别坚决的。例如孙良诚在冀鲁豫，庞炳勋在豫北，吴化文在山东，都是明证。伪军中有许多人是继续领受了我们的统帅部的命令，加紧进攻共产党的。例如庞炳勋、孙殿英就有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及军委会调查统计局的人员经常联络，授予反共命令。而庞炳勋在投降敌人发表叛国宣言，并被日本同盟社公布于世以后，我们的参谋总长何应钦先生，还向中央社发表谈话，称赞庞为“谋国忠诚”的人物。因此敌后伪军的大量增加，对我们坚持敌后战场及准备反攻的事业，是一个严重的威胁，所以今天特别需要把敌后伪军情形，作一个简单介绍，唤起大家注意。

所有伪军，几乎全部都压在共产党身上，国民党是不打伪军的。只有极少数伪军，因为那里没有共产党的军队，例如在南昌附近及杭州附近之伪军，不应算入中共抗击的范围之内，

但是也不能算入国民党抗击的范围之内，因为国民党是不打伪军的。

如果把全部敌军及全部伪军合计起来，则在一九四四年三月以前，共产党担负抗击的占敌伪军总数一百三十四万人中的一百一十余万，即百分之八十四，或六分之五以上，国民党担负抗击的仅占百分之十六，即不足六分之一。三月以后，敌人增加了一部分军队来华，向河南、湖南、广东的正面战场进攻，两党分担的比重起了一个变化，但增至这三省举行进攻的部队，最多不过十几个师团，这个变化，也不算很大。

至于敌后战场以及一部分正面战场的友军和我军的关系，抗战初期还能配合作战，但是在一九三九年以后即集中力量对中共磨擦。曾在一九四〇年、一九四一年、一九四三年有过三次大规模的反共高潮：其中只有一九四三年七月间的一次（胡宗南将军调动河防大军，准备进攻边区），因为中外舆论干涉，未爆发战争；其余两次，均爆发了大规模的战争，使用的兵力均近十万人。第一次是一九三九年十二月至一九四〇年四月在山西进攻决死队（阎锡山长官所属的部队，亦称新军）与在太行山进攻八路军；第二次是一九四一年在安徽进攻新四军；此外小的或中等规模的军事磨擦，则从未间断过。即如目前山西的中条山（阎锡山长官所部），湖北的鄂东、鄂西、鄂南，安徽的皖中、皖东、皖南，浙江的东面，广东的广九沿线（以上均国民党所部），我们的友军无日不在剿共战争中。这种抗日战争中的国内战争，在中国已经存在了四年半（从一九三九年十二月第一次反共高潮算起）。我们曾在自卫斗争中，获得了统帅部及国民党各级的成千件的反共或剿共的命令训令。我们之所以至今还没有把这些文件公布出来，是因为我们始终抱着期待我们的友党友军自动地改变态度，停止国内战争，改善国

共关系的心理。尽人皆知，不停止一切国内战争（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中国要配合盟国反攻日寇，是异常困难的，或者是不可能的。

至于正面战场友军之所以大部分丧失战斗力与在敌人进攻面前表示束手无策，例如蒋鼎文将军、汤恩伯将军与胡宗南将军的数十万军队，在河南不超过七万敌军的进攻面前，不战而溃，或一触即溃，几成不可收拾之局，其原因完全在于政治上反对人民，反对民主，反对共产党，外交上依赖友邦作战与依赖友邦接济，而全不振奋精神，自己动手之故。我们的友党——国民党的方针，拿几句话来概括，就是厉行专制，压迫民主，抗日依赖别人（国际依赖英美，国内依赖共产党），自己保存实力，准备铲除异己。假如这种方针不变，中国不但不能反攻，就连保存现状也是不可能的。

总计开到华北、华中敌后战场的国民党军队，原来不下一百万（一九四一年中条山战役时期的统计，华北约有八十万，华中约有二十万），由于政策错误和受不了艰苦磨炼，绝大部分被敌人消灭或投降了敌人，留在原地的及撤回后方的为数甚少。到今天还在敌后的只有三部分地方性的军队，他们用各种方法，不择手段地求得自己的存在，这就是山东的赵保元、张里元及山西阎锡山长官在三个月前才由晋西南派到晋东南去进攻决死队与八路军的第六十一军，这三部分总共不过二万至三万人。

最后，要介绍八路军、新四军的情形：

八路军的前身，是中国红军。一九三五年至三六年在陕北会合时，计有官兵八万人。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红军乃奉统帅部命令，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但只被承认四万五千人，被授予三个师的番号（一一五师、一二〇师、一二九师），即

开赴华北参加抗战。

新四军的前身，也是国内战争时的红军游击队，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日奉统帅部命令，集中于皖南、江北两地，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辖四个支队，计有一万二千人，在华中参加抗战。

华南的中共部队，一部分是内战时期的红军改编的（海南岛），一部分是抗战以后共产党领导人民组成的（广州附近）。

中共领导的一切部队，都执行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执行孙中山三民主义及中共一九三七年九月间宣布的共赴国难宣言，他们在华北、华中、华南三大敌后战场上团结各界人民，创立民主抗日根据地，每一次由敌人手中解放出来的国土，都由人民选举抗日地方政府，执行三三制、减租减息、发展自卫军民兵游击队、发展生产、肃清汉奸的政策，其特点就是密切地依靠人民，军队与人民痛痒相关，党政军民结合一体，向着敌伪展开进攻与防御的猛烈战斗。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他们能够战胜敌伪军无数次的进攻，在毫无接济、困难万分的条件下，能够克服困难，坚持敌后战场达七年之久。大体说来，一九三七年至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期间，日本人重视国民党，轻视共产党，故以其主力向正面进攻，而以第二等力量在敌后打击共产党。但自从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以后，由于中共在敌后战场展开了猛烈的战斗，日本人就改变了其战争政策，轻视国民党，重视共产党，对国民党改为以政治诱降为主，以军事打击为辅，而移其主力于敌后战场进攻共产党。一九四一与一九四二两年，这种进攻达到非常残酷的程度，敌人的“扫荡”政策，“蚕食”政策，“三光”政策都在这个期间达到最高峰。其结果是我们的军队缩小了，根据地缩小了，人口由一万万降到五千万。一九四三年以来，敌人进攻的残酷虽

仍是有加无已，但是我党、我军及敌后人民却从这种艰苦斗争中锻炼出来了。由于执行了中共中央的各项正确政策（三三制、土地政策、精兵简政、统一领导、整顿三风、拥政爱民、发展生产、肃清特务、发展民兵等），终于打退了敌人的一切进攻。因此，一九四三年到现在，情况又好转了，军队又有四十七万，民兵有了二百余万，根据地又扩大了，人口又上升到八千六百万，并且经验丰富了，质量提高了。我们曾经担负抗击敌伪总兵力六分之五以上，经过了外间所不能想象的困苦艰难，然而什么敌人、什么困难也不曾压倒我们。

中共七年来的抗战史，几个钟头是说不完的。现在把七年来我军作战的几种重要统计分别地说一说。

先说八路军各周年的战绩统计：

第一周年，从一九三七年九月到一九三八年五月，共进行大小战斗六百三十八次，毙伤日军三万四千零七名、伪军三千七百零四名，俘获日军一百二十四名、伪军二千零九十四名，伪军反正一千三百六十六名；缴获长短枪六千六百九十九支、轻重机枪一百九十二挺，各种炮二十五门。我军指战员伤八千一百零七名，亡四千四百三十二名；敌伪与我伤亡比例为三比一。

第二周年，从一九三八年六月到一九三九年五月，共进行大小战斗二千零五十一次，毙伤日军三万一千零八十三名、伪军一万五千四百三十名，俘获日军三百八十五名、伪军七千五百二十一名，伪军反正一万七千九百三十五名；缴获长短枪一万四千五百六十九支，轻重机枪二百九十一挺，各种炮六十一门。我军指战员伤三万一千零三十一名，亡一万五千零四十八名。敌伪与我伤亡比例为一比一。

第三周年，从一九三九年六月到一九四〇年五月，共进行

大小战斗六千九百三十六次，毙伤日军六万四千三百五十五名、伪军二万三千四百七十五名，俘获日军六百八十九名、伪军一万五千三百三十八名；日军投诚十九名，伪军反正九千一百八十名；缴获长短枪三万七千六百六十六支，轻重机枪六百七十一挺，各种炮一百一十九门。我军指战员伤三万二千一百七十五名，亡一万七千零一十二名；敌伪与我伤亡比例为一点八比一。

第四周年，从一九四〇年六月到一九四一年五月，共进行大小战斗六千一百五十二次，毙伤日军五万零二百五十七名、伪军二万一千五百八十一名，俘获日军三百二十六名、伪军一万五千三百五十五名；日军投诚十二人，伪军反正五千一百七十八名；缴获长短枪二万四千零一十七支，轻重机枪五百一十九挺，各种炮一百零四门。我军指战员伤三万八千三百八十四名，亡二万一千三百四十八名；敌伪与我伤亡比例为一点二比一。

第五周年，从一九四一年六月到一九四二年五月，共进行大小战斗一万二千三百二十一次，毙伤日军五万零三百零六名、伪军三万三千五百二十六名，俘获日军二百八十四名、伪军一万七千九百一十四名；日军投诚十六名，伪军反正四千三百零六名；缴获长短枪一万六千八百五十八支，轻重机枪三百六十二挺，各种炮二十九门。我军指战员伤四万零八百一十三名，亡二万三千零三十四名；敌伪与我伤亡比例为一点三比一。

第六周年，从一九四二年六月到一九四三年五月，共进行大小战斗二万二千七百三十五次，毙伤日军五万五千六百七十三名、伪军六万二千四百零五名，俘获日军二百九十六名、伪军三万一千一百六十一名；日军投诚二十三名，伪军反正四千

七百二十八名；缴获长短枪三万八千五百四十二支，轻重机枪四百七十九挺，各种炮四十六门。我军指战员伤一万八千一百零七名，亡一万一千三百七十八名；敌伪与我伤亡比例为四比一。

第七周年，从一九四三年六月到一九四四年五月，共进行大小战斗二万三千三百二十七次，毙伤日军六万五千四百三十二名、伪军七万九千八百三十一名；俘获日军三百零三名，伪军五万九千三百四十三名；日军投诚四十五名，伪军反正六千九百四十八名；缴获长短枪五万零六百七十七支，轻重机枪六百二十六挺，各种炮一百零五门。我军指战员伤一万七千九百七十六名，亡一万零九百三十四名；敌伪与我伤亡比例为五比一。

七年总计，共进行大小战斗七万四千零六十次，毙伤日军三十五万一千一百一十三名、伪军二十三万九千九百五十二名，俘获日军二千四百零七名、伪军一十四万八千七百二十六名；日军投诚一百一十五名，伪军反正四万九千六百四十一名；缴获长短枪一十八万九千零二十八支，轻重机枪三千一百三十挺，各种炮四百八十九门。我军指战员伤一十八万六千五百九十三名，亡十万零三千一百八十六名，敌伪与我伤亡比例为二比一。

从这一统计看来，八路军在华北敌后的抗战，其战斗次数是一年比一年增加的，这是第一。

第二，是对日军作战，毙伤数字较大，而俘虏数字较小；而对伪军作战，则恰恰相反，俘虏较多，毙伤较少。

第三，可以看出日军投诚的事，在抗战最初两年是没有的，第三周年以后，则逐渐增加，可见我们对敌军的政治工作是收到了效果的。

第四，就敌伪与我伤亡比较的变迁来看，中间虽有波动，但至一九四二年以后，我军经过精简整训，战斗力比战争初期是大大提高了，由三比一进至五比一了。

第五，从缴获敌军的武器的数字来看，可以看到我军在第五周年度（即一九四一年下半年至四二年上半年），战斗是非常艰苦的，就是说，战斗次数很多，而缴获率则比第四周年减少了。

在华中方面的新四军，他们七年抗战的经过情形，大体上与八路军差不多。

下面就是新四军七年来各周年的战绩：

第一周年到第四周年，从一九三八年五月到一九四一年五月，共进行大小战斗四千九百六十七次，毙伤敌伪军十二万四千二百五十二名，俘虏敌伪军二千三百九十二名；缴获长短枪四万八千零四十八支，轻重机枪一千六百四十四挺，各种炮六十四门。我军指战员伤三万六千六百三十七名，亡二万二千四百四十八名；敌伪与我伤亡比例为二点一比一。

第五周年，从一九四一年六月到一九四二年五月，共进行大小战斗二千四百二十七次，毙伤敌伪军二万四千五百一十二名，俘虏敌伪军五千四百五十八名，敌伪军投诚反正四千八百二十五名；缴获长短枪一万三千八百七十支，轻重机枪三百零一挺，各种炮八门。我军指战员伤一万零八百五十六名，亡六千七百五十四名；敌伪与我伤亡比例为一点四比一。

第六周年，从一九四二年六月到一九四三年五月，共进行大小战斗四千八百二十二次，毙伤敌伪军三万九千八百七十九名，俘虏敌伪军九千九百二十三名；敌伪军投诚反正七千九百二十一名；缴获长短枪二万八千五百七十四支，轻重机枪三百三十挺，各种炮十二门。我军指战员伤八千四百一十二名，亡

七千六百一十七名；敌伪与我伤亡比例为二点五比一。

第七周年，从一九四三年六月到一九四四年五月，共进行大小战斗五千三百一十八次，毙伤敌伪军五万三千一百零七名，俘虏敌伪军一万三千六百四十二名，敌伪投诚反正一万一千三百二十名；缴获长短枪三万三千九百六十七支，轻重机枪三百七十六挺，各种炮二十门。我军指战员伤九千零一十五名，亡八千零五十八名；敌伪与我伤亡比例为三点一比一。

七年总计，共进行大小战斗一万七千五百三十四次，毙伤敌伪军二十四万一千七百五十名，俘虏敌伪军三万四千四百一十五名，敌伪投诚反正二万四千零六十六名；缴获长短枪十二万四千四百五十九支，轻重机枪二千六百五十一挺，各种炮一百门。我军指战员伤六万四千九百二十名，亡四万四千八百六十八名；敌伪与我伤亡比例为二点二比一。

在毙伤敌人的项下应当特别指出：中共抗战七年来击毙日军之将校，根据极不完整的统计材料，计有五十五名，其中有日军中将一名，少将八名，大佐十九名，中佐二十名，少佐七名。

关于缴获武器方面，也应当指出：若将八路军、新四军所缴获的长短枪总计起来，则我军七年抗战的结果，缴获了长短枪三十二万支以上（其中一部分是日军的，大部分是伪军的）。若按照我军人与枪的比例为五比三计算起来，光是长短枪就可以武装五十四万多人，缴获轻重机关枪及大小炮，还不算在内。但是这些武器有许多是残破不全不能再用的。现在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游击队的武器来源有三：一是原有的；二是缴获敌伪的；三是民间武装，由人民自动组成游击队或参加八路军、新四军的。但是我军武器弹药依然非常不够，国民政府从抗战开始即不给以必须的接济，一九四一年以后，更无支

枪、颗弹、文钱、粒米之接济。希望同盟国设法给以援助，以利配合作战。我们军队因缺乏优良武器，缺乏子弹，缺乏医药设备，而无辜死亡的人数是非常之多的。

敌后七年抗战的经验还证明，如果不组织民兵，武装民兵，训练民兵，以配合正规军作战，则敌后的长期坚持是不能设想的。

我军在华北、华中、华南三大敌后战场的各根据地上，对民兵的建设，曾用了很大的力量，到今天止，我们敌后的民兵，已有二百多万。除华南尚无统计外，华北、华中的民兵分布如下：

华北方面：晋察冀六十三万人，晋冀豫三十二万人，冀鲁豫八万人，山东五十万人，晋绥五万人，共一百五十八万人。

华中方面：苏中十三万人，淮南五万五千人，苏北八万五千人，淮北七万人，鄂豫皖十五万人，苏南二万五千人，皖中二万五千人，浙东一万人，共五十五万人。

民兵以外，八路军新四军的正规部队及游击部队，是逐年增加的。广大敌后战场，受日寇压迫的人民，不得不武装起来进行残酷的战争，他们开始组成游击队，后来编入八路军及新四军，又复组成新的游击队。所以敌后战场的军制：是正规军、游击队与民兵三者的互相配合。有了这三者的互相配合，任何强大的敌人也无法摧毁我们。我们的友党，不愿发动民众、组织民兵及游击队，单靠正规军作战，纪律又很坏，如鱼失水，如鸟失气，所以不能胜敌。现将八路军新四军历史发展情形介绍如下：

一九三七年，八路军八万人，新四军一万二千人，共九万二千人。

一九三八年，八路军十五万六千七百人，新四军二万五千

人，共十八万一千七百人。

一九三九年，八路军二十七万人，新四军五万人，共三十二万人。

一九四〇年，八路军四十万人，新四军十万人，共五十万人。

一九四一年，八路军三十万零五千人，新四军十三万五千人，共四十四万人。

一九四二年，八路军三十四万人，新四军十一万零九百六十人，共四十五万零九百六十人。

一九四三年，八路军三十三万九千人，新四军十二万五千八百九十二人，共四十六万四千八百九十二人。

一九四四年，八路军三十二万零八百人，新四军十五万三千六百七十六人，共四十七万四千四百七十六人。

以上情况可以看出，我军在一九四〇年曾达到五十万，但在一九四一及一九四二年减少了，从一九四二年下半年起又向上涨，至今保持四十七万多，特别是战斗经验丰富了，质量提高了。要把民族敌人打出去，并配合同盟国反攻日寇，八路军新四军还应该壮大。一部分国民党朋友把我们这种壮大抗战军队，诬称为“破坏抗战，危害国家”是完全没有根据的。他们讲这种话，实在是缺乏民族思想的表现。现在应该不是削弱八路军新四军，也不是设置种种障碍去阻止它发展，而应是极力扶植它，接济它，壮大它，使它更能担负起配合盟军作战，驱逐日寇出中国的历史使命。尤其是当着正面战场发生严重危机的今天，每一个具有充分爱国心的中国人，都是应该有这种要求的。

我们的战绩统计中，已指出七年抗战中俘虏日军与日军投诚的数目，八路军二千五百二十二名（这中间包括一九三九年

四月二十六日我冀东包森游击支队在遵化地区所俘的敌寇天皇表弟赤本大佐及其随员六人)，新四军五百多名，关于这些俘虏的处置，我们的政策是：（一）送回日军去，起瓦解作用；（二）送交统帅部（西安）处置；（三）留在我军训练成为做敌军工作的战士。

关于送回日军去的政策，有些人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其实这是有重大作用的。我们的政策是不杀害俘虏，给予他们以兄弟般的待遇，听其自愿的去留，同时，又对他们进行不疲倦的反法西斯的政治教育，大胆地放他们回去，愿留下的则留下，这对于削弱敌军的战斗意志，有极大作用。

在这个政策下，我军俘虏日军的数目，逐年有增加，日军投诚的数目，亦逐年有增加。日军中反战厌战运动的生长，决不是偶然的事。这一件工作，即所谓敌军工作，我们的日本战友，首先是日本人民领袖冈野进同志，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

日军俘虏除大部分送回日军者外，由延安送去西安的俘虏数目：

一九三九年十四人，一九四〇年二人，一九四一年三人，一九四三年第一次十三人，第二次十人，共四十二人。

又由太行送往大后方去的数目，自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二年共二十八人。此外，新四军在抗战头三年亦送往大后方若干人，尚未计算在内。

现在华北、华中我军内的俘虏数目（其中大部分现在是日人解放联盟盟员）如下：

华北地区有二百五十六人，华中地区有六十六人，两处共计三百二十二，其中解放联盟盟员二百八十九人。

应当特别指出：在这些盟员中，有原在日军的军医中尉山田一郎，现在晋东南我军中做医务工作；原在日军的步兵少尉

山光美，现在我军中任步兵炮教员；另有中尉透江荣甫，在我军中任技术教员。他们均积极负责，热心工作。

我们很惭愧，由于我军的装备低劣，接济毫无，未能更多地俘虏敌人。但是我们拥有三百万大军、又得到盟邦大量金钱武器接济的友党，在整个抗战期间，他们俘虏敌人的数目，不管我们的统帅部如何夸大其词，实际上是比我们要少的，这可以将现存的俘虏一个一个去点验。他们没有敌军工作，更没有将俘虏送回去的事。他们缴获敌军枪炮的数目少于我们，俘虏敌军的数目也少于我们，教育俘虏变成反对敌人的斗士，则实际上完全没有。即如此次河南作战，以四十余万大军（蒋鼎文、汤恩伯、胡宗南三部分军队在河南境内者，再加五战区派至豫南增援的一部军队）对付七万日军，作战两个月（自四月十七日算起），据我们所知，不但一个俘虏兵、一支枪、一门炮也没有缴获，反而丧地四十余县，丧军近三十万（其中大部分溃散，一部分被俘），大部分枪械被丢弃（据传仅是步枪就有十五万支以上，其中有许多是友邦援助的），第一战区的粮、弹、枪、炮存储全部丢光。但是有些人却说共产党不打日本人，专作破坏抗战、危害国家的事。请你们看看，究竟谁不打日本人，谁破坏了抗战，谁危害了国家呢？

抗战以来，我军死伤数目，八路军近二十九万，新四军近十一万，两军合计，死和伤将近四十万人。其中阵亡团级以上干部，据不完全的材料统计，八路军四百零九名，新四军一百四十六名。

我军在抗战中光荣牺牲的烈士，不仅有中国人，还有国际的朋友。下面就是八路军、新四军中的国际友人牺牲于战争中者：

医生诺尔曼·白求恩，加拿大人。

医生柯棣华，印度人。

太平洋学会成员希伯，德国人。

在华日人反战同盟盟员：寺泽吉藏、令野（名不详）、安滕清（秋蒲县）、浅野清（形山县）、黑田嗣（埼玉县）、铃木（名不详，兵库县）、松野觉（广岛县）、大野静夫（长野县）。

朝鲜义勇军队员（独立盟员）：孙一峰（平安道）、王贤淳（平安道）、韩清道（忠清道）、朴吉东（京畿道）、石正（广尚道）、陈光华（平安道）、胡维伯（广尚道）、金学武（咸镜道）、金巴伦（平安道）、文明哲（金罗道）、韩乐山（忠清道）、崔指南（平安道）、李炉寅（平安道）、金永信（平安道）、吴均（江原道）、林平（忠清道）、韩震（京畿道）、金明华（平安道）。

说到这里，我联想到历年来盟国朋友，对我国许多援助，我全体军民是感激不尽的。

在武器方面：盟国帮助我们国家的东西，我们并不清楚，只是在抗战初期，统帅部曾经发给过我们一百二十挺轻机枪，六门反坦克小炮，据说是苏联的军火，可是除此以外，我们未曾得到统帅部的任何武器接济。弹药接济也自一九四〇年停止了。

在医药及器材方面：我们前后得到不少盟国团体及友人捐来的医药器材，可是还有一百零一箱药品被友军扣在三原，至今没有收到。这两年幸有保卫中国同盟捐来一些药品器材（其数目分配另有清单），虽然距我们需要很远，但我们很感谢盟邦朋友的援助和孙夫人^[1]领导的“中保”的热心和关切。

在运输方面：八路军前后收到摩托卡车一辆，救护车四辆，载重车四辆。新四军因原来军部在皖南，于一九四一年一月被统帅部派兵围攻，军长叶挺被俘，文件被劫，该军所得国

际援助数目，已无法查清。

在人力方面：我军得到加拿大的白求恩大夫，印度医疗队的柯棣华大夫等六人，美国的马海德大夫，奥国的夫赖大夫、罗生特大夫，苏联的阿洛夫大夫，英国的林迈可教授、班威廉教授，德国的记者希伯及米勒大夫等人，他们对我军的帮助是很多的。至于日本友人冈野进同志及其统帅下的大批日本干部，则对于我军进行瓦解敌军及号召日本侨民反对日本军阀的侵略战争，其成绩非常之大。华北朝鲜独立同盟自武亭同志以下的大批人员，在这方面，也做了艰苦勇敢的工作。

关于陕甘宁边区的部队情形，当抗战初期，为了保卫黄河北段数百里的河防，巩固西北后方，曾经统帅部批准留下一部分部队在边区，成立八路军后方留守处，指挥这些部队。到抗战中期，敌后根据地逐渐被分割，大兵团集中作战，已极困难，为适应战争形势与减轻人民负担，我军曾进行了一次精兵简政。许多精简出来的人员，大部分在敌后转入生产，一部分调来边区学习，或参加部队，或参加生产。尔后国内政治情况变得一天一天更坏，边区被包围封锁更厉害，内战危机经过三次的大紧张，陕甘宁边区为八路军新四军的总后方，我们是必须保卫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调了一部分军队（如王震旅）来边区。陕甘宁边区留守部队的作用，就是保卫河防与保卫被胡宗南将军五十万大军包围的八路军新四军的总后方。然至今天为止，边区军队的数目不过五万人。拿胡宗南将军部队和我们比较，是十个与一个的比例。现在敌军进攻河南，逼近陕西，我们的这点留守部队，除河防守兵及治安保卫外，很愿意和胡宗南将军的部队一同开赴豫陕前线去打敌人。我们可以断言，只要我们的统帅部允许边区的几万军队，开上豫陕前线，并给我们以充分发动民众配合作战的权力，而无友军友党

从旁牵制、反对、袭击或截断后路的事情发生，是有把握阻止敌人进攻，并把失地收复回来的。

现在说一说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问题。这是敌后坚持抗战的基本问题。没有民主的抗日根据地的建立，这样残酷、严重与广大的敌后战场是不可能坚持的。

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一面和敌人作浴血的战斗，一面又和根据地的人民一道实行新民主主义的亦即孙中山革命三民主义的建设。

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设，包含着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艰苦工作。在这一方面，我不多说，我只说一说敌后各根据地的轮廓。

华北敌后战场，我们建立了五六块抗日民主根据地，东至青岛与胶东半岛、黄海与渤海沿岸、山海关和锦州，北至热河之宁城，察哈尔之多伦、商都，绥远之百灵庙，西至黄河，南至陇海线，包括华北七省（晋、冀、察、鲁、绥、热、辽），东西长二千二百华里，南北长一千八百华里。有政令所及的人民五千多万，占全华北一万万人口百分之五十一；其中有组织的群众一千六百多万，占我根据地人口百分之三十以上；有不脱离生产的民兵一百五十万，占我根据地人口百分之三。在这个区域内，共有五个大军区，即晋绥军区，晋察冀军区，晋冀豫军区，冀鲁豫军区，山东军区。每一个大军区内，又有几个小军区，我们名曰军分区。

华中敌后战场，我们的新四军建立了八个抗日民主根据地，包括江、浙、皖、鄂、豫、湘六省地区。包含政令所及的人口三千万，占华中沦陷区人口百分之五十；有组织的民众九百万，占我根据地人口百分之三十；不脱离生产的民兵五十多万，占我根据地人口百分之一一点七。在这个区域内，共有八个

军区，即苏中军区，苏北军区，淮北军区，淮南军区，皖中军区，鄂豫皖军区，苏南军区，浙东军区。每一个大军区又各有几个小军区，同华北是一样的。

华南敌后战场有两处，一在海南岛，该处是内战时期的红军根据地，抗战后改为该地抗日军，领导者为冯白驹同志。国民党部队早已撤退，该岛完全为我军与敌军斗争。近年因电讯中断，详情不明，然从敌军消息方面，得知该岛大部为我军收复，敌人无可奈何。一在广九路沿线及广州四周，领导者曾生同志。该部现已迫近九龙，并在香港进行秘密活动，敌人很感头痛。

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就在华北、华中、华南这三个敌后战场与十五个抗日根据地上，进行异常残酷的非为目击者所能想象的抗日战争至七年之久。赖有这些敌后战场，才挽救了中国免于被日寇灭亡。如果没有这些敌后战场军民的英勇斗争，中国的情形是不能设想的。日寇欲以华北为所谓大东亚战争的兵站基地，欲在华中、华南搜刮人力与资财，这一目的是被中共七年来坚决、广泛的斗争基本上打垮了，在人力、棉花、煤铁与粮食的搜刮上，敌人受到我军的很大打击。这件工作，不但对于中国有利，对于我们共同作战的盟邦，也是有利的。但是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及其抗日根据地，却被国民党统治人士诬之为“奸党”、“奸军”、“奸区”，诬之为“破坏抗战，危害国家”，派遣军队进行攻击、包围与封锁，派遣成千的特务进行破坏工作，断绝一切接济，并截断国际朋友对我们的援助，封锁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抗战与民主建设的消息，不使国内人民与国际友人明白真相。所有这一切，实在是不利于抗战与不利于团结的。我们希望尽可能迅速地结束这种状况，改善国共关系，而开辟一个真正团结抗战的新环境出来。

关于中共抗战情况的一般介绍，今天就很简略地说到这里为止。至于八路军新四军及敌后人民所以战胜日寇的政治方针，政治工作，战略战术，军队训练，经济工作，后方勤务工作，文化教育工作，内容丰富，有许多适合情况出奇制胜的创造，连日本人都说“达到神奇的境地”，但不是短时所能尽述，只好待之另外的机会。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出版的
《叶剑英选集》刊印。

注 释

〔1〕即宋庆龄。

刘少奇、陈毅关于华中部队准备向河南发展给张云逸等的电报

(一九四四年六月二十三日)

张饶李郑^{〔1〕}：

河南战役现暂告一段落。敌寇一面作局部东退，似在诱胡宗南出关，寻求再度歼灭；一面则积极修复平汉路，图确实占领。但目前敌全般战局重心在攻略粤汉路。长沙陷落，衡州亦将不守，敌由广韶向北进行夹击，亦计日可待。因此，使我五师的战略地位和作用益形增高，五师今后发展方向应该确定向河南发展，完成缩毂中原的战略任务。这一任务完成，使我华中、华北、陕西呵成一气，便解决了我党我军颠扑不破的战略地位。但在目前，由于敌寇尚未大举进攻五战区，和平汉路尚未修复，故五师方面只宜以待机姿势作各种发展的准备；四师之一部越过津浦路，可西进至涡蒙阜颍等地，相机处理，亦暂不宜向豫境急进。总之，发展河南的斗争任务是必须完成的。目前从各种有利的准备入手，请将五师、四师在这方面的准备情形见告。另一面敌寇在粤汉路大举攻蒋^{〔2〕}。目前湘北、湘东、赣西北之间，均构成了极宽广的敌后地区。我五师宜以一部兵力加强鄂南分区，指示他们就当地敌后的实情向南推进，预先占领一二线阵地也是必要的；宜调查通山、通城、阳新境

内九宫山脉的情况，就可能作相机推进。鄂南发展是仅较河南为次的，发展方向亦请你们考虑见告。

刘少奇 陈 毅

二十三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四册刊印。

注 释

〔1〕指饶漱石、李先念、郑位三。

〔2〕指蒋介石。

中共中央关于整训军队的指示

(一九四四年七月一日)

(一) 全军目前四十七万，民兵二百一十万（各地报告数字恐有些不确实），欲以此在反攻前坚持与发展根据地是够用的；但欲以此在反攻时夺取大城市与交通要道，最后驱逐日寇出中国，并对付从国民党方面来的可能的国内突然事变（从背后来的袭击），则是不够用的；要担负最后驱逐日寇出大城市与交通要道，并对付可能的突然事变，非有一倍至数倍于现有的军事力量，不能胜任。敌人现在正向正面战场进攻，若干根据地当面敌情有某些暂时的变动；第二战场开辟，红军大举进攻，美国对日进攻更加积极等捷讯，又可长抗战之志气，灭敌伪之威风。这些条件，均使我们可能与应该在敌后扩大根据地与扩大军事力量。但是就扩大军事力量一点来说，在目前时期内，除若干条件优越地区外，则仍然受着种种限制。一则目前人力、物力、财力仍然差不多和过去几年一样，严格地限制我们。过去精兵简政正是为着适应此种限制，现在条件基本上没有变更（上层中层机构精简方针仍应坚持不变）。二则敌人从正面回师“扫荡”及从满洲抽兵入关，都有可能。战争越接近胜利，将会越困难。如同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二年那样，再来一个极端困难时期，不是没有可能的。还要准备对付使我们陷入更大困难的突然事变。所有这些可能的困难，我们均要事先作

好精神上、物质上与组织上的准备工作，方能有备无患。三则我军多年分散游击，极少训练，尚不巩固；我军经过了七年抗战锻炼，从这一方面来说，是提高了。但是我军现在进行的是极端分散的游击战争（这是完全必要的），极少集中整训与集中作战，从这一方面来说是退步了。由于上述种种原因，所以目前除若干条件优越地区外，一般地不可能与不应该采取扩大军队的政策。我们的中心政策是应该抓住目前时机，除对付敌伪“扫荡”、“蚕食”，深入敌后之敌后发展游击战争，扩大与巩固根据地，并以大力争取伪军伪警及大城市与交通要道上的广大群众之外，一定要在一年内，加紧整训现有军队，在现在物质基础上与战斗生产间隙中，把我军的军事训练与政治工作极大地提高一步，准备将来使我军发展一倍至数倍的条件。目前根据地一切工作的中心任务，仍然是提高，是深入，是巩固，是准备将来大发展的条件，这不论对军事工作，政权工作，经济工作，民运工作，干部教育工作，都是如此。如果我们不能完成此种任务，则我们将来的大发展与我们从大城市驱逐敌人的任务必会受到妨碍。关于军事工作方面的提高、深入与巩固，须特别唤起同志们注意。

（二）因此我们向你们提议，在一年内，主要是今年秋冬两季，在不妨碍战斗与生产条件下，由各局各委作出全般计划，由军区军分区负责执行，利用一切可能间隙，轮番整训部队。有特别便利条件者，几个团或一个团为单位分批集中整训；无此种条件者，以营以连为单位分批集中整训；总使一年内，整个八路军新四军都得到一次有效的大整训。

（三）整训内容分军事政治两方面。军事整训就是练兵，并总结带兵用兵与养兵的经验。练兵内容，以技术为主，战术为辅。练兵方法：第一，实行群众运动的方法。改变过去少数

人包办，即司令部与教员包办的作风，而变教育为广大群众自己的事业，使群众（干部、战士、杂务人员）自觉学习，自动研究，互相帮助，互相比赛；各个人，各大小单位的群众都关心自己个人与单位的教育成绩，生怕成绩落在其他同志与其他单位的后面；使到处成为操场，到处成为课堂，时间抓得很紧，人人不甘落后；使官教兵、兵教兵、兵教官。第二，实行学用一致的方法，改变过去教条主义的练兵方法。过去的教条主义练兵方法，是使书本成为教育的唯一根据，结果使教育停止在书本范围以内，把宝贵的现实经验置之不问。教者是教条主义，形式主义，强迫灌人，不能启发群众的积极性，表面很忙，实际上无多大成绩；学者是事不关己，反认学习是痛苦，是不必要的负担。关于过去我军的军事教育方法，当然不能说一切都是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的，其中有许多曾经是有益处的，合乎实用的，过去的书本教育对于我军有其一方面的进步性与益处。但是过去的方法中存在着严重的教条主义与形式主义弊病，则是事实，而且没有受到必要的批判。此次练兵，必须纠正这种错误，不是不要书本，而是正确地运用书本，将书本上不合实用的加以删削，而将书本上没有包括的东西（我们的具体经验）加入进去，并且不断地吸收新的经验。总之，练兵内容要切实实用，不是为练兵而练兵，而是为战胜敌人而练兵。第三，练兵的领导方法：动员要普遍到每一个战士，使人人都了解练兵的必要，注意说服落后分子，打通思想。要使骨干与群众相结合，所有干部与战士中的积极分子，在操场上都和一般战士一样操作，一样守纪律。要创造与发现典型例子，将其经验介绍给全体，并请有优良成绩的战士当教员，要以分区或以团为单位召开模范学习者代表大会。在训练一时期后，每个伙食单位用无记名投票法选出干部一人，战士二人为代表，到团

部或分区去开会，总结经验，发动竞赛，奖励积极分子。关于练兵方法以及练兵内容，军委将有详细介绍，这里只指出几个方法上的要点。

（四）一年整训期内，政治工作须作一次普遍的彻底的有计划的改造，根据古田决议及谭政报告，用检讨错误缺点，发扬优良成绩，发扬模范连队的经验，奖励战斗英雄、劳动英雄、模范工作者与模范学习者的方法，达到改造政治工作之目的。政治工作必须保证整个整训任务的完成。

（五）上述军事训练与政治工作改造，包括全军四十七万主力军与游击队在内，均须在一年内达到大整训一次的目的。我们还有二百万民兵与更多的自卫军，他们不但是现在坚持与发展根据地配合主力军与游击队作战的决不可少与极有成效的力量，而且是将来使我军扩大一倍至数倍的主要兵源。一年大整训期内，不但要整训全部主力军与游击队，而且要整训全部民兵与自卫军。各局、各委及各军区、军分区，应分别作出关于主力军与游击队部分及关于民兵与自卫军部分两种整训计划，分头、分区、分期进行整训。在整训民兵与自卫军中，应总结民兵与自卫军的斗争经验，重新整理其编制，不足者扩大之，落后者提高之，缺乏干部者补充之，在不违农时及劳动与战斗相结合的原则下，达到全民皆兵之目的。民兵自卫军的整训方法，亦须实行群众运动，学用一致，骨干与群众相结合，介绍典型经验，发动竞赛，开英雄大会与模范学习者大会，奖励优良成绩等。各级军政党机关对民兵自卫军工作过去注意不足者，须作自我批评；军区，军分区政治工作部门过去对民兵自卫军中政治工作的指导与帮助注意不足者，须立即加强注意。

（六）为着准备在将来条件成熟时，扩大我军一倍至数倍，

对于大批训练干部，应引起各级党委及各级军事机关与政治工作机关的极大注意。现在不论主力军、游击队或是民兵自卫军，我们的干部对于技术与战术程度，对于练兵、带兵、用兵、养兵的能力，一般都不很高，有些则是很低的；对于政治认识与政治工作，一般都有缺点，有些则是很差的。如果还不及及时加以整训，势将妨碍将来重大任务的执行。但是同时，不论在我们的主力军与游击队中，或是在民兵与自卫军中，都包藏着广大勇敢聪明与有极大发展前途的干部与士兵。我们的干部与整个军队有极大的成绩，干部水平的不高及某种落后是可以克服的。在一年整训期内，各局各委及各军区军分区应有一个训练干部的切实计划，分别在各军区军分区及县级实行。在军区者，有抗大分校，轮训当地连长连政指以上军政干部及训练由当地党政民工作准备转入军队担任连级以上工作之干部。再则，普通中等以上学校亦须加入军事教育课程。在军分区者，应办教导队，以训练军队班长排长与民兵自卫军排长两类干部为目的。前者应包括轮训主力与游击队中的排长班长及训练由当地党政民工作准备转入军队担任班长排长工作的干部，其期限由各地酌定。后者时间一月至二月，派回本地工作。在县级者应办民兵自卫军班长一级的教导队，轮训一月即归本乡，造成广大群众武装的干部。各地应自己创造多种训练方法，利用战斗与生产间隙去进行。

（七）请你们将关于一年大整训的任务，提交所属军事机关与政治工作机关，加以研究，定出计划，开始执行。为着使这个一年大整训的计划变为群众热烈参加的运动并获得实效，必须在一次包括全根据地的党政军高级干部会上讲通这一任务的重要性及其实践的方针方法，会毕并应仿照去冬陕甘宁边区高干会例子，所有高级干部，不分文武，一律参加，下操五天

至七天（身体太差者在操场旁观），造成大整训的决心与热潮。还须注意者，时间虽定一年，但是主要应抓住今冬十一月至明春二月共四个月为整训中心关节。今秋八九十三个月则须训练好一部分武工队，一部分游击队及一部分主力，准备到冬季去接替其他部队，分期集中整训。民兵自卫军的分期轮训计划，由你们酌定之。

（八）此外，在发展军政党公营生产，减轻人民负担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二十（以一九四三年负担作标准），并十分注意保护壮丁、休养民力的原则下，应按照各地须要情形，酌量吸收若干新兵，补充连队之消耗，保持各战略区军队之总数量。如果我军在一年整训期满时能够保持全军四十七万至五十万，又获得一次大整训，那就算是很大的成功。再则，本指示所提出之整训与提高部队质量之方针，不能误解为放松上中层机构的精简，也不能误解为要改变目前部队的分散游击性，须知精简政策与分散游击政策在目前时期仍是完全需要的。

中 共 中 央

七月一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四册刊印。

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

(一九四四年七月一日)

罗 荣 桓

—

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是马列主义的思想。在民族化上有了他的发展。这是否由于毛泽东同志个人的天才而得到成功呢？我认为这并不能完全说明毛泽东同志思想的伟大处，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是“来自群众中，再到群众中去。”因此，他是掌握了马列主义的基本精神，实事求是的精神，这是教条主义所不了解的。曾有人认为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是狭隘经验论，这是有原因的。由于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与教条主义者、与以背诵马列主义现成词句为满足、自以为是的人，是完全冲突的，是不能并存的；又曾有人对毛泽东同志思想是马列主义的，而表现惊奇与愤怨，认为“在偏僻的农村斗争中哪里会有马列主义？这简直是侮辱了马列主义啊！”这充分说明了这种把马列主义看成了神秘的东西，完全否认了列宁说的“政治在千百万群众中”（《论群众观念》），他也不懂得中国革命已成为世界革命的

^{*} 这是罗荣桓在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山东军区直属机关干部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二十三周年会上的报告。原载一九四四年八月中共山东分局出版的《斗争生活》第三十二期。

组成部分，这是如何的无知无识。这种人特别瞧不起毛泽东同志思想的地方，是因为毛泽东同志又没有到过外国、到过苏联，还不能看外国文书，讲话都是老百姓的话，什么“三大纪律啊！八项注意啊！军队三大任务！”这在教条主义者看来，都是非马列主义的，是一些狭隘的经验论。这是不奇怪的。教条主义者如果不这样高叫，又怎样能吓唬人家、自称“马列主义”者呢？造成宗派教条主义呢？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并没有因为教条主义、宗派教条主义而丧失光芒万丈的发展成为中国革命胜利的武器。

毛泽东同志的思想还由于历史的条件而产生的。处在二十世纪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到了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发展到死亡的阶段，是世界革命的时代，并且有了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革命则已不同于欧美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是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民族统一战线来完成的。这就是毛泽东同志思想产生与发展的历史条件。同时还由于“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如果我们回想一下，我党在幼年时期，我们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和对于中国革命的认识是何等肤浅，何等贫乏，则现在我们对于这些的认识是深刻得多，丰富得多了。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一百年来，其优秀人物奋斗牺牲，前仆后继，摸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是可歌可泣的。但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作为解放我们民族的最好的武器，而中国共产党则是拿起这个武器的倡导者、宣传者和组织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这说明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是从马列主义的普遍真

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日益互相结合上产生发展起来，继承了中国革命百年来的历史传统而民族化了的思想。他的发展是完全合理的，决不是偶然的，更回答了教条主义者、宗派教条主义者，对毛泽东同志思想发生惊异与愤怨，是没有任何根据的。而如果还说有根据的话，只有死守住马列主义的现成词句，主观主义的自以为是。但中国共产党已不是幼年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布尔什维克的党中央，已率领着全党继续走向胜利的前途，那末教条主义、宗派教条主义已临到了从党的领导成分上滚开去，当成一钱不值的废物而将被全党所抛弃。

二

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是与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途径继续前进不可分离的。他经过历次严重的考验，每当着党的领导上犯了错误，招致对革命的损失，总是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来代表着党的正确方向，挽救对革命的损失，胜利的团结了党，巩固发展了革命势力。这特别表现在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在民族抗战阶段上，毛泽东同志思想，已成为全党所公认，是代表着党的正确方向，马列主义的方向，胜利的旗帜。

毛泽东同志是马列主义的天才战略家，他根据马列主义的科学与实际，说明中国武装斗争的特点，作为中国革命特殊的规律而发现。

因为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内有封建反动势力、军阀主义的割据统治，外有各个帝国主义的侵入、划分势力范围，而同军阀主义相结合。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没有任何自由与民主；要有革命的地位，工农的地位，那只有武装斗争。还由于资产阶级大地主叛变了第一次大革命，武装斗争要

依靠农村，这是长期的斗争；游击战要有根据地，造成武装斗争的地方割据，并利用军阀的混战（亦是长期存在的），反对四面包围的敌人，以推动全国革命形势之到来；而且规定出我们打仗，不是为了打仗而打仗，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建立群众自己的政权，武装群众的力量而打仗。这是一条很明确的武装斗争道路，谁要不依照这条道路做，武装斗争必然遭到失败。因此，在苏维埃的初期，有名的南昌暴动、广州暴动、秋收暴动、湘南暴动、海陆丰暴动，实际上都没有成功，而只有毛泽东同志为首挽救了秋收暴动的武装，与朱德同志退出湘南暴动的部队会合于井冈山，建立了罗霄山脉中段根据地，粉碎了敌人的三次“围剿”，以后发展了闽粤赣边的中央苏区，才是成功了的。而其他苏区亦无不是循着毛泽东同志这一武装斗争道路，而获得存在发展起来的。苏维埃后期在教条、宗派主义的错误指导之下的武装斗争，军事方针是过早地提出阶级决战，发展到拼命主义，苏区是损失了十分之九，红军的长征最后又回到毛泽东同志为首的指挥之下，得到挽救，剩下了苏区十分之一。曾经有人认为毛泽东的武装斗争道路是保守主义，这有什么根据呢？这不过是冒险盲动主义、自以为是的宗派、教条主义，反对毛泽东同志正确的斗争道路，加上一个莫须有的罪名而已。

毛泽东同志在建设红军和现在的八路军、新四军是给我们很好的示范。他写下的红四军九次党代表大会的决议，解决了我们建军的方向。他把党的领导树立无产阶级的思想，作为建军的决定因素。他曾亲自下手去建立连队支部，重视小组在班排的分布，规定军队的三大任务、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以建设自觉的纪律，巩固官兵一致，军民一体，反对打骂战士，废除肉刑，有了争取俘虏的政策。他给我们奠定了和培养出革命军

队的本质，同一切其他军队、旧的军队完全区别开来，组织一支崭新的军队。但这并不是很顺利的事情，是经过同军阀主义、流寇思想及流氓无产者、小资产阶级、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意识，不断地作着严重的斗争。因为这些东西从外面和内部经常来袭击党的领导，危害党的领导，如果我们不能够经常去同这些脏东西作斗争，是不可能保持我们军队的纯洁，甚至引起变更、分裂党、分裂军队，张国焘分裂主义就是很好的证明。皖南新四军的损失，亦有同样的情形。还有，宗派、教条主义在我们军队中的影响，是促进了大小不同的山头主义的存在，妨碍着党的一元化领导，产生各自分离的独立的现象。这在抗战初期我军中是严重的，尤其离开了毛泽东同志的建军思想，不宣传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思想，而宣传着洋八股，强调正规化、形式化，有的准备去同国民党的军队溶化起来，传播出旧军队的习气，生长起军阀主义的倾向、单纯的军事观点，就不能不严重的脱离了群众，脱离了战士，不爱护伤病员。如果我们再不遵照毛泽东同志的号召整风，是很危险的。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在抗战阶段上已成为全民族的救星，解放胜利的旗帜。他连续发表的伟大著作《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号召全党的整风，改造着全党的思想，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经济，而放出了万丈光芒，表示出半殖民地或殖民地及一切被压迫民族革命与反法西斯战争的示范。因此，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已不是中国一个独有的产物，而已成为国际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

毛泽东同志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民革命的领袖，不

是自己封的。他是代表党的正确方向，胜利的方向，而与党的整个事业相结合，成为不可分离的关系而得到成就的。这不凭哪一个人的欲望能够成就的。这对我们干部中有些存在个人英雄主义的思想，总想把个人提到第一位，分离党的整个事业，而与党对立起来的人，是一个很好的对照。领袖决不是靠吹嘘自己、拉拢捧场所能够如愿以偿的。在我们干部间，确还有不少的人经常强调个人前途为重。有的是知识分子出身的新干部，对工作存在不老实的态度，总想做一鸣惊人的工作，如果不得意，则认为被老干部排挤，找着老干部弱点加以扩大，把整个老干部同自己对立起来，甚至认为党都是黑暗的。而另外也有一种是老干部，由生活不满，没有做到更重要的工作，则牢骚百出，翻遍同行、同事、同入伍的人名，说“谁骑了马啊！谁当了首长啊！”只有他是个官运不通的倒了霉，尤其是见到一个新干部做了比较重要的工作，可更有话说了：“土包子吃不开了啊！”这两种人各人背上都背上了一个大包袱，在包袱上面各个标着不同的四个字，前者是“自高自大”，后者是“自负功臣”，而包袱里面藏着的東西，都是些个人主义的货色，不要看他们两样，实际他们可以走到一块，由不满、愤怨走到失望，于是共同得出的结论：“革命的前途是光明的，个人前途是微弱的啊！”这是多么悲痛的事情啊！我们要抱着治病救人的态度，在他们个人包袱上写上“谨防跌倒”四个字，劝他们好好学习一下毛泽东同志的伟大精神。还有同样想法的人，感到自己是“气灯面前的洋蜡”，非常满意自己这支“洋蜡”的光亮，但感受到气灯的威胁，而又失望起来了。难道不会更感受到毛泽东同志思想万丈光芒的威胁吗？实际上他并没有“洋蜡”那样大的光，只是一根香头小的火，或者只能是在黑夜中的萤火。因为这种超过党的事业所追求个人主义的

欲望，是完全失掉光的。这都要求我们以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来改造我们的一切。

四

我们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在整风上有了一些成绩，这特别表现在我们现在要老实得多了，检点得多了，工作也有了成绩了；自以为是的风气，标新立异的想法，你也英雄，我也好汉的互相分歧，一般的收缩起来了。但这是不是就已经很好的改造了思想，我认为还不能这样说，对改造思想还有发展过程，这一过程对我们许多干部是很费事的。知识分子出身的读得通文件，不见得能领会到文件中的精神，因为他们是缺乏实际的；工农分子出身的读通文件很困难，事务主义的简单想事，很难从总结自己经验中去领会文件。如我们还只是一般的整风反省，会使整风平淡起来，不能够坚持下去，贯彻下去。

我们还有不少的部门干部，是完全脱离实际，在那里把整风文件当识字课本看。如这次供给会议、卫生会议的干部，就是如此的。到处闹着动手生产，解决供给困难，发展经济，而我们供给干部仍然把脑袋伏在收支预算表上，后方生产的混乱，浪费贪污，并没有适当的改善。而卫生干部单纯的技术观点，更为严重，离开了政治团结，分离出了党性，存在普遍的自由主义的思想，从这里已很难看出整风的踪迹。其它方面是否也有同样的情形，我想都是值得注意的。我还认为个人的清洁是非常重要的，打扫房屋、街道，清理厨房、厕所，建立起公共卫生的秩序，亦是非常重要的。有的个人还没有决心去清洁自己，有的个人在清洁自己，但他住的房屋、走的街道、搞饭吃的厨房、拉屎的茅房，还不懂得去动手清理，这种个人的

清洁，一定就不会彻底。因此，我们的整风要求从自己所站的工作岗位上，从自己所管理的工作上，与整个党的事业联系上，来暴露自己的思想，才会更全面的认识自己，也认识了人家，改造思想与改造工作完全结合起来。这对我们某些范围，某些干部中的整风，应走到这个阶段上来，因为有了一般的读文件与自我反省，如果不改变方式的话，就不可能贯彻下去、坚持下去，对思想的启发与改造，亦不会有更好的成就。

现在还有不少的人，对自己思想上存在的毛病，仍不敢公开，还不相信党的宽大政策，或者畏怯同志们对他的小视，这是很不必要的顾虑。这由于不懂得我们的党是以毛泽东同志为自己的首领，是以毛泽东思想为遵循的方向，而改造着整个的党，这会有什么不敢相信的地方？怕人家小视的地方呢？这是最好改造个人自己的时机了。

我们要把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作为斗争的武器，把实践这一思想看成是最荣誉的事业。

根据解放军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出版的
《罗荣桓军事文选》刊印。

边区参议会常驻委员会、 边区政府委员会联席会议关于 召开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 第二次大会的决定^{*}

(一九四四年七月五日)

日寇临死挣扎，进攻河南、湖南，正面战场后退，全国危极，西北危极。但是八路军、新四军作战的敌后战场则捷报频传，各抗日民主根据地日益巩固，成为全国人民希望之重心。为团结一切抗战力量，准备对敌反攻，决定本年十一月召开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二次大会。

在这次大会上，主要地将讨论下列各项问题：

(一) 团结与民主问题。陕甘宁边区抗日根据地之所以发展，所以巩固，依靠于政治上的民主、经济上的民主与文化上的民主，团结了各阶层各党派的人民成为一条心。今年的参议会应检讨已有好的和不够的经验，反映各方意见，给团结与民主以更充实的内容，使各界人民，男女老少，一齐动员，增加力量。且要以边区的模范推动全国人民一齐努力，从速终止一切分裂与反民主的现象。

* 这个决定是毛泽东修改审定的。

(二) 军事问题。过去拥军优抗工作与组织民众工作是有成绩的，但是还有缺点。今后两项均应加强，务以军民一体与全民皆兵之阵势，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今年参议会应该检讨此种工作。

(三) 边区经济文化建设问题。旧社会给边区的遗产是：贫穷、愚昧与疾病。多年以来全体人民在政府领导下，与贫穷现象斗争，这种现象或者已经消灭，或者已经减轻，人民的生活已有很大改善，丰衣足食的新现象已日渐推广。但是还没有普遍，更因抗战与备荒的需要，必须增加生产，因此必须号召人民于两年至三年内普遍做到每户至少有一年余粮。为改变边区童山太多现象，应号召人民植树，在五年至十年内每户至少植活一百株树。边区各项工业品年有增加，但还不能自给，特别是布、铁等项，要办到三年内完全自给，并且不仅求数量多，而且要求质量好。在与愚昧斗争的事业上，年来虽有进步，但文盲还未消灭，要用一切有效方法，使男女老少在数年内至少都能认到一千字。在与疾病斗争的事业上，更须作极大努力，方能克服“财旺人不旺”的现象，应在数年内做到每乡至少有一个医生，每区至少有一个药店。总之，应使现在已经蓬勃发展或已开始发展的经济运动、文化运动、卫生运动，更加向前大踏步发展。其办法：一是国营，一是民营。而主要的方法是民办公助，号召人民组织各种形式的合作社。只有公私合作、公私兼顾与在自愿原则下（禁止任何强迫摊派），把绝大多数人民都组织到经济的文化的卫生的合作运动中去，才能完成上述任务，今年参议会应具体检讨这些工作。

(四) 选举问题。边区参议会会议员应于明年改选。为使人民更能把自己爱戴的人选到参议会去，使这些新的参议员更能反映人民利益与决定抗战建国大计，关于选举条例及选举方式

应在今年参议会中提出讨论。

上述四项，为今年参议会必须讨论之主要问题，本联席会议责成各级政府，各参议员及各级参议会，各抗日团体，各劳动英雄，在事先发动热烈的讨论，准备意见，以便届时反映于参议会，作出有利于增强团结抗战与发展边区各项建设之决议，至为至要！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三卷刊印。

中共中央发布抗战七周年纪念口号

(一九四四年七月六日)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布抗战七周年纪念口号如下：

(一) 纪念七七，向全国抗战同胞致敬！向正面战场上努力作战的军队致敬！向敌后战场的八千万抗日同胞致敬！向英勇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致敬！向沦陷区抗日同胞致敬！向援助中国抗战的美苏英盟邦致敬！

(二) 纪念七七，加强抗日战争，全国军队必须积极作战，加强团结，粉碎敌人的新进攻！

(三) 西南危急，西北危急，全国人民快快起来，保卫西南，保卫西北，不让敌人打通粤汉路、湘桂路，不让敌人打进潼关，把进攻的敌人打出去！

(四) 要求国民政府切实改善士兵的待遇和教育，改革军事机构，提高军纪和战斗力，坚决打退敌人的进攻！

(五) 要求国民政府保护目前大后方正在兴起的人民民主运动，使得这个运动得到自由发展，增加抗战的力量！

(六) 要求国民政府快快给八路军新四军发饷发弹发药，改进八路军新四军的装备，让八路军新四军开到河南湖南前线去，打退敌人的包围封锁与进攻！

(七) 要求国民政府快快停止对八路军新四军的进攻，释放叶挺军长和一切被俘将士！释放各地被捕的共产党员，释放

一切被捕的爱国志士！

（八）纪念七七，要求国民政府，立即加强全国团结，立即改革内政，立即实行民主，以便彻底打倒日本侵略者，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

（九）要求国民政府快快实行三民主义，给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动员全国人民，打退敌人的进攻，准备全国的反攻！

（十）要求国民政府取消党禁，允许各抗日党派的合法存在，并在加强抗战实行民主的基础上，迅速调整国共关系，加强国共两党的团结！

（十一）要求国民政府废除统制经济，取缔投机操纵与囤积居奇，实行发展农业生产，奖励民营工商业，克服经济危机，培养抗战的经济基础！

（十二）纪念七七，敌后军民要再接再厉，更有效地打击敌人，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配合正面战场，阻止敌人的进攻，驱逐敌人出中国！

（十三）八路军新四军，要继续积极作战，无情的歼灭敌人，加强训练，提高军事技术，更加发展民兵与游击队，更加发展武装工作队，加强瓦解敌伪的政治工作，准备变成全国反攻的先锋军！

（十四）陕甘宁边区与各敌后抗日根据地，要继续发展生产，发展工业，发展农民的生产互助组织，发展各界人民的经济的文化的卫生的公益事业的合作社，改善军民生活，准备反攻的物质基础！

（十五）坚决实施减租减息，交租交息，没有减租的彻底减租，发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为驱逐日寇而奋斗！

（十六）继续改善军民关系与官兵关系，加强拥政爱民与

拥军优抗的工作，全体军民团结一致，打倒日本法西斯！

（十七）一切共产党员，要坚持团结抗战，坚持实行三民主义与四项诺言，坚持实行三三制，坚持与美苏英亲密合作，坚决反对法西斯主义，虚心学习，力戒骄傲，艰苦奋斗，迎接反攻，完成解放中华民族的伟大任务！

（十八）沦陷区的同胞们！你们解放的时刻迫近了，继续各种形式的大小斗争，反抗日寇占领者，聚集力量，加强准备，准备在必要时以武装起义来响应将来的全国总反攻！

（十九）纪念七七，加强中国与美苏英及一切联合国的团结，争取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消灭一切法西斯势力！

（二十）庆祝第二战场的胜利，庆祝苏联反攻的胜利，庆祝太平洋上的胜利，庆祝印缅前线的胜利，中国军民要与美英盟邦共同动作，积极准备反攻，驱逐日寇出中国！

（二十一）给来华作战的盟军以一切帮助！援助和救护盟邦飞行人员！

（二十二）拥护莫斯科、开罗、德黑兰决定，坚决实行这些决定，在目前，积极打倒法西斯，在战后，保持长期的国际和平！

（二十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伟大的保卫祖国战争万岁！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二十四）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万岁！和平民主繁荣的新世界万岁！

根据一九四四年七月六日《解放日报》
刊印。

八路军新四军的英雄主义^{*}

(一九四四年七月七日)

朱 德

日本强盗恃其帝国主义的军事力量，按其蓄谋已久的侵略计划，向我国进攻，造成战争初期敌进我退的形势，使敌人得以大吹其“战无不胜”、“攻无不克”、“赫赫战果”的牛皮。但我八路军、新四军英勇出击，挺进敌后，平型关一战首挫敌锋，打破了“日本所向无敌”的神话，奠定了我国人民持久抗战、争取胜利的信心。而自武汉失守，特别是百团大战之后，敌人深知我八路军、新四军为“皇军心腹之患”，乃放松正面战场，以全力“扫荡”我敌后。在五年半的长时期里，百分之六十四的在华敌军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伪军，完全压在我八路军、新四军和敌后人民的肩上。我八路军、新四军在敌人一万一千多公里长的封锁沟墙、一万多据点和三万多个碉堡围困的“囚笼”里，在敌人厉行“扫荡”、“蚕食”、“清乡”、杀光抢光烧光的“三光”政策、“长期的毁灭性扫荡”和加强“总力战”、“治安强化运动”的情况下，在敌伪军数量和装备都占绝对优势，而我又孤悬敌后，毫无粮饷弹药接济的情况下，不仅抵住了敌人，而且反守为攻，争取主动，战胜与消灭敌人。七年以来，我八路军、新四军大小作战九万二千次，毙伤俘敌伪

* 本文原载一九四四年七月七日《解放日报》。

军一百一十万，收复沦陷敌手的广大失地，解放遭敌奴役的八千万同胞，建立了华北、华中和华南大小十五个抗日根据地，组织了几千万民众和两百万手执武器的民兵，使全世界人士深知中国人民是不可征服的伟大力量。我们之所以能够创造出如许的史无前例的伟大功业，不但是由于八路军、新四军有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战略战术，而且是由于我全体将士的坚苦卓绝、奋不顾身的英雄主义气概。

但是，应该承认，对于八路军、新四军这种坚苦卓绝、奋不顾身的英雄主义的表扬是异常不够的。很多人没有把这种新英雄主义和旧式的个人英雄主义区别开来，错认为英雄、英雄主义都是旧的名词、旧的事物，是出风头、争名利、个人突出等个人主义的产物；而我八路军、新四军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是集体主义者，不应去提倡什么英雄主义。在这种错误认识下，许多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主义事迹和手创这些事迹的英雄们都被冷淡过去了，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这不能说不是一个重大的损失。怀疑新英雄主义的人们，不了解革命的英雄主义是革命者致力于革命事业的一种新产物，和旧的个人英雄主义有原则区别的崭新事物；不了解革命斗争需要有革命的英雄主义，需要有许多许多的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赤胆忠心，自始至终为革命服务，为革命效死的革命英雄；不了解我们部队之所以能够战胜敌人，实有赖于我们部队的英雄主义，有赖于许许多多勇敢杀敌、奋不顾身的英雄们。

八路军、新四军的英雄主义，不是为个人利益打算、为反动势力服务的旧英雄主义，而是新英雄主义，革命的英雄主义，群众的英雄主义。

革命的英雄主义，是视革命的利益高于一切，对革命事业

有高度的责任心和积极性，以革命之忧为忧，以革命之乐为乐，赤胆忠心，终身为革命事业奋斗，而不是斤斤于作个人打算；为了革命的利益和需要，不仅可以牺牲自己的某些利益，而且可以毫不犹豫地贡献出自己的生命。革命是为群众的事业，又是群众自己的事业，因而革命的英雄主义，必然是群众的英雄主义。群众的英雄主义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所作所为都是为群众的利益，而个人的利益则无条件地服从群众的利益；一是相信群众力量、集体力量才是创造世界和创造历史的伟大力量，个人的力量只是这个伟大力量中的“沧海一粟”。新的英雄产生于广大群众的共同行动、共同斗争中，为群众所赏识，为群众所称颂，而不是自封的，高高站在群众头上的。新的英雄也知道自己是群众中的一员，是群众力量中的一点滴，不轻视较自己稍为落后的人，不嫉妒较自己更为前进的人，互相学习，互相帮助，真正体现“大家为一人，一人为大家”的集体主义精神。这就是新英雄主义和旧式的个人英雄主义的严格区别。旧式的个人英雄主义者，是把个人的名利权位放在第一位，而不去首先分辨革命与反革命的严格界限；是一人至上，个人突出，轻视与脱离群众，甚至愚弄与奴役群众。其结局，必然为群众所唾弃，为历史所嘲笑！

新英雄主义是新时代新社会的产物，是和共产党的领导分不开的。只有具备共产主义的高尚品质和伟大气魄，才能具有彻底的革命观点和群众观点，才能开展新英雄主义运动。一切自私自利的旧的剥削阶级，都没有勇气面向革命、面向群众，不知埋没与葬送了几多的真正英雄，反而使许多害人的毒虫披上了“英雄”的外衣。而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一切人们都可在为革命为群众的事业中，尽量发挥自己的天才和创造性，在革命事业的宝库中放进自己更多的力量和更大的成就；而所有杰

出的群众英雄，也都会被赏识，被表扬，将和伟大的革命事业一起永垂不朽！

八路军、新四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爱国军队，具有一切条件来开展新英雄主义运动。因此，虽然我们过去有意识地开展部队中的英雄主义运动做得很不够，但我们部队仍然创造了许多史无前例的英雄业绩，涌现出许多出类拔萃的新的英雄们。战斗、生产、团结群众，是目前各部队的三大主要任务，也就是我军开展英雄主义活动的三个主要战场。在战斗方面，如著名的平型关大捷，阳明堡火烧敌机，使敌人胆寒的百团大战，狼牙山五勇士的壮烈跳崖，全排壮烈牺牲的马城村坚守战，黄烟洞保卫战，全连八十二人全部殉国的淮北刘老庄战斗，南北岱固坚守战，韩略村伏击战，甄家庄歼灭战，无一不是我军指战员的英雄主义的最高表现。这种英雄主义气概也同样表现在生产战线上。陕甘宁边区的留守部队，去年把二十万六千亩荒山变成了良田，收粮食三万一千石；今年更计划生产粮食十万石，做到衣食住全部自给，不让老百姓供给一粒米、一寸布和一文钱。前方的部队，虽在紧张的战斗环境中，但也已经掀起生产的热潮。部队中的劳动英雄以及兼为战斗英雄的劳动英雄，在前后方都是层见迭出。而在拥政爱民、团结群众的工作中，也出现了无数动人的模范事迹。大批的积极分子走在前面，在他们的影响下，大家从实际教育中懂得了老百姓是军队的父母，懂得了军队与政府的正确关系。实际行动证明，他们爱护人民与爱护政府，真能像爱护自己的眼珠一样。这些战斗、生产和群众工作中的大批积极分子的榜样，不仅推动了部队里的中间分子，而且也推动了落后分子；由他们所带动的群众运动的开展，就使得我军各方面的工作得到巨大的进步，造成了崭新的局面。

如果要问，部队中的共产党员应该怎样？共产党员的党性表现在哪里？我说，就应表现为战斗、生产和群众工作三个方面的英雄主义，三个方面的模范作用。事实也是如此，坚持黄烟洞保卫战的十二勇士全是共产党员，山东我军几年来伤亡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五是共产党员，其他还有很多战斗英雄都是共产党员；在生产与群众工作中也是这样，陕甘宁边区留守部队的劳动英雄，百分之八十是共产党员。这就是我军中共产党员的优良品质、坚强党性的具体表现。只有共产党所领导的、共产党员在其中起模范作用的我八路军、新四军里，才能开展新英雄主义运动，使部队更加坚强与巩固，成为无敌于天下的人民军队。

许多经验已经证明，新英雄主义运动是我们推进工作、培养干部和教育群众的很好的很重要的方法。因而，党、政、军、民、学各个方面，都应该在革命工作中进行革命的竞赛，开展新英雄主义运动。

但是，在过去，我们的连队工作中不是也时常号召大家要起模范作用吗？为什么效果不大呢？为什么同一个人，这件事情上是模范而那件事情上就不是模范，昨天是模范而今天又不是模范呢？重要的就在于我们没有把新英雄主义运动当做一种推进工作、培养干部和教育群众的重要办法，没有郑重地有系统地去进行这个工作。因而，对于开展新英雄主义运动的重要意义和应该注意的地方，还有加以解释的必要。

第一，新英雄主义运动是群众性的运动，需要在正确的工作方向的指导下，为争取实现目前可能实现的目标，发动人人的积极性、创造性，开展普遍的革命同志的友谊竞赛，形成一种勇往直前的风气，造成一种热火朝天的运动，使人人积极而愉快地为革命战争贡献出更大的力量。只有把全体群众发动起

来，投入实现某种具体任务的浪潮中，才能表现出群众的伟大力量和从群众中涌现出无数的英雄。如果没有把群众发动起来，工作还只停留在少数人的身上，则即使能造出几个突出的人物，其作用和意义也是很小的。

第二，这是一个团结群众、培养干部的重要方法。需要作领导工作的同志，在群众运动中，以最关切的态度对待自己的部下，很细心地研究与了解他们，很殷勤地培养他们，当他们需要扶助的时候，就去帮助他们，当他们做出了成绩的时候，就去奖励他们，鼓励他们上进。只有这种关切的态度，才能发现群众中的英雄，培养出很好的干部。有了这批积极分子，就有了团结群众的核心，在他们的影响下，使全体群众更积极地行动起来。因而，这是一件很精细周到的工作，决不是用官僚主义的态度，或者不慎重地乱加表扬又乱加打击的态度所能收效的。

第三，这是教育群众的重要方法，也是进行部队政治工作的重要方法。以群众所最熟悉的和最钦佩的群众英雄及其业绩来教育群众，以群众英雄的活榜样号召大家前进，这就打破了教条主义的空谈，使教育产生出力量。在我们革命的军队中，人人都有蓬勃的上进心，领导者的责任就在于发扬与引导这种上进心，使其为革命战争而戮力同心。这就决定了我们部队的教育方法，重要的是拿出好的榜样教育与激励群众，而不是消极的申斥或近于恫吓的责备。如果能使人人积极、上进，向前面看齐，我们的工作就会大踏步地前进，而在前进的道路上就会把一些坏的倾向克服掉。因而，我们更应该运用这种方法，使之成为提高民族觉悟与阶级觉悟的一个有计划的经常的工作，成为我们进行部队政治工作的一个重要方法。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从今天起已进入第八个年头了。英

美盟军已经胜利地在法国北部登陆，苏联红军的夏季攻势已经神速地粉碎了卡累利地峡、白俄罗斯前线的德芬防线，太平洋上美国海军已经突入日寇的内防御圈。我国战场的敌后战场上我八路军、新四军的积极作战，一年来扩大了我抗日根据地，使根据地的人口由五千万上升到八千万。这些事件，使日本强盗已经强烈地预感到盟军在太平洋上的总反攻之日已为期不远了。为救死计，敌人乃作困兽之斗，以一部分兵力向我国正面战场进攻。而我国正面战场的国军，久疏战备，仓皇无措，致使以敌一我十之兵力，不足两月之时间，河南、湖南大半沦丧，西北、西南同告危急。在如此严重而紧急的时日里，历史所赋予我八路军、新四军的任务更为重大了。在保卫西北，保卫西南，制止敌人的进攻，以及进入准备反攻之伟大战斗中，我八路军、新四军将日益成为有决定意义的力量。对于民族抗日战争，对于国际反法西斯战争，我军已经担负了重大的任务，创造了伟大的战绩，已经是一支英雄的军队；但目前的战争形势，要求我们肩负起更重大的责任，给予我们更艰巨的任务。在抗战进入第八个年头，英雄主义运动已经开始的今天，我英勇的全体将士，必能更加奋勉，普遍开展战斗、生产和群众工作中的英雄主义运动，在战斗员之间，指挥员之间，各种人员之间，在各个部门、各单位之间，发动战斗、生产与群众工作中的英雄主义竞赛，形成一种热火朝天的伟大运动，创造出更多的部队英雄和英雄事迹，以进一步提高我们的工作，加强我们的斗争，担负起目前战争形势所赋予我们的战斗任务，最后战胜与消灭日本侵略者！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
《朱德选集》刊印。

在民主与团结的基础上， 加强抗战，争取最后胜利！

——纪念抗战七周年

（一九四四年七月七日《解放日报》社论）

保卫祖国的神圣抗战已经七年了。

抗战第八年的开始，国际环境对于我国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之最后胜利是空前有利的。这便是：

第一，欧洲反法西斯战争已经进入了最后决战阶段。第二战场开辟了，美英加盟军在法国北部进行着艰苦的胜利的战斗，在西欧大陆上盟军已经建立了巩固的前进阵地，跟着时间的进展，这一战场的规模将日益宏伟，战斗的性质将日趋激烈。苏联红军在东线上的夏季攻势则以空前的规模与兵力发动了，希特勒在东线的所谓“祖国防线”几天内便被粉碎无遗，红军正以雷霆万钧之力向西方猛进，在不久的将来，它就会把战争的舞台推进到法西斯德国的本土内去。在南线，盟军正在意大利继续北进，铁托元帅率领的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燃起了巴尔干民族解放战争的烽火，希腊与法国的游击队正在步随他的后尘。从东西南三面围攻希特勒的大战开始了，受伤的法西斯野兽在其巢穴中被消灭的日子迫近了，这日子不在今冬，便在明春。

第二，反法西斯联合国——首先是美苏英——团结和合作

的更加巩固与亲密。有历史意义的德黑兰会议，不仅决定了三大盟国在消灭法西斯侵略者的解放战争中亲密合作，而且决定了胜利之后的团结合作以建立长期和平的国际关系。战争中的合作，现在已经进一步的体现在第二战场开辟与红军夏季大攻势的互相配合中，这种合作已经进到直接的军事的密切配合的阶段了；而战争中合作的增涨，战友之谊的生长，将必然会促进战后的长期合作。现在我们不仅可以看见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迫近，而且也可以看到，战后以美苏英为首的团结合作的自由、民主、和平的新世界，正在逐步成长了。

第三，太平洋上美国对日反攻的开始。一年内，美国在太平洋上的反攻已经得到了巨大的进展。据不完备的统计，在最近八个月中（从去年十月起），美国在太平洋上前进了三千六百公里，击毙敌军七万九千人（内有继山本之后任敌联合舰队总司令的古贺），击沉敌舰一千二百余艘，击毁敌机四千二百余架，现在敌寇自诩为“太平洋长城”的外防线，早已为美军所突破，即其内防线，亦因美军在塞班岛的胜利登陆而被打入了一个楔子，日本本土现在被置于盟机的轰炸圈内了。印缅前线，日寇蠢动非特毫无所获，且因孟拱、加迈的克复，雷多公路与滇缅公路之接通已不在远了。在这里，是中美英三国合作的结果。美军在太平洋上的反攻，虽然还仅仅在开始的阶段，在盟军面前虽还有许多艰苦的考验和残酷的战斗，但是以美国海空军的巨大优势和旺盛士气，实现尼米兹将军打到中国海岸的豪语的时期，决不会太辽远的了。在希特勒覆亡之后，日本法西斯决没有多少长期单独苟延残喘的可能。

总之，不论西方与东方，战胜法西斯强盗的胜利已经迫近了，自由、民主、和平的新世界快要来临了！当前的国际环境是极端有利于我们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

但是无论国际环境如何有利，在中国战场上的胜利，依然是要靠我们以自己的努力去争取的。依赖有利的国际环境，幻想盟国替我们打日本，袖手观战，保存实力，坐享胜利之果实，这不仅是无出息的妄念，而且是不可能的幻想。太平洋战争的最后决战场所是中国大陆，最后决胜力量是陆军，不把日本陆军歼灭，就没有太平洋战争的最后胜利，不把日本军队完全驱逐出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的真正解放。不仅中国大陆是进攻日本的基地，而且中国陆军是击溃日寇的必不可少的力量，没有强大的有战斗力的中国和中国军队，决不能最后战胜日寇。正因为这样，迅速发展着的有利的国际形势，非但没有减轻我们的负担，并且加重了我们的责任。这就是：要在政治、军事、经济及其他一切方面，加速准备，配合盟军的反攻，与盟军协同动作，驱逐日寇出中国，最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而在目前，要完成这个基本任务，必须先完成一个先决任务，即彻底粉碎日寇在中国战场上的救死攻势，这是中国面前最迫切的最紧急的任务。

中国能不能担负起配合盟军实行对日反攻的任务？怎样才能担负起这个任务？回答这个问题，不能不先看一看今天中国的内部形势。关于中国的内部形势，由于七年来战局的推移，整个中国战场被划分为正面与敌后两大战场。这种划分，从抗战之初就开始了，到现在，这两大战场的差别是愈加明显了。现在是敌后战场在进攻，正面战场在退却。

敌后战场，七年来无日不在闻所未闻的艰难困苦中奋斗，既无国外的援助，复断国内的接济。武汉失守以后，敌人对正面战场采取诱降政策，集其绝大部分的兵力回师敌后，采取种种毒辣险狠的手段，例如“治安强化”、“治安肃正”、“反复扫荡”、“铁壁合围”、“三光政策”、“无人区”等等，花样繁多，

不胜枚举，企图完全摧毁敌后战场。但是，由于敌后军民对于保卫祖国战争的无限忠诚及艰苦卓绝的奋斗，由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毛泽东同志的英明远见的领导及正确切合的政策，由于民主政治的贯彻施行与敌后各阶级的团结合作，终于在长期苦战中粉碎了敌人的种种狠毒手段，打退了敌人无数次的进攻，站稳了脚跟，以致今日三大战场——华北、华中、华南——不仅依然雄峙敌后，而且发展了，壮大了。现在敌后战场已经拥有八千六百余万人口，二百一十万民兵，四十七万八路军新四军。敌后战场非但没有退却，而且早已经转入了战役的进攻。今年上半年，在进攻的作战中已经攻克了二十四四个县城，克复了一万三千余个据点。虽然越接近胜利，战争将越艰苦，敌后战场的军民及其领导人员决不能粗心大意，自骄自满，决不能忽视将来的极大困难环境，而不作思想上、物质上与组织上的准备；但是敌后战场的坚持与发展已是毫无疑义的，因为他已打下了坚固的基础。所以，就敌后战场而论，配合盟军反攻日寇的任务是能够担负起来的，而且现在已经在积极准备着。

敌后的共产党员们！八路军、新四军的指战员们！敌后的男女同胞们！你们的艰苦奋斗是中华民族的光荣和荣耀，你们的光辉成就是中华民族的希望和未来。现在你们的责任更加重大了，配合盟军反攻驱逐日寇出中国的任务落在你们肩上了，勇敢地担负起这个任务来！敌后的男女同胞们！加强你们的团结，把一切阶层的人民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贯彻中共中央的十大政策，加紧训练主力军与游击队，扩大民兵与武装工作队；加强拥政爱民与拥军优抗工作，使全体军民亲密结合起来；彻底减租减息，发扬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努力发展生产，发展农业、手工业与运输业，普遍地发展各界人民联合起来自

已经经营的经济的文化的卫生的公益事业的各互助组织与合作社组织，发展民办官助的人民教育与人民文化事业；坚持三三制的政权工作，纠正其中过左过右的缺点，共产党员与各界领袖实行完美的民主合作；如此等等，把敌后抗日根据地变成总反攻的前进基地！八路军、新四军的指战员们！继续积极作战，无情地歼灭敌人，加紧训练，提高军事技术，把自己变为总反攻的先锋队！敌后的共产党员们！保卫人民，依靠人民，一分钟也不要脱离人民，坚持团结抗战，坚持实行三民主义，保证四项诺言，虚心学习，力戒骄傲，整顿三风，努力工作，完成人民先锋的责任。

所有这一切，便能保证敌后战场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并有能力配合同盟国与国内友军实行反攻。

至于正面战场，则情况完全不同，在极有利的国际条件下，在敌后战场牵制绝大多数敌伪军的条件下，至今还在节节败退，两个半月失去两个省会，五十余个县城，六十余万平方里国土。正面战场现在是处于严重的危机中。而且危机所波及的不限于军事领域，政治、经济及其他方面，亦均为危机所笼罩。论政治则由于专制独裁，以致民情壅闭，民怨沸腾，阶级间、民族间、党派间隔阂日深。论经济，则由于不正当的专卖统制，以致通货膨胀、物价飞腾、生产凋敝、民生憔悴。论文化，则由于钳制封锁，以致正当舆论横遭压抑，反动复古势力日益嚣张。今日的大后方，实在是危机四伏，隐患堪虑。我们目睹空前有利的国际环境，朝气蓬勃的敌后战场，返顾正面战场与大后方此种情况，不得不深为抗战前途忧虑。我们继续大声呼吁，要求国民党当局，从速改弦更张，与民更始。

我们认为：今日大后方与正面战场一切问题之症结是在于民主问题与团结问题，一切危机之根源是在缺乏民主与团结不

足。中国需要民主，各方面的民主：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文化的、党务的……；中国需要团结，各方面的团结：民族间的、阶级间的、党派间的、国际间的。只有民主与团结，才能使抗战增强力量，才能使中国走上轨道，才能停止目前的敌人进攻、配合将来的全国反攻，也才能建立战后的国内和平合作与国际和平合作的正当关系，否则一切都是没有希望的。

我们共产党人坚持民主、坚持团结、坚持抗战、坚持实行三民主义与保证四项诺言，七年如一日，始终不变。

我们希望国民党当局，珍重七年合作抗战之成果，在民主与团结的基础上，改变旧有政策，克服危机，完成同盟国共同期望的神圣事业。

根据一九四四年七月七日《解放日报》
刊印。

中共中央关于新四军五师工作 给郑位三、李先念等的指示^{*}

（一九四四年七月十日）

郑、李、任、陈^{〔1〕}并告华中局：

午江电悉。

（一）我们赞成你们在半年内以巩固原有地区为主，以发展河南及湘鄂赣工作为辅的方针。

（二）关于发展河南工作，应首先沿平汉路两侧向北发展，以求得和华北八路军打通联系，以便中央能派干部到你们地区来。中央已令华北派部队到密县、登封、淮阳、西华一带活动，望你们由信阳、罗山逐渐向北发展。目前你们有一个团的兵力，并有一批干部组织河南工作委员会去工作是好的，但须有得力干部去领导。

（三）对于湘鄂赣你们应利用目前机会去占领若干有利阵地，以便将来能有更大发展。亦应组织湘鄂赣工作委员会，有得力干部去领导。

（四）中央准备派一百个以上高级和中级干部到你们地区工作，并带各种材料给你们，只要交通有办法，在两三个月以后，即可从延安起身。

^{*} 这个指示是刘少奇起草的。

（五）望你们注意侦察河南及湘鄂赣敌友我三方情况，随时电告我们。

中 央
七月十日

附：郑位三、李先念等关于五师工作和向河南发展等问题给张云逸、饶漱石等的报告

（一九四四年七月三日）

张、饶、曾并刘、陈^[2]：

关于河南战略任务指示电收到。我们对河南发展的可能和需要，完全同意来电。我们正开扩大会，主要议程是两个，方针与秋收。关于方针问题，关系河南工作，特作以下报告，请求指示为祷。

（甲）我们现在存在几个困难，确与发展河南的任务矛盾：

（一）严重的财政困难，根据现在与明年的初步预算，照现在的物价，少四个月的给养。边币完全是欠的（吃了的），边币价低到三分之一，财政困难成为主要危险，河南又是不好解决财政之区。

（二）地方工作落后的现象还很严重。主要地区群众还未组织起来。主要地区如果抽兵、抽干部太快，即有由放松而走到不得不放弃的可能。我们认为二等分区万不能因为发展河南而失去，即是说，抽兵、抽干部太早，恐地区主要部分有失去之危险。

（三）干部的数量，只有需要的三分之一，分子复杂，数年来无时间学习和教育，工作经验未经整理，工作效率亦不

大。加之师级到团级长病四十人左右，最近数月已成难支持局面之势。这些问题，都有事实和数目字，表明并未夸大。

（乙）经我们一周详细交换意见之后，认为至少在半年以内，仍应布置原地区的巩固工作为主，逐渐增加力量。发展河南，必须对财政的危机基本上有所克服，基本区群众组织以后，才可较多转移力量到河南。如果认为这样是对的，那末，对河南工作，提议：

（一）中央多调别的力量，少指望我们；

（二）我们请中央及华中局多派干部来，以便将河南干部完全抽去。

（丙）我们拟马上组织河南工作等于地委，兵力约七个连，暂在原来信罗两县境内推进工作，河南内地照五月指示进行。我们有河南干部三百人左右，目前至多抽三十人左右。但靠个人威信和关系在地方能成立武装的干部，却很难找。大家都是希望新四军去才有办法，统战的好关系也少。由此看来，河南工作条件，还不能算是很容易的。是否有当，请即指示，以便贯彻方针。扩大会中详情，尚待扩大会再报。

郑、李、任、陈

午江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注 释

〔1〕指任质斌、陈少敏。

〔2〕指曾山，刘少奇、陈毅。

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对中国 大资产阶级及美英资产阶级的政策 问题给晋察冀分局的电报

(一九四四年七月十三日)

分局：

(一) 还在抗日的中国大资产阶级，在其抗日一点上是有革命性的，应该联合的，这是主要的；但其抗日不积极，又反对民主，故其革命性不大。对其不积极抗日与反对民主的反革命一面，应该坚决斗争，但这是为着联合抗日这个中心目的而进行的斗争，是服从于联合抗日的。抗日的地主军阀亦均有这样的两面性，我们至今亦均应以革命的两面政策（联合与斗争）对待之。民族资产阶级主要都是中等资产阶级，在抗战时期，其留在敌占区者或买办化，或受敌伪压迫无法发展而要求抗日；其迁至大后方者，亦因受买办大资产阶级官僚资本的压迫而无法发展，并因此而要求民主。故中国民族大资产阶级只占极少数。以上各点均请参照《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

(二) 同样，反法西斯的美英资产阶级，在其反法西斯一点上均有革命性，以苏美英联盟为基础的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乃是今日世界的基本革命战线，这是一九四一年以后，世界的决定变化。在学习一九三九至一九四一年间的各种文件（如《新民主主义论》）时不可忘记此点。但美英资产阶级内部

亦各有许多派别，其亲德日的派别是反动的，其联苏而又反苏、反法西斯而又反民主的派别是革命性较小的，而如美国的罗斯福、华莱士一派，则比较着重于联苏与民主，其革命性亦较大。故美国无产阶级亦积极支持之，以共同反对法西斯与国内孤立派、顽固派。

(三) 在今天的中国与世界，敌友我三方均有武装与政权，阶级力量的分合变化极其复杂，有时并极其迅速而巨大，套用战略策略的简单公式已往往不能解决问题，但以人民群众（工、农、小资产阶级）为基础，根据各阶级对革命的具体态度，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对最反动分子各个击破的总方针则决不会错。望你们告诉同志，叫他们多研究实际而少争论名词。

中 宣 部

七月十三日

附：晋察冀分局关于大资产阶级 有无革命性问题的请示

(一九四四年六月二十日)

中央：

分局直属各机关与党校在反法西斯的学习中展开了四十天的大论战，大体上已告一段落，详情另报。现在有一个争论的问题还没有得出适当的结论，即大资产阶级有无革命性的问题，争论双方有无各执一词，我们的意见如下：

(一) 一般的提出大资产阶级有无革命性这种提法不妥当，

因为今天争论的重点是属于英美派的一部分大资产阶级是否还有一些革命性的问题。

（二）我们认为英美派的大资产阶级仍是两面性的阶级，如只有妥协或反动的一面，则没有联合或保持这种联合的可能与必要了。在这个问题上也有争论，有主张是把他当作用间接后备军或策略上的利用，有主张是战略同盟军。争论未解决，与革命动力有关。

（三）英美派大资产阶级在武汉前后的两面性又各有不同，但有人单纯强调只有抗日或反动一面是不妥的，实在的问题是：（1）抗日是否就是革命性？有人主张抗日与民主或是有革命性，英美派大资产阶级实行法西斯反对民主那就没有革命性。（2）英美派大资产阶级抗日是否主要反映英美与日本的矛盾？有人主张是，如《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书所讲大资产阶级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革命性；又说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重性，是两重性的阶级，似乎是大资产阶级的两面性，这也是一个疑问。

（四）地主军阀参加抗日是否有革命性，地主阶级是否有两面性。

（五）英美丘罗派大资产阶级有无革命性。

（六）大资产阶级除带买办性者外，是否尚有民族大资产阶级和纯粹买办的区别，这一个问题应如何解释，我们还没考虑到成熟意见。因为这是属于全国性的问题，拟于请示中央后作最后答复。特此电告请示。

分局

号日

毛泽东同英国记者斯坦因的谈话^{*}

(一九四四年七月十四日)

斯坦因：你们是否有可能改变“共产党”这个名称？

毛泽东：各国共产党只有一件共同的东西，那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思想方法。任何地方的共产党必须将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另一件全然不同的事物即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区分开来，因为后者是这个思想体系的最终目标。

特别是在中国，我们必须严格地将观察、研究和解决社会问题的共产主义方法，同我们实际采用的新民主主义政策加以区别。在中国社会发展的现阶段，实现新民主主义政策是我们的近期目标。没有共产主义的思想方法，就不能正确地指导我们现在的社会革命的民主阶段；而没有新民主主义政治制度，我们就不能将共产主义哲学正确地运用于中国的实际。

我们目前的新民主主义政策在任何条件下都将必须继续实行，而且还要实行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因为中国现存的具体条件要求我们这样做。

中国现在所需要的是民主主义，不是社会主义。更确切地说，目前中国需要做三件事：（一）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二）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民主制度，使人民获得一切现代自由，以真

^{*} 这个谈话原载斯坦因所著《红色中国的挑战》一书，一九四六年七月曾由晨社译成中文出版。

正自由的普选方式选举中央及地方政府，这些在我们管辖的区域内都已经实现了；（三）解决土地问题，使具有某种进步性的资本主义能在中国得到发展，并通过引进现代生产方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这些就是目前中国革命的任务。在这些任务完成之前谈论实现社会主义，只能是空谈。这就是一九四〇年在我的那本《新民主主义论》一书中告诉我们党员的观点。那时我就说过，我们革命的第一阶段即民主革命阶段，决不是短暂的。我们不是空想家，我们不能离开当前的实际条件。中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阶段，比起你们经济高度发达的西方国家，很可能要晚相当长的时间。

斯：你所考虑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毛：新民主主义的主要经济特征是土地革命。即使是现在抗日是我们的主要任务的时期，也是如此。因为中国的农民是主要的被剥削者，他们不仅受中国反动派的剥削，在敌占区还受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剥削。正是由于在我们作战的区域实行了新民主主义，我们才从一开始就在各地成功地抵抗了日本军队，因为新民主主义的各项改革符合农民大众的利益，而农民大众构成了我们作战力量的基础。

在没有进行土地改革的中国其他地区，仍然是封建土地所有制下的分散的个体小农经济，农民被土地束缚着，没有自由，彼此很少往来，过着愚昧落后的生活。这种经济是中国古代封建主义和独裁专制的基础。未来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不可能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中国社会的进步将主要依靠工业的发展。

因此，工业必须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经济基础。只有

工业社会才能是充分民主的社会。但为了发展工业，必须首先解决土地问题。没有一场反对封建土地制度的革命，就不可能发展资本主义，西方国家许多年前的发展已十分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我国到一九三七年为止的国内战争时期的土地革命，其性质与西方一些先进国家过去所进行的土地革命基本上相同，土地革命扫除了封建障碍，为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斯：在抗日战争结束后，你们在内战时所采取的从地主那里没收土地分给农民的激进政策是否还将实行？

毛：在内战时期我们没有理由阻止农民没收地主的土地，因为地主阶级不仅压迫他们，而且在实际上领导着反对农民的斗争。我们的党只是满足了农民在这个问题上的意愿，把他们的要求变成口号，并作为政策来实行。根据中国的条件，这种没收土地的做法是一项正确的政策。农村广大群众的基本要求始终集中在对土地所有权的渴求上。已故国民党领袖孙中山先生认识到了这一点，主张实行“耕者有其田”。这是他解决民生问题纲领中的要点之一。

在反抗外来侵略者的民族战争阶段，情况当然有所不同。民族战争可以说服农民群众不没收地主的土地，因为群众也认识到，当地主也愿意抵抗外敌的时候，没收土地的政策可能会驱使地主跑向日本人控制的城市，然后再同日本兵一起打回来重新夺走土地。

于是，在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农民很快就了解到我们用减租的新政策代替过去没收土地的做法，具有两大好处：一是改善了农民的生活；二是吸引了地主留在乡村参加抗日。实行有利于佃农的普遍减租以及我们保证向地主交租的政策，使佃农和地主之间的关系得到了改善，从而使日本侵略者在我们区

域内简直找不到合作者了。

斯：共产党对土地政策的改变，在当时是如何决定的？

毛：这是我们党用民主方法制定政策的一个典型例子。从没收土地到普遍减租和向地主交租这一根本性的政策转变，最初是由党的下级组织的同志建议的，我们党中央采纳了他们的建议，因为很明显这一建议是符合群众的愿望的。我们对这些要求进行了研究，根据这些要求制定政策，并普遍加以实施。

假如整个中国在一切党派合作的基础上，成为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那就能够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我们的减租政策。尽管它还比不上孙中山先生的“耕者有其田”的主张（这是土地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法），但它实际上仍然是一次伟大的改革。只要真正的民主政府制度在各地建立起来，就可能把现在处于封建剥削制度下的一切土地逐步地和平地转移给耕种者。

实行一切土地逐步转移给耕种者的方法，将会鼓励地主的资本投向工业，同时还要制定出其他的有利于地主、佃农，有利于整个中国经济发展的财政经济政策及其实施办法。

但是，这样的解决方法取决于真正的国内和平和真正的民主的实现。所以，也不能完全排除将来全部地没收地主土地并分给佃农的必要性，因为如果战后国民党坚持进攻我们的话，就可能再次爆发内战。

但是，不管将来国内是和平还是内战，我们宁愿不实行没收土地的政策，而是继续实行目前的减租和交租的政策，因为总的说来这将减少前进和改革道路上的障碍。

我想提醒你一下，一九三〇年南京国民党政府曾经颁布了一个土地法，规定地租的最高限额为佃农主要作物收获量的百分之三十七点五，对次要作物不得收取地租。但是事实证明，国民党不能够、也不愿意将土地法付诸实施，这项法律从未实

行过。因此，事实证明，只有共产党能够真正实现土地改革，即使它采取的仅是减租的方式。

斯：中国共产党在战后对中国工商资本采取何种态度？

毛：我们坚信，不管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私人资本，在战后的中国都应给予充分发展的机会，因为中国需要发展工业。在中国和外部世界的商业关系方面，我们要以同一切国家进行自由平等贸易的政策，来代替日本把中国沦为殖民地的政策。在国内，我们要以在解放区已经实行的促进人民生产力发展、提高购买力、尽快为现代工业稳定发展创造先决条件的政策，来代替国民党政府降低人民生活水平从而阻碍国内工业发展的政策。

按照孙中山先生的设想，实现工业化有三种方式，就中国的一般条件来说，我们认为这是正确的。凡是能够操纵国民生计的关键产业如铁路、矿山等，最好由国家开发经营，其他产业可以让私人资本来发展。为了开发利用手工业及农村小工厂的巨大潜力，我们必须依靠强大的用民主方式管理的合作社。

斯：共产党打算在战后的中国起什么政治作用呢？

毛：我们的党员在中国人口中当然只占很小的一部分，只有当这一小部分人反映大多数人的意见，并为他们的利益而工作时，党和人民之间的关系才是健康的。

今天，共产党不仅反映了农民和工人的意见，也反映了许多抗日的地主、商人、知识分子等的意见，也就是说反映了我们区域内一切抗日的人们的意见。共产党愿意并且时刻准备同所有愿意与共产党合作的中国人密切合作。这种愿望表现在我们的民主代表制性质的“三三制”中，在一切民选机构中，共产党员的席位不超过总人数的三分之一，三分之二的席位给予其他党派和无党派人士。

斯：中国共产党如何处理同国民党的关系？

毛：我们愿意同国民党合作，不仅在战时，而且在战后，假使国民党让我们这样做的话。而且，我们将会像今天一样，继续履行我们在一九三七年对国民党许下的四项诺言。

斯：关于四项保证，在重庆时我常听到人们笼统地提到它及其附带的条件，它们的具体内容是什么？

毛：我们允诺：（一）不继续实行我们过去实行的那种土地革命政策；（二）停止用武力推翻国民党政府；（三）把边区苏维埃政府改组为地方民主政府；（四）将我们的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的一部分。

我们那时说过，我们将履行自己所声明的诺言，但要求国民党方面做到：（一）停止内战；（二）对日作战；（三）推行民主政治，给予人民以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四）采取措施改善人民的生活。

斯：对目前的政策，或对你所阐述的中国远期目标，中国共产党内部有没有反对意见？

毛：没有，现在我们党内没有反对意见。在以前的时候有过两种偏向。一种是托洛茨基主义性质的，以陈独秀为代表，他的反对意见早已毫无影响。陈独秀在一九四二年死了。另一种是张国焘的偏向，他曾经有一段时间对抗党的正确路线，最后孤身一人离党而去。现在他在国民党的特务机关工作。这两种偏向都没有影响我们党的团结，而且没有留下影响团结的痕迹。

斯：你是说你的政策从来没有被怀疑过或被反对过吗？

毛：我们党内自然也时常会发生意见分歧，但这些分歧都能通过讨论和分析这种民主的方式加以解决。如果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决议的正确性仍然不信服，那末，在党的会议上经过彻

底辩论以后，他们就会服从决议了。在我们工作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是我们经常去了解我们哪些政策为群众所接受，哪些政策受到群众的批评或拒绝。只有那些受群众欢迎的政策才能成为我们党继续实行的政策。

每当采取一项新的措施时，党内和党外总会有一些人不大理解。但是在实施过程中，必然会形成一种绝大多数人共同的意见，这是因为我们的党始终在注视着党内外的普遍反应，而且还根据人民的实际需要和意见，不断修改我们的措施。我们所有的党组织，从上到下都必须遵守我们的一项至关重要的原则，这就是不脱离群众，同群众的需要和愿望息息相通。

我们任何一项政策的正确性都必须由群众来检验，而且事实上一直是这样做的。我们自己也不断检查我们自己的决定和政策，一旦发现错误就加以改正。我们从所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中得出结论，并尽可能广泛地加以实施。通过这些方法，共产党同人民大众的关系就能不断得到改善。

这是最基本的一点。如果党的领导者真正是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而工作，如果他们在这方面的努力是诚心诚意的，那末他们听取群众意见的机会是非常多的。我们十分注意倾听人民的意见。我们通过村、乡镇、区、县的群众大会，也就是我们区域内任何地方的群众大会，通过党员同各阶层人士的交谈，通过各种会议、报纸和群众的来电来信等等一切能听到人民呼声的渠道，总是能发现群众的真正的意见。实际上我们也是这样做的。

此外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在一切活动中找出几个令人满意的和令人不满意的典型例子，经过深入研究，总结经验，得出具体结论，以求得必要的工作改进。这种观察实际情况，研究好的和坏的典型例子所用的时间，有时是几个星期，有时是几

个月，有时甚至是几年。虽然用的时间比较多，但这种方法却使我们能同现实发展情况始终保持密切联系，能了解人民的愿望和需要，能向党内外工作出色的人学习。

我们有些同志有时可能没有透彻理解我们的政策，在执行政策过程中犯了错误，对这样的同志必须进行批评和教育。为了达到教育目的，透彻地研究和分析一个工作中好的例子也是很重要的。就拿今天的《解放日报》来说吧，有一篇长文章占了整整一个版面，它详细讲述了八路军的一个连如何改正缺点成为一个最好的连队。我们军队的每个连的干部和战士都要阅读、研究和讨论这篇文章。这是一个简便易行的做法，利用一个连队的好经验对五千个连队进行政策教育。今后你还会看到有关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所学校、一家医院或一个地方行政单位的类似的文章。

我们再来谈党员和非党人士之间的相互理解、密切合作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吧。虽然这个问题已经有了很大的很坚决的改善，但是我们的一些同志依然在犯错误，纠纷和误解仍然不断发生，到处还有我们的一些党员在包办一切。因此我们一直要求大家注意，在民主的“三三制”之下，使非党人士有实际权力的重要性。在我们政策的实际执行过程中，我们要向所有同志具体讲明，我们和非党人士之间的真诚合作，不仅帮助了群众，也帮助了我们自己。这样做的结果，党和非党人士的相互信任，在他们必须通力合作的实际工作中增长了。

斯：你是否认为中国共产党曾在政策上犯过重大的错误？

毛：在所有基本点上，我们的政策从一开始就是正确的。首先，我们新民主主义的基本政策是正确的。这个基本政策是让人民群众自己组织起来，为实现民族独立，为建立民主制度，为在私有制基础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而进行革命。只是在

把这些基本政策应用于具体情况时，有时才容易出现某种偏向，有“左”的，有右的。然而，这些偏向并不是全党性的，也不是党内某个派别的，而是党内某些人的。从这些错误中，全党都学到了很多东西。在某些时期，我们党内曾有几个人相信共产主义现在就可以在中国实行了。但是，我们的党从来没有这样的观点。由于中国的具体条件使共产主义在很长时期内不能在中国实现，因此，在我们党内不可能有一个主张立即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的小集团存在。

国民党断言在我们党内有持各种不同观点的小集团，这是毫无根据的。国民党自身被派别搞得四分五裂，因而不能设想会有一个真正团结一致的政党，也许这就是这样的谣言在重庆能有人相信的原因吧。

斯：你是否有曾因处于少数地位而使你对某个问题的主张得不到实行的情况？

毛：是的。我自己曾经有过处于少数地位的情况。在这种时候，我所能做的只有等待。但在近些年，这种情况就非常少了。

斯：我在重庆的时候，一些中国朋友要我来观察一下共产党是“中国至上”还是“共产党至上”？请谈谈你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毛：没有中华民族，就没有中国共产党。你还不如此样提问题，是先有孩子还是先有父母？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际问题。这就像在国民党区域人们向你提出的另一个问题一样，问我们是在为我们的党工作，还是为人民工作？去问我们的人民吧，去哪儿问都行。他们很清楚，中国共产党是为他们服务的，他们有在最艰难的时期同我们共患难的经验。

至于我们的思想方法，我已经告诉过你，我们像其他国家

的共产党一样，坚信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当人们问我们是“共产党至上”还是“中国至上”时，可能指的就是这一点。可是，我们信奉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思想方法，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忽视中国文化遗产和非马克思主义的外国思想的价值。

中国历史遗留给我们的东西中有很多好东西，这是千真万确的。我们必须把这些遗产变成自己的东西。然而我们中国有些人却崇拜旧的过时的思想，这些思想对于我们今天的中国不仅不适用而且有害。这样的东西必须抛弃。

外国文化也一样，其中有我们必须接受的、进步的好东西，而另一方面，也有我们必须摒弃的腐败的东西，如法西斯主义。

继承中国过去的思想和接受外来思想，并不意味着无条件地照搬，而必须根据具体条件加以采用，使之适合中国的实际。我们的态度是批判地接受我们自己的历史遗产和外国的思想。我们既反对盲目接收任何思想也反对盲目抵制任何思想。我们中国人必须用我们自己的头脑进行思考，并决定什么东西能在我们自己的土壤里生长起来。

最后，我想总结一下今天中国需要的是什么。中国需要国内和平和民主。没有国内的和平，中国既不能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也不能赢得和平。我们在抗日战争之后若不能取得国内和平，这可能会影响国际间的和平关系。因为，如果在中国再爆发内战，那将会持续很长一段时期，同时也势必会影响到别的国家。

外国仍然有许多人不十分明白，过去二十三年的中国政治进程中的关键问题，一直是国共两党的关系问题。将来依然如此。

在这重要的二十三年里，其第一个阶段中，从一九二四年

到一九二七年，假如没有国共的合作，在中国就不会有国民革命。在第二阶段后期，从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六年，中国不能抵抗日本就是因为国民党的国民政府倾其全力，其中包括利用外国贷款、外国军事顾问以及其他形式的外援，进行“剿共”战争。在第三阶段，从一九三七年至今，如果没有国共合作，我们就不可能进行抗日战争，至少不会坚持这么长久。再说，如果国民党继续同共产党合作，至少像战争初期那样的合作，中国的作战能力比现在就不知要强大多少了。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三卷刊印。

毛泽东关于时局近况的通知^{*}

(一九四四年七月十五日)

各同志：

兹将时局近况通知你们。

(一) 蒋⁽¹⁾之军队由于其士兵是捆绑与购买来的，军官极其腐败与根本没有民族民主教育，提倡反共教育，因而大部分军队充满失败情绪，失去战斗意志。蒋军在河南、湖南作战中，绝大多数均不战而溃或一触即溃，损失在四十万以上。进攻河南敌军不过四个师团，蒋军近四十万，除少数武器较差、待遇较坏的杂牌军比较能作战外，几乎无不望风而逃。胡宗南有十个师由陕、甘开入豫西参战，但是只有一二个师能打一下，其余都是一触即溃。河南人民，在蒋军残酷压迫下引起他们普遍地与军队对立，群众暴动围缴军队枪械。这些地方的共产党，早已被国民党摧残，但是这些地方的人民在对国民党失望后，希望中共军队到临抵抗敌军之心甚为强烈。

(二) 胡宗南已调动十个师入豫参战，对边区威胁减轻，但直接包围边区军队并未减少，封锁依然存在，一切反共行为依然继续。

(三) 英、美、苏记者到边区已一个多月，他们感到兴奋。

* 这份电报的发出时间是一九四四年七月十九日，发给李先念和中共中央华中局、山东分局、冀鲁豫分局、北方局、晋察冀分局、晋绥分局。

但是蒋在事前沿途布置反共宣传，蒋又派一批人同来监视他们，进行破坏中共工作，但未达到目的，这些人现已离边区，他们出去后可能进行破坏宣传。但是英、美、苏三国主要记者尚留边区，他们愿意多看一看，并将赴晋西北参观。他们对英、美、苏的新闻报道有利于我们。

（四）罗斯福三次电蒋要求派美国军事代表团来延安，均被蒋拒绝；此次华莱士来华，率美方在渝有关人员全体见蒋，正式提出罗斯福第四次电报，蒋始被迫答应。美军事人员十八人不日可到延安。

（五）国共谈判无进展。关于党的问题，国民党虽在形式上说可以照抗战建国纲领办理，但是实际上仍不承认我党合法地位；关于军队问题，仅承认十个师即十万人的名义，其余三十七万军队、二百万民兵，均要解散；关于政权问题，只承认陕甘宁边区一处，对华北、华中、华南各敌后根据地代表八千六百万人民的民主政权，概不承认；我党被捕人员不肯释放；其他要求条件都不答应。林伯渠同志尚在重庆，但是根本调整国共关系，要待蒋更困难及美方施以更大压力时才有希望。

（六）国民党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机构，腐化达于极点，酝酿着极大危机。孙科、宋子文、于右任及许多国民党党员均不满蒋及其集团的死硬政策，各中间党派及川、滇等省地方实力派更加不满。如果日本继续向内地作深入进攻，重庆可能发生重大事变。

（七）我党在华北、华中、华南三大敌后战场，近几个月有新发展，消灭了许多敌伪军，夺回了许多土地。为克服物质困难，发展了广大的生产运动，今年天雨及时，粮食可望丰收。在人民面前，我党领导的敌后战场与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间的区别，越来越明显了。一个在进攻，在发展，在巩固；

一个在退却，在萎缩，在充满着危机。在敌人继续进攻情况下，这种区别会更显露出来。但是我党困难仍是很多的，日寇将向我们施行残酷进攻，经济困难依然极大，决不可粗心大意，失去警惕性。

（八）对国民党问题，我们将继续谨慎处理方针，谈判虽无结果，但仍在进行中。

毛 泽 东

七月十五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三卷刊印。

注 释

〔1〕指蒋介石。

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华南根据地工作 给曾生、冯白驹等的指示

(一九四四年七月十五日)

曾王林^{〔1〕}同志并告东江纵队全体指战员，冯白驹同志并告海南岛人民抗日军全体指战员：

自广州沦陷，迄今六年，你们全体指战员在华南沦陷区组织和发展的敌后抗战的人民军队和民主政权，至今天已成为广东人民解放的旗帜，使我党在华南政治影响和作用日益提高，并成为敌后三大战场之一。

抗战进入了第八年度，国际环境对于我国伟大民族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是空前有利。

我八路军、新四军七年来不仅坚持和巩固了华北华中敌后根据地和团结了敌后八千六百余万的人民和二百一十万的民兵并拥有四十七万的正规军，克服了一九四一及一九四二两年最困难时期，而且年来在地区和人口上均有极大的发展，冀东我军已挺进至热河、多伦、赤峰及辽宁之锦州一线。一年来党的十大政策在敌后各根据地获得伟大的成效，使全体根据地党政军民，在为着坚持根据地和准备对日反攻上空前的团结起来了。

总之，不论在欧洲战场，太平洋战场及中国敌后战场都是胜利的。只有国民党的正面战场，则处处失败。中原沦陷，长

沙、耒阳相继弃守；现粤汉之敌，南北对进，已快会合，并有打通湘桂之企图。因此大块华南将沦为敌手，拯救华南人民的责任，不能希望国民党而要依靠我党及华南广大民众。因此，你们在华南的作用与责任，将日益增大。英美在太平洋上继续作战的胜利，一旦接近中国南方海岸，实行对日反攻时，则我华南根据地，将成为一支重要力量，可予盟国部队以直接的配合，并可能获得他们一部分帮助。为着迎接新的伟大任务，首先必须在思想上有充分准备。为此，必须更亲密团结自己的队伍，加紧整风，打通干部思想，坚持统战政策，加强与根据地人民的血肉联系，坚持原阵地，并力求继续发展，扩大武装部队，建立广大的与强固的根据地。

为使我们能及时了解你们的斗争情形，望随时将敌伪友及我部队根据地情形电告。

关于冯白驹同志领导下之琼崖抗日部队，因交通中断，此间已无法联络。望你们东江纵队多方设法派人赴该岛与该部取得联系，并建立电台通讯，使华南两大根据地有机的配合起来，并力求与中央取得电讯联络。此电请曾王林派人转送海南岛。

中共中央军委

七月十五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四册刊印。

注 释

〔1〕指王作尧、尹林平。

党在不断学习中进步^{*}

(一九四四年七月十五日)

董 必 武

今天是我们党二十三周年纪念日。二十三年来，党是在不断的学习中进步的。党向谁学习呢？我们主要是向广大的人民——工人和农民学习，向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学习，也向其他阶级的人民学习。当然书本上的学习，特别是马列主义的书籍的学习，也是很重要的。

我党开始是在五四群众运动以后一部分革命的知识分子中萌芽起来的。一九二三年在二七运动中，党直接领导了工人阶级争取集会、结社的自由，反抗了封建军阀。党研究了工人阶级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的联系，经历了统治者的武装镇压，懂得了工人阶级争取同盟军之重要。五卅运动，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这是一种空前伟大的场面，也是一种伟大的群众运动学校。党在这中间研究了群众运动发展的规律和领导群众斗争的方法。党又在省港罢工中，使工人革命运动直接与国民革命运动发生了联系。省港罢工成为广东国民政府的一根支柱。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二七年国民革命军的北伐，工人阶级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党和工人更发动了湘鄂赣广大的农民

^{*} 这是董必武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三周年写的文章，原载一九四四年七月十五日出版的《群众》杂志第九卷第十三期。

群众参加到这一革命运动中来，使国民革命军的北伐声势浩大起来，内容更加充实了。党在这中间发现了领导机关中的机会主义，但立即纠正了它。

革命发展到了乡村，党在这里求得了怎样使工人和农民的相互关系更加密切起来的方法。党又在这里学会了怎样使工人与农民武装自己，学会了怎样使工人与农民管理国家大事，更学会了怎样使工人与农民促进他们的生产并提高他们自己的文化。

自“九一八”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直接用武装吞并中国以后，党看到了工人与农民坚决抗日的要求，看到了中国各阶级、各阶层都不愿当亡国奴，因而党就学会了建立全国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以团结全国广大的人民全力抵抗日寇。

七年的抗战，党和人民在一起学会了怎样打胜日本侵略者，学会了怎样从敌人手里夺取武装和怎样使用武器，学会了怎样以劣势装备抵抗并战胜有优良装备的敌人，更学会了怎样巩固自己的根据地和怎样消灭敌人。

党在敌后的解放区中，与群众一起学会了政权上的“三三制”，经济上的自己动手、自力更生，文化上的切合自己需要向前发展的教育、文艺等等。

这样一些学习都不是书本子上的字句中所能寻得出的，甚至马列主义的字的字句中也不寻不出。这只有在群众斗争的活生生的事实中去虚心领会，去刻意追求，去脚踏实地地试验，才会得到成果的。

但谁因此便认为我党主张废书不读，也是不对的。须知党在二十三年来的成就，正是因为马列主义中国化有了逐渐的进步之结果，特别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马列主义的中国化更为

显著。没有马列主义的原则指导，虽日与事实接触，纵使在个别问题上处理得很好，那也有陷于事务主义与经验主义危险的可能。但把马列主义照书呆子的方式去读，背诵字句，空讲原则，不从事实的内部和外部联系与发展去看，这样的党员必定要成为一个十足的教条主义者。

我们党曾经有一部分同志犯过教条主义的错误。但经过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提倡的整风运动，对我们党的学风、党风和文风切实加以整顿，改造了党内的非马列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思想，也改进了工作，因而使党更加团结、巩固和发展。这是我党的思想革命。在这将近三年的整风运动中，我们已有了极伟大的成绩。这种成绩是不能以数字计算的。

整风运动不仅是只看看整风文献就算了事，而是应当凭借整风文献切实反省自己，改造自己原来的思想和思想方法。

整风运动同样是一个实践的过程。有人以为把整风文献读得烂熟之后，便是整好了思想和思想方法，这一样是可笑的。

从此得出结论，就是说，读了整风文献，反省了自己，改正了自己的思想和思想方法，不是口头谈谈或写写文章就算完了，一定要在实际工作上表现出来。只有在实际工作上表现出不是狭隘经验主义的或教条主义的，而是实事求是的，整风才算有效。

二十三年来，党的成绩是伟大的，党已经成为中国政治中的决定因素。这是因为党是不断地和群众在一起学习而进步的。但是，目前中国境内的日本法西斯强盗尚待驱逐，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尚待建立，党的任务是异常复杂而繁重的，我们不应骄傲，而是应当在毛泽东旗帜之下继续不断地和群众在一起

学习，并领导群众前进，很快地把日寇打倒，把新中国照着革命的三民主义的原则建立起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年出版的
《董必武选集》刊印。

思想方法问题*

(一九四四年七月十八日、十九日)

彭 真

党校第二部、第四部的大会开了很久，整顿学风阶段快结束了，今天就来研究如何结束。

我们看问题的方法一致，才容易得出一致的结论。现在，大会怎样收？这有几种办法。第一种是对过去工作中犯过错误的，这次大会发言中有错误的，用无情的铁锤给以无情的打击，斗他一下，将来他就不敢调皮了。这是一个老办法，是苏维埃后期用过的办法。这种办法倒是简单痛快，但是不能解决问题，因为问题在他心里还存在。这次你打击了他，以后谁也不敢讲话了，这会损伤党的民主生活，使党没有生气。这个办法不符合毛主席、党中央治病救人的方针。反过来，把这样做的领导者也来打击、斗争一下，也是不对的，其思想方法也是一样的，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办法。我们对同志不能采取对敌斗争的办法。犯错误不只是个人的原因，还有阶级、社会的根源，只有经过党的长期教育和斗争锻炼才能纠正。再一种是学阎锡山的办法，八面玲珑，脚踏两只船，有人还说他是脚踏三只船。习染了这种作风的人，对问题不分是非，模棱两可。这是一种庸俗的市侩态度。要是这样，党内的争论就永远解决不

* 这是彭真在中共中央党校整风大会上的总结报告。

了。这是一种养病的办法，会使错误更加发展。有错误的人，自以为是，不虚心接受别人的批评，甚至吵嘴，打架，也是不行的。过去有的同志自以为是，把白区工作差不多搞垮了十分之十，苏区工作搞垮了十分之九。

这次大会我们采取的是实事求是的办法，搞清思想，把病治好。治病，有的人也许要开刀，有的人只要吃几片阿斯匹林就好了。毛主席、党中央关于党内斗争的方针就是治病救人，思想弄清，结论从宽。其中有两个意思：一是有病一定要治，一是治病不是治人。这次大会不是火坑，是炼钢炉。把铁炼成钢还不好吗？错误要检讨，思想要弄清，又不要损伤同志。这不是说不损伤他的“面子”，而是不损伤他的积极性。

第二期整风大会比第一期开得好，范围宽广，牵扯到全国从中央到各个根据地和白区的各种问题。这样，思想就展开了，比第一期以讨论一个人一个人为主好得多了。上次我们的方针是对的，但做得粗糙了一点。这一次我们要不使任何一个同志受打击，而是让大家讲话，互相帮助，错了就改。这种作风要成为我们全党的作风。我们要采取各种各样的办法来帮助有错误的同志。

这次大会许多争论的问题怎样解决呢？有两个路线：一个是群众路线，即我们现在的路线，有问题让大家讨论，最后求得一致；还有一个是少数人讲，不管人家懂与不懂，有意见与否，讲过就算了，不开动脑筋，这是一种灌输式的、填鸭式的办法。现在没有人公开反对走群众路线，但实际上是有的。有人说，心里话可不要都到大会上去讲，一讲，火就会烧到你身上。有人说，好多人一进党校就变坏了。老实说，我们没有这么大的本领，能几天使人变坏或者使人变好。所有在大会上发言的同志的意见，大都是原来就有的，不过现在讲出来罢了。

真要走群众路线，就要做到两点。一点是你的意见是对的，就要说服别人。说服不是压服、管服，不是打击、戴帽子。这是一个本领。有的人为什么怕大会呢？就是不能说服人，说服能力差些。再一点是你错了，就要承认错误。很多人的病就是怕“脱裤子”。毛主席都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何况我们呢？列宁说过，聪明人不是不犯错误，而是不犯重大错误，同时又能认识错误并迅速地纠正错误。有错误就改正，是光荣的。

说服人是不容易的，这有一个立场、观点、方法的问题。现在我就来讲讲这个问题。

先讲立场。我们的立场是党的立场即无产阶级的立场，它表现在党性与党的政策上面。

比如，拿对平均主义的态度来说，就反映了各种不同的立场。有些人认为平均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是从小资产阶级立场出发的。其实，在社会主义社会，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到了共产主义阶段，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也不是平均主义。还有一种人，是以平均主义作幌子，实际上，据我看来，他并不是什么平均主义思想。今天的大后方，一方面是一些反动统治者的荒淫无耻，另一方面是河南等灾区的人吃人；一方面是金融财阀的腰缠累万，另一方面是无数工人的失业挨饿。这种现象，他不反对。有的军阀发国难财，一次就是八十万，讨小老婆十几个。这种现象，他也不反对。看到延安衣服分成几种颜色，他就大叫这是等级制度。这是一种错误的看法、立场。也有一种人，从个人主义出发，看法、立场也是错误的。例如五部有的同志说，我为什么要转部呢？原因就是这里每月少两斤肉，他的平均主义就是为了两斤肉。我们也想把这几个部的生活搞成一样，但这牵连太多，办不到。当然，

也还有些同志是反对生活上特殊的个别人，他的出发点是为了党。这是无产阶级的立场。

再以批评与自我批评来说，和党两条心的人是害怕自我批评的，怕露原形；他批评别人，纯带破坏性，是破坏党的。和党半条心的人也怕批评与自我批评，他的自我批评往往避重就轻，不接触错误的实质；他批评别人是打击别人，抬高自己，或者吹嘘别人，让别人捧自己。国民党有个中央委员写了一副对子：“三诀吹、拍、骗，四维礼、义、廉”。在我们党内，这种人当然是少有的。但是，有的人就爱说自己过五关斩六将，不愿提自己失荆州、走麦城。这也不好。毛主席说，我们要有“三戒”，戒吹、戒拍、戒骗；还要有“三防”，防吹、防拍、防骗。我们要勇于进行自我批评，对别人的批评要采取欢迎态度。同时，我们要勇于提出批评，这种批评应该是建设性的。这是党的立场。看一个人是否正派，首先要看他的学风是否正派，是不是主观主义的、唯心主义的。其次看他的党风是否正派，有没有宗派主义，是不是照顾全局，照顾群众。再看他的政治路线是否正确，过去不正确的路线使党受了很大损失。最后看他处理党内问题是否合乎原则，是自由主义还是布尔什维克主义。衡量一个人是否正派的标准就是如此，不能只是看他对我好不好。我们衡量人就要以上面这些为标准，坚持党的原则，坚持按这些标准来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正确的批评有时即使很激烈，也是为了割治毒疮，是为了挽救人，而不是伤害人。

再以党内民主来讲，有一部分同志要求民主，让大家都能自由发表意见，目的是为了把党搞好。这是党的立场。党内有民主，才能发挥党员的积极性。还有一种人，他是强调小资产阶级的散漫性，强调自由主义，不要组织批评。这是一种小资

产阶级极端民主化的立场。还有一种人，他要求民主，是为了破坏党的纪律，并利用“小广播”瓦解党的组织，企图把我们的党搞垮。这是站在敌人的立场上。什么是“小广播”呢？不是任何私下的议论都是“小广播”，只要一不违背党的决议，二不违背党的政策，三不搞小组织活动，就不是“小广播”。

从以上所说看来，立场有敌人的立场，有小资产阶级的立场，有党的立场。每一个人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这就是党的立场，就是无产阶级的立场，就是人民群众的立场。

再讲观点和方法。我们的观点和方法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只有我们无产阶级才能采取这种观点和方法。我们的立场和观点、方法是一致的。我们的观点，第一，要客观地看问题，不要主观地看问题；第二，要全面地看问题，不要片面地看问题；第三，要看问题内在的联系，看它的本质，不要停留在问题的表面即现象上。怎样达到这个目的呢？要进行周密的调查研究，掌握大量系统的材料，加以分析、综合。

主观和客观问题。我们认为主观是客观的能动的反映，这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这一点十分重要。毛主席说，要经常提倡这一点。好多人在莫斯科学了十几年，就没有学到这一点，学到的是德波林⁽¹⁾的一些东西。比如这里有十多个人争论不休，谁是谁非，以什么作标准呢？以客观实际作标准。以对国民党的认识来说，一九三七年苏区党代表会议（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会议）上，毛主席估计国民党要抗战。但是，要使蒋介石抗战，建立真正的、坚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必须强调实行民主，发动群众。没有人民群众的发动和抗日武装力量的逼迫，要使蒋抗战是困难的。当时，有人说毛主席强调实行民主是“左”了。事实证明，毛主席是对的。接着，国共两党合作了，国民党承认了八路军，有了些好的表现。毛主席又说，国

国民党是有两面性的。但有的同志却认为国民党好得不得了，要十二万分诚意地拥护它。事实证明，国民党是又抗日又反共的。一九三九年冬的反共高潮一来，才知道国民党不是跟我们讲恋爱的。这时有的人还不相信，一九四一年又来了一个皖南事变，这一下才知道毛主席的话正确。毛主席是有远见的。以对日本来讲，毛主席分析了中日双方的客观情势，得出了持久战的结论，认为我们对日本作战要以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为主。我们说毛主席的意见是正确的，不是因为他是主席，而是因为他的这些认识是与客观实际相符合的。一个意见对不对，要以实际来检查，这是我们共同的标准。我们应该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的观点来看问题。这样，有了争论，也就容易解决。我们的观点和我们的立场是一致的。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正确地反映客观，因为无产阶级的利益同历史发展的规律是一致的。别的阶级与党派是不敢彻底、完全正视客观实际的。我们是否应该坚持自己的意见？凡是符合客观实际的即正确的意见，就要坚持，必须坚持；同时，又要随时修正那些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即错误的意见。总之，要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目的在于求得主观与客观相一致。有的同志认为改正错误可以偷偷地改，转了一百八十度的弯，还说没有改，怕承认错误丢面子。这也不对。认识是一个过程，很难一开始就完全正确。错了就修正，这是我们的党性的表现，是很光荣的，应该勇于修正自己的错误意见。对了，也不要神气十足，其实一个人不会是什么都对。另外有一种人，见别人修正了错误就耻笑人家，这实际等于是阻碍别人修正错误。我们应该互相帮助，实行批评与自我批评。

讲讲全面地看问题与片面地看问题。全面是和客观相一致的。片面就是主观。比如看一个人，他有优点，也有缺点，如

果只看到他的优点或只看到他的缺点，都不全面。有许多问题所以争论不休，就是这个原因。有人看到一个领导者有缺点，就说如果枪毙他，我举双手赞成。这样看问题就是片面的。一个领导者，他总是共产党员，不过在工作中有些缺点、错误，我们在审干中对特务都不枪毙，为什么要枪毙他呢？再比如对国民党，你如果只看它的积极方面，它一抗日，就只讲团结，结果产生投降主义；你如果只看到它的消极方面，它一反共，就只讲斗争。两者都是片面的。我们应该全面地看问题。

全面有历史的全面与现实的全面。一个同志，他现在有优点，也有缺点，这就是现实的全面。还有历史的全面，他有九十件事是好的，有十件事是坏的，如果你只看到那十件坏的，而不看他九十件好的，便去打击他，他当然不满；反之，你只看到他九十件好的，不看他那十件坏的，也是不对的。这既是现实的，也是历史的，因为他不可能在同一天做一百件事。对一个同志的看法，要顾及现实的与历史的全面。某个同志在某年犯了一次错误，已经改正了，如果因为他犯过错误，便把他看死了，这就不对了。每个人布尔什维克化都有一个过程。在开始时，虽有半条心与一条心的区别，但有的人能改正、提高自己，于是他便天天前进；有的人老是不改，于是他便落后了。我们如果不是历史地看问题，看到一个同志犯了错误，就认为他完了，这是机械的、形而上学的看法。再以国民党来说，国民党在大革命时期和我们合作过一次，内战时期便反革命了，日本来了，它又和我们合作了。还要看将来。从过去、现在、将来看问题，这是历史的全面。

讲讲现象与本质。看问题不要只看现象，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土财主穿得很破烂，像是个贫民，但他有很多的财富埋在地窖里。有些城里流氓穿得很阔气，但家里很穷。就以这次整

风来看，这是党内一场思想作风上的革命，是革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命。整风中发生很多争论，有时争得面红耳赤，甚至吵架。争论好多问题，比如，究竟共产党和延安是光明的还是黑暗的，新老干部关系，平均主义和等级制度，等等。所有这些争论的本质是什么？就是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主要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斗争的结果，是党内思想的统一和团结的增强。共产党就是在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和倾向中成长壮大起来的。毛主席说，这是社会上各种阶级、阶层的思想意识经过各种关系在党内的反映，不一定是一部分人代表无产阶级，另一部分人代表非无产阶级。有时，一个人身上就同时存在着无产阶级思想意识与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这是因为我们的同志，有的是小资产阶级出身，有的是农民出身，有的是地主家庭出身，等等。特别是我们党是生活在一个复杂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环境中的，即使是工人出身的党员，也会受到社会上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所以，在我们党内，有的人虽然在组织上加入了党，但思想并没有入党或没有完全入党。毛主席说，党内如果没有这样的矛盾与解决这种矛盾的斗争，党就不能存在。党内思想斗争是必然的，是党内正常的生活。小资产阶级革命家缺乏群众观点，比如对妇女，只看到女学生，看不到广大的农村妇女，审查干部和锄奸只依靠少数人，等等，归结起来，都是缺乏群众观点。无产阶级革命家是有群众观点的，他们是与广大群众相结合的。如果看到本质，争论的问题便好解决了。以国民党来说，它有好多现象，归结起来，它有两重性。看到这一点，既团结又斗争的政策便产生了。有的同志问，我们党的领导一元化与国民党的一党专制有什么区别？这里，忽略了一个本质的区别，就是革命与反革命的区别。国民党员有那么多思想政治不

同的人，毛主席现在只把他们分为顽固的、进步的与中间的几类。这是本质的分类。

我们怎样做到全面、客观、本质地看问题呢？需要用分析和综合的方法。比如西瓜，从表面上看起来是绿色的，不知道里面是些什么，切开后才知道颜色不同，而且还有籽、瓤等。看人也是如此。比如，一个同志并非没有优点，但你片面地只看到他犯了一次错误，死记在心里，结果就会打击同志；见到一个坏人表面做了一件“好事”，就认为他好得不得了，这样就会产生麻痹思想。这就是没有分析。如果你分析了他有多少优点，多少缺点，你就能综合起来，得出结论，他是好的还是坏的，他的好的方面、趋势是主要的，还是坏的方面、趋势是主要的，就可以采取不同的具体办法对待。对中国革命的问题也应该这样看。毛主席在一九三七年五月初苏区党代表会议上讲国民党要抗日，就是用了分析和综合的方法。我们中国的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要反帝反封建，有国内的矛盾，有与帝国主义的矛盾。毛主席分析了当前这些矛盾后，综合起来，说与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是主要的。他还看到了发展的趋势，就是日本要进攻，我们要全面抵抗。这就产生了毛主席关于国民党要抗日、国共要合作的预见。实践已经证明，这种分析是符合客观实际的。再如国民党内部有顽固势力、中间势力、进步势力，我们应仔细地分析其各种矛盾，再统一起来看，这就是又分析又综合。再如我们区别一条心、半条心、两条心，也是这样。我们要看到问题的各个方面，同时又要看到其过去、现在和将来，这是分析。分析是为了综合，分析是综合的基础，综合是分析的结果。

我们站在党的立场、无产阶级的立场、人民群众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又是客观的、全面的、本质的，即辩证唯物主义

的，那末我们大会上许多争论的问题就容易解决了。比如在大会上暴露了新老干部关系的问题，有人说新干部“三会”、“二无”、“一有”；有人说老干部是“三大要求”、“八项注意”；老干部是戈尔洛夫^[2]，新干部是吴部长^[3]。这些都是片面的。我们知道，会说会写并不是缺点，只是会说会写而不会做才是缺点。否则许多老干部为什么还要求去四部学文化呢？讲到会说，我看有许多老干部在这个台上讲话绝不比新干部差。会拍是不好的，新干部是否都会拍呢？老干部也有会拍的。新干部入党时间短，斗争经验少，但老干部哪一个没有经过新干部的阶段呢？至于说老干部爱表爱笔，我看新干部对派克钢笔、瑞士表也是喜爱的。这些都是片面的错误的思想方法，不是为了团结全体。我们处理党的问题有一个原则，就是“坚持原则，团结全体”。新老干部应该互相帮助，互相学习，取长补短，这样就容易搞好团结。

整顿三风，本质上就是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其基本方法就是学习马列主义，总结经验教训，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在统一认识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

这次大会，我们不伤害一个同志，不打击一个同志。我们要采取群众路线，大家都站在党的立场上，以客观、全面、本质地看问题的观点与方法来解决问题，来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

批评与自我批评有多种形式，比如开大会、小组会、支部会，写反省日记、反省自传，出墙报，个别谈心，等等。大家应该有一个共同的态度，就是欢迎批评与勇于自我批评。我们要善于批评，注意方式，使被批评者容易接受，批评应该是建设性的，目的是为了治病救人。但被批评者不应该计较批评者

的方式，应该看他批评的内容。另一方面，要勇于自我批评与勤于自我批评，自我批评应该主动。否则，一旦受到批评，那就不仅不会感到这是同志式的帮助，而且往往会感到是痛苦的。

批评的方法是分析与综合，方针是治病救人。前一段是以批评为主，现在应该以自我批评为主，这是为了自己，为了党，不是为了别的。有人说自我批评是“逼上梁山”，那末现在我们主动地上“梁山”，因为“梁山”是革命的。

今天我讲的这些话，错的，请同志们批评指正，如果大家赞成，就照这个办法来结束整风大会。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
《彭真文选》刊印。

注 释

〔1〕德波林，苏联哲学家。

〔2〕戈尔洛夫是苏联话剧《前线》中一个不肯学习新知识而又好摆老资格的典型人物。

〔3〕吴部长是《同志，你走错了路》话剧中的知识分子干部，是能说会道的教条主义的典型人物。他在同顽固派军方谈判中，蒙受欺骗，使我军受到损失，而他也牺牲了。

开辟豫西抗日根据地^{*}

(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日)

邓 小 平

此次中原作战，国民党汤恩伯部惨败，丢枪十五万支，多被民众缴去。日军现占渑池、新安一线。豫西成为很大的敌后地区，我们应该去发展游击战争。该地区战略地位重要，国民党当然也不会放弃这个地方。中央军委叫我们负责开辟这个区域，太岳、冀鲁豫组织豫西抗日游击支队前往开展工作。决定由徐子荣同志为党委书记兼政治委员，皮定均同志为司令员，郭林祥同志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部队去后受北方局、八路军总部直接领导和指挥。

开辟豫西的任务是很繁重，也是困难的，但如果我们把这个任务完成了，对中国革命的战略意义是很大的。我若占有中原，将来发展前途很大，就现实意义说，它也是现有八路军、新四军地区的重要屏障。现在只能派去小队伍，容易立足。将来可能形成局面，发展成大队伍，还可能增派队伍去。

开辟新区是有困难的。一、客观上国民党在该地区搞了很多年，基础比较大。这次国民党军的败退，使它的政治威信受到很大损失，但它又采取更巧妙的办法企图恢复自己的威信。国民党已有“曲线救国”政策配合敌人搞我们。二、敌人有了

* 这是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北方局讨论开辟豫西抗日根据地会议上的讲话。

华北的教训，会对我们警戒很严。部队去了以后可能遇到战争。三、当地人民对我如何，我们不清楚。人民对我是生疏的，我们对敌情、地形、社会情况也知道得很少。我们在那里的基础是很薄弱的。估计到这些困难，我们去了才会兢兢业业地谨慎地进行工作，求得站稳脚跟。

有利条件是更多的。一、好的地形便于游击战争。二、人口多，民性强悍。三、物产方面吃用都有。四、国民党此次败退是受到很大损失的，双方比较，人民会跟我们走的。五、敌人还未站稳脚。六、有些地方地主武装不多，我们更易于立足。

我们领导者应当看到这些困难，在思想准备上要充分，去了以后谨慎地工作。所有同志都必须具有信心，因为还有几个区域同时派部队进去，你们不是孤立的。信心要建立在模范的纪律和正确的政策上。在纪律上，我们的干部、部队要很好准备，不是去抓一把，乱打汉奸乱没收，要认识到这是一个艰苦任务。进去以后，要拿行动来表现，要训练士兵，使每一个人成为宣传者，要普遍地做宣传工作、调查工作，要拜访士绅、老百姓，随时了解风俗人情。各方面都要很客气，买卖要公平。为了保证部队模范纪律，所有首长要经常到部队与战士见面，做讲评，着重鼓励。要经常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并告诉政治形势，就是环境顺利亦应这样做。党的工作、支部工作要健全，纠正形式主义。

我们的任务是要在那里建立抗日根据地。政策方面，发展方针是独立自主的方针，发展自己的武装，创建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发动群众，改善群众生活，减租减息，为我党在那里建立根基。独立自主的精神不是横冲直闯，蛮干是不对的。要达到我们目的必须有正确的政策。

对敌伪政策。对敌人，为了兴奋群众，仗是要打的，主要是游击战争。应当先打一二个仗，但又不要过于刺激敌人。对伪军，一般原则上开始不要过于刺激。对外来伪军，必要时拔掉几个钉子，打它一下，对地方伪军要很慎重地研究情况，先礼而后兵，只有对那些最坏、坚决反对我们的，可以解决它。一般的不同我们作对的，我们可以麻痹它。对不同的具体的对象，适当处理，否则我们不易立足。不能乱打，要打就要打好。合乎政策有利我们在那里立足的就打，否则不能打。

对伪组织。一般情况下，在我们确定立足的地方是要把伪组织打垮的，对伪组织人员的处理要非常慎重。在我立足前一律宽大处理，不杀，不采取没收政策，捉到后可加以教育放回去，还可去劝别人。我立定脚跟之后是要摧毁伪军伪组织的，但俘虏处理都要宽大。

对国民党。国民党在那里可能留一部武装，对我破坏也一定有。在政治宣传方面，我们对国民党的态度，不要一去就痛骂，要采取善意诚恳的批评态度，否则将大批树敌，不能达到争取大多数的目的。对国民党，我们始终表示愿意合作抗日，但要在他们开放党禁，实行民主与团结的基础上。我们之来，为的是支持抗战。首先可以吸收一部分国民党人士参加工作，对国民党可能利用这类人混进来，也不必太惊慌，但一般不能吸收入党。如果还有国民党地方政府，我们要去联络。可能有两种：一种是有武装做依靠，坚决同我们对立的，对这样的，我们要一面讲理，暴露他们，一面公开宣传我们需要建立抗日民主政府，到一定时候要产生新政权。一种是没有武装依靠同我们联系的，我们要与它联络，采取积极步骤，提出某些主张，首先提出人民马上要求解决的问题，同时向人民宣布要他们实现，如他们不敢做，就暴露了国民党政权的实质，孤立了

他们。如有几个政权，相互间有矛盾，我们则利用矛盾，争取多数，打击少数，不要到处树敌。

对国民党军队。国民党军队大兵团没有，小武装是会有有的，对其一律采取联合抗日的方针，但要注意不上当，一方面防止其袭击我们，一方面防止在合作当中把我们推上去同敌人对立，消耗我们。如果是愿意同我们联合的，我们也提出积极的建议，如开联欢会、参观，以达到争取的目的，当然我们要有戒备；如果是同我们尖锐对立的，我们要做到仁至义尽，要暴露他们，但绝不进攻他们，如他来进攻我，坚决打击他，打胜以后，还可办交涉。

我之武装政策。除上面讲的以外，我们要扩大武装，主要是建立游击队，发展游击战争。对于本地干部的使用，有的以八路军名义带队伍，有的自己回去发展游击队。去后第一个问题，必须扶持与掌握游击队，有些游击队才能生根。枪支问题，主要用游击队方式取得，有卖的，买一部分也可以，不能向老百姓要枪。地方人民武装起义，可以大胆收编逐渐改造，不要性急。对土匪我们不能要，同时对土匪、地方实力派也不要乱打。

政权。看进入以后的状况决定在什么时候提出来，需要建立立即要搞起来。这个政权要有三三制，要注意选择当地有威望的正派士绅、中间人士参加。政权成立后，首先就要做善政，组织武装。

经济文化。目前还提不到这个问题，但要宣传我们的纲领，可以陕甘宁施政纲领为中心，作为我党的主张宣布之。

宣传政策。大家要做宣传工作，介绍我根据地，宣传我党纲领。中心口号是保卫西北，配合正面战场，坚持河南抗战，与河南人民共存亡，保卫河南，保卫家乡，团结，民主。

锄奸政策。就是宽大政策，军队不要杀人，对伪组织人员甚至国民党特务加以教育，或让他们在人民中悔过后放走。

干部政策。武装要由骨干来掌握，一定时候可以搞短期训练班解决干部问题，培养些青年学生、知识分子。

准备工作。两个大工作，一个是过河的准备。渡河是一个秘密的问题，侦察渡河点，收买渡口，都应准备。一个是思想上政治上的准备。思想上，在干部战士中分别教育，进行些调查。

到豫西后，只要我们能真正发动人民抗日，政策对，依靠人民，我们是可以立足的。

根据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二〇〇四年出版的《邓小平军事文集》
第一卷刊印。

中共中央关于收集研究 全国经济情报的通知

(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二日)

组织农工业生产，发展对内对外贸易，已成为各抗日根据地最重要工作之一，但目前各根据地都感到缺乏敌占大城市和大后方的金融贸易情报。例如：华中及陕甘宁边区急需知道重庆的法币政策，法币、物价、金价的涨落，又需知道平津的联钞政策，与物价运输等等。由于不能适时得到这些情报，因此在对外的金融贸易政策上，常常处于暗中摸索、被动、应付的状态，而使根据地在经济上受到损失。为了克服这一缺点，特提出下列办法：

(一) 由陕甘宁边区政府的西北财经办事处负责编辑一种带全国性的经济情报，委托各根据地及办事处向一定的大城市收集必要的材料，按期编成情报，通知各根据地作参考。

(二) 各根据地及办事处须定期的将被委托搜集的或自己需要汇报的情报，通知西北财经办事处。同时亦可向西北财经办事处要求代为收集自己所希望得到的情报。

(三) 收集情报地区的划分如下：晋察冀分局负责平津方面，北方局负责太原、平津、开封、洛阳方面，晋绥分局负责太原、绥远方面，山东分局负责济南、青岛方面，华中局负责上海、南京及陇海路东段，鄂豫边区党委负责武汉方面，东江

游击支队负责香港方面，重庆办事处负责重庆方面，各地能收集其分工以外地区的情报则更好，情报不怕重复，愈多愈好。

（四）各地负责收集情报的项目随时由西北财经办事处通知，但各地最重要的责任是在收集带战略性的经济情报，例如：（甲）大后方及敌伪的货币政策，及其内部的金融秘密消息；（乙）大后方及敌后对于我有关的某项物资政策（如食盐、棉布的产运销等等）。此外，每周或按期通报几项物价以及物价、金价的涨跌及比价。

（五）为了迅速获得经济情报，各地党须在有关城市中建立经济情报的据点，这些据点的建立最好是利用纯粹的商业关系，同时也可经过党员与同情分子去建立，但必须与秘密党划分开。

（六）上述各地党必须指定专门人员负责收集研究经济情报，每周或每半月或一月用专门的经济情报密码向西北财经办事处通报一次，如遇金融上重大风潮时，随时报告。

（七）各地党接到这一通知，并加以讨论研究后，首先回答我们两点：（甲）如何执行？有何困难？（乙）把自己所希望知道的情报项目开来。

中 央
七月二十二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四册刊印。

中共中央关于争取教民的指示^{*}

(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二日)

各同志：

关于天主教耶稣教教徒在我根据地及游击区的分布情形，抗战中的表现，我党对他们及他们对我党的态度，多少加入我党者及其表现，各地教堂多少等项，请加以调查，随时电告。据云，单是天主教全国有教徒四百万，华北有一百五十万，绥远有二十二万，这是一个大问题。日本人及国民党均在争取教民，必须引起我党注意。争取教民是我党不可疏忽的任务。

中 央

午养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 这个指示是毛泽东起草的。

中共中央关于发展河南 敌后工作的指示

(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五日)

敌寇进占河南，已打通平汉线，铁道附近地区的小“扫荡”已在进行，国民党留李品仙、何柱国、陈大庆三个集团军在敌后，企图最后坚持，估计正规军计八万，地方武装不少于十万，敌寇是否向李等大举进攻，还要看以后情况的发展，大举“扫荡”和暂时保留顽军以阻止我军西进，两种可能均存在。因此，此次向河南发展与以前发展华北和华中情况均有不同，情况更复杂，我军政策应照顾敌伪友我诸方面，更灵活的去适应具体情况，成功关键取决于此。因此我们应注意下列各点：

(一) 我军发展河南，要善于插入敌顽之间的空隙地区，在敌伪区及其边沿去建立抗战秩序，对李陈何三个集团的地区不应主动楔入，如其向我进攻才可举行严正自卫，不故意去制造磨擦。

(二) 发展新区一般规律是首先着重政治宣传，争取同情，建立武装，扩大武装，以自己的军政力量扫除阻碍，使局面初定，即转入组织和领导群众斗争，以建立根据地，这个步骤不宜先后倒置。关于新区武装建立和争取问题，第一，对已有不反我之地方自卫武装应建立友善同情的外围关系，长期帮助耐

心争取使其能自觉自愿走我军道路；第二，坚决反我之地方武装及遭人民反对之土匪武装，如争取无效，则应坚决解决之。但对俘获人员不问首从一律采取宽大政策，分别改编或资遣之；第三，还应放手，根据当地政治条件，去建立新的武装，以扩大我军的地方势力，但不得乱发委任，自乱秩序，我军的武装发展是经过团结和争取各种新区武装的道路，反对并吞政策和不培植地方武装的剃头政策。

（三）迅速发动群众抗日运动和减租息运动，是我军深入新区工作的重要任务。为此应注意者，第一，我军进入新区第一件大事是群众纪律，做到秋毫无犯；其次除在当地筹粮外，至少最初几个月应自带菜金，筹粮时每户只筹一次，至多不过二次，严禁各部队往来重复向当地人民摊派粮草，人民吃什么，军队即吃什么，不得专向人民另筹米麦细粮。我军三大纪律做得好和筹粮有秩序是我军与河南人民的最初见面礼，敌伪顽我的比较，在人民眼中第一天是从纪律和筹粮的具体行动出发的。第二，我军进入新区多半是敌伪顽等蹂躏过久的地区，人民痛苦最深，我军初到应懂得安定人心，首先给好日子过，多做好事使人人都有来苏之庆，因此不筹饷，不乱打汉奸，不捉人，不罚款，不杀一人，就是坚决的反共分子特务分子，也采取宽大政策资送出境。第三，对新区应适时发动减租减息的群众运动，我军一面要支援和领导群众的减租息运动，一面要说服地主执行法令，采用双方协议，我军出面玉成的方式，减额不应过高，宜适合双方情况，我军应以关怀双方利益的态度，以迅速达到发动群众运动之目的。

（四）新区政权，我军进入初期应委派自己的县长区长，但要善于吸引当地进步人士和开明士绅出来做事，作我之助手。新政权任务在建立抗日秩序，担任初期军事需求的任务，

并努力造成绅民与我军的合作，应召集有绅士参加的座谈会，许多问题都同他们商量。政府还应注意兴办几件与人民福利有关的一些建设，使人民认识新政权不仅向人民要东西，而还能替人民做些有利的事情。新政权的各级改选不宜任意举行，彻底改造应放在群众运动发动之后，国民党旧官吏应吸收其进步分子来共同办事，但不能轻易信任，淆乱人民视听，同时亦不可任意打击或逮捕拘禁造成自己孤立，其卸职家居者如申明愿遵守新政府法令无反动行为，政府应予保护，不侵犯其正当权益。

（五）我军和新政权应注意容纳和吸收当地专门技术人才和知识分子。过去在华北华中这一工作是有缺点的，我们过去所吸收的只是其中进步分子，总比例占少数，大部分对我党是消极的。今天在河南应多注意礼遇和容纳各种知识分子替民主政权服务，给以工作机会，对一般青年给以读书机会。旧式中小学应接收逐渐改造，使其自愿接受我党教育方针，对中小学教师待遇应有所改善。

中 央
七月二十五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四册刊印。

中共中央关于布置 湘粤两省工作和桂林疏散 给董必武的指示

(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五日)

董：

敌阁虽更迭，但对打通粤汉路势必继续，因此布置湘粤两省敌后工作和桂林疏散仍属必要。

1. 同意派周礼、谢竹峰、张春林（即白毛）秘密转回湘南布置敌后各县的人民武装斗争，但在敌未到或只经过而无久占意图的地区切勿过早暴露，免为顽方所乘，至国民党军队所在地区党员，仍应坚守原来隐蔽待机方针不变，周、谢等动身前应训练一两星期，请若飞^[1]亦参加此训练。

2. 李应吉如由衡阳撤回，仍宜深入商业，不参加秘密工作。

3. 孙仁如能由川东调出，最好派回，因他极熟悉湘中情形。

4. 东江由此间直接电其沿粤汉路向北谋发展。

5. 广州湾以北最空虚，该处几无国军，望设法通知该处同志一方谋武装发展，另方力求与琼崖游击队打通联系。

6. 同意对桂林疏散办法，对叶、廖、柳^[2]三家宜多接济，

以便其能早日移动。如桂林危，文化人亦宜走不宜留。

中 央

午有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四册刊印。

注 释

〔1〕即王若飞。

〔2〕指叶挺、廖承志、柳亚子。

中共中央关于东江纵队 应大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 给尹林平等的指示^{*}

(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五日)

林平转军政委与临委^{〔1〕}：

敌阁虽更迭，但对打通粤汉路仍势在必行，你处工作应一本开展敌后游击战争之方针加紧进行。

1. 凡敌向北侵占之区，只要其有久占意图，即应由你处派出得力干部或武装小队至该区与当地党员取得联系，尽力发展抗敌武装斗争。将来此项武装在名义上不一定与东江支队联系，与余汉谋部亦应避免磨擦，以便自己发展。同时敌向北行动，三角洲及其以西地区亦有可能扩大我现有武装，希望广东我党武装能扩大一倍，并提高战斗力。总此诸事统应由军政委会讨论施行，并统一其指挥。

2. 国民党军队所在地区，我地方党员仍应坚守隐蔽待机之方针勿变，唯临委可斟酌实情抽调一部分干部转至游击队受训，参加游击工作。

3. 你处仍应不断设法派人与琼崖游击队打通电台联系，如可能亦应派人至广州湾附近发展武装抗日斗争。

* 这个指示是周恩来起草的。

4. 在广、九市上的武装斗争有成绩，但不宜常做，免致引起敌人对我过多报复和进攻，并妨碍我城市秘密和抢救工作。

5. 你们与潮、梅、闽西南最近有无联系，潮、汕附近有无发展游击战争可能，望告。

中 央

午有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出版的
《周恩来军事文选》第二卷刊印。

注 释

〔1〕指广东军政委员会和中共广东临时工作委员会。

毛泽东关于请各地调查和答复 十项问题的电报

(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八日)

先念、漱石、荣桓、黄敬、小平、子华⁽¹⁾、林枫同志：

下列问题，请予电复。

(一) 经过时事教育、整风、反特、减租之后，对于党外人士的团结、“三三制”的推行是否生长了一种“左”的现象？党外人士是否对我们发生不满，其不满之点主要是什么？他们是否感到有职无权，如何使他们有职有权？如何使他们经过参议会、座谈会、参加政府工作与社会事业，把他们进一步团结起来？同时，右的现象是些什么？

(二) 减租中的偏向，明减暗不减是否还存在，减租是否还应定为今年的任务？同时，减租中的过左现象是些什么？

(三) 拥政爱民与拥军优抗两项工作是否较前进步，两项工作的缺点各是什么？

(四) 据你们看，秋冬军队轮番大整训可能性如何，你们是否已在着手研究此事？现在军队军事与政治工作两方面的主要缺点是些什么？

(五) 民兵工作的缺点是什么？是否还有大量发展的可能性？如何使民兵及地雷战普遍大量发展？并如何使战斗与生产相结合在民兵运动中完全实现？

（六）沦陷区、接敌区合法与非法工作相配合的工作是否有更大发展？赤白对立现象是否发生过及如何克服的？

（七）据你们看，中央对城市工作指示其实现的可能性如何？你们是否已在着手研究此项工作？

（八）经过今年大生产运动后，是否可以酌量减轻人民负担？例如减轻百分之十至二十，是否不至损害财政支出？

（九）在今年部队、机关生产发展基础上，是否已经看得见战士及工作人员的生活有了相当改善？或者还是很苦的？同时，在我们帮助农民发展生产方面，是否已经看得见农民收益的增长？农民对于按家计划、互助组织及合作社的态度如何？在这些工作中存在的命令主义是否很严重？全根据地粮食、棉花及各项工业品其自给程度及可能性如何？

（十）对于将民众团体的工作在减租减息后转到领导各界人民发展生产、文化、卫生方面，你们意见如何？据你们看，是否只在作了这种转变后，民众团体（各救）的工作人员才有事做，才不是空架子？各地是否正在作这种转变？

以上十项问题，请作一次或分作几次答复（每项不必太详，以能扼要说明问题为限），以便中央在今秋能对其中几项工作作恰当的指示。

毛 泽 东

午俭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三卷刊印。

附一：罗荣桓、黎玉答复毛泽东的十项问题

（一九四四年八月十二日）

泽东同志：

午俭电收到，兹答复十个问题：

甲、关于“三三制”：经过时事教育、整风反省，对上层党外人士一般没有产生“左”右现象。他们主动起而响应，也有不少改造。山东政委会、参议会、“抗协”以及一些专署的党外人士，在分局的坦白大会后，反省争论，亦如党内，不轻易放过一个人隐瞒的历史问题及肮脏行为。因此，暴露不少，但未发现内奸问题。鉴于党员整风反省后，工作焕然一新，很受感动，更见大局前途光明。因此，一些动摇二者之间，足蹬两只船的打算，对我一贯有成见的人均有反省、有改变。在减租减息斗争中，当听到个别过左之处，与偏信上层地主一面之词，对下层党不满，如果上级稍一喊左，即借此以反对左走的人，经对地主反攻阴谋、摧残基本群众真相的揭露，并提倡机关走一村、做一村，先从党内、群众团体内了解地主材料后，发动斗争，群众忽然活跃起来，使他们亲自参加，于是改观。过去说破坏社会秩序，现在则说：不发动基本群众，真还不行。

至于农村地主阶层，一般有四种态度：

其一，被群众斗争过的恶霸、地主及其走狗，以为民主政府不是他们的，只望“晴天”（指国民党来），大约五六个村有一个。

其二，保持中立，或对穷人们眼红。

其三，认为斗争的对。以为他们不办好事的被斗，并不是都斗。

其四，有不少的地主，对于经过减租斗争后，以为过去不劳而食，是不光荣的；现在改变了，要劳动纺线，甚至有的以为过去作事不对。对于一般减租不满的地主，经过民主检查，要其加强生产，很受感动。

不过这些材料知道的还不普遍。农村地主上层怕斗争心理是不少的。不满的心情在参加生产后似已稍减。

党外人士一般不满是民主作风问题、参议会领导问题。由于专署、县署二级党团作用差，不善于领导参议会驻会委员会工作，所以形成驻委会有其名无其实的现象，以致有些有职无权，县委运用一元化的方式有偏差，形成包办命令，取消各组织的活动，形成党的机关，动员后长期分散工作，以致引起党外人士不满。这种偏向尚未完全纠正。我们准备在减租减息完毕后，即重新开展民主运动，同时，要求党员参议员在参议会起模范作用。现在是党员被选参议员后即不负责任。对参议会的号召不积极，信件不复，是普遍的现象。同时“左”的现象还存在，右的现象也有。有些为了“三三制”，不慎重、不考察，随便植入不好的上层。各县参议员、政府委员，拉了一些高利贷者，甚至曾经是恶霸也进来了。这半年来因群众要求，也斗了一些，才发动起群众。有些县区曾因参议会喊左了，就放松了减租减息。有些为了迁就“三三制”，政府中党员骨干也不得参加委员会了，但仍作政府主要工作。对于党外人士一些进步分子要求入党，因在整风中未批准，他们感觉党为了“三三制”，叫他们当长期党外人士，自觉干了七八年，还入不上党，不情愿。敌占区人士来我根据地参观，看到官兵穿吃平等，纪律好，老百姓夜不闭户，不见乞丐，群众生活好，东西

便宜，一般印象良好，感觉我党非成功不可。

乙、关于减租：这一年中执行中央十一指示，得到很多经验。现发现：

（一）过去两年减租工作不彻底，明减暗不减现象很多。滨海增资多、减租少。由于包办代替作风，初期时涌进流氓，减租未发动多少群众。胶东、鲁南、滨海地委以下干部，很多说租佃对自己的关系少，以致不去作深入调查研究工作，搞一阵就算了。清河、冀鲁边，因环境关系现未进行，鲁中稍好些。

（二）查减后，发现租佃关系是分散的。

（三）减息过去没有做，事实上有各种各样的实物高利贷，粮食有吃一还四的（花生、饼、米子账、双花账都如此）。过去八年来未了结的利滚利、利涨准折（折地亩房产等）最厉害。因物价变动，有利息形成百分之七百的。分局去冬今春，抓紧这一问题。鲁中、滨海发动了不少群众，而且是十余村庄联合斗争，对于开展工作很有利（有的是调解）。

（四）发现一些恶霸是典型封建主，过去仗势欺人，有怕杀的不少。有些高利贷者，霸占公山、公地、族产，其中有些有政治问题，群众恨入骨髓。在减租减息中不斗倒他们，群众是不敢起来的。十个月来，在滨海打了不少，群众说：这才翻身了，晴天了。

（五）地主反攻是多样的。抽地、“让地”、威胁、利诱、甚至派狗腿子打入群众团体，掌握群众团体，全部或一二个部门，借进步词句反对群众领袖，组织反示威。击破地主这种反攻，主要建立农会，培养积极分子，分化地主狗腿，使其在群众大会上进行良心检讨最有效。

（六）干部几年来对群众路线不明确，方法不会。尤其地

委、县委本身，有的成员出身小资产阶级，群众观点不强，亦未经过群众工作锻炼，故有些束手无策，形成单纯的党务工作。对上级指示一般的不去研究。因此，“左”的右的经常摇摆。但较以前有些进步。

（七）估计现在全山东，减租完成了百分之五十到六十二。一年来，增加新地区，村庄约一万个（游击区在内）。再度检查过去，也有区干部工作不深入，群众一遇村干部是应付，或有问题则受欺骗。同时群众大多数尚未组织起来。因此，分局已有七、八、九、十，四个月再度减租减息查减的指示。基本根据地要求今年十月底完成。新地区年底明春仍是一个严重任务。在这一期间，要与改造农会、发扬民主、改造村政权联系起来。

丙、关于军民关系：拥政爱民，较前进步。对群众观念，干部中从今年开始有些具体认识，过去是抽象的、模糊的。连队大部反省自己不对。事后注意实行十项公约，有些战士还订下计划。缺点是，对群众工作除经常帮助房东家务劳动、宣传群众、训练民兵外，一般还不会组织群众，工作观念上亦不够重视。县区武装纪律差。拥军优属今年有较大进步。拥军方面，良心检讨大部地区进行了。莒南有百分之八十的村庄作了检讨，对主力认识提高了一步。各村墙壁上都贴了拥军公约，通过讨论，举行了村民宣誓。因此，对部队进行了热情慰劳，摊派现象在发动群众的村庄已减少，各地都在一二月份进行了拥军教育。分局曾决定思想动员后，动员参军，充实主力。滨海一个多月完成了六千余人参军，胶东三千余人参军。归队：鲁中沂蒙区一个月约一千余人，渤海七八千，鲁南未做。参军者贫农约百分之八十以上，其中民兵约占百分之六十左右。入伍后，要求打仗，学习努力，比过去均好。现在主力一般充实

了，滨海主力团自二千五百至三千人。部队群众观念增强了，对地方工作认识亦由此提高了一步。指战员情绪由此更加高涨。地方党、群众团体，认识减租减息后，支部力量增强了。对武装的认识教育还是不普遍、不深入、不平衡。拥军中有些区村，注意动员群众慰劳肉食物品，多数区村干部认识不够。

总之，以上三个政策，需要中央进一步号召全党开展群众路线，才能使战后优势获得雄厚基础。

丁、关于大力整训部队：

（一）秋冬两季完成不可能。秋季反敌抢粮、反“扫荡”比春夏两季更为紧张。到明年春季或夏季有完成的可能。

（二）我们正开各军区高级军事会议，整训部队是主要的内容，已完成对连队工作与战术问题的总结，对敌顽统一作战方针的总结，还有对地方武装与精简问题的总结。整训部队以中央指示作根据，再充实我们的一切计划。

（三）军事上存在单纯军事观点，狭隘的经验观点是比较普遍的。如军事训练同政治工作结合不够，有些分离现象。如只承认自己一套是正确的，不愿接受人家的经验、吸收新的东西。军事技术一般是很差的。从去年“八一”起特别强调军事技术训练，由各军分区开办专门训练班，解决教练人员缺乏的问题。已毕业一万六千二百五十九名，学习成绩仍不大。部队中大多数战斗员，包括干部在内，不懂射击，对刺杀信心不高，手榴弹消耗甚大，杀伤敌人不多。现在正在召开战斗英雄大会，以动员练兵、练技术为中心。

（四）政治工作：开始纠正在部队中会议繁多、脱离战斗、生产与群众的现象。后勤医院的政治工作没有力量。贪污浪费，不关心伤病员是普遍的。还有一些主力兵团政治工作同军事工作分离，政治工作强调自己第一，把一元化领导同军事指

挥对立起来，实质上是知识分子同工农干部对立起来。胶东比较严重。

戊、民兵工作：

（一）民兵估计由现在的二十万到达五十万可能做到。深入减租减息的群众运动还不普遍，在基本地区还有大的空隙。做好减租减息的地区民兵发展就快，现在边沿区扩大了，新区人口增加了三百万。清河平原对民兵还没有弄好。

（二）地雷战在胶东很普遍，去年起已制造六万个地雷，其次是鲁中，滨海亦有发展，现在在山地制造石雷是很便当的。此外，多用手榴弹，在根据地内对付敌人“扫荡”，到处使用，男女老少都可用。地雷战同麻雀战配合起来，效力更大；但必须防止炸伤来往人员。

（三）民兵战斗与生产结合还缺乏具体经验。在边沿区民兵成立村联防，替换防卫与生产，把变工队与民兵小组结合起来。民兵到敌占区走私，发展合作社。而中心地区民兵战斗少，锻炼也少，生产是主要的。

（四）民兵在边缘区完全无战斗能力。中心区组织不健全。一般经过两期整训。个别的有民兵对抗民兵，民兵对抗区中队，包庇走私，自己走私，随便去干涉农村男女关系，捆绑人，分化农会，受破坏分子、地主狗腿子利用。在打开据点时纪律很坏。支部与分区对民兵领导很差。还有民兵火药消耗量很大，在战斗多的地方就地征用成问题。由政府补助，军队供给地雷、炸弹，还解决得不彻底。

己、关于沦陷区与接敌区工作：我们有了更好条件。敌人“蚕食”被打破，逐渐收缩，人民更倾向我们。伪组织、伪军不能不向八路军留个后路。武工队进入敌后活动会更便利。滨北对张步云、莫正民两股较大的伪军工作有很大成功，使我跨

过日诸路、台潍路，部队东进北向，与应付敌人“扫荡”得利不少。至于造成赤白对立现象一般不存在。胶东我对通敌反共之赵保原部进行了剿办，捕获其乡保长、甲长，受训者大批放回，鼓励该地群众到根据地来，并加以照顾。因此，打垮了该匪对我的封锁与抓壮丁计划。前一时期西海曾有没收在我区赵部家属财产的现象，现已纠正。

庚、对中央城市工作指示已讨论。

（一）我们过去在方针上有错误。如济南城委，只走中上层路线，并以为根据地吸收知识分子，培养建国人才为中心是很荒谬的。把青协当成为唯一的路线，替特务向我们打开了通路，使济南原有组织迭次遭到破坏。

（二）胶东城市工作发展前途很大。青岛、烟台在工人及学生中，已经有了我们党及群众组织。经过商业关系对东北十几个大商埠，都可以开展工作。各大商埠都有抗日救国联合会及商人救国团等组织。加强这一工作的领导，向东北发展是有希望的。

（三）进行城市工作条件很有利。敌人在城市的统治，由于经济生活的混乱，存在政治上的危机。工人在应付敌人斗争上，提出偷的办法。口号是：偷鬼子的不算偷，被鬼子打了不算丢（不丢人的意思）。工人、厂警、工头联合起来共同偷敌人的，可能发展为广大群众运动，便于我们团结工人，从中扩大我们在城市的影响。如在年节时，胶东、滨海都召开了在根据地居住的青岛、烟台及海外商人座谈会，到会人都在三四百人以上。胶东各地县委都召开了同样的会议，人数更多。济南市委亦采用了这一办法。

（四）我们的情报、锄奸、工商管理、贸易与对日伪工作，在上海、天津等城市都有了一些单线的联系。青岛、烟台、济

南、连云港、上海、天津，比我们城市部门预计的工作发展更快些。有数处已建立了我们的情报电台。如果我们把以上各地区的工作，根据党的发展方针，仍保持各单线之联系，可能做出更大的成绩。现在大城市共有党员一百二十四人，中等城市共有党员六十四人，城郊有四十八人，镇区有五十六人，共二百九十二人。其中铁路工人党员有十八人，主要在交通线上。胶济路有三段工作，津浦路有两段工作，并有两个地区工作委员会。陇海路上有几处党的工作。我们缺乏城市工作经验，对过去城市工作的错误与最近犯的一些错误，在城工干部中不易领导，而且缺乏大的干部与有能力的干部。有个别面目不清的，分局在整风中已审查出来一些。其他地区正在清查中。拟召集附近区党委，研究中央指示与具体帮助布置工作。

辛、对人民负担上：去年与今年公粮一般比一九四二年减轻了。去年负担占产量比例：地主占百分之三十，富农占百分之二十五左右，中农占百分之十二，贫农占百分之五。今夏鲁南地主减至百分之二十，富农减至百分之十六，贫农略增至百分之八，比一九四二年减低百分之十到二十左右；田赋因以前币价不稳，去年改缴粮食，一年不超过五千万斤。现因粮价低，币价稳定，今年改缴钱，上半年每亩标准缴四元，下半年缴五元。此收入尚不足军需开支，需依靠出入口税、工商局经营盈利解决。滨海上半年工商税利，两次占全部收入百分之八十，为了准备反攻，我们不准备再降低负担。

壬、部队在生产初步发展基础上，一般主力、机关每日可以吃到五钱油盐，一斤多菜，每月一斤多肉，并能补助牙刷、牙粉、黄烟等日用品。今年上半年由生产盈余每人解决衬衣一套。指战员体力亦渐增强。今年要求部队、机关生产收益解决经费百分之七十至八十，部队除够吃外，一般尚未做到平均三

人一亩地（清河垦区平均一人一亩半），农业基础还弱。县区武装生产亦差，且不平衡。

农民生产方面，在发动减租减息与民主的村庄，对生产有热情，一般的开荒、纺织、运盐、打油，做到了生活上的改善；除还债外，穿衣、吃饭比以前好些。由此进一步转变了他们的认识，认为是毛主席的法子，过的是共产党、八路军、民主政府的日子。实行了部分的家庭计划，如深耕、多锄、拾粪、副业。但农民对这个计划的执行还很差，许多还是想起什么做什么。由于工作中的形式作风、命令主义存在，所以家庭计划多不切合实际，或变成一个人的计划，没有多采用家庭讨论会议的形式，有些甚至是突击的。一般对一类的劳动互助与纺织合作社已经有初步认识，但由于农民受文化水平限制，因之在合作社中计工方法、算账感到困难。初期也有因感情不好意思说，彼此形成散漫，以后又因不会使用剩余劳动力发生苦闷。这些在长期摸索整理中已有转变。个别的也有过早集体化。基本群众在许多地区都相互畅谈说：快了快了（他们意思是快共产了，其实是误解），情绪很高。我们在工作中耐心深入群众作风不够，命令主义、包办还存在，但比以前减轻了一些。县区干部劳动观念还差，存在着形式主义，因而对生产工作兴趣不大，为数目字、为上级工作的偏向还存在。所以了解与研究群众要求、群众情绪还很差。今年根据地秋季高粱、谷子，因受旱不能丰收。除沂蒙区受旱成灾外，余够吃。布匹除鲁南外，各地均可作到自给。纸、盐在鲁中、滨海、胶东大部自给。棉花估计今年可产一千万斤，还需外来一部。

癸、山东群众团体：有一些变化。一般县区群众团体，很少是选举的。现在发动群众并通过代表会，讨论民主、文化、生产事项，完全同意减租减息后，转到生产、文化、卫生、民

主选举和民兵工作方面来。我们准备再订出一定时间来进行工作。今年连新地区在内，有一半地区仍是减租减息。其它，可转入民主、文化、生产、卫生、民兵方面。

以上答复，有不正确处与不够处请指示我们。

根据解放军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出版的
《罗荣桓军事文选》刊印。

附二：邓小平答复毛泽东的十项问题

（一九四四年八月二十四日）

毛主席：

关于所询十项问题，因雨交通阻隔，未能及时搜集材料。先就太行情形，答复如次。

（一）减租、减息、简政和反奸以来，对团结党外人士，发生了一些“左”的偏向。现在，政权中党外人士太少了。在反奸中，有些参议员坦白了，有些被罢免，还自杀了两个（邢台、偏城）。邢台李参议员自杀时留下一个遗嘱，里边说：“国民党放毒，共产党整风，国民党完了。”一般党外中间人士认为：反特务，就是反国民党。有些认为：减租是慢性共产。认为：三三制是利用党外人士，非党人士似是傀儡，实际还是一党专政。这与各地对参议员问题的不慎重、不严肃，与对非党干部不够尊重、宗派主义作风有关。可是，他们一般认为：上级比下级好。经过时事教育和整风，他们看到我们提倡自由思想与自我批评，加上中原战役及最近国际形势的变化，以及国际舆论的

空气之下，比前好转，较进步的，想加入。这一现象，还不是个别的（有的是投机思想）。生产运动以来，开劳动英雄会，不开士绅会，有些人说：“咱们吃不开了”。但阶级关系，在生产运动中是比较稳定。太行对此问题，区党委拟定的调整办法是：

（子）开生产运动、生产劳动等会时，请参议员和一些经营生产好的士绅参加。

（丑）对政权中党外人士整风的方法加以改善。加多时事教育，不要勉强，纠正生硬方式。

（寅）准备今冬改选参议员，召开参议会。届时，准备多吸收一些党外进步中间人士参加工作，宁肯工作人员多几个。

（卯）党内整风，克服宗派主义，讨论统一领导和三三制政策的运用。

（二）减租减息问题：太行区减租，抗战后有我工作的地方，做了一些，但极不深入。真正执行，是在中央土地政策指示后。一九四二年下半年，做得轰轰烈烈，基本群众大大发动起来了，根据地面貌完全改观。尔后，一切工作都好做了，一切任务完成都容易了，党政军与人民的关系密切了。如去秋公粮，人民自动缴纳，超过了计划。又如今年扩兵送延安，两次约二千人，每次回去就完成了。但在减租减息中，“左”、右偏向都是存在的。在大减租息运动中，“左”的现象表现在：

（甲）退租过多。有退五年的。榆社实际上变成了折地分青，不少地主破产。

（乙）不少地方，租额规定过低。一九四二年底，虽改为退租不超过两年，也显得太多。

（丙）有些地方，以反贪污、退贪污款代替了减租，没有减租，地主就坍了。所以，真正贫农得利益不多。

（丁）减息，也是发展到普遍的清债、算老账。利息超过

二倍者，大部都退。不足二倍者，补足二倍退了。典地都无偿退还了。

这些“左”的现象，在一九四三年初，太行分局高干会议中，提出适当的纠正。当时，虽也提出了贯彻减租，克服不平衡，但强调坚持到底不够，多少为“左”的现象所迷惑，丧失了贯彻力。加之从去年二三月起，就形成了严重的灾荒，一切力量集中于救灾、生产去了。而灾荒区，多是工作薄弱地区。灾荒中，又不可能进行继续减租。所以，太行区直到现在，减租工作还是不彻底的，不平衡的。去冬，因集中力量整风，虽也照中央指示作了一些检查，但不普遍，不深入。现在太行状况，大概是这样的：原六个分区，大约真正减了的，是十分之五，包括更好的县份（如武乡）在内。这些更好县份中，也还有百分之十没有减。新开辟的七、八两分区，为时已经一年，还未开始减租。我们曾经多次催促，据区党委说：两分区领导同志，思想上有毛病，认为两区问题复杂，恐怕影响团结，这也是右的观点。而在已减租区，又发生下列现象：

（甲）明减暗不减。先进区也有，落后区更多。其中有虽订约而无租额规定者，有在文据约定外另有口头约定者。

（乙）地主随便收地。因在法令上取消永佃权一条，地主则借口出典、出卖或收回自种，收佃户的地。农民恐怕收地，向地主屈服，形成明减暗不减。也还有怕变天而屈服的。但这种心理自庞、孙^[2]投敌后，大部消失了。

（丙）减租办法极不一致。有的地方存在着虚租（名义租额）、实租（实际租额）之分。虚租减了，实租未减。有些地方，死租变为活租，实际是抵抗减租（这现象，五、六分区还很普遍）。不少地区，因灾荒收成大减，所收粮食大部交租，甚至有全部交了租还不足的。

(丁) 农民不了解政府法令，而被地主欺骗了的，也不少。

以上是太行区状况。据我所知，太岳与太行情形差不多，深入程度，尚不及太行。因此，今冬必须进行一次彻底的检查运动，贯彻减租。工作中心，是在群众中进一步进行政策法令教育和保障佃权。依太行情况，未减租者，一九四三年的多交部分，应退还农民。至于新发展区，则应以减租发动群众为一个时期的中心任务。此外，还有一个赤贫户问题。太行区无地（不是佃户或佃得很少的地）的赤贫农，约占人口的百分之十，减租减息，对他们均无利益。过去长期是终年劳苦，永不翻身的阶层，我们也长期忽视他们了。大生产运动，有小部分开了荒，加入了互助组，情况略有变更。但替他们想的办法还不多。这是今后必须特别照顾的问题。

(三) 民兵问题：民兵工作，在太行有进步。一九四二年冬和一九四三年，曾作两次训练。太岳比较差些。近来，太行在数量上无大发展，质量上则有相当的提高。特别是边沿区，战斗力增强，组织严密，行动亦较积极，地雷战有发展。去年，全区制造石雷几万个，因未遭遇大“扫荡”，尚未见其效果。又发明了磁雷，据说，效果比石雷还大。总之，民兵对地雷信心是有的，问题是训练与使用。今天民兵的武器，最有效验的，还是地雷（铁、石、磁三种），应大大发挥。步枪，在太行有八九千支，太岳不足一二千支。过去经验证明，步枪杀不如地雷炸死之多。至于旧的武器，亦应提倡。惟除土炮外，其余效果不大，但比没有武器好得多。而在发挥尚武精神上，尤属必须。近日群众发明了一些小土炮、土迫击炮，不断的有创造。太行民兵现存缺点是：

(甲) 洋枪主义未完全克服，不愿使用旧武器。

（乙）缺乏白刃搏斗的训练与锻炼。

（丙）宗派主义还很普遍，有些自高自大，不注意团结广大的自卫队。

关于民兵的发展，仍有可能。太岳则有大大发展可能。太行现约五万余名。最好县份（武乡），占人口百分之七。中等县份，占百分之五。据过去研究，发展到百分之七，一般是达到了饱和点。所以，太行原有区还可发展约两万。如加上新区，将来可达到十万左右。区党委提出，今年发展百分之六，明年到百分之七。今年冬季，仍着重民兵训练。明年，则加强自卫队工作。至于生产与战斗结合，一般有了进步。在初期，民兵游民化的倾向是严重的。经过几年不断纠正，特别是今年大生产运动，把广大民兵卷进去了。边沿区民兵的生产与战斗结合，也有一些经验，如战斗与生产的变工互助形式，组织以民兵为骨干的互助组到边沿区、敌占区卖工，既保护了生产，又得利益。中心区的民兵，多参加一般互助组。也有民兵就自己范围内组织起来的。也有以民兵为骨干组织起来的。至于在战时如何结合，还是尚待研究的问题。看起来，战斗与生产的变工形式，会大大发展起来。

（四）沦陷区、接敌区的斗争问题：赤白对立的现象，一九四一年以前，曾在某些区发生过。一九四一年以后就没有了。过去形成的原因，是敌人挑拨甚至鼓动群众到根据地抢掠烧杀，我游击队纪律不好，抗日政府只要粮食，不做工作。其结果使我游击队不能在敌占区立足，形成根据地严重退缩状态。以后，纠正了自己的弱点。加之敌人对沦陷区的无情压榨，我政治攻势发展，敌占区人民对我一改旧观，态度甚为亲切。现在，许多老沦陷区都能进入武装活动了，游击区有很大的开辟，平汉线也大体恢复到一九四〇年以前的状态。合法工

作与非法工作相配合，在运用上，一年来也有发展。举二分区几个例子：

(1) 平西小商工作。平西南下商人很多，商人成分多系失业矿、瓷、染工，雇工及小知识分子，常来往于敌区、我区之间。我经过工商系统，加以买营业证，每月一换，加以组织教育，离城五里的村庄，都有人参加。他们参加的条件是：(甲) 保守抗日秘密；(乙) 组员互保，防止奸细混入；(丙) 遵守贸易法令。他们做了很多事，如出口粮食四百石（至去年七月），都未落入敌手，并输入很多必需品，建立了锄奸网、秘密游击小组和秘密宣传员，开展了一些伪军工作，并建立了党的组织。

(2) 太谷反抽丁同盟。这一组织本来早就存在，但无作用。去年夏荒时期，群众想向大户借粮，所以配合公开武装，把敌人吸引到公路点上，其他地方就借粮。借粮时，先由反抽丁同盟讨论，然后村政委员会（以合法形式存在的，名字叫工作组）讨论，然后召集座谈会。地主们提出三个条件：甲、保守秘密；乙、不借给料子鬼^[3]；丙、秋后归还，由政府担保，然后当面写约。穷富之间，改善了关系。经过这些工作，同盟中也建立了秘密游击队小组和锄奸网。

(3) 榆次反毒救国会。这一组织，是伪区公所批准的，但完全在我掌握之下。各阶层都赞成，它真正在开展灭毒运动，同时在里边掩护了秘密工作。

(4) 榆次战斗生产合作社。这是接敌区的组织，土地、劳力以及民兵的武力，都算股份，按股分取收获物。

(5) 寿阳卖工队。接敌区青年组织起来，到游击区做短工，带着武器，敌人来了，就打，敌人走了，就种地，并且做宣传工作。这可能成为群众性的敌占区工作。

（6）今年夏季屯粮时，太谷敌占区群众分散地往山上送，遇见敌伪时，就佯向据点前进，并称给皇军送粮，一转眼，就又上了山。这样，一千五百石粮食不到一礼拜就都屯齐，而且都自己送上来了，未用部队掩护。

这样例子，各分区都有不少。

（五）民众团体问题：民众团体在减租减息之后，转为领导各界人民发展生产、文化、卫生方面，十分需要。惟保障农民佃权，调解人民纠纷，还仍是农会必须经常注意的事。在组织方面，太行同志认为这样一转，工、农、青、妇都可统一起来（或统一于农会），因为生产、卫生、文化等事业，没有系统分立之必要。惟文化教育上，还可以分开做。此点，他们亦未考虑成熟，只是一个初步意见。

（六）拥政爱民与拥军优抗两项工作，较前均有进步。去年冬季及今年年节，普遍进行了教育，军民都进行了反省。一般说来，太行军民关系，在减租运动后，即有进步，经过这个运动，更密切了。军队对群众态度比前更好。一般都积极参加了救灾、打蝗工作。节食救灾，自己生产，并帮助人民生产，都给群众影响很大，视军队为救命恩人。爱护军队的例子很多，参军热情很高。如武乡扩兵，每个新战士都带有民兵或农会的介绍信和鉴定表，即其一例。在进行生产运动中，部分队伍与人民实行互助，军队作战时，人民自动帮助军队锄草，这种例子很多。近九月来，民众不和的事很少听到。即有，多能相互原谅。对于抗属，政府一面动员帮助他们生产，建立家务，一面优抗工作，也做得比前切实。在社会上，抗属地位提高。投机抗属到军队来诉苦的人大大减少了。现在的缺点，在军队方面，违反纪律现象还未消灭。特别在生产运动中，还有占民众地者，有为改善自己生活向人民放高利贷者，也还有个

别违反政府法令者。在拥军方面，无论政府、人民，个别缺点均很难免，都不是什么大问题。

（七）军队轮番训练，非常必要。太行军队任务还是繁重，正规军数量也很不够。此次抽出四个团到太岳作战，抽出两个团向南发展，加之准备工作不够，故须整训时间略为延迟，大约十一月才开始，军区正从事准备工作。至于军队政治工作，的确吃了长期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的亏，政工缺点，较之任何部门特别厉害。这个工作尚未总结。谭政同志报告已开始引起前方注意。

（八）城市工作，我们及区党委均已讨论。北方局着重帮助太行积累经验，以帮助其他各区。太行区已确定抽出七个地委级干部以及其他一批干部来进行这个工作。最近准备召集一次城市工作干部会议，打通思想，总结经验，并拟定实施计划。估计这批干部下去时，可以干些成绩出来。余尚无可报者。

（九）今年大生产运动后，估计太行只能减轻人民负担百分之十，未江电业已报告，不赘。今年收成不坏，人民负担能力尚无问题。太岳历年负担比较太行轻得多，今年因百物昂贵，预算较过去还得增加一些。

（十）军队生活，现在比大灾荒时期略好。但仍只能吃小米一斤四两，七钱清油还吃不到三钱，用菜蔬弥补，勉强够吃。但从十一月起，生产品收入多，供给标准提高，即可大大改善，前电亦已报告。农民自麦收后，基本上已经渡过灾荒。今年互助合作运动都有开展。惟命令主义与形式主义还是严重。这个，尚待材料收好，再行报告。

关于根据地自给，在太行的困难是棉、盐两大问题。两项入口，年需一万万二千万元伪钞。准备明年扩大种棉地到十六

万亩，则可达到棉布百分之八十自给。盐非到外面买不可，但亦准备从冀鲁豫土盐找出路。其他工业品，大致可以自给。现从敌占区入口的，除棉、盐、布、火柴（火柴入口量不大）四项及军工、医药、电料外，其他几乎没有有什么入口了。

邓 小 平

八月二十四日

根据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二〇〇四年出版的《邓小平军事文集》
第一卷刊印。

注 释

- 〔1〕 即李先念、饶漱石、罗荣桓，邓小平、程子华。
- 〔2〕 指庞炳勋、孙殿英。
- 〔3〕 指抽鸦片烟的人。

毛泽东等关于在上海、杭州 周围广泛发展游击战争等问题 给华中局的电报

(一九四四年八月三日)

华中局：

关于如何使游击战争极广泛地发展到上海周围、杭州周围、沪宁路两侧，使沪杭两城及沪杭路完全在我们游击战争紧紧包围之中，以便加紧进行这些大城市工作并准备夺取这些大城市。再则如何使沿海的水手、从吴淞至沙市的长江水手及长江两侧各小河的水手尽可能组织起来，以便将来配合夺取大城市。以上两项工作请你们加以研究，分段分区给各地党与军队以一定的任务，努力争取完成。

毛、刘、陈^{〔1〕}

未江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注 释

〔1〕指刘少奇、陈毅。

衡阳失守后国民党将如何^{*}

(一九四四年八月十二日《解放日报》社论)

缅边中美联军占领密芝那的捷报，一会儿就被衡阳失守的不愉快消息掩盖过去了。守衡阳的战士们是英勇的。但是他们的努力没有人支援，因为我们政府和我们统帅部的不要民众与自愿放弃主动权的消极战略不能支援他们，人民虽然焦急万分，也无法自动去支援。

衡阳的重要性超过长沙，它是粤汉、湘桂两条铁路的联结点，又是西南公路网的中心，它的失守就意味着东南与西南的隔断，和西南大后方受到直接的军事威胁。衡阳的飞机场，是我国东南空军基地和西南空军基地之间的中间联络站，它的失守就使辛苦经营的东南空军基地归于无用；从福建建瓯空袭日本的门司，航空线为一千四百二十五公里，从桂林去空袭则航空线要延长到二千二百二十公里。衡阳位于湘江和耒水合流处，依靠这两条河，可以集中湘省每年输出的稻谷三千万石，还有极其丰富的矿产于此集中，这些对大后方的军食民食和军事工业是极端重要的，它的失守会加深大后方的经济危机，反过来却给了敌人以“以战养战”的可能性。

英美人士对于衡阳战役亦抱着很大的耽心。他们指出：衡阳比长沙更为重要。他们忧虑：如果衡阳失守，战争将会延

* 这篇社论经毛泽东修改。

长。他们忧惧大后方的经济危机。美国《基督教箴言报》警告道：日本现有进行其“首先击败中国”之象征（中央社纽约六月十四日电）。英国伦敦《泰晤士报》恐怕我国来不及等到滇缅路打通就被日寇打败，说：“得出打通滇缅路将是为时太晚这个结论，是何等悲观啊！”（路透社伦敦七月一日电）美英苏各报都再三呼吁把包围边区的五十万军队调去抗日。他们的重视这一战役，可想而知。敌同盟社承认，六月二十六日敌占衡阳飞机场后，陈纳德将军的第十四航空队，每日派了一百架以上的飞机助战，轰炸寇军，可见其行动之积极。

我国民众方面，更对这一战役予以充分的重视，而尤其重要的，则是提出了许多积极的主张。本报六月二十四日社论，指出了日寇此次犯湘，与以前的“活塞战法”不同，而是要“塞死这个抗战的瓶子”，指出了现在“万事齐备，只缺一个国民党政策的改变。我们希望国民党有一个改变，而且要快。如何变法？改消极抗战为积极抗战，改唯武器论为武器与人民相结合，改防制人民为依靠人民，改压迫民主为实行民主，改反对共产党为加强国共团结，改依赖外力打日本为以自己动手为主配合同盟国打日本。”这种主张，在全国各界各党派人们中都得到同情。除此之外，还有一个主张，就是河南人士提出的要求追究豫战将领的责任。

但是，我们政府当局的做法又是怎样呢？一言以蔽之曰：原封不动。军委会六月三日发表一周战况时说：“豫中战事，赖我忠勇将士之不顾牺牲，拼死奋斗，终使平汉路南北长达一百二十公里之距离，复归我军控制，敌寇未能遂其所愿。”当面扯谎，替豫战的败绩作掩饰，更不会去追究责任和研究任何经验教训了。六月十日又发表一周战况，把湘战初期日蹙国百里的败退描写为“我军节节阻击，虽尺寸土地，敌无不付予最

大之代价！”六月二十八日，梁寒操在外国记者招待会上，除了表功粉饰外，否认衡阳失守会使战事延长，他说“有人颇虑衡阳倘使失陷，将使战局延长一二年，吾人殊不能同意。”（中央社六月二十九日重庆电）七月十日，何应钦在中枢纪念周上说：“在全般战略上言，吾人实不忧敌人打通我平汉、粤汉两线之蠢动。”（中央社七月十日重庆电）真是非常写意之至！政府的措施中，没有一件是号召和组织民众起来参加保卫衡阳、保卫西南与西北的。西安国民党人竟在报纸上批评延安在联合国日纪念大会上数万到会民众所表示的保卫西安与西北的坚强意志，认为是“共产党的阴谋”。总之，一切大好河山，都由国民党包办，不要人民干与。可是国民党先生们呵，这些大好河山，并不是你们的，它是中国人民生于斯、长于斯、聚族处于斯的可爱的家乡。你们国民党人把人民手足紧紧捆住，敌人来了，不让人民自己起来保卫，而你们却总是“虚晃一枪，回马便走”。据说这是“磁铁战术”，实际则是永远抛弃主动权，永远不要人民的战术，人民已经看穿你们这个“西洋景”了。

我们的意见，归结起来只是这样：这次衡阳之战，再一次证明，没有政治上的根本改革，即使兵多，即使取得制空权，即使武器好，还是没有用的。情形依然与过去一样：“万事俱备，只缺一个国民党政策的改变。”本报六月二十日社论曾经说：“国民党政策若无根本改变，则前途的危险可以预见，战事必将继续失败，野战军必将更受损失，平汉、粤汉两路必被敌人打通，苏皖浙闽粤赣诸省必将为敌切断，大后方的抗战基地必将大大缩小，兵源财源必将愈益困难，国际地位必将日益低落，各种危机必将日趋尖锐。”这些话，不久就会应验的。

一切问题的关键在政治。一切政治的关键在民众，不解决

要不要民众的问题，什么都无从谈起。要民众，虽危险也有出路；不要民众，一切必然是漆黑一团。国民党有识人士其思之。

根据一九四四年八月十二日《解放日报》
刊印。

周恩来关于国共谈判问题 答新华社记者问

（一九四四年八月十二日）

（一）梁^{〔1〕}先生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国共关系已有改进，并将继续改进”。如果说去年十月国民党宣布了政治解决的方针而没有进行谈判，现在中共代表林伯渠同志去渝以后才开始了谈判的话，这样说，关系是比以前有了一点微小的改进。可是，梁先生又说：“谈判了三个月之后，国共问题已经有一部分解决了。”我可以负责声明，任何一个具体的即使是最微小的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举例如我们要求政府恢复渝延间、西延间电台通信，释放各地被捕人员，停止在报纸上对中共造谣污蔑的言论等事，都未见有任何解决，更不用说停止封锁边区、进攻八路军、新四军等事了。

（二）梁先生认为：“根本解决问题困难很多”，又说：“政府的观点和共产党的观点事实上并无严重分歧。”这完全是一种给国内外关心两党谈判人士一种错觉的说法。实际，双方在解决问题的原则上，有着很大的距离。我们从西安事变以来，即不断向国民党建议，只有立即实行民主，才能增强团结抗战的力量；只有循民主的途径，才能公平合理的解决国共关系与解决国内其他一切政治问题。我们拥护统一，是拥护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统一。我们拥护蒋^{〔2〕}委员长与国民政府，是要求他

坚决抗战与真正实行三民主义。这不仅是共产党一党的要求，而且是全国百分之九十九的广大人民的要求。但是，国民党统治人士与政府的观点，则完全两样，他们始终不愿意立即实行民主，至今仍坚持国民党的一党统治与限制、削弱和消灭异己的方针，用一种自大和武断的精神，只强调别人应无条件地拥护政府、拥护统一，而不许问这种统一是否对抗战民主团结有利。这就是现时双方谈判所以相距甚远的真正原因。

（三）梁先生又认为：“根本解决问题的障碍，是在于中共党人一方面宣称他们有意合作，但事实不然，他们所作的事情和他们的说话相反。”梁先生此话完全与事实相反。国民党所希望于中共的，是实行其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二日所宣布的四项诺言。七年来，我们已经切实的实行了，过去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这是有充分事实可以证明的。今年三月十二日我在延安孙中山先生逝世十九周年纪念大会的演说中，已经详细的说到了这点。但问题还是没有得到解决。根本解决问题的障碍，究竟在哪里呢？一句话，国民党统治人士及其政府始终固执其一党统治与拖延实行三民主义的方针，而不愿立即实行真正的民主，以加强抗战力量，以保证战后和平，这就是解决问题的障碍所在。

（四）梁先生所说的过去三个月政府和中共的谈判经过，也与事实大有出入。林伯渠同志五月二日到西安后，即与王世杰、张治中两先生作初步商谈。林提议以我在三月十二日演说的基本精神，即要在全中国实行民主政治，要循民主途径公平合理的解决国共问题为商谈的根据，张、王不愿，张、王主张先就两党目前有关的军事及边区问题商谈。对于编军数目，林提出现在分散在各敌后游击区的正规军四十七万七千多人，都是久经对日作战有成绩的部队，请政府立即予以编整。为了使问

题容易解决，请先给以六个军十八个师的番号，但张、王只主张编四个军十二个师。关于边区问题，张、王主张改为陕北行政区，直属行政院，实行中央法令。林提出区域及现行民主制度不变，实行三民主义。关于党的问题，林要求须予中共以合法地位，停止捕人，停扣书报，开放言论。关于敌后游击区的军事、政治、经济，服从国民政府及军事委员会的领导，但一切都应按有利抗战的原则来解决。关于撤除边区军事经济封锁问题，张、王允先对于商业交通予以便利等等。西安谈话主要内容，就是如此。林与张、王最后一次会谈时，商定将历次会谈双方意见整理成记录，双方签字，各报告其中央以备参考，然后由两党中央作最后决定，这个意思已在记录上注明了。林就在这个记录上首先签字，但王、张未签。记录既系综合双方谈话的意见而成，显非林之一方意见，且又未经双方中央所批准，自更不能作为预备协定。这是稍具常识的人都能明了的事，而梁先生却企图指鹿为马，混淆听闻，实在令人遗憾。

（五）五月十七日，林伯渠同志偕张、王两先生飞往重庆。二十一日，我党中央即有复示给林伯渠同志，嘱其向国民党中央提出关于解决目前若干急切问题的意见二十条。其中主要内容，关于全国政治制度者三条：

一、请政府实行民主政治与保障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及人身之自由。

二、承认中共及各爱国党派的合法地位，释放爱国政治犯。

三、实行名副其实的人民地方自治。

关于两党悬案者十七条：关于编军，为委曲求全计，请政府目前至少给予五个军十六个师的番号，并给以给养、军火、医药等接济。关于地方政府，请政府承认陕甘宁边区及华北、

华中、华南各抗日根据地民选政府为合法的地方自治政府。关于封锁和进攻我军问题，请政府撤消对边区及各抗日根据地的军事封锁与经济封锁，停止对敌后我军的军事进攻。关于盟国援助问题，请政府对同盟国援助中国之武器、弹药、药品、金钱，应按正当比例分配于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此外，尚有请政府通令取消“奸党”、“奸军”、“奸区”等诬蔑与侮辱中共、十八集团军、新四军与各抗日根据地的称号，停止特务人员对中共、十八集团军、新四军与各抗日根据地的破坏活动，停止在报纸上对中共的造谣，释放各地被捕人员，停止对《新华日报》无理检查，恢复重庆、西安两办事处电台，允许两办事处工作人员有往来渝延间、西延间的自由及在该两地居住与购买生活物品之自由等等。该提案于五月二十二日送交张、王。张、王以条文如此写法，无异暴露国民党之罪状，拒绝转呈政府。林为尊重张、王意见，转报我党中央请示。旋由我党中央复示，在文件上只写关于全国民主政治及编军、停攻、停封锁等十二条，而把请求政府停止特务反共破坏活动等八条改为口头要求，于六月五日送交张、王。张、王亦于同一时间将政府之提示案交林转告我党中央。但张、王仍拒绝向政府转呈我党提案，嗣经多日争执，张、王始于六月十五日复函称，已将我党提案转呈政府。按双方提案实有极大距离，在政府提示案中：一、关于我方所迫切要求解决的实行民主政治，承认各党合法，释放爱国政治犯，释放叶挺等被捕人员，撤消军事封锁与经济封锁，停止军事进攻，按比例分配盟国援华物资，停止特务活动，停止造谣诬蔑，恢复电台通讯，停止无理检查报纸，允许渝、西两办事处工作人员有走路自由及购买生活物品自由等项，一字不提；二、编军数目，只承认四个军十个师，且不顾抗战需要及敌后游击战争环境，要将十个师以外的数十

万军队，“限期取消”，并要将十个师“限期集中使用”；三、对边区政府只要求实行国民党中央政府之法令，不提实行三民主义，不承认为抗日所需要并且已经实行大见成效的现行各项民主设施与民主法令；四、对各抗日根据地人民选举的各民主政府，要求交还久已离开该地不知何往的所谓“各省政府”接管；五、要求取消各抗日根据地为着抗日需要而发行的必不可少的地方纸币。

由于两党意见距离甚远，我党中央曾邀请张、王两先生来延安商谈。林伯渠同志要求回延安报告谈判经过，以便我党中央根据其报告，对于政府提示案作正式之答复。张、王则称现正在请示中。三个月的谈判经过，就是如此。而梁先生竟谓：“中共并未回答政府条件，反而提出十七条对案，经过修改后改为十二条，这些条件和三个月前在西安谈判所同意的有显著不同。”这完全不合事实。事实上，我方提案在先，彼方拒绝接受，我方为委曲求全计，将提案二十条改为书面十二条、口头八条，于六月五日交付张、王，彼方提示案亦于同时交付林伯渠同志，并且我们已屡次表示政府提示案与我党意见相差甚远。且我党第一次提案是二十条，非十七条，后分为书面口头两部分，乃是我党中央为委曲求全而这样做的，并非“回答政府条件”。梁先生竟然抹煞事实，用意何在，殊属费解。

（六）梁先生最后说：“目前正在处于泯除蒋委员长的条件和共产党的对案之间的分歧”。我党也希望真能很快的泯除这种分歧。梁先生再三声言，肯定中国不会再有内战，这是我党所十分欢迎的。但可惜目前事实，尚与梁先生所谈不甚一致，例如：

一、在陕甘宁边区周围，即使在最近数月，亦尚有零星的袭扰情形。

二、在华北，自今年一月二十八日起，阎锡山的第六十一军即取得敌寇同意，最后更订了协定，从汾西地区渡过汾河，侵占汾东地区，向我决死队、八路军大举进攻，直至现在，还未停止。

三、在华中，国民党李品仙部队最近仍不断向我鄂中、皖中、皖东抗日根据地的新四军部队进攻，而这些部队正在为牵制敌人向我平汉、粤汉两路进攻而战斗着。鄂中根据地最近正因营救了两个美国飞行人员得到了美国空军第十四航空队陈纳德将军的谢函。

四、在华南，东江抗日游击根据地今年曾先后救出六个美国飞行人员，可是这个区域的东江游击纵队，于五月间又受到国民党军队罗懋勋部两千余人的进攻。

这些就是军事冲突并未停止、内战危机并未过去的证据。

总之，依照目前形势，要最后战胜日本强盗，国共两党必须团结，国共之间所存在的问题，必须从速解决。而这种解决，只有国民党的统治人士立即放弃一党独裁政治，立即放弃削弱与消灭异己的方针，立即实行民主政治，并从民主途径中，公平合理的解决国共关系，才能得到效果。我们共产党人，是以十分热烈的心情期待着这些的。

根据一九四四年八月十三日《解放日报》
刊印。

注 释

〔1〕指梁寒操。

〔2〕指蒋介石。

中共中央关于克服财政困难和生产自救问题给豫鄂区党委的指示^{*}

(一九四四年八月十二日)

豫鄂区党委：

未支电悉。

(一) 你处财经具体情况及灾荒情况，我们不清楚，望略告。

(二) 解决财政困难不外是开源节流。在开源方面除整理税收外，主要应是组织机关部队进行生产，即自己动手，克服困难。进行种菜、种粮、喂猪、喂鸡鸭、打豆腐、榨油、打鱼及采集各种山货和进行各种手工业生产，均可克服很大的困难。改善部队机关的生活条件，各地均有很好经验，望你们仔细研究。如果部队缺乏土地生产，即可在人民自愿条件下合伙，将部队劳动力和肥料加在人民土地上，因而对所增加的收获，部队能分得若干成。其次，适当的进行对外贸易，组织公营企业，亦可增加一些收入。在节流方面，则需彻底进行精兵简政，将一切不必要的人员马匹裁减，机关部队单位合并，组织编余人员去专门进行生产。其次，则为进行节省，减少浪费。至于根据地经济困难，则须执行正确的税收、金融、贸易

* 这个指示是刘少奇起草的。

政策，并动员人民来提高生产，才能解决。

(三) 关于灾荒问题，应坚决实行生产自救的基本方针，应提出生产救灾，大家互助，渡过困难，政府以一切方法保证不饿死肯自救的人等口号去动员组织党内的群众进行生产自救。应批评眼睛向上、专等政府救济，不自生产，坐吃山空等观点。目前应以一切方法，动员一切男女老幼部队机关去抢收秋禾，补种晚禾及番薯豆子等，特别应普遍大种蔬菜，采购各种蔬菜种子广为布种，并将蔬菜晒干，留作冬春食用。又须多种麦子菽豆等，以便明年春末能有收获。其次应普遍采用代食品，如可食之野菜、山花、山果等，储存糠秕瓜果皮及一切可以代食的东西，准备春荒严重时不致饿死人。再次，要防止灾区根据地粮食外流，向无灾区及敌友区购进粮食。政府应设粮食调济所，不使奸商操纵粮价，但不要限制粮价，以免引起黑市及粮食外流。对灾民应普遍实行以工代赈，组织一切待救济而又有劳动力之灾民开荒、开滩、开渠、打坝、打井及进行各种手工业等，并实行贷款、贷粮给灾民去进行商业运输，赚脚价及作小买卖等。如太行山贷给一家一斗粮食几斤棉花，令灾妇纺纱交公家收买，即可维持一家生活。又如贷给灾民一部粮食，路费，要灾民到敌区运粮来根据地卖亦可维持生活等。又要动员灾区各阶层人民实行广泛的互助互济，奖励私人亲友间的互助，表扬慷慨捐输者，推动士绅名流组织募捐及参加我们的各级救灾委员会。但须严格防止强价抢粮与吃大户等现象，因这将引起粮食隐藏，粮价高涨，市场停滞及破坏私人借贷与妨害生产等。还要妥善处理因灾荒而发生的各种严重社会问题，如家庭不睦、离婚增多、偷盗抢劫等，均将减低生产情绪。应进行调解，促进家庭和睦及建立群众防奸防盗公约，互助监督。对于敌区灾民，也应进行生产救灾的宣传，揭破敌人

制造灾荒的罪恶，并须防止敌人驱使灾民到根据地就食的阴谋。

（四）上述各项生产救灾工作，是很细密的组织工作和群众工作，必须深入下层，调查研究，吸取群众意见和经验，并经过群众的讨论和决定来进行，才能切实有效。粗枝大叶，官僚主义，则必扰民有余，救灾不足，必须教育各级干部改变这种作风。关于太行山救灾经验，准备整理后公开发表，望予注意。

中 央
八月十二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四册刊印。

欢迎美军观察组的战友们！

（一九四四年八月十五日《解放日报》社论）

美国驻中缅印军总司令部（即史迪威将军总部）所派遣的美军观察组，现在到达了延安。这是中国抗战以来最令人兴奋的一件大事。我们谨向远道来此的观察组全体人员，致热烈欢迎之忱！

我们欢迎美军观察组诸位战友，不能不想到美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光辉成绩，和美国人民见义勇为、不怕牺牲的伟大精神。不论在欧洲、非洲和亚洲，现在都有英勇的美国将士效命疆场，为解放法西斯铁蹄下的人民而流血战斗。在我们中国的抗日战场上，美国亦直接和我国人民并肩作战，成为最亲密的战友。在这个欢迎美军观察组朋友们的时候，我们向美国政府、人民、海陆空军将士及其英明领导者罗斯福总统，表示衷心的感谢。

美军观察组战友们的来到延安，对于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实有重大的意义。七年以来，近五十万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八千余万被解放了的人民，在华北、华中、华南三大敌后战场奋勇作战。很久以来，事实上敌后战场成了中国抗战的最重要战场。在这里，抗击了在华敌伪全部兵力的六分之五；在这里，几乎一切中国的大城市均被八路军新四军所围困；在这里，大部分的敌占海岸线均被我们控制了。这种情形，一向为

盟国朋友们所不明了。

在过去，在盟国政府与盟国人民方面，他们所了解的中国抗战情形，完全与上述相反。他们所得的印象是：中国抗战的主力军是国民党，国民党在抗战中所做的工作是最多的，大多数敌伪军由国民党所抗击，将来反攻日寇自然也是主要地依靠国民党。这些印象，直到现在还是统治着盟国朝野大多数人的思想的。

所以出现了这种完全违反事实的现象的原因，主要的在于国民党统治人士的欺骗政策与封锁政策。他们欺骗外国人，说国民党如何的努力在打日本人；实际则从一九三八年十月以后整整五年半时间，他们所取的政策，基本上不过是坐山观虎斗的政策；直至现在，除湖南与缅甸外，大多数战区依然还是如此。他们欺骗外国人，说共产党不但“不打日本人”，而且总是“破坏抗战、危害国家”的；实际则抗击敌伪军六分之五的，正是这个所谓“不打日本人”而又“破坏抗战、危害国家”的共产党；至于那个天天高叫“民族至上”的国民党，它总共不过抗击了六分之一的敌人而已。共产党既然一“不打日本人”，二又“破坏抗战”，三又“危害国家”，那国民党早就应该号召外国人中国人大批的前往共产党区域去视察，好去证实一下国民党先生们所说的并非撒谎。但是决不，反而封锁得铁桶似的。五年多的时间，一不许共产党发表战报，二不许边区报纸对外销行，三不许中外记者参观，四不许边区内人民自由来往。总之，只许国民党的丑诋、恶骂、造谣、诬蔑，向世界横飞乱喷，决不许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的真相稍许透露于世。只要看此次记者团访问边区，是经过怎样的艰苦奋斗才达到成行目的，就知道国民党统治人士一面尽情丑诋，一面却不许人来看，是什么一种挖空心思而又自相矛盾的想法了。

但是事实胜于雄辩，真理高于一切，外国人中国人的眼睛，总有一天会亮起来的。现在，果然慢慢地亮起来了，中外记者团与美军观察组，均先后冲破国民党的封锁线，来到延安了。这是关系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反抗日寇解放中国的问题，这是关系中国两种主张两条路线谁是谁非的问题，这是关系同盟各国战胜共同敌人建立永久和平的问题。国民党人说，“国共争论问题是中国的私事”，这不过是国民党人在抗日战争中所犯罪过的一块遮羞布。这块脏布之应该扔到茅坑里去，现在已是中国人外国人的公论了。

关于国民党的抗击不力、腐败无能这一方面，大半年以来的外国舆论与中国舆论，已经成了定论了。关于共产党的真相究竟如何这一方面，大多数的外国人与大后方的中国人，还是不明白的，这是因为国民党的反动宣传与封锁政策为时太久的原故。但是情况已经在开始改变。大半年以来的外国舆论中，已经可以看见这种改变是在开始。这次记者团与观察组的来延，将为这种改变开一新阶段。

由于来延外籍记者的报导，中国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和各抗日根据地的真相及其对于协助盟国抗战事业的重要地位，将逐渐为外国人所明了。下面的例子可以证明这一点。

七月一日的《纽约时报》，在其《中共领导下的军队是强大的》一文中说：“无疑地，五年以来，对于外界大部分人是神秘的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在对日战争中，是我们有价值的盟友。正当地利用他们，一定会加速胜利。”这篇文章是根据外国记者的报导而写的。

早在一月七日的《美亚杂志》，在其《作为反攻基地的中国游击区》一文中说：“许多军事当局的意见，认为如果边区的部队能得到充分的援助，这些区域可以成为缩短对日战争的

有力的反攻基地。”

六月十日的美国《星期六晚报》杂志，登载了美国名记者史诺的一篇题名为《六千万被忘掉的同盟者》的文章中，对于中国各个敌后抗日根据地和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略意义，有很精辟的见解。他说：“二月间，尼米兹上将宣布美海军拟在中国海岸上建立基地，以便从那里攻击台湾和日本。香港或广州或将首先为美军攻取。但是轰炸机由这些城市起飞到日本去，仍是遥远的距离。只是在更北面的地方，中国才是最接近日本。因此在那里的中国游击队，对我们有很大的潜在重要性。”

这些是从国民党遮天手掌的指缝中间透露出去的关于中共情况的反映。

现在不但外国记者团到了延安，而且美军观察组也到了延安。我们相信，该组的战友们一定会对此间情况，作周密的和深刻的观察，并对于双方如何亲密合作以战胜日寇，必能多所擘划。国民党想要永远一掌遮天，已经困难了。

我们预祝美军观察组的工作的成功。我们希望这一成功，会使美军统帅部对于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团结抗战、实行民主的政策，和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抗战力量，获得真实的了解，并据以决定正确的政策。我们希望这一成功，会增进中美两大盟邦的团结，并加速最后战胜日寇的过程。

根据一九四四年八月十五日《解放日报》
刊印。

中共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

(一九四四年八月十八日)

自五月底中外记者参观团来边区后，接着便有美军观察组十八人奉史迪威总部之命先后来延，并将分赴前方。同时美军第十四航空队亦派欧高士少校及一上士经五战区前往我鄂中五师地区，担任前线侦察。综合此种情况，中央特作如下通知：

(一) 由于我党政军民的努力和国民党统治人士的日益反动与无能，目前两个中国（新民主的中国和法西斯化的中国），在抗战营垒中的对照是更加明显了，这次外国记者美军人员来我边区及敌后根据地，便是对我新民主中国有初步认识后的实际接触的开始，因此，我们不应把他们的访问和观察当作普通行动，而应把这看作是我们在国际间统一战线的开展，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但须指明，这种外交现在还是半独立性的外交，因为一方面重庆国民政府还是中国人（我们在内）及同盟国所承认的中央政府，许多外交来往还须经过它的承认。但另一方面，国民党是不愿意我们单独进行外交活动的，我们与同盟国家只有冲破国民党种种禁令和约束，才能便于我们外交来往和取得国际直接援助，所以我们的外交，又已经是半独立性的。同时还须指明，外交工作正是我们工作中所最

* 这个指示是周恩来起草的。

不熟悉的一方面，我党同志首先是高级领导同志，应该对于这项工作开始予以注意予以学习。如果大家承认八年来国内统战政策，曾经给我们以极大的发展，那末，今后国际统战政策，将可能给我们以更大的发展。而且如果国际统战政策能够做到成功，则中国革命的胜利，将必增加许多便利，这是可断言的。

（二）国际统一战线的中心内容，是共同抗日与民主合作，这不仅在抗战中有此需要，即在战后也有此可能。就国家言，美苏英与中国关系最大，而在目前美英与中国共同抗日，尤以美为最密。美军人员来我边区及敌后根据地的理由，为有对敌侦察和救护行动之需要，准此可争取其逐渐扩张到对敌作战方面的合作和援助。有了军事合作的基础，随后文化合作，随后政治与经济合作就有可能实现。但目前不应希望过高，目前美英苏外交的重心仍是放在国民党方面，且就英美内部言，也有进步中间顽固三种势力存在，即在其政府中亦复如此，而英又较美为差。故我们对其政府及其来往人员不应看成一模一样，而应有所研究和分析，因之在国内统战中的策略原则，一般的也适用于国际统战。不过在目前且因外交原因，凡愿与我们来往的英美人士及其军事人员，顽固保守分子总还占少数，且其顽固又常常是只反对其国内共产党，而不反对我们者，故其情形又与国内顽固分子有别。因之我们外交工作中心，应放在扩大我们影响，争取国际合作上面。即遇顽固分子仍应诚恳说服给以好的影响。这次记者团中有一个天主教神甫本来对我成见颇深，但经我们争取，他即表示好感，拒绝国民党利用他反共的要求。

（三）国际统战政策，在目前最主要的应是外交政策，陕

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第二十一条是我党外交政策的总纲，目前实施原则，军事上，是在取得我们同意和遵守政府法令的条件下，同盟国的军事人员及其武装力量，可进入我们地区，执行共同抗敌的一切工作，并取得我们协助，同时我们也欢迎盟国给我军以军火物资药品和技术上的援助。政治上，我们欢迎同盟国在我边区及主要抗日根据地派遣外交使节，或设外交机关。文化宣传上，我们欢迎与盟国文化合作，欢迎盟国通讯社或其政府新闻处在延安设立分社，或派遣特约通讯员及记者来延，并给以至各地访问之便利，通讯的电信，政府在原则上不放弃检查权，但在实际执行时，凡非泄露军机造谣生事破坏政府者，我们概予放行，不予检扣，以示与国民党区别。对敌军民宣传，我们欢迎盟国合作并交换经验。在宗教方面，我们实行政教分离，我们容许外国牧师神父来边区及敌后根据地进行宗教活动，并发还其应得之教堂房产；同时这些神父牧师亦须给我们以不反对政府不反对共产党领导之保证。在救济方面，我们欢迎美英加拿大等给我们以医药器材和金钱的救济，同时我们更要求国际善后总署必须算人和承认这拥有八千多万人口，而且遭敌蹂躏最甚的地区的救济。在经济方面，在双方有利原则下，我们欢迎国际投资与技术合作，我们首先要求国际工业合作委员会的继续合作。这一切，就是我们目前外交政策的具体步骤。

（四）为使我们的外交政策和活动不犯错误，首先必须站稳我们的民族立场，近百年的中国外交史，中国人在民族立场上曾有过两种错误观念。在义和团事变前，排外的观念占上风，其后惧外的观念占上风。“五四”到大革命，惧外观念虽曾一度被民族高潮冲淡，但国民党当政二十年，即在抗战时

期，上层人士的惧外观念仍很浓厚，这不能不影响中国社会，故我们应一方面加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而不是排外，另一方面要学习人家长处，并善于与人家合作，但决不是惧外媚外。这就是正确的民族立场，也就是新民主主义中国的新人典型。这种新人典型，已经在敌后在边区广大军民中不断的成长，而且已为国际朋友所开始认识，我们新民主的中国人应该坚持着这样立场，不致有所偏颇。

（五）在外交工作本身，我们目前应注意的是：（1）一切应争取主动，切勿陷于被动，更不应有求必应，而应有所取舍，或有所轻重。凡我所能而且愿意使外人知道和参加的事，可由我主动的有计划的加以布置，即使是我们的要求，我们也可使其自动的先向我们提出，例如军火援助，国民党天天向他们噪咕，要这样那样，我们则暂不提起，反而引起他们的尊敬，向我们先提，虽然目前因国民党反对事实上还难办到。各地见到盟国人员，不可一见面就问他要东西。（2）我们执行政策，进行工作应坚定不移，事前应周知博访深思熟虑，但一经决定和宣布之后，便应力求贯彻主张，这样方易取得外交胜利，尤其是军事外交，更应肯定坚定，当然这是指原则性的问题。若在技术方面，则又应当极其灵活机动，不拘一格。（3）关于文件材料及谈话内容，可告者应力求真实，不可告者应力求隐蔽，其有关国家机密及党内秘密者应拒绝答复和供给，其不便答复者应避而不谈，或设法推开。（4）外交态度宜谨慎坦率，一方面勿失去警觉，另一方面勿吞吐支吾。（5）招待方法要守时守信，朴素热烈，一方面切忌铺张，另一方面也不可冷淡。（6）各地一切对外交涉和具体协商，统应电报中央批准后方得进行。

上述各项，凡有国际统战关系或外交工作的地方，均应向干部中传达，并进行讨论，以求一致遵守。

中 央
八月十八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四册刊印。

毛泽东关于认真布置 沪杭甬地区工作给张云逸、 饶漱石、赖传珠的电报

（一九四四年八月二十一日）

张饶赖：

未筱电悉，苏南有发展，甚慰。美军准备在中国登陆，要求和我军配合作战，五师地区美军已派人去，我们已许其设无线电网并供给情报，不久他们即将派人来军部并在上海及沿江沿海设无线电网，其目的不但目前便利空军轰炸，而且准备将来登陆作战取得配合。美军在中国登陆时间，据有些美国人估计已不在很远。因此，请你们认真布置吴淞、宁波、杭州、南京间，特别是吴淞至宁波沿海及沪杭甬铁路沿线地区的工作，广泛地发展游击战争及准备大城市的武装起义。一师及苏中苏南的党在此工作上应担负很大责任。

毛 泽 东

未马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毛泽东、刘少奇、 陈毅关于华中部队整训 给饶漱石等的电报^{*}

(一九四四年八月二十二日)

饶、张、赖^{〔1〕}：

十四日电悉。

(一) 华中部队整训应着重练兵、带兵、养兵、用兵四大项，而以练兵为中心。可参考张宗逊关于冬季练兵的总结报告。其中经验，打破陈规，采用兵教兵、官教兵、兵教官群众运动的练兵办法，是突破历史的新创造。华中各地，应令在职的团级及团级以上干部，有十天左右时间讨论这种练兵新法，使他们学会练兵，保证获得优异的练兵成绩。练兵内容，着重提高战斗技术，着重把投弹、射击、刺杀、土工作业四大基本技术练好。同时，在干部中还应讨论带兵，去创造新的管理方法；讨论养兵，去保证增加生产，改善待遇，增强体力；讨论用兵，去增强作战指挥方法。这四样是当务之急，能在一年内解决得好，我军战斗力可提高数倍，便利去应付战局变化的需要。开这种练兵会，或在军部开会，或在各地分组开，应就便去做，负责师、旅干部应亲自

* 这个电报的原稿是由当时在延安的陈毅起草的，经毛泽东审阅修改。

主持。

（二）关于培养团级干部，军部可办团级训练队，或称军事整风班亦可，吸收离职的旅、团级干部，并选一部优秀营级干部参加，时间不宜太长，课程可定为战术学、兵器学、筑城学、地形学、管理教育（带兵、练兵、养兵等军事行政事项）五大项，以提高干部的指挥艺术为中心。关于战术学习，最好采用总结过去战例的互相批评的整风座谈办法，就是要学生报告自己的作战经验，或提出若干问题让学生发表意见，举行辩论之后，然后加以总结。这种根据实践的启发式的具体学习，最合我军干部的需要。以前照本宣科的办法，既不易注入，且难切合实际。延安抗大，正准备冬季开办抗大教员训练班，先教好教员，四个月后再回去教学生，其课程也是上述几项。教员，此间无人派来，应由你们自己负责作教员，或在学生中培养和选拔教员，或即用学生教学生、发挥特长、学习特长的新办法，或就华中现有旧军人才，加以改造，作为教学助手。延安军教人才亦感缺乏，因此全靠你们自己负责去解决。

（三）关于特种兵人员，如工兵之类，可在各抗大开办训练班。关于使用新武器、掌握新技术等教育，目前暂不强调，如果我们把练兵、带兵、养兵以及战术基础，做得很深入巩固，到了有新兵器之时，再来学习使用，也来得及的。

以上提议，请你们按实况实施之。

毛、刘、陈

未养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三卷刊印。

注 释

〔1〕指张云逸、赖传珠。

毛泽东关于同国民党谈判 我军编制问题给林伯渠、董必武、 王若飞的电报

(一九四四年八月二十二日)

林董王：

(一) 长电悉，你们对时局分析及各项建议均很有价值，当加研究。其建议部分当分别处理。(二) 元电所述答复张王^{〔1〕}各点可照办。(三) 铣电所述军队问题，应作如下措词：为了准备配合盟国反攻，敌后四十七万军队不仅不能减少，而且应奖励他，装备他，增强他，政府首先应全部承认他的合法地位，承认其一部取消其大部的想法是违反抗战需要的，而且是办不到的。我们在建议书中是请求政府给予四十七个师的番号，所谓五军十六师是暂时至少数目，其余三十一个师仍请政府继续给予番号，决不是可以取消这些军队，也决不是不再请求给予番号。盟国援华物资一定要公平合理分配。这样说，和建议书原意是适合的。

毛 泽 东

未养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注 释

〔1〕指张治中、王世杰。

毛泽东给秦邦宪的信

(一九四四年八月三十一日)

博古同志：

此文^{〔1〕}改了一些，原拟发表，后觉改的与原文各部分颇不调和，故决定不发表，而请报馆另写一篇不涉及许多根本问题的文章^{〔2〕}发表了。关于原文不妥之处，我的意见如下：原文着重改造家庭，关于联系群众运动方面说的很少（即在已发表的那篇社论上亦是如此），而问题的重点，恰是使家庭改造与群众运动联系起来。这种群众运动，有当地的不脱离家庭的群众运动——变工队及合作社，自卫军及民兵，乡议会，小学、识字组及秧歌队，以及各种群众的临时集会；有脱离家庭、远离农村的群众运动——进军队（才有革命军），进工厂（才有劳动力市场），进学校（才有知识分子）以及其他出外做事等。民主革命的中心目的就是从侵略者、地主、买办手下解放农民，建立近代工业社会。“巩固家庭”的口号，只有和上述种种革命运动联系起来，才是革命的口号。农民的家庭是必然要破坏的，进军队、进工厂就是一个大破坏，就是纷纷“走出家庭”。实际上，我们是提倡“走出家庭”与“巩固家庭”的两重政策。扩军、归队、招工人、招学生（这后二项将来必多）、移民、出外做革命工作、找其他职业等等，都是提倡走出家庭，这个数目，在现在敌后战场是很大的，在战后也将是很大

的。剩下的男女老幼，才是提倡巩固其家庭。在内战时的兴国县，有些家庭，剩下来待我们巩固的，竟至占人口的少数。只要有一个大的时局变动，例如打下北平之类，我们居住的这个现在很少变动的边区农村家庭人口，也将有许多人走出家庭。实际上，不断地走出，不断地巩固，这就是我们的需要。所以，根本否定“五四”口号，根本反对走出家庭，是不应该也不可能的。

没有社会活动（战争、工厂、减租、变工队等），家庭是不可能改造的。襄垣李来成家的改造，正是在社会群众运动的大浪潮中才获得。农村家庭从封建到民主的改造，不能由孤立的家庭成员从什么书上或报上看了好意见而获得，只能经过群众运动。

此外，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工厂（社会生产，公营的与私营的）与合作社（变工队在内），不是分散的个体经济。分散的个体经济——家庭农业与家庭手工业是封建社会的基础，不是民主社会（旧民主、新民主、社会主义，一概在内）的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民粹主义的地方。简单言之，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机器，不是手工。我们现在还没有获得机器，所以我们还没有胜利。如果我们永远不能获得机器，我们就永远不能胜利，我们就要灭亡。现在的农村是暂时的根据地，不是也不能是整个中国民主社会的主要基础。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正是我们革命的任务。

以上，请给艾、陆、余^[3]三同志一阅。如有意见，请告知。

敬礼！

毛泽东

八月三十一日

又，我在改文中加上了解放个性，这也是民主对封建革命必然包括的。有人说我们忽视或压制个性，这是不对的。被束缚的个性如不得解放，就没有民主主义，也没有社会主义。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三卷刊印。

注 释

〔1〕指原题为《把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建立在家庭里》的《解放日报》社论草稿。

〔2〕指一九四四年八月二十五日《解放日报》就山西襄垣李来成建立新式家庭一事发表的社论，题为《发扬根据地新式家庭》。

〔3〕指艾思奇、陆定一、余光生。

中共中央关于建立城市 工作部门的指示

(一九四四年九月四日)

各中央局、各分局及五师：

(一) 你们接到已微中央关于城市工作指示后，对该项工作之具体部署及进行情况如何，望即电告。

(二) 地委以上各级党部须立即建立城市工作部，在党委与上级城市工作部领导下专门负责管理城市及交通要道工作，不兼其它任务。其负责干部，应根据城市工作与根据地工作为当前同等重要的两大任务之原则来配备，要真能负责指导争取城市及交通要道的千百万群众，瓦解伪军伪警，以准备武装起义之艰巨工作。上述干部决定后望即电告。

(三) 凡本地有城市或交通要道工作可作，或有可能进行其他区域城交工作之县委，应指定专人负责进行工作。

(四) 各地城市工作之进行情形及其经验教训和你们工作中所遇到的困难与新的问题，望随时报告中央城市工作部。

(请军部转一、二、三、四、七师及浙东)

中 央

九月四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四册刊印。

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满洲工作 给晋察冀分局的指示

(一九四四年九月四日)

晋察冀分局：

满洲工作之开展，不但关系未来中国之局面至巨，而且已成刻不容缓之紧急任务，因此特决定：

(一) 分局、冀中区党委和冀热区党委，各组一个满洲工作委员会，负责动员和领导一切可能的力量开展满洲工作。

(二) 三个委员会之工作分头进行，均直接受中央城市工作部领导，并与该部通报（应指定译电员负专责，冀热边冀中的电可由分局电台转）但分局与区党委，应用极大力量，给予指导和帮助。

(三) 如组织机构一时难以健全，可先指定一二得力干部负责，开始进行工作，再逐渐充实之。

(四) 人选决定后，望即电告。

中 央
九月四号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四册刊印。

中共中央关于提出改组国民政府 的主张及其实施方案 给林伯渠等的指示

(一九四四年九月四日)

林董王^[1]：

目前我党向国民党及国内外提出改组政府主张时机已经成熟，其方案为要求国民政府立即召集各党各派各军、各地方政府、各民众团体代表开国事会议，改组中央政府，废除一党统治，然后由新政府召开国民大会实施宪政，贯彻抗战国策实行反攻。估计此项主张国民党目前绝难接受。但各小党派，地方实力派，国内外进步人士甚至盟邦政府中开明人士会加赞成。因此，这一主张，应成为今后中国人民中的政治斗争目标，以反对国民党一党统治及其所欲包办的伪国民大会与伪宪。其进行办法为：

一、望你们在起草回答张王^[2]的信中加上此项主张，以说明这是我们对于实施民主政治的具体步骤和主张。

二、在这次参政会中，如取得小党派及进步人士同意，可将是项主张作成提案，即使不得通过或改变性质地通过，我仍可向国内外宣传，你们估计此次参政会能否提出此项提案，望即告。

三、龙与华^[3]商定的五条，可用，依其提议可由五方面代

表商谈。我党此项主张如同意，可从各方面进行推动，以代替攻守同盟之请，因为这在目前是不可能的。

四、下届参政会如扩大名额，我们提议重新加入救国会（如沈陶张史^{〔4〕}等），并增加文化人（如郭沫若、茅盾等），如愿增加中共名额，望先商定数目再商人选。

五、延安及敌后待你们致张王信稿到后，再定发表办法。

中 央

申支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四册刊印。

注 释

- 〔1〕指董必武、王若飞。
- 〔2〕指张治中、王世杰。
- 〔3〕指龙云与华岗。
- 〔4〕指沈钧儒、陶行知、张申府、史良。

为人民服务^{*}

(一九四四年九月八日)

毛泽东

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张思德同志就是我们这个队伍中的一个同志。

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

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精兵简政”这一条意见，就是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提出来的；他提得好，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采用了。只要我们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我们这个队伍就一定会兴旺起来。

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

* 这是毛泽东在中央警备团追悼张思德的会上的讲演。

一起来了。我们还要和全国大多数人民走这一条路。我们今天已经领导着有九千一百万人口的根据地，但是还不够，还要更大些，才能取得全民族的解放。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中国人民正在受难，我们有责任解救他们，我们要努力奋斗。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不过，我们应当尽量地减少那些不必要的牺牲。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

今后我们的队伍里，不管死了谁，不管是炊事员，是战士，只要他是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的，我们都要给他送葬，开追悼会。这要成为一个制度。这个方法也要介绍到老百姓那里去。村上的人死了，开个追悼会。用这样的方法，寄托我们的哀思，使整个人民团结起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刊印。

中共中央关于要求合理分配盟国 援华物资给董必武的指示^{*}

(一九四四年九月九日)

董：

一、根据黄山会议消息，赫尔利、纳尔逊来华任务及美军观察组在延表示，尤其是太平洋决战准备的加紧，使我们有利用此次机会向史迪威、赫尔利、纳尔逊提出援助我们之必要。

二、要求的理由和内容，为根据我军历年抗敌的战绩，今日抗击敌伪的比例（六分之五），我军所处的战略地位（敌后沿海及大城市附近交通要道两侧），我军的实力（五十万正规军、二百万以上民兵），和我军配合盟国军队作战的各种可能，以及国民党军队的连战皆败和衰弱无能，我军有充分权利要求同盟国将援助中国军队之武器、弹药、交通、卫生器材和金钱、布匹分其应得之部分给第十八集团军和新四军。基于上述诸理由，十八集团军和新四军应占全中国军队所接收之全援助数量的二分之一的比例。至少应得三分之一的比例。如最近所传美国政府愿依租借法案武装中国军队成为近代化的六十个师，则我军要求应被装备二十个到三十个师。

三、提出上项要求的办法，拟由你先代表中共及十八集团

^{*} 这个指示是周恩来起草的。

军、新四军欢迎赫尔利、纳尔逊两氏来延观察，如他们允来或史迪威另派将级军官来延，则由此间向其正式提出说帖，如他们一时无人来。则一方面由此间向包瑞德上校正式提出说帖，烦其转达史迪威及华盛顿统帅部，另一方面由你面见赫尔利、纳尔逊作口头陈述。

四、你依此进行情况如何望随时电告。

中 央

申青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军委关于建立联络机关的通令

(一九四四年九月九日)

各首长：

甲、目前我军的参谋工作，为了准备适应我军与同盟国家联合对日作战并取得外援，须严格整顿，并先加紧进行战略性的包括海陆空的情报侦察工作，及时报告军委，以便通报盟国友军，获得情报上更大价值，给日寇以更大打击，并为进一步军事合作建立初步工作基础。因此决定在敌后各战略基地的司令部，增设战略情报机关，定名为联络处，专门担负这一任务。

乙、联络处的任务是经常不断进行自己的战略侦察工作，但当着同盟国家派遣其军官到达我根据地时，我联络处应给予情报业务上的帮助，成为与盟军进行情报合作的机关。

丙、联络处的组织和业务规定如下：

(子) 军或师(或大军区)设联络处，某些师或旅(或某些小军区及某些分区)，于必要时得设联络科。为此工作的建立，特准在增设联络机关之司令部下，增加一副参谋长兼联络处长(或科长)，专司其事，并配置若干翻译人员。

(丑) 暂定在晋绥、晋察冀、晋冀豫，冀鲁豫、山东五个军区及新四军军部、李先念师部共七处各设一联络处，在胶

东、浙东、苏北、苏中、苏南、冀东、冀中共七处各设立联络科，在东江、琼崖两处得设小规模联络处，其工作须与军委取得联系。

(寅) 某分区应于某种业务的需要（如专门为了气象或目标等），得建立专为一种业务或兼管几种业务的联络站，如气象观察联络站等，在某些团于需要时得指派特派员，进行专门的情报业务。

(卯) 除此规定以外各军师（或军区）首长如认为某处有设立联络机关的必要时得呈报军委增设之。

(辰) 联络处下设：

A. 空军组，其业务是管气象报告，轰炸目标，轰炸效果，敌空军活动，地上救护，并管理本区内飞机着陆场。

B. 陆军组，管敌伪军陆上部队一切情报材料。

C. 通讯组，设一电台专门管理联络系统的上下级单线通报，并管地上交通单线通报的建立及其办法，交由三局另订之。

D. 爆破组，管侦察爆破目标，实行爆破指导，训练爆破干部。

E. 在滨海地区，设海军组，管中国沿海的海军需要的情报工作。

联络科组织与业务，可按照军师联络处的原则，由各机关首长依实际需要规定之。但各级联络机关，有其相互间的业务指导关系。

联络处、联络科及联络站的人数和人选，由各机关首长自定之。

丁、这是我们司令部一门新的业务，望各战略基地的军政

首长接此通令后，即着手进行和调整司令部的工作，并将工作情形随时电告。

军 委

申青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毛泽东、刘少奇关于同美军合作的 方针问题给张云逸、饶漱石、 曾山的电报

(一九四四年九月十日)

张饶曾：

齐电悉。美方对失事降落人员，一律须回后方，你处五人不能例外。机场筑好后，大批美军人员陆续飞来军部及各师，我们应表欢迎。一则美我配合侦察敌情，有利现时轰炸与将来配合作战；二则了解我情可争取军火援助，此点可能性很大；三则现时可打破国民党反宣传，将来国民党举行内战，新四军首当其冲，可争取美方赞助。虽可能引起日寇“扫荡”，但比较全局，利多害少。放手与美军合作，处处表示诚恳欢迎，是我党既定方针。

毛、刘
申蒸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林伯渠在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上 关于国共谈判的报告

(一九四四年九月十五日)

各位先生：

国民参政会主席团要我报告国民政府派张文伯、王雪艇^{〔1〕}两先生与中共中央派本人双方谈判的经过，本人对此感到十分兴奋。

国共两党关系应该公平合理的调整，在现政治情况下为十分紧要的事情，不仅参政会同人注意这一问题，全国人民也十分关切。我今天要报告的就是我们与张、王两先生四个月来谈判的过程。在这过程中，大致有七个重要文件，主席团已印发各位，可请参考。

这次谈判，本人从延安出来抱着满腔热诚，希望能够解决问题，并很高兴在西安与张、王两先生不期而晤，我们的谈判是在很友好的情形下进行的。迄今为止，我们双方的谈判在原则上存在着很大的距离。虽然我们的谈判尚未最后决定，但四个月来，还无结果可以报告。

谈判的重要问题

我们所要求于国民党中央的，第一个是全国实行民主政治

的问题。在今天民族敌人正深入国土，抗战尚在艰巨时期，必须全国军民团结一致，必须全国人民都动员起来，才能坚持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日寇是一个工业发达的国家，它是有力量的，它正在我国境内作最后挣扎，我们必须重视这一严重形势。中国有四万万五千万人民，战胜日寇的力量是有的，不过没有团结起来，没有充分的发动起来，今天非常迫切需要将这全部力量团结起来，发动起来。用什么方法来团结全国力量，来发动全国力量呢？我们认为应该在抗战中实行民主政治，只有民主政治才能团结全国一切力量，动员全国一切力量，以拯救我们民族国家的灾难。我们主张实行三民主义、抗战建国纲领和中共所提出的十大纲领，这三大纲领真正实行，就能团结全国力量。蒋^{〔2〕}委员长在抗战初期曾说过：“地无分南北，民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我党中央在抗战初期就主张实行民主，动员人民，实现全面全民的抗战，不应该是政府与军队片面抗战。我们对立即实施民主以增强全国团结抗战力量的意见，抗战以来是一贯如此主张，这次谈判也是这样提出来的。

其次，我们从国共两党关系上说，希望解决一些悬案。这些悬案主要是有关军队、政权与党三方面问题。我们在敌后抗战八年，军事政治形势有很多变化。在抗战初期，当时八万红军，政府只承认编了三个师，奉命出动，渡河入晋作战，并得到最高统帅部的命令，要我们组织些敌后游击挺进队，挺进敌后作战。我们自己来看，几年来在敌后艰苦作战，做得还好。十八集团军、新四军在晋、冀、察、热、绥、辽、鲁、豫、苏、皖、浙、鄂、粤等省敌人占领区作战，粉碎了许多伪组织，建立了许多抗日政权，使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能够飘扬在敌人后方。我们经过七年多的作战，正规军已增加到四十七

万七千五百人，并组织了民兵二百二十万人。我们要求政府先给我们五个军十六个师的番号。同时，我们在敌后已建立了十五个抗日根据地，人民选举了自己的政府，管辖了八千八百万人口。我们希望政府承认这些抗日民主政权，管理和指导这些抗日政权。在党的方面，我们要求政府给中共以公开合法的地位；对其他党派也是如此。我们希望政府撤销对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军事封锁与经济封锁，使边区的人员商旅能够有行动、交通、往返上的自由。

谈判的重要分歧

我们党向政府与国民党中央提出了这样的意见，国民政府曾有一个提示案给我们，张、王两先生要我们照中央提示案来办理。但这两者中间的差别距离很大，以至谈判到今毫无结果。本人现在仅略举几个较大的分歧之点来加以说明。

首先从军事问题来说，中共所领导的在敌后作战的正规军队四十七万七千五百人，八年来在异常艰苦的敌后环境，坚持与发展了华北、华中、华南敌后三大战场，抗击了绝大部分侵华日军与伪军，并成为将来总反攻的先锋部队。为了准备反攻的需要，政府应当奖励它，增强它，首先应该全部编成四十七个师才是合理。西安谈判时我提出请求政府暂编六军十八个师，张王两先生表示困难接受。我党中央六月四日提案请先给五个军十六个师的番号，而政府仍不愿答应，只允编四军十个师。

特别是政府提示案中的编余部队“限期取消”，及已编者“限期集中”二点办法，未能顾到抗战需要与敌后游击战争的

环境。因为这些部队是敌后不愿当亡国奴的人民组织起来保卫家乡的抗日武装，他们正是执行了蒋委员长“地无分南北，民无分老幼，人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的号召。限期取消就等于不要敌后人民抗日，把敌后解放区再交给敌人，这自然是不应该的。

再从对敌后民选地方政府的分歧之点看，敌后的各抗日政府，全是民权主义性质的。我们在敌后抗日根据地除汉奸外，一切人民和抗日团体均享有一切自由和权利，政府由人民选举，领导着敌后人民团结一致，坚持抗战，是有很大成效的。我们要求国民政府承认这些敌后解放区民选政府为其所管辖的地方政府，而中央提示案则要取消，这是从抗战利益上不可理解的。

再次，关于党派的公开合法地位，与人民言论集会结社身体自由的保障等问题，依目前情形而论，并未见有何改善。我们略举几例来谈：言论自由问题，政府已表示言论尺度放宽，而实际上我们敌后近几个月来打了不少大胜仗，攻克了很多县城，这战报每月呈送军令部，始终未能发表，送《新华日报》也是被扣。再如人民身体自由，政府自八月一日宣布实行保障的规定，但是实际上，我们一再要求释放叶挺将军，他既非共产党员，去新四军更为政府所劝请，不应该拘禁他。我们要求释放自香港沦陷返粤被捕的廖仲恺先生公子廖承志。此外还有很多政治犯身囚监中，我们也要求释放，但都未能做到。

七年前的四项诺言我党信守不渝

还有，张、王两先生给本人的信中也曾责备我党不实行四

项诺言，这一点也要加以说明。我们去年十二月曾在延安开会认真检查，检查结果更证明我们对四项诺言确实完全做到了信守不渝。譬如拿第一条：“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来说，我们对民族主义的实行表现在努力抗战、齐心协力打击日寇，以及对边区境内各民族平等地位的尊重上面；我们对民权主义的实行，表现在边区和敌后各根据地民选政府，实行三三制，保障人民言论集会结社身体等一切自由上面；我们实行民生主义，正表现在陕甘宁边区军队和机关的生产运动，减轻人民的负担，由前年二十万石公粮减到今年只征十六万石，我们不把公家的负担，全部压在老百姓头上。第二条：“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七年来我们坚守不渝。在农民与地主的关系中，我们是一方面保证交租交息，一方面实行减租减息；我们帮助私人工业的发展，并发展合作社，做到公私兼顾，公私两利。我们也早已实践了诺言，从无也从未曾想过要推翻国民党政权的事情。第三条：“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实行民权政治，以期全国政权之统一”，这在各抗日根据地已经切实在实行民权政治，我们并不曾另立中央政府，我们只要求政府承认陕甘宁边区与敌后各抗日民选政府为它所管辖的地方政府。我们是赞成统一的，中国也必须统一，但统一必须是民主的统一。第四条：“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日前线之职责”，我们对此也是实行已久，我们的军队在敌后艰苦作战的成绩就是证明。我们的部队几年来从未得到粒弹一饷的接济，而仍坚持敌后战争，拥护国民政府蒋委员长。凡此事实都足以说明我们已经实践了诺言。张、王两先生曾指责我们立法监察的不独立，但是我们在

司法方面已做到切实保障各阶层人民的人权、财权和地权等等，我们完全依靠人民来执行弹劾政府，所以我们那边绝少贪污渎职事件发生。

虽然双方的距离还如此远，可是本人可以再度声明：中国共产党是一贯坚持团结抗日方针，耐心的期待政府观点的改变。

谈判经过真相

现在，本人再来说明一下自西安到重庆与张、王两先生谈判的经过。自从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决议对国共关系采取政治解决方针以后，我们在延安听到了很高兴，非常赞成。因为自民国三十年新四军事件以后，两党关系很僵，我是参政员，也因封锁而不能出来。我们请军委会驻延联络参谋打电报出来，表明我们愿来重庆继续谈判，经政府复电同意后，本人因负边区政务，尚须布置春耕关系，直到四月底才能动身。在西安与张、王两先生一共会谈五次。本人初见张、王两先生，主要先请示政府的政治解决究竟是如何解决法？以及向他们报告边区情形。张、王两先生一再要我提出具体问题来谈，我当时提出以本年三月十二日国父忌辰日周恩来同志的演说作谈判基础，张、王两先生不赞成，他们提议先谈军事及边区问题。我认为也可以，因此先报告了中共领导下军队的数目，并问中央可以答应我们编多少？张先生要我讲，我说请先给六个军十八个师；张、王两先生认为太多，只同意四个军十二个师。以后又会商几次，到最后一次会面时谈话，商定将历次双方会谈意见整理成记录，双方签字，各报告其中央，由两党中央作最后决定。当时我就照我们双方原先约定的首先在记录上签字，但

张、王两先生未签。记录系综合双方意见而成，张、王信里说只是我个人意见，显然不是事实。

到重庆以后，我党中央即来电报提出二十项意见，由我于五月二十二日交张、王两先生，请其转陈国民党中央，张、王两先生认为有些条件这样提法无异宣布国民党罪状，不肯接受。本人为尊重张、王两先生意见起见，向我党中央请示，将二十条改为十二条，其余八条改为口头要求^[3]，由本人于六月五日送交张、王两先生，张、王两先生同时将政府提示案交给我，但对我党中央提案则不允收转，一直争执到六月十五日，才复信称已转呈政府，但解决办法仍照政府提示案不能变更，谈判遂呈僵局。

当时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梁寒操先生曾对外国记者发表谈话说，谈判停顿，中共要觉悟才好。有记者跑来问我，我于七月二日有谈话发表在《新华日报》，表示我党的态度是只要对于抗战团结与促进民主有利，我们都可商量。七月二十六日，梁部长又发表不合事实的谈话英文稿。我党周恩来同志于八月十三日^[4]发表谈话，说明谈判并无结果，并解释此事责任并非在我。但我党中央仍希望谈判能有结果，曾来电请张、王两先生赴延安继续谈判。张、王两先生说此事可以商量。两党谈判的经过情形大致如此。

挽救危局准备反攻应采救急办法

最后，我应当声明：中国共产党很盼望把问题解决，我们所提的意见都是正确的合理的，希望政府能一切从抗战民主团结利益出发，接受我们的合理要求。现在敌寇正在作垂死前的挣扎，我们中国的抗战要保持今天的国际光荣地位，要打败日

寇，要得到永久和平，都不能坐待盟友的奋斗，而需要靠我们自己的努力，需要团结与动员全国力量，才足以停止敌人的进攻及准备力量配合盟邦的反攻。我们认为，挽救目前抗战危机准备反攻的救急办法，必须对政府的机构人事政策迅速来一个改弦更张。这几天参政员诸先生的各项询问，也正说明了我们的机构的机构从人事到政策都有很多毛病，不能适合今天抗战的要求。因此，我坦白的提出，希望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统治的局面，由国民政府召集各党各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国事会议，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一新天下耳目，振奋全国人心，鼓励前方士气，以加强全国团结，集中全国人才，集中全国力量，这样一定能够准备配合盟军反攻，将日寇打垮。

根据一九四四年九月二十二日《解放日报》刊印。

注 释

〔1〕即张治中、王世杰。

〔2〕指蒋介石。

〔3〕口头要求八条如下：（一）请政府停止对于华中新四军及广东游击队的军事攻击。（二）请政府通令取消“奸党”、“奸军”、“奸区”等诬蔑与侮辱共产党、十八集团军、新四军及抗日民主地区的称号，此等诬蔑与侮辱的称号，过去都是暗中流行，近更公开见诸报纸。（三）请政府停止特务人员对于共产党、十八集团军、新四军及抗日民主地区的破坏活动，此种活动变本加厉，中共获有充分证据，如不停止，妨害团结，实甚且大。（四）请政府禁止在报纸刊物上发表对中共造谣诬蔑的言论，例如西安特务人员谓延安枪毙王实味等数十人，竟伪造王实味等亲友于三月二十九日在西安大开追悼会，在报纸上登载追悼会广告与追悼会经过，但王实味等确无所谓枪毙情事。似此完全造谣，有意诬蔑，应请飭令更正，并制止再有类似此等情事发表各报。（五）据确息西安一带特务机关，准备于外国记者到西北时，沿途伪装各种人物与伪造各种证件，向外国人告状，借达破坏中共信誉之目的。闻特务所捏造之中共罪状，共达十余项之多，似此不但阻碍团结，而且有辱国体，

请政府制止彼等伪装伪造。彼等如何布置，中共获有充分证据，如不制止，难免引起不快之后果。（六）请政府停止对重庆中共《新华日报》之无理检查（例如禁登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的作战消息，禁登中共文件等），破坏该报发行，实行威胁订户，扣压邮寄等事情。（七）请政府放还在三原被政府军队扣留，前英美援助十八集团军的药品一百〇一箱。（八）请政府允许恢复重庆、西安两处电台，以利通讯。

〔4〕这是谈话发表的时间。

延安权威人士评国共谈判

(一九四四年九月十九日)

此间权威人士顷就国共谈判经过及国民参政会派遣视察团来延一事，发表评论如下：

自林伯渠同志与政府代表张治中、王世杰两氏在西安开始谈判以来，已四月有半，在此长时期中，虽中共中央及其代表十分宽容忍耐，委曲求全，但由于政府方面对错误政策之顽固不化，对谈判缺乏诚意，玩弄手段，以致谈判毫无结果，任何一个具体问题，即使最微小的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现在谈判经过已在参政会报告，参政会并决议组织视察团来延，四个半月来之国共谈判由此告一段落，因之，可以把过去的谈判加以概括的评论。

四月下旬，林伯渠同志赴渝之时，正是日寇在中国大陆发动攻势之始。观乎历年来国民党之错误的误国政策：军事上消极观战，依赖盟国打日本，政治上专制独裁，经济上垄断专卖，文化上压迫钳制。中国共产党中央预见到中国抗战阵营在日寇新进攻之前，将遭遇到严重的军事失败及政治经济各方面的重大危机。为避免此项危险局面计，中共中央派林伯渠同志赴渝。中国共产党在谈判中之立场与方针，明显地表明于六月五日提交国民政府的意见书中，该书开头即说：“为克服目前困难，击退日寇进攻，并认真准备反攻起见，中共方面认为唯

有实行民主与增强团结一途。为此目的，中共希望政府方面，解决若干急切问题。……”从意见书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共对于局势的冷静清楚的认识，对国家民族的重大的责任感及大公至诚的态度。至国民党政府方面则相反，对于目前危局，熟视无睹，轻率乐观，对于贻国家民族于如此危急之局，毫无引咎自责之意。在整个谈判中，抱着自大与武断之精神，企图以国民党一党一派之私利，超越于民族利益之上，而强迫他人服从之。一看六月五日政府之提示案，就可知道。提示案没有一个字提到抗战（这是最值得注意的），没有一个字提到当前的艰危之局，没有一点表示改弦更张放弃误国政策之意。该提示案要把敌后抗战卓著功勋、抗击了敌伪军六分之五的武装力量的五分之四以上，“限期取消”。即是说，该案允编十个师，依国民党编制每师约一万人，不过十万人，其余三十七万正规军都要“取消”，而且要快快“取消”。试问这不是日本人的腔调吗？日本强盗千方百计用残酷的战争方法所不能“取消”的，现在经过国民党政府诸公一纸提示案，假如真正“取消”了，那岂不是要受到天皇陛下的头等奖赏吗？该提示案又要把由中国解放区人民民主选举出来的、与敌后人民血肉相关、甘苦与共、坚决领导抗战的民主政权，“一律由各该省政府派员接管处理”。但是这些所谓“省政府”也者究在何处呢？谁也不知道它们逃在什么角落里去了。它们究竟与人民及其艰苦卓绝的斗争有什么关系呢？如果有一天查明了它们的所在地，这些所谓省政府的老爷们，只应该给他们一种公平的待遇，就是“撤职查办”四个大字。何况还有许多卖国贼暗藏在这些所谓省政府里面呢？卖国贼庞炳勋、石友三不都是过去这类省政府的主席吗？至于委员们之投敌叛国者更不可胜计了。总之这个提示案只是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只是那些为着私利而忘掉国家民族

的人们之意旨的反映。说得明白一点，所谓提示案，正是今天一小群只图私党利益，不知民族大义的国民党法西斯分子之卑鄙意识的结晶，是每一个真正爱国者所不可能与不应该接受的，因为谁要接受这种提示案，就无异于帮助日本侵略者。

论到在谈判中双方的态度，中共方面一贯真诚与委曲求全，而国民党政府方面则夜郎自大，耍些无赖手段。他姑不论，即举中共中央意见书之提出而论，中共中央于五月二十一日电林伯渠同志提出二十条，二十二日林送张王，张王称“如此写法无异暴露国民党之罪状”，拒绝接收。中共中央得悉后，减为十二条，而以其余八条作为口头要求。六月五日，张王仍拒绝转达政府，经多日争执，始允转达。即此一端，足见中共中央为尊重对方代表之意见，不惜委曲求全，酌量减少了正式条文，而政府代表则充分暴露了无赖面目，因为如实转达对方之意见于所代表之机关，是任何谈判中充任代表者之起码的责任和义务，已经谈判而又拒绝转达对方之意见，这是任何谈判中鲜见之事例，此种态度，除称之为无赖或流氓手段外，无以名之。

此外，政府代表张治中氏及蒋介石氏本人在参政会中一再声言：“中央政府所求的只是军令政令之统一”（张）。“我们中央屡次表示只求军令统一政令统一”（蒋）。关于这一点，我们应该声明：我们是最坚决地拥护政令军令的统一的，但是这政令必须是代表人民意志的政令，这军令必须是有利抗战的军令。相反，如果这政令是引导国家走向法西斯暴政的政令，这军令是致使抗战失败的军令，则为任何中国的爱国者和民主战士所决不能服从，亦决不容许其统一的，中国人民是严肃地鄙视这种反革命的“统一”滥调的。问题的核心就在国民党政府

今天的政令军令正是这么一种东西，政令是法西斯的政令，军令是失败主义的军令。要用这么一种政令军令去统一一切，非特是缘木求鱼，而且如果统一了，那就会招致亡国大祸。远姑不论，即以谈判进行期间之事实为例，蒋鼎文、汤恩伯、胡宗南、薛岳，都是所谓忠实服从国民党政府的政令军令的，结果是不战而溃，或一触即溃，丧师失地，涂炭生灵，贻笑天下。反之，被国民党诬为“破坏军令政令统一”的八路军新四军，却在天天打胜仗，天天收复失地，这就是真正有利于民族国家的统一。这种鲜明的对照，证明了国民党政府“军令政令”之毫无价值。因之，今日欲谈军令政令之统一，必须彻底改变军令政令之性质。欲改变军令政令之性质，必须彻底改变现在国民党政府所执行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项政策，必须彻底改组政府与统帅部，把那些投降派、失败主义者、专制主义者与法西斯分子赶出去，由真正能代表人民利益的人去掌握政令军令，使其能代表全国各方面的力量及人民的意志。必如此方能真正挽救目前的危机及争取抗战胜利。必如此，方能谈得到军令政令之统一。必如此，军令政令之统一才与国家民族有利。关于改组现在抗战不力腐败无能之国民党寡头专制政府一点，林伯渠同志已于其在参政会报告中提出，可谓恰合时宜。林同志八月三十日致王世杰、张治中两氏信对于国民政府提示案之批驳，亦完全是合乎抗战、团结与民主原则的。延安人士仍希望张王二氏来延视察与谈判。至参政会推选之五位参政员^{〔1〕}来延视察，交换意见，是很好的，我们表示欢迎之意。

附：国共谈判双方来往文件

四个半月来国共谈判之经过，详情已见周恩来同志八月十二日与本社记者之谈话（本社八月十三日电）。八月上旬以来，谈判实际上已陷于停顿，虽中共中央代表林祖涵同志一再催询政府代表及约请张王二氏来延，但政府方面始终回避推延。政府代表张治中氏在参政会上之报告，与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梁寒操氏七月二十六日之谈话一样，对谈判经过歪曲事实，混淆听闻。关于此类歪曲意见，除周恩来同志八月十二日谈话所驳正者外，有林祖涵同志八月三十日致王世杰、张治中一函严予驳正。兹将此次谈判中，双方提出之两大文件及双方代表在八月间之信件，发表于后：

中共中央向国民政府提出之意见书

（此件于一九四四年六月五日由中共中央代表林祖涵面交国民政府代表王世杰、张治中）

国共两党合作抗战已历七年，中共谋国之忠诚，抗敌之英勇，执行三民主义，实践四项诺言，拥护国民政府及蒋介石先生抗战建国之始终如一，均为有目所共见。惟目前抗战形势极为严重，日寇继续进攻，而国内政治情况与国共两党关系，尚未走上适合抗战需要之轨道。为克服目前困难，击退日寇进攻，并认真准备反攻起见，中共方面认为惟有实行民主与增强团结一途。为此目的，中共希望政府方面，解决若干急切的问题。

题。这些问题，有关于全国政治方面者，有关于两党悬案方面者，兹率直牖陈如下：

（甲）关于全国政治者：

（一）请政府实行民主政治与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及人身之自由。

（二）请政府开放党禁，承认中共及各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释放爱国政治犯。

（三）请政府允许实行名副其实的人民地方自治。

（乙）关于两党悬案者：

（一）根据抗战需要，抗战成绩，及现有军队实数，应请政府将中共军队编为十六个军，四十七个师，每师一万人。为委曲求全计，目前至少给予五个军十六个师的番号。

（二）请求政府承认陕甘宁边区及华北、华中、华南敌后各抗日根据地民选抗日政府为合法的地方政府，并承认其为抗日所需要的各项设施。

（三）中共军队防地，抗战期间维持现状；抗战结束后，另行商定。

（四）请政府在物质上充分接济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自一九四〇年以来，政府即无颗弹、片药、文钱、粒米之接济，此种状况请予改变。

（五）同盟国援助中国之武器、弹药、药品、金钱，应请政府公平分配于中国各军，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应获得其应得之一份。

（六）请政府饬令军政机关撤消对于陕甘宁边区及各抗日根据地的军事封锁与经济封锁。

（七）请政府饬令军事机关停止对于华中新四军及广东游击队的军事攻击。

（八）请政府饬令党政机关释放各地被捕人员，例如皖南

事变时被俘的新四军官兵叶挺等，广东的廖承志、张文彬等，新疆的徐杰^[2]、徐梦秋、毛泽民、杨之华、潘同等，四川的罗世文、车耀先、李椿、张少明等，湖北的何彬等，浙江的刘英等，西安的宣侠父、石作祥、李玉海、陈元英、赵祥等，此等人员，均属爱国志士，请予恢复自由，以利抗日。

(九) 请政府允许中共在全国各地办党办报，中共亦允许国民党在陕甘宁边区及敌后各抗日民主地区办党办报。

以上各条，仅举其大且要者，中共方面诚恳希望我国国民政府予以合理与尽可能迅速之解决。诚以西方反希特勒斗争，今年可望获胜，东方反攻日寇，明年必可开展，而目前则日寇正在大举进攻，威胁抗日阵线，若我国共两党不但继续合作，而且能将国内政治予以刷新，党派关系予以改进，则不特于目前时局大有裨益，且于明年配合同盟国举行大规模之反攻，放下坚固之基础，愿我政府实利图之。

国民政府对中共问题政治解决之提示案

(此件亦于一九四四年六月五日由国民政府代表王世杰、张治中面交中共中央代表林祖涵)

三十三年六月五日，中央对中共问题政治解决提示案：

兹以林先生祖涵在西安所表示之意见为基础，作以下提示案：

(甲) 关于军事问题：

(一) 第十八集团军及其在各地之一切部队，合共编为四个军，十个师，其番号以命令定之。

(二) 该集团军应服从军事委员会命令。

（三）该集团军之员额，按照国军通行编制（由军政部颁发），不得在编制外另设纵队、支队、或其他名目。以前所有者，应依照中央核定之限期取消。

（四）该集团军之人事问题，准予按照人事法规，呈报请委。

（五）该集团军之军费，由中央按照国军一致给与规定发给，并须按照经济法规办理，实行军需独立。

（六）该集团军之教育，应照中央颁行之教育纲领、教育训令实施，并由中央随时派员校阅。

（七）该集团军之各部队，应限期集中使用。其未集中以前，凡其在各战区之内的部队，应归其所在地区司令长官整训指挥。

（乙）关于陕甘宁边区问题：

（一）该边区之名称定为陕北行政区，其行政机构称为陕北行政公署。

（二）该行政区区域，以其现有地区为范围，但须经中央派员会同勘定。

（三）该行政区公署直隶行政院。

（四）该行政区须实行中央法令。其因地方特殊情形而需要之法令，应呈报中央核定施行。

（五）该行政区主席由中央任免，其所辖专员县长等可由该主席提请中央委派。

（六）该行政区内之组织与规程，应呈请中央核准。

（七）该行政区预算，逐年编呈中央核定。

（八）该行政区暨十八集团军所属部队驻在地区，均不得发行钞票。其已发之钞票，应与财政部协商办法处理。

（九）其他各地区所有中共自行设立之行政机构，应一律

由各该省政府派员接管处理。

(丙) 关于党的问题：

(一) 在抗战期内，依照抗战建国纲领之规定办理。在战争结束后，依照中央决议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实施宪政，中共应与其他政党遵守国家法律，享受同等待遇。

(二) 中国共产党应再表示忠实实行其四项诺言。

国民政府代表王世杰、张治中致 中共中央代表林祖涵的信

(一九四四年八月十日)

自五月三日弟等与先生晤见于西安，往复商谈，至今已达三月。自六月五日弟等以中央政府提示案面交先生，为时已两月有余，迄今尚未得到中共方面之切实答复，此等情形超出弟等意料之外。政府在提出提示案以前，特命弟等赶赴西安与先生晤谈至两周之久，借以充分洞悉中共方面之意见，用意已见慎重。政府提示案之内容，不但对于去岁中共代表林彪师长所请求，基本范围已全部容纳，即对先生最近在西安所表示意见，亦已大部容纳。这是事实，只须将有关文件略予比较、分析，即可知。然立意政治解决既为中共所表示赞同，团结与统一又为中共所宣言拥护，弟等今兹实不能不敢请先生向中共主持诸公，剴切敷陈，促其接受政府提示案，并速予答复。至六月五日先生交来中共方面十二条意见，弟等于六月十五日业就政府指示及弟等观感，以书面送达左右，兹因先生一再敦促弟等为更详尽之答复，因将政府意见再为先生详谈之：

（一）十二条意见中之第一、第二、第三条，涉及实行民主政治，保证自由，承认中共合法地位与地方自治诸事。对于此类问题，政府提案中业已剴切申示两点，即在抗战期内励行中共暨一切党派所已接受之抗战建国纲领，在抗战结束后一年内实行宪政，予各党派以同等地位。但此种申示意义较为明确，亦较为具体。倘中共欲于此种申示之外，更标举若干毫无边际之抽象文句，如“实行民主政治”、“保证自由”等等，于事实究竟有何裨益，复为异日增加纠纷而已。盖“民主政治”云云，其他云云，中共过去或今日之所信，恐未必与国民党员乃至一般民主主义者之所信为一事也。兹愿与先生告者计有两点：

（1）中央政府之既定政策，曾在依抗战之进展，胜利之接近，与夫社会之安定，而逐渐扩大人民自治之范围，促进地方自治。

（2）政府希望中共于接受提示案后，随时提出关于励行抗战建国纲领之意见，并积极参加参政会及宪政实施协进会之工作，诚能如是，彼此之观点当不难渐趋一致，国家之真正统一与团结庶几可以实现，政治解决云者，其根本意义亦即在此。

（二）十二条意见中，涉及军队编制数额、军队驻地、医饷军械者条。十八集团军过去规定编制，原为四万五千人，政府提示案允许编为四军十师，确属从宽核定。带兵官自行扩编军队，其事原不可为训，且政府正励行精兵政策，一般军队，均在裁减单位，于此时期独允许十八集团军扩编为四军十师，自属委曲求全之至。关于军队驻地，政府亦正考虑至再，提示案一面指示集中使用之原则，一面规定在未集中使用前，受所在地战区司令长官之整训指挥，原则与事件实情兼顾。倘如中

共所提意见，抗战期间内军队防地，概为现状，试问中央何以计划反攻或指挥作战。至于军饷，提示案中业已允许第十八集团军享受与一般国军相同之待遇。军械之供给，政府当随时视反攻之需要与各军所负之任务公平合理分配。

(三) 十二条意见中，列有一条要求政府承认“陕甘宁边区”及“华北根据地民选抗日政府”。陕北边区问题，政府愿予考虑，并已于提示案中，提出十分宽大之办法，借以容纳中共之意见；至其他任何地区之行政机构，自当依照提示案之指示，由各该地省政府接管，以免分歧而杜流弊。

(四) 十二条意见中，尚有若干要求，或则与事实不符（如要求中央停止攻击中共某某军队），或则与事理不合（如对中央在陕北办报等事设定某某条例），弟等已向先生口头声明，兹不赘述。至于十二条意见中所提解除陕边之“军事封锁”与“经济封锁”及释放若干人犯两项要求，弟等已向先生口头声明，俟此次商谈获有切实结果后，当予考虑。总之，政府对于中共方面之意见，实已尽可能范围予以容纳。至于政府之根本意愿，则在军令政令之贯彻与统一。中共提出十二条意见书时，既未将服从中央军令与政令化作条款之内，即书面之引言亦未将中共对于此一问题之今后态度为剖切鲜明之表示，弟当时不敢转电者大意在此。嗣因先生口头声明谓：中共方面对于服从军令政令决无问题，弟等乃敢以先生之口头声明与十二条书面意见一并转陈政府，此又弟等亦愿附带郑重声明者也。尚此布达，诸希惠察。

王世杰 张治中

八月十日

中共中央代表林祖涵致国民政府代表
王世杰、张治中的信

（一九四四年八月三十日）

雪艇、文伯先生勋鉴：

八月十日来函，对敝党十二条意见所作之答复，于收到之后，即转电延安。以往返电码多有错误，校正费去一些时间。兹将敝党中央命弟奉复的意见，转告如后，敬请再转达蒋主席及贵党中央。

来函说：政府提示案已交给中共两月余，“尚未得中共方面之切实答复”，殊出先生等“意料之外”。并说：这个提示案，已能“大部容纳”中共之意见，内含有责备我方无理拖延之态度。应该声明，这是完全不合事实与错误的见解。因为弟已在屡次会谈中表示：政府提示案与我党已经提出的书面十二条及口头八条，在原则上相距太远，无法接受。比如在政府提示案中：

（一）关于我方所恳切要求解决的实行民主政治，承认各党合法，释放爱国政治犯，释放叶挺等被捕人员等项，一字未提。

（二）编军数目，只承认四个军十个师；且不顾抗战需要及敌后游击战争环境，要将十个师以外数十万正在抗战的军队“限期取消”；并要将十个师“集中使用”。

（三）对边区政府，只要求实行国民党中央政府之法令，不提实行三民主义，不承认为抗日所需要并且已经实行大见成效的现行各项民主设施与民主法令。

（四）对抗日根据地人民选举的各民主政府，要求取消。

由于两党意见距离如此之远，但敝党中央仍不愿谈判停顿与破裂，曾命弟邀请两先生去延安商谈，或要弟回延报告谈判经过，以求获得继续商谈之途径，使问题终能“有利抗战团结，有利促进民主”的原则，而得到合理解决。两先生对于延安之行，已称在请示中。弟之回延，亦希望能于旬日内实现。

国共两党关于全国政治问题及两党关系之谈判，并非自这次弟与两先生谈判开始。远自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来，六年之间，敝党曾不断向国民党建议，只有立即实行民主，实行孙中山先生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所提出的革命的三民主义，才能增强团结抗战的力量；只有从民主的途径，才能公平合理的解决国共关系与解决国内其他的政治问题。我们拥护统一，是拥护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统一。我们拥护蒋委员长与国民政府，是要求他坚决抗战与实行三民主义。这不仅是共产党一党的要求，而且是全国百分之九十九的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为了求得国民党中央政府能够接受敝党的建议，接受全国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敝党于民国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二日的宣言，曾提出了保证实行四项诺言。八年来，这四项诺言我们早已完全实践了，而且至今还在实行，这是有充分事实可以证明的。今年三月十二日，我党周恩来同志在延安孙中山先生逝世十九周年纪念大会的演说中，已经详细的说明到了这点，可以参考。八年来，敝党中央又不断派弟与周恩来、董必武、林彪诸同志，耐心的向国民党中央政府请求解决全国政治问题与国共关系问题。周董两同志驻渝已有数年，始终未能得到结果。究竟根本解决问题的障碍在哪里呢？不能不指出：由于国民党中央政府诸公的观点，和我们及全国广大人民群众的观点，有着很大的距离。政府负责诸公，始终不愿意实行孙中山先生的

三民主义及足以团结全国各党派各阶层抗日力量的民主政治，这就是现时双方谈判所以相距甚远的真正原因。

我们希望国民党中央政府在解决全国政治问题与国共关系问题上，应把整个国家民族的利益放在第一，而不把一党一派一己的私利放在第一，应从有利全国团结抗战，有利促进民主的观点出发，而不应从维持一党统治的方针出发，才能使双方的谈判易于接近，才能使一切问题可以得到公平合理的解决。但是政府提示案及两先生八月十日来信，可惜均不能符合这些期望。比如：

（一）关于全国政治制度问题。我们所提出的三项要求（一、请政府实行民主政治与保障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及人身之自由；二、承认中共及各爱国党派的合法地位，释放爱国政治犯；三、实行名符其实的地方自治），正是反映今天全国人民最迫切的要求，正是今天为着团结全国力量，认真准备反攻，必须立即实行的措施。如能这样做，不仅对整个国家民族有利，而且对国民党也是有利的。然而两先生来信，仍坚持“中央之决定政策”是要在抗战以后才能实行宪政，实行民主。批评我们所提民主要求为“毫无边际之抽象文句”，认为于实行无其益，“徒为异日增加纠纷”。但照我们的经验，在敌后那样的艰苦的环境中，人民尚能进行普遍讨论国事，选举抗日政府，实行地方自治，哪有大后方反不能实行民主政治的道理？因此，一切问题，都看国民党有无准备实行民主政治的决心和诚意。如果有，就应该在抗战期中立即实行宪政，而不推在抗战之后。

（二）关于中共所领导的四十七万七千正规军队之编制、防地与饷械问题，如果从这个军队过去抗战的成绩与今天准备反攻的需要来说，他们在八年来的敌后艰苦作战的环境中，坚

持与发展了敌后三大战场（华北、华中、华南），建立起许多强固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解放了八千八百余万的人民，组织了二百二十余万的民兵，抗击了侵华绝大部分的敌军与伪军，并成为将来总反攻的先锋部队。为了准备反攻的需要，政府应当奖励他，装备他，增强他，首先就应当全部承认他，才为合理。我们在建议书中请求政府“编为十六个军，四十七个师，目前至少给予五个军十六个师的番号”，是为着谈判更容易接近。关于防地在抗战期间维持现状，及盟国援华物资请求公平合理分配等，这是配合抗战需要与无可非难的。而政府提示案的“限期集中使用”的办法，是未能顾到抗战需要与敌后游击战争的环境。两先生八月十日来信中强调反对带兵官“自己扩编军队”与反对军队防地维持现状，责备我们不守军令的统一。但两先生恰恰忽视了一件平常人都懂得的真理，这就是今天我们中国是在抗战中，我们所扩编的军队，是在沦陷区，发动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人民组织起来的人民抗日武装，我们的防地都是在敌后，从敌人手里解放出来与坚持敌后抗战的根据地。如果我们反对在沦陷区发展人民抗日武装，或企图削弱消灭这个抗日武装，以及想使敌后解放区的人民抗日武装从该地离开，这一切，都会在客观上成为有利于敌的。

（三）今天陕甘宁边区政府及华北华中华南敌后各抗日根据地民选抗日政府，其所实行的一切，完完全全是革命的三民主义。坚持敌后抗战，就是实行民族主义。抗日政权，完全是民权主义性质的。我们各抗日根据地，除汉奸外，一切人民和抗日团体均有一切自由和权利，并行使直接民权，组织三三制的地方政府。我们又实行劳动互助，生产节约，救灾开荒，减租减息，精兵简政，普及教育，拥政爱民，拥军优抗，减轻人民负担，改善人民生活等政策，更无一不合乎民生主义的原

则。由于我们在边区及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彻底实行了三民主义，所以能团结全体人民，克服一切困难，长期坚持抗战，并可以有力量组织反攻。像这样的抗日民主政府，就应当承认他成为合法的地方政府，就应当给他们以地方自治的权利。像这样政府已经实行大见成效的各项民主设施与民主法令，就应加以奖励、提倡、推行于全国。这才是真正奉行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的国民党中央政府所应采取的态度。但政府提示案及两先生八月十日来信，对边区政府，只要求实行国民党中央政府之法令，对各抗日根据地人民选举的各民主政府与各种有利抗战的民主设施，则要求取消，也是不利于今天敌后抗战的需要的。

总之，促进目前形势，要最后战胜日本强盗，国共两党必须团结，国共之间所存在的问题必须迅速解决。而这种解决，只有国民党诸公立即实行民主政治，并从民主途径中公平合理的解决国共关系，才能增强全国团结抗战力量，才能使一切走上轨道，才能停止目前敌人进攻，实行将来的全面反攻，也才能建立战后的国内和平合作与国际和平合作的关系。我们共产党人是以十分热烈的心情来希望国民党当轴在民主与团结的基础上迅速改变其旧有的政策，才能打开目前政治上的僵局与完成盟国共同期望的神圣事业。我们这里绝没有乘国民党形势不利而提出什么过高的要求，更没有利用国民党处境困难而拖延不愿解决（有些无知的人正在如此散布谣言），所有一切，都是为了争取全民族抗战胜利必须实行的东西。

我们在爱护、帮助国民党进步，而不是在冷眼坐视国民党的困难，耿耿忠言，定为国民党贤达所鉴察。希望两先生将上述意见，再向蒋主席及贵党中央转述。时乎不待，望早决策。我们共产党人始终忠实执行四项诺言，忠实实行三民主义，坚

持民主团结，与政治解决的方针，以期待国民党中央政府的回答。敝党中央所提邀请两先生赴延安继续谈判一事，不仅表示敝党不愿使谈判破裂之诚心，而且想使国民党中央政府的重要负责人员亲到边区看看，我们是怎样忠实实行四项诺言与彻底实行三民主义，我们在边区及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的各种建设，是很可以为全国实行民主参考的，想因此使双方谈判更易得到解决。未识两先生对此已商得政府及贵党中央同意否？盼能早复。敬颂勋祺。

林 祖 涵

根据一九四四年九月二十日《解放日报》
刊印。

注 释

〔1〕指冷遹、胡霖、王云五、傅斯年、陶孟和。

〔2〕即陈潭秋。

延安观察家评国内战局

(一九四四年九月二十一日)

最近中国两个战场的军事情势，尖锐地揭破了国民党当局所谓“军令统一”的实质是什么。在完全由国民党统帅部所指挥的正面战场，自本月二日湘敌进陷常宁后之十二日间，先后失去湘桂路沿线的祁阳、零陵、东安、新宁、道县、资源、全县七城，湘桂路正面的桂林与侧翼的邵阳，均已岌岌可危。同时期中，广东敌自西江与雷州半岛两路侵陷高明、四会、肇庆、开平、新兴、廉江六城。目前自道县南犯之敌，已窜抵湖南最南部之江华、永明。由西江北犯之敌，则已进陷广西之怀集、信都。两线相距已不满一百二十哩。此种日丧一城之可耻失败，即今日所谓“服从军令”之代价。当盟国在海上竭力准备进攻菲律宾与中国海岸，在陆空竭力加强滇缅运输与轰炸日寇占领区及其本土之际，重庆腐败无能的统帅部乃竭力造成自己的危险与盟军的困难，而给予日寇以重要的有利阵地与拖延失败的机会。盖西南战场失败的严重性，首先尚不在丧师失地之巨之速，而在其战略的结果。广西的危急，意味着日寇可能由此而敲昆明甚至重庆之大门。另一方面，日寇所最畏忌的盟国空军，亦因湘桂形势的急速恶化而丧失了重要的阵地，且继续感受国民党恶劣军事指挥的危害。退一步说，敌人即使仅仅打通其横贯中国之交通线，并将中国切为两半，此对反攻日寇所造成的不利，亦即不可胜计。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上的两次

演说，没有一个字道及如何挽救当前的危机，或如何改变造成此危机之统帅部的方针与成分，徒然一再强调其阻碍抗战胜利的所谓军令统一。殊不知所谓军令统一一语，诚如参政员王云五、胡霖两氏所说，“原是不成问题的”，成问题的只是用什么军令去统一。如必以今日失败主义的军令来统一全国，则无非欲全国军队均向过去的河南战事与现在的湘桂战事看齐，同归于尽，而后甘心。这种亡国心理除了帮助敌人，阻碍胜利与引向失败之外，不能有任何别的东西。

试一返观被国民党诬为“不服从军令”的敌后战场，则情形完全相反。这个战场的人民军队，在八九两月中，连续获得了重要胜利。山东的八路军，在八月下半月与九月上半月中，连克五城，即旧黄河口的利津、乐陵、临邑，胶东半岛尖端的文登和山东东南部的沂水，山东西南部的郟城战役，解放村镇六百余，山东东南滨海区的反“扫荡”战役，歼灭伪军陈三坎一旅，尤与正面战场的日失一城成一极鲜明的对照。此外，沿海各省亦均有许多胜利，如河北八路军攻克北平城北十六哩的高丽营，攻入北平东南的青云店与西南的长辛店，以及沧州、雄县、深泽的县城和易县、徐水的城关；活动于南京、上海、宁波三角地带的新四军，攻克南京西南十六哩的六郎桥，长江北岸的石庄、张黄港、新生港，攻入太湖西南岸的长兴及南京长兴间的溧水、溧阳三城与宁波的近郊，广州附近的东江纵队，亦攻入广州市郊的龙眼洞。仅就沂水、文登、郟城、长兴四次胜利统计，解放的国土即达一万四千方里，或约一千五百方哩。由于敌后最近的连续胜利，中国解放区的人口总数已由八千六百万增至九千万以上。如果所谓军令，是要抗日，要胜利，则敌后战场实为执行抗战军令的模范。但是若国民党所提议的必须将这种有效抗日力量“取消”五分之四，亦即将收复

的失地、解放的人民和俘获的人枪送还敌伪五分之四，才叫做“服从军令”，则这种所谓军令也者不过是天皇陛下的走狗们所发的叛卖民族利益的卖国军令，中国人民将起而惩治这些实际上的卖国贼，决不许其逍遥法外。

综观中国两个战场的最近情形，可以清楚看出，正面战场的中心问题是立即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各人民团体各地方抗日力量的紧急国事会议，立即废除国民党的寡头统治，彻底改组国民政府及统帅部，立即将一切卖国贼、投降派、失败主义者、专制主义与法西斯分子全部驱逐出去，并交付人民惩办，由代表抗战利益与人民意志的人们去掌握政令军令，才能阻止敌人前进，挽救国家危局。至于敌后战场的中心问题则是加强武装。在这里，完全应该按照共产党抗击敌伪军六分之五，而且天天打胜仗，国民党仅仅抗击敌伪军六分之一，而且天天打败仗这种事实，共产党应得盟国援助品的六分之五以上，国民党最多只能得六分之一。而且不能由国民党分配，因为它已无资格做这些事了。如果政府与统帅部不改组，则六分之一的物资交给国民党亦应考虑，因为国民党应负丧师失地与阻碍同盟国胜利之责，把任何一件武器交给他，适以资敌。

根据一九四四年九月二十三日《解放日报》
刊印。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关于 民兵工作的指示

（一九四四年九月二十六日）

一、目前我民兵总数虽号称二百万，但真正名副其实的民兵实不到此数目。各根据地的民兵工作是不平衡的，现在民兵质量一般还不够坚强，不够巩固，而有些地区还必须扩大现有民兵数量，要求民兵发展到总人口百分之三的比例（各地区因工作基础及客观条件的差异，得略高或略低于此比例的规定）。以我整个根据地现有九千万的总人口来看，我们应有三百万左右的民兵，这是今天我们可能与必须做到的数目。但今天我们的中心工作，一般应放在巩固与提高现有的二百万民兵上面，加上新的发展，如果能很快有三百万左右真正起民兵作用（不是一般自卫队作用，一般的自卫队必须有几千万的数目才是，有些地区忽视一般自卫队的工作是不对的）的民兵，那我们就解决了一个重大的问题。即由于目前国民党的严重军事危机，抗战形势发生了大的变化，在美国的帮助下，我八路军、新四军相当大的一部正规军与游击队，会抽出来接受新的装备和训练。这样，敌后游击战争的坚持，势必更多依靠民兵的力量，有了三百万强大的民兵，在坚持斗争上才不会发生困难。更重要的是为了将来的反攻，必须准备扩大现有的正规军，如照现有数量扩大一倍，就势必要从民兵中提补五十万，而当百万正

规军在前线作战时，没有二、三百万的民兵做补充前线的预备兵，那是很成问题的。如果我们今天已准备好了这一着，将来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

二、因此，今天我们必须要在思想认识上和工作布置上，充分地把握上述新的形势与任务。认为民兵就仅仅是民兵，不能有其他作用，不积极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教育民兵，使民兵逐渐提高成为熟练有节制性的兵员；而始终满足于民兵在群众武装自卫的那种散漫和落后性上，那是不正确的。但要健全民兵的组织生活，加强其教育训练，来提高民兵，增强其节制性，使之能变成正规军的广大预备兵员，也是不能用有损害和削弱民兵作为广大群众性的武装组织这一固有特性来达到的。反之，要更好地发挥民兵作为乡村保卫者的作用，切实使民兵将战斗与生产结合起来，使民兵更加成为广大群众性的武装组织。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积极提高民兵，取得我们需要的大量预备兵员。在这一问题上，要反对只看到群众的落后与保守的一面，不去积极设法提高民兵的观点；也反对不照顾群众当前的要求与觉悟程度，主观地一下子就想把所有民兵造成为马上能够动员到正规军的预备兵员的念头。正确的是：在确定了这个方向后，依靠我们积极的耐心的实际有效的工作，去争取尽快的实现。

三、加强对民兵的训练，是巩固与提高民兵和变民兵为我有组织有训练的预备兵很重要的一个工作。这在中央的练兵指示中，其方针与具体办法都已提到，在此仅补充这样几点意见：

（一）对民兵的军事训练，过去多半是无计划的自流的进行的，同时与自卫队训练没有什么分别。现在应建立对民兵经常有计划进行训练的制度，集训与平常的训练应很好的配合，

军事要求应比一般自卫队要高一些。

(二) 集训民兵时，在军事上应着眼于军队集体生活行动与遵守纪律习惯的养成，和教育一些简单班、排、连战斗动作。因此根据地边缘地带的民兵，虽有很好的打游击战的实际训练，也应有计划地抽调参加此种集中训练。至于内地区民兵，应多进行些集中训练（不妨碍生产的大集训外的小集训），必要时可带至前线地带做实地打游击的演习。

(三) 民兵的政治的与文化的教育训练，应很好地配合军事训练进行。因为民兵究竟还是民兵，不是营兵，要想以严格的军事训练，把民兵训练得很好，一动员到正规军中便等于老兵，那是困难的。我们应多从政治上来补军事训练之不足，什么时候都可以动员，能如此，到正规军后，提高其军事技术是容易的。民兵的文化教育也须引起注意。这不仅因为提高政治需要借助于提高文化，同时为迎接我军将来实行新的装备与训练时，亦大大需要提高文化知识，预做准备。

(四) 要使民兵的教育训练能很好的经常的进行，应使正规军与游击队与民兵建立很好的教育训练的联系制度。正规军与游击队在哪一地区，就应负责对那一地区的民兵进行教育训练，还应经常有计划的把民兵分批轮流，带到自己部队内参观或随着行动，以师傅带徒弟的方法，耐心地帮助民兵学习和使之了解与习惯于军队生活。这不仅容易使民兵军事动作熟练，战斗力提高；更重要的是这样一来，可大大减少其农民的落后保守性，民兵与军队的感情会弄得更好，给将来动员为正规军时打下了很好的基础。过去有些军队干部因为民兵不准做补充队伍之用，对民兵帮助便不积极的现象，必须立即克服。

四、巩固与提高民兵，建立民兵中的政治工作，应成为很

重要的课题。过去一般都注意不够，现必须用大力来建立。首先确定村支部，特别是边缘区的村支部，应把建立民兵政治工作做为自己的中心工作。支部书记兼任民兵中队指导员（内地区的村支部，必要时可设一副支书任指导员），以保证党对民兵的领导。同时，只有使支部成为民兵政治工作的领导组织，要求“党员军事化”，动员最好的党员到民兵中去才有可能。而要使民兵坚强有力和实现预备兵的任务，民兵中一般应有强大的党的组织，党员应保证占民兵数目的三分之一（包括原有党员之参加民兵者及民兵中新发展为党员者，在民兵中应采取发展党员的方针，这对于坚持斗争，将来动员补充军队，都有很重大的意义），今天在民兵中的政治工作，最重要的就是要求党员能充分地起模范作用。其次，民兵的政治工作，应把解决民兵家庭生活问题作为很重要的一个内容，过去有些地区民兵工作不活跃，就因为这个问题没有适当地解决。自此提出武力与劳力结合，战斗与生产变工后，这个问题的方向已明确解决，政治工作应很好组织这一工作。第三，加强对民兵的教育，在今天应特别地强调提出，作为民兵政治工作的首要任务，经过教育的加强，提高民兵的自觉性，改造其农民的保守观念，使其在思想上认识正规军的重要，爱护正规军，以参加正规军为无上光荣，愿意成为正规军的预备兵（不一定提出民兵是正规军的预备兵的口号）。过去有些地区，发展民兵不完全依靠在一般自卫队中进行很好的动员、基于自愿的原则，而用强制的如编一般自卫队一样的按年龄造名册，或用类似的强制的选举的方式，这是要不得的。政治工作即应注意这一问题，进行很好的解释与教育来弥补这一缺陷，使其不会影响到将来做为补充正规军的动员。至于民兵教育内容与方式，一方面要有步骤的使其认识些革命道理，启发其思想，扩大其眼

界，而主要的则应从实际生活中来进行教育。用积极领导其与敌人斗争，以增强斗争决心；用积极组织武力与劳力结合，战斗与生产变工，以提高劳动与群众观念；用经常检查其不良行为表现，以改造不良倾向；用军队与民兵的联系制度，以激发其对军队的拥护和增加其参军的决心。再就是对民兵的政治工作与正规军的不同，应很好的联系到本村和民兵的家庭，注意其实际困难的解决，以具体的人和事例的好榜样来改造坏的和推动工作，并在群众中造成正确的舆论。最后，民兵政治工作的组织建立与干部缺乏问题，应即设法解决。村设指导员，由支书或副支书担任；区设教导员，由区书或副区书担任；县、分区或军区的武委会，应有政治工作部门的组织。分区或军区政治部与武委会，应很好组织民兵指导员与教导员的训练班，有计划的调干部轮训，培养出一批民兵政治工作者，并组织工作组下去实际帮助工作，创造经验，以丰富与推动民兵的政治工作。

五、积极发现、培养与宣扬模范民兵和民兵英雄，有计划的定期发动竞赛与选举，召开民兵英雄大会，形成广大的群众运动，应作为我们巩固与提高民兵很重要的方法和一种工作制度。目前我们各地在发动民兵大整训中，应更普遍与深入的来一个大规模的民兵英雄运动，要从这一运动中发现与培养出一大批民兵干部。只有在民兵中我们有了一批真正与群众有联系、在群众中有很好的信仰、革命意志很坚强的骨干，我们的民兵组织才算得巩固，才能更好地负担起对敌斗争的任务。同时在将来做补充正规军的动员时，经过他们自身模范作用与号召，就可以成组成队的参加军队，而这样动员组成的军队也是最巩固与最能作战的。这种经验，在民兵工作比较深入的地区，是有很好的例子被证明了的。不过，民兵英雄的培养，要注

意一经发现后，即须加强其教育，要从政治上、思想上多帮助他，不要一下子抬得很高，应经过考验，由群众来提出。这样培养出的民兵英雄才真能称得起英雄，不致有锦标主义或风头主义的缺点。

六、为着适应今天对民兵工作加强的需要，应加强对武委会的领导。区、村武委会主任应是区委与支部的军事干事，县委、地委、区党委应设立人民武装部，以该部部长兼任武委会主任。为着使民兵更好地取得军队的帮助，特别是军事教育训练、武器补充、医药供给方面的帮助，分区武委会主任应兼军分区副参谋长或政治部副主任，以建立民兵与正规军之间的更密切的联系。军队必须把建设民兵工作看做自己应有的责任，民兵必须更好的接受军区的领导，从这上面立即来开始建立民兵与正规军之间的正确关系。在民兵工作已很深入、发展数量已够、并臻于相当巩固的地区，可采取晋察冀的办法，改武委会为人民武装部，直属于军区的领导，俾能更加加强对民兵的军事管理与训练。但仍必须注意民兵作为人民武装的地方性与群众性和内部民主生活之保持，同时实行动员补充正规军时，亦必须在军区的统一计划下，采取很好的政治动员与自愿参加的方式。现应严禁各部队擅自动员民兵补充部队，要使所有军队干部明白：今天只应是多对民兵给以各种帮助，把民兵巩固和提高。眼光要放远一点，注重将来的大用，而不应斤斤于目前几个人的补充。至于民兵的编制，应进行较严格的编队，村成立中队（因村之大小和人口的不一，中队人数不必划一），区成立大队，县成立总队。在内地区，可以建立一些必要的军队生活（不妨碍生产与家务），如进行民兵登记与体格检查，发给符号佩带，以示区别，并通过和宣布民兵应守的纪律。各级队部亦应颁发队旗与关防，建立一固定办公的地方等。但要

防止因这一来而容易产生的官僚的、形式主义的作风和脱离群众的倾向。

一九四四年九月二十六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林伯渠给王世杰、张治中的复信^{*}

(一九四四年九月二十七日)

雪艇、文白两先生大鉴：

九月十日两先生来函，及在这次参政会上双方关于谈判经过的报告，和蒋^{〔1〕}主席在参政会上对于本问题的表示，均已报告我党中央。兹将复示以下几点，奉告两先生，并请转达国民政府蒋主席及贵党中央。

(一) 我们对于蒋主席在参政会上表示继续用政治方式解决问题一点，表示欣慰。因为国内一部分强有力的人士，对于内战的准备，并未放松，内战危机，依然存在。并且愈到反攻之时，危机将愈严重。按照他们的计划，是要把反攻与反共合并举行，以达其所谓一举两得之目的。但是蒋主席在参政会上有此表示，足使我们及国人暂时放心。对于参政会所组织的延安视察团，我们表示欢迎。对于两先生延安之行，仍盼命驾。至于两先生问是否能派负责代表偕返重庆一节，要看延安谈判结果如何而定。但可确告者，只要国民政府与国民党方面不拒绝继续谈判，又能保障来往自由（至今天为止是没有这种自由的），即使无人立即出来，不久一定会有人出来。虽然周恩来、董必武二同志在渝多年，前年林彪师长来渝，祖涵此次来渝又已五月，无一人获有谈判结果；但是只要还有一线希

* 这封信是毛泽东起草的。

望，我们总是有人来谈判的。

(二) 鉴于目前抗战形势之危急，而国内一般情况远未走上适合抗战需要之轨道，不论在军事上、经济上、文化上、政治上到处都存在着严重的危机，政府与人民之间、军队与人民之间、军官与兵士之间、军官与军官之间、军队与军队之间无一不发生异常严重的脱节现象，全国人民皇皇不可终日，烦闷、苦恼与怨恨的情绪与日俱增，大家感觉没有出路，在此种种情况下，以致军心动摇，民心离异，以致不能停止敌人的进攻，不能配合盟国的反攻。造成这些严重危机的最根本原因，就是由于在一党独裁制度下完全没有民主。因此不能取得人民的信任，不能动员与团结全国抗战力量，不能巩固军心民心，不能使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项设施符合抗战、民主与团结的需要。现在唯一挽救时局的办法，就是要求国民政府与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专政的局面，由现在的国民政府立即召集全国各抗日党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民众团体的代表，开紧急国是会议，成立各党派联合政府，并由这个政府宣布并实行关于彻底改革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新政策。只有这样的新政府，但决不是请客式的、不变更一党专政实质的、不改变政策的所谓新政府，才能一新天下之耳目，才能实行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才能保障人民有充分民主自由的权利，才能发出积极抗战的军令与民主主义的政令，才能取得人民的信任，而把全国人民动员起来，增强抗战力量，停止敌人的进攻与实行我们的反攻，也才能实行真正由人民选举的国民大会与实现民主选举的政府。有了这样的新政府，国家统一也就可能实现了。如果一党专制的局面继续不变，则无法取得人民的信任，各种危机只会增大，人民不能动员，抗战不能胜利，离心离德的危险现象无法克服，国家统一断乎不能

实现。我们这个建议，实是代表全国人民的要求，即贵党中亦有不少人士同具此心。这个建议，祖涵已在此次参政会内正式提出，兹特重申此意。两先生历次谈话与函件，对于实行民主，全属敷衍之词，使人感觉不到任何诚意。即九月十日来信，仍是如此。此计不决，则两党谈判即使可能解决若干枝节问题，至于关系国家民族的重大问题，必不能获得彻底解决的。

（三）两先生九月十日来信中有“要求与时俱增”一项责备之词，不能不予以辨正。林彪师长所提四项，时在一年半之前，当时已为政府拒绝，林师长空劳往返。五月间祖涵在西安与两先生所谈，约定各呈报自己中央请求指示，祖涵与两先生均无权作最后决定，故只有六月四日（于六月五日由祖涵面交两先生的）敝党中央所提正式十二条与委托祖涵所提口头八条，才是敝党中央的意见。且西安所谈，原约定双方签字呈报双方中央，但祖涵签字后，两先生不愿签字，应即不能成立，何得事后又引为根据？两先生此种作法，说得客气一点，叫做不友好态度；说得正确一点，叫做玩弄无谓的手腕，是只会影响问题的解决的。至于“华中华南”四字，明是电文脱落，后经校正，故即补上。华中、华南广大解放区人民抗日政权之存在，已历多年，岂有不要政府承认之理？

（四）综观两先生九月十日来信，仍如政府提示案及两先生前次来信一样，不从抗战利益出发，故总是不着边际，毫无结果。除前述实行民主一项关系国家兴亡之大问题外，关于广大中国解放区军、政两项要求国民政府承认问题，亦复如此。现在再一次明告两先生：全部敌后解放区的军队与政权是一定要请国民政府承认的，而且一定会“与时俱增”。因为整个敌后战场的战争情况，与正面战场恰成相反的对照，在正面是节

节节败退，在敌后是节节胜利。十八集团军、新四军与华南抗日纵队是在一天一天地发展，收复的国土、解放的人民与民选政府，也是在一一天地增多，这些难道国民政府与国民党都不喜欢吗？难道蒋主席也不喜欢吗？不见得吧！不管国民政府、国民党承认与否，万恶的日本强盗总是要打的，而且是要打到鸭绿江边，收复一切国土的。我们所以请求承认，是要求统一，要求国民党、共产党及全国一切抗战力量，都在民主基础之上，而不是在独裁基础之上，统一团结起来，好配合盟国早日把日本强盗打倒。如果你们坚持不承认主义，或少承认主义，祖涵以为是不妥当的。为什么打胜仗的军事力量你们不要，打败仗的军事力量你们尽要呢？为什么收复的国土你们不要，反加责备，而几个月之内从郑州到桂林丧失如此广大国土，你们反而不可惜，不加责备呢？我现在敬告两先生，并请转告国民政府与蒋主席，请你们嗣后再也不要讨厌我们共产党人请求你们承认打胜仗的军队与收复的国土了，因为这种嫌恶情绪是很不合于民族利益的。率直之言，尚乞鉴谅！

林 祖 涵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三卷刊印。

注 释

〔1〕指蒋介石。

中共中央关于开展苏浙皖地区工作 给华中局的指示

(一九四四年九月二十七日)

华中局：

敌寇目前已进占衢县、丽水、温州等地，其目的在控制浙江海岸线以预防盟军登陆。我军为了准备反攻，造成配合盟军条件，对苏浙皖地区工作应有新发展的部署，特别是浙江工作应视为主要发展方向，建议作如下部署：

一、浙东挺进纵队派一个得力部队约两个团到天台山，去发展天台、黄岩、临海、乐清等地工作，沿公路沿海岸进行游击，创造游击区，背靠四明山，用推进方法，沿敌伪区进军，解决顽方地方武装，造成将来大部歼灭顽部的条件。

二、向天台山脉进军后，依据可能程度，由浙东派一个精干连（或营）配一部分干部，由刘亨云、张文碧等率领，携带电台、相机挺进至平阳山区与龙跃汇合，造成该区的扩张形势。龙跃地区的中心任务是沿温州及浙闽交界的海岸线力求蔓延式的发展，海岸线愈长愈好。

三、苏南部队除巩固现有地区外，中心工作应放在太湖西南岸，沿京杭国道伸入天目山，造成过钱塘江与浙东打通的战略形势。浙东区党委，应加强金华、义乌、衢县、桐庐、富春等地的敌伪区的游击工作，以迎接苏南部队的南进。

四、估计到苏南地区现有兵力不敷分配，且必需加强干部，建议派叶飞、朱克靖等同志率两个主力团，由华中局抽调苏南、浙江一批干部，随同渡江，汇合十六旅，共同担任南进任务。

五、建议恢复六师师部，以叶飞任师长。苏南区党委名单及六师军政人选，请考虑提出交中央核准，将来六师师部可设在天目山。

六、中央正准备派一部干部到苏浙皖等地工作，要明春才能动身。目前为了发展苏浙皖工作，故派遣叶飞等先往，部队抽调转移，交替的妥善办法，请与苏南、苏中商定电告。

中 央

申感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四册刊印。

周恩来致史迪威将军说帖

(一九四四年九月)

一、目前战争情况是欧战节节胜利，太平洋战争着着前进，唯我中国正面战场却处在严重的失败之中，桂林、柳州乃至昆明，都感受着敌人进攻的威胁。尤其是国民党政府统治的区域，存在着抗战以来空前未有的政治、经济、军事危机，而这种危机是由于国民党实行法西斯化的政令和失败主义的军令所造成的。为挽救目前这种严重危机，以便击退敌人进攻和配合盟国准备反攻起见，我们坚决主张国民政府应立即召集各抗日党派、各抗日军队、各地方政府、各民众团体的代表开紧急国事会议，取消一党专政，成立各党派联合政府，改组统帅部，刷新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方面政策，以一新天下之耳目。

二、但在另一方面，中国敌后战场（华北、华中和华南）与正面战场恰成相反的对照，在正面是节节败退，在敌后战场是节节胜利。敌后解放区现已拥有被解放的人口约九千万，占沦陷区人口（二万万零七百八十万）的百分之四十三。敌后解放区的面积约八十三万七千余平方公里，占敌后总面积（一百二十六万三千余平方公里）的百分之六十六。敌后我抗战兵力，正规军（包括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已达五十三万，游击队的民兵约二百二十万，成为正规军的直接预备

队，另有数百万的地方自卫军，则为我敌后动员的后备队。在这些解放区内，共有民选县政府五百九十一县，专员公署八十五处，民选的边区政府及行署十二处（陕甘宁边区均不在内）。敌后我军所抗击的敌人，在一九四四年三月河南战役以前，为日军侵华全数（三十四半个师团，约五十六万人）的百分之六十四点五，为伪军全数（约七十八万人）的百分之九十五，合起来则为百分之八十四。在目前，虽由于敌人增加兵力于湘桂、粤汉、平汉三路，向我正面战场作深入的进攻，但敌后我军仍继续抗击侵华日军（据已判明位置的三十三半个师团计算，另有六个师团位置不明的未算入）的百分之四十九点五，几近半数，而伪军情况则没有变化，合起来尚为百分之七十六点四。我军在敌后共解放了二十二个县城，经常被我们围绕或袭击的十万以上人口的大城市约有三十八个，为敌占大城市（四十五个）的百分之八十五，经常被我们逼近活动或破坏的铁路线约九千六百公里，为敌占铁路线（约一万公里）的百分之九十六，被我们完全控制的海岸线约八百公里，经常有我们活动的海岸线约六千五百公里。以我军民在敌后如此的力量、成绩及其所处的战略地位，如再加以近代的装备和补充，不仅可以牵制今日敌人之进攻，而且可以配合明日盟国之反攻。而国民党政府对此不仅不予奖励，且于最近所发表之国民政府提示案中，竟欲取消此敌后解放区中之各级民选政府，取消此敌后抗战有功之数十万正规军及数百万民兵自卫军。无理而又有助于敌的事情，莫过于此。因此，我们誓死反对取消，坚决要求国民政府应承认此敌后解放区之各级民选政府，及敌后抗战有功之五十三万正规军和数百万民兵自卫军。

三、国民党政府不仅不承认我敌后解放区的政府和军队，并且还不断进攻村镇和企图消灭此各级民选政府和抗战有功的

部队。即在目前正面战场最危急的时候，国民党政府用以包围陕甘宁边区及进攻八路军和新四军（尚未算入华南抗日部队）的兵力，也还有五十六个师及其他地方团队达七十七万五千人众，而进攻侵扰之事，始终未停。因之，内战危机亦依然存在。我们坚决要求全国人民、同盟国家和我们一道制止这种内战危机，以便将我们全国力量，都能用到抗敌的战场上去。

四、同时，我敌后抗战部队在此七年当中，奋勇血战，从未得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任何轻重武器的装备（除抗战初期领了一百二十挺轻机关枪和六门反坦克小炮以外），即弹药、被服、粮秣、经费以及各项交通、卫生器材的供给和补充，也在一九四四年起全部停止了。因此，我军之所以能存在、发展和胜利，完全是依靠于中国人民的拥护和自力更生的成功。但为着今日更有效地消耗和牵制敌人之进攻，明日更有力地配合盟军之反攻，我们有充分权利要求国民政府装备和供给我军以应得的军火和物资，我们更有充分权利要求同盟国将援助中国军队之武器、弹药、交通卫生器材和金钱布匹等，分其应得之部分给八路军、新四军及敌后一切抗日游击部队。且更基于上述理由，特别是敌后、正面两战场胜负的对照，我军至少应获得美国租借法案分配于中国的军火、物资的全数二分之一。这样，方为合理。

五、根据以上四项意见，我敌后各解放区及陕甘宁边区谨代表九千万中国人民、五十三万正规军、数百万民兵自卫军，特向史迪威将军及美国统帅部作下列之提议：

1. 按目前战况及反攻之需要，我敌后部队依现有五十三万人计算（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至少应编为正规师五十个，以便接收新式装备。现时我军分在各处作战，均以团或旅为单位，隶属于敌后各作战分区。如欲集中编制和训

练，以师为单位进行，决无碍于目前作战，且按此五十个正规师兵力，仍可由民兵游击队中组织同样数目的预备师，以作补充之用。

2. 为适应敌后战场目前需要，并牵制敌人向我正面深入进攻，我军急需接济的军火物资为轻兵器（轻重机枪、掷弹筒、迫击炮及坦克小炮、火箭炮）、弹药及通信卫生等器材。

3. 为加紧准备反攻起见，我军装备急需使之近代化。你们美军统帅部已决定装备中国军队以一定数目的近代化的师，则我们要求至少以一半数量的装备给予我们。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出版的
《周恩来军事文选》第二卷刊印。

评蒋介石在双十节的演说^{*}

(一九四四年十月十一日)

毛 泽 东

空洞无物，没有答复人民所关切的任何一个问题，是蒋介石双十演说的特色之一。蒋介石说，大后方尚有广大土地，不怕敌人。寡头专政的国民党领导者们，至今看不见他们有什么改革政治抗住敌人的意图和本领，只有“土地”一项现成资本可资抵挡。但是谁也明白，仅有这项资本是不够的，没有正确的政策和人的努力，日本帝国主义是天天在威胁这块剩余土地的。蒋介石大概是强烈地感到了敌人的这种威胁，只要看他向人民反复申述没有威胁，甚至说，“我自黄埔建军以来，二十年间，革命形势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的坚固”，就是他感到了这种威胁的反映。他又反复地说不要“丧失我们的自信”，就是在国民党队伍中，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社会人士中，已有很多人丧失了信心的反映。蒋介石在寻找方法，以期重振这种信心。但是他不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任何一个政策或工作方面去找振作的方法，他找到了拒谏饰非的方法。他说，“国际观察家”都是“莫明其妙”的，“外国舆论对我们军事政治纷纷议论”，都是相信了“敌寇汉奸造谣作祟”的缘故。说也奇怪，罗斯福一类的外国人，也和宋庆龄一类的国民党人、国民参政

* 这是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评论。

会的许多参政员以及一切有良心的中国人一样，都不相信蒋介石及其亲信们的好听的申辩，都“对我们军事政治纷纷议论”。蒋介石对于此种现象感到烦恼，一向没有找出一个在他认为理直气壮的论据，直到今年双十节才找到了，原来却是他们相信了“敌寇汉奸造谣作祟”。于是蒋介石在其演说中，用了极长的篇幅，痛骂这种所谓“敌寇汉奸造谣作祟”。他以为经他这一骂，一切中国人、外国人的嘴巴可被封住了。对于我的军事政治，有谁再来“纷纷议论”的么，谁就是相信“敌寇汉奸造谣作祟”！我们认为蒋介石的这种指摘，是十分可笑的。因为，对于国民党的寡头专政，抗战不力，腐败无能，对于国民党政府的法西斯主义的政令和失败主义的军令，敌寇汉奸从来没有批评过，倒是十分欢迎的。引起人们一致不满的蒋介石所著的《中国之命运》一书，日本帝国主义作过多次衷心的称赞。关于改组国民政府及其统帅部一事，也没有听见什么敌寇汉奸说过半句话，因为保存现在这样天天压迫人民和天天打败仗的政府和统帅部，正是敌寇汉奸的希望。蒋介石及其一群历来是日本帝国主义诱降的对象，难道不是事实吗？日本帝国主义原来提出的“反共”“灭党”两个口号，早已放弃了“灭党”，剩下一个“反共”，难道不是事实吗？日本帝国主义者至今还没有向国民党政府宣战，他们说，日本和国民党政府之间还没有战争状态存在呢！国民党的要人们在上海南京宁波一带的财产，至今被敌寇汉奸保存得好好的。敌酋畑俊六，派遣代表到奉化祭了蒋介石的祖坟。蒋介石的亲信们暗地里派遣使者，几乎经常不断地在上海等处和日寇保持联系，进行秘密谈判。特别是在日寇进攻紧急的时候，这种联系和谈判就来得越多。所有这些，难道不是事实吗？由此看来，对于蒋介石及其一群的军事政治发生“纷纷议论”的人们，究竟是“莫明其妙”呢，还是

已明其妙呢？这个“妙”的出处，究竟是“敌寇汉奸造谣作祟”呢，还是在蒋介石自己及其一群的身上呢？

在蒋介石的演说中，还有一项声明，就是他否认中国将有内战。但是他又说：“决没有人再敢背叛民国，破坏抗战，如汪精卫之流之所为。”蒋介石是在这里寻找内战的根据，并且他是找着了。有记性的中国人不会忘记，一九四一年，正当中国叛卖者们宣布解散新四军，中国人民起来制止内战危机的时候，在蒋介石的一次演说中，曾说：将来决不会有“剿共”战争，如果有的话，那就是讨伐叛逆的战争。读过《中国之命运》的人们也会记得，蒋介石在那里曾说：中共在一九二七年武汉政府时期“勾结”过汪精卫。一九四三年国民党十一中全会的决议上，又给中共安上了“破坏抗战危害国家”的八字由头。现在又读了蒋介石这篇演说，就使人们感觉内战危险不但存在，而且在发展着。中国人民现在就要牢牢地记着，不知哪一天的早晨，蒋介石会要下令讨伐所谓“叛逆”的，那时的罪状就是“背叛民国”，就是“破坏抗战”，就是“如汪精卫之流之所为”。蒋介石是擅长这一手的，他不擅长于宣布庞炳勋、孙良诚、陈孝强一流人为叛逆，也不擅长于讨伐他们，但是他却擅长于宣布华中的新四军和山西的决死队为“叛逆”，并且极擅长于讨伐他们。中国人民决不要忘记，当着蒋介石声言不打内战的时候，他已经派遣了七十七万五千人的军队，这些军队正在专门包围或攻打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的人民游击队。

蒋介石的演说在积极方面空洞无物，他没有替中国人民所热望的改善抗日阵线找出任何答案。在消极方面，这篇演说却充满了危险性。蒋介石的态度越变越反常了，他坚决地反对人民改革政治的要求，强烈地仇视中国共产党，暗示了他所准备的反共内战的借口。但是，蒋介石的这一切企图是不能成功

的。如果他不愿意改变他自己的作法的话，他将搬起石头打他自己的脚。我们诚恳地希望他改变作法，因为他现在的作法是绝对地行不通的。他已宣布“放宽言论尺度”，就不应该以相信“敌寇汉奸造谣作祟”的污蔑之词来威胁和封闭人们“纷纷议论”之口。他已宣布“缩短训政时期”，就不应该拒绝人们改组政府和改组统帅部的要求。他已宣布“用政治方法解决共党问题”，就不应该又来寻找准备内战的理由。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刊印。

军委关于准备决战前日军严重“扫荡” 给邓小平、滕代远等的指示

(一九四四年十月十四日)

邓滕同志并告山东、平原及五台：

申感电悉。华北有纵横六条大铁路，有连云、青岛、塘沽三个军商港，有公路如网，有冀鲁大平原（利于大兵战场），有东北依靠，有日本本土屏障，交通便利，空海易与陆军配合，在苏联不出兵满洲条件下，是日本陆军在大陆决战最理想战场。在华南因日之海空均劣势，运输困难，内地交通仅粤汉路而被破坏，将来盟国在粤闽登陆，日军可能采取运动防御节节抵抗，以拖延时间。华北可能成为主要的决战战场。然而使敌最感头痛的，是共产党八路军许多民兵游击队，这些抗日力量，不仅直接危害日军作战，而且是英美在华北登陆最好帮手。因此在决战开始前，可能在华北还有一时期最严重的“扫荡”与摧毁，我们应有此准备。但目前日寇忙于准备美在菲岛登陆，隔断南洋，力求迅速打通安桂交通，华北敌军减弱，伪军动摇，我在可能条件下，应乘虚尽量消减伸入根据地内之伪军、顽军及敌军小据点，扩大根据地，但一般的暂时不打通要道及较大城市（敌人“扫荡”时破袭交通要道与袭击较大城市在外）。充实现有小团，健全游击队，加强民兵组织，利用冬寒认真练兵。新发展区域及减租减息未深入地区，继续深入

减租息斗争。减租息已深入地区，注重各种生产，改善军民生活，巩固军民团结与社会团结。在太行北岳山区努力增加子弹、炮弹、手榴弹、地雷、无烟抛射药及炸药生产，隐蔽储存，以为将来严重不能生产时用。对伪军上下层工作均须加紧。这些工作做好，就是预见困难，克服困难，争取胜利的条件。以上意见，望斟酌实施。

军委 毛、朱^{〔1〕}

西寒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四册刊印。

注 释

〔1〕指毛泽东、朱德。

中共中央关于巩固太岳、豫西等 根据地的指示

(一九四四年十月十四日)

北局、平原、太岳：

皮徐^[1]申陷电，你们酉冬转来于酉文阅悉。

甲、已决定戴季英、王树声、刘子久、韩钧等率河南干部约百人及七七零团、警二团约千六百人，十一月初由延起程，照来电经太岳往河南。

乙、太岳派两个团入豫西，我们意见：A. 铁道与伊河间之洛河水深，两岸淤泥亦深，不易随便徒涉，如遇敌顽进攻，不大便于机动。在冻冰前似不宜用大兵，在不妨害中条山发展与巩固情形下，派政治军事较强的干部，率一个小团进入该区，与地方党密切联系，巩固已有同情武装，先求站稳脚，部队小给养亦易筹。B. 太岳区目前极应巩固中条山已得阵地，积极发展汾河以东（三角地区）沁河以西广大地区，特别豫北之沁、济、温、孟四县，山西之垣、平、芮三县，以及黄河与铁道间（估计有被敌控制之地区应广泛利用合法形式及建立隐蔽根据地），使华北与中原密切衔接。

丙、太行、太岳、平原区，今冬整军期间，尽可能充实小团，并每区补充两个大团（共六个团），根据目前发展情形，似有必要与可能。

丁、解决河南新区军队给养问题，在根据地未具规模以前，可采取以下临时过渡办法：A. 按每亩产量抽百分之五至百分之七，未减租以前，由地主出，减租以后，农民确实得到减租利益时，东佃各半。B. 或者照国党田赋征实办法，每两粮银应征公粮若干，但无论哪项办法，均须比以前国党及现在敌伪统治民众的负担要轻与合理些，并保障每年只征一次，请当地士绅及富、中、贫农代表商讨上述办法或其他更适当的办法。总之，力求与地主不要过早搞破脸，使自己站稳脚，如与地主过早搞破了脸，基本群众又未发动起来，将增加我们许多困难。C. 在根据地建立有初步头绪时，即应筹办征收出入口税，以保障根据地物资与帮助部分解决财政问题。其征税原则：1. 对敌利大，对我利小，则抽重税甚至禁止出入口。2. 对敌利小，对我利大，则抽轻税，甚至免税。3. 对敌我均有利，则按我需要缓急，定出适当税率。D. 为避免混乱，保障安定社会秩序，便利于自己站稳脚，须禁止乱打汉奸乱罚款，军队须由最高司令部统一发给临时粮票，给粮户作为收据，对部队内部须按人数给以应得粮票，以免重复过去浪费。

以上意见提供你们及皮徐同志参考，并望将你们意见电告。（北局转皮徐）

中 央
西 寒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四册刊印。

注 释

〔1〕指皮定均、徐子荣。

军委关于开辟河南根据地问题 给郑位三、李先念等的指示^{*}

(一九四四年十月十四日)

郑李任陈^{〔1〕}：

申艳电悉。

(一) 八路军第一批南下部队两个团，在皮定均（司令）、徐子荣（政委）率领下，已于一个月前在新安以北渡过黄河，申陷进至登封、临汝、禹县地区大峪店东西疾山一带。现正从事建立根据地，并分向各地活动中。尚有后续部队，正从新安以北渡河南下。洛阳、伊川、宜阳一带已有地方党员所组织的游击队进行活动，群众对我军进入河南极为欢迎。敌情与顽情亦不十分严重。

(二) 中央已决定派戴季英、王树声、刘子久、陈先瑞等从陕北率两个老团并大批干部进入河南活动，建立河南人民解放军，为解放河南而斗争。王、戴、刘、陈等在一个月內可从延安起身。中央派到五师的部队及大批干部，亦可同时起身。

(三) 你们派到豫南的部队，应坚持进行活动，建立据点，

* 这个指示是毛泽东起草的。

发展地方武装，并设法与皮、徐部队取得联系。

军 委

酉寒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四册刊印。

注 释

〔1〕指任质斌、陈少敏。

毛泽东对董必武、林伯渠关于 同赫尔利谈话情况的电报的批语

(一九四四年十月十九日)

九月下半月至十月上旬，蒋⁽¹⁾对罗丘⁽²⁾压力，硬抗了几个星期。在此期间，对我方亦表示硬性。但在双十演说出了一通气之后，又软下来。对美国软，对我方亦随着软些，邵力子召集的国共及中间三方会谈，决定派五参政员⁽³⁾来延及要求延安停止骂蒋等，即其表现。蒋最怕指名批评他，美国亦怕我们不要蒋，故在许蒋存在条件下，可以作出一些有利于我们的交易来。

毛泽东

十月十九日

附一：董必武、林伯渠关于第一次同赫尔利 谈话情况给毛泽东、周恩来的电报

(一九四四年十月十七日)

毛周：

(一) 今日(十七日)午后，赫尔利约我们去谈，约两小时。我们陈述我党的主张及要求后，他表示几点：

(1) 他和我们谈话，是蒋允许的，蒋也允许他必要时去延安；

- (2) 他认为蒋的态度已变和缓；
 - (3) 他认为我党武装组织训练都好，力量强大，为决定中国命运的一种因素；
 - (4) 他说：蒋现为抗日的领袖，是全国人公认的事实；
 - (5) 中国现政府不民主；
 - (6) 假如说他认识有错误，希望坦白的批评他。他代表罗总统帮助中国团结，决不对党派有所偏袒，分配东西亦决不偏重某一方；
 - (7) 他亦赞同我们的意见，并约明日继续谈；
 - (8) 我们代表我党欢迎他去延，他表示感谢。
- (二) 赫所说的三、四、五各点，很值得注意。估计照前电费思与怀特等试探的口气，大约系蒋见我态度强硬，怕我们不承认他是抗战领袖。赫讲，他是看了林十月三日信，并其他材料，及蒋在参政会演说，得出来的结论。我们当然不好不承认此点。
- (三) 赫讲时，态度诚恳。
- (四) 有何指示，请立即电示。

董 林
十七日

附二：董必武、林伯渠关于第二次同赫尔利谈话情况给毛泽东的电报

(一九四四年十月十八日)

毛主席：

今午（十八日）赫尔利约吃饭，谈二小时许。赫说要点：

（一）蒋在十五日对赫讲：他个人对共观点已完全改变，但部下还不明了。并说：林、董和他一样爱国家，赫可以信任林、董与之交谈。这句话昨晚也谈过。因此，赫认为蒋的态度已变好了些。

（二）赫说国共合作后，多有益于抗战与国家的事情，中共应取得合法的地位；有言论出版集会的自由；军事领导机关中，应有中共党员参加；分配东西，决不应偏于哪一党。

（三）他拟约张、王^{〔4〕}和我们同谈，得出两点合作初步结果后，他拟向蒋谈。蒋同意后，他便到延安来和你谈，求得双方合作的基点。最后蒋、毛见面，发出宣言，两党便合作起来了。

（四）他说：美军很快就要在中国海岸登陆，但国共不团结，美军要双方接洽，否则妨害军事行动很大。

（五）他对我们过去宽容忍耐，以国家为重，极称赞。他说：假使你们不用共产党这个外国名称，你们将大大的减少反感。他说：这点不重要，只是他个人的意见。

（六）他明日约我们和张、王同谈。

（七）你及中央有何指示，请即电告。

董 林

十八日

附三：董必武、林伯渠关于第三次同赫尔利谈话情况给毛泽东的电报

（一九四四年十月二十四日）

毛主席：

昨日（十月二十三）第三次见赫尔利。他说话要点如下：

(一) 他已为中国解决了中美邦交中很困难的问题（意似指撤换史迪威事），现还试图调解国共关系。

(二) 蒋在十月二十一日交给他二方案（中英文各一份），经赫当场退回。并说，如果我是共党，我也不会接受。至于内容，因人格关系，绝对保守秘密（此事请勿公布）。他只打个譬喻，说，叫你们在前面打，他们在后面打，意思就是要消灭你们。赫问蒋：为什么不可以并肩作战？蒋说，无适当人指挥。赫说：我去，但我不是指挥，是作两军的连锁。但赫未说蒋最后的意见。蒋现正起草新的方案，赫看后，原稿带延安（估计他还要拉我们一次）。

(三) 十月二十二日下午，宋子文与蒋辩论了半天。当晚，赫、宋又同蒋辩论许久。

(四) 已告诉蒋，要就马上行动，实行民主就实行，释放政治犯就释放，不能再等。云。

董 林

十月二十四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注 释

〔1〕指蒋介石。

〔2〕指罗斯福、丘吉尔。

〔3〕指冷遹、胡霖、王云五、傅斯年、陶孟和。

〔4〕指张治中、王世杰。

军委关于暂时缓和同阎锡山的关系 给邓小平、滕代远等的指示^{*}

(一九四四年十月二十日)

邓滕并转太岳：

甲、陈诚到克难坡晤阎后，中央军有接防秋林、阎部调河东之确实消息，其原因：

(一) 阎恐慌畏我进攻，请中央军保护。

(二) 阎准备进一步与敌合作，向我晋东南进攻，防我向秋林报复，故事先撤离。

(三) 陈诚支援阎反共，更不反对阎联日，其阴谋是利用阎日牵制我向河南发展。

(四) 敌阎间还有矛盾，河津敌有攻阎讯。种种可能，哪种为主或并重，待证。

乙、我为取得将来对阎之更多政治理由，便于我冬季整军与生息民力，暂时和缓阎一下，似有必要。提议放回阎部俘虏一至二百人，分送六十一军、五十九军（王靖国部）及吕梁山，使之到处散布影响与面报阎。在放走时口头说明（不用文字）六十一军不该联日反共打八路军、决死队，阎司令长官不该诬蔑八路军不抗日、决死队是叛军，今后如不再重复以前错

* 这个指示是彭德怀起草的。

误，我愿谅解，各守原防，互不侵犯，仍归旧好。是否能达到暂时和缓目的，要看将来发展，不要因此松懈自己，更不要在任何文字上表示愿意和解恢复旧好。

丙、谢、王、王、毕^{〔1〕}电沁州一带集敌，请注意敌阎配合“扫荡”太岳及太行山之三分区。

军 委

十月二十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注 释

〔1〕指谢富治、王鹤峰、王新亭、毕占云。

军委关于向苏浙豫皖发展 给华中局的指示

(一九四四年十月二十四日)

华中局：

梗电悉。

(一) 同意粟裕率两个团南下发展苏浙，必要时还应从一、二两师再调一部去。所有苏南及浙江归粟统一指挥，叶飞留苏中主持。

(二) 新四军（除五师外）在最近的任务，是向南（苏、浙）向西（豫东、皖北）发展，除现在派出之部队外，将来仍须派遣部队南进、西进，并须有主要负责人同去，望你们加以考虑并预作准备。中央为了协助新四军完成任务，准备在明年春季派遣数百个干部到新四军（长江下游）工作。

(三) 发展河南是已经确定的方针，但现在只能逐步发展。首先建立巩固阵地，然后向前推进。你们在津浦路两部队，已有冀鲁豫区南下水东之三个团，可以配合作战。

(四) 美军有在杭州湾登陆可能，十分注意发展宁波、杭州、上海三角区工作，以便配合美军作战，时间可能很快。

军委

西敬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出版的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四册刊印。

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广东游击战争 等问题给尹林平等的指示^{*}

(一九四四年十月二十六日)

林平同志转军政委、临委：

甲、目前战局重心在桂，但西、北江已成敌人进出之路，邓龙光集团调退广西，李汉魂省府保安团向和平集中，余汉谋后方虽向西移，但其兵力仍留路东。因此，西江、南路在目前最为空虚，敌占地区亦较东江为广。如桂、柳不守，粤、桂、湘边国民党亦难屯大兵。如此种估计不变，我广东游击战争应以向西发展为目前主要方向。同时联系南路，打通琼崖联络，应成为目前重要任务之一。

乙、为实施上述任务：一、应从东江纵队抽出得力军政干部，经过中路游击队帮助，向西江加紧发展抗日武装，推广游击区域。二、选派得力同志，往南路帮助周楠及当地组织，发展敌占地区武装游击，并继续派人打通琼崖联系，告以与延安电台先行明码联络。三、中路游击，应采取分散发展，多游动，少刺激，避免过大损失。四、北路游击，应仍依山地发展，避免与余汉谋部过早冲突，并力求和缓。五、潮、汕方面如纵队中有本地下级军事干部，抽二三人派回与当地组织联

^{*} 这个指示是周恩来起草的。

络，恢复并发展分散的游击小组，以保持此海口附近的活动，很有必要。六、着眼于敌占汕尾及扩大厦门占领的可能性，你们应经过香港及闽西南两处组织关系，布置汕尾、厦门、漳州的秘密工作，以为将来准备。七、一切布置应仍以东江游击区为中心根据，不要因此放松这个区域的巩固和发展。

丙、一切工作以武装的发展和胜利为基本条件。照目前四千五百人数目，在向西发展中，希望半年内能扩大一倍。

丁、各路领导，可均组织军政委员会分会，由东江军政委员会统率之，唯东江不必再组分会。

戊、对外号召组织和联系，依各地情况自定适当的名称（如抗日游击队或解放军均可），不必强求一致。在目前分散发展中，动员人民，执行政策，亦均由武装组织直接进行，力量较大而较巩固时，可建立县、乡、村民选政权，但不必急于建立各地联合政权。

己、对外发表党的宣言，可用广东省委名义，内容可着重号召全省人民武装起来自卫，反对内战，以免全省沦陷，不必套抄中央口号全部。

庚、统战工作可用曾、王^{〔1〕}名义，向各方通函，并利用英、美外交关系，向外传播我们抗战成绩与地方军队合作主张。如有可靠社会关系，可经过李章达（或经过邱映芙、彭泽民）去找李、张、蒋、蔡^{〔2〕}、余等联络。

辛、临委仍管理国民党区秘密工作。各地组织仍不宜恢复，继续以单线或个别关系领导，在关系隔断地方，仍循可靠线索去求联系，无线索时，宁断勿急。在沦陷区以武装组织为中心，联系地方党员，但武装没发展到的地方，亦不宜过早暴露，而游击地方亦应保留若干秘密党员，以便存在。

壬、临委下设城市工作部，专管港、澳、广、汕、厦及广

州湾等城市工作，并研究其情形、经验报告中央。

癸、中央正在计划试派几个军政干部经上海、香港到你们处工作，望你们调查港、沪交通情况及可能电告。

子、此电到后，望将讨论及执行情况陆续电告。

中 央

西 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出版的
《周恩来军事文选》第二卷刊印。

注 释

〔1〕指曾生、王作尧。

〔2〕指李济深、张发奎、蒋光鼐、蔡廷锴。

在湘赣工作座谈会上的发言

(一九四四年十月二十六日)

任 弼 时

我想我们经过这几天的座谈之后，对湘赣苏区历史发展的过程，较之过去是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但也只是比较而言，因为时间很短促，一方面我们没有可能把实际情形详细地在这个会议上来讲，另一方面又没有许多文件作为我们现在讨论的根据，无论哪个时期都没有旧的文件可参考，因此我们还只能是粗枝大叶地对过去作总结。我的讲话也不能作为湘赣苏区历史问题的最后结论。其所以不能作为最后结论，是因为湘赣过去所执行的路线与当时整个党的路线是分不开的，而那个时期的党的路线究竟如何，是需要七大作结论的。在七大以后，根据七大的认识来讨论湘赣工作，才能够有更完全的认识。但是这次的座谈也可以得出一个初步的共同的意见或者是初步的结论，因为大家已经有了一个共同的想法。这是我首先要声明的。

一 研究湘赣苏区历史问题的目的

我们在湘赣做的工作，到今天已经有十年了，我们要以历史的观点去看问题。所谓历史的观点，就是说要懂得我们在湘

赣工作的时候，是在四中全会以后，不管旧省委也好，后来的新省委也好，都是执行了四中全会以后的路线的，但那个时候并不知道四中全会以后的路线是错误的路线，这个错误路线是过了七八年之后才发觉的。当时许多同志也没有把它当错误的路线，相反的，倒还觉得很合胃口，同意了那个路线，拥护了那个路线，现在看来当然是错误的。

现在我们来检讨历史问题的时候，首先，应该从各种不同的历史情况出发，了解历史问题，检讨自己的错误。过去在同一错误路线下，也是有各种不同的情形的。

比如有一种人，他当时执行那个路线，他是把那个路线当作正确路线来执行的。这种人的反省，应该反省自己在那个时期的思想方法，就是说应该反省自己在当时为什么同意了那个路线，为什么拥护了那个路线。这种人对党是忠实的，只是思想方法错了，需要在这方面作自我批评。虽然错误路线下造成的罪恶应由路线负责，但自己也应该反省自己为什么同意了那个路线，执行了那个路线。

另外，还有一种人，在那种错误路线下面，他利用党的错误来进行自己私人的活动，达到自己私人的目的。这就是说是品质不好的人。这种人不仅要反省他的思想方法，而且要反省他的品质有些什么毛病，造成什么罪恶。

再还有一种人，虽然在错误路线下，但是他并没有完全同意这个错误路线，他对错误路线有抵抗，有不满意。这种人在任何一个苏区里面都是有的，就是说他对当时的路线不满意，提出过不同的意见，反抗过，但是他也没有能够把这个错误路线完全纠正，而只是在具体执行中没有完全执行这一错误路线。这些同志也应该反省，反省自己当时为什么没有能够坚持自己的正确意见。他如果是这样反省，也可以得到一些经

验教训。

也还有的同志有官僚主义的倾向，脱离群众，作风不好，因而使工作受到更多的损失，等等。

总之，是有各种各样的情况的。

今天我们来研究历史问题的时候，各种各样的人对自己应该根据各种不同的情况来加以检讨和反省，这样对各个人都可以得到一定的好处。

其次，我们不能够以现在的眼光去看历史问题。今天的观点是什么？今天我们是实行统一战线政策，与大资产阶级共同抗日。我们不能够拿这个尺度来要求过去，来看过去，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具备与大资产阶级大地主合作的条件。但在“九一八”之后，中国国内阶级关系上是起了新的变化的，在今天来看，当时的某些社会政策可能改变或者应该改变。比如在对十九路军问题的态度上，我们应该采取和他们合作，打击蒋介石，以争取五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那个时候没有这样做，这是错误的。但是超过这些要求，说那个时候与蒋介石也应该合作，这就不对了。那个时候这样的可能还没有，就是说与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合作还不可能，还没有这种条件。所以我们说，不能以今天统一战线的尺度去看那个时候的问题。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那时的某些可能采取的统一战线的措施，比如“九一八”以后，我们在某些政策上应该加以改变，是可能做到的。这就是我们在检讨历史问题时应该有的观点，也就是历史观点。

再次，我们在研究历史问题时，应该有实事求是的精神。就是说一方面我们要看出错误并研究犯这些错误的原因，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哪些地方有成绩。我们不是否定一切的态度。我们也需要研究出在错误路线下还能够得出成绩的原因是什么，

大家要很冷静很客观地来分析当时的情形。如错误何在，是什么原因，在哪些地方还有成绩。这种态度是很需要的，在教育党教育干部上，必须具有此种态度，同时也只有如此才合乎事实。

我们检讨历史问题的目的，对党来说是要很好地检讨那个时期的经验教训；对个人来说是要弄通自己的思想，基本上不是追究责任应归哪个人负，而是把思想搞清楚，以对过去错误的检讨来教育全党。总起来说，我们不是过分追究个人责任，而对个人来说，则应着重反省自己犯了什么错误。如此，才能够对党对个人都有利益。

这就是我们研究湘赣苏区历史问题时应该采取的态度和目的。

二 对湘赣苏区历史上各个时期 党的路线的估计

为着讨论的便利，我们把湘赣苏区的历史分为四个时期，即：临时省委以前为一个时期，旧省委（包括临时省委）为一个时期，新省委为一个时期，最后一个时期为谭余保同志在那里坚持游击战争的时期。最后一个时期的干部到会的很少，我们很难谈到许多的具体问题。这次我们的座谈主要还是弄清旧省委与新省委这两个时期之内的一些问题。

现在我把临时省委以前这个时期的情形简单地说一下。

根据这几天的座谈，大家有一个共同的认识：湘赣这个区域在大革命时期就有党的和群众斗争的基础。在永新、莲花、茶陵、宁冈等县内，大革命时就有群众斗争，特别是安源等地方的工人运动有很大的影响。北伐也经过那些地方。湘赣这个

区域后来成为中国苏维埃运动中重要的地区，中国苏维埃根据地的建立，它不是首创也是第一批（大概除了广州暴动之外它就是首创地）。这不是偶然的，首先是有群众斗争的条件，其次是有它的地形条件，如井冈山是很好的地形条件。在政治条件上说，它是比较偏僻的两省交界或三省交界的区域，统治阶级在那里的力量薄弱。因为有这些条件，所以以后朱、毛选择了这个地区，创造了苏维埃政权。毛主席曾在这里搞了一年多，在宁冈、永新、茶陵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叫做革命割据，创造了一套政策，包括建政、建军、建党的各种政策。这是一套正确的办法。毛主席这一套政策的基本精神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按照实际情形规定我们的政策。所谓后来保存了毛主席的精神者，我看也就是保存了毛主席的实事求是的精神。

朱毛红军离开这个区域以后，在立三路线时期，湘赣边的党是否执行了这个错误路线呢？应该说湘赣边党的领导机关一般地是接受和执行了这个路线的。比如湘东南的五次暴动，赣西南的八次攻吉安，把地方武装集中起来，组织行动委员会等。至于执行这个路线时，是不是下面还有一部分同志在那里实事求是地按照毛主席的精神奋斗呢？那还是有的。某些党部、某些同志和许多党员干部不满于立三路线，保留了原来的一套好的东西。我看毛主席的这种作风不仅只在湘赣这个区域才有，即使在其他区域执行错误路线下也是存在的。当然湘赣这个区域是毛主席直接领导、直接参加的一个区域，毛主席的影响更深更广些也是自然的。我觉得在湘赣的军队里面，毛的传统保持得更多一些，这一点我是这样的看法，大家也还可以考虑。

（一）新旧省委执行的路线

旧省委和新省委两个时期都是执行了“左”的路线，而且

这个路线是一天比一天更加“左”的，这样的估计是合乎事实的。更确切些说，旧省委执行的是四中全会以后到临时中央从上海搬至中央苏区以前的路线，新省委执行的路线是临时中央搬到中央苏区以后的发展得更“左”的路线，包括五中全会。四中全会只形式上停止了立三路线，而新的“左”的路线在四中全会后不久就产生了。四中全会反对立三路线并没有解决问题，因为没有能够揭发立三路线的社会的政治的根源。所谓社会的根源是党内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政治的根源是大革命失败以后广大群众对国民党统治者非常仇恨的思想。这两个思想都是发生“左”的根源，都容易走向“左”的错误方面去。四中全会也没有指出立三路线的思想方法是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总的说来，四中全会虽然反对了立三路线，并且批评了三中全会的调和路线，但是并没有看到“左”的根源何在。四中全会以后的中央依然保存了立三路线时的那一套思想方法，“左”的根子并没有去掉。而且四中全会不正确地提出了反对党内右倾思想，说右倾是主要危险，因此四中全会以后中央的政策如土地问题、劳动政策等，以及许多的个别政策都表现得很“左”。但是，我们说形态完备的路线之形成还是在“九一八”以后。因有日本打中国，有三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又有几省的大水灾，就认为革命形势到了，认为中国已经革命化了，认为国民党的统治是总崩溃，于是提出要完成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这是夸大了国民党要崩溃的一面，提出了不正确的任务和斗争的策略，成为一个极左的路线。这个“左”的路线是否把各个区域普遍地统治了呢？是否各个苏区都被它统治了呢？那就不一定。比如在中央苏区，就遇到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实事求是者的抵抗，毛主席就不赞成打大城市。但是是否部分的也被执行了呢？是的，如分配土地上就执行了。在临时

中央未搬到中央苏区以前，中央虽然派我们去了，后来又派恩来^{〔1〕}去了，但在博古、洛甫^{〔2〕}未去苏区之前极左路线还没有完全统治中央苏区。我们去的时候，中央局的书记开始是项英，后来是毛主席。以后恩来同志来了，他当中央局书记时，虽有五月决议案^{〔3〕}批评了中央苏区的机会主义，提出打赣州，赣州没有打开，回来之后就再没有打大城市。这就是说实际上并未贯彻的执行四中全会以后的路线。

我想在湘赣，旧省委虽执行了“左”的路线，但也并没有充分执行，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临时中央搬到中央苏区以后，福建打出一个罗明路线来，江西虽然没有指出省委有路线错误，但也打了几个地区，还处分了邓、毛、谢、古^{〔4〕}。这表明苏区并没有全部执行他们的路线。湘赣之所以被打，也是这个原因，因为没有完全执行他们的路线，所以被认为机会主义的动摇。认为福建是罗明路线，江西几个地区是机会主义，这实际上也就是说那时的中央局的领导有问题。

新省委执行了中央搬到中央苏区以后的路线。中央搬到苏区以后，博古、洛甫亲自到苏区执行极左的路线，这对于中央苏区就发生了很大的影响。他们认为必须彻底执行中央的路线，在这种情形下面，他们认为旧省委是机会主义动摇，撤销了旧省委，组织了新省委。这个新省委在思想上、政策上比旧省委自然表现要更“左”，但是我们今天来说这个新省委是否满足了当时的中央的要求呢？也没有，也没有完全彻底地执行他们的路线，因此他们说新省委还有右倾机会主义。

这里我顺便说到一个问题，有同志说派刘士杰到中央报告是一个错误，我说这也只是相对的正确。刘士杰这个人品质不好是事实，但是派别人是不是也会带一个机会主义动摇的帽子回来呢？我可以肯定地说，一定要带的。为什么？中央从上海

搬到中央苏区以后，为了贯彻自己的路线，采取的办法就是打倒一切，否定过去，把罗明路线的帽子到处戴。因此我想无论是王震去也好，张启龙去也好，都免不了要带一个帽子回来，恰好湘赣那个时候失去了上犹苏区，红军有些缩小，那一定会戴上机会主义动摇的帽子的。所以今天我们检讨湘赣历史，我认为应否定那时候中央对旧省委是机会主义动摇的估计，因为这不合乎事实。随着这个否定，当然改组省委也就是错误的，后来打击省委这些人是更不对的。我看不仅仅对湘赣右倾机会主义动摇这个估计不对，就是罗明路线，江西几个区域的机会主义的帽子，戴得也不对。我想统统应在否定之列。如果现在我们研究罗明路线这个问题，我看错误的不是罗明，罗明倒是提出了一些边界上斗争策略的问题，如武装斗争、两面政策等。他是反映了一些实际情况的。这些问题既然已经提出来了，应该很好地去研究解决，但那时候中央不独未去研究，反而抓住这一点来打击他。

至于旧省委和新省委所执行的路线，“左”的具体的内容是表现在各种政策上。

旧省委在土地政策方面就改变了毛主席过去的分田原则，根据当时党中央的决定，实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重新分配土地虽说是对的，但问题不在这个地方，而是分田的方法不对头。此外，如驱逐豪绅地主出境也是“左”的。在劳动政策方面是执行第一次全苏大会所通过的七十五条劳动法，这里面有八小时工作制那一套，把大城市的東西搬到农村里应用。文化政策也是共产主义的一套。苏维埃政权建设也是根据全苏大会所通过的宪法大纲进行的，那个宪法大纲是很“左”的，在那里规定了一切剥削者都没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但规定富农没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简直

和苏联无产阶级专政差不多了，这就表现了对革命性质的模糊。照那个东西看起来，只有雇农、贫农、中农才能够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肃反是在中央苏区时特别授命为中心工作的。在军事行动方面，在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这个“左”的口号下面打过一下分宜，但只是打过一下，以后就没有打了。这一套“左”的政策是为旧省委所执行了的，但是执行得不彻底。比如有些地区分田还是按人口分；军事行动上要与湘鄂赣打通，打了一下没有打通就不打了，因此后来受了批评打击。

新省委因为在思想上政策上比旧省委更“左”一些，所以在某几个政策上就特别表现了突出的“左”。

第一，在土地问题上，查田查阶级方面比旧省委表现得更“左”。旧省委在土地问题上也是“左”的，如驱逐豪绅地主。新省委没有驱逐豪绅地主，但是有查田查阶级。驱逐豪绅地主不对，但它还是对地主阶级的，而查田查阶级却侵犯了农民的利益，特别侵犯了中农的利益。把中农当富农，把富农当地主，甚至查出一些干部家庭成分不好，认为他们是阶级异己分子而放在劳役队，甚至当作反革命。当然省委并未决定查田要查几代，然而实际上是查了几代。

第二，在思想斗争中的打击政策也特别“左”。反对王首道的机会主义动摇是错误的，那个时候的打击政策，在湘赣已经发展得很厉害。今天我们看，对王首道、张启龙以及甘泗淇这些同志的打击都是不对的，一直到我们与夏曦同志的斗争方法也有错误。这种打击政策一直继续到六中全会时，才基本上结束。

第三，是在群众动员工作中的强迫命令。这里面包括扩大红军，动员担架伕子、借公债等，比过去旧省委时期也为突出。打击政策不仅在党内存在，而且扩大到了群众里面去了。

在扩大红军方面枪毙的人还少，动员逃兵归队方面枪毙的人就多一些，查田查阶级里面杀人杀的也还少。这一点上得出的结论是，虽比旧省委突出，但与中央苏区也不同。在干部打击政策方面，我看和中央苏区比较一下也不同。

这三个问题是新省委特别突出的“左”的政策表现。

至于其他政策如劳动政策等都还是继续旧省委的一套，没有什么变化。

总起来说，就是新省委继续执行“左”的政策，在思想上比旧省委更“左”一些。在各种政策上，特别在上面举出的那些政策上更加“左”得突出一些。这里也要说明，新省委执行的政策虽然更“左”，但并没有完全达到当时中央所要求的程度，因此使得中央后来还批评新省委有右倾机会主义。

（二）新旧省委在肃反工作上的问题

在肃反政策上，第二次肃反是否比第一次肃反高潮时闹得更厉害，更恐慌一些呢？我问了几个同志，在群众中造成恐慌的还是第一次肃反高潮。但第一次干部恐慌情绪少一些，第二次肃反高潮捉的干部多，群众少，在干部中造成恐慌这是可能的。第二次肃反高潮与第一次肃反高潮比较起来，恐怕还是第一次肃反要乱一些，捉的杀的也要多一些，县级干部也不少，而第二次肃反则比较有秩序些，捉的也比较少一些，但其中重要干部占的数量为多。为什么？因为第一个高潮时社会秩序没有建立起来，区乡都可以杀人，后来秩序渐渐建立，已经不像过去一样混乱。裁判部已经设立了，不能随便杀人，杀人要经过省府批准（逃兵例外）。有的同志估计第二个时期杀的人质量比较高一些，这是个事实。为什么第一次肃反时旧省委比较坚决，而在第二次肃反或刘士杰捉了很多人时就动摇了呢？因为第一个时期捉的人主要是西路分委的干部，那个时候对西路

分委有这样一种观感，觉得西路分委 AB 团多，这也是自然的，因为富田事变发生在那里，当然这也还是错误的。但这里面也还是存在着不自觉的山头主义的，觉得湘东南的干部可靠些，对西路分委的干部因为有富田事变的关系，怀疑多些；又因受了中央的命令，因此肃反坚决些。而第二次发生动摇，因为肃到湘东南这批干部身上来了，肃到自己在赣西南提拔起来的一批干部（他们是本地的，是经过旧省委提拔起来的，所以比较熟悉一些），因此对肃反发生怀疑，于是派人到中央报告。王首道、王震、甘泗淇、张启龙虽都怀疑，但派人去报告恰恰碰到更“左”的路线来了，它是以更“左”的精神来看苏区的问题的，所以反而批评旧省委对反革命容忍姑息，不仅没有支持旧省委对过去肃反的怀疑，反而批评旧省委右倾。第一次与第二次肃反，军队里面都要好一些。

以上是新旧省委在肃反工作上的比较。新省委所提出以赤色恐怖镇压白色恐怖的口号是不对的，但在这个口号下面杀人也还不算很多。当时刘士杰有这样的意见，说带一升米进永新城就要杀，这个意见是被大家反对了。

新旧省委都是执行“左”的肃反路线的，新省委时期表现得更“左”一些的，表现在旧省委还犹豫的，新省委肯定了，杀了，捉杀了一些重要干部如袁德生等。但也不能说后来肃反是怎样扩大化，因为建立了革命秩序，不会使肃反那样无组织地发展下去。我在省委的这一时期，对清理旧案，我没有尽到责任。这是一个很大的损失。

我想肃反问题就暂时说到这里，大家还可以交换一下意见。

（三）新旧省委在军事方面的问题

新省委在军事政策方面比旧省委更“左”的有哪些方面？

我看旧省委在执行“左”的军事路线方面，只是打过一次分宜，而新省委在五、六两月基本上接受了新的军事路线。

在国内战争的环境下面，在苏区斗争的环境下面，军事问题是占很重要的地位的，有时候甚至是起决定作用的。军事问题包括军队建设和军队作战方针。我有这样一个认识，大家也可以考虑一下，就是朱毛红军传统在湘赣军队中保持得更久一些。比如红军三大任务的作法在湘赣苏区就保持得比较久。后来虽改变了，但在斗争中，在长征中，也还是多少采取这些办法的，有时候是斗争环境使你不得不这样做。在作战方针上，虽然旧省委在“左”的路线下也打过分宜，但经过那个尝试之后，碰了钉子，马上就停止了，而采取了游击战与运动战的方针。后来新省委也执行过新的军事方针，如修碉堡、筑工事等，但搞了两个月之后，事实告诉我们不能那样做，所以以后也改变了，由永新县转移到遂川、万安、泰和方面行动。在第一次长征行动中虽然有许多缺点，但基本上完成了任务。所以，可以做出这样的结论，就是在军事作战路线上还是保持了一些朱毛红军的传统。这一点也就使我们能够解释为什么我们还能够保存这样一些力量和一大批干部，并且还取得一些胜利。

一般地说，红军的产生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由旧军队暴动过来改编为红军的；一种是从当地群众斗争发展到武装斗争再发展为地方游击队，由游击队集合而为红军的。湘赣红军是第二种形式产生的，湘赣红军是由游击队集合而为大队伍的。独立师是这种情形，赣西南二十军也是这种情形。这样产生的红军有什么特点呢？

第一，这样的红军与群众的关系比较密切，它是在群众斗争下面产生出来的。

第二，这样产生的军队，对地方党政一般地说服从习惯要好一些，因为一个小游击队过去县委、区委都可以指导它的行动。

第三，这样产生的红军，干部的机动性和独立活动的能力强一些，士兵的觉悟程度、政治条件、政治基础也要比较好一些，因为它是在群众斗争中由最积极的分子集合而组成的。

湘赣红军具备了这些特点，我们应该估计它的政治素质是好的，对这个部队的战斗力也应该估计是相当强的。

对于创造这个队伍，哪些人是有功绩的，哪些同志是这个队伍历史发展上的重要人物呢？我们说从本队伍里面产生出来的重要人物应该是谭思聪、王震、谭家述等同志，这些人都应该作为这个部队的创造者。李天柱、萧克、蔡会文这些同志是外面来的帮手，他们对部队的提高也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基本的创造者应该是上述那些人。

那末湘赣这个部队有没有弱点呢？它是游击队集合而成的队伍，民主性比较大一些，这一方面可以说是它的长处，但是另一方面部队的散漫习气是大一些。我过去也是这样看法，它的战斗力相当强，但游击习气大一些。

十七师北上，我们就其结果来看，是错误的。湘赣当时处于辅助地位，这种辅助力量为了与主要地区配合，受些损失，在原则上是可以的。在福建事变以后，如果中央的方针的确是配合十九路军，因此需要湘赣军队到南浔路上活动，以这个力量辅助主力，使主力红军配合十九路军达到粉碎第五次“围剿”的目的，这当然很好。但是，那个时候的十七师北上，并不符合这个实际情况，当然是不对的。如果没有北上，湘赣的整个形势虽不会根本改变，但是会使那个区域的斗争坚持得更

长一些。至于六军团的突围，还是不可免的。

在十七师北上回来之后是否执行过单纯防御的军事路线，退出永新时我记得是有游击战争的部署，那个时候还想占领井冈山。但是我们是不是受了新军事路线的影响还想在那里坚留一下呢？我想是有的。这就是说在五、六两个月基本上是执行了这个方针，后来，在松山战斗后才改变。但我们也不能把所有的筑堡垒的事情都归之于新路线。

突围的军事行动，在帮助主力红军方面，成为主力红军的先遣队的作用来说，大体上是完成了这个任务的。我们突围有没有缺点错误呢？应该说是有的，主要的我看是因为我们没有经验。

三 对湘赣苏区新旧省委成绩的分析

旧省委时期有这样几个显著成绩：

第一，统一了湘赣边的领导。湘赣边原来是分散的，有湘东南、赣西南，还有北路分委，成立省委以达到对这个区域斗争的统一领导，是很需要的。

第二，旧省委深入了斗争，发动了基本群众，巩固了（恐怕还发展了）苏区。

第三，建立和发展了武装，如独立第一师等等。

这些是旧省委领导期间的基本成绩。省委、军区、省政府都起了一定的作用，我只这样概括地说一说。

新省委虽然是更“左”了，但也还有它的成绩。概括地说，是在保卫苏区的斗争上，在扩大武装及组织长征上，都有成绩。

为什么在错误路线下还可以得到这些成绩呢？我看可以作

这样的解释：

首先，这个区域实行了土地革命，虽然我们土地政策上是“左”的，如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但不能否定基本群众得到了土地革命的果实。雇农、贫农、中农（虽然也侵犯了他们的利益）对苏区是热情保护的，虽然我们执行“左”的路线，“左”的政策，但他们对于苏维埃政权还是爱护的。

其次，广大党员和干部是与群众有密切联系的，毛主席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在许多干部当中还是存在的，上面虽然规定了“左”的政策，但有许多干部在执行时，往往对它有许多纠正。如肃反问题，在军队里面并不是坚决执行的，并没有搞得很“左”，这就是有些纠正。许多下层干部是按照实际情况办事的，虽然规定的政策很“左”，但他们执行时是能做几分就做几分。

还有一点是两个时期的省委虽然很“左”，但其中还是有些作过实际工作的同志，如王首道、张启龙等就有实际工作的经验，与群众有密切联系，他们在执行“左”的路线遇到某些困难阻碍之后，有些修正。如在军事上打分宜打得不好，就不是去硬拼。其他政策方面也是一样，体验到做不通的时候，就有些转弯，有些纠正。这也是使我们能在工作中得到成绩的原因。所以两届省委都还是得到了一些成绩。

两届省委存在的共同的缺点，拿思想方法来说，都是有些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具体地说，都是对于一个区域的斗争历史没有加以深刻的研究，对当时的政策也是缺乏很好的调查研究。这大概是过去党内一般的作风。我们说如果对当时当地的情形加以了解，比如旧省委到那个地方以后，把这个区域加以了解的话，那末我相信对西路分委肃反中的问题会能发现，肃反中的“左”可能有一些改变，对西路分委领

导下的干部，可能有不同的看法。新省委对过去也是缺乏了解，如果能像我们这次座谈会一样的座谈一下，那末对张启龙等同志的问题也会改变一些看法的。这都是割断历史，因此不能够接受那个区域的历史教训。这一点教训，我们一定要接受。这是将来任何一个同志到任何一个区域工作时，必须引以为戒的。

篡党篡军这个问题。旧省委是中央派去领导的，不能够说他是篡党篡军，上级派人下去领导就说是篡夺领导，那以后就不能派人。派去的人他并不是以阴谋手段把人家推翻，自己夺取领导，就不能说是篡。王首道以及其他几个同志被派去领导湘赣，中央指定他们为领导机关，这在原则上不能说是钦差大臣、篡夺领导。至于这个领导机关，接受本地干部参加是不够的。这一点两届省委都值得反省。蔡会文同志去了以后，当军区司令兼政委，并兼八军政委，是否能说他是篡军呢？从形式上来说把军权拿下来了，但也不能说他篡军，因为事实上加强了对这个区域的领导，对地方部队也有帮助，至于大家感觉到他闹独立性，不尊重地方党的领导，这种缺点是有的，但以后还是纠正过来了。

至于刘士杰这个人，他是有钦差大臣的味道的，好在没有让他掌握全权。他当时是被中央很信任的一个人，所以他去中央作了报告之后就被提为党的书记。刘士杰回来以后的确是神气十足，他想利用自己的地位打一些人，这个阴谋是明显的，但对刘士杰的本质是不容易一下认识清楚的。他会说话，是个工人，并且有些小聪明，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旧省委会把他提拔起来，我们那个时候也认为他还有些能力。我对刘是放任了，他就利用我对他的信赖进行私人活动。到什么时候才感到此人大不妙呢？在守井冈山以后。以前从他生活上也看出了一

些问题，觉得他是个好吃懒做的人。在长征中更暴露了他的坏处。到了与二军团会合以后，组织党的领导机关时，对他的认识已经改变了，过去是副书记，此时只参加常委。第二次长征之前，给了他一次很严格的批评，撤销了他的职务，这次之后他就跑了。今天我反省起来，觉得我对刘士杰的本质感觉不灵敏。他背的是工人金字招牌，当时就为他这些假象所蒙蔽。但说刘士杰当时就是反革命，我看则没有根据。我认为刘士杰和陈洪时都是投机分子。当革命胜利之时，当他们在党内有地位的时候，他们可以留在党内，当革命困难之时，当他们个人地位动摇时，他们就可离开革命，叛变革命。我们对这样品质的人，当时没有看清楚。在对刘士杰的问题上，我有责任，放任了他，对他的品质认识很慢，虽然认识一个人要有过程，但这个过程拖得很长。

还有一个问题也谈一谈，就是在错误路线下面一些党员违反了党的纪律，如贪污或破坏党的纪律的行为等，受了处分，不能说因为路线错误就要根本取消。

湘赣问题经过这几天的座谈之后，大家把问题都提出来了，上面我已经讲过，现在很难作最后结论，但是把基本意见暂时归纳起来还是可以的。大家对这些问题还可以继续想一想，我今天讲的这些也只是一个意见，还可以修改。因为一些同志要走了，座谈也还是带搜集意见的性质的，今天我们得出的只能是一个初步的大家共同的意见，七大以后我们对于湘赣问题再进行更深刻的讨论。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出版的
《任弼时选集》刊印。

注 释

〔1〕即周恩来。

〔2〕即秦邦宪、张闻天。

〔3〕指一九三二年五月十一日中共苏区中央局《关于领导和参加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与扩大民族革命战争运动周的决议》。

〔4〕指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

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

(一九四四年十月三十日)

毛 泽 东

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日本帝国主义和希特勒一样，快要灭亡了。但是还须我们继续努力，才能最后地消灭它。我们的工作首先是战争，其次是生产，其次是文化。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

解放区的文化已经有了它的进步的方面，但是还有它的落后的方面。解放区已有人民的新文化，但是还有广大的封建遗迹。在一百五十万人口的陕甘宁边区内，还有一百多万文盲，两千个巫神，迷信思想还在影响广大的群众。这些都是群众脑子里的敌人。我们反对群众脑子里的敌人，常常比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还要困难些。我们必须告诉群众，自己起来同自己的文盲、迷信和不卫生的习惯作斗争。为了进行这个斗争，不能不有广泛的统一战线。而在陕甘宁边区这样人口稀少、交通不便、原有文化水平很低的地方，加上在战争期间，这种统一战线就尤其要广泛。因此，在教育工作方面，不但要有集中的正规的小学、中学，而且要有分散的不正规的村学、读报组和识字组。不但要有新式学校，而且要利用旧的村塾加以改造。在

* 这是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者会议上所作的讲演。

艺术工作方面，不但要有话剧，而且要有秦腔和秧歌。不但要有新秦腔、新秧歌，而且要利用旧戏班，利用在秧歌队总数中占百分之九十的旧秧歌队，逐步地加以改造。在医药方面，更是如此。陕甘宁边区的人、畜死亡率都很高，许多人民还相信巫神。在这种情形之下，仅仅依靠新医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新医当然比旧医高明，但是新医如果不关心人民的痛苦，不为人民训练医生，不联合边区现有的一千多个旧医和旧式兽医，并帮助他们进步，那就是实际上帮助巫神，实际上忍心看着大批人畜的死亡。统一战线的原则有两个：第一个是团结，第二个是批评、教育和改造。在统一战线中，投降主义是错误的，对别人采取排斥和鄙弃态度的宗派主义也是错误的。我们的任务是联合一切可用的旧知识分子、旧艺人、旧医生，而帮助、感化和改造他们。为了改造，先要团结。只要我们做得恰当，他们是会欢迎我们的帮助的。

我们的文化是人民的文化，文化工作者必须有为人民服务的高度的热忱，必须联系群众，而不要脱离群众。要联系群众，就要按照群众的需要和自愿。一切为群众的工作都要从群众的需要出发，而不是从任何良好的个人愿望出发。有许多时候，群众在客观上虽然有了某种改革的需要，但在他们的主观上还没有这种觉悟，群众还没有决心，还不愿实行改革，我们就要耐心地等待；直到经过我们的工作，群众的多数有了觉悟，有了决心，自愿实行改革，才去实行这种改革，否则就会脱离群众。凡是需要群众参加的工作，如果没有群众的自觉和自愿，就会流于徒有形式而失败。“欲速则不达”，这不是说不要速，而是说不要犯盲动主义，盲动主义是必然要失败的。在一切工作中都是如此；在改造群众思想的文化教育工作中尤其是如此。这里是两条原则：一条是群众的实际上的需要，而不

是我们脑子里头幻想出来的需要；一条是群众的自愿，由群众自己下决心，而不是由我们代替群众下决心。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刊印。

毛泽东、刘少奇关于准备力量 向苏浙地区发展给饶漱石、 张云逸、赖传珠的指示^{*}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日)

饶张赖：

美军可能在杭州湾登陆，而我们在那一带工作还很薄弱。为了配合美军登陆及准备夺取杭州、上海、苏州、南京等大城市，除粟裕带两团南进外，请你们考虑下列步骤：

(一) 设立苏浙军区，以粟裕为司令员，谭震林为政委，统一指挥苏南及全浙，将来必要时设立中央分局领导之。

(二) 除即调两团外，准备再从一、三、二、四各师调五至六个团南进。

(三) 从军直及各地抽调大批干部，加以两三星期训练，陆续派往苏浙。

(四) 对各大城市工作作具体布置。

(五) 对苏浙各区（浙东区、沪东区、杭嘉两区、浙西区、浙南区、苏南各区）作具体布置。

^{*} 这个指示是毛泽东起草的。

以上各项哪些可行，哪些不可行，哪些应急，哪些应缓，请提出意见。

毛 刘

戊冬

根据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一九九三年出版的《毛泽东军事文集》
第二卷刊印。

南下的方针与任务^{*}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四日)

任 弼 时

最近中央曾讨论同志们此次出发的任务及行动的方针，中央认为有必要给同志们传达一下，这就是今天开会的目的。

一

这次有许多干部及队伍从延安派到湖北、湖南去，并亦准备派往河南一批。从这里可以看出，中央有决心要在平汉路南段及粤汉路日寇最近占领区去开辟抗日根据地，在这些地方发动广大群众起来打日本，准备反攻。同时要在河南及湖南、湖北筑一道堤，准备用这道堤堵住国民党从西面冲来的反共反人民的逆水，预防国民党反共反人民的阴谋。这一道堤的修筑是很重要的。

为何说此堤的修筑很重要呢？因为我们看出，国民党对抗日不积极，实行民主之希望不大。全世界要实行民主，法西斯要垮台，这本来是必然的趋势，国民党应采取民主办法实行反攻，但它不是这样，它害怕，它不愿放弃其一党专制和个人独裁的办法，因此它在抗日方面是消极的，而反共反人民则是积

* 这是任弼时在八路军南下第一支队出发前的干部会上的讲话。

极的，并且准备在反攻时打共产党，所谓反攻与反共一同进行，反攻即将日寇、共产党一起攻下去。所以，我们必须准备，当国民党打我们时，我们有堤挡住它。如将来国民党进步，当然更好，我们也欢迎。我们提出改组政府及统帅部，即是希望它进步。我们希望它进步，不是消极地等待，而要积极地推动，并且要准备它不进步时抵抗它。现在看来，它的进步不大，因此我们更要筑堤防御。这个任务应当说是很大的。

在这样的总的意图下面，到了湖南、湖北这些区域之后应当搞什么呢？

首先就是要搞武装。扩大武装创造武装力量在长江南面特别重要，因为我们现在在华北华中有八路军、新四军，在华南只有东江一带有我们不很大的游击队，在长江以南根据地区域我们的武装力量还很小，过去发展的机会也不多。现在我们有了机会，因此我们要在长江以南努力发展武装力量。中国的事情就是这样，谁武装力量大一些，谁讲话才会有力量。为什么共产党今天在中国有这样的地位？因为我们有八路军、新四军。但是，我们这个力量今天在华南还很小，拿我们的力量与国民党的力量比较起来看，国民党的军队在数量上比我们多（当然在质量上比我们差）。现在我们需要改变这种状况，就是说我们在华南日本人占领的地方要建立和扩大我们的武装力量。在华北华中我们现在再发展也比较困难，将来反攻的时候可以发展。我们要使我们的武装力量进一步发展。比如现在国民党有三四百万军队，其中地方实力派的军队占了好几十万。我们前不久有四十七万军队，现在则有六十三万军队，将来要作到能有百把万军队，而且我们军队的质量要比国民党的好。我们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加上地方进步武装，合起来要超过国

民党的中央军，超过国民党的力量。这样，在解决中国问题的时候，共产党才更有力量。只有当我们力量更大的时候，才可以使国民党在某些方面表示一些进步；也只有当我们力量更大的时候，地方实力派和中间派才会跟着我们走。因此，为着打日本，为着筑成这样一道堤，同志们去了以后要首先做发展武装力量这个工作。

第二是要组织千百万的群众。我们要把湖南、湖北以及华南没有组织的、散漫的、但是要求抗日和不满于国民党统治的群众组织起来，成为我们在那个区域存在所依靠的力量。同志们，大家都知道，没有雄厚的群众基础，就是脚也站不稳的。

第三是准备进城。有了武装力量，有了为我们所依靠的广大群众的组织，我们有什么意图呢？我们要想到在反攻的时候，在把日本人打走以后，占领武汉，占领长沙。今天我们要作这个准备，要这样来布置我们的工作，要从敌人手里夺取这些大城市。如果那个时候国民党还不进步，国民党这股逆水从西边冲下来，我们就要占住这些城市进行抵抗。今天估计，国民党的这股逆水大致会分三股从西边冲下来，即由西安到洛阳、郑州为一股；由宝鸡、汉中往襄阳、武汉为一股；从重庆往沙市、长沙为一股。他们大概是准备从这些方向冲下来破坏我们，阻碍我们的反攻。我们要有这个精神准备，要有夺取城市，占领武汉、长沙、郑州这些地方的计划。如果国民党进步，采取民主的办法，执行了民主制度，改组了统帅部，那我们当然欢迎，但我们也可以进城，他们也可以进城，国民党进步则共同进城。如果它反动，那我们就要拿这些城市作为防御遮挡它的堡垒。

总之，在总的方针下面，我们有这样三件工作，即发展武

装，组织群众，准备进城。这也可以说是我们总的意图，这次同志们出发就是要干这些事情。

二

我们估计一下，究竟日寇在长江以南，在武汉这些地方可能停留多久。目前日寇在华南一带继续扩大它的占领区，目的大致有两个：一个是因为英美打到菲律宾这些地方来了，它不得不在中国大陆上打通与南洋群岛的交通，所以它必须继续打通湘桂路，与安南取得联系；同时它又必须打通粤汉路，因为海上交通被英美控制了，它在南洋有四五十万军队要撤退。第二个目的是它要把华南掌握在自己手里，准备与英美作战。它想掌握整个华北、华中、华南在自己手里来拖延战争，引起英美内部孤立派的抬头，然后拿中国华南这些地方与英美讲和，与英美作生意，以避免它的完全失败与无条件投降。日本所以要占领华南这些地方，在我们看来不外是这样两个目的。日本的企图是要把华南这些地方占领得比较长一点的时间，但是不是能够实现它的这种企图呢？那就很难说。现在美国在太平洋有了很大的胜利，最近在菲律宾又登陆，估计在菲律宾这些区域占领后，可能向台湾进攻，以后可能在中国东南部长江流域一带登陆。如果美国能够在长江流域登陆，可能使日本不得不从南洋及中国南部撤退。如上海、南京这些地方被美国军队占领时，武汉就很危险，日本为了缩短它的战线，就要从南洋甚至从武汉这些地方撤退，撤到长江以北，甚至黄河以北。另外，日本还可能有一种企图，就是从武汉退出，以引起国共两党的内战，它坐收渔人之利。究竟什么时候会撤退，当然现在还很难说。如果说美国后年下半年可能在中国登陆，那末日本

就可能于那时向北撤退。我们现在从延安出发，估计明年四五月才可以到湖南那些地方。在那里，至多只会有年把的时间在日本占领下的那些地方进行我们的工作，甚至于还要短，甚至于日本人从那个区域退出还要快一些。这就是说我们要估计到日寇在那里的时间不会很长。这就告诉我们必须在很短的时间内，年把甚至半年内，打下我们的工作基础，就是说准备将来日寇退了以后，我们还能够在在那里继续坚持斗争。因此，我们必须争取时间，要更加扩大我们的力量，发展我们的工作。

三

这次出发的干部，有到湖南的，有到湖北的。到湖南去搞什么呢？到湖南去就是要在湖南建立根据地。究竟在湖南什么地方建立根据地？同志们都谈过这个问题，有的说在山上，有的说在平原，有的说在过去老苏维埃的区域。我想现在在这里恐怕不能够肯定，但我们可以看出，现在我们创造根据地，比之内战时期是有了不同的形势的。在内战时期，我们建立根据地总是靠大山，在几个省交界的地方建立苏维埃根据地。现在的情形是我们要在日本人占领的地方才能够发展，而日本人占领的地方不是山地而是平原，是交通要道。我们也要随着这种形势选择适当的地方建立根据地，就是说我们现在建立根据地是在平原。内战时期我们在山上，国民党在平原，现在是国民党在山上，我们则在平原，在靠近交通要道的地方，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够得到发展。到湖南究竟在什么地方才能够建立根据地？我们现在也不便宣布，但我們要注意选择便于我们组织力量打日寇，便于我们组织老百姓筑堤，便于我们将来夺取

长沙，合乎这些条件的地方去建立根据地。我们的力量要使用在这样一个中心区域。对于其他次要的区域，应当派干部去，应当派支队去配合中心区域去发展。日寇没有到的地方也很重要，我们也可以派干部去，在那里做秘密工作，发展党的工作，但必须着重在一个中心区域。派人到湖南去，这是第一批，将来还有第二批。真正准备要夺取长沙，那就要求到湖南去的同志迅速地到达那个区域，很快地发展力量，还必须争取发展三五万军队，必须有几百万有组织的老百姓，真正做到人山人海，在我们党的领导下面，这样我们才能够谈得上进长沙。

到湖北去的同志们，到新四军五师那个区域去的同志们，也有一批。现在五师活动的几个根据地，包括平汉路东面西面及鄂南的一部分。湖北这个根据地主要应该向哪个方向发展呢？它本来四面八方都可以发展，但在目前，我们觉得它主要发展的方向应该是向南或者向东。向北发展本来也很重要，但这个任务我们可以另外派人去，而且五师已经派了一部分干部和一部分队伍去了。五师目前应该向南发展，使之与这次到湖南去的同志们活动的区域衔接起来。向东有九江、无为、新四军军部所在地，与二师、六师那些区域打通。向西也很重要，但假如日寇不向西前进的话，继续向西发展我们的区域比较困难，因为那里都是国民党的区域。西面重要不重要？应该说很重要，如果国民党的军队将来从重庆那些地方冲下来，就是从西面来。所以，我们在西面洪湖三水南北如果不能够向前发展，也要求得工作的深入与巩固，提高我们部队的战斗力，把老百姓很好地组织起来。如果日寇还要占领更多的地方，我们也可以发展，其目的在什么地方呢？也是准备将来夺取武汉，进武汉。

所以我们说同志们到湖南去的也好，到湖北去的也好，我们都要有这个准备，准备进武汉，进长沙。当然，哪天能进这还要看我们自己的力量，看那个时候的条件。我们要准备进这些城市，并且还要准备进了这些城市因为力量不够又要退出这些城市，当然最好是不退出，但国民党的力量比我们大，我们先进去，它把我们又打出来也是可能的。我们要准备即使是它把我们打出来，我们还要在城市周围活动，要准备在那里坚持斗争。

四

我们去湖南也好，去别的地方也好，上面我已经讲到，必须要有强大的武装力量。但这里还要指出，我们不仅仅要在这些区域创建强大的武装力量，并且还要有各项正确的政策，才能在这些根据地里得到群众的拥护。我们知道中国还有些人甚至是不少的人，对我们八路军、新四军和共产党表示很尊敬很佩服，但对我们的一套办法，对我们的各项政策，他们还是表示很害怕的。有些外国人也是这样，他们觉得我们共产党有力量，能够联系群众，军队也能够作战，但仍怀疑我们。比如美国人就怀疑我们是不是听苏联的话，是不是跟着苏联跑，是不是执行苏联的命令，我们的民主是真的还是假的。中国人当中有些也怀疑我们的“三三制”政策是真的还是假的，如果是真的，他们就赞成，而如果是另外一套，他们就害怕。所以我们在这些根据地里，不仅仅在军事上要表现我们有力量，而且要在政策上能够为广大人民所拥护。这就是说，我们的统一战线政策、“三三制”政策、财政经济政策、土地政策，的确要能为各阶层广大群众所接受和拥护。我们要在实际行动中间表现

出我们确实是这样做的。至于许多政策的详细论述，我不准备在这里说，许多同志也都给你们讲过，你们也座谈过了。这里就是提出这样一个要求：即我们对于这些政策应当很好地去了解，使我们的各项政策都发生很好的影响。国民党批评我们共产党破坏有能力，建设没有能力，我们要表现我们在建设方面有办法，不比他们差，要比他们好。如陕甘宁边区的建设即是一例，陕甘宁边区的建设在外面宣传发生了很好的影响。在华中、华南的建设要靠谁呢？要靠我们，就是要靠这次去的同志们。只要我们建设得很好，长江流域的老百姓就会相信我们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

五

初去这些区域的时候，有几件事同志们要特别注意。整个湖南及湖北大部分地区还没有我们的政权，到湖南去是才开辟工作，我们去了以后要吃饭要穿衣，这里就有一个问题要同志们注意，国民党为什么脱离群众？就是因为它在要人要钱上与老百姓发生了磨擦。我们这次去的时候，如果在路上不注意这个问题，和老百姓的关系就会搞坏。所以在这次路上吃饭如何办呢？我们钱带得不多，经过城市、村镇时，应通过商会或当地政权机关帮我们筹一点钱粮，但不能使老百姓感到我们筹得多，至少也要使老百姓把我们与国民党区别开来。到了目的地，可以向老百姓借或摊派一些。到政权建立之后，这个事情就更更要做得有秩序。总之，在负担问题上，我们要避免混乱现象，不致引起老百姓的不满意。我们经过的区域，我们初到的区域，这个问题要特别提醒同志们注意，不要一去就和老百姓搞翻了。

其次，这里也特别提一下，即一般不要杀人。因为过去在湖南老苏区给了老百姓一个印象，他们觉得共产党好倒是好，就是杀人杀得厉害，如在湘南暴动时烧了很多房子，杀了很多人，在苏区之内也杀了很多人，老百姓对于我们有了恐惧心理。所以我们这次去，无论在路上或到达目的地，对于杀人要很慎重。只有那些为老百姓所非常痛恨的才杀个把，其他一般不杀，甚至本来应该杀的我们也不杀，判处以徒刑。这样，改变老百姓对我们的看法。我们不要乱杀人，我们应该检讨过去苏维埃时代杀人杀得太多，那是错误的。所以同志们特别要注意，无论是你们经过的区域也好，将来的根据地也好，要尽量少杀人，当然也不是不能杀，但总以少杀为好。

第三，对过去自首自新过或叛变过的人怎么办？过去叛变过或曾经自首自新过的人，只要他们今天愿意抗日，对顽固派也表示坚决反对，能够和我们在一起进行斗争的，我们就要表示欢迎，欢迎他们一块儿抗日。但是我们不能不提高警惕，也要注意考察他们。至于党籍问题，我们党内要保持成分的纯洁，一般地说不能一下就恢复他们的党籍。将来可不可以，那要看以后的事实，看他们以后是不是忠诚，是不是有很大的功绩。这个问题，可以放在将来再说，现在不能够一下吸收入党。

六

这次出发的同志，大部分到湖南，另外一部分到湖北，到五师那个区域去，其中一部分是原来洪湖区的干部，一部分是原来鄂豫皖的，一部分则是去大别山的，大体上是这三部分。中央讨论认为，到湖南去的干部应当在王首道、王震同志领导

的军政委员会统一分配下工作。到湖南以后，哪些同志应当去主要地区，哪些同志应当到次要地区，要听他们的分配。到湖北五师去的，在今天以前有同志已经传开，说我是到洪湖的，你是到大别山的，他是到什么地方。中央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确定到湖北的同志，不管到哪里，应当统一在五师地区区党委（区党委书记为李先念同志）和司令部下，按照哪个地区有发展前途，哪个地区有需要，由他们看情形统一分配。这一点，我们要在这里讲清楚，他们分配的时候当然会照顾到哪些干部适于去哪些地方，哪些地方需要哪些干部去，不能说洪湖的干部就一定分配到洪湖工作，大别山的干部就一定分配到大别山工作。根据我们上面所讲，向南发展最重要，并且有发展前途，区党委就可能从洪湖干部中或者大别山干部中派人去。向东要与新四军军部打通，也可能抽干部去。所以现在我们必须说清楚，不然将来去了又扯不清。

这次去的干部，一、二、四方面军的都有，大家应当很好地团结。在路上行军时就应当很好地团结，到了目的地以后，如到了五师地区或湖南以后，应当好好地团结在军政委员会、党委和党的路线下面工作，防止闹独立性。特别是到湖北去的同志，应该注意到情况的不同，因为那个地方现在已经创造了基础，已经打开了天下，生长了一大批干部。在那个地方工作，还要靠那个地方的干部基础。李先念同志去的时候，只带了七八十个干部，许多干部是当地土生土长的，他们在几年的斗争中已经有了发展。同志们，你们这次去了，首先要求得和他们的团结，不要以为我是老资格，是延安来的。应该首先要尊重他们，和他们团结。对上级应当服从领导，对同级应当尊重他们，对下级也要向他们学习。要承认他们那段历史有功绩，虽然他们在某些方面可能比我们这次去的同志差一些，我

们也应该采取帮助的态度，向他们学习的态度。我们不是去当首长的，而是要自己努力，好好工作，搞到多少人，就当多大“官”，搞到一排人，就当一个排长。

七

这里我还要说一个问题，即我们对大后方的党应该如何估计呢？过去在抢救运动的时候，觉得大后方的党大部分不可靠，被特务的红旗政策^{〔1〕}把我们党搞得一塌糊涂了。这种错觉，现在个别同志或某些同志思想上还有。中央讨论这个问题时认为，大后方的党绝大多数人是可靠的。我们拿陕西的经验或者拿其他地方的经验来看，确实是这样的情形。湖南有五六千党员，在报上宣布自首脱党的有好几百人，虽然有这样多脱党的，但我们估计留在党里的绝大多数还是好的，虽然今天他们没有党的关系（因为撤退了领导机关）。上面没有去联系，但下面仍有组织，仍有党的活动。过去我们在大后方的党组织，农民党员占大多数。国民党对农民一向不注意，不重视，国民党注意的是知识分子；就是知识分子党员，国民党也没有办法把他们大多数搞去自首叛变，反对我们。我们说小部分党员可能发生问题，但这小部分中间真正坚决反对我们的，我们估计也是少数。那种自首叛变的人中，坚决反革命的，我想也是极少数。困难的是这小部分人中哪个是好的，哪个是坏的，哪个可靠，哪个不可靠，这是很难区别的，因为他们脸上并没有记号。这应当怎么办呢？我们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在斗争里面去考验他们。比如同志们到了湖南，湖南过去有五六千党员，以后省委撤退了，县委也没有了，下面的支部有的撤销了，有的还存在，你们去了以后，会有许多人来找你们。现在

已经有人在那里搞武装，并已搞起了游击队，这些人他说他过去是党员，究竟如何你们刚去又没有办法判明，只有在斗争里面去考验。是否党员还可以互相证明，是否是坚决的党员，则可以在斗争中去考验，考验他们对日寇、对顽固分子的斗争是否坚决。我们应该相信他们是好党员，自然，这也不妨碍我们应有的警惕性。对于他们，我们还要严格考察，一般地说，在斗争中考验党员的可靠与否是最好的办法。

八

最后讲一讲这次出发所用的名义和组织：这次出发，有的只到湖北，有的还要到湖南，这一段，我们没有确定固定名义，叫游击支队也可以。队长是王震同志，政委是王首道同志，副政委是王恩茂同志，政治部主任是刘型同志。由湖北到湖南是用湖南抗日救国军的名义，八路军、新四军的名义一下打出去也不好，将来还可以采用各种名义。从这里出发到湖南，除开司令员、政委之外，还要组织军政委员会。军政委员会由下面九个同志组成，即：王首道同志为书记，委员有王震、王恩茂、刘型、廖汉生、贺炳炎、文建武、张成台、聂洪钧等八同志。到湖北以后，有四个同志留下来。到湖南后成立党委，用电报和中央联络，那时候的组织到时再来决定。湖南党的组织，应受五师这个地区党的领导。

同志们这次去，任务是很重大的，但工作能够顺利展开，就是说那个地区的老百姓是欢迎我们的。最近我们派了队伍和干部到河南，那个地方的老百姓非常欢迎，我们的工作开展得很快，唯一的感受是干部不够，部队也不够。我想你们到那里后也将会是这样的情形。党所提出的这些要求和任务，我想你

们也一定能够完成。但同时也必须指出，困难也还是很多的，斗争也是非常艰苦的。将来筑堤是不是能挡住逆水，那就要靠同志们很大的努力。还要遇到很多困难，但不管如何，我们要在那个区域坚持斗争，坚持长期斗争。如果国民党那个时候不进步，将来硬要和我们打起来，那末首先从哪里打起来呢？就是从你们现在去的这些区域打起来。我们要抵抗他们，可能八路军、新四军在其他地方把日寇赶走了，并在那些地区已经胜利地占领了大城市，而你们这个方向的战争也许还是很激烈的。你们这个方向担负的任务是很重大的，斗争也将是很残酷的，也可能在国民党的逆水冲下来时把你们隔在后面，但你们还要在那里坚持斗争，那个斗争是很残酷的，参加过内战时期斗争的同志们都会知道。但虽然艰苦，我们是有前途的，我们有军队在那里坚持，我们相信在那里新民主主义一定会胜利。今天有我们的党，有毛主席的领导，胜利的前途是很大的。所以同志们在敌后长期坚持斗争，表面看来是孤立的，但应当看清楚我们是有前途的，最后我们是能胜利的。大家要有这样的信心，要看到我们的希望与前途，胜利也不容易，是要流血的，困难是有的，但我们有办法克服。

总的说，胜利的前途是存在的，是光明的。我今天就把中央上次讨论时涉及的一些问题向同志们报告一下，告诉同志们出去时应该有这样一个方向。我的话就说到这里。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出版的
《任弼时选集》刊印。

注 释

〔1〕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特务机关曾开办和组织一些伪装进步的报社、书

店及文化团体，甚至组织假共产党，诱捕进步青年和共产党员，迫其自首，再让他们加入或留在共产党组织内部，伺机破坏。这种反共策略称为“红旗政策”。在延安整风审干期间，曾出现过对这方面的敌情估计过于严重、反“红旗政策”扩大化的现象。

毛泽东同赫尔利的谈话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八日)

我们欢迎赫尔利将军到延安，并感谢赫尔利将军帮助中国团结抗战之热忱。中国的事情很难办，这一点在中国多年和来延安已有一些时候的包^①上校知道得很清楚，还有许多美国朋友也都知道。中国有丰富的人力、物力，我们所需要的就是团结。但是要团结必须有民主，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在民主基础上团结全国抗日力量。现在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都打得很好，唯有中国正面战场上打得不像样子，这是因为中国缺乏民主。现在赫尔利将军到来，帮助中国人民一手，促进中国民主团结，我们极表欢迎。尤其是在今天，日寇向中国西南进攻，美军打到菲律宾需要中国配合，但国民党当局所负责的正面战场却天天打败仗。中国人民和盟国朋友都非常着急，希望经过赫尔利将军的努力帮助，中国局势能有一个转机，就是从破坏团结、破坏战斗力、破坏民主、和同盟国关系搞不好的方向，转变到加强团结、加强战斗力、加强民主、和同盟国关系搞好的方向。经过赫尔利将军帮忙，能做到这一点，这是全中国人民都会感谢的。

今天上午赫尔利将军说要自由的、公开的、坦白的谈话，现在我就按照你所提的方法来谈一谈。

直到现在国民党还是一个大政党，拥有庞大的军队，这个

军队在抗战头两年打仗打得比较好，现在总算也还在打日本，国民党当局还没有最后破裂民族团结，这是蒋介石先生所领导的党和政府好的一方面。因此，我们一向愿与蒋先生合作打日本，我们从未放弃过这一条。但是，还应当看到另一方面，那就是中国的困难、缺点与严重危机。如果不看到这方面，就不能解决问题。现在中国政府的政策（直到现在还是如此，希望有所改变）是不利于全中国人民的团结的，是妨碍全国人民起来打日本的。

中国现在分为三个区域：敌占区，中国共产党人与非党人士所领导的解放区，国民党直接统治的区域。

对于第一种区域，即敌占区，国民党当局是不管的；对于如何在这个地区内组织地下军以期配合盟军登陆作战，国民党当局也是不管的。

对于第二种区域，即解放区，国民党当局则是拼命妨碍、限制、缩小、消灭，但是解放区还是天天生长。你看解放区为什么这样广大，这就是八年来广大人民艰苦战斗的结果。他们前面要打日本，同时后面又有国民党破坏，他们是处于被前后夹击的非常困难的环境中。关于国民党如何对解放区施行包围、进攻和派遣特务捣鬼等等，可以说是千方百计，一言难尽。

在第三种区域，即国民党直接统治的区域，存在着严重的危机，尤以军事危机为甚。自今年四月起，在日寇进攻面前，国民党军队已由二三百万减至一百九十五万。大部分国民党军队是打不得仗、一触即溃的。在大后方，民不聊生，土匪横行，人民对政府的信任从未有像今天这样低，各界人民包括大学教授、学生、小党派人士以及国民党员，都对当局不满和怨恨。

以上就是中国三个地区的概况，希望盟国朋友能了解真相。

现在日寇进攻中国西南，美军打到菲律宾急需中国配合，我们怎样才能很快解决问题，来团结全中国一切力量，配合盟国迅速打败日本，建立自由民主的中国？上午赫尔利将军说，美国要增加一点力量，来帮助解决这一问题，我们中国人民对此非常高兴。

关于如何解决，赫尔利将军曾提出几个要点，希望作为形成协定的基础。我们感觉还有这样一些问题，虽然还没有形成条文，值得提出来谈一谈。

中国大多数人民，包括我们共产党人在内，首先希望国民政府的政策和组织迅速来一个改变，这是解决问题的起码点。如果没有这一改变，也可能有某些协定，但是这些协定是没有基础的。因此必须改组现在的国民政府，建立包含一切抗日党派和无党无派人士的联合政府。同时，现在政府的不适合于团结全中国人民打日本的老政策必须有所改变，而代之以适合于团结全中国人民打日本的政策。

这一改革之所以必要，首先是为了挽救国民党直接统治的区域的军事、政治、财政、经济各方面的严重危机。解放区虽然非常困难，但是没有危机。如果不改组现在的国民政府，就无法振作大后方军队的士气，就无法挽救国民党统治区域的严重危机。国民党总是埋怨盟国军火接济不够，可是如果政府不改组，老的政策不改变，虽有大量坦克、飞机等新式武器，也是无济于事的。国民党统治的各种机构，腐败达于极点，改组政府，首先是为挽救国民党统治区域的危机。如果国民党自以为大权在握，不肯改变，人家有什么办法？可是它自己的危机，便会无法挽救。

关于“政府民主程序”一点，我感觉似乎首先应当改组国民政府，成立联合政府，改变政策。可是蒋先生历次所表示的，却是想拖，拖到战争结束后一年以内，才来办这件事，有人向他提出改组政府和成立联合政府，他便一巴掌打回去。如果这样下去，只有把危机拖长和扩大，使国民政府有崩溃之危险。对于这一危险，不只我们共产党人，就是外国朋友，如许多外国记者，都是感觉到的。

因此，国民党统治区域危机的来源，在于国民党的错误政策与腐败机构，而不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存在。

现在看一看我们共产党人如何工作。

在沦陷区，我们组织地下军，准备配合盟军作战。

在解放区，我们进行公开工作，组织人民，实行民主，坚持抗战。我们从不妨碍国民党，而国民党却来妨碍我们的抗日民主活动，在一百九十五万国民党大军里面，有七十七万五千人被用来包围我们，其中有一部分在进攻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用一切力量对日作战。

在国民党区域，当局见到共产党人，非捉即杀。从一九三九年起，我们在那里的党便被迫成为地下党。只有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社的少数共产党人还被允许公开工作，在西安也只有少数共产党人可以公开活动；在大后方其他各地，我们的党都被迫在地下工作。虽然如此，我们一不罢工，二不罢市，三不罢课，我们还是拥护国民政府打日本。

因此，我愿重说一遍：国民党统治区域危机的来源，在于国民党的错误政策与腐败机构，而不在于共产党的存在。

相反的，我们在敌后战斗的六十三万军队和九千万人民，拖住了日寇的“牛尾巴”，这样保护了大后方；假若没有这个

力量拖住日寇的“牛尾巴”，国民党早被日寇打垮了。今年六月间国民党当局提出了一个方案，要取消我们军队百分之八十，还要取消解放区的民选政府，这方案如果实行，就没有人拖住日寇的“牛尾巴”，就只有害他国民党自己。

上午赫尔利将军所提的要点中，有一条说改组我们的军队，说在改组后我们的军官和战士将获得和国民党军队一样的薪俸和津贴。这一条主要地恐怕是蒋先生自己写的。我以为应当改组的是丧失战斗力、不听命令、腐败不堪、一打就散的军队，如汤恩伯、胡宗南的军队，而不是英勇善战的八路军、新四军。现在美军观察组，在参观陕甘宁边区、晋西北、晋察冀等抗日根据地。我们在敌后有几十个根据地，大的有十七个。我们愿意你们组织几百个人的观察组，到各根据地去看看来做出结论，应当改组的究竟是哪一种军队。中国人民的公意是，哪个军队腐败，就应该改组哪个。关于薪饷待遇，国民党军队的士兵饥寒交迫，走路都走不动，士兵月薪五十元，只够买一包纸烟。我们的军队，吃得饱，穿得暖，走起路来蛮有劲。现在要我们拿同国民党军队一样的薪俸，那不是要我们军队也和他们一样吃不饱、穿不暖，走路都没有力吗？这如何使得呢？

我们的意见大要如此。对赫尔利将军为了帮助中国而不辞劳瘁长途跋涉的热忱，我们在延安的人们深表感谢。关于中国三个区域的实况，我们感觉到有告诉你的必要。

在不破坏解放区抗战力量及不妨碍民主的基础上，我们愿意和蒋介石先生取得妥协，即使问题解决得少一些、慢一些也可以，我们并不要求一下子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要破坏解放区的抗战力量和妨碍民主，那就不行了。

我很愿意和蒋介石先生见面，过去有困难，没有机会，今

天有赫尔利将军帮助，在适当时机我愿意和蒋先生见面。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三卷刊印。

注 释

〔1〕指包瑞德。

延安协定草案*

——中国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与
中国共产党协定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日)

一、中国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应共同工作，统一中国一切军事力量，以便迅速击败日本与重建中国。

二、现在的国民政府应改组为包含所有抗日党派和无党无派政治人物的代表的联合国民政府，并颁布及实行用以改革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新民主政策。同时，军事委员会应改组为由所有抗日军队代表所组成的联合军事委员会。

三、联合国民政府应拥护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建立民有民享民治之政府的原则。联合国民政府应实行用以促进进步与民主的政策，并确立正义、思想自由、出版自由、言论自由、集会结社自由、向政府请求平反冤抑的权利、人身自由与居住自由，联合国民政府亦应实行用以实现下列两项权利即免除威胁的自由和免除贫困的自由之各项政策。

四、所有抗日军队应遵守与执行联合国民政府及其联合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并应为此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所承认。由

* 这个协定草案是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与美国总统代表赫尔利商定的，蒋介石未签字。

联合国得来的物资应被公平分配。

五、中国联合国民政府承认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及所有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

中国国民政府主席 蒋中正

中华民国三十三年十一月 日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签字）

中华民国三十三年十一月 日

北美合众国大总统代表 赫尔利

（见证人）（签字）

中华民国三十三年十一月 日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日十二时四十五分，毛、赫在延安王家坪签字）

附一：赫尔利致毛泽东的信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日）

中国延安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先生

我的亲爱的主席：

我感谢你的光辉的合作与领导。这种合作与领导表现在你率领你的政党提出协定上，这一协定你已授权于我带给蒋介石主席，我同样感谢你要我转交美国总统的卓绝的信件。

阁下，请信赖我对于你用以解决一个最困难的问题的智慧

和热忱的品质，深感愉快。你的工作，是对于统一中国的福利及联合国家的胜利的供献。

这一光辉的合作精神，不仅将继续于战争的胜利中，而且将继续于建立持久和平与重建民主中国的时期中，这是我们的恳切愿望。

美国总统代表
美国陆军少将
赫尔利

附二：赫尔利带来之五条

（一九四四年十月二十八日）

为着协定的基础

一、中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将共同工作，来统一在中国的一切军事力量，以便迅速击败日本与重建中国。

二、中国共产党军队，将遵守与执行中央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的命令。

三、中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将拥护为了在中国建立民有、民治、民享的孙中山的原则。双方将遵行为了提倡进步与政府民主程序的发展的政策。

四、在中国，将只有一个国民政府和一个军队。共产党军队的一切军官与一切士兵，当被中央政府改组时，将依照他们在全国军队中的职位，得到一样的薪俸与津贴，共产党军队的一切组成部分，将在军器与装备的分配中得到平等待遇。

五、中国政府承认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地位，并将承认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的合法地位。中国一切政党，将获得合法地位。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四册刊印。

毛泽东给罗斯福的信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日）

罗斯福总统阁下：

我很荣幸的接待你的代表赫尔利将军。在三天之内，我们融洽的商讨一切有关团结全中国人民和一切军事力量击败日本与重建中国的大计。为此，我提出了一个协定。

这一协定的精神和方向，是我们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八年来在抗日统一战线中所追求的目的之所在。我们一向愿意和蒋^①主席取得用以促进中国人民福利的协定。今一旦得赫尔利将军之助，使我们有实现此目的之希望，我非常高兴的感谢你的代表的卓越才能和对于中国人民的同情。

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已一致通过这一协定之全文，并准备全力支持这一协定而使其实现。我党中央委员会授权我签字于这一协定之上，并得到赫尔利将军之见证。

我现托赫尔利将军以我党我军及中国人民的名义将此协定转达于你。总统阁下，我还要感谢你为着团结中国以便击败日本并使统一的民主的中国成为可能的利益之巨大努力。

我们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一向是有历史传统的深厚友谊的。我深愿经过你的努力与成功，得使中美两大民族在击败日

寇，重建世界的永久和平以及建立民主中国的事业上永远携手前进。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日于延安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四册刊印。

注 释

〔1〕指蒋介石。

中共中央关于东江、琼崖工作 给尹林平的指示^{*}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四日)

林平同志：

(一) 同意戍真电所述各项。(二) 特别注意西江，迅速向桂林、柳州发展，以便明年能和湖南部队（对外守秘）向桂林南进部分取得联系，好输送干部给你们。因此派往西江的部队及干部能多一点为好。你们今后主要发展方向是向广西与南路。(三) 嘱咐去琼崖的人，将中央对冯白驹同志及其整个部队致慰问之意带去，并告诉他们的任务有二：第一，派得力部队向南路发展，和你们取得联系；第二，占领整个琼崖。(四) 你们须办一大的训练军事政治与地方工作干部的学校，短的几星期，长的三四月毕业，分批集训，主要向广西方向派遣。

中 央

戍寒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 这个指示是毛泽东起草的。

开展大规模的群众文教运动^{*}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五日)

李 维 汉

一 边区群众文教工作的总任务

边区文化，有其进步的和落后的两个方面：新民主主义文化，是其进步方面；封建文化残余，是其落后方面。边区人民从政治上、经济上破坏了封建统治，反映政治经济的文化生活，也应破坏这种统治。从领导方向与新文教工作的政治地位看，文化上的这种旧统治已经破坏了。从边区的军队、工厂、公立学校和许多群众组织来说，这种旧文化的统治也已经基本上结束了。从农民的观点形态的最主要方面看，封建的束缚也已经被打破了。但从多数农民的文化生活的广大领域看，则封建文化的残余，还是存在着，并在某些领域，如卫生上与艺术上，暂时还占着优势，与边区的政治经济生活相反而不相称。因此，从旧到新，破坏封建文化残余，为新民主主义文化打开广阔发展的道路，使之正当地反映新的政治经济生活，仍是边区文教工作的重要历史任务，需要付以巨大的努力，才能成功。

* 这是李维汉在陕甘宁边区文教大会的总结提纲，原载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解放日报》。

与破坏封建半封建的政治和经济同时，边区人民即建立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经济。这个建设，在近几年来，尤有长足的进步（抗日与民主，民选政府与三三制，合作社与变工队，工厂与作坊等等）。可是另一方面，由于封建文化的破坏不彻底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不足，在边区人民的前进道路上还横着巨大的绊脚石：若干地区成年人百分之三与婴孩百分之六十的死亡率（还有在生产上居重要地位的牲畜的死亡率也是很大的），百分之九十的文盲与迷信，严重地妨害了他们政治经济生活的继续发展。因此，边区人民迫切需要生理上（卫生）与心理上（教育）的解放，也就是说，需要卫生运动与教育运动（报纸和文艺也都是教育的形式）。从无到有，从极少数到大多数，使文化生活适应于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使政治、经济的发展获得完全的解放。

因此，边区群众文教工作的当前任务，是开展卫生、教育、报纸、文艺的大规模群众运动，在生产第一与继续发展生产的基础之上，五年至十年之内，消灭百分之三与百分之六十的死亡率，大大增加人口繁殖率，消灭男子四十岁与女子三十五岁以下的文盲，大家能读能写，健康愉快，享有新文化生活，从而有充分能力向前发展政治经济。

因此，应该重视文教工作与文教运动。过去不重视的，应该转到重视。动员一切可能动员的力量，一致奋斗。

二 新的时期开始了

边区文教工作的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现在开始进入第三个时期。

内战暴风雨时期。人民把教育权夺到自己手里，为革命事

业服务。文艺方面，除各种剧团外，革命歌曲普遍流行，报纸也能反映群众的斗争生活。这时的文教工作，虽是比较粗糙与简略的（受当时环境的限制），但由于密切联系了群众和实际，对革命事业起了鼓舞群众意志与动员群众行动的积极作用，新鲜活泼，又健壮有力。

抗战后至一九四三年。边区因尚未遭敌人蹂躏，处在相对和平的环境，大批外来知识分子进入边区参加文教工作，数量上和规模上都有发展。但由于教条主义（内容上和方法上）与形式主义（作风上）作怪，日益同实际脱离，同群众需要违背。初期获有一种活泼气象，一九三九年后更转入沉闷与软弱无力。一方面，代表正确方向的因素被挤掉，或退居于次要地位；又方面，客观上帮助了封建文化残余的活跃（教育方面，特别是文艺方面）。

一九四三年以后，特别是今年，开始了一个新的局面，从沉闷转向活泼，并转向大规模发展（村学、识字组、读报识字组、黑板报、秧歌等）的局面。由于生产发展，群众的文化需要提高了。更重要的是由于整风运动，文教工作从与实际脱离，转向与之联系，知识分子从与工农隔绝，转向与之结合，因而被群众所热烈欢迎。新时期与新局面，是第一时期优良作风与第二时期发展规模相结合的产物。其前途将是大规模群众文教运动的展开。

救命第一，我们大会特地把群众卫生运动放在群众文教工作的第一位，教育、报纸和文艺，都要充分反映和指导这一运动。但它在第一、第二时期是没有地位的，因为过去根本没有重视过它，这主要是官僚主义作怪（也有一点教条主义）。现在，应该是这官僚主义彻头彻尾结束的时候了。

这一切工作，现在都还在开始，但已预示了灿烂的前途。

群众创造能力的闸门被打开了，我们已经发现了不少的模范医生，模范医药组织，各卫生模范村，各模范小学与识字组，各模范黑板报，读报组，工农通讯员，模范秧歌队……。只要我们善于坚持下去，一定能在数年之后，使边区面貌为之完全改观。边区将在各方面都成为全国的模范。

三 组织广泛的统一战线，团结为主

毛主席在大会上指示我们要组织文教战线上广泛的统一战线，不要闹孤立主义，这是十分重要的。我们要反对的是数十百万群众脑子中的封建遗毒，我们要建设的是百数十万人的识字与健康，而我们的干部又如此缺乏，我们的物质力量也深感不足，如果没有广泛的统一战线，便不要幻想大规模群众文教运动的成功。

统一战线的实质有两方面。一方面，是为要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中间力量，向封建文化的残余进军，是为要在文化上解放群众的旧脑子，从带有若干封建残余的脑子变为完全民主的脑子。又方面，是为要动员一切可能动员的进步力量，大踏步开展新民主主义文化运动，是为要在文化上扩展群众的新脑子，让他们看得远一点，从今天出发，又能照顾明天。由此，两条战线斗争会在各个问题上发生，也势必发生。要反对投降封建残余的倾向，又要反对打倒一切的倾向。一般说，以团结为主，从团结达到改造，达到消灭封建残余。

何者应团结或争取，何者应改造或批评，要从各个问题的具体性质与具体情况出发。旧秧歌的内容是封建的，调子唱“兄妹开荒”，则未必封建。报纸一般没有封建问题。所以不可一概而论，要加以具体分析。比如关于文艺形式问题，不是抽

象争论所能解决的，要看它能否表现新的内容，或能表现至何程度。凡是能够表现新内容而又为人民喜欢接受的，就要让它们发展，给以帮助。凡是不能表现新内容，或只能部分表现的，则应给以批评和改造。在群众文化战线上，即使是应该反对的东西，也不是简单的打倒。巫神及各种封建迷信是必须反对的，不发生联合问题，但也不是用简单打倒方法所能解决问题的，要经过群众与本人的自觉才会被消灭。勤勤恳恳地像改造二流子一样去改造巫神，破除迷信，这就是我们的目的与方法。

四 发动群众，加强领导

四项文教工作，都要发动群众，造成群众运动。群众运动必须群众路线，就群众文教运动说，必须是内容（目的）上为群众，形式（方法）上经过群众的路线。内容上应该具体实现（即根据边区当前情况的具体需要来实现）新民主主义的文教方针（即人民大众反日反封建的方针），这个问题已经明确地解决了，并且说过了。现在要说的，是形式上如何经过群众的问题，是何种方式最能为群众接受和最易普及的问题。这个问题的适当解决，同样要从边区今天的具体条件出发。今天边区还是农业为主的经济，还是地广人稀，村庄分散，劳动力不足的条件。在这种基础和这种条件之上，群众文教工作宜于分散经营，以村庄为单位，以村庄的形式出现（如村学，村的识字组，读报组，卫生组……），才为群众乐于接受，才易于普及。过去由一个或两个乡办集中的初级小学，与上述条件不适合，即使采用了强迫办法，实际上也办不通。所以一般说来，群众文教运动的推广与普及需要采取分散的形式，主要靠群众自己

觉悟与自己动手，主要靠村民自己主办。由此，提出了民办公助政策。

民办公助的目的，就是经过群众自己觉悟与自己动手，也即是毛主席所说需要与自愿这两个原则的具体实现。自然，民办公助不是任何工作非如此不可，也不是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非如此不可，而是群众文教工作特别在边区今天具体条件下的产物。

我们的民办是群众公办，是小公办，与旧社会的私办不同。我们的公办是民选政府办，是大民办，与旧社会的官办更是根本不同。小公与大公是统一的，是可以互相转变的，是不可互相脱离的。反对脱离小公的大公，也反对脱离大公的小公。所以民办必须公助，所以民办不是不要公办。

今后一个时期里，边区群众文教工作将是大量民办。大量民办需要大量公助，例如干部、课本，还有经费，没有公助是不行的。特别重要的是要加强领导，决不能减弱领导。领导的作用，首先在于使民办文教的内容能够符合于新民主主义的文教工作方针，既能密切联系劳动生产，联系卫生工作，并适当地适应家庭的需要，又能提高人民的政治觉悟，解放他们被封建文化残余束缚着的脑子，转向民主文化迈进。

领导的作用，又在于能够发动群众的创造性，照顾民办形式的多样性，既不机械地限制他们的手足，又善于选择最可靠最能持久的形式，加以提倡。譬如经验告诉我们，在有热心积极分子为骨干，在有良好的变工队、唐将班子^{〔1〕}、合作社支持的民办文教工作，就特别可靠，特别能坚持。我们就要在群众文教战线上提倡变工与合作的方法。譬如经验又告诉我们，读报与识字结合的形式是最能起作用的形式。因为识字开眼睛，读报开脑筋，两者又互相推动。我们就要在可能条件下提倡读

报识字相结合的形式。

领导民办比领导公办更不容易，所以需要加强领导，注意更复杂更细致的领导方法。

在今后边区的群众文化运动中，一方面要展开大量民办，以资普及；又方面需要小量公办，真正办好，作为民办的楷模与核心，以资提高。放弃或忽视小量公办，是不对的。但现在某些脱离群众，脱离实际而为群众所不满的小学（包括所谓普通小学与中心小学），必须在短时期内彻底改造成为群众所满意所爱护的学校。确为群众所拥护的公立小学，不必转成民办，但不能因为要维持公办而限制民办（如限制学生转学等等）。

在民办公助的问题上，已发生了各种偏向与误解。以为民办只是解决经费（由群众出钱）问题，以为民办无需公助，或不要过问，以为民办即是废止公办等等，这是一类。还有另一类，对于民办则采取命令主义办法，所谓“官逼民办”，对于公办则强迫维持现状，不敢发动批评和实行彻底改造。前一类是放弃领导的倾向，后一类是恶劣的官僚作风，都是错误的。在今天情况之下，主要的危险还是强迫命令与惧怕批评，所以尤应努力纠正。

五 质与量并重，反对形式主义

文教工作要不要量？要不要急？要的。在五年至十年的时间内，要求消灭百多万文盲、百分之三与百分之六十的成人和婴儿死亡率，消灭戏剧与秧歌中的封建内容，又要求办成千的村学、读报识字组、黑板报、新秧歌队与医药卫生组织。这些要求都是应该的，并不是“左”倾空话。全边区干部与人民应

有此决心，应作此努力。谁对此不抱着十分热心，而继续着官僚主义的冷淡态度，是完全错误的。

但要切记，我们要求质、量并重，而不要变了质的量；要求有步骤的急，而不要不成熟的急。要十分明白，群众文教工作的目的，是经过群众自己的觉悟，自愿地改造他们的脑筋，自愿地挤掉封建传统，自愿地接受新民主主义文化。毛主席指示我们，改造千百年的习惯比打倒一个日本帝国主义还要困难些。这是一件非常需要说服的工作，命令主义毫无用处。这又是一件非常需要细致的工作，形式主义也同样毫无作用。

我们之间，有些同志求成心太切，任务一经提出，恨不得马上成功，这个热情是好的，但是缺乏实际的计算，于是采取了简单命令的办法布置下去。将领导上成熟了的东西，当作下级干部和群众也已经成熟了，不加解释说服，不愿等候。因而下级干部和群众接受不了，瞒上不瞒下，数字很多，内容甚少。命令主义产生了形式主义，好心肠引起了坏结果。所谓欲速则不达，就是这个道理。

也有这样的官僚主义者，实际无知，架子十足，不调查，不研究，贪便宜，怕苦干，爱好形式，轻视内容，追求数量，忽视质量，这样，官僚主义就与形式主义结合在一起，成为更顽固的病症了。

这样或那样的形式主义，在许多工作中或多或少的存在着。这是与实事求是完全相反的不良作风，大大妨碍着我们对于现实的了解，大大妨碍我们工作的深入。必须随时随地警觉，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认真肃清之，尤其在文教工作中。

这次大会之后，各位同志回去，千万不要重复命令主义与形式主义。必须在自己机关中、团体中和村庄中，进行思想酝酿。首先在干部中和积极分子中酝酿，然后在群众中酝酿。首

先搞通思想，然后商议具体办法。只要干部和大多数群众的思想搞通了，酝酿成熟了，办法就会很快地产生出来，群众就会自愿地动作起来，新的人物，新的创造，新的成就，也会随之出现。这次大会上许多受特等奖励的同志、团体和村庄，不是这样产生出来的吗？向他们学习！需要与自愿的原则，热情与计划的原则，艰苦细致的作风，凭着这来开展大规模的群众文教运动。

六 培养大批的边区知识分子， 是开展文教运动的总关键

我们上面说的，主要是农民群众中的文教运动。但是我们还有八路军战士，工厂工人和机关学校人员的文教运动。这些方面的群众在数量上比农民少得多，在质上却比农民更重要。只有把这些都组织发动起来，才是边区群众文教运动的全貌。但是因为时间关系，我不来叙述这些已有其他同志叙述过的问题了。现在，我来谈一个总的适用于各方面的根本问题，就是：边区文教运动既然是仅次于生产运动的严重任务，既然是继续发展生产、提高边区一切工作的必要条件，那末，这个工作要靠谁来做呢？

卫生也好，教育也好，以至生产也好，决定了方针，剩下的就是要干部。我们现在已经有很多干部，在群众运动中又涌现了许多干部，但是我们的干部够了没有呢？差得远！在文教工作方面尤其差得远！我们要提高现任干部，要继续发现和培养群众中的干部，我们还要在各级学校中训练干部。这就是干部教育问题。只有解决了干部和干部教育问题以后，我们大会的各项决议才能实现，才能达到提高边区，使群众文化落后的

边区，变为群众文化先进的边区之目的。所以高岗同志特别指示我们：干部教育头等重要。

高岗同志指示我们：边区一级的领导机关要负责把延大办好，分区一级的领导机关要负责把中学和地干班办好，各县的领导机关要负责把完小和区乡训练班办好，各级政府机关都要办干部文化夜校，在两三年内消灭干部中的全部文盲，这是极端重要的。我们一定要把现任的工农干部知识分子化，尤其要为边区培养大量的足够的本地知识分子，这是边区今后一切工作的关键，当然更是开展文教工作的关键。

我们的干部教育，一定要有明确的实际目的和适合目的的方针、制度，应该彻底抛弃教条主义内容和教条主义方法，但也要防止和反对经验主义内容和经验主义方法。除必要的政治、文化、科学知识与专门技能外，应该着重学习边区建设，学习边区的经济政策和文教政策，尤其注意新的人生观的培养，使每个干部具有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无限热情和向人民大众学习的真正决心。这是知识分子与工农兵结合的决定关键，又是业务成功的决定关键。这在我们这次大会上也完全得到证明。只要回忆一下大会的讨论和发言，就可以明白，谁能弯腰向着群众，鞠躬尽瘁地为着群众，虚心从群众中学习，不骄傲，不浮夸，谁便获得群众的真心爱护，谁便有创造，有成绩，有真本领，有大进步。我们应该奖励表扬这种人，我们应该教育出这种人。只要合于这些要求，无论工农分子或知识分子，我们都欢迎。我们应该充分重视和信任革命的知识分子，他们同样是边区宝贵的财富。

我们的群众文教工作和干部教育工作是这样艰巨的任务，没有各级首长负责，亲自动手，没有党政军民学一切力量的动员，是不能完成，甚至不能进行的。我们要求各方面的负责同

志都能切实注意到这两项工作，共同来执行这次大会上毛主席和高岗同志的指示，共同来执行这次大会上的各项决议。

政府和党，要把群众文教工作和干部教育工作的干部看作政治上重要的干部，边区人民、政府和党的重要干部。校长、教职员、医生、畜医、护士、助产士、编辑、记者、通讯员、读报识字组长、秧歌队长、作家、演员，总之，一切文教工作者，只要在自己岗位上做出成绩，就是对抗战、民主和经济建设作了积极贡献，就是对革命事业尽了一定的政治责任。对他们应该给予政治上的指导、照顾和学习的机会（参加会议、听报告、读报纸和其他出版物，在职学习和学校学习等），并应关心其物质生活、家庭生活，解决其工作上的需要，鼓励他们努力前进。

同志们，我们应该以身作则，不疲倦不自满地完成边区人民所给予我们的光荣任务。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出版的
《李维汉选集》刊印。

注 释

〔1〕旧时，陕西关中地区把那些由土地不足的贫苦农民结合起来集体出雇，为别人耕种以取得工资的组织称之为唐将班子。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唐将班子是一种劳动互助的组织形式。

陕甘宁边区文教大会关于发展 群众艺术的决议^{*}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六日)

一、反映人民生活又指导人民生活的艺术，已证明是一个伟大的教育武器。新的艺术，乃是新的政治、经济所必不可少的同伴之一。艺术工作有普及与提高的两方面任务，而在边区目前情况下，由于群众艺术运动的薄弱与艺术工作者与群众联系的薄弱，普及则是一个主要的任务。

虽然边区群众及其艺术工作者，已经为了教育自己的队伍在斗争中创造了自己的艺术，但由于过去一时期的被重视不够，新艺术至今在群众中仍未得到充分发展，宣传封建迷信的旧艺术在群众（主要是农民）中仍占着相当的优势，所以迫切需要大力在群众中发展新艺术和改造旧艺术，使新艺术在边区建设中，发挥它的力量。

在一九四二年文艺座谈会之后，艺术工作者已开始为艺术与群众的结合而共同奋斗。但要在群众中完全以新艺术的阵容代替旧艺术的阵容，要在艺术工作者中完全以联系群众的阵容代替脱离群众的阵容，还需要一个长时期的和多方面的巨大的

* 这个决议于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六日陕甘宁边区文教大会通过，边区二届二次参议会批准。

努力。加强对于艺术工作的领导，团结一切艺术工作者，来达到上述的目的，便是今天边区艺术战线上的中心任务。

二、艺术的新旧，基本上决定于其能否为群众的利益服务，能否为群众的战争、生产、教育等服务。因此，凡能正确表现新生活（与新观点的历史）的艺术，都应得到发展，反之都应受到改造；同样，凡能正确表现新内容的形式，也都应得到发展，反之也都应受到改造。

要在群众中发展新艺术和改造旧艺术，不是简单地依靠输入的外力和行政的权力所可奏效的。主要的必须在群众中扶助新力量的生长和诱导旧力量的转变，群众是欢迎并能创造新艺术的，这不仅表现在部队和工厂中，而且也表现在以刘志仁为代表的觉悟的农民中，但又必须承认，旧艺术与群众的不可忽视的历史联系，也不仅表现在旧戏班和其他职业性的旧艺人的活动中，而且表现在广大工农兵的春节娱乐或平时娱乐中。因此，今天发展边区新艺术的任务，必须从两方面同时进行，即一面在新基础上发展，一面在旧基础上改造。

群众艺术无论新旧，戏剧都是主体，而各种形式的歌剧尤易为群众所欢迎。应该一面在部队、工厂、学校、机关及市镇农村中发展群众中的话剧和新秧歌、新秦腔等活动，一面改造旧秧歌、社火及各种旧戏。其他艺术部门也是如此。应该一面在群众中发展新文学（工农通讯、墙报、黑板报、新的唱本、故事、新的春联等）、新美术（新的年画、木刻、剪纸、新的连环画、画报和画册、新的洋片等）、新音乐（新的歌咏、新的鼓书等）、新舞蹈和新的艺术组织（俱乐部、文化室、文化台、文化棚、展览会、晚会等），一面要团结和教育群众中旧有的说书人、故事家、画匠、剪纸的妇女、小调家、练子嘴家、吹鼓手等，使之为人民的新生活服务。

在这个方针下，边区群众艺术在一个时期的努力以后，应该呈现一个崭新的面貌：无论是新基础上发展，或在旧基础上改造的，其内容都是新的和丰富的，其形式也都是新的和丰富的。艺术能与人民的生活和斗争相协调，而艺术的内容与形式也自相协调，这种新时代的艺术，那时将在群众艺术生活中获得完全的统治。

三、发展边区群众艺术运动，基本上就是发展与改造农民艺术。秧歌社火为农民艺术最普遍最重要的一种形式，它的活动主要在春节。春节是群众艺术的节日。但不论是秧歌、社火或其他形式，也不论是在春节或平时，旧基础既然尚占优势，旧基础上改造就成为一个十分必要、同时也十分繁重的任务。

旧基础上改造是与新基础上发展分不开的。首先必须加强群众艺术中已有的新基础，因为这些新基础还很薄弱，经验还不完全，它们还需要在群众的鉴赏中经受更多的考验，所以在已有新基础的地方必须加以巩固，扶助它们的发展，增大它们的作用。同时，尽力在旧基础上进行改造。在没有新基础的地方，尤应着重在旧基础上改造。改造应从思想上入手。改造的对象有缓急、轻重、难易之分，必须先改造急需而又较易于改造的，必须择其要者。改造的对象中又必须区别民间旧形式与统治阶级的旧形式，群众中业余的艺人和艺术团体与职业的艺人和艺术团体。但对一切旧艺术、旧艺人，一般地都必须采取改造的方针，而不能采取简单的打倒的办法。

发展或改造农民艺术均应注意到今天边区农村的实际条件，特别要注意不误生产与群众自愿的原则。艺术上的民主必须在组织与创作各方面充分发扬出来。这并不是减轻对群众艺术活动的领导，而是真正地加强领导。各级领导者和各文艺团体应该密切合作，根据各地情况，在群众中布置工作，培养典

型、组织竞赛，推动全局。政治上与技术上的指导帮助尤为重要。应该供给和教给各群众艺术团体与民间艺人以新的或改编过的唱词和剧本，发动和帮助群众自己动手创作，提高和奖励他们多演新剧，教育他们去改进他们艺术组织内部的生活和废除不良习惯。这一切对发展群众艺术运动有决定的作用。

四、随着普及工作的发展，就必然要相对的和逐渐的提高。提高的任务主要应该由两个力量来完成：其一是部队、工厂、学校、机关的艺术活动；其二是各级政府所领导的专门艺术团体和专门艺术工作者的活动，而群众中间有特殊艺术才能的人物，亦应注意发现培养，使之参加提高工作的进行。

边区战士、工人、学生和机关人员中的戏剧、文学、美术、音乐、舞蹈等活动，对专门家来说当然是普及工作的一部分，但比之一般农民则代表着更前进的力量。因此各主管方面和各艺术团体应给以更大的注意，更多地鼓励他们从事新艺术的学习、表演和创作，除了在他们本身范围内的活动外，并应组织他们利用机会（春节、假期、市集、庙会、集会等）在附近群众中进行工作，成为推动群众艺术活动的据点。

延安和各分区（以及可能的县）的剧团、文工团，其他文艺团体与专门的艺术工作者是指导普及工作的支柱，他们负有群众教育与干部教育的双重任务。为了教育，他们首先需要学习——政治的、艺术的与实际生活的学习。他们应该经常和下层艺术组织保持联系，了解工农群众各项艺术活动的情况，并予以帮助和领导，尤其是供给他们以各种创作和演出，并视需要与可能与他们进行联合表演，或集中其积极分子进行短期训练，一面教育他们，一面向他们学习。分区与县的剧团，应适应各地方各时期工作的要求，经常下乡，尤其要注意利用庙会、骡马大会等演新内容的戏，并应视需要与可能进行其它各

种文化艺术工作。一切艺术工作者，均应深入群众，他们对群众的了解愈深刻，则他们对于群众和干部可能做的贡献才愈大。各有关的领导方面应该重视上述这些艺术团体与艺术工作者的工作，在政治上、工作上、生活上给以细心关切，使他们步伐一致地配合群众的努力，为边区艺术与边区建设的远大前途而奋斗。

根据一九四五年一月十二日《解放日报》
刊印。

陕甘宁边区文教大会关于 开展群众卫生医药工作的决议^{*}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

一、边区人民在政治上经济上获得解放，在支援战争发展生产的运动普遍展开以后，卫生运动就成为群众文化运动中的第一等任务。边区人民由于过去长期封建统治的遗产，直到现在，还遭受大量疾病死亡的严重威胁；这个威胁如不加以克服，则人民的解放就不能完全达到目的，同时对战争与生产的努力也发生严重的影响。抗战以来，边区卫生医药部门对此虽曾作了一些努力，但全面的有系统的工作，还未开始。大会为此严重唤起全边区各方负责同志的切实注意，要求他们迅速动员一切力量，为扑灭边区大量的疾病死亡而斗争。

二、为要扑灭大量的疾病死亡，第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普遍的开展卫生运动。根据调查，边区人口大量死亡的主要原因都是可以预防的传染病：因喝生水、吃腐败的或蝇子叮过的食物而往往引起的肠胃传染病（伤寒、痢疾、吐黄水病等），因剪脐带不洁而往往引起的婴儿破伤风，因常年不洗澡不洗衣晒被而往往引起虱子所传染的各种病症（如斑疹、伤寒、回归热

* 这个决议于一九四四年十一月陕甘宁边区文教大会通过，边区二届二次参议会批准。

病等) 尤为普遍。相反的, 凡是注意卫生的村庄(如延市阎家塌、新宁窠家湾等) 和家庭(如米脂常雄宾、新宁傅老太太等) 就可以避免这些疾病的袭击。因此全边区各界人士, 必须针对各地具体情况, 利用一切机会和方法(如小学校、干训班、自卫军、读报识字组、黑板报、歌谣、戏剧、秧歌、画报、画图、庙会、展览会等) 进行对人民的卫生教育。在普通卫生方面, 主要是多吃营养品, 不喝生水, 不吃死气饭, 食物防蝇, 灭蝇灭蛆, 修好井水窖, 人畜分居, 修厕所, 开大窗, 通烟筒, 勤洒扫洗浴洗衣晒被等等。在妇婴卫生方面, 主要是多办接生训练班, 普遍改造老娘婆, 产妇生产时要躺着, 垫的灰要炒过, 剪脐带的剪子要煮过, 生产后要睡下, 多休息, 多吃营养品, 月经带要用净纸或用开水洗净的旧布片, 要注意两性卫生等等。为要普及卫生运动, 需要动员一切县、区、乡干部, 小学教员和中小学生, 劳动英雄和其他积极有威望的分子, 驻军和机关人员都来学习卫生知识, 并成为卫生运动的领导者和宣传者。而教育家庭妇女使能了解卫生常识, 尤为工作中的中心环节。在工作中应防止强迫命令和形式主义, 并须注意发现、创造和表扬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村、一个乡、一个区的范例, 用以推动全局。在运动开展之后, 即应根据具体情况, 加以组织领导, 以求持久。

三、医疗工作是卫生运动的后盾, 也是推广卫生反对迷信的有力促进者。边区现在只有部队、机关中有西医, 农村中只有中医, 好坏合计约有一千人; 药品也是中药多而西药少, 此外就都是巫神的势力范围。因此, 必须动员一切部队机关中的西医除为部队机关服务外, 兼为群众服务, 尽量给老百姓看病或住院, 并于必要时组织巡回医疗队下乡。必须动员和帮助一切中医和一切药铺认真为群众服务。西医应主动的与中医亲密

合作，用科学方法研究中药，帮助中医科学化，共同反对疾病死亡和改造巫神。中医应努力学习科学与学习西医，公开自己的秘方和经验，技术好的医生尤应帮助教育技术差的医生进步。必须有计划的研究、培植、采挖和制造边区土药及制造其他外来中西药的代用品，在可能条件下组织群众的医药合作。对于热心群众服务著有劳绩，或有新创造的医药工作者或卫生医药组织，应该予以充分尊重和表扬，他们的经验应该予以推广，对于工作中有缺点者，应予批评，以求改进。应该大量培养卫生医药人才，扩大医科大学的边区名额，开办全边区与各分区的中医训练班、助产训练班与司药训练班，各分区中学应授卫生医药常识课，并提倡医生和各种医药工作者多带徒弟，以解决边区医药干部的巨大需要。

四、边区的大量巫神，主要是边区文化落后以及医药缺乏和卫生教育不足的产物。因此，要消灭巫神的势力，首先要普及卫生运动和加强医药工作，否则就是主观的空想。采取脱离群众、强迫命令的单纯行政手段，是无济于事的。但巫神的存在也促进了人民的死亡，并增加了卫生运动的困难。因此，随着卫生运动的展开，应该在各地推行崔岳瑞运动，抓紧适当的时机（如巫神的敲诈害命，和医生的治病救人的事实），进行唤起群众自觉的反巫神运动与巫神坦白运动。巫神之以酷刑治病人死亡者，则应以法究办。至于一般的反迷信运动，则应依靠群众的觉悟与自愿进行之，以免与群众相对立。

五、各分区各县应根据地方具体情况，作出卫生医药工作的具体计划，列在地方施政总计划中，以求在数年之内，达到若干卫生项目的普遍实施，做到一个区有一个能治病的医生、一个药铺与几个会新法接生的助产妇。为此各县区在边区政府统一规定的制度下，应进行人口与出生死亡登记及疫病报

告；各医务机关及医生应进行疾病登记，以作为执行卫生工作的根据及衡量工作成效的尺度。关于开展卫生医药工作的经费，除由边区政府统一筹划事业费与奖励金外，各地应在群众自愿的原则下（必须是群众自愿的，绝对不准强迫），提倡张振财、张振皋式的卫生互助金办法，以为乡村保健事业的基础。

六、卫生运动的开展和医药工作的加强，有赖于各个方面的通力合作与首长负责。因此，干部思想的打通就是这一工作的决定关键。大会要求党政军民学各方面各级的干部和边区各阶层的人士，都能响应毛主席和高岗同志的号召，切实纠正过去一切不重视卫生医药工作，不愿作卫生医药工作，对卫生医药工作必要的人力物力不予解决的错误态度。无论何人何时何地，只要有可能，都应该亲自动手，参加或帮助卫生医药工作的进行。今后各分区各县、区、乡村的卫生医药工作，是否深入，是否有效，将成为边区政府对各地考查工作成绩的重要标准之一，各旅、团卫生部门对地方卫生医药工作帮助的大小，亦将成为联司考查工作成绩的标准之一。直接负责卫生医药工作的同志，尤应重视自己的神圣岗位，加强自己为群众鞠躬尽瘁的精神，以求边区大量疾病死亡现象能够迅速减轻和消灭。

根据一九四五年一月八日《解放日报》
刊印。

毛泽东给郭沫若的信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沫若兄：

大示读悉。奖饰过分，十分不敢当；但当努力学习，以副故人期望。武昌分手后，成天在工作堆里，没有读书钻研机会，故对于你的成就，觉得羡慕。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倘能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经验，会是很有益的；但不敢作正式提议，恐怕太累你。最近看了《反正前后》，和我那时在湖南经历的，几乎一模一样，不成熟的资产阶级革命，那样的结局是不可避免的。此次抗日战争，应该是成熟了的吧，国际条件是很好的，国内靠我们努力。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看到了什么错误缺点，希望随时示知。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恩来同志到后，此间近情当已获悉，兹不一一。我们大家都想和你见面，不知有此机会否？

谨祝

健康、愉快与精神焕发！

毛泽东 上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于延安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三卷刊印。

中共中央关于 华中军事部署的指示^{*}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华中局：

(一) 成虞给各师信及二十日关于发展东南部署，均同意。但还须令七师开辟芜湖、当涂、高淳、南京地区工作，造成将来能够占领芜湖的条件。

(二) 粟裕南进后，可以成立苏浙皖军区统一指挥江南斗争。

(三) 新四军西进南下两个任务中，应以南进发展苏浙皖地区为主要任务，江北兵力应尽可能抽调向南。在豫东皖北方面现有兵力大概已经够用，无须再加兵力。

(四) 各根据地机动兵团抽走以后，应由老的地方独立团，提升若干为机动兵团，再由老的独立团留一部分作底子，成立新的独立团担任地方守备。八路军暂时没有部队抽调南下，师级干部明春延安可派几个到新四军。

中 央
成 宥

^{*} 这个指示是刘少奇起草的。

附一：中共中央华中局关于转报给粟裕、 谭震林等的信给刘少奇的电报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七日）

刘少奇同志：

兹将我们致粟、谭、黄、邓^{〔1〕}一封绝密信内容告你，请审查指示。

近数月来，国际、国内政局，均有重大而显著的发展。首先是苏联，已将德寇全部逐出国境，红军目前已越过自己国界，在几个国家的辽阔土地上作战，且已深入德寇巢穴。同时，英美盟军，在完全解放了法国之后，又已越过比、荷、卢边疆，深入德国本土。意大利战局亦有进展。轴心国所奴役国家的游击战争，与各种反抗运动和各被解放国家的民主反法西斯运动，正如怒潮般普遍汹涌开展着。这不但确定准备希特勒速将覆没，而且决定了今后国际新民主运动不可动摇的趋向。远东局势虽由于国民党节节溃败，使日寇最后失败，将较过去一般人们合理的估计，可能要更加延长一些。但由于美在菲律宾登陆的胜利，及大举轰炸台湾和日本本土各地等，预示着盟军在中国海洋登陆的时间，日益接近。同时，由于我党我军在敌后胜利坚持，事实上已经控制着绝大部分对将来反攻日寇的决定意义的战略基地（如沿海岸线，及各大城市与交通要道）。特别由于国民党腐败无能，使盟军在击败日寇的实际任务上，有要求和我党我军密切合作的需要。我党我军的政治威信和影响，在全世界与全中国各阶层人民中是飞跃的发展着。国民党

在抗战初期，因为占有全国政权与正统和合法的地位，且掌握着在全国武装部队的绝大部分，故对抗日曾经起着一定的作用。但由于蒋介石一贯执行依靠与等待外援，和一贯采取积极避战与消极抗战的失败主义方针，一贯实行反共反人民的法西斯主义政策，已经在全世界与全中国人民面前暴露出腐败堕落的真面目。蒋介石最近对我党谈判，仍一味敷衍。对我军与后方人民，仍坚持其高压政策。对英美苏，仍用流氓恐吓欺骗手段。对日寇汉奸，仍采一面应战，一面勾诱的方针。这不但证明其顽固反动，到了完全不可救药的境地，而且也暴露蒋介石反动统治，已经日益接近无法维持的地步（最近国际舆论，对国民党的强调评击，与大后方人民反法西斯与争民主运动，已经快要接近爆发点，就是明显的例证）。日寇在此次大战与中日战争中，虽一度逞其凶焰，但现在已渐至趋向没落与最后失败。日寇自身，亦已显至丧失其胜利信心，而企图把前途与出路寄托下列幻想上面：即压迫蒋介石参加轴心国战争，增加形成反攻的困难，以便求得在廉价条件下与英美议和。或希望英美与苏联团结破裂，以便从中取利，确保其所获赃物。近来，日寇加强对我沿海一带的控制，与打通平汉和从安南直达武汉的铁路交通，就是为了预防盟军登陆，阻止盟国从大陆上反攻和压迫蒋介石投降的救死方法。以上，是目前国内外时局演变的概括情形。就目前整个时局发展趋势而论，蒋介石如果不愿接受盟国舆论，与我党和全国人民坚持改组国民政府与统帅部的要求，实行改弦更张（目前并无此象征），又不愿接受日寇条件，公开退出战争（目前仍存在着此种可能），则国民党军队，必继续遭受严重挫折，整个平汉粤汉路东，不久即将沦为敌后。国民党在政治上可能发生严重危机，势难照旧维持下去。根据上列形势的分析与判断，我们对华中工作方向与布

置，应提出新的估计和考虑。华中一方面为日寇统治我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为全国大城市与交通要道集中地区。另方面，为盟军在华登陆首先必争的地带（特别是对上海、宁波、杭州、南京及沿海沿江一带）。同时，华中为全国精华，为国民党与我势在必争的地区。如果我们在敌寇继续进攻，与国民党继续溃退的时候，我们能够迅速加强对上海、宁波、杭州、南京、武汉与沿海一带工作，能够争取时间，迅速完成发展河南、控制中原与发展东南、控制苏浙的任务，这不但对将来配合盟军反攻，而且对粉碎蒋介石反共内战阴谋，均将起着决定的意义。因此，华中局根据中央指示，和适应目前时局迫切要求，对华中发展方向与各项工作布置，有下列的计划，盼你们同样加以考虑，并速将你们意见用密电告诉我们。

第一，华中目前发展方向：一面向南，即发展东南，控制苏、浙。一面向西，即发展皖北、河南，控制中原。

第二，向南发展，须由新四军独力担任。我们准备由粟率两个主力团南下，配合十六旅，首先打开苏南、浙西局面，进一步与浙东打通联系，相机向南发展全浙。随之，尚须从一、二、三、四师增调几个团南进，完成任务。

第三，向西发展，须与八路军南下部队共同负责。除目前四师之主力，与三师七旅，担任向豫东、皖北方面发展外，于必要时，尚须从三师再抽一部参战，完成任务。

第四，发展步骤，应采取逐步发展的方针。即于每一战役胜利后，即当发展群众运动与建立地方武装、建立政权和建设党的组织。于建立巩固阵地后，再向前推进。

第五，对淮南巢南桂顽方面，一方面随时作大规模自卫战的准备。另方面，又不主动的去刺激桂顽。但桂顽对我有任何小规模之进攻与“蚕食”，都应设法给以必要的报复和打击，

以阻止其气焰。如果我们能将桂顽向我大举进攻的计划推迟到几个月以后，则对各方面均有利。

第六，为着应付向南，向西发展任务，我一、二、三、四各师地区，应加强下列基本工作：

（一）对各大城市与交通要道工作，应作具体布置和检查。特别对上海、宁波、杭州、南京、徐州、海州与沿海洋、沿长江、沿铁路一带，必须立即布置工作与发展游击战争（已经布置了的，须经常检查）。但我们估计，敌人在反攻前夜，对上述城市与地区，可能特别加强控制。因此我们对上述地区工作，亦应力求隐蔽持久，切忌表面铺张。

（二）发展整顿民兵，充实提高地方兵团。要做到主力机动抗敌，可以就地坚持的目的。各师主力，应加以适当的充实和补充，并力争时间整训，和准备随时可以机动参战。

（三）大胆提拔地方干部，坚决抽调大批党政军民各方面工作干部，进行训练，准备分配地方兵团，与发展新地区工作。各地区应即开办建设公学（或建设干部学校），广泛吸收各根据地内青年工、农、知识分子入学训练。如没有成百成千经过训练的各方面工作干部作准备，则无法应付目前和将来空前发展的局面（华中局正计划开办建设大学中，计划另告）。

（四）加强党与群众工作，这里特别要求加紧完成整风、审干、防奸。并从发展生产运动（发展和巩固劳动互助与各种合作社运动）中去团结根据地各阶层群众，与完成基层政权，即改造工作。使各根据地的工作达到进一步巩固与发展。

（五）整理公粮、税收，准备明年普遍实行农业统一累进税，与积蓄大量物资。必须确保大发展中经济与物资的需求（华中局计划研究一、三师盐棉运销与适当调整各根据地的财政税收）。

（六）加强时事政治教育，扫除根据地人民对国民党任何幻想。从思想和政治上，加强全根据地各阶层人民的认识。

（七）经常要有反“扫荡”的准备与继续保持精简状态。

（八）经常检查总结各种政策实施情况，与可能发生的各种偏向。必须从各方面贯彻党中央正确方针，及克服偏向，才能团结全根据地各阶层人民，为巩固现有根据地与发展敌后新地区而斗争。

第七，各区党委，为着完成上列方针和任务，对各地工作，须作新的具体布置。华中局对各地个别具体要求与指示，当另函告。

华 中 局

十一月七日

附二：中共中央华中局关于发展东南的 部署给中央的报告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日）

中央：

粟、叶文日抵达军部，谭因路西大“扫荡”无法前来。兹将发展东南的初步部署报告如下，盼指示。

甲、由粟裕先率三个团（一团、特一团、四团，共计七千人），及党政军干部三百余人南进，配合十六旅，进占吴兴、长兴、安吉、武康间之敌后地区，作为控制天目山全部之前进阵地。

乙、俟上项任务初步完成后，即由陶勇率特四团，过富春

江东进，与浙东部队打通联络，以求控制会稽山。当陶勇部进到浦江地区时，即由特四团参谋长舒雨旺及江如枝（四六团主任，三北游击战争时浙南县书），率一个营，协同浙东部队一营（必要时须增派），进占宁海以东之象山地区。并以象山敌后为基地，沿海岸南下，进至温州地区，与浙南龙跃处打通联络，以开展温州南北沿海之游击战争。并相机由阮英巨率一部兵力，经浙南返闽东，以打通至闽中曾镜冰处之联络。

丙、加强浦东地委领导，决定苏中四分区地委正副书记陈维达、顾复生，前往工作。并由天目山方面派队深入杭嘉地区，开展工作，并打通与浦东之联络。为发展苏常太地区，已由苏中派出短枪队百余人、工作干部三十余人，前往工作。并已组织苏常太地委，以钱敏负责，现和青浦之浦东工作取得联络。为加强镇、丹、武地区工作，已由苏中派短枪队百余人及长枪队三百余人，作为该区基干武装。并已组织镇、丹、武地委，金柯负责。其工作，于向东与苏常太，南与太湖地区打通联络。沪宁铁路沿线工作，即由上述两地委负责。宁波由浙东，杭州由苏南，南京由淮南，分别负责。上海，除各区党委动员关系、开展工作外，主要由华中局直接负责，并派专员驻浦东，就地指导上海工作（上海工作布置，当另电告）。

戊^[2]、由于二师路西情况严重，谭一时不能偕粟南进（罗^[3]近半年均病，现仍离职休养中）。我们本准备从三师抽调部队到二师，担任监视桂顽，以便从二师抽调两个主力团，在明春继续南下增援。候明年春季，尚可从苏中抽调三个团（内五十二团）担任南进任务。

己、由于西进、南下，同时并进，孙良诚进入华中，亦须给以打击。我们已感到主力与主要干部不够分配的困难。不知可否由八路军派两三团到淮北路东，以便三师主力接防苏中淮

南，使一、二两师主力可大部担任南进任务。可否从八路军或中央抽调几个师级军政干部来华中工作。

庚、我们提议，组织江浙指挥部，以粟为司令员，谭为政委，刘显势为参谋长。在谭未南下前，粟以司令及华中局代表名义，统一指挥苏南浙江部队与苏南及浙江党的工作。天目山局面打开，再考虑如何恢复六师，与建立浙江部队的指挥机关问题。

辛、我们提议，叶飞、钟期光参加苏中区党委为委员，叶为书记，陈丕显副之，张藩为参谋长。

壬、南进部队七千人，分批渡江。为秘密，分次分路出发。又布置需时，故须延期到下月上半月前，始能完成。如果在此期内，发生“扫荡”，则恐还要延长一些。

华 中 局

二十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四册刊印。

注 释

- 〔1〕指黄克诚、邓子恢。
- 〔2〕原文缺丁项。
- 〔3〕指罗炳辉。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审干反奸工作 给晋察冀分局的指示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晋察冀分局：

鉴于内战时期的肃反教训，抗战初期某些地区乱捉乱杀的
错误，鉴于去年延安抢救运动时，在实行正确路线中，发生的
过火行动，因此各地对于审干反奸工作，要采取谨慎态度。澜
涛^[1]来此，知分局同志能掌握此种方针，这是很好的。目前工
作情况如何？望你们将成绩缺点经验教训电告我们。

为使正确方针能够继续坚持下去，不致在运动开展中发生
毛病，特将下列问题提起你们注意。

(一) 分局应速将九条方针的条文，中央今年几次反奸指
示，西北局高干会反奸报告，中央社会部审讯条例等文件，多
多印发给各地区、各机关、各部队、各学校的干部和党员，配
合冀察晋抗战初期的反奸教训及这次工作中的经验，进行广泛
深刻的教育，使党员干部搞通思想，掌稳政策，这是一切工作
的前提。这种宣传教育工作，应耐心经常的进行，采取整风的
方法研究文件，以民主的方法吸取群众的意见，以批评与自我
批评的方法检讨工作，务使九条方针的每一条都能深入到群众
中，贯彻到实际工作中去。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不犯错误或少犯
错误。九条方针中，最主要的是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两

条。两条中又以调查研究为最中心关键。凡无调查研究或虽有而是表面的非真凭实据的，一概不能误认为特务，此点须使一切干部充分认识清楚。

（二）在党校和分局、军区、行署各机关中审查干部，更要特别慎重，不要将反对公开的国民党特务（如郝胜符之流）的方法，使用于党内审查干部，也不要将反对公开的国民党党的方法，使用于三三制政权中的非党人士。因此，党校及各机关的审干及反奸工作，不要采取单纯的反特务斗争的方式（这样很容易产生简单化的毛病），而应采取整风学习、自我反省、坦白运动的党内方式。行政人员训练班，不要发展为反省机关（这样很容易产生扩大化的毛病），而应成为一种整风学习的教育组织。一切机关、部队、学校和地区，不要将审干反奸与坦白运动分离起来，而应将坦白运动当作审干反奸的主要形式，以党内整风反省的姿态，达到坦白生活、道德、工作、思想、政治、党派、变节、特务等各种党内党外问题。分局务将这个方针继续贯彻下去，对于一切简单化扩大化的倾向，须随时注意。

（三）在坦白运动中，应提倡说老实话，宣传“是则是非则非”的口号，发扬实事求是的精神，纠正干部中强迫坦白、指名坦白、过火要求、不坦白特务不过瘾的“左”倾情绪，同时反对坦白者哗众取宠、混编乱造、夸大其词。对逼供信偏向，及时注意，即便个别现象也不要轻易放松。对于坦白了特务和变节的分子，如果我们没有真凭实据，不要加以深追，以免造成对立僵局，有碍争取，或中敌人诬陷同志的奸计，混乱了自己的队伍。对一时审查不清的重大嫌疑分子，不要急于求得解决，以免逼供信错误，可以有意识的放松一时期，或暂时按他所讲的作一结论，然后继续进行调查研究，秘密侦查，这

样如系好人则便于团结，如系坏人则便于麻痹。对于一切坦白材料和口供，绝不可轻信，必须用周密的调查研究具体分析的方法，分清其中有真有假有冤枉有夸大各种不同的性质。因此，一切被审查的人，无论他坦白党内党外问题，均应进行甄别工作，分清是非轻重，这是审干反奸一个最重要的关节。你们已经进行过坦白运动的机关学校及进行过反国特群众运动的地方，是否已经开始。

（四）经常检查和警惕有无肉刑与变相肉刑、车轮战、打骂、捆吊、污辱等等犯法行为发生，实现逮捕人犯必须经过上级批准，并不得超过嫌疑分子百分之三的制度。根据具体情况订立反奸纪律，在群众中公布。

（五）随时防止和纠正老的工农干部对新的知识分子的宗派主义与报复情绪，正确估计新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好的，特务只是极少数，不要将他们的思想问题与特务问题混为一谈，这个问题，特别是在军队更要极端严重的注意。许多知识分子，从抗战以来，在军队中在战斗的环境内出生入死多年，当审查他们时，绝不要忘掉这个重要根据。对他们的方针是既要详细审查，又须关心爱护，二者必须统一。

中央书记处

十一月二十六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四册刊印。

注 释

〔1〕 即刘澜涛。

毛泽东给谢觉哉的信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一日)

觉哉同志：

此件^[1]很好，略有增删，请斟酌。

关于参议会改为人民代表会议，我想对内对外都是会有好影响的，请你和其他同志商量一下。这一点以及此次参议会的其他问题，中央想讨论一次，请告高、林、罗^[2]诸同志。

政治民主有其自己的内容，经济是其物质基础，而不就是政治民主的内容。文化是精神的东西，它有助于政治民主，也不就是政治的内容。这些请考虑。

人民各项权利，在我们这里，只能说实现了几个重要部分，例如，管理政府，工作权，在现有物质条件限制下的言论、出版、集会权等。至于休息权，中国目前大体上还谈不到，工农更是如此。教育权、老病保养权，还在走头一步。苏联宪法是几个五年计划的产物，在中国许多部分还是理想，不是事实。又，在我们的这类文件上，不宜提及苏联宪法，免人误会。

敬礼！

毛 泽 东

十二月一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三卷刊印。

注 释

〔1〕指谢觉哉起草的他准备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第二届第二次会议上作的参议会常驻委员会工作报告。这次参议会在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四日至十九日举行。

〔2〕指高岗、林伯渠、李维汉。

毛泽东、周恩来关于同蒋介石谈判 的原则立场给王若飞的指示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二日)

若飞同志：

(一) 我们毫无与美方决裂之意，五条协定草案赫尔利不愿发表，我们即可不发表，周致赫信中提到准备发表五条即是征求他同意的意思。至于赫在五条上签字及赫毛交换信件，我们自始即无发表之意。我们所想发表者仅是我们向蒋建议之五条，因蒋态度强硬无理拒绝，无法实现中国人民一致要求的联合政府，故想公开于人民，让人民起来向蒋要求实现之。此点待包瑞德回来再和他商酌。(二) 牺牲联合政府，牺牲民主原则，去几个人到重庆做官，这种廉价出卖人民的勾当，我们决不能干，这种原则立场我党历来如此。希望美国朋友不要硬拉我们如此做，我们所拒绝者仅仅这一点，其他一切都是好商量的。(三) 中央在三个月内集中精力开七大，解放区联合委员会只能在七大以后再说。以上意思请告包瑞德或台维斯。

毛 周

亥文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彭德怀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 二届二次会议的讲话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二日)

各位参议员先生：

陕甘宁边区，我是一九三五年随红军长征到这里来的。过去人民生活很苦，土匪也不少，沿途要饭的人也很多。此次从华北回来，经过绥德、米脂到延安，和过去不同了，改观了，人民生活提高了。今天各位参议员济济一堂，商量国事，适西南战局严重危机之际，他的作用是很大的。这个边区给全国，给敌后做了很多事情，把革命的三民主义，也是新民主主义在陕甘宁边区认真实现了，对全国来说，有很大的启示作用，因为这是国民党人几十年讲要实现的三民主义，而实际上没有做。对敌后所有解放区亦有很大的帮助，这里的许多经验介绍给敌后解放区，使他们的民主建设得到更快的、更顺利的进行，对坚持战争准备反攻有好处。这个边区的具体政策，比如李鼎铭先生提出的精兵简政，在敌后也普遍的实行，结果很好，军队的战斗力提高了，行政效能也提高了，人民负担减轻了。边区的生产运动，对敌后影响也是很大的。这就是说，边区的一切设施，对敌后解放区起了示范作用，推动了敌后解放区向陕甘宁边区学习。边区办了很多学校，训练了大批的干部，给八路军新四军很大的帮助。同时，敌后许多残废，也在

这个边区很好的得到了安置，这对于前方的作战是鼓励的。这都是给敌后解放区战争的帮助，特别是对八路军的帮助更大。

我们在华北的共产党，华北的人民，华北的八路军作了些什么事情？在七年多的血战中，华北就有了六大块解放区。一万万人口的华北，在我们抗日民主政府统治的人口即有五千五百几十万。六个解放区：晋绥区、晋察冀区、晋冀豫区、冀鲁豫区、山东区（指津浦路东）、冀热辽（包括热河南部和“满洲国”占领了十几年的辽宁的一部分），我们的力量已经深入到东北。这六个大解放区，是我们八路军、华北人民反对日本的根据地。华北抗战的军队，以八路军为主。八路军在七年多的抗战中，力量不但没有削弱，反而加强了。抗战开始的时候，只有三个师。一九四〇年秋即举行了百团大战，打垮了敌人七个师团，十二个混成旅。经过了一九四一及一九四二年最残酷的战斗，敌人用进攻中国军队半数以上，还有几十万伪军，加上飞机、大炮、坦克。但是，到现在，比我们出发的时候，扩大了十倍。就是说，现在八路军在华北，还保持了四十万以上的主力。在七年多的作战中，抢夺敌人的武器，武装了自己，武装了一百七十万以上的民兵。没有正式反攻以前，主力军只能保持现状，因为战争是持久的，不应过多的加重人民负担。七年多的战争，俘虏日本兵还不多，只有二千几百人，这说明日本军队还很顽强。

华北建立了四百三十八个抗日民主的县政府，建立了六十五个专署。在华北所有的解放区，没有土匪，这一点是可以告慰的。也很少看到乞丐。我们到的时候，要饭的成群结队，现在没有看到了。贫苦的农民工人生活，没有继续下降，没有继续破产，而且是继续上升的。农村中间，中农阶层有很大的增加，贫农减少了。由贫农变成中农，在华北六个解放区，是普

遍的现象，不是个别区域的现象。晋察冀边区三十五个行政村的调查：雇农上升贫农的占百分之二十八点三七，雇农上升为中农的百分之十点二八，由贫农上升中农的百分之十八点五七。雇农贫农向中农发展，因此农村中没有要饭的，没有土匪，这就毫不稀奇了。

在作战方面，华北的八路军，华北人民自己组织起来的新队伍“决死队”等等，经常和敌人作战。从三七年冬起，到现在，敌人最少的时候是十二个半师团，最多的时候是二十二个师团。日本军队，在我国最多的时候，是四十三个师团，华北经常占日本进攻中国军队的全部五分之一到五分之三。华北还有四十几万伪主力军与地方军、大部分是国民党军队投降敌人的。从七七事变后，华北有国民党军队七十五万，当时敌人在华北才七个师团，没有打过一次胜仗。那时的“恐日病”非常厉害，社会秩序很紊乱，北平、天津、保定、大同相继失陷了。九月间，八路军出发前线，头一仗“平型关大捷”，把日本的板垣第五师团打垮了，开“九一八”以来中国军打垮日本军的先例。也是第一次缴了日本兵不少枪弹。三八年四月以后，国民党的军队大部分过了河，一部分溃散了，一部分投降了。华北的八路军，在三八年秋冬，就有很大的发展，积极作战。从武汉失守以后，日本军阀叫出同八路军共产党作战要准备百年战争，叫出五台山与武汉并重。武汉失守时，敌人进攻中国的军队有四十三个师团。三九年春，在华北的日军有二十二个师团，占日本进攻中国军队的二分之一强。从此，华北处在极残酷的斗争中。由三九年到四〇年八月，敌人把我们所有的解放区缩小了，我们来了一个百团大战，把敌人从解放区打出去，解放区又扩大了。日本准备太平洋战争，于四一年四二年加紧进攻我军，“百团大战”恢复的地区又被敌人占去了不

少，解放区人口当时只有千四五百万了。经过这两年残酷血战后，我们又继续恢复与扩大到现在的样子。所有的政府人员、军队、老百姓，在这一残酷的斗争中锻炼了，学会了很多本事。敌人在华北的军队，创造了许多杀人的办法，提出了“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囚笼政策、堡垒主义、封锁沟墙，为数之大，我们没有统计。日本派遣军华北参谋长安达十三，他统计的封锁墙沟之长，等于万里长城的六倍，等于地球外周四分之一。企图用这样的囚笼政策，把我们围困起来，一网打尽。以后又实行了“三光”政策，就是杀光、抢光、烧光。在军事上，有铁壁合围、奔袭、拉网战法、“蚕食”政策，名目很多，一一被我粉碎了。华北七年多的抗战，敌总司令换了七次。据说冈村宁次本事最大，来势也是最凶的。但是，他在华北共产党、八路军及民兵的面前，是失败了的。冈村宁次是七人中最坏、最毒辣，杀人最多的一个，其残暴是局外人难以想象到的。他整整在华北战场三年，没有得到便宜，也没有升官。但是他调到另外一个战场，即豫、湘、桂战场，就升了官。不到半年，就做了驻华全部总司令了。

我们在七年的战争中，打了多少仗？打死了多少敌人，自己牺牲了多少？今年抗战七周年纪念，华北战争作了一个统计，大大小小的战斗，有七四，〇六〇次，平均每天作战二十九次。所有华北的解放区，在这七年中，敌人伤亡三十五万一千一百十三人，伪军伤亡二十三万九千九百五十二人。俘虏了日本官兵二，四〇七人。在华北战场上，我们伤亡多少呢？我们也伤亡了三十万（民兵自卫队伤亡在外）。我们的牺牲，换来了六个解放区，解放了五千五百万人口，造成了六年多正面战场的相持局面。假如不是敌后的坚持，今天的重庆、昆明、成都，早就没有了。争取了这样长的相持时间，而国民党毫无

反攻准备，这是很遗憾的！事实证明，在蒋委员长法西斯的政令、失败主义的军令下，不是愈战愈强，而是愈战愈弱了。我们敌后解放区，八路军、新四军，是民主的政令，胜利的军令，是愈战愈强了。华北的军民，已经有了丰富战斗经验。就拿这个边区来说，各阶级更团结了，人民生活改善了，军民关系巩固了。抗战力量，比过去强的多了。过去土匪多，要饭的多，许多老百姓没有裤子穿，现在开始走向了丰衣足食的道路。这个区的人民、军队、民兵和文化、经济、政治建设等等，是加强了。敌后解放区的力量，也加强了。假使国民党也采取进步办法的话，那末，今天的反攻时间就到了。

由于国民党失败主义政策的结果，延长了反攻胜利。但中国抗战胜利的基础已打下了，因为德国明年必然的失败，美国在太平洋已进占莱特岛，中国敌后战场普遍的发展、巩固，真正人民的军队扩大了，现在有六十五万人，边区和敌后解放区是反攻胜利的基础，是未来新中国的榜样。

正面战场一天天削弱了，我们敌后战场愈战愈强，这到底是什么道理呢？有人回答，共产党八路军不怕死，华北的人民不怕死，勇敢，坚决，不怕困难，所以愈战愈强。我们说，这个回答是对的，但只是一个方面，而不是全面。共产党是中国人，国民党也是中国人，为什么共产党不怕死，国民党便怕死，华北的人民不怕死，难道华中华南的人民就怕死吗？共产党八路军，华北的人民不怕困难，难道其他地方的人民就怕困难？是的，我们应当分析一下，为什么一些省份的人不怕死，为什么有些军队很勇敢，另外一些人和军队就怕死，不能打仗，这样就可以找出一个最基本原因，这就是政策错误与正确的问题。政策是正确的，就能发动人民自觉的抗战，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就能愈战愈强。政策是错误的，人民不能发动起

来，军队就愈战愈弱。不然，就不能说明，为什么一个地方的人民勇敢，拥护军队，另一个地方的人民不勇敢，反抗军队，不愿意当兵。不分析政策对不对，就无法回答。华北能收复这样多的地方，新四军也是一样的。我觉得，这不一个人能做出来的。是共产党中央正确的政策，能代表全中国人民共同的要求。共产党中央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敌后解放区坚持了这个政策，共产党认识许多党派、许多阶级，承认这许多党派和阶级，因此要把这许多党派阶级联合起来，共同抗日。只有联合起来，团结我们民族全部的力量，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我们共产党开始就提出明确的方针，中国要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必须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蒋介石的国民党，忌讳讲各党派各阶级合作抗战。他们为什么不提各党各派各军各阶级联合呢？七年来的经验证明，他们不提各党派就是不承认各党派，不提各阶级，就是不承认各阶级，他们事实上只承认国民党与大地主资产阶级代表们。七年抗战以来的事实，就是“地无分南北”，一党专政；“人无分老幼”，唯我独尊。这样的政策，和我们共产党主张，就有了原则的分歧。共产党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是地主阶级与农民，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以及国民党、共产党、无党无派，联合起来，共同抗日。不管哪一党派，哪一阶级，民主的合作，实行三三制的民主专政，只反对汉奸与反民主分子。这是孙中山的革命三民主义，也就是新民主主义，在我们边区已经实现了，在敌后所有解放区也已经实现了。我们共产党明白，抗战要大家抗，国事也要大家议，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抗战胜利，日本赶出中国去，依然如此。我们主张减租减息，同时主张交租交息，敌后执行这个政策，地主与农民更加团结了。我们提出增加工资，同时提出发挥劳动热忱，增加生产，工人有利，

资本家也有利。这样的做，是照顾了工人农民，提高了他们抗战生产的热情，同时也照顾了地主资本家。解放区巩固了，愈战愈强了，这不是哪一个英雄做出来的，而是民主政策贯彻到各方面的一种结果。从国民党方面来看，他们采取了相反的政策。他们是一党专政。他们口头上国家至上，实质上是个人高于一切。口头讲民主，实质是要独裁，自私自利，上行下效，贪污腐化。在经济政策上，也不是自力更生，而是依赖外援。这样错误的政策，想愈战愈强，是做不到的。华北的事实证明，国民党的军队，七七事变后华北逐渐增加到七十五万，极少退到黄河南岸外，大部分变成伪军或瓦解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们反民主，反共。而且倡“曲线救国”，这个名字喊了很久，从三九年张荫梧受陈立夫的指示，在敌后就实行“曲线救国”，把自己的军队投降敌人，做汉奸，联合日本打共产党八路军，实质上就是反民主，打人民。敌人在三九年以前，叫“剿共灭党”，从国民党实行“曲线救国”政策以后，日本人只说“剿共”，不提“灭党”了。国民党当局这种办法，从中国人民看来，是愚不可及，弄得士气不振。河南、湖南、广西的败仗，就是这种错误政策的恶果。一九四二年六月以后，华北国民党军队投降敌人的有多少呢？有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庞炳勋，新五军军长孙殿英，二十七军预备第八师师长陈孝强，山东新四师吴化文，第二纵队夏继礼，第三纵队侯如墉，胶东纵队等，共计有十五万人。现在华北有四十五万伪军，如果没有这四十五万伪军，我们可以多牵制敌人八个到十个师团。这也就是错误的“曲线救国”所造成的恶果。国民党军事政策，军事上是挨打被动的政策，从来没有一次主动的去打敌人。人家打来，便招架，或回头便跑，这样的政策，永远打不了胜仗。几百万大军一触即溃，甚至不触亦溃，这是惨痛

的事实。所有反法西斯的同盟国都打胜仗，无论欧洲、太平洋，都打胜仗。敌后八路军、新四军，都打胜仗，且还愈打愈强。国民党得到同盟国许多援助，不能打一个胜仗。领袖！领袖！要打几个胜仗给老百姓看啊！不然，老百姓怎会高兴这样的领袖呢？

根据一九四五年一月二日《解放日报》
刊印。

一九四五年的任务^{*}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五日)

毛 泽 东

一九四四年快要完结了，我们在一九四五年的任务是什么呢？我们有些什么工作在明年要特别注意去做呢？整个反法西斯战争有很大的胜利，打倒希特勒明年就可以实现。我们唯一的任务是配合同盟国打倒日本侵略者。现在美国已打到莱特岛，并可能在中国登陆。同时，日本侵略者已打通了由东京到新加坡的大陆交通线，中国的沦陷区更加扩大了。敌人是否会停止它的进攻呢？我看还不会停止，它还有可能再向我国西南部及西北部进攻。在此期间，日本侵略者必定又要玩弄诡计，企图通过中国的投降主义者，引诱中国政府投降。中国内部的状态仍然是不团结，国共谈判毫无结果，中国人民的抗日力量被中国反动派人工地分裂着。正面战场的战事，节节失败，国民党当局仍然固执其为全国人民所不满意的一党专政及其失败主义的政策，拒绝一切有利于抗战、团结与民主的建议。只有艰难缔造的广大的中国解放区，执行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即新民主主义，团结各界人民，建立了英勇的军队，粉碎了一切敌人的进攻，并能发动攻势，收复了广大的失地。在此种情形下，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

^{*} 这是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第二届第二次会议上的讲话。

必须使全国人民明白，用人民的力量，促成由国民党、共产党、其他抗日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在民主基础上召集国是会议，组织联合政府，才能统一中国一切抗日力量，反对日本侵略者的进攻，并配合同盟国，驱逐日本侵略者出中国。我们经过林祖涵^{〔1〕}同志曾经向国民参政会提出了这个问题，后来又向国民党当局用书面提出了，最近周恩来同志又专为此事去重庆谈判一次，但是依然没有结果。在目前，很清楚的，单是谈判是不能成功的，希望全国人民一致起来，大声疾呼，要求国民党当局改变现行政策，以便迅速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这是全国人民的总任务，中国人民不论在大后方，在沦陷区，在解放区，都要为此目标而奋斗。只要中国有一个真正实行民主政策的、能够动员与统一中国一切抗日力量的联合的中央政府出现了，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与中国人民的解放，就会很快了。为了这个目的，大家应该想出许多办法来。

在大后方，我们必须援助被反动当局压迫的民主爱国运动，必须动员一切力量抵抗敌人的进攻，必须警惕投降主义者背叛民族投降敌人的阴谋活动。青年们及其他各界，应该有许多人到敌人占领的地方去打游击，广大群众则应当准备在一切敌人可能到的地方就地抵抗。同时，解放区则以自己的英勇作战行动及发动新地区的游击战争，有力地援助大后方。大后方的一切人民，一切爱国党派，都有责任为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而努力。大后方已经有许多党派，许多工业家、教授们、学生们，甚至许多国民党人，赞成联合政府的主张，认为这是目前抗日救国的唯一正确道路。但是现在的力量还不够，应该号召广大的人民起来为此而奋斗。

在沦陷区，广大人民遭受敌人的残酷压迫，渴望解放。我们必须帮助他们组织起来，准备在时机成熟时，举行武装起

义，配合军队的进攻，里应外合地驱逐日本侵略者，解放我们的兄弟姐妹们。这一任务，现在必须提到和解放区工作同等重要的地位。这是十分迫切的工作，不管如何困难都要去做。在这个工作中，法国共产党与法国人民有了光荣的榜样，我们应该学习法国的经验。在沦陷区人民中，应解释民主的联合政府之必要，使他们知道只有这个政府出现了，沦陷区人民的解放就快了，号召他们起来为这个目标而奋斗。

在解放区，这里现在已经成了抗日救国的重心，截至一九四四年十一月止，有了六十五万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抗日军队，有了二百多万民兵，有了九千万被解放的人民。一九四四年一年中，我们不论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哪一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成绩。但是，我们在一九四五年有些什么工作值得特别指出的呢？

我认为，一九四五年，中国解放区应该注意如下各项：

（一）扩大解放区。无论哪一个解放区的附近，或其较远之处，都还有许多被敌伪占领而又守备薄弱的地方，我们的军队应该进攻这些地方，消灭敌伪，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我们必须把一切守备薄弱、在我现存条件下能够攻克的沦陷区，全部化为解放区，迫使敌人处于极端狭窄的城市与交通要道之中，被我们包围得紧紧的，等到各方面的条件成熟了，就将敌人完全驱逐出去。这种进攻，是完全必要的与可能的，我们的军队已经举行了很多这样的攻势，特别是今年有很大的成绩，明年应该继续这样做。在一切新被敌人占领、尚未建立解放区的地方，例如河南等处，必须号召人民组织武装队伍，反对侵略者，建立新的解放区。几年的经验证明，组织众多的经过训练善于执行军事政治各方面任务的“武装工作队”，深入敌后之敌后去袭击敌伪，组织人民，以配合解放区正面战线的

作战，有很大的效力，各地都应该这样做。

（二）敌人的进攻（“扫荡”）是不会停止的，我们应该经常警惕，随时准备用反“扫荡”粉碎敌人的进攻，没有这种警惕是不对的。不要以为我们强了，敌人弱了，敌我力量对比形势现在已经改变了，须知敌人还是强的，它决不会忘记向我们进攻，我们还是比敌人弱，我们还要作很大的努力，并执行正确的军事政策及其他政策，才能改变这种形势。只有到了我们占优势的时候，敌人进攻这回事才会成为不可能了。

（三）整训现有的自卫军与民兵，增强他们的战斗力。自卫军与民兵数目还不够，各地除某些个别地方不可能再扩大者外，均应尽量地扩大。九千万人民中，除老幼及患病者以外，一切男女公民，均应组织在自卫军中，在不脱离生产原则下，轮流担任保卫家乡与协助军队的任务。从自卫军中挑选精干分子组织民兵或基干自卫军，在“战斗与生产结合”的原则下，协同军队作战，或者独立自主地作战。九千万人民中，至少应该有百分之五即四百五十万人当民兵，即是说，比现有民兵数目扩大一倍。有些地方，还没有十分重视这个工作。在这些地方，民兵的数量太少了，又缺乏整训，质量也不高，一九四五年必须改变此种情况。自卫军与民兵，均必须不违农时，减少误工，不妨碍生产。在这里，变工的方法是必要的，战斗的民兵组织与生产的变工组织，往往可以互相结合。自卫军与民兵的领导机关，必须是民主选举的。只有这样，自卫军与民兵才能扩大，也才能提高战斗力。民兵的重要战斗方法是地雷爆炸，地雷运动应使之普及于一切乡村中。普遍制造各式地雷，并训练爆炸技术，成为十分必要。

（四）整训正规军与游击队。一九四五年，应将全部军队轮番整训一次。按照新方法进行整训，举行群众性的练兵

运动。

（五）在老区域，补充原有军队的消耗数额。在新发展区域，在经济条件许可下，应该扩大军队。不论补充军队与扩大军队，均以不加重人民财政负担为条件，这一点必须谨记。如果违背了这一点，我们就会要失败的。

（六）军队内部的团结，非常之重要。我们八路军、新四军，历来依靠官兵一致，获得了光荣的胜利。但是，中国军阀军队的军阀主义习气在我们军队里的影响，仍然是存在的。有些部队，这种习气还是很严重。一九四五年，应该进行广大的工作，将军队官兵关系中的一切不良现象，例如打人，骂人，不关心士兵的给养、疾病及其他困难，对于士兵的错误缺点不耐心教育说服、轻易处罚，以及侮辱或枪毙逃兵等等恶劣习惯及错误方针，从根本上去掉。许多部队，现在还未重视这一工作，由于不明白这一工作是军队战斗力的极其重要的政治基础。目前开始的一年整训计划，军事整训与政治整训应该并重，并使二者互相结合。整训开始时，还应着重政治方面，着重于改善官兵关系，增强内部团结，发动干部与战士群众的高度积极性，军事整训才易于实施与更有效果。这一工作的实行，应在每一部队内部举行拥干爱兵运动，号召干部爱护士兵，同时号召士兵拥护干部，彼此的缺点错误，公开讲明，迅速纠正，这样就能达到很好地团结内部之目的。

（七）加强拥政爱民与拥军优抗两项工作，进一步地改善军民关系。我们八路军新四军和我们解放区人民之间的关系，历来是好的，因此我们能够战胜敌人，巩固与发展解放区。但是，旧军队的习气，同样会传染给我们的，军民关系中的不良现象，例如军队态度蛮横，损害人民利益，纪律不好，不尊重政府等事，也就时常发生。同时，地方对军队帮助不够，优待

抗属工作做得不好等等现象，也就存在着。一九四三年，我们曾经指出了这些工作的重要性，但是许多地方还未重视。一九四五年旧历正月，一切解放区应普遍举行拥政爱民运动与拥军优抗运动，一定要做出显著成绩来。已经有了成绩的，必须继续做，必须检查此两项工作的结果。如果我们的全部军队，官兵上下团结一致，从政治上铁一般地巩固起来了，加上军事技术与战术的训练，又加上人民的拥护，中国人民的抗日救国事业，就有了坚强的保障了。

（八）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的根本路线，在解放区，首先表现在各阶级各党派合作的“三三制”政府工作中。这一方面的工作，各地有做得好的，有做得差的，各地均应总结经验。共产党人必须和其他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多商量，多座谈，多开会，务使打通隔阂，去掉误会，改正相互关系上的不良现象，以便协同进行政府工作与各项社会事业。凡参加人民代表会议（参议会）工作、政府工作及社会工作的一切人员，不问属何党派，或无党无派，应该一律被尊重，应该一律有职有权。

（九）减租，各地均有成绩。但是有些地方成绩少些，明减暗不减及恩赐观点仍是存在的。另一方面，也有减得太多，或在减租之后不注意交租等现象。这两种偏向都应纠正。减租之后租约满期的，除在照顾双方利益原则下可由地主收回自种者外，应该重订新约，使农民有地可种。老区域减租未彻底的，应该查租。新区域尚未减租的，应该发动减租。租不减是不对的，减得太过火也是不对的。凡地主因被敌人摧残或其他原因而生活困难的，政府应帮助他们解决困难，给以从事农工商业或参加其他工作之方便。要把这件事当做政府工作之一，借以团结他们反对共同敌人。我们现在是处在农村中，土地问

题的正确解决，是支持长期战争的重大关节，希望大家十分注意。

(十) 今年绝大多数地方都进行了生产运动，有了显著的成绩，这是非常可喜的一件大事。但是也有一部分地方还未着手进行，另有一部分地方成绩不大，再有一部分地方军队方面有成绩，人民方面缺乏成绩。一九四五年，必须绝无例外地普遍举行大规模的生产运动。一切军队于作战、训练之外，必须从事生产自给，机关学校也是如此。只有特殊情形者，可以允许减少或免除生产。必须动员人民，在自愿原则下，组织生产互助团体，例如变工队、互助组、换工班等。我们的地方工作人员，必须用绝大精力去帮助人民，组织这种互助团体，以便大规模地恢复生产与发展生产，不但应该使人民够穿够吃，而且应该使人民逐渐地有盈余。“耕三余一”的口号，除被敌人摧残厉害的地方外，就是在敌后解放区，也是可能实现的。我们解放区的工业品，必须力求自给，必须争取于数年内达到全部或大部自给之目的。由国营、私营与合作社经营这样三方面的努力，达到这个目的是可能的。和生产相辅的是节约，必须尽可能地减少浪费。“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确定不移的财政方针。如果我们不去从根本上发展经济，而去枝枝节节地解决财政问题，就是错误的方针。如果我们努力地发展了公私经济，我们就能支持不论时间多久的战争，而使精力不至于枯竭。这一点非常重要，必须使一切工作人员及全体军民透彻地认识清楚，以便组织他们从事大规模的生产运动。在国营经济中，按质分等的个人分红制度，是在很多部门内可以实行，并应该实行的。“军民兼顾”、“公私兼顾”两个原则，必须注意不要违背。

(十一) 为着战胜日本侵略者，于充分注意军事、政治、

经济之外，还要注意文教工作。我们解放区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都是好人。他们的缺点甚至错误，可以在工作中改造。他们是人民事业的宝贵资本，他们应该被重视。他们中有许多人从事军事、政治、经济工作，另有许多人从事文化、教育、艺术、卫生工作。所有这些人员，都应该被重视。今年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会议所指出的方向，各地都可以适用。专制主义者利于人民愚昧，我们则利于人民聪明，我们要使一切人民都能逐渐地离开愚昧状态与不卫生的状态。各地政府与党组织，均应将报纸、学校、艺术、卫生四项文教工作，放在自己的日程里面。

（十二）从军队中、农村中、工厂中及政府机关中，用群众民主选举的方法选出优秀分子，充当战斗英雄、劳动英雄及模范工作者，给予奖励与教育，经过他们去鼓励与团结广大的群众。这种制度，对于提高军队的战斗力，提高农业及工业的生产力，提高政府机关及一切其他机关的工作能力，数年来的经验已经证明是极有效果的，各地应该普遍地推广这一运动。

（十三）为着战胜日本侵略者，需要广大的有能力的干部。我们现有的干部，比较从前增加很多，但是仍感不足。干部的能力也提高了，但是仍很不够。特别是下级与初级干部，不论是军队的或地方的，他们的文化程度，他们对于政策的了解程度，以及他们工作技术的程度，一般地是不高的，有些则是很低的。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他们忙于工作，领受教育的机会太少。一九四五年，各地干部教育，应该着重于训练军队的（连至班）与地方的（区、乡）下级及初级干部。在职的用轮训办法，不在职的用学校办法，有计划地将他们提高一步。

（十四）我们工作作风中的一项极大的毛病，就是有些工作人员习惯于独断专行，而不善于启发人们的批评讨论，不善

于运用民主作风。当然，这是拿我们解放区的这种作风与那种作风作比较，而不是拿我们解放区与国民党区域作比较。我们解放区是民主的地方，国民党那里是封建的地方，这两个地方是原则上区别的。但是，我们队伍中确有许多人尚未学会运用民主作风，旧社会传染来的官僚主义作风，依然存在。别人提不得不同的意见，提了就不高兴。只爱听恭维话，不爱听批评话。为怕碰钉子，受打击，遭报复，人们不敢大胆提意见。这是一种很不好的作风，这种作风阻塞着我们事业的进步，也阻塞着工作人员的进步。我提议各地对此点进行教育，在党内，在党外，都大大地提倡民主作风。不论什么人，只要不是敌对分子，不是恶意攻击，允许大家讲话，讲错了也不要紧。各级领导人员，有责任听别人的话。实行两条原则：（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二）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如果没有“言者无罪”一条，并且是真的，不是假的，就不可能收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效果。自从整风以来，我们的工作作风有了很大的进步，这是受到了一切善良人民的称赞的，这是很光荣的。但是我们仍有严重缺点，我们许多人中仍然缺乏民主作风，我们一定要改正这个缺点。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我们有些什么不好的东西舍不得丢掉呢？如果我们改正了这个缺点，那我们就能团结更广大的人民，我们的事业就能获得更大的与更快的发展。

（十五）除了上述种种以外，摆在解放区人民面前的极其重要的一项任务，就是想出种种能够促成联合政府的办法来。继续和国民党及其他党派谈判是一种办法，全体人民起来呼吁要求是一种办法，还可能其他的办法。总之，我们一定要多方努力，将这个适合全民族抗战要求的民主的联合政府，尽可

能迅速地建立起来。

我们解放区已做的和要做的工作，当然还有许多，但我以为目前特别值得指出的，就是上述十五项，其他就从略了。各个解放区的情况与工作步骤，在许多点上互不相同，各地应按照自己的特点布置工作，以便适当地完成各项任务。

一九四五年应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更大发展的一年。全国人民都希望我们解放区能够救中国，我们也有这样的决心与勇气。我希望我们解放区的全体军民一齐努力，不论是共产党人与非共产党人，都要团结一致，为加强解放区抗日工作而奋斗，为组织沦陷区人民而奋斗，为援助大后方人民而奋斗，为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而奋斗。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三卷刊印。

注 释

〔1〕即林伯渠。

高岗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 二届二次会议的讲话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七日）

各位参议员、各位来宾，这次参议会上大家对于政府过去的工作做了检讨，提出了许多批评和建议，提出了今后新的任务，对于国民党的寡头独裁提出了严正的抗议，喊出改组国民政府改组统帅部的呼声，表现了边区人民的正气。这些都是很好的。边区经过这几年已经大大的改变了面貌，这些改变主要是由于边区生产发展的结果。像米脂高愉庭参议员所说的：“荒山变成熟地，梢林里建筑了许多工厂、医院、学校。”又像淳耀房文礼参议员说的：“过去有袄无袖，有裤无裆的人，现在放下粮食，买下骡子”。抗战前后，边区的粮食仰赖外边供给，现在我们除自给外还能剩余一部分。一九三七年全边区只产粮一百三十五万石，今年产粮二百十五万石，增加了八十万石。关于穿的，一九四一年边区植棉五万亩，收花七十五万斤，今年植棉三十一万亩，估计可收花三百万斤。我们有许多织布的工厂，政府又帮助人民发展纺织事业，给私营的工厂贷款，供给机器。毛织业边区也有许多产品。这样边区人民就有吃有穿。关于日用品：铁器、纸、火柴、肥皂、瓷器、纸烟，我们都可以自己制造，并逐渐走向完全自给。我们采取大家动手公私两利的方针和合作的形式（如变工队、扎工队、合作

社）组织了劳动力，提高了生产。结果是人民负担的减轻和生活的改善。因此边区各阶层之间、军民之间就更加团结，边区抗日的力量就更为强大，边区就更为巩固。

第二个改变就是边区文化教育事业的开展。一九三八年时边区只有三个中学，现在有七个中学一个延大，抗战八年来给全国各地培养了成千成万的干部。现在边区有各地方办的几十种报纸。边区的艺术、戏剧和秧歌，不是给少数人服务而是给全边区的人民服务的。边区的医院在给人民看病、消灭瘟疫，帮助人民办助产训练班等方面，也有一些成绩。

这些经济和文化的建设成绩，和先进的国家比较起来诚然还差的很远，但比过去的基础已经进步了许多。我们的地区，是一个地广人稀交通不便、极端分散的落后农村，又处在战争、封锁和国民党的抢劫骚扰的环境之下。如果边区没有国民党的封锁和骚扰，毫无疑问我们会建设得更好一些。

和边区的欣欣向荣相对照，我们看一下国民党统治区域的状况吧！在农业方面，国民党统治地区日益缩小，征粮负担却年年增加，从一九四一年五千三百万市石增加到今年一万万市石。棉业由于国民党的压价强买，每百斤成本一万五千元，而花纱布管制局奉蒋介石命令只发官价一万一千元（十月一日西安报纸），结果棉田缩小了十分之八。工商业方面，由于统治专卖的结果“生产萎缩，关厂停工”（生产局长翁文灏在参政会报告），囤积居奇，市场萧条。据房文礼参议员说：淳耀边境，友区每亩负担四斗九升，边区每亩负担二升二合，相差约二十二倍。由于这种悬殊，在陇东某地有几百人民打碎保甲门牌要求依靠边区。镇川堡百余商家大部关门，有的抛弃房产移入边区。宁夏等地回民移至三边者四百余户。在大后方流传着这样的民谣：“革命尚未成功天有眼，同志仍须努力地无皮”。

为什么在边区是民生改善公私两利而在国民党区域则是“民不聊生，公私交困”（王晓籟先生语）呢？国民党区域具备着许多客观的优越条件为边区所无，如地广人众，物产丰富，技术人才较多，又有盟国的接济。为什么大后方有这样条件，反愈变愈坏，岌岌不可终日；在边区自然条件虽坏，却愈变愈好，欣欣向荣呢？这就是因为边区的政权是真正人民的政权，而国民党的政权则是少数独裁者的政权。边区参议会由人民选举出来，为人民办事，处处为人民打算。在三三制政权之下边区非党人士担任边府副主席、厅长、县长、科长及乡长、乡文书以上的各级行政干部有三千五百九十二人。参加经济文化工作者二千二百一十人。他们在职有权，共同担负起建设边区的责任。凡是参议会通过的议案，我们政府都认真实行。在国民党统治下，情况完全相反，什么都是一党包办，指定委派，名义上党治，实际是少数人的独裁，对非党人士一方面特务威胁，强迫入党，另一方面请客摆样子，毫无实权。国民参政会通过了一千四百件提案，到底实行了几件？在这样寡头专制政治之下，就形成“贪赃枉法，官升财发；埋头苦干，撤职查办”的怪现象（国民参政员芦前语）。

在这里全国人民可以明白看到两条道路两种结果，边区所走的民主道路是抗战建国引到胜利的“阳关大道”，国民党当局所走的独裁道路则是祸国殃民，“此路不通”。各位参议员慷慨激昂的要求改组这种反民主的独裁政权，要求成立联合政府和联合统帅部，这是完全正确的。

边区的工作的成绩和意义既如上述。但我们决不能自满，我们还有许多事要做。特提出下面四项任务和各位商量：

第一项是生产。根据各地具体情况用施肥、细耕、多锄、除虫、修水利、开荒等办法增加粮食，达到耕三余一，扩大棉

田到四十万亩，推广纺织，争取工业品全部自给，安置移难民，发展牧畜。关于办合作社，这是一件好事，也是一件大事，也必须承认这是很难办的一件事。合作社必须是人民自愿的，绝对不能强迫摊派。那个地方办什么合作社，要看当地人民的需要和自愿，摊派的股金要退股，合作社的领导必须加强。

第二项是团结。边区内部各阶层的团结，人民与政府的团结，人民与军队的团结是有进步的，但仍须努力加强。在减租减息问题上，有少数地方尚未贯彻，以后还要切实贯彻，有些地方贯彻了减租，但有过火之处，应该纠正。在公粮负担上，应适当调剂，以照顾各阶层的利益。其次，今后凡是愿意打日本，愿意为边区民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服务的人，不管是什么阶层、什么党派，大家都来挑起担子。一切工作大家商量，打破隔阂，出之以诚。许多参议员提议明年正月来一个拥军优抗运动，这很好。希望我们参议员大家参加这个运动。

第三项是作风问题。我们的政策都是正确的，但是执行中还有缺点，有的区乡干部还有强迫命令、形式主义的毛病。这个责任主要在上级而不在下级。这些干部对于“对谁负责”的问题没弄清楚。必须确定：我们的一切工作首先是对当地人民负责，他们是我们的上司，我们是他们的勤务员，一切工作都是从当地人民出发。上级领导机关的缺点是了解下情不够。今后每一件大的工作各级领导机关要先酝酿成熟，好好研究，教会下级干部怎样做法，再去进行。要照顾到干部的经验 and 能力，任务不要给的太多。至于打人骂人，在新民主主义下，是根本不许可的。有些干部与人家合作时，民主作风不够，也要很好地检讨，进行自我批评。明年选举要在群众中大大的发扬民主，展开批评。我们对人民负责，若是工作有不好的地方，

人民不满，就应改正。不像大后方，国民党当局就不敢让人民说一句话。

最后，训练干部问题。大部分区乡干部艰苦工作，为人民服务。他们是好人，不是坏人。但由于他们文化水平较低，工作方式较简单，有些还受了旧习气的影响。今后对他们以教育为主，个别的加以适当的调换，坏分子则给以惩办。要办地干班、冬训班，帮助他们总结经验。这是贯彻政策、改善作风、转变工作的基本环节。逐渐提高他们的文化也很重要。县及分区的干部要学习业务学习政策。纠正过去对区乡干部指示多而教育少的毛病。最后还应当培养大批边区子弟为边区服务、为西北人民服务。

我们要实实在在地给人民办事，把边区工作做得更好，才能援助和支持大后方人民和我们共同起来要求改组国民政府和统帅部，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出中国去。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毛泽东关于扩大解放区 给程子华的指示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八日)

子华同志：

亥文电悉。(一) 敌对蒋^{〔1〕}仍是一打一拉，目前又到了拉的时候，但将来还可能打。(二) 蒋对我党不愿作任何原则上让步，我党应坚持联合政府，在此种立场上不关闭谈判之门，其他不应再谈，结果仍是拖。(三) 沦陷区扩大，如我党能执行正确政策，便可使现有军队获得巩固，并可在新发展地方扩大军队。(四) 豫湘粤浙四省明年可能大发展，陕甘宁边区已抽出六千军队及干部分赴豫湘。(五) 河南发展，胡宗南、汤恩伯两部又南调十余师，此间已不感威胁，不须再增兵。(六) 希望你们努力向雁北、绥东、察哈尔、热河及冀东敌占区发展，扩大解放区。同时努力从事城市工作。

毛 泽 东

亥 巧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注 释

〔1〕指蒋介石。

毛泽东关于对英雄模范须勤加 教育给程子华的信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子华同志：

关于李勇的落选，你们的处理是对的。值得注意者，是李勇的骄傲，主要的由于我们未能向他多作教育，使他不要骄傲。李勇这类现象，陕甘宁边区也发生了，各地还会发生，其责任主要地不是在他们本人，而是在于领导他们的人。嗣后凡当选的英雄模范，须勤加教育，力戒骄傲，方能培养成为永久模范人物。如果只有赞扬，没有教育，骄傲落选，将是必然现象，此点请加注意。

毛 泽 东

亥敬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三卷刊印。

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一) 十一月间，罗斯福代表赫尔利将军来延，其目的在调停国共关系，我们和他商定了一个向蒋介石提出的协定草案，其内容以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为中心，并派周恩来同志偕赫尔利去重庆和蒋谈判，蒋拒绝这个协定草案，反而要求我党交出军权，而以允许我方一人加入政府，一人加入军委会作官为条件。我们坚持联合政府主张，谈判无结果，但未关闭谈判之门。

(二) 蒋军队溃败不堪，重庆及国民党区域人心惶惶。各界人民，包括许多工业家、大学教授及许多国民党员对蒋失望，希望共产党拿出办法来，我党在国民党区域人民中的威信，极大地提高。

(三) 蒋的全部正规军，包括杂牌在内，已降到不足二百万，中央军的战斗力已极大下降。

(四) 蒋及国民党镇压人民更加厉害，成都发生殴击学生大惨案，引起各界公愤，万余学生游行示威，为一九三五年一二九学生运动以来第一次大运动。

(五) 国民党区域民生凋弊，财政恐慌，土匪蜂起，自发

的农民武装暴动不断发生，多至数百股，小者数十人，大者万余人。湘西一股万余人坚持两年之久，蒋派大军进攻，屡战屡败。

（六）许多地方系军队对蒋早成半独立状态，特别是云南、四川、广东三系，近数月来更加不满。

（七）蒋已密令白崇禧，要他在华中发动对我党的军事进攻，其目的在打给日本人看，缓和日本对蒋的进攻。蒋对日本人暗中勾结近日增多，其目的也是缓和进攻。如果日本再向西南及西北进攻，国民党崩溃甚至投降的危险是可能发生的。

（八）上海一带敌占大城市的资产阶级近日更多向我党靠拢，傀儡政府中人员向我输诚者增多，各地伪军叛日降我者增多。

（九）我党军队又有发展，现已达六十五万，明年可能达到一百万，民兵也有发展，明年可能达到三百万。

（十）我党及中国解放区在国际上的地位已提高，外交关系之门已打开了。

（十一）最近八个月，中国政治形势起了一个大变化。国共力量对比，已由过去多年的国强共弱，达到现在的国共几乎平衡，并正在走向共强国弱的地位。我党现在已确实成了抗日救国的决定因素。

（十二）许多人赞成组织中国解放区联合会（不称政府），以便加强解放区工作，影响大后方及沦陷区人民，促进民主的联合政府之建立。但时机尚须考虑。

（十三）对日战争时间将延长，可能还有数年之久。我党须利用今后两年增强抗日力量。一九四五年方针见之十二月十五日毛主席演说，各地应按照自己特点部署工作，特别注意发

展生产、城市工作及扩大解放区三方面。第一，如果各地明年一年，用极大努力，在军民生产方面有一个普遍的高涨，由现在的克服困难，走向不久将来的丰衣足食，我们就能在经济上（粮食及日用品）胜过大后方及沦陷区，而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内战时期，我党不懂得发展生产，也不懂得节省人力，以致后来精力枯竭，不能持久。鉴于这个教训，现在必须充分注意发展生产与节省人力，使战争愈持久，我们愈丰富，愈强盛。数年之后，我们将出现为中国最强有力的政治力量，由我们来决定中国命运。各地须立即利用冬季，准备明年春耕，并确立明年全年的军民生产计划。第二，如果我们明年一年用极大努力，在敌占大城市及交通要道中普遍建立地下组织，就可保证将来的继续发展，组织广大的地下军，并占领大城市。在解放区工作的人们为烦忙工作所束缚，产生了不甚注意沦陷区地下工作的弱点，各地必须依照中央指示，克服此种弱点。只有我们占领大城市以后，我们才能成为最后胜利者。第三，如果我们明年一年用极大努力，扩大解放区的面积与人口，就有可能依据新地区的人力物力扩大我们的军队。除向豫湘浙等省派遣大批军队及干部创设新地区外，各地均应有步骤地努力扩大自己的新地区，并十分注意保育这些地区的人力物力，切勿滥用与浪费。如果在数年之后，我们能达到一百万至一百五十万有纪律有训练的军队，而又有充足的粮食及日用品供养这个军队（没有这一条件是不行的，那时至少要有大批小城市与若干中等城市在我们手中，并且许多军队还应自己从事生产自给），而不感到勉强与竭蹶，中国的命运就可由我们掌握了。

（十四）一切主要政策，各地大都上了轨道。但在这些政

策中，尚有部分的执行得不恰当。一切决定于任务的提出与政策的恰当，精密地掌握政策的执行，十分必要。

中 央
亥 有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四册刊印。

刘少奇、陈毅关于发展江南的 准备工作给饶漱石等的电报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饶张赖^{〔1〕}：

你们向南发展的部署和给各师首长的密信，中央各同志均已阅悉。你们的分析和部署是对的，中央前已略复。为了应付情况变化和在准备工作方面，我们又想到几点，特提出如下意见供你们考虑：

一、为了准备在反攻时期，我党能确实占领芜宁沪杭各大城市，目前必须以大力着手取各种方式发展江南苏、湘、皖、闽、赣地区的工作，包括赣江以东，大海以西广大地区，南面应包括浙西天目山京赣路沿线及打通武夷山曾镜冰、龙跃西处，西面应加强黄山山脉及赣东北地区的地下党工作或相机去恢复。华中局及四军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担任发展长江以南地区，以便将来能确保在宁沪杭三大城市中的人民之完全胜利。如果是这样，则北面夺取陇海沿线的任务，应由华北、山东负主责，华中只担任配合责任。关于西面争取平汉沿线和武汉及大别山的任务，中央准备以入豫部队及四军五师划为一新的战略单位（由华北、太行、太岳各地予以协助），湖南及两广各为一战略单位，四军对以上各单位只担负配合责任，但目前你们与五师的关系暂不改变。

二、为了争取江南苏、湘、皖、闽、赣地区，四军部队开始分批南下，粟裕率三个团为一批是对的，叶飞（或震林^{〔2〕}同去）准备率第二批去，嗣后看情形可能再从二三师派第三批去。提议派去部队，每团均留下三分之一的底子番号，仍旧使在原地继续发展。

三、如反攻时期揭幕，则四军全军主力除防御李品仙者外，均应南渡长江，去保证在江南伟大发展，诸如破敌收京入沪配合盟军登陆等任务。目前你们应从此种战略的可能情况出发，一面能使四军逐渐南调，一面能使现在江北的各地方兵团逐渐加强和提高，而能适合需要全部担任江北重大的配合任务，你们今后一切工作都应照顾大举南进和加强现地的双重任务。

四、华中局及军部应预有准备，于将来适当时期率队进入江南去主持全局，而江北现地应于军部南移后能成立一个独立工作的大单位，负责江北工作。这个江北军区要能担负起华中战略后方的重大任务，如出干部、出兵、出军需品、出粮秣资财、保证前线动用无缺等。

五、因此你们应开始考虑江北大军区的人选，将来这个单位仍是华中局下面一个极其重要的战略单位，下面的各军区，专区，县区均应以就地取材为原则，尽先任命与当地人民有联系的苏皖干部去担任领导工作，许多外地干部，应大量调赴江南工作，这方面在华北、华中过去均未十分注意。中央来陕北，自开始重用陕北当地干部充任重要领导责任之日起，收到改进工作、团结全党、团结人民的效果极大。在华中，例如粟、叶南进，应考虑培养管文蔚、季方、黄逸峰等，作为苏中的领导中心，重新要他们担任指挥部队和党的工作。例如在军

队方面，三师应注意提拔原十五军团的干部到师级工作（徐海东同志病况如何，代中央慰问），例如二师方面中央决派郭述申、周骏鸣等回来负责，过去在二师方面对引用大别山的干部方面是不够的，在其他各地的地方工作方面，均应提拔当地干部，不仅作政权工作，而且就其可能去担任党和军队的重要工作。我党在整个内战时期均曾犯过以外地干部代替当地干部的偏向，这是一种脱离群众的偏向，你们在进行大的战略转移之际，宜注意人事配备中的提拔当地干部的原则。自然，华中的大发展，是在四军进入之后，那时不能不形成外地干部占优势的事实。但几年来的情况变化，当地干部已受过锻炼，这一事实已到了应该改变的时候了。而且在四军未到之前，华中确有一些开创游击的老干部，如管文蔚、孙象涵、余宗田、吴觉及其他许多同志，目前应考虑就才德资三方面的可能性，宽广大胆的在当地去重用他们，加以培养，加以提拔。

六、中央决定将华中前后来延干部计百余名全部派回华中工作。另从在延的东南籍贯的团县以上老干部，调四百名左右来华中工作。还又加调东南各地的新知识分子约四百名同来，这些干部明春可分批起程，但这些干部大部应使用在江南去担任发展工作，并准备就可能派些到闽赣各地去，而在江北各地区，仍应尽先录用当地人才。

七、以上是属于战略部署上的一些意见，提出供你们考虑，例如江南情况是否能围集众多兵力，其限度如何，江北地区抽调兵力的限度如何，是否影响到现有坚持和将来配合，以及提拔当地干部和提拔部队老基础的干部的可能程度，均应防止另一偏向的发生。还有其他未想到事情甚多，请你们详加考

虑电告中央，再作执行的决定。

刘少奇 陈 毅

亥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注 释

〔1〕指张云逸、赖传珠。

〔2〕即谭震林。